胡適文存二集目次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胡適文存二集卷一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裏，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

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夢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爲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爲，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并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明末到於今，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 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眞僞的考訂。考訂眞僞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 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爲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爲前

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爲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着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鉤沉，小學鉤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裏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

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　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

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却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却回到兩漢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

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會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　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眞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〇），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

猶指秫黍以爲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爲。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註，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僞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

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啓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爲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彌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資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裏抬出來，尊爲四書之一，推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着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

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却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着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着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採，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鑑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

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擴大研究的範圍。

(2)注意系統的整理。

(3)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隘的

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爲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

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爲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

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

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尙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淸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　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　不會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銷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

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製一番（部首依筆畫，每部的字也依筆畫），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

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校讎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鈔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爲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幷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

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偌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賬式的整理。　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賬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賬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

縱長增高的。古代結賬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賬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賬，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歎』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又可以明白結賬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爲二千年的詩經爛賬至

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爲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頸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賬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嘆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爲，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賬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賬。詩經的總賬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賬。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賬。

(D)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僞詩傳，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迷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賬，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賬裏未曾解決的懸賬：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閒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賬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賬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

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爲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着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史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呢？ 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

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卽是『矩子』，而『矩子』卽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 Karlgren, 如 Baron von Staël-Holstein, 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

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

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并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十二，一月。

發起『讀書雜志』的緣起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學者王念孫和他的兒子王引之兩個人合辦了一種不朽的雜志，叫做『讀書雜志』。這個雜志前後共出了七十六卷，這一百年來，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們想像那兩位白髮的學者——一位八十多歲，一位六十多歲——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校注那許多的古書來嘉惠我們，那一副『白髮校書圖』還不夠使我們少年人慚愧感奮嗎？我是崇拜高郵王氏父子的一個人，現在發起這個新的『讀書雜志』，希望各位愛讀書的朋友們把讀書研究的結果，借他發表出來。一來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來呢，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

十，二，二二。

王莽

——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王莽于西歷紀元九年建國，那年他就下詔曰：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

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于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此等處皆可以補史傳的不足。百年前，董仲舒也有『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的主張。）……漢氏減輕田稅，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晉灼曰，罷癃老病者，皆復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刦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貧者不厭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詔須看王莽傳。）

莽傳說，『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食

貨志同。）

此政策即『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當日施行時自然有大困難。到了西歷十二年，中郎區博諫莽曰：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傳）

莽知民愁，乃下書曰：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

西歷十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設『六筦之令』。『筦』字食貨志作『斡』，即是『歸國家管理』之意。六筦是：

(1)鹽，(2)酒，(3)鐵，(4)名山大澤，(5)錢布銅冶（今本錢作鐵，今依錢大昭校，據閩本。）(6)五均賒貸。

食貨志記諸筦，有兩次詔令的原文。莽傳亦有兩次，一在西十年，一在西十七年。食貨志第一詔當是十年的：

夫周禮有賒貸，（此指泉府之職。）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因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並兼也。

『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兩市及五都）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即泉府）丞

一人。』此時似尙未明定『六筦』之數，諸『斡』次第舉行。凡屬于國有富源的，辦法如下：

『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鉛）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于）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這不是國家自辦，乃是歸國家管理；凡做此項事業的，須呈報（『自占』）于司市錢府。營業所得，國家要抽『所得稅』。故食貨志說：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有不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于）縣官一歲。

抽所得稅竟抽到女工方技，似乎不確。況且科罰條文內說『盡沒入所采取』，似乎原令的所得稅只限於『諸取衆物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或至多『及它方技商販賈

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者。莽傳也只說『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可以互證。

食貨志說酤酒的辦法最詳細：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讎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並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䤑（酢漿也）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五均之制，食貨志也說的詳細：

（1）市平（平均的物價）『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

（2）收滯貨『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緜之物，周于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3)平市『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所收不讎之物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于)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4)賒『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5)貸本『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而)受息，毋過歲什一』。莽傳作『賒貸與民，收息百月三』。

這些政策，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們的目的都是『均衆庶，抑並兼』。但當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完備，這種大計劃的干涉政策，當然不能一時收效。政府裏的書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經驗的商人，故食貨志又說：

> 義和(官名)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

饑，府藏不實。百姓愈病。

到了西十七年，王莽又下詔曰：

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農田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賖貸，百姓所取平，仰給以瞻；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筦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

我們看這一詔，可以知道當日的政治家確能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意。六筦都是民間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勢必不能；若讓少數富賈豪民去做，貧民必致受他們的剝削。社會主義者所以主張把這種『公共用具』一切收歸社會（或國家）辦理。這個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無可疑的了。

西二十一年，南郡秦豐，平原女子遲昭平各聚兵作亂。莽召羣臣問禽賊方略。

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他說：

……國師嘉信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這幾個重要人物，除了劉歆之外，幾乎全不可考。若不是公孫祿明白提出，我們竟無從知道這些主名了。作井田的孫陽，已不可考。張邯見於漢書儒林傳（八十八）之后蒼傳下。后蒼通詩禮，傳匡衡翼奉蕭望之，匡衡的傳經表如下：

- 匡衡
  - 琅邪師丹
  - 伏理
  - 潁水滿昌
    - 九江張邯
    - 琅邪皮容

按莽傳，滿昌爲莽太子講詩。又按后蒼傳，張邯與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魯匡見于後漢書魯恭傳（五十五），『恭，扶風平陵人也。……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食貨志說：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取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即十年之詔）……羲和魯匡言：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筦在縣官。唯酒酤獨未筦。……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餘見上。）

還稱穿鑿附會，絕像王莽時代的經學家。莽傳又說，公孫祿請誅數子之後，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

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

大概酒筦是魯匡的計劃，其餘則劉歆等人的合作，未必是魯匡一人「所獨造」了。西二十二年，四方盜賊幷起，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于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此事竟無下文，似乎終莽之世，這些政策不會廢除。再過一年，他就死了。

食貨志說：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

莽傳說：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爲』，要『均衆庶，抑幷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漸臺上，他的頭被一個商人杜吳斫去，尸首被軍人分裂，『支節肌骨臠分』！而二千年來，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

十一，九，三。

記李覯的學說

——一個不會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讀直講李先生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用明成化刊本影印，凡年譜一卷，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共八冊。）

李覯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的大膽，他的見識，他的條理，在北宋的學者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對手！然而宋元學案裏竟不給他立學案，只附在范仲淹的學案內，全祖望本想爲他立『盱江學案』，後來不知怎樣，終于把他附在『高平學案』內。這幾百年來，大家竟不知道有李覯這一位大學者了！我從前讀北宋和尚契嵩的文集，見他特別注意李覯的言論，當時我就很想研究他的著作。近來讀他的全集，

才知道他是江西學派的一個極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導，是兩宋哲學的一個開山大師。因此，我現在熱心的介紹他給國中研究思想史的人們。

（一）事蹟。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於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死於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五十一。

十三歲（一〇二一），是年王安石生。

二十三歲（一〇三一），作潛書十五篇。

二十四歲（一〇三二），作禮論七篇。

二十八歲（一〇三六），作明堂定制圖並序。平土書。是年入京。

二十九歲（一〇三七），往鄱陽謁范仲淹。

三十歲（一〇三八），作廣潛書十五篇。

三十一歲（一〇三九），作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

三十三歲（一〇四一），應制科試入京。明年試不第。歸。

三十五歲（一〇四三），作慶歷民言三十篇，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在南城主郡學，學者來者數百人。

三十七歲（一〇四五），余靖薦先生於朝，略云，『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

三十九歲（一〇四七），作禮論後語，删定劉牧易圖序。

按序云『嘗作易論十三篇』，是易論作於此年之前。

四十一歲（一〇四九），范仲淹荐于朝，略云，『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

四十二歲（一〇五〇），范仲淹再荐於朝，旨授將仕郎，太學助教。

四十四歲（一〇五二），范仲淹卒。是年王安石三十一歲。

集皇祐續稿八卷。刊行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四十五歲（一〇五三），著常語三卷。明年作常語後序。

四十九歲（一〇五七），國子監奏乞差李覯充太學說書。

五十歲（一〇五八），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說書。

五十一歲（一〇五九），權同管勾太學；因胡瑗病，故有是命。是年胡瑗卒；八月，先生亦卒。

集後附門人錄，可考者三十八人。門人陳次公作墓誌，言門人登錄者千有餘人。此蓋併合太學生徒而言耳。

（二）學說。

李覯是一個實用主義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樂利主義。所以他的原文篇說：

>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入也至矣。

因爲他注重在功利，故他大膽的提倡霸國與强國。他寄上范參政書有云：

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强。較之於今何如？

又常語上云：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衞風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又常語下云：

>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

這一段駁向來區別王霸的謬論，非常明白痛快。他的結論是：

> 所謂王道，……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這是說：天子安天下，便是王道；諸侯擁護中央政府而安天下，便是霸道。眞的區別只是立功的人的地位不同，並不是義與利的分別，也不是純粹與駁雜的區別。

因爲他注重富國利民，故他有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有平土書，有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

他的富國策開端的幾句話可以引來作他的理財論的引子：

>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羣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爲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

這是他的根本主張，也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根本主張，故最可注意。

他的周禮致太平論把一部周禮的材料，整理出來，分作內治，國用，軍衞，刑

禁，官人，教道，六類。這樣分類，頗有點像近人做的周禮政要一類的書；雖是講周禮，其實是談當時的政治。這六類之中，國用十六篇最爲重要，因爲他的許多主張都是和王安石一致的。我們可以說，李覯是熙寧元豐新法的哲學家，他的政治哲學是新法的學理的背景。我且舉他的重要主張如下：

（1）國用出入須有定制：『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國用一）

（2）天子無私財：『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皆屬于大府。屬于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

誅賞之典存焉。』（國用二）

（3）『人各有事，事各有功』：『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于事，取有利于國家，然後可也。……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除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這個『不作工不配吃飯』的主義原來不是俄國的波雪維克的新發明！（國用三參看七。）

（4）『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他根據周禮（大司徒，遂人）主張『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萊謂休不耕者），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兼并

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猶作惰游，況邑居乎？沃壤猶爲蕪穢，況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略爲限。不可察也。」（國用四。參看七。）

（5）應調查民財：周禮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政令。』（逆謂鉤考。）『恐其羣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國用八）

（6）平準（此卽後來王安石所謂『均輸』）：周禮有『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及『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二事。他因主張仿桑弘羊的辦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

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他的理由是：『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切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爲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國用九）

（7）泉府之制：此即王安石『青苗錢』所本，故我詳引李覯的議論於此。周禮本文云：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鄭司農說，『抵，故買也。』鄭玄說，『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此處當從鄭司農說。因爲從原價，不取利，故須

保證，不顧買者拿去牟利。國服二字亦有兩說：鄭司農說，『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玄說，『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李覯與王安石皆從鄭玄說。李覯說：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

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強，耿壽昌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

（國用十一）

（8）均役使：周禮役民之法甚平均，免役只限于『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李覯說，『君子之于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

（國用十五）王安石後來行的『免役錢』，亦是這個道理。宋代『差役』之法，當時人大都知其不便。故雖反對王安石最力的人，如蘇軾范純仁等，皆反對司馬光推翻此法。

李覯不但把一部周禮做成一部有系統的政治學說，他還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實用的學說。他的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刪定易圖序論）第一篇論易的爲君之道，第二篇論任官，第三篇論爲臣之道，第四篇論治身之道及治家之道，第五篇論遇人，第六篇論動而無悔之道，第七篇論應變，第八篇論常與權，第九篇論愼禍福，……

他在易論第一篇裏說：

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爲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爲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爲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萬事之理，猶輻之于輪，靡不在其

中矣。

他最恨那些『晝讀夜思，疲心于無用之說』的易學，故他對于當時最風行的劉牧的易圖（牧字長民，是范仲淹孫復的門人，受易於范諤昌，范受之于許堅，許受之于种放。）極不滿意。牧有五十五圖，李覯刪存三圖——河圖，洛書，八卦。他保留這三圖，固是不能十分澈底。但他的刪定易圖序論確然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議論。其第六篇尤爲有精采，今錄其末段：

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

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爲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

這幾句話不甚明白，須看下文始知他的用意只是要人注意性命的外面的表現——『善』。他不要我們空談那不可捉摸的性命。他下文說：

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爲天之所爲也。

此論極重要。他所說的『命』只是一種『本來應該如此』的道理。但這種命須要有聖人『制民之法，足民之用』，然後可以表現出來，故說『非聖人則命不行』。他所說的『性』只是一塊『可以如此，可以如彼』的質料。但這種質料須要有教育禮法的制裁，然後可爲成材。性命都是天然的，但都全靠人力，方能有成，聖人只是

那些用人力做到天然的可能性的人，故說『聖人爲天之所爲』。他下文說：

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帝堯舜（所謂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黃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舉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爲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這種完全注重人事的哲學，眞是李覯的特色！當時的思想界幾乎全是一個道士的世界。天書的笑柄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陳摶种放的高徒正在得意的時候。孫復爲北方大儒，范仲淹爲南方大師，而他們的弟子中乃有劉牧周敦頤一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歐陽修大膽疑古於前，李覯大膽主張功利，主張人

事，比歐陽修更進一步；後來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派的具體的表現了！

李覯的功利主義和人事主義並不是要反乎自然，其實還是要根據自然。禮制法度都是人爲的謀樂利的工具，但不是違背人情的天然趨勢的。人事的制度乃是謀天然的本能的正當發展的唯一法門。禮制若違反人情，就不能存在了。上文說『聖人爲天之所爲』，即是此意。他很反對當時儒者的反人情論。例如胡瑗作原禮篇有云：

> 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圈也，禽之於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强而制爾。民之於修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

李覯駁他道：

親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爲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强而制者，何歟？君與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爲功，師欲以爲名，命之曰讎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惟禮爲能順人情，豈嘗勉强之哉？

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爲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爲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爲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爲君臣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

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爲罪辜，爲離散。禮之所謂情者，雖積于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

之，使有所成就者也。

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于山藪，鳥之于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爲罪辜，爲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于圉，鳥之于絏，魚之于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與胡先生書）

他的禮論說的更詳細。禮論一說：

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爲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

酒醴酏，以爲飲食，藝麻爲布，繅絲爲帛，以爲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顚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爲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爲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範金斲木，或爲陶瓦脂膠丹漆，以爲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爲之婚姻以正夫婦，爲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爲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羣黨爭；於是爲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爲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懵也，於是爲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爲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爲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爲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修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有常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

最可注意的是他講禮的範圍極大，包括樂刑政及仁義智信七項。他說：

> 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

他說明這一層如下：

> 「禮既備」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
>
> 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乎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

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之類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他這種分類法，頗有一種很正當的見解。古人把仁義禮智信看作五件平等的東西，如漢人把木金火水土分配五常，是很沒有道理的。禮是很具體的東西，如何能與那四個抽象名詞並列？故李覯說：

> 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禮論五）

李覯的大貢獻是把五常之中最具體的一項提出來，特別注重。他說的禮不是那

懸空闊大的虛談，乃是那根據于人的性欲上的法制。他說，『禮者，先王之法制也。』用『法制』來解釋『禮』，有兩層好處：第一，法制是應用的；第二，法制是在外面的，是具體的制度。這樣一來，可以掃除許多無稽的玄談。故他設爲問答的話，說明這一點：

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

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於人。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闊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說爲陳熟，以虛辭爲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禮論六）

這種議論自然引起當時人的反動。他的禮論成書後十五年，有章望之（名表民）作文駁他道：

率天下之人爲禮，不求諸內而競諸外。人之內不充而惟外之飾焉，終

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禮論後語引）

這個駁議最可指出李覯的思想的特點。他的特點就在這個『外』字上。他說，『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單有內而沒有外面的表現，是沒有用的。故他的答復是：

> 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爲內，猶飢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爲外，猶冠弁之存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內出也。』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內者，必出諸外；有諸外者，必由於內。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僞飾云乎？且謂衣冠非自內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飢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內者也。（禮論後語）

他不承認內外的區別，故說，連衣冠也都是根據於人的性欲的需要的，故是『內』的。他又說『天下之善，無非內者』。這句話便是打破一切重內輕外的成見。因爲一切善都是內的，故他明白主張法制的重要。他說，『有諸內者，必出諸外。』單注重內而不注重外面表現的制度，不是儒家的性理空談，便是禪家與道士的『內功』了。他在禮論四中說，『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這是李覯的一大主張。後來王安石的新法便是想從外面的制度上做一番救世的工夫。後來王安石一系與司馬光程頤一系的勢不兩立的競爭，從哲學史上看來，仍舊是一個主外與主內之爭。王安石一系究竟失敗了，故這八百年的思想史仍舊是主內派的勝利史。

李覯是一個排佛教最力的人，他的極力提倡禮制，也是想用儒家的禮教來代替佛道的儀式。他說：

> 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

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姓黃）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漢傑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答黃漢傑書，書中所引乃景德寺重修大殿記。）

這是當時少數學者公認的論調。如歐陽修本論中下兩篇（著作的時代與李覯的景德寺記相近。）即是這個意思。歐陽修說：

>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本論中）

又說：

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本論下）

李覯的主張完全與此相同，故他極力說明禮制是順於人情的，是適用的。他要使儒家相傳的禮教，——『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一一回復他們舊有的勢力，範圍社會的一切生活，滿足『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的需要。這是中國近世哲學的中心問題。李覯說：

儒者詬釋氏，爲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韙，而外彊焉。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於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

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孳孳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於淫僻，恤乎罪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遊江淮而南，不一日，

有庠序者，不一邦。隨其地而問之：棟宇脩歟？或曰，爲去官之舍館矣。委積完歟？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歟？曰，某院參禪，某院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乎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前耶？（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這一段說的最感慨。釋氏所以大行於世，只爲他們「善自大其法」，故儒者的問題也是「如何自大其法」。釋氏能使人『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於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故儒家的問題也是如何能使人「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于儒；民用是信，事用是立」。

懂得這個中心問題，方才可以了解近世哲學。李覯歐陽修王安石一班人想從禮樂刑政一方面來做那『自大其教』的事業；程頤朱熹一班人想從身心性命一方面來做那「自大其教」的事業。李覯是最能代表這種精神的人。他說：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瓚鋌牲幣，廟以王禮。食（原注，祥吏反。）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悲夫！（潛書）

他在他的袁州學記內，很痛切的提出他的教育宗旨：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

這是他『自大其教』的精神。

（三）餘論

李覯和王安石的關係，可以證明嗎？

本書門人錄引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之高弟。』鄧溫伯即是鄧潤甫，潤甫先以字行。宋史四百三十二，李覯傳末有云，『門人鄧潤甫熙

實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並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鄧潤甫亦是建昌人，與李覯同鄉。王安石用他爲編修中書戶房事，後改知諫院，知制誥；後升爲御史中丞。鄧潤甫是王安石的一員健將，他們在熙寧變法時代特別奏上李覯的遺著，可見李覯在新法一派人的眼裏，確是同調，確是一個前輩的大師。後來哲宗親政時，鄧潤甫首先陳『武王能繼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遂開『紹述』的運動。紹聖元年，潤甫作尙書右丞。

歐陽修生於廬陵，屬吉州，王安石生於臨川，屬撫州；曾氏弟兄，鄧潤甫，和李覯同屬建昌軍。這一班人同屬北宋之西路，南宋之隆興府，今之江西省。



費經虞與費密——清學的兩個先驅者

（讀費密的弘道書，三卷，成都唐氏怡蘭堂刻的費氏遺書本，民國九年刻成。）

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界裏，有兩個很可代表時代的人物，而三百年來很少人知道或表章的：費經虞和他的兒子費密。乾嘉之際，章學誠得讀費密的兒子費錫璜的貫道堂文集，因做了一篇很詳細的提要（見浙江圖書館排本章氏遺書及吳興劉氏刻本章氏遺書）。但章學誠雖然能賞識費氏的家學，終有點懷疑；他疑心費錫璜說的太誇張了。清朝晚年，戴望以顏李學派的信徒的資格，來作費舍人別傳（見謫麐堂遺集一）；他的賞識應該比章學誠更深一層了。但他的敘述太簡單了，終不能使人知道費氏家學的眞

相。直到近年（一九二〇）成都唐鴻學先生刻費氏遺書三種，—弘道書，荒書，燕峯詩鈔—世間始有人知道費密的思想確有很可表章的價値，確可以算是清初思想界代表之一個。我在幾年前曾作一篇『記費密的學說』，是匆匆做的筆記，被朋友拾去發表了。近年重讀弘道書，覺得費氏父子的思想應該有一篇更詳細的研究，故重做了這一篇。前年又承江都閎紹均先生替我借得費氏的族譜，添了許多傳記的材料。現在我把這些材料附錄在這裏，使愛敬費氏的人可以參考。

（一）費經虞家傳（江都費氏族譜六）

先名曰經野，入學時名經緯，中式時乃名經虞。字仲若，號鮮民。雲衢公（字夏輔，名爲譜，萬歷二十三年乙巳明經，三十九年辛亥選授四川大竹縣訓導，四十二年甲寅卒於官，年六十三。）第三子，（兄弟四人，長經國，次經世，次經虞，次經濟，姊妹四人。）母鄧氏。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二月十七日生。

丁巳，補邑庠生。

天啓三年癸亥，進廩膳。

崇禎九年丙子，中副卷。十二年己卯，中式五十四名。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五日選授雲南昆明縣令。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

丙戌年（一六四六），因成都奇禍，家口未知安否，欲歸里訪問，屢次辭官未得。按院羅國瓛加陞爲雲南府同知。

丁亥年三月，兵逼滇省，力辭，方得許。四月初三日，率次子燕峯公（曹）及諸僕啓行，渡金沙江，抵建昌衛。

戊子，會妻曹氏於黎州。四月至雅州。

己丑，移家至榮經縣之楊村。住二年。

壬辰，正月，至崇慶州國寺村，住兩月餘。四月歸新繁。十月移家居彭縣野鴨池。十一月，移彭縣鳳皇山，與諸親謀遠行。十二月過什邡綿竹安縣；除夕至綿

州。

癸巳二月初七日至蒲家村；三月十八日至圓山砦陝西沔砦。

甲午正月九日，移蕭家砦，共住三年十月。

丁酉（一六五七）十一月廿五日，因楊鳴九公（父嘉諾尤配楊氏　父名瑞靈；疑鳴九翁母族之人。）歸揚之便，闔家啓行。十二月六日至漢口，戊戌年二月三日抵揚州。

己亥春，聞海寇消息日急，至六月十七日方得出揚州城，登舟至喬墅。……十月十八日至泰州。

庚子三月二十日復歸揚州。

辛丑三月，燕峯同張幽山（乙未進士）往廣東。閏七月，公至蘇州。蘇州又有圍城之警，因匿居于施家浜顧厨子家。

八月，燕峯自廣東歸揚；十二月十四，往蘇州迎公。二十二日回揚州。二十三日至泰州，住過壬寅年癸卯年。

甲辰十二月四日，自泰州復移至揚州。

戊申九月，到塘頭，移家入戈莊宅。

己酉八月十八日，燕峯往平鄉縣趙公諱弼字子匡任中抽豐。

庚戌七月，水淹戈莊宅。十八日往揚州。

康熙十年辛亥（一六七一）正月二日申時，卒於揚州。……

門人私諡曰孝貞先生。

（二）節錄費密的家傳（同上）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

鮮民公次子，母王氏。（父名以聯，彭縣新繁鹽池人，蜀王府典儀官。）

明天啓五年乙丑（一六二五）七月二十三日子時生。……

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四月，移居野田。

康熙辛巳（一七〇一）九月七日未時，卒于家，年七十有七。葬野田鮮民公墓西一塚，有碑，東北向。門人私諡曰中文先生。……

生二子，長錫琮，次錫璜；二女。……

適按：戴望作費舍人別傳，說費密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章學誠書貫道堂文集後也說費密『生天啓六年（丙寅，一六二六），卒康熙三十八年』。而族譜與新繁志傳皆作卒于四十年辛巳。章戴雖然同根據于費密之子錫璜的書，其實不足憑信。費密若生于天啓六年，至康熙三十八年只有七十四歲，其誤可見。況弘道書首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張含章的序，有『吾師……今七十一矣』之語。足證費密生于天啓五年之不誤。兒子紀父親生死之年，倘不可輕信，這可見史學上『旁證』的重要了。

十三，七，廿九，在大連。

（三）費密傳（新繁縣志人物志，孝弟）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九歲，祖母歿，哀泣如成人。十歲，父經虞爲講通鑑盤古氏相傳爲首出御世之君，（適按，通鑑無此文。）遽問曰，「盤古以前？」曰，「鴻荒未闢。」又問，「鴻荒以前？」經虞呵之，然心奇之。……

崇禎甲申（一六四四），流賊張獻忠亂蜀，密年二十，爲書上巡按御史劉之渤，言四事：練兵一，守險二，蜀王出軍餉三，停徵十六十七兩年錢糧四。倉卒未果行。賊遂陷成都。密展轉遷徙，得不遇害。

丙戌，入什邡縣高定關，倡義，爲砦拒賊，賊乘間刧營，設伏待之，不敢犯，一方以安。

時經虞仕滇，以家遭大亂，屢乞休。密聞之，遂隻身從兵戈蠻峒中入滇。丁亥，奉父入建昌衛。十月，至黎州省母；十二月，復入建昌；過相嶺，被凹者蠻擄

去。明年戊子，潰歸。

會楊展鎮嘉定州，聞密名，遣人致聘焉。因說展屯田于雅州龍門山；復于青神江口，命人沉水得張獻忠棄金，爲民間買牛，餘悉給諸鎮，得久與賊相持。

十月，同展子璟新復屯田于榮經瓦屋山之楊村；入敘州府，遇督師呂大器，署爲中書舍人。（故戢盤稱費舍人。）內江范文熒見密文，大驚曰，「始以吾此度有經濟才，不知吾此度訶客也！」

是時密與成都邱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詩文雄西南，稱三子。

己丑秋，楊展爲降將武大定袁韜所害，密與璟新整師復仇，與賊戰，身自擐甲。時營在峨眉，裨將來某與花溪民有隙，詐稱花溪民下石擊吾營，勢且反，以激璟新。璟新遽署檄討之，密力爭，……乃止。率殘卒復與璟新屯田于瓦屋山。

庚寅七月，還成都省墓；至新津，爲武大定賊兵所刼；十月，又爲杜漢良掠送大定營中，幾被害。十二月，乘間逃楊村。

辛卯四月，歸新繁，舊宅皆爲灰燼。

明年癸巳（一六五二）二月，至陝西沔縣，遂家焉。

密留楊展父子幕最久，所至屯田，爲持久計。而天命人事已改，是以大功不就。

已乃究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爲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人靜坐，便以爲善學；丙申（一六五六），與通醉（僧名？）論禪，四入靜明寺，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厲曰，『百日之坐尙不能定，况其大者乎？』誓不出門，半月餘乃定。嘗自言，始半月視物疑爲二，如履在牀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學矣。

丁酉（一六五七）十月，攜家出沔漢。戊戌春，至揚州；聞常熟錢尙書謙益以

古文名天下，乃上書錢公；錢公得書大驚，與論詩于芙蓉莊，指密北征詩，歎曰，「此必傳之作也。」

時王司寇士禎司李揚州，見密古詩，以為絕倫，而尤愛近體「白馬岩中出，黃牛壁上耕」，「鳥聲下楊柳，人語出菰蒲」，「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等句。當時咸謂知言。

辛亥（一六七一），居父喪，悉遵古禮，冠衰皆仿古自製。三原孫枝蔚見之，自謂弗及。服闋（一六七三），以父遺命，往事孫徵君奇逢。一日，與論朱陸異同，進言漢唐諸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沒。徵君大以為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辭歸；徵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為贈。

丙辰（一六七六）冬，聞孫徵君卒，哭于泰州圓通菴，設主受弔；冠細麻，加粗麻一道，橫于上；衣用白布。二十一日始焚主出菴，心喪未去懷也。

丁巳，入山東提督將軍柯永蓁幕。會舉博學鴻詞，永蓁屢欲論薦；力辭，乃

止。

乙丑，修明史，頗採舊臣遺佚者。密遂泥入都，奉其父行狀，入史館，下拜，涕泣沾襟袖。在館諸人皆爲感動。

己巳，大病，尋愈；乃自定生平所著諸書。

辛巳（一七〇一）六月，病下痢，遂不起，年七十有七。門人私謚中文先生。

密少遭喪亂，經歷兵戈，中年遷徙異國，足迹徧天下。晚年窮困，閉戶著書，篤守古經，倡明聖學，以敎及門。嘗謂子錫琮錫瓚曰，「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爲無用之學。天性和平，與人無忤；終身未嘗言人過失；有機相向者，淡然處之。村居數十年，著書甚多。

自宋人講周程接孔孟，二千年儒者盡黜，無一聞道者，密嘗爲之悲慟，乃上考古經與歷代正史，旁採羣書，作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

餘篇，儒林二千有奇。

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此下敍諸篇目，與戴望所作傳同，故不錄。）……聖門舊章六種，共二十四卷。文集二十卷，詩鈔二十卷。外集三十二種，百二十二卷。藏于家。（江都志弘道書及舊章卷數同此。但又云，「中旨定論以及歷代貢舉二十二種，共九十卷，詩古文詞二十二卷。」）

密生平精于古注疏，謂古注言簡味深，平實可用。後儒即更新變易，卒不能過。古經之文，專賴此書。變易經文，各自爲說，勢將不止，深爲可懼。次則尤愛史記，枕籍其中者八年；於諸子則熟南華，於八家則愛昌黎。……

（四）費氏的書目（新繁志，藝文）

費經虞：　四書廣訓一卷　　毛詩廣義三十卷

字學十卷　　古韻拾遺一卷

雅倫一卷

揚州府志作

毛詩廣義二十卷　四書字義一卷

雅倫三十卷　臨池懿訓三卷

注周易參同契一卷

江都縣志則作

劍閣芳華集二十卷　雅倫三十卷

中傳正紀百廿卷　弘道書十卷（今本三卷）

費密：

聖門舊章廿四卷　文集廿卷

詩鈔廿卷　河洛古文一卷

尚書說一卷　周禮注論一卷

二南偶說一卷　甕錄一卷

中庸大學古文一卷　　中庸大學駁論一卷

太極圖記八卷　　聖門學脈中旨錄一卷

古史正十卷　　史記補箋四卷

歷代紀年四卷　　四禮補錄十卷

古文旨要二卷　　甌此遺錄二卷

答簪歸來晚暇記四卷

奢亂紀略一卷　　費氏荒書四卷（今本一卷）

歷代貢舉九十卷　　二氏論一卷

題跋六卷　　尺牘六卷

詩餘二卷　　雜著二卷

費氏家訓四卷　　祀先儀禮一卷

長沙發揮一卷　　王氏參論一卷
金匱本草六卷　　傷寒口義二卷
集外雜存八卷　　補劍閣芳華集廿卷
雅倫廿六卷　　中旨定論一卷
中旨正錄二卷　　中旨辨錄二卷
中旨統論二卷　　中旨申惑二卷
歷代貢舉合議二卷　　朝野爭論二卷
老農記事二卷　　天涯知已錄一卷
全唐詩選十卷

以下各見本傳

費錫琮：　家庭偕詠集　　白雀樓集

費錫璜：　貫道堂文集　　掣鯨堂詩鈔

（五）孫奇逢給費密的手書（皆載費氏族譜）

（一）

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

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常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不盡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隨人轉移爾。（癸丑春中）

（二）

此度留兼山草堂旬餘矣。素不問其師事者何人，友事者何人。今閱其著書，聞

其持論，若久在江村侍講席者。其論朱陸異同，陽明之教辭論于紫陽，皆確有所見，不隨人口吻。至論漢唐諸儒有功于聖人，且有功于宋人，可謂漢儒知己。然此皆往事，猶有人論說。其論目前人，謂某非諫官，持論亦不必太激；某某當國而令小人潰決至此，亦未免不學無術：此皆予在江村四十年前所論說，此度若習聞之。此度既能世其家學，自能光大師說。老夫拭目望之矣。啓泰氏又書。

（三）

王文成公之學，鄒文莊公得之，傳其子昌泉公，諱美。先大父敬所公，諱臣，與昌泉公同舉嘉靖辛酉京兆榜，得聞其家學，暨其著述，以授先季父司訓公，諱丕基。不肖逢奉父命從受學，尤得吾友鹿忠節，諱善繼，切磋之力。成都費密事予山中，因述付之。癸丑春日。

（四）

從來聚首之難！然同此覆載照臨，猶比壁而居也。此度勉之！臨路手書。啓

塨。

（六）費密答李塨的書（載恕谷年譜）

費氏家學與北方顏李學派有無關係，還是很可注意的問題。李塨的恕谷年譜卷二，記康熙戊辰（一六八八），李塨三十歲時，費密六十四歲時，李塨寓書費燕峯論學。自註云，『燕峯，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費氏復書亦載此卷中，今附錄于此。

是時李塨未曾到南方，已知費氏之名，可見費氏在當日的名聞不小。後來康熙甲戌（一六九四），李塨三十六歲時，費氏又有論學書給李氏，今不存。次年（一六九五），李塨南遊，『過揚州，拜蔡瞻岷廷治（劉本訛作蔡瞻沿岷，今正。）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是。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滋衡（錫璜）來謁。』（恕谷年譜卷二）鄭

時曾孫已七十一歲了。

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者）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尤衆。至正中，陳君采（樵）又以為與洙泗不同，著洛熙關鍵。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辭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歷以來，學者不入于窮理，即入于致（良）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即物窮理，承譌既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為旨，違悖古經，敝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蓋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譏謗。雖然，爲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竄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

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弘儒碩識必剖靜滿世，甯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

也。望之，望之！

（七）費氏父子的學說

（1）費氏家學與道統論

費氏父子都長於歷史知識，故他們第一步便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道統說始於韓愈，他說『堯以是傳之舜，……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宋時，蔡京極推崇王安石，說他『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與孟軻相上下。』程顥死時，程頤作他的行狀，說他是孟軻後一人。至朱熹作三先生祠記，他說：

>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

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于世。（此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淳熙五年。參觀同類的祠記甚多。）

又他的中庸集解序說：

> 中庸之書，……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乾道癸巳）

又大學章句序：

>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淳熙己酉）

又中庸章句序：

> 及其（孟氏）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

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同上序）

這叫做『道統論』。這種道統論一日不去，則宋明理學的尊嚴一日不破。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只是一種因襲的道統論，他說上古的道統（宗傳）是：

（元）羲皇　（亨）堯舜　（利）禹湯　（貞）文武周公。

中古的統是：

（元）孔子　（亨）顏曾　（利）子思　（貞）孟子。

近古的統是：

（元）周子　（亨）程張　（利）朱子　（貞）王子。

這竟是海智爾的哲學史觀了！故他的『宗傳』以周，大程，小程，張，邵，朱，陸，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十一人為正統；餘人自漢至明皆為附考。他的特別貢獻只在把王守仁作為程朱的嫡派。此外全部是因襲的，並且是更壞的（因為

更詳盡的「道統論」。

費氏父子根本否認這種道統論，故說：

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于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然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弘道書上，一）

又說：

求聖人道德旨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爲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即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

甚歟？（上，四）

這話何等痛快！

他們父子因爲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故也提出一種他們認爲正當的道統論。他們以爲最古政敎不分，君師合一，政卽是道。後來孔子不得位，故君師分爲二，故帝王將相傳治統，而師儒弟子傳道脈。但所謂『道』仍是古昔的政敎禮制，故『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上，四）

他主張：

> 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爲治；其統則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爲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
>
> 前言往行存焉。（上，二）

他把這個意思列爲『天子統道表』：

二帝三王—孔子—歷代帝王統道（君師之尊，治教所本。）
（君師合一）（師）

- 公卿輔行道統
- 帝王統道
- 師儒講傳道脈

這個表，初看去似乎很淺陋。但我們要進一步去尋他的真意義。費氏父子的意思只是要否認那「一二人靜坐而得」的不傳的絕學。他的根據是歷史的：他只說，古往今來的一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別無所謂道。也別無所謂道統。簡單一句話，事業即是道，事業史即是道統。他們父子說：

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為道德，與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為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為道德，以事業為伯術，則後儒竄雜謬誕而非聖門之舊。（上，十）

這個意思，他們也列為一表：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下，二八）

▲儒

君臣將相行乎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開國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興教，弘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所載，士農工賈（所）遵守：此為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僻之傳行乎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靜坐相傳為專養心性。

佛氏其徒靜坐相傳為專悟心性。

這種見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這是大家口頭都會說的區別。但費氏父子提出的區別，說的更痛快。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業，二氏是山林幽隱的道；我們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來做我們的城市生活的事業。第二，儒家的道的內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農工商所遵守的實事實用；二氏的道是少數閑人廢物的養心性與悟心性的工夫。我們不能叫士農工商都拋棄了他們的日用事業來做養心明性的工夫。

費氏家學所謂『道』，以『實事，中庸』為主。費密曾說：

> 通諸四民之謂中，信諸一己之謂偏。見諸日用常行之謂實，故為性命恍忽之謂虛。（中，三五）

他們認定這『通諸四民』『見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們極

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說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荀子君道）

但費氏父子的這種主張並非有意因襲前人，乃是從痛苦患難之中體驗出來的結論。

費密說：

天下之治，羣黎樂業，萬物遂其生，皆法制禮義所維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統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職；自上古至今，無有踰此而可致治者。後儒以靜坐談性辨理爲道，一切舊有之「實」皆下之，而聖門大旨盡失矣。密少逢亂離，屢受饑饉，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參差，則弱之肉，強之食。此時「心在腔子」，「卽物窮理」，「致良知」，有何補于救世？豈古經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先子（經虞）平日論次，密

老年益確信不疑也。（上，十五）

這一段自敘使我們看出時勢與學說的關繫。清代學者所以羣趨于『反理學』的運動，也正是因爲靜坐致良知等等空談禁不起李自成張獻忠一班人的試驗。費氏父子從亂離饑饉裏體驗出『道在于政治』的一個道理，故說，『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

費密的兒子費錫璜也能承家學，章學誠引他的貫道堂文集，有云：

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爲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斥以爲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士，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爲宮室，小不能爲輪轅，尙可以爲工乎？（劉刻章氏遺書八，頁二十）

這確是費氏的家學。他們把儒者看作一種『政治匠』，他的職業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製器一樣。他們菲薄理論，但用事功作標準，有時未免趨于極端，變成一種

狹義的功利主義。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狹義的功利主義相同（參看我的中國哲學史上，頁三百十一），同為事勢的產兒。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費氏家學的道統論。他們否認宋儒的道統論，他們認定儒術貴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談玄理，所以主張

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宋則議論為主，實事為末。）蓋人主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敷和化洽。澤之渥者，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為統典。……漢唐以來，治亂一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為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經，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

把持，乘潤過日」──（上，五）

這種道統論，認事業卽是道德，政治史卽是道統，『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這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主要見解。其說與南宋的陳亮葉適頗多相同，但陳亮雖大胆，說的尙不能有費氏父子這樣的透澈明白；這大概是因爲費氏父子飽嘗了無政治的痛苦，體驗的深切，故主張也更老實透切了。

（2）費氏論經學傳授源流

用帝王公卿治安天下的政治史作道統，這是費氏父子的一種道統論。但他們另作一種『道脈譜』，敘七十子之後經學傳授的統系，表示儒學傳授並不曾中斷，並沒有宋儒說的『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的事。這也是用歷史的事實來證明宋儒的道統論的虛妄。費密作道脈譜論（弘道書上），檢直是一篇儒學史論。他說：

> 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塚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

人討論纂述之：保秘深厚，牽持不墜。經已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

漢興，……正定訛殘，互通傳義，共立學官。……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

自漢而後，中罹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或得其遺以補亡脫，至唐始會為十二經；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綫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上，十七）

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兩途，後人遂輕視漢魏以下的經師，以為他們未聞大道；而道統所寄，竟像真在那些得千載不傳之絕學的周程張朱諸人了。費氏父子不認政治史上三代以後全是「勢力把持，牽滯過日」，也不認學術史上孟子以後儒學遂無傳人。他們用歷史事實來指出秦漢以下的傳經諸儒皆是七十子的真正傳人。但從歷史上看來，漢儒尤為重要。他們說：

然漢儒，冢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嘗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尚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未）散失，三也。（上，廿七。）

這不但代表費氏家學，並且代表清朝學者的『漢學運動』。這三層理由，其實只是一個理由，其實只是『去古未遠』四個字。清代學者所以推崇漢儒，只是因為漢儒『去古未遠』，比較後代的宋明臆說為更可信任。這個態度是歷史的態度。宋明儒者的毛病在乎缺乏歷史的態度。他們的思想富于自由創造的成分，確有古人所不曾道過的；但他們不認這是他們自己的創見，却偏要說這是古經的真義。這並不是他們有心作偽欺人，只是缺乏歷史的眼光，不知不覺地把他們自己的創見誤認作千餘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諦。後來他們的經說竟成了學術思想界的無上權威，後人無法可以推翻他們。只有從歷史上立腳，指出宋明儒者生當千餘年之後，萬不能推翻那『去古未遠』的漢儒的權威。清代的漢學運動的真意義在此；上文引的費密主張漢

儒所以最可崇信的三層理由，要算是這個運動的最明白的說明了。

人皆知漢學盛于清代，而很少人知道這個尊崇漢儒的運動在明朝中葉已很興盛。費氏父子富于歷史的興趣，自言他們的主張乃是宋元明三朝學者屢次主張的。在一處（上，廿二）他們列舉宋朝司馬光歐陽修以下，直到明末的錢謙益等，凡一百零二人，都是主張漢唐諸儒可以繼承七十子的。他引明朝的學者的話，更可以表示明朝中葉以後反理學，重漢學的傾向。如王鏊說：

>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諸儒掇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間有不可盡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注疏，惟閩中有板。閩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

又引鄭曉的話：

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宋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

又引歸有光的話：

光竊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闢于有宋。

又引新安黃洪憲的話：

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于世，則扃鐍未啓，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四出；諸儒校讎未必無據焉，可盡訾哉？

這皆可表見尊崇漢儒的風氣不起于明末清初。費密又敘他的直接淵源有四個人：

(1)張朝瑞作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

(2)朱睦㮮作授經圖，列漢儒。

（3）鄧元錫作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

（4）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諸儒于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

因爲這四個人的書不大行于世，所以費經虞父子推廣這個意思，『遵聖門定旨，輯爲中傳正紀』。此書今不傳了，但據新繁志及貫道堂集所稱，『中傳正紀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中傳』的意思即是我們在上文說過的『通諸四民之謂中』。他們自己又下定義道：

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故謂之中傳。（上，廿二）

據新繁志載的書目，費密還有中旨定論一卷，中旨正錄二卷，中旨辨錄二卷，中旨統論二卷，中旨申惑二卷。這可見『中』字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中心觀念。

道脈譜似是中傳正紀的一種圖表，『畫圖詳其世次，述傳授之宗系』。此譜亦

不傳。但章學誠引貫道堂集，說費密『自推其學出乎子夏七十二傳』，大概此譜必有許多牽強附會的地方，怪不得章氏要說他『妄誕不經』了。

道脈譜論的後半列舉五種反對的議論，並舉五種答覆。其第二辨云：

>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乃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

費密駁他道：

> ……旣不敢自爲傳，云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與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獲傳此遺經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爲傳也？不亦太過乎？

其第三辨云：

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只可言傳經，宋始傳道。

道就是「道學」「儒林」分家的話。費密駁他道：

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闢之云：「自周至于今，二千年間，先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說者，皆起于講道也。」有光眞不爲所惑哉？……即聖門果有性命突超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廢也。……籩俎鼎鐘，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之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

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為毛血明水。遂盡削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

這一段的議論最公平。宋儒凝精漢唐的經學，加上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參考的材料多了，他們對于古書的了解往往有確然超過漢唐之處。但他們為中興儒教起見，雖得力于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為自尊其說起見，雖得力于漢唐而不能不壓倒漢唐。誰知他們的權威太大，終久要引起反宋學的運動，于是清儒雖皆得力于宋學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學。這真是『一報還一報』。我們今日用純粹歷史的眼光看來，只看見古今一線相承，演化不息。漢儒去古未遠，保存得不少的古訓詁，有抱殘守闕之功，而他們的見解實在鄙陋的可笑。魏晉以後，經過低等民族的擾亂，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個黑暗的中古時代，這也是不可諱的。在這個長期的中古時代裏，儒家實在不曾產出一個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兩個平凡的王通韓愈來撐持門面。因為中古儒家沒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後來儒者看不起中古時期，而有『孟子

沒而不得其傳焉」的話頭。但平心看去，魏晉六朝的經師確也有繼續不斷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規模的結集，上結八代的經學，下開宋儒的經學。宋儒的理解能力來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經的基礎工具仍然是漢唐的注疏。不過宋儒生當禪宗大行之後，思想經過大解放，所以理解突過漢唐諸位學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組織偉大的系統。但這正是學問進化的自然現象，像堆柴一般，後來的應該在上面。費密說漢唐諸儒不妨等于「毛血明水」這是最公平的話。宋儒排斥漢唐，然而宋儒實在是毛公鄭玄王弼王肅的嫡派兒孫。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也實在是朱熹黃震王應麟的嫡傳子孫。（章學誠已能見及此。）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宋學只是一種新漢學，而清代的漢學其實只是一種新宋學！

費氏父子說：

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上，三十三）

這真是歷史的眼光。不過他們生當宋學的反動時期，不免一筆抹殺宋儒的貢獻，不

殆過崇漢儒。這也正是費氏父子代表時代精神之處。他們說的『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也和顧炎武說的『經學即理學』相同，也代表當日的學術界的一種大趨勢。

(3)費氏的實用主義

費氏著的書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傳正紀，而這書所代表的只是他們的新道統論，所以我們述他們的主張時也首先注重道統一點。費氏的歷史的道統論既說明了，我們現在可以研究他們用歷史眼光去觀察儒家的學說所得的什麼結論。我們除去細節，只提出兩個方面：一是他們的實用主義，一是他們尙論古人的態度。

新繁志的費密傳曾述費密常對他的兒子說道：『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志傳又說他『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爲無用之學。』他的注重經驗事實，他的注重實用，是他的學說的特別色

彩。他們從痛苦的經驗裏出來，深深地感覺宋明理學的空虛無用，所以主張一種實用主義。新繁志說費密壯年時（一六五六）曾在靜明寺和一班和尚學靜坐。坐到半月餘，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視物疑爲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鳴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鳴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

弘道書（下，二十）也說：

密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考定古說，條晰辨論。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注疏在後。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觀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這兩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輕視漢唐古注疏，只爲漢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訓詁的工夫，不談微言大義，所以宋儒嫌他們太淺陋了，笑他們未聞大道。宋儒的理學所以能風行一世，也只爲他們承禪宗的影響，居然也能談玄說妙，一洗「儒門淡薄」之風。現在當理學極絢爛之後，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極困難的事；非經過一番大覺悟或大反動之後，那是不會實現的。明末清初的學者，承王學極盛之後，所以能拋棄那玄妙的理學而回到那淡薄的經學，正是因爲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敗了，閹宦的橫行太可恥了，流寇的禍亂太慘酷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種種的原因構成了一個有力的反動，方才有那樣的大覺悟，方才有那樣的大決心。況且亂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觀消極的路上去。幸而那時正當古學復興的時期，楊慎焦竑胡應麟陳第等人已把門戶打開，歸有光錢謙益諸人又極力提倡古注疏。（崇禎十二年吳鳳苞新刻十三經注疏，錢謙益爲作長序。費氏父子屢引此序。）所以費氏父子從患難裏出來，不致于走入靜坐遯世的墮落路上去，却在古注疏裏尋出古代儒家所謂「道」，本無談玄

說妙的話，乃是治國平天下的實事實功。所以費密說，『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見道之源。』一方面，費氏父子若不經過那種痛苦的經驗，也不容易甘心捨棄那神秘的主靜主敬的理學，誠心地來提倡那『淡薄』的儒學。所以他說，『使親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費氏父子從痛苦的經驗裏出來，主張實用主義。他們有一個吾道本旨表（中，三九），大略如下：

吾道本旨‖有—{力行、內省}

吾道夢說‖無—{清談、高論}

他們又有一個先王傳道表（中，二八）：

先王傳道

三重：（1）議禮，（2）制度，（3）考文。

九經：（1）修身，（2）尊賢，（3）親親，（4）敬大臣，（5）體羣臣，（6）子庶民，（7）來百工，（8）柔遠人，（9）懷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四民：士，農，工，商。

他們對於『道』的見解，只是政治的，倫理的，實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裏，成了一部高談性命的根據；而費氏父子在那部書裏只看出那『三重』『九經』幾個政治的觀念。他們認定『儒貴能治天下』；『三重九經』之說雖極淡薄，卻是一種整治社會國家的途徑，比那性命玄談是實用多多的了。

費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談，常說事功爲要，言說爲下。他們常歎息：

>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下，二）

他們也反對宋儒說『下學』爲人事，『上達』爲天理的話。他們說：

邵雍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聖人以人道濟羣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下，三）

這是一種『存疑主義』（Agnosticism）的論調。他們因爲要推開那宋儒的玄學，故輕輕地用『天道遠而難知』一句話，把宋儒的宇宙玄學放在存而不論的地位。放開了那遠而難知的，且來研究那實而易見的：這是實用主義者的存疑主義。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義的態度，要使人離開神學與玄學的圈套，來做科學的工夫。費氏父子的存疑主義也只是要大家離開那太極先天的圈子，來做實學的研究。

他們推開了那無用的道，主張那整治國家，實事實功的道。他們說：

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徵，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

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王之六經四科亂矣。……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冲漠無朕至矣，心無不（在）腔子，性無不復，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台止觀，同一門庭，則沙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國民生作有用無用的標準，雖然頗近于狹義的實用主義，然而當時的虛空無稽的玄談實在需要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評判標準。費氏指出宋明的理學只是『深山獨處』的自了漢的哲學，但不適用于『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們的『道』，是要能適用于一切社會階級的：

帝王天命統道，爲『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師儒，

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織紝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下，二十）

這種見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淺近淡薄的，但仔細看來，却是幾千年無人敢說，無人能說的大見識。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與人生日用發生交涉；凡與人生日用沒交涉的，凡與社會國家的生活沒關係的，都只是自了漢的玄談，都只是哲學家作繭自縛的把戲，算不得『道』。他們說：

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為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或可有可無之經。（下，二十）

凡經不起這個實用主義的標準的評判的，都只是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天下既治，無異于中材；天下已亂，無救于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

（上，四十五）

這叫做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費氏父子的實用主義，簡單說來，只是

致實以致用，學實以致用。（上，五十一）

十個大字。說的更明白點，只是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說的更明白點，只是

修之有益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則有益于國，處則有益于家。（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國學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于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云『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爲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陞，不能則罷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應用，只是

論政，以身所當者爲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道二帝三王爲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爲定章。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後引的一段話，即荀卿『法後王』之意，但費氏父子說的更痛快明白。

如云，『堯舜三代風氣未開』，此是何等見識！費氏父子又舉封建井田爲例，說明此意。他們說：

欲行郡縣阡陌於先王風尙淳質之世，時有所不可；卽欲行封建井田於後王人心大變之日，勢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縣阡陌，後王之善政也。所謂『王道』，不過使羣黎樂業，海宇無擾，足矣。（中，二十三）

這是歷史的眼光。費經虞曾講中庸『議禮，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踰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衆論而成一是也。制者，盡爲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頗僻也。（中，二十六）

他們的結論是：

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中，二十四）

應用的標準仍是那實用主義的標準，——『濟時救弊也已』。

（4）費氏議論人的態度

費氏父子經過無數痛苦的經驗，深知人情世故，故他們議論人物，往往能持一種忠恕平允的態度。自從宋儒以來，士大夫自居於窮理，其實只是執着一些迂腐的意見；他們拿這些意見來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湊合他們的死板法式。他們自己迷信『無欲』爲理想境界，所以他們上論古人，下論小百姓，也期望他們無私無欲。他們抱着成見，遂不肯細心體諒人們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顥朱熹以後，學者心眼裏只認得幾個本來沒有的聖人，其餘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們的教主孔丘先生當日本是一個很和平圓通的人。孔丘

也肯見見南子，也不拒絕陽貨的豬肉，也和他國裏的一班貴族權臣往來問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發財的，也有替蒯聵出死力的。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說過，鄉原是德之賊，而狂狷却還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絕四」，而宋儒却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訓！費氏父子對於宋明理學家的這種態度，最不滿意，常常提出抗論。他們說：

夫運代不同，猶四時之遞序；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勳鐘鼎；或其初託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遐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覈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天下稱之；或為衆所攻而未盡非，或為衆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弘遠而人議其侈，

或守身淸介而人譏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爲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爲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爲衡宜百務精當。……此伊尹不求備于一人，孔子論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烏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嘗鍊達，輒憑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見爲刺；削平生之勳德，搜隙罅以爲罪。……固薄之論滿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識略高賢遺寃簡册，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大痛也。（上，十一——十二）

這已是很平允的議論了。他們又說：

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値姦凶，世亂而陷沒盜賊，隱忍汚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爲盡失。惟相與煽亂爲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

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飢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厄，人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量之歟？論事必本于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不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爲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爲不肖。後事之忠咸足以立身，異時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爲急；或可或否，中正爲宜。倘堅信宋儒刻隘臆說，恐伊呂微箕生于漢唐，亦多遺議矣。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酷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旨。（上，十三）

這種見解，非常平易，却是宋以後無人敢道的議論。程頤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那種武斷的論調，在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男女。費氏把生命，妻子，產業等等，和義理看作同樣重要的東西；敎人要把這各種分子合起來

看，不可單拿『義理』一種來評判人。這眞是平允忠厚的態度。

他們又說：

倘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于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敗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愧悔，求以寡過，倘何敢任意苛搜，輕剌往昔哉？（上，十七－十八）

這一大段中，如『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通而易執者，這

見也』，皆是閱歷有得的名言。宋以來的儒者往往意氣用事，勇于責人，而不自覺其太過。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後人之誣衊王安石，都是道學史上的絕大污點。費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擯而棄之』（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態度。費氏形容他們：

> 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為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為不聞道；自命曰真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於是以儒之說為昧難測也，儒之意為執難平也，儒之事為煩難從也，儒之情為隔難合也，儒之氣象為厲難近也。彼方夷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為名高，交相惡矣。……立於朝廷，兩相危陷，……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宦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

歟，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

宋以來的理學有幾個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與人生沒大交涉；第三，氣象嚴厲，意氣陵人。費氏父子痛斥這種理學，說他『矜高自大，鄙下實事。』（上，四七）他們要提倡一種平易近人的『中，實』之道：

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爲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上，四五）

這眞不愧爲實用主義者的態度。

費氏父子皆有歷史的嗜好，故他們對于古今學派的異同沿革，也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們。他們提出一種『心理區別論』來解釋歷史上學派的異同。他們說：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構精，自化而形。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

一身，不見其異 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乂用三德：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沈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敎使柔，沉潛而敎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于用。（上，四九）

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沈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歟？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沈潛者歟？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于狂；子夏之學多沈潛，門人所傳近于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于道；沈潛而學焉，則以沈潛

入于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疑當作因）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十）

我們分中行，高明，沉潛三種性質，頗似近世詹姆士（James）說的哲學家有『心硬』『心軟』兩大區別。高明一派，費氏謂近于剛，其實乃是詹姆士所謂『心軟』的一派。沉潛一派，費氏謂近于柔，其實乃是『心硬』的一派。心軟，故富于理想，而易爲想像力所誘惑；自趨于高明，而易陷于空虛。心硬，故重視事實，重視効果；雖不廢想像，而步步腳踏實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墮入拘迂，易陷于支離瑣碎。費氏拿這個區別來說明學術思想史上的派別：

後世學者，性本沉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沉潛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爲沉潛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

（以）非天下之沉潛，學者之高明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爲高明之非沉潛也。

聖人之道于是乎異矣。羣言肴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敎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卽有異，無損于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爲傳也。（上，五十一）

以上說的，皆爲有人問『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而發的。小程子與朱熹屬于沉潛一路，陸王屬于高明一路。費氏此論最爲平允，發前人所未發。費氏父子的家學也屬于沉潛一路，故費密雖受學于孫奇逢，爲王學後人，而他攻擊『良知』之說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復古本大學一件事而已。費密作孫徵君傳（耆獻類徵三百九十七，頁三六－三七），只說：

其學以澄徹爲宗，和易爲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邃奧，學者安可不造？』徵君則歎以爲果然。

費密所取于孫奇逢，如是而已。費密又自說是子夏七十二傳，是他也自居于沉潛一路。但他屢次自命為中行，自稱為『中傳』，自以為得古經之旨，故對于程朱陸王的玄學方面一律攻擊。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實，都只是他的沉潛的天性的表現。他所攻擊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傳染的方面，並不是他們的沉潛的方面。我們也可以說他『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但費氏父子的沉潛，雖然是個人天性的表現，卻也是『時代精神』的先驅。八百年前，程頤給他的哥哥程顥作行狀，曾述程顥的話道：

>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人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這是二程當近世哲學開幕時期對于中國當日思想界下的診斷。他們深知當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然而自他們以後，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學盛行，結果還只是一種『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兩宋時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這個鬼就是玄學鬼。二程不保邵雍周敦頤的玄學的宇宙論，却捨不得那主靜主敬的玄學。朱熹提倡格物窮理，却又去把二程唾棄的先天太極之學重新掘出來，奉為玄學的奇寶。陸王唾棄先天太極的玄學，却又添出了『良知』『心卽理』的玄學。陸王末流的玄學狂熱，更不消說了。高明的病菌彌漫在空氣裏，凡要呼吸的人，多少總得吸一點進去；沈潛的抵抗力強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費密活在程顥之後五百年，他診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風橐霧，可有可無』的診斷。五百年的玄學病，到此已成『強弩之末』；李闖張獻忠承客氏魏忠賢之後，屠殺了幾百萬生民，傾覆了明朝的

天下，同時也氷冷了五百年的玄學熱。費氏父子一面提倡實事實功，開顏李學派的先聲；一面尊崇漢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開清朝二百餘年『漢學』的風氣：他們眞不愧爲時代精神的先驅者！

十三，九，十七，脫稿。

讀楚辭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裏，現在整理出來，作爲一篇讀書記。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他或反證他，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烟瘴氣裏鑽出來，在文學界裏重新占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誰？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麽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麽我要疑心呢？因爲：

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幷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

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眞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垜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垜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

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裏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

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裏，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還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銷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真有其事，故劉向說範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拚八湊的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賈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　1　九歌　9

天問 1　九章 9
遠遊 1　卜居 1
漁父 1　招魂 1
大招 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卜居漁父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大招似是模倣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

爲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2)稍晚——屈原？	離騷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	招魂
(4)稍後——楚亡後	卜居，漁父 大招，遠遊
(5)漢人作的	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關雎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愛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注解。朱子的楚辭集註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裏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註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 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却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却說：

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說：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說：

旣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註，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讀書雜志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志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裏最徼幸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顧先生說的眞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

罅漏，可以看得出牠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牠的自衞的理由。現在我儘尋牠的罅漏，劉先生儘尋牠的自衞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着這個態度去搜求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無間，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了，——顧先生登有啓事，劉先生也沒有續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章，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借着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後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

> 因爲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必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十三期）

他又說：

> 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眞實，可以影響於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更進一步，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於人心只有好影響，而

無惡影響。卽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只夠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本來劉先生並不會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辯一句。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眞僞問題；去僞存眞，決不會有害於人心。譬如豬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豬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裏高興，我們難道因爲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眞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爲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尙且如此，何况一個禹？何况黃帝堯舜？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裏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眞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1)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眞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曾說：

> 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考信錄提要上，二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爲止，還不算澈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

> 我們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

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觀念是

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爲複雜，由陋野變爲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爲全國的，由神變爲人，由神話變爲史事，由寓言變爲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是『禹的演進史』。

禹的演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於井田

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後，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演進史：

(1)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漢初寫定的穀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一些『望文生義』的注語。

(4)漢文帝時的王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穀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淸楚分明的井田論。

(6)周禮更晚出，裏面的井田制就很詳細，很整齊，又很煩密了。

(7)班固的食貨志參酌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併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於是參考孟子王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胡適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一）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瞭顧先生的方法的意義，所以我引他在這兒，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

(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第三，我們既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掞藜先生的根本態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 我對于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誌十三期）

他又說：

> 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着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裏面頗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

以證』固是很好，但『情』是什麼？『理』又是什麼？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錢玄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於什麼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爲原則，而以『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爲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爲原則，而以破斧缺斨爲例外。不知在史學上，皇矣與破斧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却是後起的傳說變成的成見。成見久據于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劉先生列舉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後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論這個方法的危險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皇矣詩的人並無『王季文王是紂臣』的成見，作破斧詩的人也並無『周公聖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後，從小就灌飽了無數後起的傳說，於今戴着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爲『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於『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裏，從證據裏，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人必藉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穀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

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播荒蕪，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穀百蔬』也。（讀書雜志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爲『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裏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藉助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須假定（1）辨認種類的能力，（2）預料將來收穫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5）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決不能了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爲『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後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

圖的一段做例。堯典的版圖有交阯，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阯，甚且是堯舜撫有交阯。

他引四條證據：

(a)墨子節用中。

(b)尸子佚文。

(c)韓非子十過。

(d)大戴禮記少閒。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阯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卻真大膽！他說：

知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

戰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什麼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典爲秦漢時的僞書了。

（圈是我加的。）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2)什麼時候尋出的？(3)什麼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僞（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a)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無，本不可考；

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於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篇，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見秦等篇同為後人偽作的。而劉先生却以為『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不知顯學篇明說『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五蠹篇明說『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為偽作而無疑。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於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有文時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十二，二，八。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序言

這個書目是我答應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個人擬的。他們都是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年，很想在短時期中得着國故學的常識。所以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并不為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一點。

這雖是一個書目，却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可以叫做『歷史的國學研究法』。

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我起初也學

着老前輩們的派頭，勸人從『小學』入手，勸人先通音韻訓詁。我近來懺悔了！那種話是爲專家說的，不是爲初學人說的；是學者裝門面的話，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法子。音韻訓詁之學自身還不曾整理出個頭緒系統來，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十幾年的經驗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老實說來，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那些國學有成績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幹出來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學的門徑。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真興趣，他然後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便是依着這個觀念做的。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二點。

這個書目不單是爲私人用的，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公共圖書館之用。所以每部書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爲注出。

（一）工具之部

書目舉要（周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館本。這是書目的書目。

書目答問（張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記書莊有石印『增輯本』最易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存目錄 廣東圖書館刻本，又點石齋石印本最方便。

彙刻書目（顧修）顧氏原本已不適用，當用朱氏增訂本，或上海北京書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續彙刻書目（羅振玉）雙魚堂刻本。

史姓韻編（汪輝祖）刻本稍貴，石印本有兩種。此為廿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

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北京晉華書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運森）商務印書館

歷代地理韻編，清代輿地韻編（李兆洛）廣東圖書館本，又坊刻李氏五種本。

歷代紀元編（六承如）李氏五種本。

經籍纂詁（阮元等）點石齋石印本可用。讀古書者，於尋常字典外，應備此書。

經傳釋詞（王引之）通行本。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等譯編）上海醫學書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商務印書館。

二十二子：

老子　莊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尸子　孫子

孔子集語　晏子春秋　呂氏春秋　賈誼新書

春秋繁露　揚子法言　文子纘義　黃帝內經

竹書紀年　商君書　韓非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山海經

浙江公立圖書館（即浙江書局）刻本。上海有鉛印本亦尚可用。叢刻子書，以此部為最佳。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閒詁（孫詒讓）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莊子集釋（郭慶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謙）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商務印書館出版

春秋繁露義證（蘇輿）原刻本。

周禮　通行本。

論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湖北崇文書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館叢書本最佳，亦有單行的；湖北崇文書局本。

四十二章經　金陵刻經處本。　以下略舉佛教書。

佛遺教經　同上。

異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綱要（葛𩨧）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院本。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眞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

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譯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即圓覺經）（佛陀多羅譯）金陵刻經處白文本最好。

十二門論（鳩摩羅什譯）金陵刻經處本。

中論（同上）揚州藏經院本。

以上兩種，爲三論宗『三論』之二。

三論玄義（隋吉藏撰）金陵刻經處本。

大乘起信論（僞書）此雖是僞書，然影響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經處有沙門眞界纂註本頗便用。

大乘起信論考證（梁啓超）此書紹介日本學者考訂佛書眞僞的方法，甚有益。商務印書館將出版。

小止觀（一名童蒙止觀，智顗撰）天台宗之書不易讀，此書最便初學。金陵刻經處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經處本。

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疏）金陵刻經處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立撰）玄奘爲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偉大人物，此傳爲中國傳記文學之大名著。常州天寧寺本。

華嚴原人論（宗密撰）有正書局有合解本，價最廉。

壇經（法海錄）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語錄　此爲禪宗極重要之書，坊間現尚無單行刻本。大藏經縮刷本騰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此書可考見佛教在晉宋齊梁士大夫間的情形。金陵刻經處本。

韓昌黎集（韓愈）坊間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翺）三唐人集本。

柳河東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學案（黃宗羲，全祖望等）馮雲濠刻本，何紹基刻本，光緒五年長沙重刊本。坊間石印本不佳。

明儒學案（黃宗羲）莫晉刻本最佳。坊間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兩書，保存原料不少，爲宋明哲學最重要又最方便之書。此下所列，乃是補充這兩書之缺陷，或是提出幾部不可不備的專家集子。

直講李先生集（李覯）商務印書館印本。

王臨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二程全書（程顥，程頤）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書（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朱子年譜（王懋竑）廣東圖書館本，湖北局本。此書爲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書。

陸象山全集（陸九淵）上海江左書林鉛印本很可用。

陳龍川全集（陳亮）通行本。

葉水心全集（葉適）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書（王守仁）浙江圖書館本。

困知記（羅欽順）嘉慶四年翻明刻本。正誼堂本。

王心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東台袁氏編訂排印本最好，上海國學保存會寄售。

羅文恭公全集（羅洪先）雍正間刻本，四庫全書本與此本同。

胡子衡齊（胡直）此書爲明代哲學中一部最有條理又有精采之書。豫章叢書本。

高子遺書（高攀龍）無錫刻本。

學蔀通辨（陳建）正誼堂本。

正誼堂全書（張伯行編）這部叢書搜集程朱一系的書最多，欲研究『正統派』的哲學的，應備一部。全書六百七十餘卷，價約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現行者爲同治間補刻本。

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商務印書館。

日知錄（顧炎武）用黃汝成集釋本。通行本。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單行本。掃葉山房梨洲遺著彙刊本。

張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思問錄內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夢一卷（王夫之）同上。

顏李遺書（顏元，李塨）畿輔叢書本可用。北京四存學會增補全書本。

費氏遺書（費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義疏證（戴震）戴氏遺書本。國學保存會有鉛印本，但已賣缺了。

章氏遺書（章學誠）浙江圖書館排印本，上海劉翰怡新刻全書本。

章實齋年譜（胡適）商務印書館出版。

崔東壁遺書（崔述）道光四年陳履和刻本；畿輔叢書本只有考信錄，亦可夠用了。全書現由亞東圖書館重印，不久可出版。

漢學商兌（方東樹）此書無甚價值，但可致見當日漢宋學之爭。單行本，朱氏槐廬叢書本。

漢學師承記（江藩）通行本，附宋學師承記。

新學僞經考（康有爲）光緒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記探源（崔適）初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叢書（章炳麟）康寶忠等排印本；浙江圖書館刻本。

（三）文學史之部

詩經集傳（朱熹）通行本。

詩經通論（姚際恆）聞商務印書館將重印。

詩本誼（龔橙）浙江圖書館半厂叢書本。

詩經原始（方玉潤）聞商務印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

詩毛氏傳疏（陳奐）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　禮記第二篇。

春秋左氏傳　通行本。

戰國策　商務印書館有鉛印補注本。

楚辭集注，附辨證後語（朱熹）通行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編）廣雅局本。此書搜集最富，遠勝於

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蘇書局本。

續古文苑（孫星衍編）江蘇書局本。

文選（蕭統編）上海會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龍（劉勰）原刻本；通行本。

樂府詩集（郭茂倩編）湖北書局刻本。

唐文粹（姚鉉編）江蘇書局本。

唐文粹補遺（郭麐編）同上。

全唐詩（康熙朝編）揚州原刻本，廣州本，石印本，五代詞亦在此中。

宋文鑑（呂祖謙編）江蘇書局本。

南宋文範（莊仲方編）同上。

南宋文錄（董兆熊編）同上。

宋詩鈔（呂留良吳之振等編）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鈔補（管庭芬等編）商務印書館本。

宋六十家詞（毛晉編）汲古閣本，廣州刊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

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編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陽山房。

彊邨所刻詞（朱祖謀編刻）原刻本。王朱兩位刻的詞集都很精，這是近人對於文學史料上的大貢獻。

太平樂府（楊朝英編）四部叢刊本。

陽春白雪（楊朝英編）南陵徐氏隨庵叢書本。

以上兩種為金元人曲子的選本。

董解元絃索西廂（董解元）劉世珩暖紅室彙刻傳奇本。

元曲選一百種（臧晉叔編）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

金文最（張金吾編）江蘇書局本。

元文類（蘇天爵編）同上。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商務印書館本。

京本通俗小說　這是七種南宋的話本小說，上海蟫隱廬煙畫東堂小品本。

宣和遺事　士禮居叢書本；商務印書館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話殘本　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編）江蘇書局本。

列朝詩集（錢謙益編）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明詩綜（朱彝尊編）原刻本。

六十種曲（毛晉編刻）汲古閣本。此書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雜劇（沈泰編）董康刻本。

暖紅室彙刻傳奇（劉世珩編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種曲（李漁）原刻巾箱本。

九種曲（蔣士銓）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長生殿（洪昇）通行本。

清代戲曲多不勝舉；故舉李蔣兩集，孔洪兩種歷史戲，作幾個例而已。

曲苑　上海古書流通處（？）編印本。此書彙集關於戲曲的書十四種，中如焦循劇說，如梁辰魚江東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價亦廉，故存之。

綴白裘　這是一部傳奇選本，雖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戲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戲曲總集中，這也是一部重要書了。通行本。

曲錄（王國維）晨風閣叢書本。

湖海文傳（王昶編）所選都清朝極盛時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illegible]學者的文

人』的文學。原刻本。

湖海詩傳（王昶編）原刻本。

鮚埼亭集（全祖望）借樹山房本。

惜抱軒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雲山房文稿（惲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義（章學誠）貴陽刻本，浙江局本，鉛印本。

龔定盦全集（龔自珍）萬本書堂刻本。國學扶輪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國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專集，不易選擇；我經過很久的考慮，選出全，姚，惲，章，龔，曾六家來作例。

吳梅村詩（吳偉業）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本，無注；此外有靳榮藩吳詩集覽本，有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本。

甌北詩鈔 （趙翼）甌北全集本，單行本。

兩當軒詩鈔 （黃景仁）光緒二年重刻本。

巢經巢詩鈔 （鄭珍）貴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頗有誤字。

秋蟪吟館詩鈔 （金和）鉛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刪減。

人境廬詩鈔 （黃遵憲）日本鉛印本。

清代詩也很難選擇。我選梅村代表初期，甌北與仲則代表乾隆一朝；鄭子尹與金亞匏代表道咸同三朝；黃公度代表末年的過渡時期。

明清兩朝小說：

水滸傳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西遊記 （吳承恩）亞東圖書館再版本。

三國志 亞東圖書館本。

儒林外史 （吳敬梓）亞東圖書館四版本。

紅樓夢　（曹霑）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水滸後傳　（陳忱，自署古宋遺民）此書借宋徽欽二帝事來寫明末遺民的感慨，是一部極有意義的小說。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本。

鏡花緣　（李汝珍）此書雖有「掉書袋」的毛病，但全篇為女子爭平等的待遇，確是一部很難得的書。亞東圖書館本。

以上各種，均有胡適的考證或序，搜集了文學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觀　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俠五義　此書後經俞樾修改，改名七俠五義。此書可代表北方的義俠小說。舊刻本；七俠五義流通本較多。亞東圖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

兒女英雄傳　（文康）蜚英館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　（吳沃堯）廣智書局鉛印本。

恨海　（吳沃堯）通行本甚多。

老殘遊記　（劉鶚）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以上略舉十三種，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說。

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　（胡適）本書卷二。

（跋）文學史一部，注重總集：無總集的時代，或總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舉別集。因爲文集太多，不易收買，尤不易遍覽，故爲初學人及小圖書館計，皆宜先從總集下手。

附錄一　清華週刊記者來書

適之先生：

在努力週報的增刊，讀書雜志第七期上，我們看見先生爲清華同學們擬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我們看完以後，心中便起了若干問題，現在願說給先生聽聽，請先生賜教。

第一，我們以為先生這次所說的國學範圍太窄了。先生在文中並未下國學的定義，但由先生所擬的書目推測起來，似乎只指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而言。思想史與文學史便是代表國學麼？先生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裏，擬了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教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國學研究，這是先生在該宣言裏指示我們的。既然如此，為什麼先生不在國學書目文學史之部以後，加民族史之部，語言文字史之部，經濟史之部……呢？

第二，我們一方面嫌先生所擬的書目範圍不廣；一方面又以為先生所談的方面——思想史與文學史——談得太深了，不合於『最低限度』四字。我們以為定清華學生的國學最低限度，應該顧到兩種事實：第一是我們的時間，第二是我們的地位。我們清華學生，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求學的時間共八年。八年之內一個

普通學生，於他必讀的西文課程之外，如肯切實的去研究國學，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程度，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第二，清華學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對於一般留學生，要求一個什麼樣的國學程度，這是第二件事應該考慮的。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爲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爲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

因此，我們希望先生替我們另外擬一個書目，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那個書目中的書，無論學機械工程的，學應用化學的，學哲學文學，學政治經濟的，都應該念，都應該知道。我們希望讀過那書目中所列的書籍以後，對於中國文化，能粗知大略。至於先生在讀書雜志第七期所列的書目，似乎是爲有志專攻哲學或文學的人作參攷之用的，我們希望先生將來能繼續發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書目，讓有志於該種學科的青年，有一個深造的塗徑。

敬祝先生康健。

清華週刊記者。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錄二　答書

記者先生：

關於第一點，我要說，我暫認思想與文學兩部為國學最低限度；其餘民族史經濟史等等，此時更無從下手，連這樣一個門徑書目都無法可擬。

第二，關於程度方面和時間方面，我也曾想過，這個書目動機雖是為清華的同學，但我動手之後就不知不覺的放高了，放寬了。我的意思是要用這書目的人，從這書目裏自己去選擇；有力的，多買些；有時間的，多讀些；否則先買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後還可以自己隨時添備。若我此時先定一個最狹義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沒有伸縮的餘地了。先生以為是嗎？

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有沒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到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爲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

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我只好在原書目上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眞是不可少的了。此外還應加上一部九種紀事本末（鉛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書：

書目答問　　法華經　　左傳

中國人名大辭典　　阿彌陀經　　文選

九種紀事本末　　壇經　　樂府詩集

中國哲學史大綱
老子
四書
墨子閒詁
荀子集注
韓非子
淮南鴻烈集解
周禮
論衡
佛遺教經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王臨川集
朱子年譜
王文成公全書
清代學術概論
章實齋年譜
崔東壁遺書
新學偽經考
詩集傳
全唐詩
宋詩鈔
宋六十家詞
元曲選一百種
宋元戲曲史
綴白裘
水滸傳
西遊記
儒林外史
紅樓夢

附錄三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啓超

兩月前清華週刊記者以此題相屬，蹉跎久未報命。頃獨居翠微山中行，篋無一書，而記者督責甚急，乃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並書名篇名亦憶錯誤者，他日當更補正也。

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啓超。碧摩巖攬翠山房。

目次：

（附錄二）治國學雜話

（附錄三）評胡適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

▲論語　孟子

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

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註為其生平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清儒注本：論語則有戴望論語注，孟子則有焦循孟子正義最善。戴氏服膺顏習齋之學，最重實踐，所注似近孔門眞際；其訓詁亦多較朱注為優。其書簡絜易讀。焦氏

服膺戴東原之學，其孟子正義在清儒諸經新疏中為最佳本。但文頗繁，宜備置案頭，遇不解時或有所感時則取供參考。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乃戴氏一家哲學，並非專為注釋孟子而作。但其書極精闢，學者終須一讀。最好是於讀孟子時並讀之，既知戴學綱領，亦可以助讀孟子之興味。

焦循論語通釋，乃摹仿孟子字義疏證而作，將全部論語拆散，標舉重要諸義如言仁言忠恕……等列為若干目通觀而總詮之，可稱治論語之一良法，且可應用其法以治他書。

右兩書篇葉皆甚少，易讀。

陳澧東塾讀書記中讀孟子之卷，取孟子學說分項爬梳，最為精切。其書不過二三十葉，（？）宜一讀以觀前輩治學方法，且於修養亦有益。

▲易經

此書爲孔子以前之哲學書。孔子爲之注解，雖奧衍難究，然總須一讀。吾希望學者將繫辭傳文言傳熟讀成誦。其卦象傳六十四條，則用別紙鈔出，隨時省覽。

後世說易者言人人殊。爲修養有益起見，則程頤之程氏易傳差可讀。

說易最近眞者，吾獨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樓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稱精詣。學者如欲深通此經，可取讀之。否則可以不必。

▲禮記

此書爲戰國及西漢之『儒家言』叢編，內中有極精純者，亦有極破碎者。吾希望學者將中庸大學禮運樂記四篇熟讀成誦。曲禮王制檀弓禮器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儒衣大傳祭義祭法鄉飲酒義諸篇多瀏覽數次，且摘錄其精要語。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經注疏內鄭注孔疏。孝經之性質與禮記同，可當禮記之一篇讀。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區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

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爲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時兩聖並稱，故此書非讀不可。除備城門以下各篇外，餘篇皆宜精讀。注釋書以孫詒讓墨子閒詁爲最善，讀墨子宜即讀此本。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張惠言墨子經說解及梁啓超墨經兩書可參觀，但皆有未精愜處。小取篇有胡適新詁可參觀。梁啓超墨子學案，屬通釋體裁，可參觀助興味；但其書爲臨時講義，殊未精審。

▲莊子

內篇七篇及雜篇中之天下篇最當精讀。注釋有郭慶藩之莊子集釋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最當精讀。餘亦須全部瀏覽。注釋書王先謙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　慎子　公孫龍子

今存者皆非完書。但三子皆爲先秦大哲，雖斷簡亦宜一讀，篇帙甚少，不費力也。公孫龍子之眞僞，尚有問題。三書皆無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韓非子

法家言之精華。須全部瀏覽。（其特別應精讀之諸篇，因手邊無原書，臆舉恐遺漏，他日補列。）注釋書王先愼韓非子集釋差可。

▲管子

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呂氏春秋

此爲中國最古之類書。先秦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瀏覽。

▲淮南子

此爲秦漢間道家言薈萃之書，宜稍精讀。注釋書間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頗好。

▲春秋繁露

此爲西漢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讀。注釋書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頗好。康有爲之春秋董氏學，爲通釋體裁，宜參看。

▲鹽鐵論

此書爲漢代儒家法家對於政治問題對壘抗辯之書，宜瀏覽。

▲論衡

此書爲漢代懷疑派哲學，宜瀏覽。

▲抱朴子

此書爲晉以後道家言代表作品，宜瀏覽。

▲列子

晉人僞書，可作魏晉間玄學書讀。

右所列爲漢晉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間思想界著光采者爲佛學，其書目當別述。以下舉宋以後學術之代表書。但爲一般學者節啬精力計，不願多舉也。

▲近思錄　朱熹著，江永注。

讀此書可見程朱一派之理學其內容何如。

▲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　王懋竑著。

此書敍述朱學全面目，最精要有條理。

若欲研究程朱學派，宜讀二程遺書及朱子語類。非專門斯業者可置之。

南宋時與朱學對峙者尙有呂東萊之文獻學一派，陳龍川葉水心之功利主義一派，及陸象山之心學一派。欲知其詳，宜讀各人專集。若觀大略，可求諸宋元學案中。

▲傳習錄　王守仁語，徐愛錢德洪等記。

讀此可知王學梗概。欲知其詳，宜讀王文成公全書。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敎，要合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故陽明集之重要，過於朱陸諸集。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宋元學案　黃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

此二書爲宋元明三朝理學之總記錄，實創作的學術史。明儒學案中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蕺山諸案最精善。宋元學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馬光）諸案失之太繁，反不見其眞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學略最壞。因有門戶之見，故爲排斥。欲知荆公學術，宜看王臨川集。

此二書卷帙雖繁，吾總望學者擇要瀏覽，因其爲六百年間學術之總匯，影響於

近代甚深。且彙諸家爲一編，讀之不甚費力也。

清代學術史可惜尚無此等佳著。唐鑑之國朝案小識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學派爲立脚點，褊狹固陋，萬不可讀。江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亦學案體裁，較好。但江氏學識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獨到之處。萬不得已，姑以備參考而已。啓超方有事於清儒學案，汗青尚無期也。

▲日知錄　亭林文集　顧炎武著。

顧亭林爲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於日知錄，宜一瀏覽。讀文集中各信札，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著。

黃梨洲爲清初大師之一。其最大貢獻在兩學案。此小册可見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問錄　王夫之著。

王船山為清初大師之一。非通觀全書，不能見其神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別為系統的整理，則學者不能讀。聊舉此書發凡，實不足以代表其學問之全部也。

▲顏氏學記　戴望編。

顏習齋為清初大師之一。戴氏所編學記，頗能傳其眞。徐世昌之顏李學，亦可供參考。但其所集習齋語要，恕谷(李塨)語要，將攻擊宋儒語多不錄，稍失其眞。

顧黃王顏四先生之學術，為學者所必須知，然其著述皆浩瀚或散殊，不易尋釋。啓超行將為系統的整理記述以餉學者。

▲東原集　戴震著。

▲雕菰樓集　焦循著。

戴東原焦理堂為清代經師中有精深之哲學思想者。讀其集可知其學並知其治學方法。

啓超所擬著之『清儒學案』『東原理學』兩案正在屬稿中。

▲文史通義　章學誠著。

此書雖以文史標題，實多論學術流別，宜一讀。胡適著章實齋年譜，可供參考。

▲大同書　康有爲著。

南海先生獨創之思想在此書。曾刊於不忍雜誌中。

▲國故論衡　章炳麟著。

可見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詳當讀章氏遺書。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著。

有偏宕處，亦有獨到處。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胡適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啓超著。

將讀先秦經部子部書，宜先讀此兩書。可引起興味，並啓發自己之判斷力。

▲淸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著。

欲略知清代學風，宜讀此書。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

▲尚書

內中惟二十八篇是眞書，宜精讀。但其文佶屈聱牙，不能成誦亦無妨。餘篇屬晉人僞撰，一瀏覽便足。（眞僞篇目，看啓超所著『古書之眞僞及其年代』，日內當出版。）此書非看注釋不能解，注釋書以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爲最好。

▲逸周書

此書眞僞參半。宜一瀏覽。注釋書有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頗好。

▲竹書紀年

此書現通行者爲元明人僞撰。其古本，清儒輯出者數家。王國維所輯最善。

▲國語　春秋左氏傳

此兩書或本爲一書，由西漢人析出，(?)宜合讀之。左傳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成誦，於學文甚有益。讀左傳宜參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學方法。

▲戰國策

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於學文有益。

▲周禮

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爲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

▲考信錄　崔述著。

此書考證三代史事實最謹嚴，宜一瀏覽，以爲治古史之標準。

▲資治通鑑

此爲編年政治史最有價值之作品。雖卷帙稍繁，總希望學者能全部精讀一過。

若苦乾燥無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門類。標治摘記，作將來著述資料。（吾少時曾用此法，雖無成書，然增長興味不少。）王船山讀通鑑論，批評眼光，頗異俗流，讀通鑑時取以並讀，亦助興之一法。

▲續資治通鑑　畢沅著。

此書價值遠在司馬光原著之下，自無待言；無視彼更優者，姑以備數耳。或不讀正續資治通鑑，而讀九種紀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則彼，必須有一書經目者。

▲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皇朝文獻通考

三書卷帙浩繁。今爲學者摘其要目：田賦考，戶口考，職役考，市糴考，徵榷考，國用考，錢幣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四裔考，必須讀。王禮考，封建考，象緯考，……絕對不必讀。其餘或讀或不讀隨人。（手邊無原書，不能具記其目，有漏略當校補。）各人宜因其所嗜，擇類讀之。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者，則讀前七考。餘仿此。馬氏文獻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創作，應擧通

典。今合彼取此者，取其資料較豐富耳。吾輩讀舊史，所貴者惟在原料，鑪錘組織，當求之在我也。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可與通考合讀。

▲通志二十略

鄭漁仲學識史才，皆邁尋常。通志全書卷帙繁，不必讀。二十略則其精神所聚，必須瀏覽。其中與通考門類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校讎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鑑通考，已浩無涯涘，更語及厖大之二十四史，學者幾何不望而卻走！然而二十四史終不可不讀。其故有二：(一)現在既無滿意之通史，不讀二十四史，無以知先民活動之遺跡。(二)假令雖有佳的通史出現，然其書自有別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終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終久仍爲國民應讀之書。

書既應讀，而又浩繁難讀，則如之何？吾今試爲學者擬摘讀之法數條。

一曰就書而摘。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俗稱四史。其書皆大史家一手著述，體例精嚴，且時代近古，向來學人誦習者衆，在學界之勢力與六經諸子埒。吾輩爲常識計，非一讀不可。吾希望學者將此四史之列傳，全體瀏覽一過，仍摘出若干篇稍爲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舉其目亦可，但手邊無原書，當以異日。）四史之外，則明史共認爲官修書中之最佳者，且時代最近，亦宜稍爲詳讀。

二曰就事分類而摘讀志。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則讀平準書食貨志；欲研究音樂，則讀樂書樂志；欲研究兵制，則讀兵志；欲研究學術史，則讀藝文志經籍志，附以儒林傳；欲研究宗教史，則讀魏書釋老志。（可惜他史無之）……每研究一門，則通各史此門之志而讀之，且與文獻通考之此門合讀。當其讀時，必往往發見許多資料散見於各傳者，隨即跟蹤調查其傳以讀之。如此引申觸類，漸漸便能成爲經濟史宗教史……等等之長編，將來薈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

三曰就人分類而摘讀傳。讀名人傳記，最能激發人志氣，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增長不少，古人所以貴讀史者以此。全史名傳既不能徧讀，（且亦不必）則宜擇偉大人物之傳讀之，每史亦不過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擇讀：如欲研究學術史，則讀儒林傳及其他學者之專傳；欲研究文學史，則讀文苑傳及其他文學家之專傳。……用此法讀去，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國傳蠻夷傳土司傳等，包含種族史及社會學之原料最多，極有趣，吾深望學者一讀之。

▲廿二史劄記　趙翼著。

學者讀正史之前，吾勸其一瀏覽此書。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書深得『比事』之訣，每一個題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學者能用其法以讀史，便可養成著述能力。（內中校勘文字異同之部約占三分一，不讀亦可。）

▲聖武記　魏源著。

清朝一代史蹟，至今尙無一完書可讀，最爲遺憾。姑舉此二書充數。魏默深有良史之才，聖武記爲紀事本末體裁，敍述綏服蒙古戡定金川撫循西藏……諸役，於一事之原因結果及其中間進行之次序，若指諸掌，實罕見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瀏覽，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蹟大概。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日本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尙可讀。（有譯本）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著。

此爲最有組織的地理書。其特長在專論形勢，以地域爲經，以史蹟爲緯，讀之不感乾燥。此書卷帙雖多，專讀其敍論，（至各府止）亦不甚費力，且可引起地理學興味。

▲史通　劉知幾著。

此書論作史方法，頗多特識，宜瀏覽。章氏文史通義，性質略同，範圍較廣，已見前。

▲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著。

讀之可增史學興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韻文書類

▲詩經

希望學者能全部熟讀成誦；卽不爾，亦須一大部分能舉其詞。注釋書，陳奐詩毛氏傳疏最善。

▲楚辭

屈宋作，宜熟讀，能成誦最佳。其餘可不讀。注釋書，朱熹楚辭集註較可。

▲文選

擇讀。

▲樂府詩集　郭茂倩編。

專讀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漢古辭，以見魏六朝樂府風格。其他不必讀。

魏晉六朝人詩宜讀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謝玄暉。無單行集者，可用張溥漢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闓運八代詩選本。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王右丞集

▲孟襄陽集

▲韋蘇州集

▲高常侍集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白香山集

▲李義山集

▲王臨川集（詩宜用李壁注本）

▲蘇東坡集

▲元遺山集

▲陸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詩文集。

▲唐百家詩選　王安石選。

▲宋詩鈔　呂留良鈔。

以上唐宋詩選本。

▲清眞詞　周美成。

▲醉翁琴趣　歐陽修。
▲東坡樂府　蘇軾。
▲屯田集　柳永。
▲淮海詞　秦觀。
▲樵歌　朱敦儒。
▲稼軒詞　辛棄疾。
▲後村詞　劉克莊。
▲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
▲碧山詞　王沂孫。
▲夢窗詞　吳文英。
以上宋人詞集。
▲西廂記

▲琵琶記

▲牡丹亭

▲桃花扇

▲長生殿

以上元明清八曲本。

本門所列書，專資學者課餘諷誦陶寫情趣之用，既非爲文學專家說法，尤非爲治文學史者說法，故不曰文學類而曰韻文類。文學範圍，最少應包含古文（駢散文）及小說。吾以爲苟非欲作文學專家，則無專讀小說之必要。至於古文，本不必別學。吾輩總須讀周秦諸子左傳國策四史通鑑及其關於思想關於記載之著作，苟能多讀，自能屬文。何必格外標舉一種名曰古文耶？故專以文鳴之文集不復錄。（其與學問有關係之文集散見各門）文選及韓柳王集聊附見耳。學者如必欲就文求文，無已，則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可用也。

清人不以韻文見長，故除曲本數部外，其餘詩詞皆不復列舉。無已，則於最初期與最末期各舉詩詞家一人，吳偉業之梅村詩集與黃遵憲之人境廬詩集，成德之飲水詞與文焯之樵風樂府也。

(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

▲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著。

▲說文釋例　王筠著。

段著爲說文正註。朱注明音與義之關係。王著爲說文通釋。讀此三書，略可通說文矣。

▲經傳釋詞　王引之著。

▲古書疑義舉例　俞樾著。

▲文通　馬建忠著。

讀此三書，可知古人語法文法。

▲經籍纂詁　阮元編。

此書彙集各字之義訓，宜置備檢查。

文字音韻，為清儒最擅之學，佳書林立。此僅舉入門最要之數種。若非有志研究斯學者，並此諸書不讀亦無妨耳。

(戊)隨意涉覽書類

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學者讀書尚少時，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為何。隨意涉獵，初時並無目的，不期而引起問題，發生趣味，從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絕業者，往往而有也。吾故雜舉有用或有趣之各書，供學者自由繙閱之娛樂。讀此者不必順葉次，亦不必求終卷也。（各書亦隨憶想所及雜舉，無復詮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乾隆間四庫館，董其事者皆一時大學者，故所作提要，最稱精審，讀之可略見各書內容。（中多偏至語，自亦不能免）宜先讀各部類之敍錄，其各書條下則隨意抽閱。有所謂存目者，其書被屏，不收入四庫者也。內中頗有怪書，宜稍注意讀之。

▲世說新語

將晉人談玄語分類纂錄，語多雋妙，課餘暑暇之良伴侶。

▲水經注　酈道元撰，戴震校。

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蹟，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

▲文心雕龍　劉勰撰。

六朝人論文書。論多精到，文亦雅麗。

▲大唐三藏慈恩法師傳　慧立撰。

此爲玄奘法師詳傳。玄奘爲第一位留學生，爲大思想家，讀之可以增長志氣。

▲徐霞客游記

霞客晚明人，實一大探險家。其書極有趣。

▲夢溪筆談　沈括。

宋人筆記中含有科學思想者。

▲困學紀聞　王應麟撰，閻若璩註。

宋人始爲考證學者。顧亭林日知錄頗仿其體。

▲通藝錄　程瑤田撰。

清代考證家之博物書。

▲癸巳類稿　俞正燮撰。

多爲經學以外之考證，如考棉花來歷，考婦人纏足歷史，輯李易安事蹟等。又多新穎之論，如論妒非婦人惡德等。

▲東塾讀書記　陳澧撰。

此書僅五冊，十餘年乃成。蓋合數十條筆記之長編乃成一條筆記之定稿，用力最爲精苦，讀之可識搜集資料及駕馭資料之方法。書中論鄭學，論朱學，論諸子，論三國諸卷最善。

▲庸盦筆記　薛福成。

多記清咸豐同治間掌故。

▲張太岳集　張居正。

江陵爲明名相，其信札盍人神智，文章亦美。

▲王心齋先生全書　王艮。

吾常名心齋爲平民的理學家。其人有生氣。

▲朱舜水遺集　朱之瑜。

舜水爲日本文化之開闢人，唯一之國學輸出者，讀之可見其人格。

▲李恕谷文集　李塨。

恕谷爲習齋門下健將，其文勁達。

▲鮚埼亭集　全祖望。

集中記晚明掌故甚多。

▲潛研堂集　錢大昕。

竹汀爲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對倫理問題，亦頗有新論。

▲述學　汪中。

容甫爲治諸子學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漢晉間，極遒美。

▲洪北江集　洪亮吉。

北江之學長於地理，其小品駢體文描寫景物，美不可言。

▲定盦文集　龔自珍。

吾少時心醉此集，今頗厭之。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

▲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

右二集信札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曾滌生文章尤美，集桐城派之大成。

▲苕溪漁隱叢話　胡仔。

詩話中資料頗豐富者。

▲詞苑叢談　徐釚。

唯一之詞話，頗有趣。

▲語石　葉昌熾。

以科學方法治金石學，極有價值。

▲書林清話　葉德輝。

論刻書源流及藏書掌故，甚好。

▲廣藝舟雙楫　康有爲。

論寫字，極精博，文章極美。

▲劇說　焦循。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二書論戲劇，極好。

既謂之涉覽，自然無書不可涉，無書不可覽，本不能臚舉書目；若舉之非累數十紙不可。右所列不倫不類之寥寥十餘種，隨雜憶所及當坐譚耳。若繩以義例，則笑絕冠纓矣。

附錄一　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右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柢略立，可以爲將來大成之基矣。惟靑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讀。今再爲擬一眞正之最

低限度如下：

四書　易經　書經　詩經　禮記　左傳　老子　墨子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　宋元明史紀事本末　楚辭　文選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白香山集　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

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爲中國學人矣。

附錄二　治國學雜話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麼，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爲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爲社會上治事領袖人

才。課外學問，自然不專指讀書：如試驗，如觀察自然界，……都是極好的。但讀課外書，最少要算課外學問的主要部分。

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趣味。打算做專門學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業家，也要如此，因為我們在工廠裏在公司裏在議院裏在……裏做完一天的工作出來之後，隨時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書籍。

但是將來這種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學校時代已經決定。因為必須養成讀書習慣纔能嘗着讀書趣味。人生一世的習慣，出了學校門限，已經鑄成了。所以在學校中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動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

讀書自然不限於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於中國書，最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你這樣待遇他，他給回你的愉快報酬，最少也和讀外國書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但會做學問的人，覺得趣味

就在這一點。吃現成飯，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是最沒有出息的人纔喜歡的。一種問題，被別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編成教科書樣子給我讀，讀去自然是毫不費力。但從這不費力上頭結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細緻不刻入。專門喜歡讀這類書的人，久而久之，會把自己創作的才能汩沒哩。在紐約芝加哥筆直的馬路嶄新的洋房裏舒舒服服混一世，這個人一定是過的毫無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過有意味的生活，須是哥侖布初到美洲時。

中國學問界，是千年未開的礦穴，礦苗異常豐富。但非我們親自絞腦筋絞汗水，卻開不出來。翻過來看，只要你絞一分腦筋一分汗水，當然還你一分成績，所以有趣。

所謂中國學問界的礦苗，當然不專指書籍。自然界和社會實況，都是極重要的。但書籍為保存過去原料之一種寶庫，且可以為現在實測各方面之引線。就這點看來，我們對於書籍之浩瀚，應該歡喜感謝他，不應該厭惡他。因為我們的事業比

方要開工廠，原料的供給，自然是越豐富越好。

讀中國書，自然像披沙揀金，沙多金少。但我們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時尋常人認為極無用的書籍和語句，也許有大功用。須知工廠種類多着呢。一個廠裏頭還有許多副產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麼方法呢？是鈔錄或筆記。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徵引那麼繁博，分析那麼細密，動輒伸着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別天才，我們不能學步了。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抵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用者，即刻鈔下。（短的鈔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葉數。）資料漸漸積得豐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他，更

成一篇名著。想看這種痕跡，讀趙甌北的二十二史劄記，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最容易看出來。

這種工作，笨是笨極了，苦是苦極了。但真正做學問的人，總離不了這條路。做動植物的人，懶得採集標本，說他會有新發明，天下怕沒有這種便宜事。

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鈔書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當讀一書時，忽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他鈔下，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腦中，和滑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碰着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係的，又把他鈔下，那注意便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之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跳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經驗得來的實況。諸君試拿一年工夫去試試，當知我不說謊。

先輩每教人不可輕言著述。因爲未成熟的見解公布出來，會自誤誤人，這原是不錯的。但靑年學生『斐然有述作之譽』，也是實際上鞭策學問的一種妙用。譬如

同是讀文獻通考的錢幣考各史食貨志中錢幣項下各文，汎汎讀去，沒有什麼所得。倘若你一面讀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國貨幣沿革考，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問題，你所讀的自然加幾倍受用。譬如同讀一部荀子，某甲汎汎讀去，某乙一面讀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學案，讀過之後，兩個人的印象深淺，自然不同。所以我很獎勵青年好著書的習慣。至於所著的書，拿不拿給人看，什麼時候纔認成功，這還不是你的自由嗎？

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涉覽的。因爲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彀用，不能博搜資料。諸經諸子四史通鑑等書，宜入精讀之部，每日指定某時刻讀他，讀時一字不放過，讀完一部纔讀別部。想鈔錄的隨讀隨鈔。另外指出一時刻，隨意涉覽。覺得有趣，注意細看；覺得無趣，便翻次葉。遇有想鈔錄的，也俟讀完再鈔，當時勿窒其機。

諸君勿因初讀中國書勤勞大而結果少，便生退悔。因爲我們讀書，並不是想專向現時所讀這一本書裏頭現錢現貨的得多少報酬，最要緊的是涵養成好讀書的習慣和磨鍊出善讀書的腦力。青年期所讀各書，不外借來做達這兩個目的的梯子。我所說的前提倘若不錯，則讀外國書和讀中國書當然都各有益處。外國名著，組織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齊齊擺出來，可以做我們的模範；這是好處。我們滑眼讀去，容易變成享現成福的少爺們，不知甘苦來歷，這是壞處。中國書未經整理，一讀便是一個悶頭棍，每每打斷趣味，這是壞處。逼着你披荊斬棘，尋路來走，或者走許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斷無冤枉，走錯了回頭，便是絕好教訓。）從甘苦閱歷中磨鍊出智慧，得苦盡甘來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卻最眞切，這是好處。

還有一件：我在前項書目表中，有好幾處寫『希望熟讀成誦』字樣。我想諸君或者以爲甚難，也許反對說我頑舊。但我有我的意思，我並不是獎勵人勉強記憶。

我所希望熟讀成誦的有兩種類。一種類是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一種類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須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纔在我們的『下意識』裏頭，得着根柢，不知不覺會『發酵』。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纔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他給我們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臨時纔用得着。我所以有些書希望熟讀成誦者在此。但亦不過一種格外希望而已，並不謂非如此不可。

最後我還專向清華同學諸君說幾句話：我希望諸君對於國學的修養比旁的學校學生格外加功。諸君受社會恩惠，是比別人獨優的。諸君將來在全社會上一定占勢力，是眼看得見的。諸君回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有無貢獻，便是諸君功罪的標準。饒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若這樣便有影響，我們把美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彀了，又何必諸君

呢。諸君須要牢牢記着：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纔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

附錄三　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胡君說：『幷不為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依我看，這個書目，為『國學已略有根柢而知識絕無系統』的人說法，或者還有一部分適用。我想：清華週刊諸君所想請教胡君的幷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卻讀商務印書館教科書之外沒有讀過一部中國書』的青年們打算。若我所猜不錯，那麼，胡君答案，相隔太遠了。

胡君致誤之由：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憑藉的資料。（對

不對又另是一問題，現在且不討論。）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不是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裏頭的書什有七八可以不讀。真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却又不彀了。

胡君第二點誤處，在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爲一談。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機關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對，只好說是哲學史文學史家私人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學生（尤其清華）正苦於跑進圖書館裏頭不知讀什麼書纔好，不知如何讀法，你給他一張圖書館書目，有何用處。何况私人購書，談何容易。這張書目，如何能人人購置。結果還不是一句話嗎？

我最詫異的：胡君爲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却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鑑是要『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纔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彀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

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平心而論，做文學史（尤其做白話文學史）的人，這些書自然該讀。但胡君如何能因為自己愛做文學史便強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歡金石學，儘可將金石類書列出一張系統的研究書目；某人喜歡地理學，儘可以將地理類書列出一張系統的研究書目。雖然，只是為本行人說法，不能應用於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書，大半和金石萃編愙齋集古錄殷墟書契考釋（金石類書）水道提綱朔方備乘元史譯文證補（地理類書）等等同一性質。雖不是不應讀之書，卻斷不是人人必應讀之書。（胡君覆清華週刊信說：『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依着這句話，留學生最少也該知道殷墟書契考釋朔方備乘……是應該知道的書。那麼，將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搬字過紙更列舉後出書千數百種便了，何必更鬧最低限度書目？須知『知道』是一件事，『必讀』又別是一件事。）

我的主張，很是平淡無奇。我認定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幾部經書

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鑑宋元明紀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關係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有了這種常識之人不自滿足，想進一步做專門學者時，你若想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你就請教胡君這張書目。你若想做別一項專門家，還有許多門我也可以勉強照胡君樣子替你另開一張書目哩。

胡君對於自己所好的兩門學問研究甚深，別擇力甚銳，以爲一般青年也該如此，不必再爲別擇，所以把許多書目臚列出來便了。試思一百多册的正誼堂全書千篇一律的『理氣性命』，叫青年何從讀起？何止正誼堂，即以浙刻二十二子論，告訴青年說這書該讀，他又何從讀起？至於其文學史之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古文苑，續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詩，宋文鑑，南宋文範，南宋文錄，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四印齋宋元詞，彊邨所刻詞，元曲選百種，金文最，元文類，明文在，列朝詩集，明詩綜，六十種曲等書，我大略估計，

恐怕總數在一千冊以上，叫人從何讀起？青年學生，因爲我們是『老馬識途』，虛心請教，最少也應告訴他一個先後次序。例如唐詩該先讀某家後讀某家，不能說你去讀全唐詩便了。宋詞該先讀某家後讀某家，不能說詩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讀。若說你全部讀過後自會別擇，誠然不錯。只怕他索性不讀便了。何況青年者有這許多精力日力來讀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冊文學書，何如用來讀二十四史九通呢？

還有一層：胡君忘却學生沒有最普通的國學常識時，有許多書是不能讀的。試問連史記沒有讀過的人，讀崔適史記探源懂他說的什麼？連尚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什麼？連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沒有讀過的人，讀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懂他說的什麼？這不過隨手舉幾個例，其他可以類推。假如有一位學生，（假定還是專門研究思想史的學生）敬謹遵依胡君之教，順着他所開書目讀去，他的書明明沒有尚書史記漢書這幾部書，你想這位學生，讀到崔述康有爲崔適的著述時，該怎麼樣狼狽呢？胡君之意，或者以這位學生早已讀過

尙書史記漢書爲前提，以爲這樣普通書，你當然讀過，何必我說。那麼，四書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總而言之，尙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爲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眞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思想史之部，連易經也沒有。什麼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覆。）

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罣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爲是不合用的。

梁任公墨經校釋序

梁任公先生近來把他十餘年來讀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隨時做的簽註，輯為一書，寫成墨經校釋四卷。他因為我也愛讀這幾篇書，故寫信來，要我做一篇序。我曾發願，要做一部墨辯新詁；不料六七年來，這書還沒有寫定。現在我見了梁先生這部校釋，心裏又慚愧，又歡喜。這篇序，我如何敢辭呢？

梁先生的校釋，有許多地方與張惠言孫詒讓諸人的校釋大不相同。我們看這部書，便知道梁先生在這四篇書上着實用過許多工夫。我們雖未必都能贊同他的見解，但這裏面很有許多新穎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學的人的參考。例如經說下第六七條，『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梁先生據明嘉靖癸丑本，於『則』字上校增『可』字。嘉靖本近始由上海涵芬樓列入四部叢刊印行，但從前

校墨子的人都不曾見此本，故梁先生這一條乃是用嘉靖本校墨子的第一次。將來一定有人繼起，把嘉靖本與他本的異同得失，一一校勘出來。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裏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了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現在梁先生這部新書，一定可以引起更多更廣的新興趣，一定可以受更多讀墨子的人的歡迎，是無可疑的。但梁先生還要我在這篇序裏『是正其譌謬』。他這樣的虛心與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僅僅應酬的序。我讀了這部書，略有一點意見，貢獻出來，請梁先生切實指教。

梁先生自己說他治這部書的方法中有一條重要的公例：『凡經說每條之首一字，必牒舉所說經文此條之首一字以爲標題。此字在經文中可以與下文連讀成句；在經說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梁先生用了這條公例，校改了許多舊注。他自己說：『竊謂循此以讀，可以無大過。』他所改的地方，如經說下第八條牒出

『異』字，如經說下第四九條標出『知』字，確然都可自立一說，可供治墨學的參考。但我覺得他把這條公例定的太狹窄了，應用時確有許多困難；若太拘泥了，一定要發生很可指摘的穿鑿傅會。例如經說下第六條標出『不』字，第七條又標出『不』字，似乎太牽强了。標出標題的辦法，——假令眞有此辦法，——不過是要求標題的分清醒目，似乎不致標出像『不』字那樣最常用的字罷？依我個人的愚見，我們至多只可說，『經說每條的起首，往往標出經文本條中的一字或一字以上。』但(1)不限於經說每條的首一字，(2)不限於經文每條的首一字，(3)不必說『必』，(4)不可說『此字在經說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梁先生必欲加上這四種限制的條件，故經說下第五四條起首的『心中』，梁先生只肯留下『中』字；剩下的『心』字，他改爲『必』字，再改爲『平』字，然後倒移到二十三個字的前面去，作爲第五四條經說的標題。這豈不是太牽强的校勘嗎？又如經說上第三條『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梁先生也讀『知材』兩字爲標題，可見『首一字』的限制，

無論是經或經說，都不可拘泥。第六條梁先生也牒『有問』兩字，與此條相同。又如經說上第一，二，三，四，五，六，等條，標題的字都是獨立的，不與下文連讀成句。但此項限制並非普遍的。如第二一條『力，重之謂』，這一類的句子，我們就不能不把標題的字與下文連讀成句了。

況且梁先生對於他提出的這條公例，也不能完全謹守。例如經說下近篇末之處有『諾超城員止也……』一大段，依梁先生牒題的公例，這一段應該是經文『諾不一利用……』的說了。但梁先生卻把經說的『諾』字改爲『言』字，移作『言，口之利也』的說的標題；並且把經文『諾不一』一段認爲衍文，一齊刪去了！

以上說的是梁先生治墨經的一條主要方法。此外梁先生還有一個意見，他說：『今本之經及經說皆非盡原文，必有爲後人附加者。』我是一個最愛疑古的人，但我對於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卻不敢懷疑。這幾篇書，因爲難懂的緣故，研究的人很少；但因爲研究這些書的人很少，故那些作僞書的人都不願

意在這幾篇上玩把戲。因此，我們覺得這幾篇書脫誤雖然不少，卻不像有後人附加的文句。經上篇末有『說』字，下注『音利』二字，（孫詒讓校改作『言利』，又改作經文。）此二字確是很像舊注。此外，我們就不容易尋出後人附加的痕跡了。（梁先生說：『讀此書旁行』五字是後人所加，此似不然。原書亦未嘗不可有這五個字。）

梁先生這個意見，我覺得有點危險。因爲他根據了這個意見，就把經與經說的原文刪去了好幾段，認爲後人附加的案語。我且舉經文的末數行（自『諸不一利用』以下），經說末數行（自『諸超城員止也』以下）作一個例：

（經上）	（經說上）
諸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諸超城（張惠言本作成。）員止也 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 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

經	說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正無非	法法取同觀巧轉法取此擇彼問故觀 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 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 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 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 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 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這些經與經說，依我的私見看來，並不很費解。經文並無誤字，但因原書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為上行所隔開，誤分作六行，故不可讀。今合為一條經，讀如下：

諾不一，利用服。執說（舊注『音利』，孫校改為『言利』，是也。但孫說則無理。孫引埤倉云：『詁說，言不同也。』今檢任大椿小學鈎沈卷八據集韻類篇引埤倉，作『詁說，言不正』。又康熙字典引埤倉，亦作『不正』。孫書多誤字，此其一也。『言利』猶言『利口』，即

「言不正」之意。言音形似而譌。）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止，因以別道。正，無非。

如此，便不須解說了。經說一百三十五字，都是說這一條的，也不必分開。今校讀如下：

諾，超城邑（原作員）止也。相從相去，无（原作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不）服，難成言。務成之，執（原作九，乃執之壞字。）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轉；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止（原作心，依張校改。）愛（於）人：是孰宜止？（原作心，从張校。）彼舉然也，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原作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互諾。（互舊譌作五。形似而譌。下同。）人皆於知有說。（皆字舊在人字上。今改正。或當在知字下，則更順了。）

過互諾，若『負無直』，無說。用互諾，若自然矣。

如此校讀，幾乎不須改字，而意義似更明顯。最重要的，乃是一個『止』字的意義。此乃墨辯裏的一個重要術語，試看經下與經說下的第一條，便知此字的重要，又可參證此兩大段。墨辯用『止』字之處甚多，但最重要的莫如上篇的末章與下篇的首章。梁先生都改為『正』，便不好講了。

墨子尚同各篇深怕『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危險，故主張『上同』之法，——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很帶有專制的采色。墨家後人漸打破這種專制的正義觀，故經上有『君臣萌通約』之說，經說上釋此條道：『君，以若民者也。』梁先生校改『若』為『約』；但『若』字向來訓『順』，正不煩改字，而意義更明顯。末章論『諾』，注重於思辨的方法，眞是『別墨』的科學精神！這樣折服人，自然使人心服，故能做到『互諾』的地位。『正』並不是『上同於天』，乃是『互諾』。『人於知皆有說』，但已經成為公認的眞理，如幾何學上的『員賦

直』，自然沒有話說了。

梁先生校讀此兩大段極重要的經與說，共刪去經文十六字，認爲傳寫的人所妄加；又刪去經說『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以下三十一字，以爲讀者所加案語；又把『若聖人有非而不非』八字搬在『正』字之下，『五諾』之上；又把『五諾皆人於知有說』以下二十四個一齊删去，以爲是複寫的衍文。梁先生說，『所以複寫者，因旁行本下有空格，傳者輒思補滿之，乃將前條複寫，而又譌衍百出。』這種大膽的刪削與心理的揣測，依校勘學的方法看來，似乎有點牽強。校勘家第一須搜求善本，校勘同異。若無善本可以質證，而仍不能不校讎，我們固然有時也可依據普通心理的可能，定校勘的範圍與規律，如『形似而誤』，『涉上下文而衍』，等等。但此項校勘的程度，至多不過是一種比較的『機數』（Probability）。故校勘家當向機數最大的方面做去。例如韓非子說的『舉燭』一件故事，那種心理上的錯誤便不在校勘學的範圍之內了；因爲一個人寫字時，他的心理上可能的變化，是

無窮數的；他也許想到舉燭，也許想到喝酒，也許想到洗脚……校勘家如何猜測得定呢？但這樣一兩個字的誤衍，我們有時還勉强可以用『誤衍』兩字去辦理。至於幾十個字的誤衍，那種事實的機數，在心理學上看來，差不多近於零點，更不能列在校勘學的範圍之內了，梁先生以爲如何？

這幾點都是關於梁先生著書方法的討論。至於梁先生校釋墨辯各條的是非得失，那就不是這篇短序裏能討論的了。此外，梁先生和我對於墨辯的時代和著者等等問題的見解不同，我也不願在這裏答辯。

我很感謝梁先生使我得先讀這部書的稿本。梁先生這部書的出版，把我對於墨辯的興趣又重新引起來了；倘我竟能因此把我的墨辯新詁的稿本整理出來，寫定付印，我就更應該感謝梁先生了。

十，二，二六，胡適。

附錄一　梁任公先生來書

適之我兄：

奉函及所賜墨經校釋序，懽喜無量。此種序文，表示極肫篤的學者態度，於學風大有所裨，豈惟私人紉感而已。竊復奉讀大著墨辯新詁稿本，搏釋終篇，益感共學之樂。除隨手簽注若干條外，對於尊序所討論者，更願簡單有所商榷：

公對於吾所提出之牒經標題公例，謂定得太狹窄，此論吾亦表相對的敬佩。吾之公例所下字，誠不免過於嚴格。但我終信此公例確爲『引說就經』之一良標準。在全書中既有什之八以上不煩校改而得此例正確妥帖之適用。其餘一二，亦引申觸類而可通，何爲而不用之？故謂時有例外焉則可，謂此例不足信憑，則不可也。其所以牒經文首字者，正如宋本書之夾縫，每恆牒書名之首一字，初不問其字之爲通爲辭能獨立不能獨立。如經說下第七條第七五條所牒之『不』字，第四三條所牒之

『所』字，第三三條第四五條第五〇條第七四條所牒之『無』字，若非適用此例，則其字皆成贅疣。公謂『不應牒出最常用之字』，似非然也。

經上經說上之末數條，吾亦未敢深自信，且自覺有不安處。然於公之所釋，抑又不能無疑。第一：依尊說將原文六條合爲一條，共爲三十六字。墨經文極簡，經上尤甚。其長至十一字者僅兩條，餘皆十字以內；其文體純似幾何書之界說。如公所說，則此處忽爲說明的文體，與全書似不相應。第二：公所以將此六條合爲一條，其理由，謂因『原書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爲上行所隔開，誤分作六行，故不可讀』。墨子每簡若干字，今無可考。然漢書藝文志稱尚書脫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聘禮疏引鄭注云：『尚書三十字一簡』；今本禮記玉藻錯簡數處，或三十五字，或三十一字，或二十九字，或二十六字；汲冢穆傳則簡四十字；可見古籍蓋以每簡三十字內外爲中數。則此三十三字，斷無分爲六行之必要。即合以上排之『化徵易也』至『動或從也』十九字，至多亦兩簡已足，何至分爲六簡。經下之『物之

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一條，亦已二十三字，然不聞分爲兩行截三行，致爲下排所間斷。（此條在經中爲最長，假定上下排必同簡，則此簡合下排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共三十二字。）此外經下之上下兩排合二十餘字成行者甚多。即經上之『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一行，亦已共十九字。彼皆不聞以簡短間斷，則公所謂因每行平均五六字以致間隔者，恐不合事理。鄙意以爲今直行本上下排相間，應認爲經文每條界線之唯一標準。其今本文相連屬者如經上之『知聞說親名實合爲』八字，應爲一經，或爲兩經，尚可以成問題；如經下之『物盡同名』至『說在因』三十一字應爲一經，或爲兩經三經，尚可以成問題。其餘兩排相間者，則條與句之斷連，不應更生問題。今於原文之『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將『損偏去也』四字抽出，而以『諾不一利用服』爲句；於原文之『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將『動或從也』四字抽出，而以『法異則觀其宜止』爲句。則經上發端，何不可以『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為條為句，經下發端，何不可以『止類以行人說在同異』為條為句？則經之系統且紊矣。故公所持『六條合一』之說，吾始終不敢贊成。此亦治墨經方法之一種討論，願公更有以教之。

至公之詁此條，誠別有妙諦。但『六條合一』之說若不成立，則詁雖妙恐未必原書之意矣。若吾於『正五諾』以下三十五字疑為複衍，細思亦覺其武斷。此蓋『正無非』經文之說，但未敢強解耳。

復次：吾謂此書有後人附加，公之所難，於吾原意似有未瑩。公謂：『……因為研究這些書的人很少，故那些作偽書的人都不願意在這幾篇上玩把戲。』吾之讀墨經餘記固明云：『但附加者仍必出先秦人之手，且為忠於墨學者之所為；非劉歆王肅輩有意竄改古籍。』質言之：則吾所疑附加之人非他，乃公孫龍桓團之流也。別人誠覺此書難解，研究者少，龍團之徒固不爾。其誦習之而有所案識增益，實意中事；此非可以與作偽者同科也。論語季氏篇末『邦君之妻……亦曰君夫人』一共四

十三字，與書文義毫無關係，其必爲後人附加無疑；然其動機卻非在作僞。古書如此類者不少（禮記王制玉藻諸篇皆有之）。吾所謂經說有附加者，乃研究之結果，而爲有意義的附加，固不容援此爲例；但以證明附加與作僞不同，不能以無作僞之故便斷爲無附加耳。要之吾觀察此書，與我公立脚點有根本不同之處。公奪此書於墨翟之手以予公孫龍桓團，謂此四篇與大取小取，皆戰國末年同時全部產出。其不認此後更有人附加宜也。吾則謂不惟六篇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即此四篇亦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雖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然卻是同出一派。百餘年間，時有增飾。故其思想雖同一系統，而微有演變。即文體亦然。經說下與經說上文體繁簡不同，至易見；可以推定下篇較爲晚出。其上篇文體有類似下篇者，則吾疑爲晚出所附加，其非原本也。（如『欲難其指』一條，文體確與全篇不類。）故吾對於經說上疑爲附加者數處，對於經說下則甚少也。此問題與『大乘是否佛說』之爭頗相類：公奪此經以與公孫龍桓團，是猶謂大乘經典皆馬鳴龍樹輩創造，則無附加非附

加之可書。我則謂大乘經典實出釋尊，而數百年間，遞有增益也。吾所謂附加者，其界說如是，願更察之。

大著新詁已精讀一過。雖意見不能盡同，然獨到處殊多可佩。其有不敢苟同者，輒簽注若干條，附繳。拙稿覆勘，所欲改者又已不少；棄於他業，輒復置之；即以呈公之原稿付印。學問之道，愈研究則愈自感其不足；必欲為躊躇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於世於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新詁，作速寫定；不必以名山之業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

十年四月三日。啓超敬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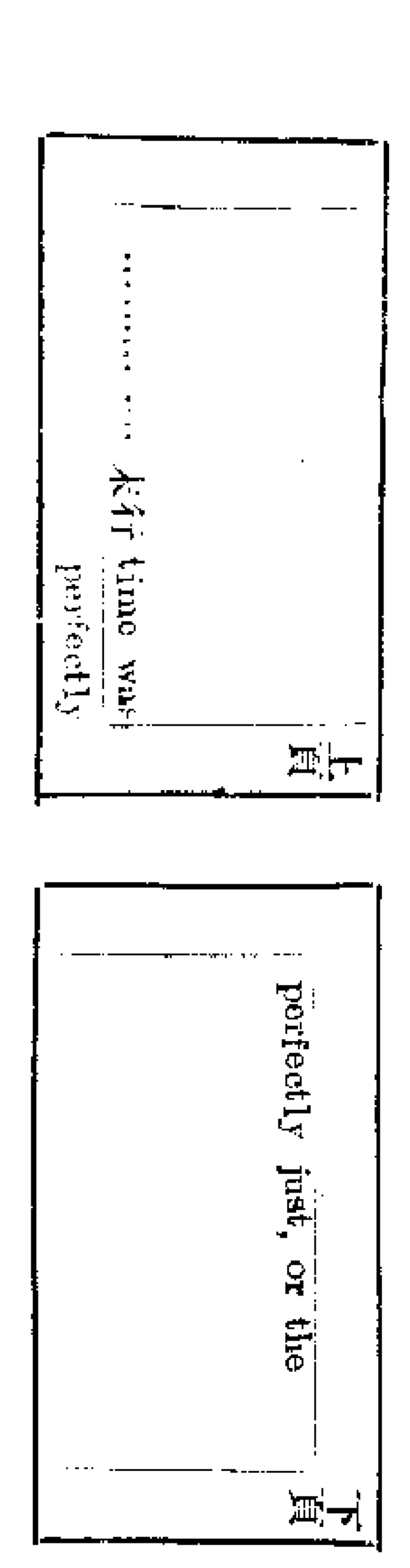
附錄二　答書

任公先生：

上星期五收到先生的信和還我的墨辯新詁稿本。先生答我的書，也讀過了。先生勸我早日整理出版，這話極是。我常說，我們著書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絕後』。但近年頗中清代學者的毒，每得一題，不敢輕易下筆。將來當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對不住讀者的期望為標準。

先生對於我那篇匆促做成的序文，竟肯加以辯正，並蒙採納一部分的意見，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敬佩敬佩。我對於每條帖題的辦法，序中似亦申明，認為可用；但不可太拘泥。我在序中提出四條修正的條件，只是要使先生這條方法的應用更為靈動。我將來校改新詁時，當參用此法，以副先生的期望。

先生說，『其所以牒經文首字者，正如宋本書之夾縫，每恆牒書名之首一字，初不問其字之為通為僻，能獨立不能獨立。』此喻實不甚切。宋本書夾縫中亦不『恆』牒書名之首一字。西文古本書每頁之末行之下方往往複寫下頁之首一字，以示銜接，例如：



此係 1808 年版的 Burke 全集

此例似較切，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論經上經說上末數條，於我說的『墨經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之說，有所指正。此處先生的誤解，實由於我措辭不完密。墨辯當初必係上下變行的，——此殆無可疑，——我說的『每行』乃是單指上行或下行，故下文說『爲上行所隔開』。以此計之，每一全行大概足容十一二字。先生所說的『每簡三十字內外』與我所說

『每行』若干字並無衝突，因爲每簡必不止一行，古書所謂『錯簡』乃是全簡，如今之倒葉，並非簡中一行有錯也。

至於此諸條我所以敢合爲一條，實因經說上末段確是一片連貫的文字，故敢合經文爲一條。每行五六字之說乃是解釋經文所以分開之故。試看『讀此書旁行』五字之在『而無非』之上，可知原書末數排的排列，似與行款有關。

先生舉出『化徵易也』至『動或徙也』十九字，說『至多亦兩簡已足，何至分爲六簡』？這又是先生認『簡』爲『行』的錯誤了。

先生的根本主張，說『今直行本上下排相間，應認爲經文每條界線之唯一標準』。此即向來沿用的方法，我也曾如此試過，但終不滿意。後來細讀經說上的末段，乃斷爲一條，迴看經文，亦成一片，然後疑寫經者習于全篇『每行成一條』的通例，嚴守此例，遂將此一條長的經文照例寫成六截。此乃很自然的機械作用的一種，正不須強爲解說。先生以爲如何？至於先生舉的經下諸條的例，似不可與經上

末條相提並論。經下每條以「說在」爲例，不易悞分，故雖長至二十餘字，亦不至被截作幾段。經上則不然，全篇體例甚雜，自篇首至「爲，窮知而懸於欲也」，約七十五條，又是一種體例；「聞，耳之聰也」數句又是一種體例；「諾不一」以下又是一種體例。這是很容易看出的。因爲體例不同，故寫者容易以拘于成例而致誤，故我們也應該分別研究，不可用一個通則來包括這種種不同的體例。此一層最重要，深望先生注意。

至於先生論墨辯究竟爲何人所作一段，非一短扎所能討論。況先生認「大乘經典實出釋尊」，則我與先生的「立脚點」誠有根本不同之處，雖辯至萬言，亦終無合同之日，似不如各存一說以供讀者之自擇。先生以爲何如？

承先生爲我的新詁校議若干條，已一一讀過，深謝先生的盛意。中有幾條，我在哲學史裏已自己改了，但未加入稿本。如「化，徵易也」一條，我在哲學史（頁二五六）裏亦主張不改字，但楊氏謂「驗其變易」之說似亦不可從，故我訓「徵」爲

表面上的徵驗。

收到來信之次晨，即赴天津演說，故不及作答。今日匆匆作答，亦不及鈔正，乞恕之。

胡適敬上。十，五，三。

論墨學

（一）章行嚴先生的墨學談

邇來誦墨經者日多，談士每好引經中一二事以相高。梁任公胡適之尤有此癖。愚亦不免。任公著墨經校釋，自許甚厚。適之著『墨經新詁』未成，僅以其所詁小取一篇，及雜論經文者布於世，而自許尤至。東南大學教授張子高，注經數十條，獨闢蹊徑，適之與愚俱見其稿本而歎服焉，惜未刊出。別有漢陽張仲如著墨子閒詁箋，論域及於全墨，蓋不拘拘於墨辯者，難與並論。而吾兄太炎言墨獨先，所論雖不多，精審莫或過之，蓋自張皋文以迄適之，言墨學者，終推吾兄祭酒，非敢阿也。

獨怪任公稱吾兄之書「深造蓋邁先輩」，而於其書則譏之未審。經曰：「以言爲盡誖誖，說在其言。」吾兄講之曰：「謂言皆妄，詰之曰，是言妄不，則解矣。」此義既樹，來者焉能更下他語？而任公曰：「經文之意，謂以某人之書爲盡誖者，誖也，亦視其所言何如耳。」如作高頭講章然，不得謂非吾兄原名一篇曾未寓目也。

惟任公有時闕疑，不似適之武斷。經以無間無厚詁次，乃釋動之精義。任公曰：「次何以必須無間無厚，未得其解。」實則望文生義，解並不難。蓋兩點相接曰次。必無間而後眞相接，必無厚而後不交加。一防接之不及，一防接之太過，意甚顯明，任公猶愼於下筆如此。而經曰：「辯爭彼也。」爭彼一義，墨學之骨幹，而亦吾名學全部之骨幹也。愚曾在東方雜誌作「名學他辯」一首言之：他者彼也。他辯出公孫龍子，與西方邏輯之言媒詞者相類，不解此義，名學殆不能講。適之獨謂彼爲誤字，以廣韻引論語子西佊哉爲例，佊誤作彼，而佊與駁通，爭佊猶言爭

駁。試思墨經一義何等矜貴，以此種語贅歸之，豈非陷全經於無意義？然適之不之顧也。

凡前所談，以見墨學雖一時貴盛，時流探索，不遺餘力，而新詁不多，義蘊待發以宣洩者，無甚可紀。甚矣絕學之未易治，而先民之沾溉後人為至遠也！

尤可慨者，名墨流別如何，至今無能言之。任公適之均見及墨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之學說『關係最當明辨』，惜乎辨而未明，繳繞益甚。其最大誤處，在認施龍為別墨。別墨之名，出於天下篇。適之謂墨者以之自號，示別於教宗之墨家，不知魯勝序墨辯注，有『以正別名顯於世』一語。別者別墨，而正者正墨。既有正墨之稱，別墨乃以蔽罪他家無疑。任公不認適之別墨即新墨學說，所見已進一步。惟施龍之學『確從墨經衍出』，兩人所見又同。其故則『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經』（適之說）。夫施龍祖述墨學，其說創自魯勝，以前未嘗有聞。漢書

藝文志載九流所出，名墨並稱，施龍之名，隸名而不隸墨，吾兄亦言『惠施公孫龍名家之傑，務在求勝。』（原名篇）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兩家相君以『求勝』，名迹俱大。所蔽之性，恰又得反。謂爲師承所在，詎非謬言？諸家徒震於兩子說事之同，所含義理，復格於罔學，未暇深考，遂不期而雷同爲說。遇有一事互見，則坐指爲辭旨相叶，比附未遑。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斵，則不動，說在端』；凡注墨者，率謂此即惠義，而不悟兩義相對，一立一破，絕未可同年而語也。且以辭序徵之，似惠爲立而墨爲破。（墨經非墨子手著之書。）何以言之？惠子之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謂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謂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決無萬世取半之理；蓋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於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世；何也？尺者端之積也，端乃無序而不可

分；（義出墨經）於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至極所餘，兩端而已；取其一而遺其餘，餘端凝然『不動』，不能斷，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斷，則『不動』，說在端。此其所言果一義乎？抑二義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從來治墨學者，未或道及；即明銳愼密如孫詒讓，曾謂『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者，於此且一致爲詭勝之說所欺，無怪夫墨學之不能大昌明也！

愚方爲東方雜誌二十年紀念號草名墨訾應考，著如上例者若干條，以證名墨兩家『倍譎不同』，決非相爲『祖述』。愚說如其有當，將爲墨學起一翻案，後爲斯學，取徑宜不同前。愚善其爲攻墨之一新趣，因別舉概要，列於茲篇，用質當世閎家，並候吾兄教。

（二）章太炎先生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吾弟鑒：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爲精審。非半勿斮一條，與惠氏言取舍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爲無序而不可分，此蓋知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知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爲，而非汎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指自見矣。吾於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强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爲爭佊，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以訓詁說經，則云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以此爲說，乃成騃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謝。此問起居康勝。

兄炳麟白。十一月六日。

（三）我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只曉得經與子同為古書，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

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志與經義述聞，羣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爲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麼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

胡適敬上。十一月十三夜。

(四) 太炎先生的第二書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之來書，請校勘訓詁，爲說經說諸子通則，並舉王俞兩先生爲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

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卽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兪兩先生，則暫爲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衆，說者亦就爲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可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云，『辯，爭彼也』，則可；墨家爲辯云，『辯，爭彼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爲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云『辯，爭也』，此文亦祇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爲界說，而未有爲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云，『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云，『天，顚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顚而來。（凡說文

用聲訓者，牽多此類。）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爲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亦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面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云，『線，索也』，『面，冪也』，於經說亦非不可，於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爲例，雖舉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辯猶且不可，而況『爭彼』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爲多。諸以同義之字爲直訓者，在吾之爲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塋，故今復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爲學者，期於愜心貴當，

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欲勝於適之也。

兄炳麟白。十一月十五日。

（五）我的第二書

行嚴先生：

那天晚上，得聞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論，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讀太炎先生給先生的信。信中所說，雖已於那天晚上討論過了，但為新聞報的讀者計，想把那晚對太炎先生說的話寫出來，請先生代為發表，並請兩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論治經與治子之別，謂經多陳事實，而諸子多明義理，這不是絕對的區別。太炎先生自註中亦已明之。其實經中明義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諸子所明義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謂事實？蓋某一學派持何種義理，此正是一種極重要的事實。

至於治古書之法，無論治經治子，要皆當以校勘訓詁之法爲初步。校勘已審，然後本子可讀；本子可讀，然後訓詁可明；訓詁明，然後義理可定。但做校勘訓詁的工夫，而不求義理學說之貫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譏王俞諸先生『暫爲初步而已』。然義理不根據於校勘訓詁，亦正宋明治經之儒所以見譏於清代經師。兩者之失正同。而嚴格言之，則欲求訓詁之恆意，必先有一點義理上的了解，否則一字或訓數義，將何所擇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異也』，二語，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當讀他。王闓運讀校爲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暫爲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後可爲初步而有成。今之談墨學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爲。以是言之，王俞諸先生之暫爲初步，其謹愼眞不可及了！

我本不願回到墨辯『辯爭彼也』一條，但太炎先生旣兩次說我解釋此條不當，謂爲駢語，謂爲重贅，我不得不申辯幾句。

經上原文爲三條：

佊，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

辯勝，當也。

經說上云。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非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

攸字吳鈔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爲佊字之譌，理由有三：(一)攸字篆文作[illegible]，最近佊字，而與從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譌爲彼，此因鈔胥不識佊字，改爲彼字，有論語彼哉彼哉一條可爲例證。(三)佊字之義，墨經訓爲「不可兩不可」，此爲名學上之矛盾律，經說所謂「不俱當必或不當」，釋此義明白無疑。此種專門術語，決無沿用彼字一類那樣極普通的代名詞之理。而詖字有論辯之義，佊詖同聲相通假，(佊字埤蒼訓邪，是與詖頗通用。)故定爲佊字。

知彼字在墨辯爲專門術語，然後知以爭彼訓辯，不爲語贅，不爲直訓。

太炎先生說：『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爲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我于「爭彼」之訓，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誤解，殆起於哲學史大綱頁二百之以駁訓彼。此因當日著書，過求淺顯，反致誤會。然註中亦引不可兩不可之訓。在精治名學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當能承認彼字之術語的涵義，不應以爲贅語也。匆匆奉白，順便告行。

胡適敬上。

章實齋年譜自序

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文獻徵存錄裏確有幾行小傳，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張字！所以耆獻類徵裏只有張學誠，而沒有章學誠！譚獻確曾給他做了一篇傳，但譚獻的文章既不大通，見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實齋的課蒙論！因此，我那時很替章實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他想不到，那班『擘績補苴』的漢學家的權威竟能使他的著作遲至一百二十年後方才有完全見天日的機會，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蹟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這眞是王安石說的『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屍能報讎』了。

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知道他藏有一部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遺書的目錄全鈔了寄來。那時我本想設法借鈔這部遺書，忽然聽說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鈔本的章氏遺書排印出來了。我把這部遺書讀完之後，知道內藤先生用的年譜材料大概都在這書裏面，我就隨時在內藤譜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我那時不過想做一部內藤譜的『疏證』。後來我又在別處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記在一處。批注太多了，原書竟寫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個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譜。這便是我作這部年譜的緣起。

民國十年春間，我病在家裏，沒有事做，又把章氏遺書細看一遍。這時候我才眞正了解章實齋的學問與見解。我覺得遺書的編次太雜亂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條理層次；內藤譜又太簡略了，只有一些瑣碎的事實，不能表見他的思想學說變

遷沿革的次序。我是最愛看年譜的，因爲我認定年譜乃是中國傳記體的一大進化。最好的年譜，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如錢德洪等的王陽明先生年譜，可算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若年譜單記事實，而不能叙思想的淵源沿革，那就沒有什麼大價值了。因此，我決計做一部詳細的章實齋年譜，不但要記載他的一生事蹟，還要寫出他的學問思想的歷史。這個決心就使我這部年譜比內藤譜加多幾十倍了。

我這部年譜，雖然沿用向來年譜的體裁，但有幾點，頗可以算是新的體例。第一，我把章實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都擇要摘錄，分年編入。摘錄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時於長篇之中，僅取一兩段；有時一段之中，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幾句。凡删節之處，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須上下貫串，自成片段。這一番工夫，很費了一點苦心。第二，實齋批評同時的幾個大師，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話，也有很錯誤的話。我把這些批評，都摘要鈔出，記在這幾個人死的一年。這種批評，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又可以

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來的傳記，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不說他的壞處；我這部年譜，不但說他的長處，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例如他批評汪中的話，有許多話是不對的，我也老實指出他的錯誤。我不敢說我的評判都不錯，但這種批評的方法，也許能替年譜開一個創例。

章實齋的著作，現在雖然漸漸出來了，但散失的還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沒有見着他的庚辛之友亡友傳。年譜付印後，我才知道劉翰怡先生有此書；劉先生現在刻的章氏遺書，此書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後，定可使我們添許多作傳的材料。劉先生藏的章氏遺書中還有永清縣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三卷，我都沒有見過。我希望劉先生刻成全書時，我還有機會用他的新材料補入這部年譜。

章實齋最能賞識年譜的重要。他在他的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說：

> 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為之，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蓋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同一言

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彷彿其始末焉。然猶不能不闕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刋傳前達文字，愼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

照他這話看來，他的著作應該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現在所傳他的著作只有極少數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時的刻本文史通義已沒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遺書與內藤藏本目錄也都沒有年月。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誤，不容

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誰料說這話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這一件『大錯』呢？我編這部年譜時，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編注；那些沒有年月的，如有旁證可考，也都編入。那些全無可考的，我只好闕疑了。

我這部小書的編成，很得了許多認得或不認得的朋友的幫助。我感謝內藤先生的年譜底本，感謝青木先生的幫助，感謝浙江圖書館館長龔寶銓先生鈔贈的集外遺文，感謝馬夷初先生借我的鈔本遺文，感謝孫星如先生的校讀。

十一，一，二一，在上海大東旅社。

淮南鴻烈集解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鈎稽匪易，雖有博聞強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為事近於機械，而其為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

捨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終歲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抈，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尚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挈，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於漢代，時尚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註，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

訓，博覽者始稍稍讎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逵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尚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尚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

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愼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　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据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

>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口鼻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黜之

耳。

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俞樾校云：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眞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

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

宋明本皆作『玄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

氏未見古本，但據莊本立說，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

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為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俶真訓云：

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

「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

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

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墬形訓云：

>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

高注云：

> 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逵吉校云：

> 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叔雅校云：

> 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

譌爲「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兕前兕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卽兕前，後小卽兕後也。（卷四，頁九。兕卽今兌字。）

此條精確無倫，眞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　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竝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竝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九引，作：

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搾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愼。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甚淖而滒』，高注曰，『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莊逵吉引說文『滒，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瀋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滒滒』，滒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考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嚼之當孰』。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

嚼齧，欲得勞敝』，謂『嚼筋』爲漢時常語，卽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溪人言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鏡釋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胡適文存二集卷二

科學與人生觀序

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先生近來把散見國內各種雜誌上的討論科學與人生觀的文章搜集印行，總名為『科學與人生觀』。我從烟霞洞回到上海時，這部書已印了一大半了。孟鄒要我做一篇序。我覺得，在這回空前的思想界大筆戰的戰場上，我要算一個逃兵了。我在本年三四月間，因為病體未復原，曾想把努力週報停刊；當時丁在君先生極不贊成停刊之議，他自己做了幾篇長文，使我好往南方休息一會。我看了他的玄學與科學，心裏很高興，曾對他說，假使努力以後向這個新方向去謀發展，——假使我們以後為科學作戰，——努力便有了新生命，我們也有了新興

趣，我從南方囘來，一定也要加入戰鬥的。然而我來南方以後，一病就費去了六個多月的時間，在病中我只做了一篇很不莊重的孫行者與張君勱，此外竟不曾加入一拳一脚，豈不成了一個逃兵了？我如何敢以逃兵的資格來議論戰場上各位武士的成績呢？

但我下山以後，得遍讀這次論戰的各方面的文章，究竟忍不住心癢手癢，究竟不能不說幾句話。一來呢，因爲論戰的材料太多，看這部大書的人不免有『目迷五色』的感覺，多作一篇綜合的序論也許可以幫助讀者對於論點的了解。二來呢，有幾個重要的爭點，或者不曾充分發揮，或者被埋沒在這二十五萬字的大海裏，不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似乎都有特別點出的需要。因此，我就大胆地作這篇序了。

（二）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

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直到民國八九年間梁任公先生發表他的歐游心影錄，科學方才在中國文字裏正式受了『破產』的宣告。梁先生說：

……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外部生活變遷急劇，內部生活隨而動搖，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依着科學家的新心理學，所謂人類心靈這件東西，就不過物質運動現象之一種。……這些唯物派的哲學家，託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不惟如此，他們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據實驗心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不過一種物質，一樣受『必然法則』所支配。於是人類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

謬了。意志既不能自由，還有什麼善惡的責任？……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要憑他的試驗發明個宇宙新大原理。卻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說，敢是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異，今日認為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底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着風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麼樂利主義強權主義越發得勢。死後既沒有天堂，只好儘這幾十年盡情地快活。善惡既沒有責任，何妨盡我的手段來充滿我個人慾望。然而享用的物質增加速率，總不能和慾望的升騰同一比例，而且沒有法子令他均衡。怎麼好呢？只有憑自己的力量自由競爭起來，質而言之，就是弱肉強食。近年來甚麼軍閥，甚麼財閥，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

總之，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後腳的來這世界走一趟住幾十年，幹什麼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無奈當科學全盛時代，那主要的思潮，卻是偏在這方面，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着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上卷，頁一九—二三）

梁先生在這段文章裏很動情感地指出科學家的人生觀的流毒：他很明顯地控告那

『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歐洲全社會『都陷入懷疑沈悶畏懼之中』，養成『弱肉強食』的現狀，——『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他很明白地控告這種科學家的人生觀造成『搶麵包喫』的社會，使人生沒有一毫意味，使人類沒有一毫價值，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叫人類『無限悽惶失望』。梁先生要說的是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而他舉出的卻是科學家的人生觀的罪狀；梁先生摭拾了一些玄學家誣衊科學人生觀的話頭，卻便加上了『科學破產』的惡名。

梁先生後來在這一段之後，加上兩行自註道：

> 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然而謠言這件東西，就同野火一樣，是易放而難收的。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國門的老先生很高興地喊着，『歐洲科學破產了！梁任公這樣說的。』我們不能說梁先生的話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風

行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我們不能不說梁先生的話在國內確曾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不少的威風。梁先生的聲望，梁先生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都能使他的讀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論的影響。何況國中還有張君勱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鏗歐立克……的旗號，繼續起來替梁先生推波助瀾呢？

我們要知道，歐洲的科學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學鬼來攻擊了。幾個反動的哲學家，平素飽饜了科學的滋味，偶爾對科學發幾句牢騷話，就像富貴人家吃厭了魚肉，常想嘗嘗鹹菜豆腐的風味：這種反動並沒有什麼大危險。那光焰萬丈的科學，決不是這幾個玄學鬼搖撼得動的。一到中國，便不同了。中國此時還不曾享着科學的賜福，更談不到科學帶來的『災難』。我們試睜開眼看看：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這樣不發達的交通，這樣不發達的實業，——我們那裏配排斥科學？至於『人生觀』，我們只有做官發財的人生觀，只有靠天吃飯的人生觀，只有求神問卜的人生觀，只有安士全書的人生觀，只有太上感應篇的人生

觀，——中國人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呢！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提倡不夠，正苦科學的教育不發達，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迷漫全國的烏烟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出來把歐洲文化破產的罪名歸到科學身上，出來菲薄科學，歷數科學家的人生觀的罪狀，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信仰科學的人看了這種現狀，能不發愁嗎？能不大聲疾呼出來替科學辯護嗎？

這便是這一次『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所以發生的動機。明白了這個動機，我們方才可以明白這次大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占的地位。

（二）

張君勱的人生觀原文的大旨是：

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

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爲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

君勱敍述那五個特點時，處處排斥科學，處處用一種不可捉摸的語言──『是非各執，絕不能施以一種試驗』，『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皆其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若强爲分析，則必失其眞義』，『皆出於良心之自動，而決非有使之然者』。這樣一個大論戰，却用一篇處處不可捉摸的論文作起點，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因爲原文處處不可捉摸，故駁論與反駁都容易跳出本題。戰線延長之後，戰爭的本意反不很明白了。（我常想，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我們定可以使這次論爭的旗幟格外鮮明，──至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紛爭。）我們爲讀者計，不能不把這回論戰的主要問題重說一遍。

君勱的要點是『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爲力。』我們要答覆他，似乎應該先說明科學應用到人生觀問題上去，會產生什麼樣子的人生觀；這就是說，

我們應該先敘述『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然後討論這種人生觀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是否像梁先生說的那樣貽禍歐洲，流毒人類。我總觀這二十五萬字的討論，終覺得這一次為科學作戰的人——除了吳稚暉先生——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不曾具體地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却去抽象地力爭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這個共同錯誤的原因，約有兩種：第一，張君勱的導火線的文章內並不曾像梁任公那樣明白指斥科學家的人生觀，只是攏統地說科學對於人生觀問題不能為力。因此，駁論與反駁論的文章也都走上那『可能與不可能』的攏統討論上去了。例如丁在君的玄學與科學的主要部分只是要證明

『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

然而他却始終沒有說出什麼是『科學的人生觀』。從此以後，許多參戰的學者都錯在這一點上。如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只主張

『人生觀超於科學以上』，『科學決不能支配人生』。

如梁任公的人生觀與科學只說

「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如林宰平的讀丁在君先生的玄學與科學只是一面承認「科學的方法有益於人生觀」，一面又反對科學包辦或管理「這個最古怪的東西」——人類。如丁在君答張君勱也只是說明

「這種(科學)方法，無論用在知識界的那一部分，都有相當的成績，所以我們對於知識的信用，比對於沒有方法的情感要好；凡有情感的衝動都要想用知識來指導他，使他發展的程度提高，發展的方向得當。」

如唐擘黃心理現象與因果律只證明

「一切心理現象都是有因的。」

他的一個癡人的說夢只證明

『關於情感的事項，要就我們的知識所及，儘量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

王撫五的科學與人生觀也只是說：

『科學是憑藉「因果」和「齊一」兩個原理而構造起來的；人生問題無論爲生命之觀念，或生活之態度，都不能逃出這兩個原理的金剛圈，所以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

直到最後范壽康的評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也只是說：

『倫理規範——人生觀——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後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觀的直覺而得，決不是科學所能干涉。後天的內容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而定，決不是主觀所應安定。』

綜觀以上各位的討論，人人都在那裏攏統地討論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問題或人生觀問題。幾乎沒有一個人明白指出，假使我們把科學適用到人生觀上去，應該產生什

麽樣子的人生觀。然而這個共同的錯誤大都是因為君勱的原文不曾明白攻擊科學家的人生觀，却只懸空武斷科學決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殊不知，我們若不先明白科學應用到人生觀上去時發生的結果，我們如何能懸空評判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觀呢？

這個共同的錯誤——大家規避『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的問題——怕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一班擁護科學的人雖然抽象地承認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却終不願公然承認那具體的『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為科學的人生觀。我說他們『不願』，並不是說他們怯懦不敢，只是說他們對於那科學家的人生觀還不能像吳稚暉先生那樣明顯堅決的信仰，所以還不能公然出來主張。這一點確是這一次大論爭的一個絕大的弱點。若沒有吳老先生把他的『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提出來做個押陣大將，這一場大戰爭真成了一場混戰，只鬧得個一鬨散場！

關於這一點，陳獨秀先生的序裏也有一段話，對於作戰的先鋒大將丁在君先生

表示不滿意。獨秀說：

『他（丁先生）自號存疑的唯心論，這是沿襲赫胥黎斯賓塞諸人的謬誤；你既承認宇宙間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學家站開，且讓玄學家來解疑。此所以張君勱說，「既已存疑，則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學，不應有醜詆之詞」。其實我們對於未發見的物質固然可以存疑，而對於超物質而獨立存在並且可以支配物質的什麼心（心卽是物之一種表現），什麼神靈與上帝，我們已無疑可存了。說我們武斷也好，說我們專制也好，若無證據給我們看，我們斷然不能拋棄我們的信仰。』

關於存疑主義的積極的精神，在君自己也曾有明白的聲明。（答張君勱，頁二一—二三。）「拿證據來！」一句話確然是有積極精神的。但赫胥黎等在當用這種武器時，究竟還只是消極的防禦居多。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在那宗教的權威不曾打破的時代，明明是無神論者也不得不掛一個『存疑』的招牌。但在今日的中國，在宗教信仰向來

比較自由的中國，我們如果深信現有的科學證據只能叫我們否認上帝的存在和靈魂的不滅，那麼，我們正不妨老實自居為『無神論者』。這樣的自稱並不算是武斷；因為我們的信仰是根據於證據的：等到有神論的證據充足時，我們再改信有神論，也還不遲。我們在這個時候，既不能相信那沒有充分證據的有神論，心靈不滅論，天人感應論，……又不肯積極地主張那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唯物的人生觀，……怪不得獨秀要說『科學家站開！且讓玄學家來解疑』了。吳稚暉先生便不然。他老先生寧可冒『玄學鬼』的惡名，偏要衝到那『不可知的區域』裏去打一陣，他希望『那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責成玄學鬼也帶着論理色采去假設着。』（宇宙觀及人生觀，頁九。）這個態度是對的。我們信仰科學的人，正不妨做一番大規模的假設。只要我們的假設處處建築在已知的事實之上，只要我們認我們的建築不過是一種最滿意的假設，可以跟着新證據修正的，——我們帶着這種科學的態度，不妨衝進那不可知的區域裏，正如姜子牙展開了杏黃旗，也不妨衝進十絕陣裏去試試。

（三）

我在上文說的，並不是有意挑剔這一次論戰場上的各位武士。我的意思只是要說，這一篇論戰的文章只做了一個『破題』，還不曾做到『起講』。至於『餘興』與『尾聲』，更談不到了。破題的工夫，自然是很重要的。丁在君先生的發難，唐擘黃先生等的響應，六個月的時間，二十五萬字的煌煌大文，大吹大擂地把這個大問題捧了出來，叫烏煙瘴氣的中國知道這個大問題的重要，——這件功勞眞不在小處！

可是現在眞有做『起講』的必要了。吳稚暉先生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已給我們做下一個好榜樣。在這篇『科學與人生觀』的『起講』裏，我們應該積極地提出什麼叫做『科學的人生觀』，應該提出我們所謂『科學的人生觀』，好教將來的討論有個具體的爭點。否則你單說科學能解決人生觀，他單說不能，勢

必至於吳稚暉先生說的『張丁之戰，便延長了一百年，也不會得到究竟。』因為若不先有一種具體的科學人生觀作討論的底子，今日泛泛地承認科學有解決人生觀的可能，是沒有用的。等到那『科學的人生觀』的具體內容拿出來時，戰線上的組合也許要起一個大大的變化。我的朋友朱經農先生是信仰科學『前程不可限量』的，然而他定不能承認無神論是科學的人生觀。我的朋友林宰平先生是反對科學包辦人生觀的，然而我想他一定可以很明白地否認上帝的存在。到了那個具體討論的時期，我們纔可以說是真正開戰。那時的反對，才是真反對。那時的贊成，才是真贊成。那時的勝利，才是真勝利。

我還要再進一步說：擁護科學的先生們，你們雖要想規避那『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的討論，你們終于免不了的。因為他們早已正式對科學的人生觀宣戰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早已明白攻擊那『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

了。他早已把歐洲大戰禍的責任加到那『科學家的新心理學』上去了。張君勱先生在再論人生觀與科學裏，也很攏統地攻擊『機械主義』了。他早已說『關於人生之解釋與內心之修養，當然以唯心派之言為長』了。科學家究竟何去何從？這時候正是科學家表明態度的時候了。

因此，我們十分誠懇地對吳稚暉先生表示敬意，因為他老先生在這個時候很大胆地把他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提出來，很老實地宣布他的『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他在那篇大文章裏，很明白地宣言

『那種駭得煞人的顯赫的名詞，上帝呀，神呀，還是取銷了好。』（頁十二）

很明白地

『開除了上帝的名額，放逐了精神元素的靈魂。』（頁二九）

很大胆地宣言：

『我以爲動植物且本無感覺，皆止有其質力交推，有其輻射反應，如是而已。譬之於人，其質構而爲如是之神經系，即其力生如是之反應。所謂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種種反應而強爲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靈魂，質直言之曰感覺，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頁二二—二三）

他在人生觀裏，很『恭敬地又好像滑稽地』說：

『人便是外面止賸兩隻脚，却得到了兩隻手，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頁三九）

『生者，演之謂也，如是云爾。』（頁四十）

『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垓八京六兆五萬七千幕，正在那裏出台演唱』。（頁四七）

他老先生五年的思想和討論的結果，給我們這樣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他老先生很謙遜地避去『科學的』的尊號，只叫他做『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的新信仰。他這個新信仰正是張君勱先生所謂『機械主義』，正是梁任公先生所謂『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他一筆勾銷了上帝，抹煞了靈魂，戳穿了『人爲萬物之靈』的玄秘。這才是眞正的挑戰。我們要看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們出來替上帝向吳老先生作戰。我們要看那些信仰靈魂的人們出來替靈魂向吳老先生作戰。我們要看那些信仰人生的神秘的人們出來向這『兩手動物演戲』的人生觀作戰。我們要看那些認愛情爲玄秘的人們出來向這『全是生理作用，並無絲毫微妙』的愛情觀作戰。這樣的討論，才是切題的，具體的討論。這才是眞正開火。這樣戰爭的結果，不是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的問題了，乃是上帝的有無，鬼神的有無，靈魂的有無，……等等人生切要問題的解答。

只有這種具體的人生切要問題的討論才可以發生我們所希望的效果，——才可以促進思想上的刷新。

反對科學的先生們！你們以後的作戰，請向吳稚暉的『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作戰。

擁護科學的先生們！你們以後的作戰，請先研究吳稚暉的『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完全贊成他的，請準備替他辯護，像赫胥黎替達爾文辯護一樣；不能完全贊成他的，請提出修正案，像後來的生物學者修正達爾文主義一樣。

從此以後，科學與人生觀的戰線上的押陣老將吳老先生要倒轉來做先鋒了！

（四）

說到這裏，我可以回到張丁之戰的第一個『回合』了。張君勱說：

『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人生觀頁一）

丁在君說：

『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

能提出事實理由來證明他是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總有求他統一的義務。』（玄學與科學頁三）

『玄學家先存了一個成見，說科學方法不適用於人生觀；世界上的玄學家一天沒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觀不能統一。』（頁四）

『統一』一個字，後來很引起一些人的抗議。例如林宰平先生就控告丁在君，說他『要把科學來統一一切』，說他『想用科學的武器來包辦宇宙』。這種控訴，未免過於張大其詞了。在君用的『統一』一個字，不過是沿用君勱文章裏的話；他們兩位的意思大概都不過是大同小異的一致，罷了。依我個人想起來，人類的人生觀總應該有一個最低限度的一致的可能。唐擘黃先生說的最好：

人生觀不過是一個人對于世界萬物同人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隨着一個人的神經構造，經驗，知識等而變的。神經構造等就是人生觀之因。我舉一二例來看。

無因論者以爲叔本華（Schopenhauer）哈德門（Hartmann）的人生觀是直覺的，其實他們自己幷不承認這事。他們都說根據經驗閱歷而來的。叔本華是引許多經驗作證的，哈德門還要說他的哲學是從歸納法得來的。

人生觀是因知識而變的。例如，柯白尼太陽居中說，同後來的達爾文的人猿同祖說發明以後，世界人類的人生觀起絕大變動；這是無可疑的歷史事實。若人生觀是直覺的，無因的，何以隨自然界的知識而變更呢？

我們因爲深信人生觀是因知識經驗而變換的，所以深信宣傳與敎育的效果可以使人類的人生觀得着一個最低限度的一致。

最重要的問題是：拿什麼東西來做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呢？

我的答案是：拿今日科學家平心靜氣地，破除成見地，公同承認的『科學的人

生觀』來做人類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

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統一歐洲（其實何止歐洲？）的人生觀至千餘年之久。假使我們信仰的『科學的人生觀』將來靠教育與宣傳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在中世歐洲那樣的風行，那樣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謂『大同小異的一致』了。

我們若要希望人類的人生觀逐漸做到大同小異的一致，我們應該準備替這個新人生觀作長期的奮鬥。我們所謂『奮鬥』，並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統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態度，誠懇的言論，宣傳我們的『新信仰』，繼續不斷的宣傳，要使今日少數人的信仰逐漸變成將來大多數人的信仰。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作戰』，因為新信仰總免不了和舊信仰衝突的事；但我們總希望作戰的人都能尊重對方的人格，都能承認那些和我們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與壞人，都能在作戰之中保持一種『容忍』（Toleration）的態度；我們總希望那些反

對我們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態度來對我們，用研究的態度來考察我們的信仰。我們要認淸：我們的眞正敵人不是對方；我們的眞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我們向舊思想和舊信仰作戰，其實只是很誠懇地請求舊思想和舊信仰勢力之下的朋友們起來向『成見』和『不思想』作戰。凡是肯用思想來考察他的成見的人，都是我們的同盟！

（五）

總而言之，我們以後的作戰計畫是宣傳我們的新信仰，是宣傳我們信仰的新人生觀。（我所謂『人生觀』，依唐擘黃先生的界說，包括吳稚暉先生所謂『宇宙觀』。）這個新人生觀的大旨，吳稚暉先生已宣布過了。我們總括他的大意，加上一點擴充和補充，在這裏再提出這個新人生觀的輪廓：

（1）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窮之大。

(2)根據於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

(3)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知此的，——正用不着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據於生物的科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5)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

(6)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

(7)根據於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

（8）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尋求出來的。

（9）根據於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10）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爲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這種新人生觀是建築在二三百年的科學常識之上的一個大假設，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加上『科學的人生觀』的尊號。但爲避免無謂的爭論起見，我主張叫他做『自然主義的人生觀』。

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在那無窮之大的空間裏，在那無窮之長的時間裏，

這個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壽不過百年的兩手動物——人——眞是一個藐乎其小的微生物了。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競爭的慘劇鞭策着他的一切行爲，——這個兩手動物的自由眞是很有限的了。然而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的這個渺小的兩手動物却也有他的相當的地位和相當的價值。他用的兩手和一個大腦，居然能做出許多器具，想出許多方法，造成一點文化。他不但馴伏了許多禽獸，他還能考究宇宙間的自然法則，利用這些法則來駕馭天行，到現在他居然能叫電氣給他趕車，以太給他送信了。他的智慧的長進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長進却又使他的胸襟擴大，想像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現在漸漸脫離了這種種幼稚的時期，他現在漸漸明白：空間之大只增加他對於宇宙的美感；時間之長只使他格外明瞭祖宗創業之艱難；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甚至於因果律的籠罩一切，也並不見得束縛他的自由，因爲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

求果，由果推因，解釋過去，預測未來；一方面又使他可以運用他的智慧，創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於生存競爭的觀念也並不見得就使他成爲一個冷酷無情的畜生，也許還可以格外增加他對於同類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爲的努力以減免天然競爭的慘酷與浪費。——總而言之，這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裏，未嘗沒有美，未嘗沒有詩意，未嘗沒有道德的責任，未嘗沒有充分運用『創造的智慧』的機會。

我這樣粗枝大葉的敘述，定然不能使信仰的讀者滿意，或使不信仰的讀者心服。這個新人生觀的滿意的敘述與發揮，那正是這本書和這篇序所期望能引起的。

十二，十一，廿九，在上海。

附錄一　陳獨秀先生序

亞東圖書館滙印討論科學與人生觀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多事，却很歡喜的做這篇序。第一，因爲文化落後的中國，到現在才討論這個問題，（文化落後的俄國前此關於這問題也有過劇烈的討論，現在他們的社會科學進了步，稍懂得一點社會科學門徑的人，都不會有這種無常識的討論了，和我們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也不至於討論什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電線是不是蜘蛛精這等問題一樣。）而却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進步雖說太緩，總算是有了進步；只可惜一班攻擊張君勱梁啓超的人們，表面上好像是得了勝利，其實并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面上在那裏開戰，暗中却已投降了。（如范壽康先天的形式說，及任叔永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能說。）就是主將丁文江大攻擊張君勱唯心的見解，其實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是因爲有一種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學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觀』，敵人方面却舉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出來；『科學何以能支配人生觀』，這方面却一個證據也沒

舉出來，我以爲不但不曾得着勝利，而且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大家的文章寫得雖多，大半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學概論講義』，不容易看出他們和張君勱的爭點究竟是什麽，張君勱那邊離開爭點之枝葉更加倍之多，這乃一場辨論的最大遺憾！第二，因爲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過這回辨論之後，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爲這兩個緣故，我很歡喜的做這篇序。

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科學，和人生觀有什麽關係，這問題本不用着討論。可是後來科學的觀察分類說明等方法應用到活動的生物，更應用到最活動的人類社會，於是便有人把科學略分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二類。社會科學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哲學。（這裏所指是實驗主義的及唯物史觀的人生哲學，不是指本體論宇宙論的玄學，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這些社會科學，不用說

和那些自然科學都還在幼穉時代，然卽是幼穉，已經有許多不可否認的成績，若因爲還幼穉便不要他，我們不必這樣蠢。自然科學已經說明了自然界許多現象，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社會科學已經說明了人類社會許多現象，這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自然界及社會都有他的實際現象：科學家說明得對，他原來是那樣；科學家說明得不對，他仍舊是那樣；玄學家無論如何胡想亂說，他仍舊是那樣；他的實際現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隨着你們唯物論唯心論改變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來在那裏繞日而行，孟軻以後，漸漸變成了無君的世界；科學的說明能和這死板板的實際一一符合，才是最後的成功；我們所以相信科學（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也就是因爲『科學家之最大目的，曰擯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現象化之爲客觀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窮其因果之相生』，（張君勱說）必如此而後可以根據實際尋求實際，而後可以說明自然界及人類社會死板板的實際，和玄學家的胡想亂說不同。

人生觀和（社會）科學的關係是很顯明的，爲什麼大家還要討論？哈哈！就是

討論這個問題之本身，也可以證明人生觀和科學的關係之深了。孔德分人類社會爲三時代，我們還在宗教迷信時代；你看全國最大多數的人，還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質以上的神秘；次多數像張君勱這樣相信玄學的人，舊的士的階級全體，新的七的階級一大部分皆是；像丁在君這樣相信科學的人，其數目幾乎不能列入統計。現在由迷信時代進步到科學時代，自然要經過玄學先生的狂吠；這種社會的實際現象，想無人能夠否認。倘不能否認，便不能不承認孔德三時代說是社會科學上一種定律。這個定律便可以說明許多時代許多社會許多個人的人生觀之所以不同。譬如張君勱是個飽學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嘗學問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張君勱立意要延醫診脈服藥；他的朋友丁在君方從外國留學回來，說漢醫靠不住，堅勸他去請西醫，張君勱不但不相信，并說出許多西醫不及漢醫的證據；兩人爭持正烈的時候，張君勱的家族說，西醫漢醫的都靠不住，還是符咒仙方好：他們如此不同的見解，也便是他們如此不同的人生觀，他們如此不同的人生觀，都是他

們所遭客觀的環境造成的，決不是天外飛來主觀的意志造成的，這本是社會科學可以說明的，決不是形而上的玄學可以說明的。

張君勱舉出九項人生觀，說都是主觀的，起於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起於人格之單一性的，而不為客觀的，論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學所支配。今就其九項人生觀看起來：第一，大家族主義和小家族主義，純粹是由農業經濟宗法社會進化到工業經濟軍國社會之自然的現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於農業宗法社會親與夫都把子女及妻當作生產工具，當作一種財產，到了工業社會，家庭手工已不適用，有了雇工制度，也用不着拿家族當生產工具，於是女權運動自然會興旺起來。第三，財產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產社會，人弱於獸，勢必結羣合作，原無財產私有之必要與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單一性的張先生，生在那個社會，他的主觀，他的直覺，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財產私有起來，怎奈他所得的果物獸肉無地存儲，並沒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變賣金錢存在銀行，結果恐怕

只有放棄他私有財產的人生觀。）到了農業社會，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倉庫，穀物又比較的易於保存，獨立生產的小農，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沒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財產觀念，是如此發生的；到了工業社會，家庭的手工的獨立生產倒已不能存立，成千成萬的人組織在一個通力合作的機關之內，大家無工做便無飯吃，無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沒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已為少數資本家私有了，非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大家只好賣力給資本家，公有財產觀念，是如此發生的。第四，守舊維新之爭持，乃因為現社會有了經濟的變化，而與此變化不適應的前社會之制度仍舊存在，束縛着這變化的發展，於是在經濟上利害不同的階級，自然會隨着變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衝突起來。第五，物質精神之異見，少數人因為有他的特殊環境，一般論起來，慢說工廠裏體力工人了，就是商務印書館月薪二三十元的編輯先生，日愁衣食不濟，那有這許閑情像張君勱梁啟超高談什麼精神文明東方文化。第六，社會主義之發生，和公有財產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為我利他兩種本

認，個人本能發揮的機會，乃由於所遭環境及所受歷史的社會的暗示之不同而異。第八，悲觀樂觀見解之不同，亦由於個人所遭環境及所受歷史的社會的暗示而異，試觀各國自殺的統計，不但自殺的原因都是環境使然，而且和年齡性別職業節季等都有關係。第九，宗敎思想之變遷，更是要受時代及社會勢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敎，依據所傳神話，大都是崇拜太陽，火，高山，巨石，毒蛇，猛獸等的自然敎；後來到了農業經濟宗法社會，族神祖先農神等多神敎遂至流行；後來商業發達，隨着國家的統一運動，一神敎遂至得勢；後來工業發達，科學勃興，無神非宗敎之說隨之而起；即在同一時代，各民族各社會產業進化之遲速不同，宗敎思想亦隨之而異，非洲美洲南洋蠻族，仍在自然宗敎時代，中國印度，乃信多神，商工業發達之歐美，多奉基督；使中國聖人之徒生於倫敦，他也要奉洋敎，歌頌耶和華；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國窮鄉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與狐狸。以上九項種種不同的人生觀，都爲種種不同客觀的因果所支配，而社會科學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論理的說明，

找不出那一種是沒有客觀的原因，而由於個人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憑空發生的。

梁啓超究竟比張君勱高明些，他說：『君勱列舉「我對非我」之九項，他以為不能用科學方法解答者，依我看來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學方法解答。』梁啓超取了騎牆態度，一面不贊成張君勱，一面也不贊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見是：

『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

他所謂大部分是指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他所謂一小部分是指關于情感方面的事項。他說：『既涉到物界，自然為環境上——時間空間——種種法則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項，固然不離物界，難道情感方面事項不涉到物界嗎？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應，情感如何而起，這都是極普通的心理學。關于情感超科學這種怪論，唐鉞已經駁得很明白。但是唐鉞駁梁啓超說：『我們論事實的時候，不能羼入價值問題。』而他自己論到用橫事件，解釋過于淺薄，並且說出『沒有多大價值』

的話，如此何能使梁啓超心服！其實孝子割股療親，程嬰杵臼代人而死，田橫乃木自殺等主動，在社會科學家看起來，無所謂優不優，無所謂合理不合理，無所謂有價值無價值，無所謂不可解，無所謂神秘，不過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所應有之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乃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之道德傳說及一切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試問在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這樣舉動，有沒有這樣情感，有沒有這樣的自由意志？

范壽康也是一個騎牆論者，他主張科學是指廣義的科學，他主張科學決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全部。他說：『人生觀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後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觀的直覺而得，決不是科學所能干涉。後天的內容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而定，決不是主觀所應妄定。』他所謂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類做各人所自認爲善的行爲。

什麼先天的形式，什麼良心，什麼直覺，什麼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狀況不

國的各時代各民族之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一個人生在印度婆羅門家，自然不願意殺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長家，自然以多殺爲無上榮譽；一個女子生在中國閥閱之家，自然以貞節爲他的義務，他若生在意大利，會以多獲面首誇示其羣；西洋人見中國人赤膊對女子則駭然，中國人見西洋人用字紙揩糞則驚訝；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滿族初入中國不知漢人禮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爲恥；中國人以厚葬其親爲孝，而蠻族有委親尸于山野以被鳥獸所噬爲榮幸者；歐美婦女每當稠人廣衆吻其所親，而以爲人妾爲奇恥大辱；中國婦人每以得爲貴人之妾爲榮幸，而當衆接吻雖娼妓亦羞爲之：由此看來，世界上那裏眞有什麼良心，什麼直覺，什麼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說明「科學何以能支配人生觀」，並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張君勱走的是一條道路。我現在舉出兩個證據：

第一，他自號存疑的唯心論，這是沿襲了赫胥黎斯賓塞諸人的謬誤；你既承認宇宙間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學家站開，且讓玄學家來解疑。此所以張君勱說：「既已存疑，則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學，不應有醜詆之詞。」其實我們對于未發見的物質固然可以存疑，而對于超物質而獨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質的什麼心（心卽是物之一種表現），什麼神靈與上帝，我們已無疑可存了。說我們武斷也好，說我們專斷也好，若無證據給我們看，我們斷然不能拋棄我們的信仰。

第二，把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歸到科學與物質文明，固然是十分糊塗，但丁在君把這個責任歸到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却也離開事實太遠了。歐洲大戰分明是英德兩大工業資本發展到不得不互爭世界商場之戰爭，但看他們戰爭結果所定的和約便知道，如此大的變動，那裏是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製造得來的。如果離了物質的卽經濟的原因，排科學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造成這樣空前的大戰爭；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張君勱所謂自由意志的人生觀眞有力量了。

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爲完全眞理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張君勱等類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

十二，十一，十三。

附錄二　答陳獨秀先生

適

陳獨秀先生在他的序文的結論裏說：

『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爲完全眞理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張君勱等類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

我不知道丁先生要如何回答他；但我個人的意見先要說明：（1）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人生觀是一個人對於宇宙萬物和人類的見解；歷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見解，是一個人對於歷史的見解。歷史觀只是人生觀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觀是用物質的觀念來解釋宇宙萬物及心理現象。唯物的歷史觀是用『客觀的物質原因』來說明歷史。（狹義的唯物史觀則用經濟的原因來說明歷史。）

說明了以上兩層，然後我可以回答獨秀了。我們信不信唯物史觀，全靠『客觀的物質原因』一個名詞怎樣解說。關於這一點，我覺得獨秀自己也不曾說的十分明白。獨秀在這篇序裏曾說，『心卽是物之一種表現。』（序頁十。）那麼，『客觀的物質原因』似乎應該包括一切『心的』原因了，——卽是智識，思想，言論，教育等事。這樣解釋起來，獨秀的歷史觀就成了『只有客觀的原因（包括經濟組織，知識，思想等等）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就是禿頭的

歷史觀，用不着戴什麼有色采的帽子了。這種歷史觀，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贊成的。

然而獨秀終是一個不澈底的唯物論者。他一面說「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一面又把「物質的」一個字解成「經濟的」。因此，他責備在君不應該把歐戰的責任歸到那班非科學的政治家與教育家的身上。他說：

「歐洲大戰分明是英德兩大工業資本制度發展到不得不互爭世界商場之戰爭，但看他們戰爭結果所定的和約便知道，如此大的變動，那裏是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製造出來的？」

歐洲大戰之有經濟的原因，那是稍有世界知識的人都承認的。在君在他的兩篇長文裏那樣恭維安基爾的大幻想（玄學與科學頁二六，答張君勱頁一六。）他豈不承認歐戰與經濟的關係？不過我們治史學的人，知道歷史事實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雖然極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

所以我個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獨秀希望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

其實獨秀也只承認『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那麼，他儘可以袖着手坐待經濟組織的變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傳的事業，謀思想的革新呢？如果獨秀眞信仰他們的宣傳事業可以打倒軍閥，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國際資本主義，那麼，他究竟還是丁在君和胡適之的同志，——他究竟還信仰思想知識言論教育等事也可以變動社會，也可以解釋歷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觀！

十二，十一，廿九。

附錄三　答適之

獨秀

我對於適之先生這篇序，固然讚美其能成立一家言，但有不能同意之二點：

（一）這回的爭論當然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科學的人生觀是否錯誤？』一個是『科學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觀？』後者的討論多於前者，適之說是共同的錯誤，其實是適之個人的錯誤。何以呢？梁啓超張君勱這班人，當初也未必不曾經過極膚淺的唯物卽科學的人生觀，只因他們未曾敲過社會科學的門，閱世又稍稍久遠，接觸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人生觀，都和科學的原理原則相隔太遠，於是他們的第一觀念便是『人生觀超於科學以上』，『科學決不能支配人生』。他們對科學的信仰如此破壞了，第二觀念方思維到科學的人生觀本身之錯誤與否。並且梁啓超更聰明一點，他駡得科學簡直是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人類，而同時却又說：『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所以我們現在所爭的，正是科學是否萬能問題，此問題解決了，科學已否破產便不成問題了。照適之的意見，只須努力具體的說明科學的人生觀，不必去力爭科學可否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像這樣縮短戰線，只立而不破的辯論法，不是縱敵，便是收兵。無論你科學的人生觀有如何具

體的說明，張君勱梁啓超可以回答你：適之先生！我們佩服你科學的人生觀也很高明，我們本來不曾承認科學破產；但是人類社會除了你這樣高明的人生觀以外，另外還有許多人生觀，如先生所說的做官發財的人生觀，靠天吃飯的人生觀，求神問卜的人生觀，安士全書的人生觀，太上感應篇的人生觀，其餘三天三夜也說不盡的人生觀，卻都是超科學的，卻都是科學所不能支配的，他們的世界大得很哩，科學的萬能在那裏？適之只重在我們自己主觀的說明，而疏忽了社會一般客觀的說明，只說明了科學的人生觀自身之美滿，未說明科學對於一切人生觀之威權，不能證明科學萬能，使玄學游魂尚有四出的餘地；我則以為，固然在主觀上須建設科學的人生觀之信仰，而更須在客觀上對於一切超科學的人生觀加以科學的解釋，畢竟證明科學之威權是萬能的，方能使玄學鬼無路可走，無縫可鑽。

（二）社會是人組織的，歷史是社會現象之記錄，『唯物的歷史觀』是我們的根本思想，名為歷史觀，其實不限於歷史，並應用於人生觀及社會觀。適之說：

『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我明明說『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何嘗專指歷史？）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我依據唯物史觀的理論來討論人生觀，適之便欲强爲分別；倘適之依據實驗主義的理論來討論人生觀，別人若說：『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適之說的是一種實驗主義的哲學，』適之服是不服？或者適之還不承認唯物史觀也是一種哲學，想適之不至如此。適之好像於唯物史觀的理論還不大清楚，因此發生了許多誤會，玆不得不略加說明。第一，唯物史觀所謂客觀的物質原因，在人類社會，自然以經濟（即生產方法）爲骨幹。第二，唯物史觀所謂客觀的物質原因，是指物質的本因而言，由物而發生之心的現象，當然不包括在內。世界上無論如何徹底的唯物論者，斷不能不承認有心的現象卽精神現象這種事實（我不知適之所想像之徹底的唯物論是怎樣？）；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敎道德敎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這是因爲唯物史觀的哲

學者，是主張如左表

經濟
- 制度
- 宗教
- 思想
- 政治
- 道德
- 文化
- 教育

之一元論，而非如左表

- 經濟
- 宗教
- 思想
- 政治
- 道德
- 文化
- 教育

之多元論。這本是適之和我們爭論之焦點。我們何以不承認多元？別的且不說，單就適之先生所舉的思想及教育來討論。中國古大思想家莫如孔老，他們思想的來

因，老是小農社會的產物，孔是宗法封建的結晶，他們的思想卽他們社會經濟制度的映相，和希臘亞里斯多德擁護農奴制一樣，並無多少自由創造。他們思想的効果，中國周末農業品手工業品之交易漸漸發達起來（觀史記貨殖傳所述及漢朝種種抑制商人的法令可知），當時的社會已遠離了部落生活，已不是單純的農業經濟，已開始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當時掛的是道家儒家招牌，賣的是法家藥料，並且自秦始皇一直到宣統，都是申韓世界。思想的價值如此。再說教育，我們有何方法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組織之下，使資本社會的教育制度實現？我們又有何方法在資本社會制度之下，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漫說資本社會制度之下了，就是趨向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非不極力推重教育，列寧屢次很沉痛的說：『在教育不普及的國家中建設共產社會是不可能的事。』『要使教育極不普及的俄羅斯很快的變成一個人民極開通的國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以物質的條件之限制，無論列寧如何熱誠，所謂教育普及，眼前還只是一句空話。歐美資本社會教育進步，完全是工業

發達的結果，工業家不但需學術精巧的技師，並且需手藝熟練的工人，資本階級爲發財計不得不發達教育，家庭農業家庭手工業社會自不需此，所以有些中國人一面絕不注意工業，一面卻盲目的提倡教育，眞是癡人說夢。教育本身的地位如此。適之說：『如果獨秀眞信仰他們的宣傳事業可以打倒軍閥，云云』我老實告訴適之，如果我們妄想我們的宣傳他本身的力量可以打倒軍閥，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國際資本主義，我們還配談什麼唯物史觀！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適之又說：『他（指獨秀）若不相信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那麼，他儘可以袖着手坐待經濟組織的變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傳的事業，謀思想的革新呢？』我的解答是：在社會的物質條件可能範圍內，唯

物史觀論者本不否認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動。我們不妄想造一條鐵路通月宮，但我們却不妨妄想造一條鐵路到新疆；我們不妄想學秦皇漢武長生不老，但我們却不妨極力衞生以延長相當的壽命與健康的身體。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動，本爲社會進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會的物質條件可能以內。思想知識言論教育，自然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說他們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和經濟立在同等地位。我們並不抹殺知識思想言論教育，但我們只把他當做經濟的兒子，不像適之把他當做經濟的弟兄。我們並不否認心的現象，但我們只承認他是物之一種表現，不承認這表現復與物有同樣的作用。適之贊成所謂禿頭的歷史觀，除經濟組織外，『似乎應該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識，思想，言論，教育等事。』『心的』原因，這句話如何在適之口中說出來！離開了物質一元論，科學便瀕於破產，適之頗尊崇科學，如何對心與物平等看待！！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識，思想，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也可以解釋歷史，也可

以支配人生觀，——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

十二，十二，九。

孫行者與張君勱

孫行者站在靈霄殿外，耀武揚威的不服氣。如來伸出一隻手掌道：「你有多大本領？能不能跳出我的手心？」孫行者大笑道：「我的師父曾傳授給我七十二般變化，還教我觔斗雲，一個觔斗就是十萬八千里。你有多大的手心！」他縮小了身軀跳上了如來的手掌，喊一聲「老孫去也！」一個觔斗翻出南天門去了。以後的一段，我不用細說了。孫行者自以為走的很遠了，不知道他總不會跳出如來的手掌。

我的朋友張君勱近來對於科學家的跋扈，很有點生氣。他一隻手撚着他稀疎的鬍子，一隻手向桌上一拍，說道：「賽先生，你有多大的手心！你敢用羅輯先生來網羅「我」嗎？老張去也！」說着，他一個觔斗，就翻出松坡圖書館的大門外去了。

他這一個觔斗，雖沒有十萬八千里，卻也夠長了！我在幾千里外等候他，等了

二七一十四天，好容易望着彩雲朵朵，瑞氣千條，冉冉而來，——却原來還只是他的小半截身子！其餘的部分，還沒有翻過來呢！

然而我揪住了這翻過來的一截，仔細一看，原來他仍舊不曾跳出賽先生和羅輯先生的手心裏！這話怎講？且聽我道來。

張君勱說：

『人生者，變也，活動也，自由也，創造也。……試問論理學上之三大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證其合不合乎？論理學上之兩大方法（曰內納，曰外繹）何者能推定其前後之相生乎？』

這是柏格森的高徒的得意腔調。他還引了許多師叔師伯的話來助他張目。

然而他所指出的羅輯先生的五樣法寶，我門只消祭起一樣來，已夠打出他的原形來了。我們祭起的法寶，是論理學上的矛盾律。

【矛一】張君勱說：

「精神科學中有何種公例，可以推算未來之變化，如天文學之於天象，力學之於物體者乎？吾敢斷言曰，必無而已。」

【盾一】張君勱又說：

「人類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

前面一個『必』字的矛，後面一個『必』字的盾，遙遙相對，好看煞人！

否認人生觀有公例的張君勱，忽然尋出這一條『不趨於惡而必趨於善』的大公例來，豈非玄之又玄的奇事！他自己不能不下一個解釋，於是他又陷入第二層矛盾。

【矛二】張君勱說：

「精神科學之公例，惟限於已過之事，而於未來之事，則不能推算。」

「精神科學……決不能以已成之例，推算未來也。」

【盾二】張君勱說：

「人類目的，屢變不已，雖變也，趨於惡而必趨於善。其所以然之

故，至爲玄妙，不可測度。然據既往以測將來，其有持改革之說者，大抵圖所以益世而非所以害世。此可以深信而不疑者也。」

請問『據既往以測將來』是不是『以已成之例推算未來？』

然而張君勱又說：

【矛三】『人生觀不爲論理方法與因果律所支配。』

【盾三】（大前提）『夫事之可以預測者，必爲因果律所支配者也。』（小前提）『人類目的，變遷不已；然據既往以測將來，……可以深信而不疑。』（結論）故張君勱深信而不疑『人類目的』（人生觀）必爲因果律所支配者也！

張君勱翻了二七一十四天的觔斗，原來始終不曾脫離邏輯先生的一件小小法寶──矛盾律──的籠罩之下！哈！哈！

十二，五，十一，上海。

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我是自己有一套思想，再來看孔家諸經的；看了孔經，先有自己意見，再來視宋明人書的；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本書頁二七九。）

我們讀梁漱冥先生的這部書，自始至終，都該牢牢記得這幾句話。並且應該認得梁先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自己說：

『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的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條線去走。』（本書自敘）

我們要認清梁先生是一個愛尋求一條『準道理』的人，是一個『始終拿自己思想作

主』的人。懂得這兩層，然後可以放胆讀他這部書，然後可以希望領會他這書裏那『眞知灼見』的部分，和那蔽於主觀成見或武斷太過的部分。

（二）

梁先生第一章緒論裏，提出三個意思。第一，他說此時東方化與西方化已到了根本上的接觸，形勢很逼迫了，有人還說這問題不很迫切，那是全然不對的。（頁四至十一）第二，那些人隨便主張東西文化的調和融通，那種『糊塗，疲緩，不真切的態度，全然不對。』（頁十二至十八）第三，大家怕這個問題無法研究，也是不對的。『如果對於此問題覺得是迫切，當眞要求解決，自然自己會要尋出一條路來。』（頁十八至二十）

這三層意思是梁先生著書的動機，所以我們應該先看看這三層的論點如何。

梁先生是『始終拿自己思想作主』，故我們先討論那關於他自己思想的第三

點。他說，『我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整個的。思想見解到那裏，就做到那裏。』又說，『旁人對於這個問題自己沒有主見，並不要緊，而我對於此問題，假使沒有解決，我就不曉得我作何種生活才好！』（頁十九）這種知行合一的精神，自然是我們應該敬仰佩服的。然而也正因爲梁先生自己覺這個問題如此迫切，所以他才有第一層意思，認定這個問題在中國今日果然是十分迫切的了。他覺得現在東方化受西方化逼迫得緊的形勢之下，應付的方法不外三條路：

（一）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而又無可通，到今日要絕其根株，那麼，我們須要自覺的如何澈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二）倘然東方化受西方化的壓迫不足慮，東方化確要翻身的，那麼，與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須有真實的解決，積極的做去，不要作夢發呆，卒致傾覆。

（三）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的，須要趕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決，好打開一條活路，決不能存疲緩的態度。（頁十）

梁先生雖指出這三條路，然而他自己只認前兩條路，他很嚴厲的罵那些主張調和融通的人，說『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所以我們此時且不談那第三條路。

對於那前兩條路，梁先生自己另有一種很奇異的見解。他把東西文化的問題當成下列的方式：

東方化還是要連根的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

接着就是他自己的奇異解釋：

此處所謂『翻身』，不僅說中國人仍舊使用東方化而已；大約假使東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樣，成一種世界的文化——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的色彩，是無論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

所以此刻問題，直截了當的，就是

> 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爲一種世界文化？
>
> 如果不能成爲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能僅祇使用於中國，而須成爲世界文化。（頁十二）

這是梁先生的書裏的最主要問題，讀者自然應該先把這問題想一想，方才可以讀下去。

我們覺得梁先生這一段話似乎不免犯了攏統的毛病。第一，東西文化的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決不是『連根拔去』和『翻身變成世界文化』兩條路所能完全包括。至於『此刻』的問題，更只有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的問題，和用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尋求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如何選擇去取的問題，而不是東方化能否翻身爲世界文化的問題。避去了具體的選擇去取，而討論那將來的翻身不翻身，便是攏統。第二，梁先生的翻身論是根據在一個很攏統的大前提之上的。他的大前提是：

> 凡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爲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當然不能限於一國，而須成爲世界文化。

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世界是一個很大的東西，文化是一種很複雜的東西。依梁先生自己的分析（頁十三），一種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他總括爲三方面：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物質生活。這樣多方面的文化，在這個大而複雜的世界上，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個性的區別。在一個國裏，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異，何況偌大的世界？若否認了這種種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無論何種劣下的文化都可成爲世界文化。我們也許可以勸全世界人都點『極黑暗的油燈』，都用『很笨拙的騾車』，都奉喇嘛教，都行君主獨裁政治；甚至於鴉片，細腰，穿鼻，纏足，如果走運行時，何嘗都沒有世界化的資格呢？故就一種生活或制度的抽象的可能性上看來，幾乎沒有一件不能成爲世界化的。再從反面去看，若明白了民族生活的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一種文化不必須成爲世界文化，而自

有他存在的餘地。米飯不必成為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吃米飯；筷子不必成為世界化，而我們正不妨用筷子；中國話不必成為世界語，而我們正不妨說中國話。

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指出梁先生的出發點就犯了攏統的毛病，攏統的斷定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攏統的斷定一種文化若能存在，必須翻身成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認是『牢牢的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覺的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了。從那個攏統的出發點，自然生出一種很攏統的『文化哲學』。他自己推算這個世界走的『一條線』上，現在是西洋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頁二五九以下）這樣『整齊好玩』的一條線，有什麼根據呢？原來完全用不着根據，只須梁先生自己的思想，就夠了。梁先生說：

> 我並非有意把他們弄得這般整齊好玩，無奈人類生活中的問題實有這麼三層次，其文化的路徑就有這麼三轉折，而古人又恰好把這三路都已

分別走過，所以事實上沒法要他不重走一遍。吾自有見而爲此說，今人或未必見諒，然吾亦豈求諒於今人者？（頁二六一—二）

是的。這三條路，古人曾分別走過，現在世界要走上一條線了，既不能分別並存，只好輪班挨次重現一次了。這種全憑主觀的文化輪迴說，是無法駁難的，因爲梁先生說『吾自有見而爲此說。吾亦豈求諒於今人者！』

凡過信主觀的見解的，大概沒有不武斷的。他旣自有見而爲此說，又自己聲明不求諒於今人，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這種勇於自信而傾于武斷的態度，在書中屢次出現。最明顯的是在他引我論淑世主義的話之後，他說：

這條路（淑世主義）也就快完了。………在未來世界，完全是樂天派的天下，淑世主義過去不提。這情勢具在。你已不必辯，辯也無益。（頁二五二）

我也明知『辯也無益』，所以我沉默了兩年，至今日開口，也不想爲無益之辯論，

只希望能指出梁先生的文化哲學是根據於一個很攏統的出發點的，而這種攏統的論調只是梁先生的『牢牢的把定一條線去走』。『要尋求一條準道理』的人格的表現，用一條線的眼光來看世界文化，故世界文化也只走一條線了。自己尋得的道理，便認為『準道理』，故說『吾自有見而為此說』，『你不必辯，辯也無益』。

不明白這一層道理的，不配讀梁先生的書。

(二)

上文只取了梁先生的緒論和結論的一部分來說明這種主觀化的文化哲學。現在我們要研究他的東西文化觀的本身了。

梁先生先批評金子馬治，北聆吉論東西文化的話，次引陳獨秀擁護德謨克拉西和賽恩斯兩位先生的話，認為很對很好。梁先生雖然承認『西方文化即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兩精神的文化』，但梁先生自己是走『一條線』的人，總覺得『我們說話

時候非雙舉兩種不可，很像沒考究到家的樣子。』所以他還要做一番搭題的工夫，要把倫賽兩先生併到一條線上去，才算『考究到家』了。這兩位先生若從歷史上研究起來，本來是一條路上的人。然而梁先生并不講歷史，他仍用他自己的思想作主，先斷定『文化』只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子，而『生活』就是『意欲』；他有了這兩個絕大的斷定，於是得着西方文化的答案：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三一）

我們在這裏，且先把他對於中國印度的文化的答案，也鈔下來，好作比較：

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爲調和持中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七一）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七二）

梁先生自己說他觀察文化的方法道：

我這個人未嘗學問，種種都是妄談，都不免『强不知以爲知』，心裏所有只是一點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點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這觀

察文化的方法也別無所本，完全是出於佛家思想。（頁六一—二）

我們總括他的說法，淘汰了佛書的術語，大旨如下：

所謂生活，就是現在的我（即是現在的意欲）對於前此的我（即是那殆成定局的宇宙）之奮鬥，……前此的我為我當前的『礙』。……當前為礙的東西是我的一個難題；所謂奮鬥，就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頁六四—五）

這點總綱，似乎很平易，然而從這裏發出三個生活的樣法：

（一）向前面要求，就是奮鬥的態度，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

（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回想的隨遇而安。

（三）轉身向後去要求，想根本取消當前的問題或要求。（頁六九—七〇）

依梁先生的觀察，這三條路代表三大系的文化：

（一）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條路，

(二)中國文化走的是第二條路，

(三)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條路。（頁七二）

以上所引，都是本書第二第三兩章中的。但梁先生在第四章比較東西哲學的結果，又得一個關於三系文化的奇妙結論。他說：（頁二〇六）

(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

(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

『現量』就是感覺（Sensation），理智就是『比量』，而直覺乃是比量與現量之間的一種『非量』，就是『附於感覺——心王——之受，想，二心所』。（頁九三）

以上我們略述梁先生的文化觀察。我們在這裏要指出梁先生的文化觀察也犯了攏統的大病。我們也知道有些讀者一定要代梁先生抱不平，說：『梁先生分析的那樣仔細，辨別的那樣精微，而你們還要說他攏統，豈非大冤枉嗎？』是的，我們正

因爲他用那種仔細的分析和精微的辨別，所以說他『攏統』。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極複雜，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裏，這便是攏統之至。公式越整齊，越簡單，他的攏統性也越大。

我們試先看梁先生的第一串三個公式：

(一)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

(二)中國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爲調和持中。

(三)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後要求。

這豈不簡單？豈不整齊？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西方化與印度化，表面上誠然很像一個向前要求，一個向後要求；然而我們平心觀察印度的宗教，何嘗不是極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曾提及印度人的『自餓不食，投入寒淵，赴火炙灼，赤身裸露，學着牛狗，齕草吃糞，在道上等車來軋死，上山去找老虎。』我們試想這種人爲的是什麼？是向後嗎？還是極端的奔赴向前，尋求那最高的滿足？我們試舉一

個例：

> 釋寶崖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幷燒二手。於是積柴於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燥油濃，赫然火合。於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拜，身踣炭上。（胡寅崇正辯二，二三）

試想這種人，在火燄之中禮拜，在身面焦坼之時還要禮拜，這種人是不是意欲極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自己有時也如此說：

> 大家都以爲印度人沒法生活才來出世，像詹姆士所說，印度人胆小不敢奮鬥以求生活，實在閉眼瞎說！印度人實在是極有勇氣的，他們那樣堅苦不撓，何嘗不是奮鬥？（頁一四八）

是的！印度人也是奮鬥，然而『奮鬥』（向前要求）的態度，却是第一條路。（頁六九）所以梁先生斷定印度化是向後要求的第三條路，也許他自己有時要說是『實

在閉眼睛說』呢！

以上所說，并非爲無益之辯，只是要指出，梁先生的簡單公式是經不起他自己的反省的。印度化與西洋化，表面上可算兩極端了，然而梁先生說他倆都是奮鬥，卽都是向前要求。

至於那『調和持中』『隨遇而安』的態度，更不能說那一國文化的特性。這種境界乃是世界各種民族的常識裏的一種理想境界，絕不限于一民族或一國。見於哲學書的，中國儒家有中庸，希臘有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而希伯來和印度兩民族的宗教書裏也多這種理想。見於民族思想裏的，希臘古代卽以『有節』爲四大德之一，而歐洲各國都有這一類的民謠。至於詩人文學裏，『知足』『安命』『樂天』等等更是世界文學裏極常見的話，何嘗是陶潛白居易獨佔的美德？然而這種美德始終只是世界民族常識裏的一種理想境界，無論在那一國，能實行的始終只有少數人。梁先生以爲：

> 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却亦沒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頁八四）

梁先生難道不睜眼看看古往今來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萬的提倡醉酒的詩，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金瓶梅與品花寶鑑，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這種東西是不是代表一個知足安分寡欲攝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而不看見無數的西門慶與奚十一；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詩裏的樂天安命，而不看見他們詩裏提倡酒為聖物而醉為樂境，——正是一種『要求物質享樂』的表示：這是我們不能不責備梁先生的。

以上所說，並不是有意吹毛求疵，只是要指出梁先生發明的文化公式，只是閉眼的攏統話，全無『真知灼見』。他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尋一個簡單公式，而不知簡單公式決不能籠罩一大系的文化，結果只有分析辨別的形式，而實在都是一堆

攏統話。

我們再看他那第二串的三個公式：

(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

(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

這更是荒謬不通了。梁先生自己說：

現量，理智，直覺，是構成知識的三種工具。一切知識都是由這三種作用構成。雖然各種知識所含的三種作用有成分輕重的不同，但是非要具備這三種作用不可，缺少一種就不能成功的。（頁六九）

單用這一段話，已可以根本推翻梁先生自己的三個公式了。既然說，知識非具備這三種作用不可，那麼，也只是因為『各種知識』的性質不同，而成分有輕重的不同；何至於成為三種民族生活的特異公式呢？例如詩人賞花玩月，商人持籌握算，罪人

鞭直打屁股，這三種經驗因爲性質不同，而有成分的輕重，前者偏於直覺，次者偏於理智，後者偏於現量，那是可能的。但人腦的構造，無論在東在西，決不能因不同種而有這樣的大差異。我們可以說甲種民族在某個時代的知識方法比乙種民族在某個時代的知識方法精密的多；正如我們說近二百年來的西洋民族的科學方法大進步了。這不過好像我們說漢儒迂腐，宋儒稍能疑古，而清儒治學方法最精。這都不過是時間上，空間上的一種程度的差異。梁先生太熱心尋求簡單公式了，所以把這種歷史上程度的差異，認作民族生活根本不同方向的特徵，這已是大錯了。他還更進一步，憑空想出某民族生活是某種作用運用某種作用，這眞是『玄之又玄』了。試問直覺如何運用理智？理智又如何運用直覺？理智又如何運用現量？

這三個問題，只有第一問梁先生答的稍爲明白一點。他說：

> 一切西洋文化悉由念念認我向前要求而成。這『我』之認識，感覺所不能爲，理智所不能爲，蓋全出於直覺所得。故此直覺實居主要地位；

由其念強，才奔着去求，而理智則其求時所用之工具。所以我們說西洋生活是以直覺運用理智的。讀者幸善會其意而無以詞害意。（二〇七）

梁先生也知道我們不能懂這種玄妙的話，故勸我們『善會其意而無以詞害意』。但我們實在無法善會其意！第一，我們不能承認『我』之認識全出於直覺所得。哲學家也許有發這種妙論的；但我們知道西洋近世史上所謂『我』的發現，乃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件，正如崑曲思凡裏的小尼姑的春情發動，不願受那尼菴的非人生活了，自然逃下山去。梁先生若細讀這一齣『我』的發現的妙文，或英國詩人白朗吟（Browning）的 Fra Lippo Lippi 便可以知道這裏面也有情感，也帶理智，而現量（感覺）實居主要。第二，即使我們閉眼承認『我』之認識由於直覺，然而『我』並不即等於直覺；正如哥侖布發現美洲，而美洲並不等於哥侖布。故『我之認識由於直覺』一句話，即使不是瞎說，也決不能引出『直覺運用理智』的結論。

此外，梁先生解釋『理智運用直覺』一段，我老實承認全不懂得他說的是什

麼。幸而梁先生自己承認這一段話是『很拙笨不通』（二〇九），否則我們只好怪自己拙笨不通了。

最後，梁先生說『理智運用現量』一層，我們更無從索解。佛教的宗教部分，固然是情感居多，然而佛家的哲學部分却明明是世界上一種最精深的理智把戲。梁先生自己也曾說：

在印度，那因明學唯識學秉一種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頁八六）

何以此刻（頁二〇九）只說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呢？梁先生的公式熱，使他到處尋求那簡單的概括公式，往往不幸使他陷入矛盾而不自覺。如上文梁先生既認印度化爲奮鬥，而仍說他是向後要求：如這裏梁先生既認印度的因明唯識爲走科學的路，而仍硬派他入第三個公式。『整齊好玩』則有餘了，只可恨那繁複多方的文化是不肯服服帖帖叫人裝進整齊好玩的公式裏去的。

（三）

我們現在要對梁先生提出一點根本的忠告，就是要說明文化何以不能裝入簡單整齊的公式裏去。梁先生自己也曾說過生活就是現在的我對宇宙的奮鬥，『我們的生活無時不用力，即是無時不奮鬥。當前爲礙的東西是我的一個難題；所謂奮鬥就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頁六四）當梁先生說這話時，他並不曾限制他的適用的區域。他說：

> 差不多一切有情——生物——的生活，都是如此，並不單是人類爲然。（頁六五）

我們很可以用這一點做出發點：生活即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而梁先生又說：

> 文化並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頁六八）

這一句話，我們也可以承認。（梁先生在這裏又把文化和文明分作兩事，但那個區

別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況且和梁先生自己在頁十三上說的話互相矛盾，故我們可以不保他這個一時高興的辨析。）梁先生又說：

> 奮鬥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頁六九）

這也是我們可以承認的。但我們和梁先生攜手同行到這裏，就不能不分手了。梁先生走到這裏，忽然根本否認他一向承認的『一切有情』都不能違背的『生活本來的路向』！他忽然說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是不走這『生活本來的方向』的！他忽然很大度的把那條一切有情都是如此的生活本路讓與西洋人去獨霸！梁先生的根本錯誤就在此一點。

我們的出發點只是：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樣法，而民族生活的樣法是根本大同小異的。爲什麽呢？因爲生活只是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而人類的生理的構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異的問題之下，解決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異的幾種。這個

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說』(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possibilities)。例如飢餓的問題，只有『吃』的解決。而吃的東西或是飯，或是麵包，或是棒子麪，……而總不出植物與動物兩種，決不會吃石頭。禦寒的問題，自裸體以至穿重裘，也不出那有限的可能。居住的問題，自穴居以至廣廈層樓，根本上也只有幾種可能。物質生活如此，社會生活也是如此。家庭的組織，也只有幾種可能：雜交，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大家族或小家庭，宗子獨承產業或諸子均分遺產。政治的組織也只有幾種可能：獨裁政治，寡頭政治，平民政治。個人對社會的關係也有限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與權威。精神生活也是如此的。言語的組織，總不出幾種基本配合；神道的崇拜，也不出幾種有限的可能。宇宙的解釋，本體問題，知識的問題，古今中外，可會跳出一元，二元，多元；唯心，唯物；先天，後天，等等幾條有限的可能？人生行為的問題，古今中外，也不會跳出幾條有限的路子之外。至於文學與美術的可能方式，也不能不受限制：有韻與無韻，表現與象徵，人聲與樂

器，色彩是有限的，樂音是有限的。這叫做有限的可能。

凡是有久長歷史的民族，在那久長的歷史上，往往因時代的變遷，環境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解決樣式。往往有一種民族而一一試過種種可能的變法的。政治史上，歐洲自希臘以至今日，印度自吠陀時代以至今日，中國自上古以至今日，都曾試過種種政治制度：所不同者，只是某種制度（例如多頭政治）在甲民族的採用在古代，而在乙民族則上古與近代都曾採用；或某種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在甲國早就消滅了，而在乙國則至最近世還不曾剷除。又如思想史上，這三大系的民族都曾有他們的光明時代與黑暗時代。思想是生活的一種重要工具，這裏面自然包含直覺，感覺，與理智三種分子，三者缺一不可。但思想的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備的。往往積了千萬年的經驗，到了一個成人時期，又被外來的阻力摧折毀壞了，重復陷入幼稚的時期。印度自吠陀時代以至玄奘西遊之時，幾千年繼續磨練的結果，遂使印度學術界有近於科學的因明論理與唯識心理。這個時代，梁先生也承認是

『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但回教不久征服印度了，佛教不久就絕跡於印度，而這條『科學的路』遂已斷而復塞了。中國方面，也是如此。自上古以至東周，銖積寸累的結果，使戰國時代呈現一個燦爛的哲學科學的時期。這個時代的學派之中，如墨家的成績，梁先生也不能不認為『西洋適例』。（頁一七四）然而久長的戰禍，第一個統一帝國的摧殘，第二個統一帝國的兵禍與專制，遂又使個成熟的時期的思想方法逐漸退化，陷入讖緯符命的黑暗時代。東漢以後，王充以至王弼，多少才士的反抗，終久抵不住外族的大亂與佛教（迷信的佛教，這時候還沒有因明唯識呢。）的混入中國！一千年的黑暗時代逐漸過去之後，方才有兩宋的中興。宋學是從中古宗教裏滾出來的，程頤朱熹一派認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證，十分明顯的表示一種『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這個風氣一開，中間雖有陸王的反科學的有力運動，終不能阻止這個科學的路重現而大盛於最近的三百年。這三百年的學術，自顧炎武閻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

以至孫詒讓章炳麟，我們決不能不說是『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

然而梁先生何以閉眼不見呢？只因為他的成見太深，凡不合於他的成見的，他都視為『化外』。故孔墨先後並起，而梁先生忍心害理的說『孔子代表中國，而墨子則西洋適例！』（頁一七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學術史上，他只認『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齋先生東崖先生為最合我意』，而那影響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對於朱學與清朝考據學，完全閉眼不見，所以他能說：

科學方法在中國簡直沒有。（頁八六）

究竟是真沒有呢？還是被梁先生驅為『化外』了呢？

我們承認那『有限的可能說』，所以對於各民族的文化不敢下攏統的公式。我們承認各民族在某一個時代的文化所表現的特徵，不過是環境與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不敢拿『理智』『直覺』等等簡單的抽象名詞來概括某種文化，我們拿歷史眼光去觀察文化，只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

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的不同。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可以看出各種文化的原形；歷史又是一座孽鏡台，可以照出各種文化的過去種種經過。在歷史上，我們看出那現在科學化（實在還是很淺薄的科學化）的歐洲民族也曾經過一千年的黑暗時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過寺院制度，也曾做過種種苦修的生活，也曾極力壓抑科學，也曾有過嚴厲的清淨教風，也曾為衛道的熱心燒死多少獨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區分在什麼地方？至於歐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學與德謨克拉西，事事都可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我們只可以說歐洲民族在這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在征服環境的方面的成績比較其餘各民族確是大的多多。這也不是奇事：本來賽跑最怕趕上；趕上一步之後，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賽跑爭先，雖然只有一個人得第一，落後的人，雖不能搶第一，而慢慢走去終也有到目的地的時候。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他們的落

後，也不過是因爲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環境與問題，並不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方式上有什麼持中和向後的根本毛病，也並不是因爲他們的生活上有直覺和現量的根本區別。民族的生活沒有不用智慧的。但在和緩的境地之下，智慧稍模糊一點，還不會出大岔子；久而久之，便養成疏懶的智慧習慣了。直到環境逼人而來，懶不下來了，方才感發興起，磨練智慧，以免淘汰。幼稚的民族，根行淺薄，往往當不起環境的逼迫，往往成爲環境的犧牲。至於向來有偉大歷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決心，終還有生存自立的機會。自然雖然殘酷，但他還有最慈愛的一點：就是後天的變態大部分不致遺傳下去。一千年的纏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復天足！這是使我們對于前途最可樂觀的。

梁先生和我們大不相同的地方，只是我們認各種民族都向『生活本來的路』走，而梁先生却認中國印度另走兩條路。梁先生說：

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爲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

路。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頁八四）

若照這樣說法，我們只好絕望了。然而梁先生卻又相信中國人同西洋人接觸之後，也可以科學化，也可以民治化。他並且預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後，還可以中國化，還可以印度化。如此說來，文化的變化豈不還是環境的關係嗎？又何嘗有什麼『抽象的樣法』的根本不同呢？他既不能不拿環境的變遷來說明將來的文化，他何不老實用同樣的原因來說明現在的文化的偶然不同呢？

這篇文章，爲篇幅所限，只能指出原書的缺陷，而不及指出他的許多好處（如他說中國人現在應該『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一節），實在是我們很抱歉的。

十二，三，二十八。

附錄一　梁漱溟先生第一次來書

頃奉手示，並讀書雜誌見教一文，敬誦悉。往者此書出版曾奉一冊請正，未見誨答。茲承批評，敢不拜嘉？獨惜限於篇幅，指示猶嫌疏略，於漱溟論文化轉變處，未能剴切相誨；倘更辱評論其致誤之由，而曲喻其所未達，則蒙益者，寧獨一漱溟乎？至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願袪省之。…………怱復

適之先生。　漱溟手復。四月一日。

附錄二　答書

漱溟先生：

頃奉手書，有云，「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

『嫌怨』一語，未免言重，使人當不起。至於刻薄之教，則深中適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爲刻薄也。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一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爲輕薄，有時流爲刻薄。在辯論之文中，雖有時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對於先生毫無惡意，而筆鋒所至，竟蹈刻薄之習，至惹起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

得來示後，又覆檢此文，疑先生所謂刻薄，大概是指『一條線』『閉眼』等等字樣。此等處皆摭拾大著中語，隨手用來爲反駁之具，誠近於刻薄。然此等處實亦關於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適頗近於玩世，而先生則屢自言凡事『認眞』。以凡事『認眞』之人，讀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如此文中，『宋學是從中古宗教裏滾出來的』一個『滾』字，在我則爲行文時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視爲輕薄矣。又如文中兩次用『化外』，此在我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個 Pun ，未

嘗不可涉筆成趣，而在『認眞』如先生書，或竟以爲有意剡薄矣。輕薄與剡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認眞亦非汪汪雅度也。如那年第三院之送別會，在將散會之際，先生忽發『東方文化是什麼』之問，此一例也。後來先生竟把孟和先生一時戲言筆之於書，以爲此足證大家喜歡說虛僞的話。此又一例也。玩世的態度固可以流入剡薄；而認眞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剡薄。先生『東西文化』書中，此種因自信太過，或武斷太過，而不覺流爲剡薄的論調，亦復不少。頁一六，頁一六四卽是我個人身受的兩個例。此非反唇相稽也。承先生不棄，懇切相規，故敢以此爲報，亦他山之錯，朋友之誼應爾耳。先生想不以爲罪乎？

適敬上。十二，四，二。

附錄三　第二次來書

適之先生：

承教甚媿！早在涵容，猶未自知也。冥邇來服膺陽明，往時態度，深悔之矣。復謝。順候

起居。

漱冥頓首。四月四日。

（附註）文中引用原書頁數是指梁先生初次自印本，與現行商務本頁數稍有不同。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一)

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綜括起來，這五十年的重要有幾點：

(1)五十年前，申報出世的一年(一八七二)，便是曾國藩死的一年。曾國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第一大將。但是他的中興事業，雖然是很光榮燦爛的，可惜都沒有穩固的基礎，故都不能有長久的壽命。清朝的命運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一切病狀一切弱點都現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國，平定各處匪亂，做到他們的中興事業。但曾左的中興事業，雖然延長了五六十年的滿清國運，究竟救不了滿清帝國的滅

敗，究竟救不了滿清帝室的滅亡。他的文學上的中興事業，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豐的時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龔自珍派，都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軍，忽然做到中興的地位。但『桐城=湘鄉派』的中興，也是暫時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國藩的魄力與經驗確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大將。但曾國藩一死之後，古文的運命又漸漸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吳汝綸……都不能繼續這個中興事業。再下一代，更成了『強弩之末』了。這一度的古文中興，只可算是癆病將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舊救不了古文的衰亡。這一段古文末運史，是這五十年的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2）古文學的末期，受了時勢的逼迫，也不能不翻個新花樣了。這五十年的下半便是古文學逐漸變化的歷史。這段古文學的變化史又可分作

幾個小段落：

(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

(二)譚嗣同梁啓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

(三)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

(四)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

這四個運動，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史上，都該占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淵源和主張雖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們從歷史上看起來，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着『應用』的方向變去。故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但他們都不肯從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都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種奢侈品，只配做一種裝飾品，卻不配做應用的工具。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個及身而絕，沒有傳

人。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在當日雖然勉強供應了一時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說集便是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適用一方面他們都大失敗了。失敗之後，他們便成了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譚嗣同梁啓超一派的文章，應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會上的影響也要算很大了，但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淺的鋪張，無謂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厭。章士釗一派是從嚴復章炳麟兩派變化出來的，他們注重論理，注重文法，既能謹嚴，又頗能委婉，頗可以補救梁派的缺點。甲寅派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成一個重要文派。但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實用的方面，仍舊不能不歸於失敗。因此，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後來也都成了白話散文的作者。

這一段古文學勉強求應用的歷史，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

個階級。古文學幸虧有這一個時期，勉強支持了二三十年的運命。

（3）在這五十年之中，勢力最大，流行最廣的文學，──說也奇怪，──並不是梁啓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紓的小說，乃是許多白話的小說。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都是這個時代的作品。七俠五義之後，有小五義等等續編，都是二十多年來的作品。這一類的小說很可代表北方的平民文學。到了前清晚年，南方的文人也做了許多小說。劉鶚的老殘遊記，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寃，……等等，都是有意的作品，意境與見解都和北方那些純粹供人娛樂的民間作品大不相同。這些南北的白話小說，乃是這五十年中國文學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這一段小說發達史，乃是中國『活文學』的一個自然趨勢，他的重要遠在前面兩段古文史之上。

（4）這五十年的白話小說史仍舊與一千年來的白話文學有同樣的一個

大缺點：白話的採用，仍舊是無意的，隨便的，並不是有意的。民國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便是一種有意的主張。無意的演進，是很慢的，是不經濟的。譬如乾隆以來的各處匪亂，多少總帶着一點『排滿』的意味，但多是無意識的衝動，不能叫做有主張的革命，故容易失敗了。太平天國的革命，排滿的色彩稍明顯一點，但終究算不得是有意識有計畫的排滿運動，故不能得中上階級的同情，終歸於失敗。近二十年來的革命運動，因爲是有意識的主張，有計畫的革命，故能於短時期之中，收最後的勝利。文字上的改革，也是如此。一千年來，白話的文學，一線相傳，始終沒有斷絕。但無論是唐詩，是宋詞，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說，總不曾有一種有意的鼓吹，不曾明明白白的攻擊古文學，不曾明明白白的的主張白話的文學。

近五年的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老老實實的宣告古文學是已死的

文學，他們老老實實的宣言『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他們老老實實的主張現在和將來的文學都非白話不可。這個有意的主張，便是文學革命的特點，便是五年來這個運動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以上四項，便是這五十年中國文學的變遷大勢。以下的幾章便是詳細說明這幾個趨勢。

（二）

曾國藩死後的『桐城—湘鄉派』，實在沒有什麼精采動人的文章。王先謙輯的續古文辭類纂（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編成的）選有龍啓瑞，魯一同，吳敏樹等人的文章，可以勉強代表這一派的老輩了。王先謙自序說，

> 惜抱（姚鼐）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闚師承，不無謬附。……梅氏（梅曾亮，一八五五死）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

曾文正公（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

「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這是曾國藩死後的古文家的傳法捷徑。我們不能多引他們的文章來佔篇幅，現在引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因爲這篇序寫桐城文派的淵源傳播，頗有文學史料的價值：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于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

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

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漵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

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勳）……受法于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為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

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家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于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

這一篇不但寫桐城派的傳播，又可以使我們知道這一派的最高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畢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國藩在當日隱隱的自命爲桐城派的中興功臣，人家也如此推崇他。（王先謙自序可參看。）他作聖哲畫像記，共選聖哲三十二人，而姚鼐爲三十二人之一，這可以想見他的心理了。他的幕府裏收羅了無數人才；我們讀薛福成的敍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庸菴文編四）一篇，可以知道當日的學者如錢泰吉，劉毓崧，劉壽曾，李善蘭（算學家），華蘅芳（算學家），孫衣言，俞樾，莫友芝，戴望，成蓉鏡，李元度；文人如吳敏樹，張裕釗，陳學受，方宗誠，吳汝綸，黎庶昌，汪士鐸，王闓運，——都在他的幕府之內。怪不得曾派的勢力要影響中國幾十年了。但這一班人在文學史上都沒有什麼重要的貢獻。年壽最高，名譽最長久的，莫如俞樾，王闓運，吳汝綸三人。俞樾的詩與文都沒有大價值。王闓運號稱一代大師，但他的古文還比不上薛福成（詩另論）。吳汝綸思想稍新，他的影響也稍大，但他的貢獻不在

於他自己的文章，乃在他所造成的後進人才。嚴復林紓都出于他的門下，他們的影響比他更大了。

平心而論，古文學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韓愈至曾國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駢文的弊病不消說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漢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沒有用，只替文學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淸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再進一步的，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興，雖然沒有什麼大貢獻，卻也沒有什麼大害處。他們有時自命爲『衞道』的聖賢，如方東樹的攻擊漢學，如林紓的攻擊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載道』的話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做通順了，爲後來二三十年勉强應用的預備，這一點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三）

太平天國之亂是明末流寇之亂以後的一個最慘的大刧，應該產生一點悲哀的感慨的好文學。當時貴州有一個大詩人鄭珍（子尹，遵義人，生一八〇六，死一八六四）在貴州受了局部的影響（咸豐四年，貴州的亂），已替他晚年的詩（巢經巢詩鈔後集）增加無數悲哀的詩料。但鄭珍死在五十八年前，已不在我這一篇小史的範圍之內了。說也奇怪，東南各省受害最深，竟不會有偉大深厚的文學產生出來。王闓運為一代詩人，生當這個時代，他的湘綺樓詩集卷一至卷六正當太平天國大亂的時代（一八四九——一八六四）；我們從頭讀到尾，只看見無數擬鮑明遠，擬傅玄麻，擬王元長，擬曹子建……一類的假古董；偶然發見一兩首『歲月猶多難，干戈罷遠遊』一類不痛不癢的詩；但竟尋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紀念這個慘痛時代的詩。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都是因為這些詩人大都是只會做模倣詩的，他們住的世界還

是鮑明遠曹子建的世界，並不是洪秀全楊秀清的世界；況且鮑明遠曹子建的詩體，若不經一番大解放，決不能用來描寫洪秀全楊秀清時代的慘劫。王闓運集中有一八七二年作的獨行謠三十章（卷九），追寫二十年的時事，內中頗有大胆的譏評，但文章多不通，敘述多不明白，只可算是三十篇笨拙的時事歌括，不能算作詩─我不得已，勉强選了他的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一篇代表這一位大名鼎鼎的詩人：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適按：此詩無注，多不可通。章字价人。曾氏靖港之敗，賴章救他出來。後來曾氏成功受封，章獨不得報酬，人多為他抱不平。章晚年作感舊圖。並作記，記此事。參看鄭孝胥海藏樓詩卷三，頁三。）

桂平盜起東南卷，唯有長沙能累卵。三年坐井仰恃天，城堞傲風勤矛矟。凶徒無賴往復來，潘張還去略受災；閉門待死證忠節，未死從容居

憲臺。曾家嶺枷偏在頸，三家村儒怒生瘦。勸捐截餉百計生，欲倚江與劾馳驛。盧黃軍敗如覆錇，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難樓走，徐公饒室趾不停。省兵無人無守禦，卻付曾家一瓦注。空船坐守木關防，直嘗鋒鏑尋死處。軍謀兵機不暇講，盜屯湘潭下靖港；兩頭張手探釜魚，十日淘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猪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圍密密張羅罝。此時詆笛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擣堅禽王在肩臂。弱冠齊年我與君，君如李廣欲無言。日中定計夜中變，我歸君去難相聞。平明丁叟踴門入，報敗方知一軍泣。督師只擬從湘絫，主簿匆匆救杜襲。十營並發事全虛，從此舍舟山上居。七門盡閉春欲盡，獨教陳李删遺疏。版橋漂破帥旗折，銅官渚畔餘明滅。豈料湘潭大捷來，千里盜屯湯沃雪！一勝申威百勝從，塔羅如虎彭楊龍。時人攀附三十載，爭道當年贊畫功！駱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脊令起。

惟餘湘岸柳千條，猶恨當時嗚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適按此詩作于曾國藩死後約十年），舊選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間從資格磨。憑君莫話艱難事，佹得佹失皆天意。漁浦蕭蕭廢壘秋，遊人且覓從軍記。

這種詩還不能完全當得一個『通』字，但在湘綺樓集裏那許多假古董之中，這種詩自然不能不算是上品了。

但是這個時代有一個詩人，確可以算是代表時代的詩人。這個詩人就是上元的金和，字亞匏，生于一八一八，死于一八八五，著有秋蟪吟館詩鈔七卷。當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破時，金和被陷在城中，與長髮軍中人往來，漸漸的結合了許多人，要想作官兵的內應。那時向榮的大本營卽在城外，金和偷出城來，把內應的計畫告知官兵；向榮初不信，他就自請把身體押在大營，作爲保證。城內的同黨與官兵約定期日攻城，到期官兵不到；再約，官兵又不到。城內的同黨被殺的很多。金和親自

經過圍城中的生活，又痛恨當日官軍的腐敗無能，故他的紀事詩不但很感動人，還有歷史的價值。他的痛定篇（卷二，頁十二—二十）用日記體作詩，寫破城及城中事，我們舉他一首作例：

二月二十三，傳聞大兵至，賊魁似皇皇，終日警三四。南民私相慶，始有再生意。桓桓向將軍，仰若天神貴。一聞賊吹角，即候將軍騎，香欲將軍迎，酒欲將軍饋。食念將軍食，睡說將軍睡。……………七歲兒何知，門外偶嬉戲，公然對路人，說出將軍字。阿姊面死灰，撻之大怒詈。從此望將軍，十日九憔悴。更有健者徒，夜半誓忠義，願遙應將軍，畫策萬全利。分隸賊麾下，使賊不猜忌。尋常行坐處，短刃縛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舉燧。得見將軍面，命即將軍賜。詎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

他的六月初二日紀事一百韻，前面寫向榮剋日出兵，寫先期大饗士卒，將軍行酒誓

師，寫明日之晨準備出戰，共九十幾句，到篇末只說：

……一時驚喜徧旌倪，譬積陰雨看紅霓，……夜不敢寐朝陽躋，……日中縱聽怒馬嘶，但見泛泛如鳧鷖，兵不血刃身不泥，全軍而退歸來兮！

這已是罵的很刻毒了。但下面的一首初五日紀事更妙，我們可以把他全鈔在這裏：

前日之戰未見賊，將軍欲赦赦不得。或語將軍難盡誅，姑使再戰當何如？昨日黃昏忽傳令，謂『不汝誅貸汝命。今夜攻下東北城，城不可下無從生。』三軍拜謝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處。空中烏烏狂風來，沈沈雲陰轟轟雷。將謂士曰雨且至，士謂將曰此可避。回轅十里夜復晴，急見將軍天未明。將軍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聞在楚因天寒，龜手而戰難乎難。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晝賊易知。乃于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

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風雨！

這種嘲諷的詼諧，乃是金和的特別長處。他是全椒吳家的外孫，與儒林外史的著者和儒林外史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點關係，他是表章儒林外史的一個人，故他的詩也很像是得力于儒林外史的嘲諷的本領。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不得已而為之。他的十六日至秣陵關遇赴東壩兵有感一篇云：

初七日未午，我發鍾山下。蜀兵千餘人，向北馳怒馬。傳聞東壩急，兵力守恐寡。來乞將軍援，故以一隊假。我遂從此辭，僕僕走四野。三宿湖熟橋，兩宿龍溪社，四宿方山來，鹽汗搔滿把。借舍偶乘涼，有聲叱震瓦。微睨似相識，長身面甚赭。稍前勸勿瞋，幸不老拳惹。婉詞問何之，乃赴東壩者。九日行至此，將五十里也！

這種技術確能於杜甫白居易的『問題詩』之外，別開一個生面。他有軍前新樂府四篇，我們選他的第四篇，篇名半邊眉：

半邊眉，汝何來？太守門下請錢回。太守門，何處所？鍾山之旁近大府。大府初聞難民苦，公家偏括閒田租，旁郡金檄上戶輸。一心要貸難民命，聘賢太守專其政。太守計曰『費恐濫，百二十錢一人贍。』太守計曰『難民多，一人數請當奈何？我聞古有察眉律。』呼僕持刀對人立，一刀留下半邊眉，再來除是眉長時。——防弊術果奇，作弊術斯巧。豈但無眉人不來，有眉人亦來都少。惟有一二市井姦，賂太守僕二十錢，奏刀不猛眉猶全，半邊眉可三刀焉。否則病夫冀餓殺，癡心尚戀一朝活，拌與半邊眉盡剃。吁嗟乎，……太守何不計之毒？千錢封人耳與目，萬錢截人手與足，終古無人請錢至，太守，豈非大快事？

此外尚有許多可選的詩，我們不能多舉例了。金和的詩很帶有革新的精神，他自己

題他的椒雨集云：

是彥平同日記，不足言詩。如以詩論之，則軍中諸作，語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風，尤非近賢排調之旨。其在今日諸公有是韜鈐，斯吾輩有此翰墨，塵穢略相等，殆亦氣數使然耶？

他又有詩（卷七，頁八）云：

所作雖不純乎純，要之語語皆天眞。時人不能爲，乃謂非古人。

這雖是弔朋友的詩，也很可代表他自己的主張。他在別處又說（卷六，頁三）：

盡數寫六書，只此數萬字。中所不熟習，十復閒三四。循環堆垛之，文章畢能事。苟可聯貫者，古人肯唾棄，而以遺後人，使得逞姸秘？操觚及今日，談亦何容易？乃有眞壯夫，於此獨攘臂；萬卷讀破後，一一勘同異；更從古人前，混沌闢新意；甘使心血枯，百戰不退避。一家言既成，試質瑱嫚地，必有天上語，古人所未至。……彼抱羸疾者，出聲

令人睡。何不指六經，而曰公家器！正因爲他深恨那些『抱殘疾者』，正因爲他要『更從古人前，混沌闢新意』。故他能在這五十年的詩界裏佔一個很高的地位。

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吳文英）派的毒，很少有價值的。故我們不討論了。

（四）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之戰以來，中國經過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戰事，中興的戰爭又很得了西洋人的幫助，中國明白事理的人漸漸承認西洋各國的重要。一八六一年，清廷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八六七年，設同文館。後來又有派學生留學外國的政策。當時的頑固社會還極力反對這種政策，故同文館收不到好學生，派出洋的更不得人。但十九世紀的末年，翻譯的事業漸漸發

達。傳敎士之中，如李提摩太等，得着中國文士的幫助，譯了不少的書。太平天國的文人王韜，在這種事業上，要算一個重要的先鋒了。

但當時的譯書事業的範圍並不甚廣。第一類是宗敎的書，最重要的是新舊約全書的各種譯本。第二類爲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書，當時稱爲『格致』的書。第三類爲歷史政治法制的書，如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法等書。這是很自然的。宗敎書是傳敎士自動的事業。格致書是當日認爲鎗砲兵船的基礎的。歷史法制的書是要使中國人士了解西洋國情的。此外的書籍，如文學的書，如哲學的書，在當時還沒有人注意。這也是很自然的。當日的中國學者總想西洋的鎗砲固然利害，但文藝哲理自然還不如我們這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了。

嚴復與林紓的大功勞在于補救這兩個大缺陷。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

嚴復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在光緒丙申（一八九六），在中日戰爭之後，戊戌變法

之前。他自序說：

……風氣漸通，士知弁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肊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

這是他的卓識。自從天演論出版（一八九八）以後，中國學者方才漸漸知道西洋除了鎗砲兵船之外，還有精到的哲學思想可以供我們的採用。但這是思想史上的事，我們可以不談。

我們在這裏應該討論的是嚴復譯書的文體。天演論有「例言」幾條，中有云：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顚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指，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

……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這些話都是當日的實情。當時自然不便用白話；若用白話，便沒有人讀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適用。所以嚴復譯書的文體，是當日不得已的辦法。我們看吳汝綸的天演論序，更可以明白這種情形：

……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顧，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今赫胥黎之道，……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

嚴復用古文譯書，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紅頂子演說，很能抬高譯書的身價，故能使當

日的古文大家認爲『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

嚴復自己說他的譯書方法道：『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天演論例言）這話也不錯。嚴復的英文與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雖用一種死文字，還能勉强做到一個『達』字。他對於譯書的用心與鄭重，眞可佩服，眞可做我們的模範。他曾舉『導言』一個名詞作例，他先譯『卮言』，夏曾佑改爲『懸談』，吳汝綸又不贊成，最後他自己又改爲『導言』。他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嚴譯的書，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這『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無論用古文白話，都可以成功。後人既無他的工力，又無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譯他一知半解的西書，自然要失敗了。

嚴復譯的書，有幾種——天演論，羣己權界論，羣學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値，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也應該佔一個很高的地位。我們且引一節做例：

望舒東睇，一碧無煙。獨立湖塘，延賞水月；見自彼月之下，至於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閃爍。諦而察之，皆細浪淪漪，受月光映發而爲此也。徘徊數武，是光景者乃若隨人。頗有明理士夫，謂此光景爲實有物，故能相隨，且亦有時以此自詡；不悟是光景者從人而有；使無見者，則亦無光，更無光景與人相逐。蓋全湖水面受月映發，一切平等；特人目與水對待不同，明闇遂別，——不得以所未見，遂指爲無——是故雖所見者爲一道光芒，他所不爾，又人目易位，前之闇者，乃今更明，然此種種，無非妄見。以言其實，則由人目與月作二線入水，成角等者，皆嘗見光；其不等者，則全成闇。（成角等與不等，稍有可議，原文亦不如此說。）惟人之察羣事也，亦然：往往以見所及者爲有，以所不及者爲無。執見否以定有無，則其思之所不賅者衆矣。（羣學肄言三版，頁七二—三。原書頁八三。）

這種文字，以文章論，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內容論，又遠勝那無數『言之無物』的古文：怪不得嚴譯的書風行二十年了。

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林紓早年譯的小說，如茶花女，黑奴籲天錄，滑鐵廬及利俾瑟戰血餘腥記，……恰不在手頭，不能引來作例。我且隨便引幾個例。拊掌錄（頁一九以下）寫村中先生有一個學唱歌的女學生，名凱脫里納，為村中大戶之孤生女，

其肥如竹雞，雙頰之紅鮮如其父園中之桃實，貌既豐腴，產尤饒沃。……先生每對女郎輒心醉，今見絕色麗姝，安能不加顛倒？且經行其家，目其巨產矣。女郎之父曰包而忒司，……屋居黑逞河次，依山傍樹而構，青綠照眼。屋頂出大樹，蔭滿其堂室，陽光所不能爍，樹根有山

泉滃然仰出，盡日弗窮。老農引水赴溝渠中，渠廣而柳樹四合，覺似伏流，汩汩出樹而逝。去室咫尺，即其倉庚，糧積擁臃，幾欲潰窗而出。老農所積如是，而打稻之聲尚不斷于耳。屋簷羣燕飛鳴；尚有白鴿無數，——有側目視空者，亦有納首於翼，企單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頸呼唯者，——咸仰陽集于屋頂。而肥腯之猪，伸足笠中，作喘聲，似自鳴其足食；而笠中忽逐隊出小豭，仰鼻于天，承取空氣。池中白鵝，橫亙如水師大隊之戰艦排檣而進，而羣鴨遊弋，則獵艦也。火雞亦作聯隊，雜他雞鳴于稻畦中，如饒舌之村嫗長日詈人者。倉庚之前，數雄雞高冠長緯，鼓翼而前，頸羽皆豎，以鬬其侶；有時以爪爬沙得小蟲，則抗聲引其所據有之母雞啄食，已則側目旁視；他雄稍前，則立拒之。先生觸目見其豐饒，涎出諸吻。見猪奔竄，則先生目中已現一炙髁；聞稻香，則心中亦畜一布丁；見鴿子，則思切而苞爲蒸餅之餡；見乳鴨與鵝游流水

中，先生饑吻則思嘗之以沸湍。又覩田中大小二麥及珍珠米，園中已熟之果，紅實垂垂，尤極動人。先生覩狀，益延盼于女郎，以爲得女郎者，則萬物俱在囊中有矣。……

滑稽外史第四十一章寫尼古拉司在白老地家中和白老地夫婦暢談時，司圭爾先生和他的女兒番尼，兒子瓦克福，忽然闖進來。白老地的妻子與番尼口角不休，

方二女爭時，小瓦克福見案上陳食物無數，饞不可忍，徐徐近案前，引指染盤上脂膩，入指口中，力吮之；更折麵包之角，竊蘸牛油嚼之；復取小方糖納之囊中，則引首仰屋，如有所思，而手已就糖盂累取可數方矣。及見無人顧覷，則膽力立壯，引刀切肉食之。

此狀司圭爾先生均歷歷見之，然見他人無覺，則亦僞爲未見，竊以其子能自圖食，亦復佳事。此時番尼語止，司圭爾知其子所爲將爲人見，則僞爲大怒狀，力批其頰，曰，『汝乃甘食他人之食！彼將投毒酖爾

矣。爾私產之見，何無恥耶！』約翰（白老地）曰，『無傷，恣彼食之。但願先生高徒能合衆食我之食令飽，我卽罄囊，亦非所惜。』……

（頁百十一）

能讀原書的自然總覺得這種譯法不很滿意。但平心而論，林譯的小說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他對于原書的詼諧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故他對于這種地方，往往更用氣力，更見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讀原文；但他究竟是一個有點文學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往往比現在許多粗能讀原文的人高的多。現在有許多人對于原書，既不能完全了解；他們運用白話的能力又遠不如林紓運用古文的能力，他們也要批評林譯的書，那就未免太冤枉他了。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

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

但這種成績終歸于失敗！這實在不是林紓一般人的錯處，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我是用古文譯過小說的人，故敢說這話。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夠供少數人的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我且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十幾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我且引安樂王子的一部分作例：

一夜，有小燕翻飛入城。四十日前，其伴已往埃及，彼愛一葦，獨留不去。一日春時，方逐黃色巨蛾，飛經水次，與葦邂逅，愛其纖腰，止與問訊，便曰，『吾愛君可乎？』葦無語，惟一折腰。燕隨繞葦而飛，以翼擊水，漣起作銀色，以相溫存，盡此長夏。

他燕嘲哳相語曰，『是良可笑。女絕無貲，且親屬衆也。』燕言殊當，川中固皆葦也。

未幾秋至，衆各飛去。燕失伴，漸覺孤寂，且勌於愛，曰，『女不能言，且吾懼彼佻巧，恆與風醻對也。』是誠然，每當風起，葦輒宛轉頂禮。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則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問之曰，『若能偕吾行乎？』葦搖首，殊愛其故園也。燕曰，『若負我矣。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別矣！』遂飛而去。

這種文字，以譯書論，以文章論，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册！這一件故事應該使我們覺悟了。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達，雅』三個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說，——但所得終不償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後的失敗。

（五）

中日之戰以後，明白時勢的人都知道中國有改革的必要。這種覺悟產生了一種文學，可叫做『時務的文章』。那時代先後出的幾種『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湯壽潛的，——文章與內容都很可以代表這個時代的趨勢。到一九八七年，德國強佔了膠州，人心更激昂了；那時清光緒帝也被時局感動了，於是有『戊戌變法』（一八九八）的運動。這個變法運動在當日的勢力頗大，中央政府和各省都有贊助的人。但頑固的反動力終久戰勝了，於是有戊戌的『政變』。變法黨的領袖是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等。譚嗣同與同志五人死于政變，但他的著述，在他死後仍舊發生不少的影響。康有爲是『今文家』的一個重要代表，他的新學僞經攷與孔子改制攷等書，在這五十年的思想史上，自有他們的相當位置。他的文章雖不如他的詩，但當他『公車上書』以至他亡命海外的時代，他的文章也頗有一點勢力，不過

他的勢力遠不如梁啓超的勢力的遠大了。梁啓超當他辦時務報的時代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

嚴復林紓是桐城的嫡派，譚嗣同康有爲梁啓超都是桐城的變種。譚嗣同的三十自紀（文集中）說：

> 嗣同少頗爲桐城所震，刻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爲似矣；出示人，亦以爲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墫壹之士，稍稍自慚，即又無以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嗜之。由是上泝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子雲所以獨遼遼焉。舊所爲，遂棄殆盡。……昔侯方域少喜駢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既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則存乎深觀者。

梁啟超自述也說：

>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指辦新民叢報時）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

這是梁氏四十八歲的自述，沒有他三十自述說的詳細：

> 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研鑽。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于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者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

裏，讀之卒業焉。……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肄業於學海堂，……乃決舍帖括以從事于訓詁詞章。……

此一段可補前一段『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話。譚嗣同與梁啓超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的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復古的時代，都曾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沈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啓超說的『筆鋒常帶情感』。

譚嗣同的仁學，在思想方面固然可算是一種大胆的作品，在文學方面也有代表時代的價值。我們引一節作例：

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

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覺消膚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本爲不生不滅，烏從生之滅之？譬如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爲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爲水，無少減也。譬如燭久爇則盡跋，非燭滅也，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合之炭氣，所然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還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還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刪去一排兩個譬喻）……譬於陵谷滄桑之變易：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淤，

知崖岸之將有傾頹；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將就掄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即南北極之所翕斂也；火期之炎，氷期之冱，即一氣之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于昔時；有之，則畸重而去日遠，畸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如流星隕石之變；恆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彗孛有循橢圓線而往可復返，有循拋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割裂，即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體，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仁學

上，頁十三。）

這一節不但材料可以代表當時的科學知識，他的體例也可以代表當時與二十年來的「新文體」。譚嗣同自己說的駢文的體例與氣息，在這裏也可以看得出來。但我們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不能不承認這種文體雖說是得力於駢文，其實也得力於八股文。古代的駢文沒有這樣奔放的體例，只有八股文裏的好「長比」有這種氣息。（上例中，水與燭一比及陶埴與餅餌一比，最可玩味。）故嚴格說來，這一種文體很可以說是八股文經過一種大解放，變化出來的。

說這種文體是受了八股文的影響的，這句話也許有人不願意聽。其實這句話不全是貶辭。清代的大文家章學誠作古文往往不避駢偶的長排；他曾說：

> 嗟夫，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彼

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嘗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與史餘村書）

此說最有理。文中雜用駢偶的句子，未必即是毛病。當日人人做八股，受了一種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事。其實這一派的長處就在他們能夠打破那「一執而不化」的狹義古文觀，就在他們能夠運用古文時文儒書佛書的句調來做文章。這個趨勢，到了梁啟超，更完備了。

梁啟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也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很多，舉例也很難。我且舉他的新民說第十一篇論進步的一節：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

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腸盪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弄舌搖筆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對也。嗚呼，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言哉？

我再舉一個例：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這兩個例很可以表示梁啓超自己說的『筆鋒常帶情感』的文體。前一例可以表示這種文字的好的方面；後一例可以表示這種文字的壞的方面。更惡劣的如：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譆譆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于大革命！

但這種文字在當日確有很大的魔力。這種魔力的原因約有幾種：(1)文體的解

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2）條理的分明，梁啓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3）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倣；（4）富於刺激性，『筆鋒常帶情感』。

梁啓超中年的文章，國風報庸言報時代的文章，把早年文章的毛病漸漸的減少了；漸漸的回到清淡明顯的文章。但學他的文章的人，往往學了他的堆砌，他的排比。在記敍的文章內，這種惡劣之處更容易呈顯出來。前七八年流行一時的玉梨魂一類的小說，便是這種文體用來敍事的結果了。

（六）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許多人抱着改革文學的志願。他們在散文方面的成績只是把古文變淺近了，把應用的範圍也更推廣了。在韻文的方面，他們也曾有『詩界革命』的志願。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說：

> 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爲夏穗卿（曾佑）。而復生（譚嗣同）亦綦嗜之。……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Caste），法會盛於巴力門（Parliament）。』……穗卿贈余詩云，『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當時吾輩方沈醉于宗教，……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

這種革命的失敗，自不消說。但當時他們的朋友之中確有幾個人在詩界上放一點新光彩。黃遵憲與康有爲兩個人的成績最大。但這兩人之中，黃遵憲是一個有意作新詩的，故我們單舉他來代表這一個時期。

黃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生于一八四八，死于一九〇五，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他做過三十年的外交官，到過日本，英國，美國，南洋等處。他曾著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當戊戌的變法，他也是這運動中的一個人物。他對于詩界革命的

動機，似乎起的很早。他二十多歲時作的詩之中，有雜感五篇，其二云：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爇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

這種話很可以算是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張用俗話作詩了。他那個時代作的詩，還有山歌九首，全是白話的。內中如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為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催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

鷄。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着中心只說『郎』。

都是民歌的上品。他自序云：

土俗好爲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採其能筆于書者，得數首。

我常想黃遵憲當那麼早的時代何以能有那種大胆的『我手寫我口』的主張？我讀了他的山歌的自序，又讀了他五十歲時的己亥雜詩中敘述嘉應州民族生俗的詩和詩注，我便推想他少年時代必定受了他本鄉的平民文學的影響。己亥雜詩中有一首云：

一聲聲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懽是團圓悲是別，總應腸斷妃呼豨。

他自注云：

土人舊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辭，當係獠蛋遺俗。今松口松源各鄉尙相沿不改。每一辭畢，輒間以無辭之聲，正如妃呼豨，甚哀厲而長。

他對于這種民間文學的興趣，可以使我們推想他受他們的影響定必不少。故他在日本時，看見西京民間風俗：『七月十五夜至晦日，每夜亘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靚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詞，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他就能賞識這種平民文學，說『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之董逃行也。』他因此作成一篇都踊歌：

長袖飄飄兮，髻峨峨，荷荷；
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
分行逐隊兮，舞傞傞，荷荷；
往復還分，如擲梭，荷荷；
回黃轉綠兮，挼莎，荷荷。

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
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蝶，荷荷；
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
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
鷄眠貓睡兮，犬不呵，荷荷，
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
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
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
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
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
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
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

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

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原刻此詩不分行。分行更好。）

這固是爲西京的風俗作的，但他對于這種民間白話文學的賞識力，大概還是他本鄉的山歌的影響。都踊歌每一句的尾聲『荷荷』，正和嘉應州山歌『每一辭畢，輒間以無辭之聲，甚哀厲而長』，是相像的。我們可以說，他早年受了本鄉山歌的感化力，故能賞識民間白話文學的好處；因爲他能賞識民間的白話文學，故他能說『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他自己曾說（此據他的兄弟遵楷跋中引語）：

各人有面目，正不必與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取騷選樂府歌行之神理入近體詩。其取材以羣經三史諸子百家及許鄭諸註爲詞賦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舉吾耳目所親歷者，皆筆而書之。要不失爲以我之手寫我之

口。

這幾句話說他的詩，都很確當。但他在『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的方面，成績最大。我們且舉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有長序，當參讀）的末節：

……臣等事畢無所求，願從先君地下游。……明年賜劍如杜郵，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時驚歎爭歌謳。觀者，拜者，弔者，賀者，萬花繞塚，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畫，手澤珍寶如天球！自從天孫開國首重天瓊鉾，和魂一傳千千秋。況復五百年來武門尚武國多賁儔！到今赤穗義士某某某某四十七八一一名字留！內足光輝大八州，外亦聲明五大洲。

此外如他的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聶將軍歌，逐客篇，番客篇，……都是用做文章的法子來做的。這種詩的長處在於條理清楚，敘述分明。做詩與做文都應該從這一點下手：先做到一個『通』字，然後可希望做到一個『好』字。古來的大家，沒

有一個不是這樣的；古來決沒有一首不通的好詩，也沒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詩。金和與黃遵憲的詩的好處就在他們都是先求『通』，先求達意，先求懂得。

黃遵憲頗想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來做當日所謂新詩。他的今別離四篇，便是這一類。我且引他的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的末段來作例：

……卽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摶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這種『新詩』，用舊風格寫極淺近的新意思，可以代表當日的一個趨向，但平心說，這種詩並不算得好詩。今別離在當時受大家的恭維，現在看來，實在平常的

很，淺薄的很。

人境廬詩鈔中最好的詩，自然還要算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篇。此詩能實行他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主張。內中一段云：

……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諸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顧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相貌，豐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腳，偸李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噀血噴滿壁，盤礴畫龍蛇。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附我耳，婆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見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挲：「此兒生屬

猴，聰明較猴多。雛雞比老雞，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着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豬雞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飄。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子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

這個時代之中，我只舉了金和黃遵憲兩個詩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有點特別的個性，故與那一班模倣的詩人，雕琢的詩人，大不相同。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於「宋詩運動」。宋詩的特別性質，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詩如說話。北宋的大詩人還不能完全脫離楊億一派的惡習氣；黃庭堅一派雖然也有好詩，但他們喜歡掉書袋，往往有極惡劣的古典詩。（如云「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

南宋的大家—楊陸范，—方才完全脫離這種惡習氣，方才貫徹這個『做詩如說話』的趨勢。但後來所謂『江西詩派』，不肯承接這個正當的趨勢（范陸楊尤都從江西詩派的會變出來），却去模倣那變化未完成的黃庭堅，所以走錯了路，跑不出來了。近代學宋詩的人，也都犯這個毛病。陳三立是近代宋詩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詩裏實在很少可以獨立的詩。近代的作家之中，鄭孝胥雖然也不脫模倣性，但他的魄力大些，故還不全是模倣。他曾有詩贈陳三立，中有『安能抹青紅，搔頭而弄姿？』之句。其實他自己有時還近這種境界，陳三立却做不到這個地步。鄭孝胥作陳三立的詩集的序，曾說：

> 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淸切爲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然余竊疑詩之爲道，殆有未能以淸切限之者。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于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于辭；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淸也。思之來也無端，則

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與之發也匪定，則儵忽無見，惝怳無聞者，惡能責以有說？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

他這篇序雖然表面上是替江西詩派辯護，其實是指出江西詩派的短處。他自己的詩並不實行這個「不清不切」的主張，故還可以讀。他後來有答樊增祥的詩，自己取消這種議論：

嘗序伯嚴（陳三立）詩，持論闢清切。自嫌誤後生，流浪或失實。君詩妙易解，經史氣四溢。詩中見其人，風趣乃雋絕。淺語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會心可意言，卽此意已達。

樊增祥的詩，比較的最聰明，最清切，可惜沒有內容，也算不得大家。此外還有許多人，努力模倣古人，努力作詩匠。但他們志在『作古』，我們也不敢把他們委屈在這五十年之內了。

（七）

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眞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論文，很多精到的話。他的文學總略（國故論衡中）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

『文』論，說『文者，包諸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爲言』。他承認文是起于應用的，是一種代言的工具；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並無根本的區別。至於『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和『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的區別，更不能成立了。這種見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實很有關係。有許多人只爲打不破這種種因襲的區別，故有『應用文』與『美文』的分別；有些人覺說『美文』可以不注重內容；有的人覺說『美文』自成一種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東西，不受常識與論理的裁制！章炳麟說：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爲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爲上。……知文辭始于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

又說：

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說。……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

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縕愉者，聞勞人之歌，必猶怕然。大患不靈，無所憤悱者，覩妙論則以爲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槩隨之矣。必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

他是能實行不分文辭與學說的人，故他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他並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漢微言有一段說：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爲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侻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頁六八）

但他自己論文，却主張回到魏晉。他說：

> 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國故論衡中，論式，頁九四）

為什麼呢？因為

> 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頁九二）

故他以為

> 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于滑澤者。（頁九三）

他又說：

> 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彊鉗；肆而不

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頁九五）

又說：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同頁）

『必先豫之以學』六個字，談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並非因為他模倣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國故論衡裏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見，原道，明解故上，語言緣起說，……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裏上品的文章。檢論裏也有許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眞是近代難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個復古的文家。他的復古主義雖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種反背時勢的運動。他論文辭，知道文辭始于表譜簿錄，是應用的；但他的文章應用的成績比較最少。他對于同時的文人都有點薄鄙的意思（看文錄二，與鄧實書及與人

論文書〕。他自命『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認『王闓運能盡雅』。有人問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闓運做文章的法子來救人。什麽法子呢？原來是先把意思寫成平常的文章，然後把虛字儘量刪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歡用古字來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說，

> 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爲多。舍借用真，茲爲復始。
>
> （檢論五，正名雜義，頁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約定俗成謂之宜』的話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這種『復始』的工夫雖然增加了古氣古色，同時便減少了應用的程度。他自己著書，本來有句讀，還可以幫助一般讀者的了解。後來他的門人校刻他的全書，以爲圈讀不古，刪去句讀，就更難讀了。他知道文辭以『存質』爲本，他曾說：『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篤』；他痛恨那班

> 庸妄賓僚，謬施塗塈，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

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雜義頁一四）

但他那篇訂文（正名雜義乃訂文的附錄）中有句云：『後之林烝，知孟晉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晉』代求進步，還說得過去；『林烝』二字，比他舉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章炳麟論韻文，也是一個極端的復古派。他說古今韻文的變遷，頗有歷史的眼

元。他說：

吟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國故論衡中，辨詩，頁九九）

這是很不錯的歷史見解。根據于這個『數極而遷』的觀念，他指出三百篇爲四言詩的極盛時期；到了漢以下，『四言之勢盡矣』，故束晳等的四言詩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詞）』。他論近代的詩，也很不錯：

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尨奇愈甚。考徵之士，覩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于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爲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騖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爲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這種議論的自然結果應該是一種很激烈的文學革命了。誰知他下文一轉便道：

> 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自注：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學，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矣。

這種極端的復古論，和他的文學史觀，實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詩之勢已盡於漢末而五言詩之勢已盡於唐初，如果詩之勢已盡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說的『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了，難道他們還能復興于今日嗎？那『數極而遷』的文學，難道還可以恢復嗎？

但他不顧這個矛盾，還想恢復那『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的詩體。他的韻文（文錄二，頁八六以下）全是復古的文學。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襪，長跪著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回頭問主人，主人甫驚絕。乞君一兩鎊，便向籠間掇。籠間何所有？四顧吐長舌。

甲第夫如何？繩蔑相鉤帶，虎落穿方竇，空小門不大。挨項出門去，恣情逐巖瀨。三步復五步，京市亦迢遥。時復得町畦，雲中聞犬吠。策杖尋其聲，潛獻方高會。『陛下千萬歲！世世從臺隸！』

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强抵銷那模倣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張，如董逃歌，若沒有那篇長序，便眞是『與杯珓讖辭相等』了。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來方才敢猜這詩大概是爲劉師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無遠，讒夫旣爽。何以漱浣？其穢其壯。越畹望之，度畦鄉之。

不見廣陵，蓬萊障之。

樓之集矣，不宿乾鵲。民之學矣，如狙如攫。知我之好，匪伊朝夕。

爾雖我到，我心則懌。

這種詩使我們聯想到易林，易林是漢朝的一種『杯珓讖辭』。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杯珓讖辭』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後的『杯珓讖辭』。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八）

當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以後，中國革命的運動一天一天的增加勢力。同時的君主立憲運動也漸漸的成爲一種正式的運動。這兩黨的主張時常發生衝突。新民叢報那時已變成君主立憲的機關了，故時時同革命的民報做很激烈的筆戰。這種筆戰在中國的政論文學史上很有一點良好的影響，因爲從此以後，梁啓超早年提倡出來的那種『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適用了。帖括式的條理不能不讓位給法律家的論理了。筆鋒的情感不能不讓位給紙背的學理了。梁啓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變了；國風與庸言裏的梁啓超已不是新民叢報第一二年的梁啓超了。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這十年是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這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釗。章士釗曾著有一部中國文法書，又曾研究論理學；他的文章的長處在於文法謹嚴，論理完足。他從桐城派出來，又受了嚴復的影響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響。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啓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復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

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倣嚴復。嚴復還是用古文譯書，章士釗就有點傾向「歐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歐化，只任把古文變精密了，變繁複了；使古文能勉強直接譯西洋書而不消用原意來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達繁複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剝的外國文法。

章士釗的文章，散見各報；但他辦甲寅時（一九一四——一九一五）的文章，更有精采了，故我們只引這個時代的文章來做例。他先著學理上之聯邦論，中有云：

>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爲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爲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烏於此，吾見九烏皆黑；餘一烏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于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于九國，而未必卽宜于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

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不敢苟同。……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眞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于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甲寅，一，五）

他的意思要說『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後來有人駁他，說他的方法是極端的演繹法。章士釗作論答他（聯邦論，答潘君力山），中有一段云：

物理之稱爲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眞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可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古無從說起。……是故範爲定理，不得不有賴于『希卜梯西』

(Hypothesis)焉。希卜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爲如是如是者，皆得謂爲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爲演繹，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證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

(甲寅，一，七)

第二次答復(甲寅一，一九)又說：

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即爲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若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嘗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即覺，事後始爲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

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爲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盡量出之，恣吾覽觀，方自幸之不暇，而又何疑焉？

羅家倫在他的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一篇（新潮，二，五）裏，曾說章士釗的文章『可謂集「邏輯文學」的大成了』。他又說，『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卽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頁八七三）這個論斷是很不錯的。我上文引的幾段，很可以說明這種『邏輯文學』的性質。

章士釗同時的政論家——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等，——都朝着這個趨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覺的造成一種修飾的，謹嚴的，邏輯的，有時不免掉書袋的政論文學。但是這種文章，在當日實在沒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費氣力；讀的人也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得懂。因此，這種文章的讀者仍舊只限於極少

歡商人。當他們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徠士，來討論中國的政治法律的問題的時候，梁士詒楊度孫毓筠們早已把憲法踏在脚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裏，把中華民國的國體完全變換過了！洪憲的帝制雖不長久，洪憲的餘毒至今還在，而當日的許多政論機關都烟銷雲散了。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以後，國中幾乎沒有一個政論機關，也沒有一個政論家；連那些日報上的時評也都退到紙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這種政論文學的忽然消滅，我至今還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甲寅最後一期裏有黃遠庸寫給章士釗的兩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個政論大家的最後懺悔。他說：

遠本無術學，濫厠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今無一不爲懺悔之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窮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如足下所謂存其在我者，即

得爲末等人，亦勝於今之一等脚色矣。

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甲寅一，十）

這封信，前半爲懺悔，後半爲覺悟。當日的政論家苦心苦口，確有很可佩服的地方。但他們的大缺點只在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這一句話不但可以批評他們的『白芝浩—戴雪—哈蒲浩—蒲徠士』的內容，也可以批評他們的精心結構的政論古文。黃遠庸的聰明先已見到這一點了，所以他懸想將來的根本救濟當從提倡新文學下手，要用淺近文藝普遍四周，要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來。章士釗答書還不贊成這種話，他說『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庋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

藝其一端也。』黃遠庸那年到了美國，不幸被人暗殺了，他的志願毫無成就；但他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他若在時，他一定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同志，正如他同時的許多政論家之中的幾個已做新文學運動的同志了。

（九）

以上七節說的是這五十年的中國古文學。古文學的公同缺點就是不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大凡文學有兩個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現著作人的性情見解，有人就是要與一般的人發生交涉。那無數的模倣派的古文學，既沒有我，又沒有人，故不值得提起。我們在這七節裏提起的一些古文學代表，雖沒有人，却還有點我，故還能在文學史上占一個地位。但他們究竟因爲不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來，故仍舊是少數人的貴族文學，仍舊免不了『死文學』或『半死文學』的評判。

現在我們要談這五十年的『活文學』了。活文學自然要在白話作品裏去找。這五十年的白話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說。直到近五年內，方才有他類的白話作品出現。我們先說五十年內白話小說，然後討論近年的新文學。

這五十年內的白話小說出的真不在少數！為討論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他們分作南北兩組：北方的評話小說，南方的諷刺小說。北方的評話小說可以算是民間的文學，他的性質偏向為人的方面，能使無數平民聽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書的人多半沒有什麼深刻的見解，也沒有什麼濃摯的經驗。他們有口才，有技術，但沒有學問。他們的小說，確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了，可惜沒有我，所以只能成一種平民的消閑文學。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書，屬於這一類。南方的諷刺小說便不同了。他們的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經驗的文人。他們的小說，在語言的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說那樣漂亮活動；這大概是因為南方人學用北部語言做書的困難。但思想見解的方面，南方的幾部重要小說

都含有諷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旣能爲人，又能有我。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恨海，廣陵潮，……都屬于這一類。（南方也有消閑的小說，如九尾龜等。）

我們先說北方的評話小說。評話小說自宋以來，七八百年，沒有斷絕。有時民間的一種評話遇着了一個文學大家，加上了前裁修飾，使一跳升做第一流的小說了（如水滸傳）。但大多數的評話——如楊家將薛家將之類，——始終不曾脫離很幼稚的時代。明清兩朝是小說最發達的時期，內中確有好幾部第一流的文學。有了這些好小說做敎師，做模範本，所以民間的評話也漸漸的成個樣子了，漸漸的可讀了。因此，這五十年的評話小說，可以代表評話小說進步最高的時期。當同治末年光緒初年之間，出了一部兒女英雄傳評話。此書前有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都是假託的。雍正年的序內提起紅樓夢，不知紅樓夢乃是乾隆中年的作品！故我們據光緒戊寅（一八七八）馬從善的序，定爲清宰相勒保之孫文康（字鐵仙）做的。

文康晚年窮困無聊，作此書消遣。序中說『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可知文康死于同治光緒之際，故我們定此書爲近五十年前的作品。七俠五義初名三俠五義，又名忠烈俠義傳，今本有俞樾的序，說曾聽見潘祖蔭稱贊此書，『雖近時新出而頗可觀』。俞序作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故定爲五十年中的作品。此書原著者爲石玉崑，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動的本子，原本已不可見了。石玉崑的事蹟不可考，大概是當日的一個評話大家。又有小五義一部，刻于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續小五義一部，刻于同年的冬間。此二書據說也都是石玉崑的原稿，從他的門徒處得來的。續小五義初刻本，尙有潘祖蔭的小序，說他捐俸餘三十金幫助刻板。這也可見當日的一種風氣了。續小五義之後，近年來又出了無數的續集，此外還有許多『公案』派的評話，但價值更低，我們不談了。

兒女英雄傳的著者雖是一個八旗世家，做過道台，放過駐藏大臣，但他究竟是一個迂陋的學究，沒有見解，沒有學問。這部書可以代表那『儒教化了的』八旗世

家的心理。儒家的禮教本是古代貴族的禮教，不配給平民試行的。滿洲人入關以後，處處模倣中國文化，故宗室八旗的貴族居然承受了許多繁縟的禮節。我們讀紅樓夢，便可以看見賈府雖是淫亂腐敗，但表面上的家庭禮儀卻是非常嚴厲。一個賈政便是儒教的絕好產兒。兒女英雄傳更迂腐了。書裏的安氏父子，何玉鳳，張金鳳，都是迂氣的結晶。何玉鳳在能仁寺殺人救人的時節，忽然想起『男女授受不親』的聖訓來了！安老爺在家中提到強盜的時候，忽然想起『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來了！至于書中最得意的部分——安老爺勸何玉鳳嫁人一段——更是迂不可當的綱常大義。我們可以說，兒女英雄傳的思想見解是沒有價值的。他的價值全在語言的漂亮俏皮，詼諧有味。旗人最會說話；前有紅樓夢，後有此書，都是絕好的記錄。兒女英雄傳有意模倣評話的口氣，插入許多『說書人打岔』的話，有時頗討厭，但有時很多詼諧的意味。例如能仁寺的兇僧舉刀要殺安公子時，忽然一個彈子飛來，他把身一蹲。

誰想他的身子蹿得快，那白光來得更快，噗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咯噔的一聲，這纔站住了……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喲一聲，往後便倒。噹啷啷，手裏的刀子也扔了。

那時三兒在旁邊，正獃獃的望着公子的胸膛子，要看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準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啵？』纔一轉身，毛着腰，要把那銅鏇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是照前噗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打了個過膛兒，從右耳朵眼兒裏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撻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裏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鏜—

把個銅鏇子扔了，——叻噹——也窩在那裏了。那銅鏇子裏的水潑了一台堦，

子。那鏇子唏啷花啷一陣亂响，便滾下台堦去了。（第六回）

這種描寫法，雖然不合事實，却很有詼諧趣味；這種詼諧趣味乃是北方評話小說的一種特別風味。

七俠五義也沒有什麼思想見地。他是學水滸的；但水滸對于強盜，對于官吏，都有一種大胆的見解；七俠五義也恨貪官，也恨強盜，——這是北方中國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來用『御鍘三刀』和『杏花雨』的苛刑來除掉那些贓官汚吏；只希望有俠義的英雄出來，個個投在清官門下做四品護衛或五品護衛，幫着國家除暴安良。這是這些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公同見解。但七俠五義描寫人物的技術却是不壞；雖比不上水滸傳，却也很有點個性的描寫。他寫白玉堂的氣小，蔣平的聰明，歐陽春的鎮靜，智化的精細，艾虎的活潑，都很有個性的區別。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寫白玉堂結交顏查散一節，又痛快，又滑稽，是書中很精采的文

字。書中有時也有很感慨的話，如第八十回寫智化假裝逃荒的，混入皇城作工的第一天，

按名點進，到了御河，大家按擋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傍邊做活的道，『王第二的，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傍邊人道，『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你要這麼做，還能吃的長嗎？』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傍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

這種好文章，可惜不多見；不然，七俠五義眞成了第一流的小說了。

小五義與續小五義有許多不通的回目，中間又有許多不通的詩，大不如七俠五義。究竟這種幼稚的本子是石玉崑的原本呢？或者，那乾淨的七俠五義大體代表石玉崑的原本而小五義以下是假託的呢？那就不容易決定了。小五義以下精采甚少，

只有一個徐良，寫的還有趣。我們不舉例了。

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學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初刻于乾隆時，後來雖有翻刻本，但太平天國亂後，這部書的傳本漸漸少了。亂平以後，蘇州有活字本，申報的初年有鉛字排本，附有金和的跋語，及天目山樵評語。自此以後，儒林外史的通行遂多了。但這部書是一種諷刺小說，頗帶一點寫實主義的技術，既沒有神怪的話，又很少英雄兒女的話；況且書裏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談什麼『舉業』『選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說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廣，但這部書在文人社會裏的魔力可真不少！一來呢，這是一種創體，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二來呢，儒林外史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話，最普通，最適用。三來呢，儒林外史沒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拆開來，每段自成一篇；鬥攏來，可長至無窮。這個體裁最容易學，又最方便。因此，

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小說體就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

我們先說李伯元（常州人，事蹟未詳）的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先後共出了六十卷，全是無數不連貫的短篇紀事連綴起來的。全書的體例與方法，最近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罵的是儒生，官場現形記罵的是官場；儒林外史裏還有幾個好人，官場現形記裏簡直沒有一個好官。著者自己說，他那部書是一部做官教科書，

> 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後半部方是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如今把這後半部燒了，只騰得前半部；光有這前半部，不像本教科書，倒像部封神榜西遊記，妖魔鬼怪一齊都有。
>
> （第六十卷）

其實當時官場的腐敗已到了極點，這種材料遍地皆是，不過等到李伯元方才有這一部窮形盡相的大清官國活動寫眞出現，替中國制度史留下無數絕好的材料。這部書的初集有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論官的制度：

……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

限資之例，始于漢代。……開捐納之先路，導輸助之濫觴。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直是欺人之談！……乃至行博弈之道，擲為孤注，操販鬻之行，居為奇貨。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于今，變本加厲；凶年饑饉，旱乾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不至充塞宇宙不止！……

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有語其後者，刑罰出之；有詰其旁者，拘繫隨之。……於是官之氣愈張，官之燄愈烈。羊狠狼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為者，

而官爲之。……國衰而官强，國貧而官富；孝弟忠信之舊，敗于官之身；禮義廉恥之遺，壞於官之手。而官之所以爲人詬病，爲人輕褻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官場現形記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覺官是世間最可惡又最下賤的東西。如卷四寫黃道台的門房戴升鼻子裏哼的冷笑一聲，說：

等着罷，我是早把鋪蓋捲好等着的了。想想做官的人也眞是作孽。你瞧他升了官，一個樣子；今兒參掉官，又是一個樣子。不比我們當家人的，辭了東家，還有西家，一樣吃他媽的飯。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逃不到那裏去的！

又如卷八陶子堯對着堂子裏的娘姨說他的官運，他說：

我們做官的人，說不定今天在這裏，明天就在那裏，自己是不能作主的。

新嫂嫂說：

難末大人做官格身體，搭子『討人身體』差勿多哉……堂子裏格小姐……賣撥勒人家，或者是押帳，有仔管頭，自家做勿動主，才叫做『討人身體』格。耐篤做官人，自家做勿動主，阿是一樣格？

陶子堯道：

你這人眞是瞎來來—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又不是賣身，同你們堂子裏一個買進一個賣出，眞正天懸地隔。

不過這個區別實在很微細。卷十四寫江山船上的一個妓女龍珠對周老爺說：

我十五歲上跟着我娘到過上海一趟，人家都叫我淸倌人，我肚裏好笑。我想我們的淸倌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

去年八月裏江山縣錢太老爺在江頭僱了我們的船，同了太太去上任。聽說這錢太老爺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幾年，窮的了不得，連什麼都當

了。好容易纔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個太太，兩個少爺，九個小姐。大少爺已經三十多歲，還沒有娶媳婦。從杭州動身的時候，一家門的行李不上五擔，箱子都很輕的。到了今年八月裏，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十幾隻，別的還不算。上任的時候，太太戴的是鍍金的簪子；等到走，連那小少爺的奶媽，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錢太老爺走的那一天，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不要錢，所以人家纔肯送他這些東西。我肚皮裏好笑，老爺不要錢，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呢？……瞞得過我嗎？做官的人，得了錢，自己還要說是清官，同我們吃了這碗飯一定要說是清倌人，豈不是一樣的嗎？

周老爺聽了他的話，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倒反朝着他笑；歇了半天，纔說得一句「你比方的不錯」。

李伯元除了官場現形記之外，還有一部文明小史，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

吳沃堯，字趼人，是廣東南海的佛山人，故自稱『我佛山人』。當梁啓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時，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以下省稱『怪現狀』）的第一部分就在新小說上發表。那個時候，——光緒癸卯甲辰（一九〇三—四）——大家已漸漸的承認小說的重要，故梁啓超辦了新小說雜誌，商務印書館也辦了一個繡像小說雜誌，不久又有小說林出現。文人創作小說也漸漸的多了。怪現狀，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都是這個時代出來的。怪現狀也是一部諷刺小說，內容也是批評家庭社會的黑幕。但吳沃堯曾經受過西洋小說的影響，故不甘心做那沒有結構的雜湊小說。他的小說都有點布局，都有點組織。這是他勝過同時一班作家之處。怪現狀的體例還是散漫的，還含有無數短篇故事；但全書有個『我』做主人，用這個『我』的事蹟做布局綱領，一切短篇故事都變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見或聽見的怪

現狀。即此一端，便與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不同了。

但怪現狀還是儒林外史的產兒；有許多故事還是勉强穿插進去的。後來吳沃堯做小說的技術進步了，他的恨海與九命奇冤便都成了有結構有布局的新體小說。恨海寫的是婚姻問題。一個廣東的京官陳戩臨有兩個兒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張家的女兒棣華；小的仲藹，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兒娟娟。後來拳匪之亂，陳戩臨一家被殺；伯和因護送張氏母女出京，中途衝散；仲藹逃難出京。伯和在路上發了一筆橫財，就狂嫖闊賭，吃上了鴉片烟，後來淪落做了叫化子。張家把他訪着，領回家養活；伯和不肯戒烟，負氣出門，仍病死在一個小烟館裏。棣華爲他守了多少年，落得這個下場；伯和死後，棣華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藹到南方，訪尋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後來在席上遇見娟娟，原來他已做了妓女了。這兩層悲劇的下場，在中國小說裏頗不易得。但此書敍事頗簡單，描寫也不很用氣力，也不能算是全德的小說。

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國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說。他用百餘年前廣東一件大命案做布局，始終寫此一案，很有精采。書中也寫迷信，也寫官吏貪污，也寫人情險詐；但這些東西都成了全書的有機部分，全不是勉強拉進來借題罵人的。諷刺小說的短處在於太露，太淺薄；專採罵人材料，不加組織，使人看多了覺得可厭。九命奇冤便完全脫去了惡套；他把諷刺的動機壓下去，做了附屬的材料；然而那些附屬的諷刺的材料在那個大情節之中，能使看的人覺得格外真實，格外動人。例如官場現形記卷四卷五寫藩台的兄弟三荷包代哥哥賣缺，寫的何嘗不好？但是看書的人看過了只像看了報紙的一段新聞一樣，覺得好笑，並不覺得動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回寫黃知縣的太太和舅老爺收梁家的賄賂一節，一樣是滑稽的寫法，但在那八條人命的大案裏，這種得賄買放的事便覺得格外動人，格外可惡。

九命奇冤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這是無可疑的。開卷第一回便寫凌家強盜攻打梁家，放火殺人。這一段事本應該在第十六回裏，著者却從第十六回直提到第一回

去，使我們先看了這件燒殺八命的大案，然後從頭敘述案子的前因後果。這種倒裝的敘述，一定是西洋小說的影響。但這還是小節；最大的影響是在布局的謹嚴與統一。中國的小說是從『演義』出來的。演義往往用史事做間架，這一朝代的事『演』完了，他的平話也收場了。三國東周一類的書是最嚴格的演義。後來作法進步了，不肯受史事的嚴格限制，故有杜撰的演義出現。水滸便是一例。但這一類的小說，也還是沒有布局的；可以插入一段打大名府，也可以插入一段打青州；可以添一段破界牌關，也可以添一段破誅仙陣；可以添一段捉花蝴蝶，也可以再添一段捉白菊花，……割去了，仍可成書；拉長了，可至無窮。這是演義體的結構上的缺乏。儒林外史雖開一種新體，但仍是沒有結構的；從山東汶上縣說到南京，從夏總甲說到丁言志；說到杜慎卿，已忘了婁公子；說到鳳四老爹，已忘了張鐵臂了。後來這一派的小說，也沒有一部有結構布置的。所以這一千年的小說裏，差不多都是沒有布局的。內中比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紅樓夢，雖然拿一家的歷史做布局，

不致十分散漫，但結構仍舊是很鬆的；今年偷一個潘五兒，明年偷一個王六兒；這裏開一個菊花詩社，那裏開一個秋海棠詩社；今回老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來覆去，實在有點討厭。怪現狀想用紅樓夢的間架來支配官場現形記的材料，故那個主人『我』跑來跑去，到南京就見着聽着南京的許多故事，到上海便見着聽着上海的許多故事，到廣東便見着聽着廣東的許多故事。其實這都是很鬆的組織，很勉强的支配，很不自然的布局。九命奇寃便不同了。他用中國諷刺小說的技術來寫家庭與官場，用中國北方強盜小說的技術來寫強盜與強盜的軍師，但他又用西洋偵探小說的布局來做一個總結構。繁文一概削盡，枝葉一齊掃光，只剩這一個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個中心題目。有了這個統一的結構，又沒有勉強的穿插，故看的人的興趣自然能自始至終不致厭倦。故九命奇寃在技術一方面要算最完備的一部小說了。

和吳沃堯李伯元同時的，還有一個劉鶚，字鐵雲，丹徒人，也是一個小說好

手。劉鶚精通算學，研究治河的方法，曾任光緒戊子（一八八八）鄭州的河工，又曾在山東巡撫張曜的幕府裏，作了治河七策。後來山東巡撫福潤保薦他『奇才』，以知府用。他住北京兩年，上書請築津鎮鐵路，不成；又爲山西巡撫與英國人訂約開採山西的鐵。當時人都叫他做『漢奸』，因爲他同外國人往來，能得他們的信用。後來拳匪之亂（一九〇〇）聯軍佔據北京，京城居民缺乏糧食，很多餓死的，他就帶了錢進京，想設法賑濟；那俄國兵佔住太倉，太倉多米而歐洲人不吃米；他同俄國人商量，用賤價把太倉的米都糶出來，用賤價糶給北京的居民，救了無數的人。後數年，有大臣參他『私售倉粟』，把他充軍到新疆，後來他就死在新疆。二十多年前，河南彰德府附近發見了許多有古文字的龜甲獸骨，劉鶚是研究這種文字最早的一個人，曾印有鐵雲藏龜一書。（以上記劉鶚的事蹟，全根據羅振玉的五十日夢痕錄。我因爲外間知道他的人很不多，故摘鈔大概于此。）

劉鶚著的老殘遊記，與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同時在繡像小說上發表。這部書的主

人老殘，姓鐵，名英，是他自己的託名。書中寫的風景經歷，也都帶着自傳的性質。書中的莊撫台即是張曜，玉賢即是毓賢，論治河的一段也與羅振玉作的傳相符。書中寫申子平在山中遇着黃龍子璵姑一段，荒誕可笑，錢玄同說他是『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的見解』，眞是不錯。書末把賈家冤死的十三人都從棺材裏救活回來，也是無謂之至。但除了這兩點之外，這部書確是一部很好的小說。他寫玉賢的虐政，寫剛弼的剛愎自用，都是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場經驗深，故與李伯元吳沃堯等全是靠傳聞的，自然大不相同了。他寫娼妓的問題，能指出這是一個生計的問題，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這種眼光也就很可佩服了。他寫史觀察（上海施書昌）治河的結果，用極具體的寫法，使人知道誤信古書的大害（第十三回至十四回）。這是他生平一件最關心的事，故他寫的這樣眞切。

但老殘遊記的最大長處在於描寫的技術。第二回寫白妞說大鼓書的一大段，讀的人大概沒有不愛的。我們引一小段作例：

王小玉……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響；……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聽的人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于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囀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像；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

這一段雖是很好，但還用了許多譬喻，算不得最高的描寫工夫。第十二回寫老殘在齊河縣看黃河裏打冰一大段，寫的更為出色。最好的是看打冰那天的晚上，老殘到堤上閒步，

抬起頭來，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分辨不清；又有幾片白雲在那裏面，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那山却不然，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了。

只有白話的文學裏能產生這種絕妙的『白描』美文來。

以上略述這五十年的白話小說。民國成立時，南方的幾位小說家都已死了，小說界忽然又寂寞起來。這時代的小說只有李涵秋的廣陵潮還可讀；但他的體裁仍舊是那沒有結構的『儒林外史式』。至於民國五年出的『黑幕』小說，乃是這一類沒

有結構的諷刺小說的最下作品，更不値得討論了。北京平話小說近年來也沒有好作品比得兒女英雄傳或七俠五義的。

（十）

現在我們要說這五六年的文學革命運動了。

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所以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稱「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那時代的小吏已不能了解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了。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這種已死的古文；所以他們想出一個法子來鼓勵民間研究古文：凡能「通一藝以上」的，都有官做，「先用誦多者」。這個法子起于漢朝，後來逐漸修改，變成「科舉」的制度。這個科舉的制度延長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壽命。

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這二千年之中，貴族的文學儘管得勢，平民的文學也在那裏不聲不響的繼續發展。漢魏六朝的『樂府』代表第一時期的白話文學。樂府的眞美是遮不住的，所以唐代的詩也很多白話的，大概是受了樂府的影響。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更是白話詩人了。晚唐的詩人差不多全是白話或近于白話的了。中唐晚唐的禪宗大師用白話講學說法，白話散文因此成立。唐代的白話詩和禪宗的白話散文代表第二時期的白話文學。但詩句的長短有定，那一律五字或一律七字的句子究竟不適宜于白話；所以詩一變而爲詞。詞句長短不齊，更近說話的自然了。五代的白話詞，北宋柳永歐陽修黃庭堅的白話詞，南宋辛棄疾一派的白話詞，代表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詩到唐末，有李商隱一派的妖孽詩出現，北宋楊億等接着，造爲『西崑體』。北宋的大詩人極力傾向解放的方面，但終不能完全脫離這種惡影響。所以江西詩派，一方面有很近白話的詩，一方面又有很壞的古典詩。直到南宋楊萬里陸游范成大三家出來，白話詩方才又興盛起來。這些白話詩人也屬于這

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南宋晚年，詩有嚴羽的復古派，詞有吳文英的古典派，都是背時的反動。然而北方受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征服的影響，古文學的權威減少了，民間的文學漸漸起來。金元時代的白話小曲─如陽春白雪和太平樂府兩集選載的─和白話雜劇，代表這第四時期的白話文學。明朝的文學又是復古派戰勝了；八股之外，詩詞的散文都帶着復古的色彩，戲劇也變成又長又酸的傳奇了。但是白話小說可進步了。白話小說起于宋代，傳至元代，還不曾脫離幼稚的時期。到了明朝，小說方才到了成人時期；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都出在這個時代。明末的金人瑞竟公然宣言『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傳右者』，清初的水滸後傳，乾隆一代的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都是很好的作品。直到這五十年中，小說的發展始終沒有間斷。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話小說，代表第五時期的白話文學。

這五個時期的白話文學之中，最重要的是這五百年中的白話小說。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並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性理的語錄，

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遊紅樓。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多賣得一部小說，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所以這幾百年來，白話的知識與技術都傳播的很遠，超出平常所謂『官話疆域』之外。試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話小說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吳沃堯是廣東人，便可以想見白話傳播之遠了。但丁(Dante)鮑高嘉（Boccacio）的文學，規定了意大利的國語；嘉叟（Chaucer）衛克烈夫（Wycliff）的文學，規定了英吉利的國語；十四五世紀的法蘭西文學，規定了法蘭西的國語。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

中國的國語早已寫定了，又早已傳播的很遠了，又早已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活文學了，——然而國語還不曾得全國的公認，國語的文學也還不曾得大家的公認：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這裏面有兩個大原因：一是科舉沒有廢止，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

科舉一日不廢，古文的尊嚴一日不倒。在科舉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無數的白話作品出現，功名富貴的引誘居然買不動施耐菴曹雪芹吳敬梓，政府的權威居然壓不住水滸西遊紅樓的產生與流傳：這已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徼幸又最光榮的事了。但科舉的制度究竟能使一般文人鑽在那墨卷古文堆裏過日子，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

一九〇四年以後，科舉廢止了。但是還沒有人出來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文學。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難道不能稱為『有意的主張』嗎？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

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雖然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總覺得『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人上人』大發慈悲心，哀念小百姓無知無識，故降格做點通俗文章給他們看。但這些『人上人』自己仍舊應該努力模做漢魏唐宋的文章。這個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說，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孫瞞住大家，不肯替他發喪舉哀；現在我們來替他正式發訃文，報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兩千年了！你們愛舉哀的，請舉哀罷！愛慶祝的，也請慶祝罷！』

這個『古文死了兩千年』的訃文出去之後，起初大家還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紛紛議論了；不久，就有人號咷痛哭了。那號咷痛哭的人，有些哭過一兩場，也就止哀了；有些一頭哭，一頭痛罵那些發訃文的人，怪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大傷孝子之心』的惡事；有些從外國奔喪回來，雖然素同死者沒有多大交情，但他們聽見哭聲，也忍不住跟着哭一場，聽見罵聲，也忍不住跟着罵一場。所以這種哭聲罵聲至今還不曾完全停止。但是這個死信是不能再瞞的了，倒不如爽爽快快說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哭幾天，不久他們就會『節哀盡禮』的；即使有幾個『終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是極少數人，也顧不得了。

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方才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故他這一篇的要點是：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

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後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啓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爲眞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爲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

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爲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爲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穫，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菴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爲之耳。……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着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時胡適還在美洲，曾有信給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見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那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想用實地試驗來證明白話可以作韻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為『嘗試集』。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獨秀答書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

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反對卽是注意的表示。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裏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內中錢玄同的討論很多可以補正胡適的主張。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眞正國語。

這篇文章名為「建設的」，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他說：

>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就是上文說的替古文發喪舉哀了。在『建設的』方面，這篇文章也有一點貢獻。他說：

> 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將來白

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文學的人。

這篇文章把從前胡適陳獨秀的種種主張都歸納到十個字，其實又只有『國語的文學』五個字。旗幟更明白了，進行也就更順利了。

這一年的文學革命，在建設的方面，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白話詩的試驗。胡適在美洲做的白話詩還不過是刷洗過的文言詩；這是因爲他還不能拋棄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儘量表現白話的長處。錢玄同指出這種缺點來，胡適方才放手去做那長短無定的白話詩。同時沈尹默周作人劉復等也加入白話詩的試驗。這一年的作品雖不很好，但技術上的訓練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北歐的 Ibsen, Strindberg, Anderson，東歐的 Dostojevski, Kuprin, Tolstoi，新希臘的 Ephtaliotis，波蘭的 Seinkiewicz，這一年之中，介紹了些這人的文學進來。在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儘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倣傚，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週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 The Renaissance，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這時候，文學革命的運動已經鼓動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像力，故大學學生有這樣的響應。新潮初出時，精采充足，確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民國八年開幕時，除了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好幾篇響應的白話文章。從此以後，響應的漸漸的更多了。

但響應的多了，反對的也更猛烈了。大學內部的反對分子也出了一個國故，一個國民，都是擁護古文學的。校外的反對黨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制這種新運動。八年二三月間，外間謠言四起，有的說教育部出來干涉了，有的說陳胡錢等已被驅逐出京了。這種謠言雖大半不確，但很可以代表反對黨心理上的願望。當時古文家林紓在新申報上做了好幾篇小說痛罵北京大學的人。內中有一篇妖夢，用元緒影北大校長蔡元培，陳恆影陳獨秀，胡亥影胡適；那篇小說太齷齪了，我們不

願意引他。還有一篇荊生，寫田必美（陳）金心異（錢）狄莫（胡）三人聚談于陶然亭，田生大罵孔子，狄生主張白話，忽然隔壁一個『偉丈夫』

踰足超過破壁，指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尙欲抗辯，偉丈夫騈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汙吾簡。……留爾以俟鬼誅。』……

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衞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這篇小說的末尾有林紓的附論，說：

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這話說的很可憐。當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來作荊生，但荊生究竟不可多得。他們

又想運動安福部的國會出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後來也失敗了。

八年三月間，林紓作書給蔡元培，攻擊新文學的運動；蔡元培也作長書答他。這兩書很可以代表當日『新舊之爭』的兩方面，故我們摘鈔幾節。林書說：

……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謠詠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死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將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

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且天下惟有眞學術，眞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

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則凡京津之稗販皆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以下論『新道德』一節，從略。）

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此書上後，可不必示覆，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 林紓頓首。

蔡元培答書對於『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一點，提出三個答案。但蔡書的最重要之點並不在駁論，——因爲原書本不值得一駁，——乃在末段的宣言。他說：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于教員，以學詣爲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蔡元培自己也主張白話，他曾說：

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决不可錯了這個趨勢。（在北京高等師範國文部演說。）

他又說：

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演說。）

林蔡的辯論是八年三月中間的事。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敗了。於是有『五四』的學生運動，有『六三』的事件，全國的大響應居然逼迫政府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這時代，各地的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此外又出了許多白話的新雜誌。有人估計，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內中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如解放與改造（現名『改造』），如少年中國，都有很好的貢獻。一年以後，日報也漸漸的改了樣子了。從前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在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個最重要的白話文的機關。時勢所趨，就使那些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話的附張了。民國九年以後，國內幾個持重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的白話化了。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或採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因此，民國八年以後，白話文的傳播眞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多起來了。民國九年，教育部頒布了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又令：

凡照舊制編輯之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其供第一第二兩學年用者，一律作廢；第三學年用書，准用至民國十年爲止；第四學年用書，准用至民國十一年爲止。

依這個次序，須到今年，（一九二二）方才把國民學校的國文完全改成國語。但教育制度是上下連接的；牽動一髮，便可搖動全身。第一二年改了國語，初級師範就

不能不改了，高等小學也多跟着改了。初級師範改了，高等師範也就不能不改動了。中學校也有許多自願採用國語文的。教育部這一次的舉動雖是根據于民國八年全國教育會的決議，但內中很靠着國語研究會會員的力量。國語研究會是民國五年成立的，內中出力的會員多半是和教育部有關係的。國語文學的運動成熟以後，國語教科書的主張也沒有多大阻力了，故國語研究會能于傅嶽芬做教育次長代理部務的時代，使教育部做到這樣重要的改革。

還有一件事，雖然與文學革命的運動沒有多大的關係，卻也是應該提及的。民國元年，教育部召集了一個讀音統一會，討論讀音統一的問題。讀音統一會議定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這一副字母，本來不過用來注音，『以代反切之用』的。當初的宗旨，全在統一漢文的讀音，並不曾想到白話上去，也不會有多大的奢望。七年十一月，教育部把這副字母正式頒布了。八年四月，教育部重新頒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吳敬恆定的）。八年九月，國音字典出版。這個時候，國語的運動已快

成熟了，國語教育的需要已是公認的了；所以當日『代反切之用』的注音字母，到這時候就不知不覺的變成國語運動的一部分了，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國語字母了。

民國九年十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白話公然叫做國語了。反對的聲浪雖然不曾完全消滅，但始終沒有一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對論。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誌，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罵一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梅光迪說的：

> 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併爲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爲今人當與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

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爲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

這種議論眞是無的放矢。正爲古文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後無駢體，白話之後無古文』，那就用不着誰來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驌說的：

> 胡君（胡適）……以過去之文字爲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爲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比字上兩個以字，皆依原文）……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爲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與字所字皆依原文）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爲（原作之）國語之故，亦由於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

> 有轉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爲國語之必要也。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實胡適的答案應該是『正是如此』。中國人用古文作文學，與四百年前歐洲人用拉丁文著書作文，與日本人做漢文，同是一樣的錯誤，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學。至於外國文與非外國文之說，並不成問題。瑞士人，比利時人，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用外國文字作本國的文學；但他們用的是活文字，故與用拉丁文不同，與日本人用漢文也不同。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胆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

至於這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因爲時間過近，我們還不便一一的下評判。

但是我們從大勢上看來，也可以指出幾個要點：第一，白話詩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詩體初解放時，工具還不伏手，技術還不精熟，故還免不了過渡時代的缺點。但最近兩年的新詩，無論是有韻詩，是無韻詩，或是新興的「短詩」，都很有許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預料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第二，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這一年多（一九二一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却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第四，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戲劇還有人試做；長篇小說不但沒有

人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現在試作新文學的人，或是等着稿費買米下鍋，或是天天和粉筆黑板做朋友；他們的時間只夠做幾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詩，如短篇小說。他們的時間不許他們做長篇的創作。這是一個原因。況且我們近來覺悟從前那種沒有結構沒有組織的小說體——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滸式，——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所以不知不覺的格外慎重起來。這個慎重的現象，是暫時的，也許是很好的。平心而論，與其多出幾集無窮無盡的官場現形記一類的小說，倒不如現在這樣完全缺貨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至於詳細的舉例和詳細的評判，我們只好等到申報六十週年紀念時再補罷。

十一，三，三。

附錄　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這部書是爲上海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册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記載這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短歷史，以備一個時代的掌故，算不得什麼著作。橋川先生竟把他譯成日本文了，實在使我很慚愧。我只好借這個機會，指出一兩處應補充之點。

第一，這五十年的詞，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鵬運（臨桂人）朱祖謀（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詞學，翻刻宋元詞集，却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彊邨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可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見的詞集，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

第二，近人對於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的賞鑒與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此外，如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元曲選，如日本京都大學文科印行的元槧雜劇三十種，如劉世珩的暖紅室彙刻傳奇，如董康刻的盛明雜劇，都可算是這幾十年中的重要供獻。

第三，小說向來受文士的蔑視，但這幾十年中也漸漸得着了相當的承認。古小

說的發現，尤爲這個時期的特色。宣和遺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話殘本的刻行，唐三藏取經詩話的來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說的印行，都可給文學史家許多材料。近年我們提倡用新式標點符號翻印古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之類，加上歷史的考證，文學的批評，這也可算是這個時期一種小貢獻。

以上不過是補充原本的遺漏，略表我對於譯者的謝意和對于讀者的歉意。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胡適序于北京。

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一）引論

現在倒數上去五十年，正是一八七二年。我們且看那時候的哲學界是個什麼樣子。

（1）歐洲大陸上，浪漫主義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Romanticism）已到了衰敗分崩的時期了。海格爾（Hegel, 1770—1831）已死了四十一年了。叔本華（Schopenhauer, 1788—1860）已死了十二年了。組織偉大的哲學系統的狂熱——倍根說的『蜘蛛式』的哲學系統，因為他們都是從哲學家的腦子裏抽想出來的偉大系統，——忽然冷落了。最有勢力

的海格爾學派早已分裂了：『右』派的早已變成衞道忠君的守舊黨了；『左』派的，在宗教的方面，有佛爾巴赫（Feuerbach, 1804—1866）與斯道拉斯（Strauss）的大膽的批評，在社會和政治方面，有馬克思（Marx, 1818—1883）與拉薩爾（Lassalle, 1825—1864）的社會主義。

（2）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盛時也過去了。孔德（Comte 1798—1857）已死了十五年了。英國方面的彌兒（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再隔一年（一八七三）也死了。英國還有一個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此時還正當盛時，但他久已完全成爲一個演化論的哲學家，久已不是十九世紀上半的實證主義者了。

（3）大陸上浪漫主義的餘波此時變成了一種新的意象主義，又叫做『物觀的意象主義』（Objective Idealism）。這一派的遠祖是康德（Kant, 1724—1804），但開宗的大師是洛茨（Lotze, 1817—1881）。當一八七

二年，他的重要著作已出了不少。一八七四，他的Logik出版；一八七九，他的Metaphysik出版；一八八四，這兩部書都譯成英文了。在英國方面，德國系的哲學向來沒有勢力；但到了這個時候，新意象主義也漸漸的有代表起來了。格林（T. H. Green, 1836—1882）的名作，（Introduction to Hume,）是一八七五年出來的。開耳得（Caird）的philosophy of Kant 是一八七七年出來的。這一派的英國大師勃勒得來（F. H. Bradley, 1846—）的兩部不可解的名著，（Principles of Logic 與 Appearance and Reality）這時候都還不曾出來。但這個時代的英國哲學界，——至少可以說，英國的大學教授所代表的哲學界，染上的德國色彩，已是很濃了。

（4）大陸上的思想界裏，這一年（一八七二）忽然出了一個怪傑，叫做尼采（Nietzsche, 1844—1900）。他的少年作品，悲劇的產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就出在這一年。這部書提出一種新的人生觀。他用希臘的酒神刁匿修司（Dionysius）代表他的理想的人生觀，他說刁匿修司勝於阿婆羅（Apollo，希臘的樂神），而阿婆羅遠勝於梭格拉底（Socrates），——這就是說，生命重於美術，而美術重於智識。這就是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第一步。

（5）一八七二年一月十日，達爾文校完了他的物類由來第六版的稿子。這部思想大革命的傑作，已出版了十三年了。他的人類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也出版了一年了。物類由來出版以後，歐美的學術界都受了一個大震動。十二年的激烈爭論，漸漸的把上帝創造的物種由來論打倒了，故赫胥黎（Huxley，1825—1895）在一八七一年曾說，『在十二年中，物類由來在生物學上做到了一種完全的革命，就同牛敦的Principia 在天文學上做到的革命一樣。』但當時的生物學者及一般學

者雖然承認了物種的演化，還有許多人不肯承認人類也是由別的物類演化出來的。人類由來的主旨只是老實指出人類也是從猴類演化出來的。這部書居然銷售很廣，而且很快：第一年就銷了二千五百部。這時候，德國的赫克爾（Haeckel）也在他的 Naturliche Schopfungs Geschite 裏極力主張同樣的學說。當日關於這個問題—物類的演化—的爭論，乃是學術史上第一場大戰爭。十年之後（一八八二），達爾文死時，英國人把他葬在衞司敏德大寺裏，與牛敦並列，這可見演化論當日的勝利了。達爾文同時的斯賓塞，承認演化論最早（在物類由來出版之先）；他把進化的觀念應用到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上去。他的重要的著作早已出了好幾種，這時候（一八七二）他正在完結他的心理學；他的羣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也是這一年出版的。

（6）一八七二年九月裏，達爾文的家裏來了一個美國客人，叫做萊特

(Chauncy Wright, 1830—1875)。萊特在美國曾替達爾文的學說做過很有力的辯護。（達爾文傳第二冊，頁三二三以下。）他自己說，『我的目的是要把你（達爾文）的學說和一般的哲學研究，連貫起來。』這個萊特那時在美國康橋(Cambridge)同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玄學會』。會員之中，有皮耳士(C. S. Peirce, 1839—1914)和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6)。這兩個人便是實驗主義(Pragmatism)的開山大師。一八七三年，皮耳士動手做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後來(一八七七)略有修改，在科學通俗月刊上發表。這篇的總題是『科學邏輯的舉例』(Illustrations of the Logic of Science)，是實驗主義的第一次發表。但是那時候大家還不注意這種學說，直到二十年後，詹姆士方才重新把這種學說傳揚出去。

(7)一八七一是普法戰爭結局後的第二年。前一年，法蘭西帝國改成

了第三共和國，普魯士王變成了新德意志帝國的皇帝；法國同普魯士議和，割了兩州的地；巴黎的市民暴動，組織『公立政府』(The Commune)；公立政府的結局，——暴亂與慘酷，——使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受了十年的挫折。但德國勝利之後，德國的社會主義却添了許多和平發展的機會。這時候（一八七二），拉薩爾（Lassalle）已死了八年了，馬克思成了社會黨的大宗師。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的第一冊（一八六七）已出版了五年了。社會民主黨已成了一種政治勢力了。（一八七三年，社會民主黨得票四三七四三八〇）馬克思在前八年（一八六四）組織了一個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但巴枯寧（Bakunin）的無政府主義的鼓吹，普法戰爭的影響，巴黎公立政府的失敗，——這些事件使這「第一國際」四分五裂。這一年（一八七二）國際勞動者協會的總機關遂從倫敦移到紐約；

不上五年，遂解散了。第一國際解散之後，馬克思仍舊繼續做他的資本論。

以上是這半世紀開幕時的哲學界的大勢。我們對於第一項的舊浪漫主義，和第二項的舊實證主義，都可以不談了。我們在這一篇裏，只敘述

（1）新意象主義，

（2）尼采的哲學，

（3）演化論的哲學，

（4）實驗主義，

（5）晚近的兩個支流

（6）社會政治學說。

（一）新的意象主義

洛茨（Lotze）精通醫學與生理學，他受了科學的影響，却不滿意於機械論的人生觀。他總想調和科學的機械論與浪漫派的意象論。（Idealism 或譯爲觀念論，今譯爲意象論。）他從機械論入手，指出近世科學承認一切現象由於元子的交互作用。這些元子只是無數『力的中心』。但是究竟物的本體是物質的呢？還是精神的呢？洛茨要我們用『類推』法（比例）來解決這個問題。物的本體若是完全獨立的，就不可知了。我們只能由已知『推知』未知。我們所以能直接了解我們自己的精神的現象，全靠心靈的綜合力。宇宙的實際，也須譯成精神的現象，方才可知。洛茨以爲元子也是有生命的，並不是死的。（這裏面很有來本尼茲〔Leibnitz〕的影響。）實際（Reality）有種種的等級；人的心靈代表最高的一級，其餘的以次遞降下去，就是最低等的物質也有心靈的生活。

洛茨以後，德國有哈德門（Hartmann, 1842—1906），費希納（Fechner, 1801—1871），心理學家溫德（Wundt），都屬于這一派。現存的老將倭鏗（Eucken），

反對理智主義與自然主義，鼓吹精神的生活，頗能替近代的宗教運動添一個理論的基礎。

在英國方面，格林（Green）的休謨哲學緒論（Introduction to Hume）和他的人生哲學導言（Prolegomena to Ethics）是這一派開山的著作。格林是一個熱心改良社會的人，做了許多社會服務的事業。當達爾文的進化論引起許多激烈討論的時候，格林正當壯年。（一八六〇年，六月三十日牛津大學辯論進化論的大會，——生物學史上最有名的一場舌戰，——格林也在座，他那時還是大學學生。）他對於這種自然主義的人生觀，總覺得不能滿意。人不單是物質的，他是精神的；他有自覺力。人是那普遍的心靈的一個影子。他有欲望與情感，但人的欲望與禽獸的衝動不同：人能把他的衝動化成他自己的，變成自覺的，使欲望變成意志。人的特點就在他能想像一個勝於現在的境界，並且努力求達到那個境界。

格林不幸早死了。英國後起的新意象論派的哲學家，要算勃勒得來（Bradley）

最重要了。他的哲學最不好懂，有人叫他做『近世哲學的柔諾(Zeno)』。他的名著叫做現象與本體(Appearance and Reality)。本體是絕對的。(Absolute)人類平常的經驗知識，都只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知識。那絕對的本體是貫通的，諧和的，無所不包的。我們的經驗知識，只是那大本體的一個具體而微的部分；雖不完全，却非虛幻，也可以算是一個小本體。我們單靠思想知識，是不能知道那絕對的本體的。只有直覺，只有直截的感覺，可以使我們領略本體的大意。

自從勃勒得來以來，這一派又叫做『絕對的意象論』(Absolute Idealism)。何以又叫做『物觀的意象論』(Objective Idealism)呢？因為他們一方面承受休謨與康德的經驗主義與意象主義，一方面又想拿海格爾的歷史哲學來代替那新興的進化論。絕對的本體是可知的，却又是不完全可知的。人心的作用，能把散漫的感覺與經驗，組織一個宇宙；這個宇宙雖是不完全，却不是純粹主觀的，因為人人都有一個大同小異的宇宙；既然人人都有，互相印證，故可說是物觀的。這個宇宙，這

個宇宙觀，是進化的。靠着知識科學的進步，由孩童的宇宙進到大人的宇宙，由常人的宇宙進到科學家哲學家的宇宙，由不完全的宇宙進到比較上略完全的宇宙，這就是進化。

這個學派，在五十年中，可算是大陸上『正宗』哲學的傳人。他的勢力在英國美國都很大。英國的大師是鮑生葵（Bosanquet），美國的大師是羅以斯（Royce, 1855—1916）。狄雷教授(Thilly)在他的哲學史（頁五六二）裏略舉美國哲學家屬于這一派的，竟有二十人之多。但馬文教授（W. T Marvin）在他的歐洲哲學史裏說（頁三五五）：

在這裏，哲學史家不得不指出，科學同這一派寂寞的，書生的學說，又宣告離婚了。也許將來科學還可以同來和他同居，但在今日，這一個運動雖然是大而重要，却只可算是歐洲哲學思潮的一個迴波，不能算是正流了。

（三）尼采

尼采也是浪漫主義的產兒。他接受了叔本華的意志論，而拋棄了他的悲觀主義。叔本華說的意志，是求生的意志；尼采說的意志，是求權力的意志。生命乃是一齣爭權力的大戲；在這戲裏，意志唱的是正角，知識等等都是配角。眞理所以有用，只是因為他能幫助生命，提高生命的權力。生命的大法是：各爭權力，優勝劣敗。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種更高等的人，造成『超人』。戰爭是自然的，是不可免的；和平是無生氣的表示。為求超人社會的實現，我們應該打破一切慈悲愛人的敎訓。叔本華最推崇慈悲，尼采說慈悲可以容縱弱者而壓抑强者，是社會進步的最大仇敵。

尼采反對當時最時髦的一切民治主義的學說。生命是競爭的，競爭的結果自然是强者的勝利。强者賢者的統治是自然的；一切平民政治的主張：民權，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反自然的。不平等是大法，爭平等是時人妄想。

尼采大聲疾呼的反對古代遺傳下來的道德與宗教。傳統的道德是奴隸的道德，基督教是奴隸的宗教。傳統的道德要人愛人，保障弱者劣者，束縛强者優者，豈不是奴隸的道德嗎？基督教及一切宗教也是如此。基督教提倡謙卑，提倡無抵抗，提倡悲觀的人生觀，更是尼采所痛恨的。

尼采本是一個古學家，他在巴司爾（Basle）大學做古言語學的教授。他一身多病，他也是『弱者』之一！他的超人哲學雖然帶着一點『過屠門而大嚼』的酸味，但他對於傳統的道德宗教，下了很無忌憚的批評，『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確有很大的破壞功勞。

（四）演化論的哲學

一八七二年的六版的物類由來，乃是最後修正本。達爾文在這一版的頁四二四

裏，加了幾句話：

前面的幾段，以及別處，有幾句話，隱隱的說自然學者相信物類是分別創造的。很有人說我這幾句話不該說。但我不曾刪去他們，因為他們的保存可以紀載一個過去時代的事實。當此書初版時，普通的信仰確是如此的。現在情形變了，差不多個個自然學者承認演化的大原則了。

（達爾文傳二，三三二。）

當一八五九年物種由來初出時，赫胥黎在太晤士報上作了一篇有力的書評，最末的一節說：

達爾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虛空一樣。（「自然最怕虛空」Nature abhors a vacuum，乃是諺語。）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個衡法學者搜求例案一樣。他提出的原則，都可以用觀察與實驗來證明的。他要我們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條用理想的蜘蛛網絲織成的雲路，乃

是一條用事實砌成的大橋。那麼，這條橋可以使我渡過許多知識界的陷坑，可以引我們到一個所在，那個所在沒有那些雖妖嬈動人而不生育的魔女——叫做最後之因的——設下的陷人坑。古代寓言裏說一個老人最後吩咐他的兒子的話是：『我的兒子，你們在這葡萄園裏掘罷。』他們依着老人的話，把園子都掘遍了；他們雖不曾尋着窖藏的金，却把園地鋤遍了，所以那年的葡萄大熟，他們也發財了。（赫胥黎論文，二，頁一一〇。）

這一段話最會形容達爾文的眞精神。他在思想史的最大貢獻就是一種新的實證主義的精神。他打破了那求『最後之因』的方法，使我們從實證的方面去解決生物界的根本問題。

達爾文在科學方面的貢獻，他的學說在這五十年中的逐漸證實與修正，——這都是五十年的科學史上的材料，我不必在這裏詳說了。我現在單說他在哲學思想上的影響。

達爾文的主要觀念是：『物類起于自然的選擇，起于生存競爭裏最適宜的種族的保存。』他的幾部書都只是用無數的證據與事例來證明這一個大原則。在哲學史上，這個觀念是一個革命的觀念；單只那書名——物類由來——把『類』和『由來』連在一塊，便是革命的表示。因為自古代以來，哲學家總以為『類』是不變的，一成不變就沒有『由來』了。例如一粒橡子，漸漸生芽發根，不久滿一尺了，不久成小橡樹了，不久成大橡樹了。這雖是很大的變化，但變來變去還只是一株橡樹。橡子不會變成鴨脚樹，也不會變成枇杷樹。千年前如此，千年後也還如此。這個變而不變之中，好像有一條規定的路線，好像有一個前定的範圍，好像有一個固定的法式。這個法式的範圍，亞里士多德叫他做『哀多斯』(Eidos)，平常譯作『法』。中古的經院學者譯作『斯比西斯』(Species)，正譯為『類』。（關於『法』與『類』的關係，讀者可參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頁二〇六。）這個變而不變的『類』的觀念，成為歐洲思想史的唯一基本觀念。學者不去研究變的現象，却去尋現象背後的那個不

變的性。那變的，特殊的，個體的，都受人的輕視；哲學家很驕傲的說：『那不過是經驗，算不得知識。』眞知識須求那不變的法，求那統舉的類，求那最後的因。（亞里士多得的「法」即是最後之因。）

十六七世紀以來，物理的科學進步了，歐洲學術界漸漸的知道注重個體的事實與變遷的現象。三百年的科學進步，居然給我們一個動的變的宇宙觀了。但關於生物，心理，政治的方面，仍舊是『類不變』的觀念獨占優勝。偶然有一兩個特別見識的人，如拉馬克（Lamarck）之流，又都不能澈底。達爾文同時的地質學者，動物學者，植物學者，都不曾打破『類不變』的觀念。最大的地質學家如來爾（Lyell）達爾文的至好朋友，——何嘗不知道大地的歷史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物？但他們總以爲每一個地質的時代的末期必有一個大毀壞，把一切生物都掃去；到第二個時代裏，另有許多新物類創造出來。他們始終打不破那傳統的觀念。

達爾文不但證明『類』是變的，而且指出『類』所以變的道理。這個思想上的

大革命在哲學上有幾種重要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觀念。如果一切生物全靠着時時變異和淘汰不適於生存競爭的變異，方才能適應環境，那就用不着一個有意志的主宰來計劃規定了。況且生存的競爭是很慘酷的；若有一個有意志的主宰，何以生物界還有這種慘劇呢？當日植物學大家葛雷（Asa Gray）始終堅執主宰的觀念。達爾文作答他道：

> 我看見了一隻鳥，心想吃他，就開鎗把他打殺了：這是我有意做的事。一個無罪的人站在樹下，觸電而死，難道你相信那是上帝有意殺了他嗎？有許多人竟能相信，我不能信，故不信。如果你相信這個，我再問你：當一隻燕子吞了一個小蟲，難道那也是上帝命定那隻燕子應該在那時候吞下那個小蟲嗎？我相信那觸電的人和那被吞的小蟲是同類的案子。如果那人和那蟲的死不是有意注定的，為什麼我們偏要相信他們的「類」的初生是有意的呢？（達爾文傳第一冊，頁二八四。）

我們讀慣了老子『天地不仁』的話，列子魚鳥之喻，王充的自然論，——兩千年來，把這種議論只當耳邊風，故不覺得達爾文的議論的重要。但在那兩千年的基督教威權底下，這種議論確是革命的議論；何況他還指出無數科學的事實做證據呢？

但是達爾文與赫胥黎在哲學方法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們的『存疑主義』。（Agnosticism）。存疑主義這個名詞，是赫胥黎造出來的，直譯為『不知主義』。孔丘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話確是『存疑主義』的一個好解說。但近代的科學家還要進一步，他們要問，『怎樣的知，才可以算是無疑的知？』赫胥黎說，只有那證據充分的知識，方才可以信仰，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這是存疑主義的主腦。一八六〇年九月，赫胥黎最鍾愛的兒子死了，他的朋友金司萊（Charles Kinsley）寫信來安慰他，信上提到人生的歸宿與靈魂的不朽兩個大問題。金司萊是英國文學家，很注意社會的改良，他的人格是極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誠懇的答了他一封幾千字的信。（赫胥黎傳，一，頁二三三—二

三九〇）這信是存疑主義的正式宣言，我們摘譯幾段如下：

……靈魂不朽之說，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我拿不出什麼理由來信仰他，但是我也沒有法子可以否證他。……我相信別的東西時，總要有證據；你若能給我同等的證據，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的話了。我又何必不相信呢？比起物理學上『質力不滅』的原則來，靈魂的不滅也算不得什麼希奇的事。我們既知道一塊石頭的落地含有多少奇妙的道理，決不會因為一個學說有點奇異就不相信他。但是我年紀越大，越分明認得人生最神聖的舉動是口裏說出和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重的懲罰都是跟着這一樁舉動走的。這個宇宙，是到處一樣的；如果我遇着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奇秘的解決，難道就可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嗎？用

比喻或猜想來同我談，是沒有用的，我若說，『我相信某條數學原理』，我自己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夠不上這樣信仰的，不配做我的生命和希望的根據。……

科學好像教訓我『坐在事實面前像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謙卑的跟着「自然」走，無論他帶你往什麼危險地方去：若不如此，你決不會學到什麼。』自從我決心冒險實行他的教訓以來，我方才覺得心裏知足與安靜了。……我很知道，一百人之中就有九十九人要叫我做『無神主義者』（Atheist），或他種不好聽的名字。照現在的法律，如果一個最下等的毛賊偷了我的衣服，我在法庭上宣誓起訴是無效的。（一八六九以前，無神主義者的宣誓是無法律上的效用的。）但是我不得不如此。人家可以叫我種種名字，但總不能叫我做『說謊的人』。……

這種科學的精神，——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義』的。對于宗教上的種種問題持這種態度的，就叫做『存疑論者』（Agnostic）。達爾文晚年也自稱為『存疑論者』。他說：

> 科學與基督無關，不過科學研究的習慣使人對於承認證據一層格外慎重罷了。我自己是不信有什麼『默示』（Revelation）的。至於死後靈魂是否存在，只好各人自己從那些矛盾而且空泛的種種猜想裏去下一個判斷了。（達爾文傳，一，頁二七七。）

他又說：

> 我不能在這些深奧的問題上面貢獻一點光明。萬物緣起的奇秘是我們不能解決的。我個人只好自居於存疑論者了。（同書，一，頁二八二。）

這種存疑的態度，五十年來，影響於無數的人。當我們這五十年開幕時，『存疑主義』還是一個新名詞，到了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還有許多衛道的宗教家

作論攻擊這種破壞宗教的邪說，所以赫胥黎不能不正式答辨他們。他那年作了四篇關於存疑主義的大文章：

(1)論存疑主義，

(2)再論存疑主義，

(3)存疑主義與基督教，

(4)關於靈異事蹟的證據的價值。

此外，他還有許多批評基督教的文字，後來編成兩厚册，一册名為『科學與希伯來傳說』，一册名為『科學與基督教傳說』。（赫胥黎論文。卷四，卷五。）這些文章在當日思想界很有廓清摧陷的大功勞。基督教當十六七世紀時，勢燄還大，故能用威力壓迫當日的科學家。葛里類（Galileo）受了刑罰之後，笛卡兒（Descartes）就趕緊把他自己的『天論』毀了。從此以後，科學家往往避開宗教，不敢同他直接衝突。他們說，科學的對象是物質，宗教的對象是精神，這兩個世界是不相侵犯的。三百

年的科學家忍氣吞聲的『敬宗教而遠之』，所以宗教也不十分侵犯科學的發展。但是到了達爾文出來，演進的宇宙觀首先和上帝創造的宇宙觀起了一個大衝突，於是三百年來不相侵犯的兩國就不能不宣戰了。達爾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來的證據。三十年搜集的科學證據，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傳說！這一場大戰的結果，證據戰勝了傳說，——遂使科學方法的精神大白於世界。赫胥黎是達爾文的作戰先鋒，（因為達爾文身體多病，不喜歡紛爭，）從戰場上的經驗裏認清了科學的唯一武器是證據，所以大聲疾呼的把這個無敵的武器提出來，叫人們認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從這個『拿證據來』的喊聲傳出以後，世界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起一個根本的革命，——哲學方法上的大革命。於是十九世紀前半的哲學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就一變而為十九世紀末年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了。

（看下章）

斯賓塞也是提倡演化論的人，達爾文稱他做前輩。然而他對於演化論的本身，不曾有多大的貢獻；他的大功勞在於把進化的原則應用到心理學，社會學，人生哲學上去。

他在一八六〇年出版了他的原理論（First Principles），書的前面附有一篇廣告，說他要陸續發表一部『哲學全書』，全書的順序如下：

(1)原理論

部甲，不可知的。

部乙，可知的原理。(如『力的永存』『進化的大法』等等)

(2)生物學原理：分二冊，六部。（目從略）

(3)心理學原理：分二冊，八部。

(4)社會學原理：分三冊，十一部。

(5)道德學原理：分二冊，六部。

最初買預約劵的人名也附在後面，中有彌兒（穆勒），達爾文，赫胥黎的名字。他這部大書出了三十六年（一八六〇——一八九六）方才出完；中間經過許多經濟上的困難，幸而他的年壽高，居然能完了他這個宏願。他的哲學是我們不能在這篇短文裏討論的。我們現在只能指出他的進化論（Evolution 一個字，我們向來譯為『進化』，近來我想改為『演化』。本篇多用『演化』，但遇可以通用時，亦偶用『進化』。）應用時的幾個特別貢獻。

斯賓塞說萬物的演化，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積聚，例如太陽系宇宙最初的星氣，又如地球初期在星氣內成的球形，又如生物初期的營養。第二個時期是畫分，——所謂由『由渾而畫』——例如由星氣分為各天體，又如每一天體分為各部分，又如生物分為各種構造與官能。這個畫分的時期呈現一個分離的趨勢，如果有一方面太偏重了，必致陷入瓦解的危險。所以須有第三個時期的安定，安定就是調和分與合之間，保存一種和均。但這種和均的安定是不能永久的，將來仍舊要重新經過

這三時期的演進。

我們先看他在生物學上的應用。他說，生命是內部（生理的）關係和外面關係的適應。一個生物不但承受外來的感覺，並且因此發生一種變化，使他將來對於外境的適應更勝於未變化之前。種類上，生理上的變異是外來勢力的影響，那種適宜的變異就得自然的選擇，就生存了。達爾文說這是『自然的選擇』，斯賓塞說，不如叫他做『最適者的生存』；因為種種生理上的變化，雖是環境的影響，却也是生物對付環境的『作用』（Function）的積漸結果。

這個觀念，應用到心理學上去，就把心的現象也看作『適應』的作用。他說，心理的生活和生理的生活有同樣的性質，兩種生活都是要使內部關係和外部關係互相適應。從前的人把『意識』（Consciousness）說的太微妙了，其實意識也是一種適應的作用。人受的印象太多了，不能不把他們排列成一種次序，凡是神經的作用，排成順序，以便適應外面的境地的，便是意識。斯賓塞把意識看做一種適應，

這個觀念後來頗影響了現代的新派心理學。

在人心行為的方面，斯賓塞也很有重大的貢獻。他用適應和不適應來說明行為的善惡。刀子割得快，是『好』刀子；手鎗發的遠，放的準，是『好』手鎗；房子給我們適當的蔽護和安逸，是『好』房子。雨傘不能遮雨，是『壞』雨傘；皮靴透進水來，是『壞』皮靴。人的行為的好壞，也是如此的。有些行為是沒有目的的，沒有目的的便沒有好壞可說，便不發生道德問題。凡有目的的行為，都是要適應那個目的的。『我們分別行為的好壞，總是看他能否適應他的目的。』斯賓塞又拿這個觀念來說行為的進化；他說，幼稚的行為是適應不完全的行為；行為越進化，目的與動作的互相適應越完密。他這種行為論，在最近三十年的道德觀念和教育學說上都有不小的影響。

（五）實驗主義

我們在第一章裏說美國人萊特（Wright）要想把達爾文的學說和一般的哲學研究，連貫起來。這個萊特在美國康橋辦了一個『玄學會』，這個會便是實驗主義的發源之地。會員皮耳士（Peirce）在一八七三年做了一篇『科學邏輯的舉例』，這篇文章共分六章，第二章是論『如何能使我們的意思明白』。這兩個標題都是很可以注意的，因為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實驗主義最初的宗旨是要用科學方法來把我們所有的意思的意義弄的明白。皮耳士是一個大科學家，所以他的方法只是一個『科學試驗室的態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他說，『你對一個科學實驗家無論講什麼，他總以為你的意思是說某種實驗法若實行時定有某種效果。若不如此，你說的話他就不懂得了。』他平生只遵守着這個態度，所以說，『一個觀念的意義完全在那觀念在人生行為上所發生的效果。凡試驗不出什麼效果來的東西，必定不能影響人生行為。所以我們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認某種觀念時有那麼些效果，不承認他時又有那麼些效果，如此我們就是這個觀念的完全意義了。除掉這些效果之

外，更無別種意義。這就是我所主張的實驗主義。』（Journal of Philos., Psy., and Sc. Meth. XIII, No. 26, P. 710. 引）

他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一切有意義的思想都會發生實際上的效果。這種效果便是那思想的意義。若問那思想有無意義或有什麼意義，只消求出那思想能發生何種實際的效果；只消問若承認他時有什麼效果，若不承認他時又有什麼效果。若不論認他或不認他，都不發生什麼影響，都沒有實際上的分別，那就可說這個思想全無意義，不過胡說的廢話。

皮耳士又說，『凡一個命辭的意義在於將來。（命辭或稱命題 Proposition。）何以故呢？因為一個命辭的意義還只是一個命辭，還只是把原有的命辭翻譯成一種法式使他可以在人生行為上應用。』他又說，『一個命辭的意義即是那命辭所指出一切實驗的現象的通則』。（同上書P. 711引）這話怎樣講呢？我且舉兩條例。譬如說『砒霜是有毒的』。這個命辭的意義還只是一個命辭。例如「砒霜是吃不得

的』，或是『吃了砒霜是要死的』，或是『你千萬不要吃砒霜』。這三個命辭都只是『砒霜有毒』一個命辭所涵的實驗的現象。後三個命辭即是前一個命辭翻譯出來的應用公式，即是這個命辭的眞正意義。又如說，『悶空氣是害衞生的』，和『這屋裏都是悶空氣』。這兩個命辭的意義就是叫你『趕快打開窗子換換新鮮空氣』！

皮耳士的學說不但是說一切觀念的意義在於那觀念所能發生的效果，他還要進一步說，一切觀念的意義，即是那觀念所指示我們應該養成的習慣。『悶空氣有害衞生』一個觀念的意義在於他能使我們養成常常開窗換新鮮空氣的習慣。『運動有益身體』一個觀念的意義在於他能使我們養成時常作健身運動的習慣。科學的目的只是要給我們許多有道理的行爲方法，使我們從信仰這種方法生出有道理的習慣。這是科學家的知行合一說。這是皮耳士的實驗主義。（參看 Journal of Philos., Psy., and Sc. Meth. XIII, 21, P. 709—720）

皮耳士的實驗主義只是一種方法論。我們在上章曾指出赫胥黎的存疑主義是一

種思想方法，他的要點在於注重證據。對於一切迷信，一切傳說，他只有一個作戰的武器，是『拿出證據來』。這個態度，雖然確是科學的態度，但只是科學方法的一方面，只是消極的破壞的方面。赫胥黎還不曾明白科學方法在思想上的完全涵義。何以見得呢？赫胥黎的論文的第一卷，大多是論科學成績的文章，他自己還題一個總目，叫做『方法與結果』。他還做一篇小序，說本卷第四篇說的是笛卡兒指出的科學判斷必不可少的條件，其餘八篇說的都是笛卡兒的方法應用到各方面將來的結果。但笛卡兒的方法只是一個『疑』字；赫胥黎明明指出笛卡兒的方法只是不肯信仰一切不清楚分明的命辭，只是把一個『疑』字從罪過的地位升作一種責任了。赫胥黎認清了這個『疑』字是科學精神的中心，他們當時又正在四面受敵不能不作戰的地位，所以他的方法只是消極的部分居多，還不能算是科學方法的完全自覺。皮耳士的實驗主義，方才把科學方法的積極消極兩方面的含義發揮出來，成為一種哲學方法論。在積極的方面，皮耳士指出『試驗』作標準：『一個觀念的意義完全在

於那觀念在人生行爲上發生的效果。承認他時，有什麼效果？不承認他時，有什麼效果？如此，我們就有這個觀念的完全意義。』在消極的方面，他指出凡試驗不出什麼效果的都沒有意義。這個標準，比笛卡兒的『明白』『清楚』兩個標準更厲害了。

皮耳士的文章是一八七七年出版的，當時的人都不很注意他。直到二十年後，詹姆士用他的文學的天才把這個主義漸漸的傳播出來，那時候機會也比較成熟了，所以這個主義不久便風行一世了。

但詹姆士是富於宗教心的人。他雖是實驗主義的宣傳者，他的性情根本上和實驗主義有點合不攏來。他在一八九六年發表一篇『信仰的心願』（The Will to Believe），反對赫胥黎一班人的存疑主義。赫胥黎最重證據，和他同時的有一位少年科學家克里福（W. K. Clifford, 1845—1879）也極力擁護科學的懷疑態度來攻擊

宗教。克利福雖然死的很早，（死時只有三十多歲）但他的論文與講演集（Lectures and Essays）却至今還有人愛讀，他有一段話說：

> 如果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安慰和愉快，就信仰一些不曾證實不曾疑問的命題，那就是侮辱信仰了。……沒有充分證據的信仰，即使他能發生愉快，那種愉快是偷來的。……我們對於人類的責任是要防禦這樣的信仰，就同防禦瘟疫一樣，不要使自己染了瘟疫還傳染全城的人。……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何人，凡沒有充分證據的信仰，總是錯的。

這種宣言，詹姆士大不滿意；他就引來做他的『信仰的心願』的出發點。他很詼諧的指出這班人說的事事求『物觀的證據』（Objective evidence）是不可能的。他說：

> 物觀的證據，物觀的確實，確是很好的理想。但是在這個月光照着，夢幻常來尋着的星球上，那裏去尋他們呢？……互相矛盾的意見曾經自

誇有了物觀的證據的，也不知有過多少種了！『有一個上帝』—『上帝是沒有的』；『心外的物界是可以直接知得的』—『心只能知他自己的意象』；『有一種無條件的道德命令』—『道德成爲義務是欲望的結果』；『人人有一個長在的心靈』—『只有起滅無常的心境』；『因果是無窮的』—『有一個最後之因』；『一切都是不得已（Necessity）』—『自由』……我們回想古來適用這個物觀證據的主義到人生上去的，最驚人的莫如當日教會的異端審問局（The Holy Office of Inquisition）。我們想到這一層，就不十分高興去恭聽那物觀證據的話了。……

我是不能依克里福的話的。我們須記得，我們對於眞理與謬誤的責任心其實都是我們的情感生活的表現。……那說『寧可永沒有信仰，不可信仰謊話』的人，不過表示他太怕上當罷了。也許他能防制他的許多欲望和畏懼；但這個怕上當的畏懼，他卻奴隸也似的服從他。至於我

呢，我也怕上當，但我相信人在這個世界比上當更壞的事多着呢！所以克里福的教訓在我耳朵裏很有一種風狂的聲音，很像一個大將訓令他的兵士們『寧可完全不打仗，不可冒受微傷的危險』。戰勝敵人與戰勝天然，都不是這樣得來的。我們的錯誤斷乎不是那樣十分了不得的大事。在這個世界裏，無論怎樣小心，錯誤總是不能免的，倒不如把心放寬點，膽放大點罷。

他的主張是：

有時候，有些信仰的去取是不能全靠智識方面來決斷的；當這樣時候，我們情感方面的天性不但正可以，並且正必須出來決斷。因爲，當這樣時候，若說『不要決斷，還是存疑罷』，那還是一種情感上的決斷，結果也許有同樣的危險，——放過眞理。

他拿宗教的問題做例：

存疑的態度仍舊免不了這個難關；因為那樣做去，若宗教固可以免得上當；若宗教竟是真的，你豈不吃虧了麼？存疑不同信仰一樣嗎？（信仰時，若宗教是真的，固占便宜；若上當了。）譬如你愛上了一個女子，但不能斷定現在的安琪變作夜叉，你難道因此就永遠遲疑不敢向他求婚了嗎？

詹姆士明明白白的宣言：

> 假如宗教是真的，只是證據還不充分，我不願意把你的冷熱天性上，因而拋棄我一生可以賭贏的唯一機會，——這個願意冒險做去，只當我情感上對世界的宗教態度畢竟會不錯

這就是「信仰的願心」。這個態度是一種賭博的態度：宗教若是當，存疑的可以倖免；但宗教若是真的，信仰的便占便宜，存疑的與存疑，兩邊都要冒點險。但是人類的意志（Will）大都偏向占便

賭博的人明知可輸可贏，然而他總想贏不想輸。赫胥黎一派的科學說，「輸贏沒有把握，還是不賭爲妙。」詹姆士笑他們膽小，他說「不賭那會贏？我願意賭，我就賭，我就大膽的賭去，只當我不會輸的！」

他這種態度，也有他的獨到的精神。他說：

假如那造化的上帝對你說：

我要造一個世界，保不定可以救援的。這個世界要做到完全無缺的地位，須靠各個分子各盡他的能力。我給你一個機會，請你加入這個世界。你知道我不擔保這世界平安無事的。這個世界是一種眞正冒險事業，危險很多，但是也許有最後的勝利。這是眞正的社會互助的工作。你願意跟來嗎？你對你自己，和那些旁的工人，有那麽多的信心來冒這個險嗎？

假如上帝這樣問你，這樣邀請你，你當眞怕這個世界不安穩竟不敢去

嗎？你眞寧願躲在睡夢裏不肯出頭嗎？

這是詹姆士的『淑世主義』(Meliorism)的挑戰書。詹姆士自己是要我們大着膽子接受這個哀的米敦書的。他很嘲笑那些退縮的懦夫，那些靜坐派的懦夫。他說，『我曉得有些人有不願去的。他們覺得那個世界裏須要用奮鬥去換平安，這是很沒有道理的事。……他們不敢相信機會。他們想尋一個世界，要可以歇肩，可以抱住爹爹的頸頸，就此被吹到那無窮無極的生命裏面，好像一滴水滴在大海裏。這種平安清福，不過只是免去了人世經驗的種種煩惱。佛家的涅槃，其實只不過免去了塵世的無窮冒險。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實只是一班懦夫。他們怕經驗，怕生活。……他們聽見了多元的淑世主義，牙齒都打戰了，胸口的心也駭得冰冷了。』詹姆士自己說，『我嗎？我願意承認這個世界是眞正危險的，是須要冒險的；我決不退縮，我決不說「我不幹了！」』

詹姆士的哲學確有他的精采之處，但終不免太偏向意志的方面，帶的意志主義（Voluntarism）的色彩太濃重了，不免容易被一般宗教家利用去做宗教的辯護。實驗主義本來是一種方法，一種評判觀念與信仰的方法；到了詹姆士手裏，方法變變了，有時不免成了一種辯護信仰的方法了。即如他說，

> 依實驗主義的道理看來，如果『上帝』那個假設有滿意的功用，——此所謂滿意，乃廣義的，——那假設便是真的。

皮耳士的方法，這樣活用了，就很有危險了。所以皮耳士很不以為然，覺得 Pragmatism 這個名字被詹姆士用糟了，他想把那個名詞完全讓給詹姆士一派帶有意志主義色彩的『實際主義』，而他自己另造一個字 Pragmaticism 來表明他的『實驗態度』。杜威也不贊成詹姆士的意志主義，所以他不用 Pragmatism 的名稱，自稱為『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又稱為『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只有英國的失勒（F. C. S. Schiller）一派的『人本主義』（Humanism），名稱上

雖有不同，精神上却和詹姆士最接近。

現在單說杜威的工具主義。杜威始終只認實驗主義是一種方法論，故他最初只專力發揮實驗主義的邏輯一方面，這種邏輯他叫做『工具的邏輯』，後來也叫做『試驗的邏輯』。一九〇七年，詹姆士出了一部書，叫做『實驗主義』，他想把皮耳士，杜威，失勒，以及歐洲學者倭斯襪（Ostwald），馬赫（Mach）的學說都貫串在一塊，看作一個哲學大運動。這書也談玄學，也談知識論，也談常識，也論眞理，也論宇宙，也論宗教。杜威覺得他這種大規模的綜合是有危險的，所以他做了一篇最懇切的批評，叫做『實驗主義所謂「實際的」是什麼』，後來成為他的『試驗的邏輯雜論』（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的一篇。杜威把詹姆士論實驗主義的話，總括起來，作為實驗主義的三個意義：第一，實驗主義是一種方法；第二，是一種眞理論；第三，是一種實在論。杜威引詹姆士的話來說明這三項如下：

（1）方法論　詹姆士總論實驗主義的方法是『要把注意之點從最先的

物事移到最後的物事；從通則移到事實，從範疇移到效果。」（看胡適文存卷二，頁九五。）

（2）真理論　『凡真理都是我們能消化受用的，能考驗的，能用旁證證明的，能稽核查實的。凡假的都是不能如此的。』『如果一個觀念能把我們一部分的經驗引渡到別一部分的經驗，連貫的滿意，辦理的妥貼，把複雜的變簡單了，把煩難的變容易了。——如果這個觀念能做到這步田地，他便「真」到這步田地，便含有那麼多的真理。』（看胡適文存卷二，頁九八—一〇二。）

（3）實在論　『理性主義以為實在（Reality）是現成的，永遠完全的；實驗主義以為實在還在製造之中，將來造到什麼樣子便是什麼樣子。』『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裏，由我們雕成什麼像。』（看同書卷二，頁一〇五—七。）

但杜威指出實驗主義雖有這三種意義，其實還只是一種方法論。他把方法論再分析出來，指出他的三種應用。（甲）用來規定事物（Objects）的意義，（乙）用來規定觀念（Ideas）的意義，（丙）用來規定一切信仰的意義。

（甲）事物的意義。詹姆士引德國化學大家倭斯襪（Ostwald）的話，『一切實物能影響人生行爲；那種影響便是那些事物的意義。』他自己也說，『若要使我們心中所起事物的感想明白清楚，只須問這個物事能生何種實際的影響，——只須問他發生什麼感覺，我們對於他起何種反動。』譬如說『悶空氣』，他的意義在於他對於呼吸的關係和我們開窗換空氣的反動。

（乙）觀念的意義。我們如要規定一個觀念的意義，只須使這觀念在我們經驗以內發生作用。把這個觀念當作一種工具用，看他在自然界能發生什麼變化，什麼影響。一個觀念（意思）就像一張支票，上面寫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這個自然銀行見了這張支票即刻如數現兌，那支票便是眞的，——那觀念便是眞的。

（丙）信仰的意義。信仰包括事物與觀念兩種，不過信仰所包事物觀念的意義是平常公認為已確定了的。若要決定這種觀念或學說的意義，只須問，『如果這種學說是真的，那種學說是假的，於人生實際上可有什麼分別嗎？如果無論那一種是真是假都沒有實驗上的區別，那就可證明這種表面不同的學說其實是一樣的，一切爭執都是廢話。』

以上是杜威就詹姆士書裏搜括出來的方法論。杜威自己著的書，如『我們如何思想』，如『試驗的邏輯雜論』，都特別注重思想的工具的作用。怎樣是『工具的作用』呢？杜威說：

> 我們人，手裏的大問題是：怎樣對付外面的變遷才可以使這些變遷朝着那於我們將來的活動有益的方向走。……生活的進行全在能管理環境。生活的活動必須把周圍的變遷一一變換過；必須使有害的勢力變成無害的勢力；必須使無害的勢力變成幫助我們的勢力。

這種生活就是經驗。經驗全是一種『應付的行爲』；思想知識就是應付未來的重要工具。向來的哲學家不明白經驗的眞性質，所以有些人特別注重感覺，只認那細碎散漫的感覺爲經驗的要義；有些人特別注重理性，以爲細碎的感覺之上還應該有一個綜合組織的理性。前者屬於經驗主義，後者屬於理性主義。近代生物學和心理學發達的結果，使我們明白這種紛爭是不必有的。杜威指出感覺和推理都是經驗（生活）的一部分。平常的習慣式的動作，例如散步，讀小說，睡覺，本沒有什麼段落可分；假如散步到一個三叉路口，不知道那一條是歸路，那就不能不用思想了；又如讀書讀到一處忽然上下不相接了，讀不下去了，那就又不能不用思考的工夫了。這種疑難的境地便是思想的境地，困難的感覺便是思想的動機，『便是思想的挑戰書』。感覺了困難之後，我們便去搜求解決困難之法，這便是思想。思想是解決困難的工具。當搜求解決的方法之時，我們的經驗知識便都成了供給資料的庫藏。從這庫藏裏湧出來了幾個暗示的主意，我們一一選擇過，斥退那些不適用的，單留下

那最適用的一個主意。這個主意在此時還只是一種假設的解決法；必須他確能解決那當前的困難，必須實驗過，方才成爲證實的解決。解決之後，動作繼續進行；散步的繼續散步，讀書的繼續讀書，又回到順適的境地了。

我們可以把思想的層次畫一個略圖：

仔細分析起來，凡是有條理的思想，大概都可以分作五步：（1）感覺困難；（2）尋出疑難所在；（3）暗示的湧現；（4）評判各種暗示的解決，假定一個最適用的解決；（5）證實（就是困難的解決）。——在這五步裏，究竟何嘗單是細碎的感覺？又何嘗有什麼超於經驗的理性？從第一步感覺困難起，到最後

一步解決困難止，步步都是一段經驗的一個小部分，都是一個『適應作用』的一個小段落。

杜威在他的新著哲學的改造（一九二〇）裏說：

……我們現在且看從古代生活到近代生活，『經驗』本身遭遇的變化。在柏拉圖眼裏，經驗只是服從過去，服從習慣。經驗差不多等於習俗，——不是理性造的，也不是用心造成的，只是從很無意識的慣例相習成風的。所以在柏拉圖眼裏，只有『理性』可以解放我們，使我們不做盲從習俗的奴隸。

到了倍根和他那一派的哲學家，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奇怪的翻案。理性和他手下的許多抽象觀念倒變成守舊拘迂的分子了。經驗却變成解放的動力了。在倍根一派的眼裏，經驗指那新的分子，使我們不要拘守舊的習慣，替我們發見新的事實與真理。對於經驗的信仰，並不產生頑固，

却產生了謀進步的努力。

這個古今的不同，正因爲大家都不知不覺的承認了，所以是格外可注意的。這一定是因爲人生實在的經驗上起了一種具體的重大的變化了。因爲人們對於『經驗』的見解究竟是跟着實際經驗來的，而且是做照那實際的經驗的。

當希臘的數學和其他理性的科學（Rational Science）發達的時候，科學的學理不曾影響到平常的經驗。科學只是孤立的，離開人事的，從外面加入的。醫術總算是含有最多量的實證知識了，但醫術還只是一種技術，不曾成爲科學。况且當日各種實用的技術裏也沒有有意的發明與有目的的改良。匠人只知道摹做遺傳下來的模型；不依老樣式做去，往往退步了。技術的進步，或者是慢慢的無意的逐漸衍變出來的，或者是一時興到，偶然創出的一種新式。既然沒有自覺的方法，只好歸功於神

助了。在社會政術的方面，像柏拉圖那樣的澈底改革家，只覺現有的弊病都是因爲缺乏可以倣效的型範。匠人制器，尙有型範可以依據，而社會國家裏反沒有這種型範。哲學家應該供給這種法象；法象成立之後，應該得宗教的尊崇，藝術的裝點，教育的灌輸，行政官的執行，總要使他們一成不變。

試驗的科學的發達，使人們能制裁他們的環境；這本是不用再詳說的了。但這種制裁是和那舊日的經驗觀不相容的，然而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層，所以我們不能不指出：經驗從『經驗的』（Empirical）變爲『試驗的』（Experimental）的時候，有一件根本重要的事就發生了。從前人們用過去經驗的結果，只不過造成一些習慣，供後人來盲目的服從或盲目的廢棄。現在人們從舊經驗裏尋出目的和方法來發展那新而且更好的經驗。所以經驗竟積極的自己制裁自己了。詩人沙士比亞曾說

「沒有法子可以改善「自然」，但「自然」自己供給那種法子」。我們也可拿他說『自然』的話來說經驗。我們不用專鈔老文章，也不須坐待事變來逼迫我們變化。我們用過去經驗來創造新而更好的將來經驗。經驗的本身就含有他用來改善自己的手續了。

所以智識——所謂『理性』——並不是外加在經驗上的東西。他固是經驗所暗示的，固須靠經驗來證實的；但他又可以從種種發明裏用來擴充經驗，使經驗格外豐富。……康德哲學裏的『理性』，是用來介紹普遍性與秩序條理到經驗裏去的；那種『理性』，在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可以用不着了；那不過是一班中了古代形式主義和煩瑣術語的毒的人揑造出來的。我們只要那過去經驗裏出來的一些具體的意思，——依據現在的需要，漸漸發展成熟；用來做具體改造的目的與方法；並且用適應的事業的成敗來試驗過，——就儘夠了。這些從經驗出來，積極的用在新的目

的上的種種意思，我們就叫做『智慧』（Intelligence）。（頁九二—九六。）

杜威在這幾段裏指出古今人對於『經驗』的態度所以不同，正因爲古今人實際的經驗確已大不相同了。古人的經驗是被動的，守舊的，盲目的，所以古哲學崇拜理性而輕視經驗。今人的經驗，因爲受了試驗科學的影響，是主動的支配自然，是進取的求革新，是有意識的計畫與試驗，所以倍根以來有許多哲學家推崇經驗而攻擊理性和他的附屬物。但人們究竟不肯輕易打碎他們磕頭膜拜過的偶像，所以總想保存一個超於經驗之上而主持經驗的『理性』。這是兩千年歐洲哲學史的一個總綱領。杜威指出，我們正用不着康德們捏造出來的那個理性。經驗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沒有什麽別的理性。人遇困難時，他自然要尋求應付的方法；當此時候，他的過去的經驗知識裏，應需要的徵召，湧出一些暗示的意思來。經驗好像一個檢察官，用當前的需要做標準，一項一項的把這些暗示都審查過，把那些不相干的都發放囘去，單留下一個最中用的；再用當前的需要做試金石，叫那

個留下的假設去實地試驗，用試驗的成敗定他的價值。這一長串連貫的作用，──從感覺困難到解決困難，──都只是經驗的活用。若說『既有作用，必還有一個作用者』，於是去建立一個主持經驗的理性：那就是為宇宙建立一個主宰宇宙的上帝的故智了！

杜威的這一個中心觀念，把哲學史上種種麻煩的問題，──經驗與理性，感覺與理智，個體與名相，事與理，──都解決了。他在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裏，曾說：

> 智識上的進步有兩條道路。有時候，舊觀念不必十分改變，更不必完全拋棄，只須擴大範圍，精密研究，知識也就因此增加了。有時候，知識的增加只要性質的變換，不要數量的增加。人心覺得有些老問題實在不值得討論了；從前火熱的意思，現在退涼了；從前很迫切的興趣，現在冷淡了。人們的道路改了一個方向了；從前的困難，現在都不成問題

了，從前不注意的問題，現在倒變大了。那些老問題未必就解決了，但他們用不着解決了。（頁三。）

杜威覺得哲學史上有許多問題都是哲學家作繭自縛的問題，本來就不成問題，現在更用不着解決了。我們只好『以不了了之』。他說：

如果哲學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哲學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同書，頁六五。）

（六）晚近的兩個支流

這一章名爲『晚近的兩個支流』。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但我個人觀察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世界思潮，自不能不認達爾文赫胥黎一派的思想爲哲學界的一個新紀元。自從他們提出他們的新實證主義來，第一個時期是破壞的，打倒宗教的威權，解放人類的思想。所以我們把赫胥黎的存疑主義特別

提出來，代表這第一時期的思想革命。一許多哲學史家都不提起赫胥黎，眞是大錯的。他們只認得那幾個奧妙的「哲學家的問題」，不認得那驚天動地的「人的問題」！如果他們稍有一點歷史眼光，他們應該知道二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上，沒有一次的思想革命比一八六〇到一八九〇年的思想革命更激烈的。一部哲學史裏，康德佔四十頁，而達爾文只有一個名字，而赫胥黎連名字都沒有，那是決不能使我心服的。一

第二個時期是新實證主義的建設時期：演化論的思想侵入了哲學的全部，實證的精神變成了自覺的思想方法，於是有實驗主義的哲學。這兩個時期是這五六十年哲學思潮的兩個大浪。但在這洶湧的新潮流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迴波，一些支派，內中那舊浪漫主義的迴波，我們已說過了（第二章）。現在單敘最近三十年中的兩個支流：一個是法國柏格森的新浪漫主義，一個是英美兩國的新唯實主義。

（A）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實證主義——無論舊的新的——都是信仰科學的。科學家的基本信條是承認人的智

慧的能力。科學家的流弊往往在於信仰理智太過了，容易偏向極端的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而忽略那同樣重要的意志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頌讚正在高唱的時候，便有反理智主義的（Anti-intellectualistic）喊聲起來了。在舊實證主義的老本營裏，我們早就看見孔德的哲學終局成了孔德的宗教。在新實證主義的大本營裏，那實驗主義的大師詹姆士也早已提出意志的尊嚴來向赫胥黎們抗議了（見上章）。同時法國的哲學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種很高的反理智主義的抗議。

柏格森不承認科學與論理可以使我們知道『實在』的真相。科學的對象只是那些僵死的糟粕，只是那靜止的，不變的，可以推測預料的。在那靜止的世界裏，既沒有個性，又沒有生活，科學與論理是很有用的。但是一到了那動的世界裏，事事物物都是變化的，生長的，活的，——那古板的科學與論理就不中用了。然而人的理智（Intellect）偏不安本分，偏要用死的法子去看那活的實在；於是他硬把那活的

實在看作死的世界，硬說那靜的是本體，而動的是幻象；靜止是眞的，而變動是假的。科學家的理想的宇宙是一個靜止的宇宙。科學的方法是把那流動不息的時間都翻譯成空間的關係，都化成數量的和機械的關係。這機的方法是不能了解『實在』的眞相的。

柏格森說，只有『直覺』（Intuition）可以眞正了解『實在』。直覺就是生活的自覺。這個宇宙本來是活的，他有一種創造向前的力，——柏格森叫他做『生活的衝動』（Elan Vital）——不斷的生活，不息的創造。這種不息的生活向前，這種不斷的變遷，不能用空間的關係來記載分析，只是一種『眞時間』（Duree）。這種眞時間，這種『實在』，是理智不能了解的。只有那不可言說的直覺可以知道這眞實在。

柏格森也有一種進化論，叫做『創造的進化』（Creative Evolution）。這種學說假定一個二元的起原：一方面是那死的，被動的物質；一方面是那『生活的衝

動」。生命只是這個原始衝動在物質上起作用的趨勢。這個原始衝動是生物演化的總原因。他在種子裏，一代傳給一代，積下過去的經驗，不斷的向前創造，就同滾雪球一樣，每一滾就加上了一些新的部分。這個衝動的趨勢，是多方面的，是無定的，是不可捉摸的。他的多方面的衝動，時時發生構造上，形體上的變異；變異到了很顯著時，就成了新的種類了。他造成的結果，雖是很歧異的，雖是五花十色的，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唯一趨勢，——就是那生活的衝動。

我們拿動物的眼睛做個例。從一隻蒼蠅的眼，到人的眼，眼的構造確有繁簡的不同；但每一種動物的眼各有他的統一的組織；他的部分雖然極繁複，而各有一個單一的「看」的作用。機械論的生物學者只能用外境的影響來解釋這一副靈妙繁複的機器的逐漸造成，但他們總不能說明何以各微細部分的統屬呼應。至於目的論者用一個造物主的意志來解釋，更不能滿意了。柏格森用那原始的生活衝動來解釋；因爲有那「看」的衝動，那看的衝動在物質上自然起一個單一的作用，那單一的作

用自然發生一個統一的互應的構造　那衝動越向前，那構造也越加精密。但每一個構造—自極幼稚的到極高等的，—各自成爲一個統一完備的組織。

柏格森又用一個很淺近的比喻。假如我們伸一隻手進到一桶鐵屑裏去，伸到一個地位，擠緊了，不能再進去了：那時候，鐵屑自然擠成一種有定的形式，——就是那伸進去的手和手腕的形式。假如那手是我們看不見的，那麼，我們一定要想出種種話頭來解釋那鐵屑的組織了：有些人說，每一粒鐵屑的位置只是四周的鐵屑的動作的結果，那就是機械論了；有些人說，這裏面定有一個目的的計畫，那又是目的論了。但是那眞正的說明只是一種不可分析的動作，——那手伸進鐵屑的動作。這個動作到的所在，物質上起了一種消極的阻力，就成了那種的集合了。（創造的進化，頁八七—九七。）眼睛的演化也是如此。

柏格森批評那機械式的演化論，很有精到的地步。但是他自己的積極的貢獻，却還是一種盲目的衝動。五十年來，生物學對於哲學的貢獻，只是那適應環境的觀

念。這個觀念在哲學界的最大作用，並不在那機械論的方面，乃在指出那積極的，創造的適應，認為人類努力的方面。所謂創造的適應，也並不全靠狹義的理智作用，更不全靠那法式的數學方法。近代科學思想早已承認「直覺」在思考上的重要位置了。大之，科學上的大發明，小之，日用的推理，都不是法式的論理或機械的分析能單獨辦到的。根據於經驗的暗示，從活經驗裏湧出來的直覺，是創造的智慧的主要成分。我們試讀近代科學家像法國班嘉賚的科學與假設（Poincare, Science and Hypothesis），和近代哲學家像杜威們的創造的智慧，就可以明白柏格森的反理智主義近於「無的放矢」了。

（B）新唯實主義　New Realism）

近年的一個最後的學派是新唯實主義。「唯實主義」（Realism）的歷史長的很哩。當中古時代，哲學家爭論「名相」（Universals）的實性，就發生了三種答案：

（1）名相的實在，是在物之先的：未有物時，先已有名象了。這一派名爲柏拉圖派唯實論。

（2）名相不能超於物先，名相卽在物之中。這一派名爲亞里士多德派唯實論。

（3）名相不過是物的名稱，不能在物之先，也不在物之中，乃是有物之後方才起的。這一派名爲唯名論（Nominalism）。

中古以後，哲學史上的紛爭總脫不了這三大系的趨勢。唯名論又名『假名論』，因爲他不認名相的實在，只認爲人造的稱謂。（楊朱篇，『名無實，實無名。名者，僞而已矣。』）所以唯實論其實是承認名相的眞實，而唯名論其實乃是『無名論』。大抵英國一系的經驗哲學是假名論的代表；而大陸上的理性哲學是唯實論的代表。所以極端的唯心論（意象論）乃出在英國的經驗學派裏，而大陸上理性派的大師笛卡兒乃成一個唯物論者！這件怪異的事實，我們若不明白中古以來唯實唯名的背

景，是不容易懂得的。

最近實驗主義的態度雖然早已脫離主觀唯心論（Subjective idealism）的範圍了，但他認經驗爲適應，認眞理爲假設，認知識爲工具，認證實爲眞理的唯一標準，都帶有很濃厚的唯名論的色彩。在英國的一派實驗主義—失勒的人本主義，—染的意象論的色彩更多。在這個時候，英國美國的新唯實主義的興起，自然是很可以注意的現象。英國方面，有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美國方面，有何爾特（E. B. Holt），馬文（W. T. Marvin）等。何爾特和馬文等六位教授在一九一○年出了一個聯名的宣言，名爲『六個唯實論者的第一次宣言』；一九一二年又出了一部合作的書，名爲『新唯實主義』。

我們先引他們的第一次宣言來說明新唯實論的意義。他們說：

唯實論主張：物的有無與認識無關；被知識與否，被經驗與否，被感覺與否，都與物的存否無關；物的有無，並不依靠這種事實。

六個唯實論者之中，馬文教授於一九一七年出了一部歐洲哲學史，那書的末篇，七章是專論新唯實主義的。我們略採他的話來說明這一派在歷史上的地位。馬文說：

關於『知識的直接對象是心的（Mental）呢，還是非心的呢』一個問題，共有四種答案：

(1)笛卡兒以來的二元論者說科學能推知一個物的（非心的）世界。

(2)存疑派的現象論者（Agnostic phenomenalists）說科學只能知道那五官所接觸的境界，此外便不能知道了。

(3)意象論者，（Idealists）包括那主觀的唯心論者和那物觀的意象論者，根本推翻二元論，竟不認有什麼超於經驗的物界。

(4)新唯實論者說我們須跳過笛卡兒，跳過希臘哲學，重新研究什麼是『心的』，重新研究知識與對象的關係。

新唯實論者批評前三派，共有兩大理由。第一，笛卡兒的二元論和他引起的主

觀主義，有了三百年歷史的試驗，結果只是種種不能成立的理論，仍舊不能解決笛卡兒當日提出『心物關係』的老問題。這一層，我們不細述了。（可看馬文原書，頁四一一—四一三。）第二，這種二元論和他對於『心的』的見解，都從希臘思想裏出來的。希臘思想假定兩個重要觀念：一個是『本體』（Substance）的觀念，一個是『因果』的觀念。這兩個觀念，在近代科學裏都不能存在了，所以我們現在應該用現代科學作根據，重新研究什麼是『心的』。這第二層，確是很重要的，故我們引馬文的話來說明：

自從葛理賴以來，科學漸漸脫離『因』的觀念，漸漸用數學上的『函數』（Function）的觀念來代他。……例如圓周之長，就是半徑的函數，因為圓半徑加減時，圓周同時有相當的加減。又如槓杆上應加的壓力，就是槓杆的定點的函數。……函數只是數學上用來表示相當互變的兩個級系之間的一種關係。……科學進步以來，所謂『因』的，都

化成了這種函數的關係：我們研究天然事物越精，這些函數的關係越明顯，那野蠻幼稚的思想裏的『因』和『力』越容易不見了。『自然』成了一個無窮複雜的蛛網，他的蛛絲就是數學上所謂『函數』。

『心與物怎樣交相作用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會把他們看作相為因果的兩種本體了，我們只須去尋出兩個級系之間的函數的關係。這些關係都可以用試驗研究去尋出來，都不是供懸想的理論去辯駁的東西。這些關係都是可以觀察的，並不關什麼不可知的本體。這樣一來，那心物關係的老問題就全沒有了。……

對於『本體』(Substance)的觀念，也可用同樣的駁難。普通的思想總以為世間有許多原質，如木石金水等等；物體就是這些原質組成的。不但如此，普通人還以為一物的原質可以說明那物的行為或『性質』。因為這是鋼，所以是堅硬的；因為他是木，所以可燒；……但是在嚴

格的科學思想裏，這些觀念和仙鬼魔術同屬於幼稚時代的懸想。依科學看來，物所以成物，所以有他的特別作用，所以有他的特性，全因爲他的構造（Structure）。假若我們還要問什麼是構造，科學說，構造就是組織，就是各部分間的關係。這個太陽系的宇宙所以如此運行，所以有他的特性，全是因爲他的組織。吹烟成圈，吹笛成音，……都只指出物的本性不過是他的構造的假面。近代科學漸漸的拋棄『本體』的觀念和搜求本體的志願了。（化學家也漸漸知道，他的所謂『元子』並不是向來所謂原質，只是組織不同的物質。）

近世思想上的這兩個變遷，就是新唯實論的基礎：新唯實論解決心和知識的問題的方法，只是要人拋棄那古代思想傳下來的『因』與『本體』的老觀念，而用近代科學裏『構造』與『函數』兩個觀念來用到心的生活的事實上去。

馮文又說新唯實主義論『心』的主張是：

人心並不是一個最後不可分析的東西，也決不是一個本體。心有一個構造，現在漸漸研究出來了。心有各部分，因為疾病可以損害一些部分，而不能損害另一些部分；教育可以改變一些部分，而不能改變另一些部分。……至少有一部分已經有了說明了。這種說明大要都是生物學的說明。我們的肢體是配着我們的環境的，我們的心也是如此。我們的肢體是遺傳的，心的特性也是遺傳的。我們的筋力配做種種相當的筋力伸縮，我們也有衝動，愉快，欲望等等來引起相當的筋力伸縮。心的某種特性多用了，那種特性就會格外發展；不用他，他就萎弱了。……總而言之，神經系統的生理學漸漸的使我們明白心的作用，心的發展，心的訓練。科學研究心越進步了，心和物的關係越見得密切了，那向來的心物二元論也就越見得沒有道理了。

關於『知識』的作用，新唯實論者也認爲一種『關係』。他們也受了生物學的影響，所以把這種關係看作『生物的一種反應』。馬文說：

> 知識這件事（Knowing）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作用，他不過是這個世界裏的一件平常事實，正和風吹石落一樣；他也很容易研究，正和天然界裏的一切複雜事實一樣。……知識不過是一種複雜的行爲，複雜的反應。……我們的神經系統是不適宜於應付那全個的世界的，我們所有的那些生成的或學來的反應，自然是很不完全的。錯誤就是這種不完全的反應。（頁四一三—四二．）

以上述新唯實論者的基本主張。他們對於歷史上因襲下來的『哲學家的問題』，雖不像實驗主義者『以不了了之』的爽快，但他們的解決法確也有很精到的地方。但我們看新唯實論者的著作，總不免有一種失望的感想：他們究竟跳不出那些『哲學家的問題』的圈子。他們自命深得科學的方法，他們自以爲他們的哲學是建築在

科學方法之上的；然而他們所謂『哲學裏的科學方法』究竟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英國的唯實論者羅素說的最多，我們請他來答覆，羅素在他的『哲學裏的科學方法』（神秘主義與邏輯頁九七——一二四）裏，曾說：

第一，一個哲學的命辭必須是普通的。他必不可特別論到地球上的事物，也不可論到這太陽系的宇宙，也不可論到空間和時間的任何部分。……我主張的是：有一些普通的命辭可以適用到一切個體事物，例如論理學上的命辭。……我要提倡的哲學可以叫做『邏輯的元子論』，或叫做『絕對的多元論』，因爲他一方面承認多物的存在，一方面又否認這許多物組成的全體。……

第二，哲學的命辭必須是先天的（A priori）。一個哲學命辭必須是不能用經驗上的證據來證實的，也不能用經驗上的證據來否證的。……無論這個實在世界是怎樣組成的，哲學說的話始終是真的。（頁一一〇——

一一一•）

假如我們用這兩個標準來評哲學，我們可以說幾千年來還不曾有哲學。況且他們的『科學方法』，也實在是奇怪的很！羅素說哲學同『邏輯』無別，而邏輯只管兩部分的事：

第一，邏輯只管一些普通的原理，這些原理可以施於事事物物，而不須舉出某一物，某種表詞，或某種關係。例如：『假如X是A類的一員，而凡A類的各員都是B類的一員，則X是B類的一員，無論XAB是什麽。』

第二，他只管『邏輯的法式』(Logical forms)的分析與列舉。這種法式就是那些可能的命辭的種類，事實的各種，事實的組合，分子的分類。這樣做去，邏輯供給我們一本清單，列舉着種種『可能』(Possibilities)，列舉着種種抽象的可能的假設。（頁一一二•）

現在姑且不說這樣縮小哲學範圍的是否正當。我們要問，如果科學不問『經驗的證據』，他們更從何處得來那些『普遍的原理』？他們說，須用分析。然而分析是很高等的一個知識程度，是經驗知識已進步很高的時代的一種產物，並不是先天的。人類從無量數的『經驗的證據』裏得來今日的分析本事，得來今日的許多『邏輯的法式』，現在我們反過臉來說『哲學的命辭須是不能用經驗上的證據來證實或否證的』，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罷？

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的最大責任與最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然而羅素的『哲學裏的科學方法』却說哲學命辭『必不可論到地球上的事物，也不可論到空間或時間的任何部分』。依這個教訓，那麼，哲學只許有一些空廓的法式，『可以適用到一切個體事物』。假如人生社會的問題果然能有數學問題那樣簡單畫一，假如幾個普遍適用的法式——例如『X＝A，A＝B，∴X＝B』——真能解決人生的問題，那麼，我們也可以跟着羅素走。但這種

純粹『法式的哲學方法』，斯平挪莎（Spinoza）在他的『笛卡兒哲學』和『人生哲學』裏早已用過而失敗了。羅素是現代提倡這種『科學方法的哲學』的人，然而他近幾年來談到社會問題，談到政治問題，也就不能單靠那『不論到地球上的事物而可以適用到一切個體事物』的先天原則了。

羅素在牛津大學演講『哲學裏的科學方法』時，正是一九一四年；那年歐戰就開始了，羅素的社會政治哲學也就開始了。我們讀了羅素的政論，讀了他反對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議論，處處可以看出羅素哲學方法的背影。那個背影是什麼呢？就是他的個人主義的天性。他反對强權，反對國家干涉個人的自由，反對婚姻的制度，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處處都只是他這種個人主義的天性的表現。他的哲學，——『邏輯的元子論』或『絕對的多元論』——『一方面承認多物的存在，一方面又否認這許多物組成的全體』，其實只是他的個人主義的哲學方式。我們與其說羅素的哲學方法產生了他的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不如說他的個人主義的

天性影響了他的哲學方法。同一個數學方法，那一位哲學家只看見數學上『只認全稱而不問個體』的方面，康德是也；這一位哲學家雖然也看見了數學上『只認法式而不問內容』的方面，卻始終只認個體而不認個體組成的全體，羅素是也。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其實骨子裏還只是個人天性的區別。

我們對於新唯實主義，可以總結起來說：他們想用近代科學的結果來幫助解決哲學史上相傳下來的哲學問題，那是很可以佩服的野心；但他們的極端，重分析而輕綜合，重『哲學家的問題』而輕『人的問題』，甚至於像羅素的說法，不許哲學論到地球上的事物，不許經驗的證據來證實或否證哲學的命辭，——那就是個人資性的偏向，不能認為代表時代的哲學了。

（七）五十年的政治哲學的趨勢

這五十年中的政治哲學很有幾個重大的變遷：（一）從放任主義變到干涉主義，

（二）從個人的國家觀變到聯攀的國家觀，（三）從一元的主權論變到多元的主權論。（以下是高一涵先生代作的。）

照白爾克（E. Barker）說：自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八〇年是放任主義盛行的時代。放任主義有兩層意思：對內，把政府活動的範圍縮到最小的限度；對外，實行自由貿易的政策。這時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有兩部代表個人主義的最重的著作出現：一是社會的靜止觀（Social Statics）（一八五〇年出版的），一是個人與國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一八八五年出版的）。但是放任主義的命運似乎已經走到末路來了。一方面又有文學家如加萊爾（Carlyle）羅斯金（Ruskin）等，都想把社會的生活放在偉人的引導和軍政的組織之下，這種理想便是放任主義的對頭。自一八七〇年福斯特（Forster）已經制成國家干涉教育的條例；一八八〇年格林（Green）在牛津（Oxford）講演政治義務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Obligation），主張國家得排除侵犯個人自由的障礙。自一八八〇年以後，社會主

義已經盛行。激烈的社會主義如馬克思（Karl Marx）一派，極力的主張階級戰爭；穩健的社會主義如英國Fabians，又極力的主張改革。這兩派的主張雖然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都想把經濟生活完全放在國家或社會的支配之下。白爾克說得好，他說：

> 當一八六四年，凡不信任國家的都是正統派，凡是信任政府干涉的都是異端；到一九一四年，（因爲他的政治思想小史是在這一年中做的。）凡信任國家的都是正統派，凡是趨向無政府主義的都是異端。（見政治思想小史第一章緒論。）

這是從放任主義變到干涉主義的明證。

個人主義大概都以爲國家只是孤立的個人的總集體，在個人之外再不能不注重羣的結合。邊沁（Bentham）一派雖然贊成職工組合（Trade Union），但是他們只承認職工組合是達到個人自由競爭的一種方法。近五十年來，學者對於羣的觀念

很和從前不同。近來的學者如白爾克柯爾(G. D. H. Cole)福萊(M. P. Follett)等都認定國家的基礎不是建築在孤立的個人之上，只建築在羣的上邊。這些羣，正如絲絲相接的網子一樣，這條線連到那條線，沒有一條線不與別條線發生關係。福萊在他的新國家(The New State)中說：十九世紀的法理學（如個人權利，個人契約，個人自由之類。）都是建築在孤立的個人一個舊觀念上。他的著作，就想打破這種個人觀念的謬說，極力說明羣的意志和羣的感情。他的平民政治就是在互相關係的個人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白爾克也是抱這種見解，且看他說：

> 如果我們要是現在的個人主義者，我們便是聯羣的個人主義者。我們的個人正在結合成羣。我們不要再做個人與國家的書，只做羣與國(The Group Versus the State)的書。現在聯台主義(Federalism)盛行，普通人都以為單一國享有唯一的主權，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同生活的實際不相符。我們以為每個國家多少總是聯合的社會，包括許多不同的人

羣，不同的教會，不同的經濟組織在內，每個團體都可以行使對於團員的支配權。聯合主義的感情異常的普及。新社會主義已經丟開獨受中央支配的集產主義的方法，在行會（Guild）名義之下造羣。他承認國家爲生產的工具的主人，要求把這種工具的動用權付託於各種同業行會管理之下；想救國家來鼓獎文化，要求由行會管理經濟的生活。（見政治思想小史第六章。）

柯爾也是這樣主張。他想打破以個人爲單位的代表制，用以職業團體爲單位的代表制；（見社會學說 Social Theory 第六章。）想打破集產於國家的學說，代以集產於行會的學說。（見工業自治。）所以現在的國家是聯羣而成的國家，現在的文明是羣產生的文明；從前個人主義家心目中赤條條的個人，早已不在現在政治哲學家的心目之中了。（以上是高一涵先生作的，以下是張慰慈先生作的。）

現今政治哲學方面最重要的爭點就是主權論。主權論的學說共有兩種：一元說的和多元說的主權論。一元說的主權論就是普通一般政治學者所早已承認的學說，是把主權看做國家至尊無上的統治權。照這一元說的學說，國家是社會中的政治組織，有強制執行其意志的權力。那強制執行的權力就叫做主權，就是政治組織的根本基礎。這一種政治組織的特質有四種：

(一)有一定的土地，在那範圍之內，國家對於各種人民或人羣均有絕對的權力。

(二)統一——在一國之內，祇有一個主權。

(三)主權是絕對的，無限制的，不可讓棄的，不能分的。

(四)個人自由是發源於國家，由國家保障的。

主張一元說的學者，總是極力注重國家對於人民或人羣那一種直接的和絕對的權力。他們說：

無論在什麼地方，一元總是發現於多元之先的。所有的多元是發生於一元，是歸納於一元的。所以要有秩序必須把那多元抑制在一元之下。如非一元有管理多元之權，引導多元達到其目的，多元的公共事業萬不能做起來。統一是萬物之基礎，所以也是各種社會生存之基礎。

這一元說的主權論倡始於布丹。歐洲當封建時代之末期，時局非常擾亂，貴族與貴族爭，貴族與國王爭，國王又與教皇爭，社會上紛亂的現象達到極點，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國家是差不多陷於無政府的危境。所以非有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出來，不能救人民於水火，拯社會於沈溺。國王權力的擴張，實在是當時社會上的需要。專制君主政體最先實現於法國，所以說明這新制度所根據的新學說也發現於法國。

民治主義發展以後，人民對於主權的態度，雖經一次的改變，但是那一元說主權論的根本觀念仍舊繼續存在。十八世紀以後的主權論祇不過把「人民」這名詞來

代替「君主」這名詞罷了。不過那時所謂『人民』也決不能包括全體的人民，祇不過是中等社會以上的人民罷了；所謂民權民意也祇不過是中等社會人的權利意志罷了。中等社會人因工業革命而得到財產，又因財產所有權而得到政權。他們有了金錢，無論什麼事都容易做得到。在各國政府裏邊，這一階級的人佔了極優勝的地位，所以他們的目的祇要維持社會秩序，保持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的方法就是把國家抬高起來，把法律看做人民公共的意志，把主權當作國家的政治基礎。但是近年來，社會上的情形又不同了，勞工階級無產階級均要求社會給他們一種公平待遇；但是國家法律，差不多全是為中級社會而設的法律，政府機關也在中級社會人民手中，勞工階級和無產階級實在不能靠社會上固有的學說，固有的制度，來達到他們所要求的「公平」，所以那一元說的主權論就受了一部分人民的攻擊。

主張多元說的主權論的健將要推法國的狄格（Duguit）和英國拉斯基（Laski）兩個人。他們絕對不承認國家為社會中至尊無上的組織，高出於其餘的各種組織之

上。他們說：

人民在社會之中，組織各種各樣的團體，有宗教的團體，有文化的團體，有社交的團體，有經濟的團體。他們有教會，有銀行清算聯合會，有醫學會，有工業聯合會，凡人民間有利害關係發生之處，他們總是羣聚起來，組織一個團體。

人民對於這種種團體，也和他們對於國家同樣的盡心盡力，同樣的服從。照拉斯基說，這多元的社會觀

否認那一元的社會，一元的國家。……凡與人民相接觸的無數團體均能影響於人民的舉動，不過我們萬不能說人民的本身就因之而被那種團體併吞了。社會的作用祇有一種，不過那一種作用可以用種種方法解說，並可用種種方法達到其目的。這樣分析起來，國家祇不過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團體。國家的目的不必一定就和社會的目的相適合，猶如教

會的，或工團聯合的目的，不一定就是社會的目的。那種團體自然有種種關係，由國家管理的，不過那種團體並不因之而就在國家權力之下。國家權力的至尊無上完全是一種錯誤的想像。……在道德的作用方面，教會是不在國家之下的。在法律的作用方面，國家的尊高是………誤認『國家就是社會』的結果。我們如果注重於國家的內容一方面，那一元說的錯誤就顯而易見了。國家既是治者和被治者所組織的社會，國家的尊高當然有種種的限制：(一)國家祇能在其職權的範圍以內，不受外界的限制；(二)祇有在那種未經人民抗議的職權範圍以內，國家纔有最高的執行權力。

除出那種學理方面的攻擊之外，還有許多運動從事實方面攻擊那種根據於一元說學理所發生的政治制度。這種種運動的目的，或者是極力提倡社會中各種團體的權利，使之不受國家的侵犯；或者是想把那政治管理權分配於各種職業，使各種

職業在一定的範圍以內，有自治權力；或者再用別種方法，設立一種分權的政治制度。在英國，在法國，現今有種種勢力極大的運動，其作用均想從根本上改造現今的政治制度；改造的方法或從組織方面入手，使國內各種職業，各種利益均有派出政治代表的權，分掌政治方面的權力，或從職權方面入手，把國家權力範圍以內，分出一部份職權，由各地方機關執行。至於那種種運動的性質不是在這一篇文章的範圍以內，故不敘述。我們單把這些運動的名稱列舉於下：

(一)職業代表制度

(二)行政方面的分權

(三)地方分權的趨勢 (Regionlism and Distributivism)

(四)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五)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這都是從一元的主權論到多元的主權論的明證。(以上是張慰慈先生作的。)

統觀這幾十年的政治思想的變遷，有幾點不可不加說明。第一，從放任主義到干涉主義，自然是從不信任國家到信任國家了；然而近年的趨勢，要求國家把政治管理權分給地方，分給各種職業，根本上却不是和『信任國家』的趨勢相反的。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的放任主義，只是智識階級對於當時政府不滿意的表示。政府不配干涉，偏愛干涉，所以弄得稀糟，引起人民『別干涉我們罷！』的呼聲。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歐洲政治稍稍革新，人民干政的範圍大擴張，大陸上國家社會主義的干涉政策的成效也大顯了，故人民對於國家的信任也漸漸增加起來。但十九世紀的政治究竟還只是中等階級的政治。到了近年，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漸漸起來，團體也堅固了，勢力也成形了。他們不能信任那建立於資產階級之上的集中政府，而要求一個分權於地方和分權於職業的政府。他們的運動，並不是根本上不信任國家，只是要求一個更可以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國家；並不是無政府的運動，

只是一種改善政府組織的運動。

第二，多元主義的政治學說，並不是個人主義的復活，乃是個人主義的修正。凡是個人主義者，無論古今中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一方面只認個人，一方面却也認那空蕩蕩的『大我』『人類』；他們只否認那介於『人類』與『我』之間的種種關係，如家庭，國家之類。他們因為不願意受那些關係的束縛，所以想像出種種『天然的權利』（舊譯『天賦人權』）來做反抗的武器。一元主義的政治學說早已指出他們的謬誤了。一元主義說，『權利』(right) 是法律的產兒；沒有社會的承認和法律的保障，那有權利可說？一元主義的話雖然也有理，但總不能使個人主義者心服。多元主義的政治哲學雖然不否認個人，但也不認個人是孤立的；多元主義不但不否認家庭國家的真實，並且指出個人與人類之間還有無數『重皮疊板』的關係。你在家是一個兒子；在宗教方面是一個浸禮會會員；在職業方面是印刷工人會的會員，又是上海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在政治方面是國民黨的黨員，是婦

女參政運動會的會計，又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你在每一個團體裏，有權利，也有義務；受影響，也影響別人；受管理，也管理別人。國家不過是這種種人類社會的一種；公民的權利義務不過是種種人類關係的一種。所以白爾克說：

如果我們要是現在的個人主義者，我們便是聯羣的個人主義者。

所以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斯賓塞說的『個人對國家』的問題，乃是白爾克們說的『羣對國家』的問題了。

第三，現在的政治思想何以不反抗『干涉主義』呢？十八世紀的幾塊大招牌—『自由』『平等』—到了十九世紀的下半，反變成資產階級的擋箭牌了。工人要求政府干涉資本家，要求取締工廠和改善勞工待遇的立法，資本家便說這是剝奪他們營業的『自由』；便說這種勞動立法是特殊階級的立法（Class Legislation），是違背『平等』的原則的。放任主義的政治的結果早已成了有力階級壓制無力階級的政治！所以赫胥黎批評斯賓塞的放任主義，叫他做『行政的虛無主義』。現代的思

想所以不反抗干涉主義，正因爲大家漸漸明白了政治的機關是爲人民謀福利的一種重要工具。這個工具用的得當時，可以保障社會的弱者，可以限制社會的強暴，可以維持多數人民的自由，可以維持社會的比較的平等。所以現代的政府強迫兒童入學而父母不反抗，強制執行八時工作而工廠主人不敢反抗，禁止兒童作工而不爲剝奪作工的自由，抽富人所得稅至百之五十以上而不爲不平等。所以現代的政治問題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權限的問題，乃是如何運用這個重要工具來謀最大多數的福利的問題了。所以我們與其沿用那容易惹起誤會的『干涉主義』，不如叫他做『政治的工具主義』罷。

十一，九，五。

胡適文存二集卷三

十七年的回顧

我於前清光緒三十年的二月間從徽州到上海來那當時所謂「新學」。我進梅溪學堂後不到兩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全國的人心大震動。但是當時的幾家老報紙仍舊做那長篇的古文論說，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是那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他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夠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之後不久就成了中國智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我當時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記得有一次時報徵求報上登的一部小說的全份，似乎是『火裏罪人』，我也是送去應徵的許多人中的一個。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黏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裏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

我現在回想當時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時報呢？我想有兩個大原因：

第一，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胆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裏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裏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的簽名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

調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生有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看這種短評，在這十七年來，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

第二，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中國報紙登載小說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匯的匯報。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但匯報登的小說一大部份後來彙刻爲蘭苕館外史，都是聊齋式的怪異小說，沒有什麼影響。戊戌以後，雜誌裏時時有譯著的小說出現。專提倡小說的雜誌也有了幾種，例如新小說及繡像小說。（商務）日報之中只有繁華報（一種『花報』），逐日登載李伯元的小說。那些『大報』好

像還不屑做這種事業。（這一點我不敢斷定，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看的報又不多，不知時報以前的『大報』有沒有登小說的。）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時報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登的許多小說之中，雙淚碑最風行。但依我看來，還應該推那些白話譯本為最好。這些譯本如銷金窟之類，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在當時最為適用。倘雖道山恩仇記（Count of monte cristo）全書都能像銷金窟（此乃恩仇記的一部份）這樣的譯出，這部名著在中國一定也會成了一部『家喻戶曉』的小說了。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裏引起的。

我們可以說時報的第二個大貢獻是爲中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附張」。自從時報出世以來，這種文學附張的需要也漸漸的成爲日報界公認的了。這兩件都是比較最大的貢獻。此外如專電及要聞，分別輕重，參用大小字，如專電的加多等等，在當日都是日報界的革新事業，在今日也都成爲習慣，不覺得新鮮了。我們若回頭去研究這許多習慣的由來，自不能不承認時報在中國日報史上的大功勞。簡單說來，時報的貢獻是在十七年前發起了幾件重要的新改革。這幾件新改革因爲適合時代的需要，故後來的報紙也不能不儘量採用，就漸漸的變成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了。

我是同時報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庚戌去國以後，雖然不能有從前的親密，但也時常相見；現在看見時報長大成了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我自然很歡喜。我回想我從前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受了時報的許多好影響，故很高興的把我少年時對於時報的關係寫出來，指出他對於當時讀者和

對於中國報界的貢獻，作爲時報的一段小史，並且表示我感謝他祝賀他的微意。

但是我們當此慶賀的紀念，與其追念過去的成功，遠不如懸想將來的進步。過去的成績只應該鼓勵現在的人努力造一個更大更好的將來，這是『時』字的教訓。倘若過去的光榮只使後來的人增加自滿的心，不再求進步，那就像一個辛苦積錢的人成了家私之後天天捧着元寶玩弄，豈不成了一個守錢虜了嗎？

我們都知道時代是常常變遷的，往往前一時代的需要，到了後一時代便不適用了。時報當日應時勢的需要，爲日報界闢了許多法門，但當日所謂『新』的，現在已成舊習慣了，當日所謂『時』的，現在早已過時了。時報在當日是報界的先鋒，但十七年來舊報都改新了，新報也出了不少了，當日的先鋒在今日覺同着大隊按步徐行了。大隊今日之趕上先鋒，自然未必不是先鋒的功勞，但做先鋒的人還應該努力向前爭這個『先鋒』的位置。我今年在上海時曾和時報的一位先生談話，他說：『日報不當做先鋒，因爲日報是要給大多數人看的。』這位先生也是當日做先鋒的

人，這句話未免使我大失望。我以為日報因為是給大多數人看的，故最應該做先鋒，故最適宜於做先鋒。何以最適宜呢？因為日報能普及許多人，又可用『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報的勢力最難抵抗，最易發生效果。何以最應該呢？因為日報既是這樣有力的一種社會工具，若不肯做先鋒，若自甘隨着大隊同行，豈不是放棄了一種大責任？豈不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豈不是孤負了一種大委託嗎？

即如時報早年的歷史，便是一個明顯的例。時報在當日為什麼不跟着大家做長篇的古文論說呢？為什麼要改作短評呢？為什麼要加添文學的附錄呢？時報倡出這種種制度之後，十幾年之中，全國的日報都跟着變了，全國的看報人也不知不覺的變了。那幾十萬的讀者，十幾年來，從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某報某報體例的變更的。這就可見那大多數看報的人雖然不免有點天然的惰性，究竟抵不住『旦旦而伐之』的提倡力。假使申報今天忽然大變政策，大談社會主義，難道那看申報的人明天就會不看申報了嗎？又假使新聞報明天忽然大變政策，一律改用白話，難道那看

新聞報的人從天就會不看新聞報了嗎？我可以說：『決不會的』。看報人的守舊性乃是主筆先生的疑心暗鬼。主筆先生自己喪失了『先鋒』的銳氣，故覺得社會上多數人都不願他努力向前。譬如戴綠眼鏡的人看看一切東西都變綠了，如果他要知道荷花是紅的，金子是黃的，他須得把這副綠眼鏡除下來試試看。今天是時報新屋落成的紀念，也是他除舊布新的一個轉機，我這個同時報一塊長大的小時朋友，對他的祝詞，只是：『時報是做個先鋒的，是一個立過大功的先鋒，我希望他不必拋棄了先鋒的地位，我希望他發憤向前努力替社會開先路，正如他在十七年前替中國報界開了許多先路！』

十，十，三。北京。

祝白話晚報

我的幾位同事們，創辦了這個白話晚報，要我說幾句話。我且說我對於這個報的希望罷。

我希望這個報要做到兩個地步：

第一，要值得一駁。

第二，要禁得起一駁。

怎麼叫做『要值得一駁』呢？北京的報紙實在太多了；一個城裏有七八十種日報，誰也看不了。有好幾種報，誰也不要看。這個時候，何苦又去添出一種報呢？我以為此時在北京，別無辦新報的理由，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要出一個有主張的報。說一句話，做一篇文章，辦一個報，至少總要有點主張，至少總要值得人家一

駁。若是添出一個不痛不癢，沒有主張的報，給人家隨手丟在字紙簍裏去，或是拿去抹桌子，包豆腐乾，那種報便不值得一駁了。

怎麼說『要禁得起一駁』呢？單有主張，倒也不難。我可以主張張弧做總理，他可以主張討伐西南，你可以主張賣國。但沒有理由的主張，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主張，或是不敢公開討論的主張，都禁不起人家的一駁。這個時代的報紙，不但應該有主張，還應該有學理與見解做主張的根據。根據正確的觀察，參用相當的學理，加上公開的態度，發為公開的主張，那才是『禁得起一駁』的主張了。

我的幾位同事辦的這個報，一定可以做到這兩個地步的。也許他們還嫌我太不長進，希望太小哩。

十一，三，七。

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去年在晨報的『五四紀念號』裏，我曾說過：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靑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我們這樣承認學生干政的運動爲『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當時已有許多人看了搖頭，說我們做大學敎授的人不應該這樣鼓勵學生的運動。

但是二百六十年前，有一位中國大學者，他不但認學生干預政治是變態的社會裏不得已的事，他竟老實說這種舉動是『三代遺風』！

這位學者就是明末淸初的黃梨洲先生。他的明夷待訪錄中學校篇說：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是非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

這就是說，學校不僅是爲造畢業生而設的，理想的學校應該是一個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黃梨洲的理想國家裏沒有國會一類的制度，但他要使學校執行國會的職務。所以他說：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强，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

可見他不但不認這種學生干政的事爲『衰世之事』，他簡直說『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

他又說：

太學祭酒（卽今之國立大學校長）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這是黃梨洲理想中的國立大學。他眞是一個烏託邦的理想家！他如何能料到他著書之後二百五十八年的某月朔日，『宰相六卿』都『巡狩』於天津去打一萬元一底的麻雀牌呢！

黃梨洲不但希望國立大學要干預政治，他還希望一切學校都要做成糾彈政治的機關。國立的學校要行使國會的職權，郡縣立的學校要執行郡縣議會的職權。他說：

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師弟子各以疑義相質難。其以簿書期會不至者，罰之。郡縣官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鳴鼓號於衆。

這不是行使郡縣議會的職權嗎？

黃梨洲極力反對官府任命校長教員的制度，他主張校長教員都由公議推舉。他又主張學生應該有權驅逐一切卑污腐敗的校長與教員。他說：

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

以上略述黃梨洲關於學生運動的意見。我並不想借黃梨洲來替現在的學生吐氣。我的意思只是因爲黃梨洲少年時自己也曾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他著書的時候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他不但不懺悔他少年時代的學生運動，他反正正經經的說這種活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這樣

一個人的這番議論。在我們今日這樣的時代，難道沒有供我們紀念的價值嗎？

十，五，二。



政治概論序

我的朋友張慰慈博士做的這部政治概論，雖是預定作高級中學教科書用的，其實是一般國民應該閱讀的一部政治常識教科書。慰慈着手編這部書時，便認定「常識」一個標準，所以他這書裏處處注重政治生活的訓練和政治制度的意義。他的選擇去取，都是很有分寸的：取的是必需的政治概念和制度歷史；有許多今日方在試驗時期中的新奇學說，往往不能不割愛。例如慰慈在美國時曾專治美國最新起的城市制度，後來即用作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然而他在這部書裏，幾乎一字不提及他研究最深的這種制度。這一點就可以見他的愼重的態度了。

慰慈這部書的好處，讀者自能認識。他的態度的平允，他的歷史的敍述法，他的文章的平易懇切，都不消一一指出。我承他的好意，得先讀此書原稿的全部；我

對於此書的全體，都表示滿意的贊同。內中只有一點，是我和他不能完全一致的。這一點在政治學上卻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在今日的中國更有討論的必要，所以我把這一點提出來作一種補充的討論。

我要提出的就是『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沒有製造良好公民的效力？』慰慈在本書第七章裏說：

> 有人說，好人民須由民治或共和政體中造就出來的。人民祇有在民治制度之下纔能得到政治上的訓練，纔能變成好公民。反轉來說，人民如果沒有執行政治的權利，永不能得到那種相當的政治訓練，永沒有做好公民的機會。
>
> 這樣一種觀念，在理論上也許是很對的，但在事實上卻是沒有根據的。民治或共和制度決沒有單獨製造良好公民的能力，就是在那幾個人民自治權力最大的國家中，政治上的弊病也不能完全免去，執政者方面

也不免時有舞弊的事實，也不免時有壓制被治者的行動。

我們也承認，良好的制度不能單獨製造好公民；我們也承認，民治制度最發達的國家中，政治的弊端也不能完全免去。但慰慈這段話並不會答復他前面引的那種主張。向來就是最迷信制度的人，也不至於希望單靠制度就可把政治弊病完全免去。在我個人看來，這個問題還應該分做兩步討論：第一，制度的改良是否可以革除政治上的許多弊病？第二，民治的制度是否有訓練良好公民的效力？

第一，歷史上的無數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制度的改良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驟。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卻能使人不敢輕易作惡。（中國古代法家的基本主張在此。）選舉票的改革，從公開的變為秘密的，從記名變為無記名，便可以除去許多關於選舉的罪惡。今日中國的選舉壞到極處了；將來我們若想改良選政，一定還得從制度上去尋下手的方法。我且舉一個具體的例。美國關於選舉的防弊法令中，有一條規定各候選人於選舉完畢之後，須正式報告本屆選舉所收到之選

舉費及其用途。這一條法令，粗看去很像沒有什麼用處，因爲我們總以爲各候選人可以揑造報告，以多報少。然而我在一九一二年却親自看見紐約的省長蘇爾曹(Sulzer)因爲漏報了一筆選舉費，被人彈劾，竟至去位受刑罰。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實在是好人澄清惡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姦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運用支應；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監督與執行，終久可以使姦人無所施其技倆。例如今日之複選制度使少數姦人得以初選當選人的名義，公然做選舉的買賣。倘使複選制改爲直接選舉，這種買賣就不容易做了。又如今日選舉之大弊在於選民冊之僞造與虛報。若想革除此弊，當追求選民冊所以不能不虛報的病根。現今議員名額的支配，不依縣分，不依府分，各選舉區彼此互相牽製，互相鼓勵爲姦詐。例如我們徽州六縣，若績溪縣知事按照本縣選民實數報告上去，而其餘五縣均報虛數，那麼，績溪一縣就永遠不會有省議員了！故選民冊的防弊，應當先從議員名額上改革起：使省議員依縣區支配，國會議員依道區或舊府區

支配。如此，則守法的區域不至爲舞弊的區域所牽掣，而澄清選舉的運動可用守法的區域作標準了。選舉的改革固然仍須要有守法的公民作繼續不斷的監督，然而沒有這種制度上的改革，就要監督也無從監督起，因爲一縣選民冊的信實，如何敵得住同區各縣的浮報呢？

第二，從民治國家的經驗上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民治的制度是訓練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民治制度的推行，曾經過兩條路子：一條是一個民族自己逐漸演進，如英國之例；一條是採用別國已成之制，如近代許多新起的民治國家。無論在那一條路上，都曾有過很腐敗的時代；英國在一八三二和一八六七兩次選舉大改革以前，也曾演出很不像樣的政治罪惡。民治制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至於那些採用現成民治制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程度夠得上』的時候方纔採用民治制度，那麽，他們就永永沒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國採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

用。其實這個道理很不希奇。慣用菜油燈盞的中國人，居然會用電燈了；向來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商業的中國人，居然會組織大銀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雖然沒有電燈電話那樣簡單，其實也只是有組織的生活的一種。這種組織的生活是學得會的。可是講到了『學』字，就得有『學』的機會。講教育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是實地的學習。民治的制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因爲他是全國一致的，是有公民資格的人都可參加的。要使這個大學校辦的有效，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上課，就是不准學生逃學。我們往往說，中華民國十二年的經驗究竟有了什麼成績可說了這話錯了。這個中華民國政治大學雖掛了十二年的招牌，但上課的日子很少，逃學的學生太多。上課的日子少，故談不到成績，逃學的學生多，故還算不得正式開學。信心太薄弱的人們阿，你們且等這個學校正式開學上課之後再來批評成績，還不遲罷。

西洋各國採用民治制度，也有失敗的，也有成功的。失敗的大原因不是由於上

課太少，就是由於逃學太多。凡經過長期民治制度的訓練的國家，公民的知識和道德總比別國要高的多。我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六兩年，曾去參觀美國的選舉。我到了投票場，討得了選舉票的『樣張』，見了上面的許多姓名和種種黨徽，我幾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樣票去問在場的選民，請他們教我。我故意揀了幾個不像上等人的選民，——嘴裏嚼淡巴菰的，或說話還帶外國腔調的，——不料他們都能很詳細地給我解釋。那些嚼淡巴菰帶外國腔的美國選民，他們何嘗讀過什麼政治學概論或什麼公民須知？他們只不過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長在民主的空氣裏，受了制度的訓練，自然得着許多民治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知識，比我們在大學裏讀紙上的政治學的人還高明的多！

有人說，『那不過是公民知識的長進，與公民的道德無關；也許那些有公民知識的人未必都是良好的公民罷？』我的答案是：公民知識是公民道德的要素；公民知識的普及是公民德道養成的重要條件。公民的知識不充分，所以容易受少數舞法

姦人的愚弄。且不要說什麼了解國民天職的好聽話頭。單說大家都明白了政治制度的作用，都「戳穿了西洋鏡」，都曉得利在何處弊在何處了，那時候，作弊自然不容易了，監督的方法自然更完密了。防弊之法加密，作弊之機會減少：公民道德的進步其實不過如此。什麼「人心丕變」，「民德歸厚」，都不過是門面話。要想公民道德的進步，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兩條路：第一要給他一個實習做公民的機會，就是實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減少他爲惡的機會，使他不敢輕易犯法。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讀慰慈這部書時的一點感想。慰慈何嘗見不及此？只是他偶然偏重他所謂「公意」的方面，故未免小看了制度的教育作用。我的提議也許可以有一點補充的用處罷？

十二，十一，十六。

天乎帝乎序

近二十年來，中國人士，對安南亡國的慘痛，似乎很冷淡了。有時候，少數文人也用『安南朝鮮』等字樣來警戒國人，但他們說的話大都是攏統的，模糊影響的，沒有證據的，所以不能使人深信而感動。現在我們得讀潘是漢先生『天乎帝乎』一文，審查他列舉的歷史上和法律上的確證，使我們不能不深感亡國的慘禍覺有如此之烈，使我們不能不向安南的志士們抱無限的同情。法蘭西民族素以『自由，平等，人類胞與』三大綱自豪，然而他們對安南人的手段眞可算是人類史上的一大恥辱。我們從前讀古書上說秦始皇的虐政，有什麼『偶語詩書者棄市』的話，總有點不相信，不料我們倒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法蘭西民族定的安南刑律第六十七條『二人以上商議其行爲謂之陰謀』一句裏尋着了這句古話的註脚了。我們很鄭重的介紹

潘先生的血淚文給全世界愛人道的讀者。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八日

我們的政治主張

我們爲供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起見，先提出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張，要求大家的批評，討論，或贊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標　我們以爲現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瞭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爲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爲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　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們對於今後政治的改革，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因為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淸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着手，惡人背着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爲自衞計，爲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爲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當時的舊官僚很多跑到青島天津上海去拿出錢來做生意，不想出來做官了。聽說那時的曹汝霖，每天在家關起門來研究憲法！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於是曹汝霖丟下他的憲法書本，開門出來了；於是青島天津上海的舊官僚也就一個一個的跑回來做參政諮議總長次長了。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着中國分裂，看着討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東的賣掉，看着軍閥的橫行，看着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夠了！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

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們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的意見　我們既已表示我們的幾項普通的主張了，現在我們提出我們的具體主張，供大家的討論。

第一，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等問題，都無從下手。但我們不承認南北的統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們主張，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一切暗地的勾結，都不是我們國民應該承認的。我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暗中的勾結與排擠是可恥的，對於同胞講和並不是可恥的。

第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但像前三年的分贓和會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應該預備一種決戰的輿論做這個和會的監督。我們對於議和的條件，也有幾個要求：

(1)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因為這是解決國會問題

的最簡易的方法。

(2)和會應責成國會剋期完成憲法。

(3)和會應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議定後雙方限期實行。

(4)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

第三，我們對於裁兵問題，提出下列的主張：

(1)規定分期裁去的兵隊，剋期實行。

(2)裁廢虛額，缺額不准補。

(3)絕對的不准招募新兵。

(4)籌畫裁撤之兵的安置辦法。

第四，我們主張裁兵之外，還應該有一個「裁官」的辦法。我們深信現在官吏實在太多了，國民担負不起。我們主張：

(1)嚴定中央與各省的官制，嚴定各機關的員數。如中央各部，

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廢止一切諮議顧問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的專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參酌外國的『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

第五，我們主張現在的選舉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們主張：

（1）廢止現行的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

（2）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應參考西洋各國的選舉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詳定細目，明定科罰，切實執行。

（3）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

第六，我們對於財政的問題，先提出兩個簡單的主張：

(1)澈底的會計公開。

(2)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幾個主張。我們很誠懇的提出，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

十一，五，十三。

提議人	職業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幹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梁漱冥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附錄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一)

我們平常在言論上或實際上主張救中國的第一步在於政治改造，在此唱高調的智識階級，麻木的一般社會裏面，每每痛恨大家無眞正覺悟。日前在努力週報看見『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想先生們多是教育界『清高事業』的人，從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會主義的，現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主張『爲自衞計，爲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和我們不約而同，這實在是思想界一大轉機，使我們抱無限的希望。

有許多言論，對先生們的主張懷疑的，我們都認爲理由不充分。有人說『要從社會改革入手，否則政治改革是基礎不穩固的』，我們可以反轉說，『要從政治改

革入手，否則社會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來好社會和好政治，互為因果，不能絕對劃分。譬如雞與雞蛋一樣，有雞能生雞蛋，有雞蛋也能孵雞。況且在中國現在特別情形之下，政治事業尤其是社會事業的工具。政治好，能夠用政治的機械力，增進社會事業的效率；政治糟，什麼都不好辦，至少要減少幾分可能性和速率。財政破產對於教育，內爭政變對於民生的影響，就是眼前好例。最好雙方分工幷進，殊途同歸。……

所以我們以為這些懷疑都不成問題。我們對於（一）政治改革的目標（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三）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非常佩服；且相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有奮鬥的精神』。但還有一個問題，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

我們平素相信政治的徹底改造在平民革命。經十一年來的教訓，大家都已覺得

中國已到千瘡百孔的病境，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不徹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經山窮水盡。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門面話，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紙老虎！現在不好再請願裁兵廢督，希望國是會議，只有合全國的平民，下犧牲的决心，作最後的决鬥。我們主張的革命，不是利用那位軍閥拉攏那系政客的革命，是要全國平民自覺自决的革命；不是革那個人革那一系的革命，是要革不良制度革不良政治的革命；不是和惡勢力調和苟求速成的革命，是要先全盤破壞後分工建設的革命。這是我們平日組織的信條，努力的目標。

再進一步，我們相信平民革命的奮興劑，一面是『到民間去』，一面是手鎗炸彈。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沒有『國民運動』『階級鬥爭』一回事。到如今政治的本能，潛伏麻木不仁，非一面『到民間去』，提高他們的智識，一面用手鎗炸彈，刺戟他們的情感，單用那種極醜極臭滑頭的投機的手段—新華門前的請願，中央公園的開會，打通電發宣言，—出風頭有餘，奮興人民不足。現在對於腐敗政府，一時

不能達到法國對付路易英國對付查理的辦法，也要採取俄國對付亞歷山大日本對付原敬的手段。無論成敗，至少可以奮興一般社會。這種手鎗炸彈向「到民間去」的先鋒隊就是我們一班有完全人格，清楚頭腦，犧牲胆量的青年。

我們也承認這種主張是很危險的，代價極大的。但想不出別的方法較安全較和平，而能夠有同樣的效果，可以認作救中國走得通的最後一條路。你們的主張大概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沒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價能夠得最大的效果，誰不樂意？關於此點，你們如能給我滿意的解釋，我們當然甘願意犧牲成見，服從你們的主張，並且勸導各地的同志轉變努力的方向，對於你們的主張，或者有幾分貢獻。我們很熱誠的等待你們的教訓或在週報上進一步的宣言。

王振鈞　鄭振夏
殷鉞　許孝炎
李俊　林之棠

叢秋芳　陳凱

（答）　對於你們提出的重要問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幷進，殊途同歸。』一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倆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雞的關係；有時破壞卽是建設，有時建設卽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着建設而來，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衆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頹椽剩瓦也要人做，打圖起屋也要人

做。我曾說過：

君期我作瑪志尼，我祝君爲倭斯韈。

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脚俱所急。

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

再者，我們很誠懇的替你們指出「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爲平民盡力，並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到民間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適）

（二）

本星期的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蔡子民王寵惠諸先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

蔡先生們開口第一句就說『我們爲給大家一個討論的底子……』，所以他們以下所說的話都是言簡而意賅；其中說得不周到的地方固然是很多，要在我們讀者能夠體貼言外之意罷了。以我看去，他們第四節（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裏所說的本來沒有什麽問題，但是這兩日看到幾篇批評的文章，大概都在這個地方起疑問，如晨報上止水君的『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和益世報上一篇未署名的社論。蔡先生們對這些疑問的答覆究竟怎麽樣，我雖不得而知，但是依我自己的意思，這種疑問，可用下列幾層逐項解答：

（一）一般民衆與政治改革

懷疑『政治主張』的人大概都說太側重于好人而忽略一般的民衆。我想這個忽略恐怕是文字的，不是意思的；蔡先生們一定不會說好人可以不顧民衆而去改革政治的。但是我主觀的眼光以爲這裏邊還有一個眞理在內。政治改革是以民衆爲憑藉乃是當然的；好人想和惡勢力奮鬥是要喚起民衆的覺悟，得民衆的援助，也是當然

的。可是民衆到了什麼程度才叫做覺悟，到什麼時候才會援助，眞是難說得很。在一個爲惡勢力所支配的社會中間，一般的民衆都是天天過那『從手到口』的生活；他們的腦經是麻木的，痛苦之極以致失了痛苦的感覺。什麼是惡勢力，什麼是他們痛苦的原因，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你看那些關外健兒還替大帥打天下呢；窮鄉僻土的老百姓還天天馨香禱祝希望出『眞主』呢。好人們——有智識階級中之良善分子——如要等他們的覺悟，等他們來援助，才敢下手去做，那眞是『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老實說起來，一般民衆是永遠不會覺悟的，永遠不敢和惡勢力奮鬥的，除非你好人們挺着胸子衝鋒陷陣的打頭去做，予他們以具體的刺激，破他們長久的魔夢。你看，假使沒有學生的五四運動，一般的民衆那裏還曉得有賣國賊這回事呢？可見民衆的覺悟是以好人的奮鬥爲前提；你們如果都叉起手來不敢動，單說我要等民衆的覺悟，那末你就等一百年民衆也不會覺悟的。這不是我看不起民衆的話，乃是社會上實際的情形；也並不止中國國民是這樣，世界上各國都是差不多。我們看

看西洋史就可知道的，那一次的政治改革不是少數的智識階級作先鋒呢？所以我希望全國的好人們只管大膽的去做；只要你宗旨純正，適合全國的需要，一般民衆自然會跟着你走的。你們切勿拿那迂遠之談先把自己的脚絆住，讓惡勢力逃走去了。你們須知道政治改革的擔子是全個落在你們的肩上！

(二)怎樣才配稱好人？（此節刪去，僅留定義。）

……『凡私德純潔的有智識者，能用犧牲的精神，作負責的行為，就是好人。』

(三)好人怎樣結合？

那末，好人怎樣結合起來和惡勢力奮鬥呢？這問題我以為須分平時和過渡時兩種講法。平時好人在政治方面的結合即是『政黨』。政黨在民治國中自然會發生的，好人要參預政治，自然也離不了這種工具，但是政黨須負有兩個責任：(1)守法。政黨的競爭無論如何激烈，總要在合法範圍之內。中國政黨所以被國民唾罵，就在於他們出乎法律軌道之外的舉動。譬如民國六年的解散國會這件非法事體，的

體也爲某政黨所主張。這實在是中國政黨史上之汚點；我希望以後的政黨能夠大大的滌刷從前的過失才是。（2）養成政治上的良習慣。國家內一部憲法本是死的東西，其運用時全靠良善習慣的輔助。一國政治習慣的良否，全視政黨程度的高下以爲斷。我希望中國憲法完成之後，各政黨都能互相了解的採擇歐美先進國政治上的良好習慣，爲後來政治家的模範；這是于國家前途有莫大之福利的。否則，大家都舞文弄法的搗鬼，造成許多惡例，貽害于後昆，那眞是中國的大不幸了！所謂好人的結合更須于此處三致意焉。

現在我把話說得太遠了，我們所急要知道的，是在這過渡時——即改革時——好人應該如何結合。我以爲過渡時的結合和平時的結合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就是，平時的結合宜于『分』，過渡時的結合宜于『合』。這話是怎麽講呢？平時，即國家政治已入軌道以後，一國內不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反對的政黨，時常作對抗的運動以維持政治的均衡。在過渡時，卻萬萬不可有這個現象。過渡時好人結合的目的是

為打破惡勢力，是為驅除國民的公敵，並不是想推行詳細的政策。所以結合的目標越簡單越好，切不可把枝節問題夾雜其中，以致互相紛爭，反為惡勢力所乘。結合的範圍也是越普遍越好。凡從前歷史上的關係，此時都應該暫時把他拋開，一同向公共目標上射擊才是。等到改革的事業成功了，然後再依政策的不同而分離，這是可以的。此外還有尊重反對的意見，也是很重要。我看好人們往往因一時意見的不同，即互指為惡人，以致自相排斥，自相攻擊。天下最可憐的事是好人自殺好人。作政治改革運動的好人們可不留意麼！

我的意見已經說完了；歸結起來，我以為現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完全要國中好人挑肩子。好人是以私德為基礎，以犧牲負責為職志；在改革時是以普遍的大結合為手段。最後還有句附帶的話，作改革運動的人切不可猶豫不決，書生氣不可太重；看時機到了，就大膽的去做，萬不可瞻前顧後。空論也是少發才對，要多留些工夫談談實事。

梅祖芬

（三）（用著者最後修正稿）

……現在我們的國家，算是壞到極處了。說到徹底的責任，却是人民放棄的過錯。在智識階級的人民，過錯更大。我看現在教育界的一般心理，都把教育當做機械的事業，對於政治上面，大有相戒不願過問的趨勢。有說政治汚濁不屑過問的，有說教育事忙不暇過問的。這種說法，都很不對。因爲社會裏面的事業，沒有不受政治支配的。說到政治徹底的功用，就在維持一般人民合理的生活。在教育界對於政治的責任，一面是要培養人才澄清政治，一面是要運用政治走入正軌，還要把最明快的眼光時時注射政治上面，運用政治的實力，改造社會的境遇。這個運用，並不限制定要投身政界。如有應該監督的地方，努力監督；應該指導的地方，努力指導。好比五四運動，不是很有成效麼？你們都是教育界的人物，忽然發表幾個政治的主張，算是智識階級的人民自動的來負責任。有了這個消息，必定影響很大。希

望你們拿出一副奮鬥的精神，繼續運動不斷，把那些政治上面的妖魔鬼怪掃得乾乾淨淨。你們的好政府主義，就可實現出來。這話我且擱下，再把批評的意思，分做三項說說。

你們第一項的主張『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究竟和會如何組織，你們沒有說及。我看這個用意本是極好，但事實上面，很難成功。你們既說從前的分贓和會很不贊成，現在南北當局絕無一點進步，縱令再開和會，也是同從前一樣。從前和會因為分贓不清，所以沒有結果。現在不要分贓，更無辦法。前年和會初開的時候，我就發表『南北問題意見書』兩編，斷定和會無効，並且豫料種種分裂的情形。現在都已實現了。那時我的意思，並非反對分贓，確是料得和會裏面簡直沒有分清贓物的好法。因為分贓的階級層出不窮，反到惹起許多糾紛，很難應付，到把和會做了一個招搖的廣告，沒有絲毫的好處。你們主張和會不要分贓，我看和會裏面除開分贓以外，沒有他事。決不能夠依照我們研究學術的情形，各人

拿個眞實的見解，平心靜氣的討論。因爲南北問題，本是分贓主義。現在我們既無神術感化他們，又無特別力量屈服他們，只好拿個分贓的手段做成統一的條件。如果能把幾個最大的條件分途協商定了，就統一了。那些廢督裁兵的種種問題，等到憲法成功，再行依法解決，儘可不必再開和會，惹起紛爭。因爲政治上面總要顧全事實，離題太遠，無異高談學理，決不能夠解決現時的政爭。現在不謀統一則已，如果要謀統一，不得不把不能統一的癥結仔細攷慮。近日伍博士發表西南惟一的條件，只要承認孫大總統，其餘的事情，好商量。依這樣看來，西南分贓的盤子，算是已經開了。北方的情形，也就很易推測。你們主張去掉分贓的辦法，來說正義公道，理論上是很不錯，但是完全落到高調，這個統一的事實，怎麼能夠做到呢？

你們第二項的主張，一在『要求和會協商召集六年解散的國會』，一在『要求和會責成國會限期制憲』。恢復國會制憲，我到極端贊成。但是尊重法統，要恢復國會。既要恢復國會，就要恢復合法的政府。還在南北當局協商妥定，承認國會自由

集會，自身地位就應同時取消。說到這個上面，如果不把分贓的盤子說得清楚，還是不能恢復。卽令勉强恢復，議員資格問題爭執不了，還是不能開會。總要各方面誠心統一，不再借題爲難，纔好辦理。說到法律問題，應該嚴格的尊重關于法律範圍的事情，必要國會自身解決，不容有他人說話的餘地。六年政府解散國會以後，亂子鬧到于今。大家認做違法的舉動，纔有恢復的主張。旣是恢復，本有自由集會的權限。至於國會任期本有一定。他在任期以內，行使職權，自然也會制憲，决不能殼再受他種『太上機關』法律的拘束。你們主張和會協商召集，並限期制憲，旣不合法，事實上也難做到。依我的推測，國會問題，恢復很易，開會很難。你們仔細攷慮一番，纔曉得這個法律的糾紛，比較總統問題，更難解決。解決糾紛的要着，本在制憲一宗，其餘的事情儘好容納憲法裏面解決。好比督軍一職，如果憲法裏面沒有督軍，督軍自然廢了。憲法裏面要自治，自治事項，自然行了。依這樣看來，我們和平統一的運動，只有制憲的一條大路。如果國會能殼開會，制成憲法，

這就很好。萬一國會不能開會，就要想個救濟的方法。我看恢復國會本是統一條件之一。開會的時期，到要聲明限制。最好適用國會開會的法定時期，以四個月為滿限，按照宣布集會之日起算。這種期限的性質，絕不大侵及法律範圍，比較你們主張的國會限期制憲有區別。並且一面教促法律問題早日解決，一面免得制憲延期。若是過期開會不成，應該另行組織機關限期制憲。總要憲法早日制成，就可根據憲法，組織統一政府。甚麼糾紛都解決了！你們第三項到第六項的主張，都是憲法裏面包含的事實，最好拿定有系統的合理的主張，具體開列條件，供給制憲機關的採納。好比第三項裁兵問題，如果憲法裏面軍制定好，那些多餘的軍隊，自然裁了。第四項官制問題，主張裁減冗員，廢止諮議顧問等等，這是預算裏面的事情，只要預算確定，那些空人自然裁了。第五項選舉問題，內有一個主張『大大的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這是議會制度裏面的一個問題，應該先把議會制度的主張確定，纔好說到額數上面。第六項財政問題，我到很想討論，但是你們的兩個主

張，無乃大簡，不好怎麽說法。

綜合以上四項問題，大體却很不錯。但是內容不甚完備。此外還有許多的重要部分，你們都沒有說及，反到掛一漏萬。總而言之，現在國內的政治要從根本着想。依我的意見，定要運用國民共同的心理，對於各方面實力的重心，還是要把分贓的手段，变換一個良好的憲法。…………

羅正緯。

（答）羅君的批評的第一項說，『和會裏面除開分贓以外，沒有他事。』我們所以主張一個『公開的』和會，也正是爲防止分贓。究竟大前年上海和會的分贓，是誰的罪過？我們說，是國民的罪過。國民容許他們躲在德國總會裏，關起門來分贓，那麽，他們不分贓，更待何時？如果我們老百姓們起來想想，究竟南北何以不能統一，究竟他們爭的是

什麼鬼問題，究竟我們老百姓對於這些問題願意怎樣解決，——如果我們起來用決戰的輿論來監督他們，如果我們不准他們鬼鬼祟祟的分贓，如果我們用手槍炸彈罷工罷市的方法來對付他們，他們敢說『不要分贓更無辦法』嗎？

對於他的第二項，我們贊成他的『以四個月爲滿限』的辦法，也贊成他的『過期開會不成，應該另行組織機關，限期制憲』的辦法。其餘他說的『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我們請他參看努力週報第三期裏張慰慈君的『制憲問題』。

對於他的第三項，我們覺得羅君對于憲法的效能，未免太迷信了。他在前條說，『如果憲法裏沒有督軍，督軍自然廢了。』在此條裏他又說，『如果憲法裏面軍制定好，那些多餘的軍隊自然裁了。……只要預算確定，那些空人（冗員）自然裁了。』我們不信這種『自然主義』，

所以希望大家仔細討論，提出具體的主張，用奮鬥的精神去督促這些主張的實現。

（適）

（四）

對政治的主張，我頂表同意的，就是從南北議和下手。正和同志談及此，兄書恰到。現在許多人講恢復舊國會，要是南方不同意，也是白講，況且一定恢復不成。選舉法實有修改的必要。現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優秀分子爲全國所仰望能解決國家大問題的，但是照現在選舉法，吾敢斷言這種人決不會當選。只是你們所講幾種方法，『大大的減少名額』，吾絕對贊成。其餘兩條，是否即可以達到使優秀分子當選的目的？還不敢說。但是吾並沒有反對這主張，不過覺得還不夠就是了。什麼樣才夠？此刻也說不出。

黃炎培

（五）

『我們的政治主張』有些意見，我很同意；有些我不贊成。比如南北和會一層，就是疊床架屋，儘可不必。因爲我們現在只希望恢復舊國會。假如果能辦到此層，就算回復法統，別的就不必再生枝節了。我現在很忙，等我下次再寫信和你討論。（秋）

（答）『秋』君這一段，與上面黃君來信的第一段可以互看。我們認和會應該在國會召集之先，也是因爲南北不議和，舊國會的召集恐怕還只是一部分的國會，將來兩個『半身不遂』的國會還是要爭的。這是第一層困難須解決的。况且我們不贊成『武力統一』之說，不願意江西再演出去年的兩湖的戰禍。若要免去戰禍的延長，我們認和會爲最正當

的辦法。這是第二層困難須解決的。

從前南方單獨召集國會，已失敗了。現在北方單獨召集國會，能保不失敗嗎？

我們要一個統一的國會，我們又不贊成『武力統一』，也不贊成一方面先行召集，然後用多數來壓迫非常國會的少數。因此，我們主張和會為第一步，召集國會為第二步。（適）

（六）

……………………

我讀這篇文章的快感，不但因為含有『切中時病』，『對症下藥』的原素，尤因為他有切切實實的具體主張，什麼召集舊國會呀，開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呀，『好政府』的最少的涵義呀……都是平易顯明實有完全辦到的可能。我是絕對贊成

的，而且願爲極力的宣傳。

不過我對于『可以代表國民的南北和會』的議和代表的人選問題，有一點意見。就是這個和會代表由兩方的政府派出來，能否保定他們不取『分贓』的方式？能否保定他們眞爲代表民意？能否保定他們不蹈前次的覆轍？倘使這幾個問題的答案不幸而肯定的，那麼事實上果然是多此一舉，或反因此而鬧出什麼亂子來，也是說不定的。這不是我們白白地犧牲了盡力鼓吹的一番苦心麼？據我的私見，以爲我們國民將來對于這個南北和會，當立在超越的地位，換句話，就是我們當拿出主人的態度去監督或調解這兩個失歡的僕人。開會的時候，我們國民應該推出在國內辦有教育上或實業上特殊的成績而爲國民所信仰的優秀分子，列席主聽，他們兩方所提出的條件，完全須從『有益國民』『不圖私利』八個字上立脚。誰能顧念或服從國民的意志者，卽認其爲有議和的誠意。……據我個人的思量，這層能夠辦到，其餘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了。但我是沒有學問的人，本不配來插嘴。但據諸先生所說

的：『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的話，就以全國的人的一個的資格來說幾句不配考慮不配批評或不配贊助與宣傳的話。

董秋芳

（七）

惡政治的壓迫，逐漸加增，於是平日不大談政治的蔡元培諸君亦『平心降格』的，提出『我們的政治主張』來，發表在努力週報上，要求大家贊助。據我見着的，已經有止水君的『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五月十六日晨報）。我以爲這個問題，是中國人都應該平心討論，別管取何種態度，要達到一個大家相同的希望，便是：只要承認現行政治方式先須把現在的惡政治換成個比較的良政治。

蔡君等主張，是不論抱持何種主義，現在只好先求一個『好政府』。止水君的疑問，是不反對這種主張，但要問個『好政府是從那裏來』。由是可見『好政府』

的目標是相同的。

至於蔡君等的具體主張，自第一至第六，大體上是多數人公認的，暫且不必深究。只要先求得一個好政府，這幾件事，便十九都可辦到。於是便不能不先表同情於止水君，問

好政府是從那裏來？

但是止水君認爲不從民衆下手，以外便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萬萬不可而且萬萬不能』，『緣木求魚』。此間頗有討論的餘地。

『好政府從好民衆來』，這種理論，是誰亦不能否認的。果能如止水君所說，一國中都是『有自覺心與活動力』，『有氣有力有出息』的民衆，自然不會有不好的政府。但是此間我亦發生了疑問的疑問，請問

這有自覺心種種的民衆又從那裏來？

於是不約而同的，都看到還須從所謂『優秀分子』所謂『好人』上着想。第一

步下手工夫，便是大家起來『和惡勢力奮鬥』。這種說法，亦是誰亦不能否認的。不過一方面急於求個好政府，一方面要始終向羣衆上尋根本。但是理論如此，必如何敎他能夠成爲事實。在當下的中國政治方式裏比較着可能性較大，我極盼大家都像蔡君等姑且放低一步，平心降格的，來把這件事做成功。今天我的意見便從此處加入。

我的主張，向來是不專唱一字調的。所以對於蔡君等此次提議，先有一大部分表同情。中間稍有考慮，便見着止水君的疑問，亦有一大部分先得我心。今且把大家相同的要點列出，作爲確定的目標，和應取的手段：

『好政府』，

『優秀分子』『好人』大家起來向惡勢力作戰。

可見好政府的目標相同，不論採取何種方法，而所謂優秀分子好人者，必須起來奮鬥亦相同。那末便可再進一步，討論這好政府到底如何成立，一般優秀分子好

人如何會起來奮鬥。……好政府如何建設。救急的方法，自然是優秀分子好人大家出來努力。……只要少數大資望大名聲的好人肯出來奮鬥，那次一等的許多好人，一定會都振作起精神來；而且便是稍微可好可不好的人，只要有好人領袖起來，一定亦會變好。這段說法，必有人笑我不成話，然而事實是千確萬確，不會錯的。……既是優秀好人，沒有個不願意替國家社會努力的；不是不能和不敢，是從前輿論不給他幫忙。大家不是要造成『決戰的輿論』嗎？請先造成這『不肯爲國家社會努力便不是好人』的輿論。先向少數的優秀好人着想，比向一般羣衆着想容易的多。有了強健的輿論立在他背後，好人是沒有不肯努力的。要緊的是怎個奮鬭法。

假定現在的政府，公認爲惡勢力的政府，好人起來，要和他決戰，當然他不肯老老實實的便自認失敗。上至最高權的政府，下至一個站崗的警察，凡是負政治上責任的，都應當教他同時改善。——不必一定都取而代之，我們的目標只要個比較的『好』，——然而他不肯改善，或是不能改善時，對待的方法，只有兩種，一『請

願」，二「革命」。

革命不論成功和失敗，內中總含有多量的危險性，——革命造革命，——但有一線他種可走的路，不願用這種最後手段。請願亦不止上書上條陳，凡避去革命手段，以求改善政治，都可說是請願。固然能如止水君所說，一國中有了均齊的民衆，這兩種方法都可不用。今天既用歷史式的順序來討論政治問題，——由優秀好人組織好政府，——惟有用革命的精神，參加到請願方法裏。先打定一個「能夠改善一部分是一部分」的決心，用漸進方法，以達最後目的。——一切革命都是請願不遂激成的，亦不能第一步便從革命起手。——這種方法，比較着還是多數的優秀好人所優為的，而且可能性較多。比方對於一種政治，今天求他參加一部分我們的意思，明天再參加一部分；今天請他改善一件事業，明天再請他改善一件；只要參加一點，照辦一件，繼續不懈至於完全改善，這種辦法，可得以下的實驗：

只要好人肯大家努力，努一分力準見一分的效點。

我想一定有人批評我這主張太沒出息。我以爲大家不談中國現在的政治則已，不希望中國的好人出來則已，要是還想望好，只有這種辦法，或者還可以把大家的主張實現到眞正人民切身苦痛的政治上。若是一下子把這樣的中國，想從理論的談判，以爲可以實現，那就還須等到二百年後再講。不如從可能上大家下手作改善一點是一點，雖然效驗很慢，然而總比任憑那惡勢力依舊胡鬧強得多。退一步說，能夠先得個蔡君等所說的那民國元年的『新氣象』，亦比連新氣象沒有還好。今且假設一個比方：

比方財政，大家都說潘復張弧等等是惡勢力，要和他決戰。可是你有什麼法子戰勝他？若說暫時莫要管他，等着我們有了『有自覺心有活動力』的民衆，自然他站不住，恐怕到那時間，已經把中國給他弄完了。不如大家想法子，一齊努力，先換個比張弧等好一點的，雖然離我們的目標尚遠，然而總可說是有益無損。

若就我一個人的意見，我總覺着這樣的中國，大家作了這些年的孽，便應該受這樣的罪。以後先求個別再作孽，或者可以少受罪。不論你有高過太行的理想，一下子想完全變好，大概是不容易的事。只要先實實在在的，用眞誠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大家向好處走。所以我看蔡君等的降格，還降的不客氣。我比蔡君等更降一格，但還趕緊先達到以下的目的：

便是不能得『好政府』，亦要先得個『不爲惡』的政府。

人便不肯自己奮鬭，亦要別說別人奮鬭不好。

所以我的主張是

『不要紅鸞禧的嫁粧那樣好，就只要得到一點點眞東西』。

十一，五，十八。韓補青。

（八）

我對於先生等新發表的政治主張，極端贊同。但是我以爲應當再進一步，組織團體，爲大規模之宣傳及運動，務期將來以民衆之勢力作實現這些主張的後盾。關於進行的辦法，我以爲可卽由先生等發起組織一個『國民政治改良促成會』，聯絡同志，先在北京成立，然後再向津滬漢等大都市地方猛力宣傳，並且多多聯絡工人商人，大家出而主張。將來最後手段，卽罷市罷稅，亦無妨也。

何思樞。

（九）

讀五月十五日的晨報轉錄努力週刊這篇文章，我心裏非常感動，一方面因爲中國的政治已是糟到不堪的地步，好人不但是籠着手，而且是閉着口。當這個時候，忽然發見這樣一篇堂堂皇皇的政論，末後署名的又都是南北兩京負有時望的學者；這無異於黑暗之下，忽見一綫曙光，怎令人不起愉快之感！

但是在又一方面，我還覺得他們並未有徹底的辦法，他們既看出『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既而又說『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前一段亦曾說『我們應該同心協力的拿這共同目標（好政府）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但全篇終沒有說出怎樣奮鬥怎樣作戰的一個方法。讀至末了一句，祇說『……我們……很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的考慮，批評，或贊助與宣傳』。這可見得他們發表這篇『政治主張』祇求得人們的同意和教人們知道這些主張，並未曾明白指示好人怎樣的聯合起來與惡勢力作戰。這是一大缺點。

我想這篇主張，除『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一條以外（此層因不關要旨，姑不具論），其餘均是人民大多數的心理。所以目前最緊急的問題，乃在於如何而後『我們的政治主張』才可以實現。若僅憑宣傳，則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後仍然無濟於事，這可斷言。如裁兵問題可以說是宣傳已久，舉國之人幾皆明其意義，然何以至於今日還未能成為事實？他們必答『我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

決，一切裁兵……等等問題都無從下手』。這是一個很有理由的答案。一般人在南北問題未解決以前便希望吳佩孚實行裁兵，原是做夢，然亦可見在此時期以前，雖竭力宣傳，亦必無甚效果。但是我並非說宣傳的方法毫無效果不應採用，宣傳有時可以喚醒民氣，且亦是羣衆運動中之一不可缺少的要素。不過僅憑宣傳，終覺是學者的態度而不徹底。所以我於因得曙光非常高興的時候，急忙寫出數語，用以盼望努力諸先生再進而教我們怎樣的同心協力，怎樣的奮鬥，及怎樣的與國中的惡勢力作戰。

現在我且將我做這篇文章的主旨略說一句。我希望努力諸先生不僅僅努力於宣傳，而抱絕對犧牲的精神，從事於政治運動。質言之，即諸君既有一個共同目標，——好政府——何妨就由諸君發起組織一個『好政府黨』？若是徒有議論，沒有具體的組織，則我恐怕這些主張祇是空談，未必能有實現的一日！質之諸君以為何如？

程振基。　十一，五，十五燈下。

（答）以上兩篇，何君勸我們組織一個會，程君勸我們組織一個好政府黨。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能有簡單的主張。前面梅祖芬君的來稿，對于這個好人結合的問題，也有很好的觀察。他以為平時的政黨不妨分，而過渡時的政黨應該合。這個意思是很對的。歐美各國的政黨，當歐洲大戰時，都能犧牲黨見，同心向國家的公敵作戰。我們覺的這十年的民國史上，政黨的狹窄態度，彼此不容忍對方的主張，專鬧意見，確是大亂的一個大原因。我個人以為現在只希望大家能持一點歷史的眼光，認明從前許多爭執的無謂，用懺悔的態度，大家一齊朝着『好政府』的一個平凡的目標上做去。此時的最大需要在於宣傳這個平凡的公共目標，叫大家認清我們的公敵是惡勢力的惡政府，我們的責任是向這惡政府作戰。這就是我們的大黨了。至於國會恢復之後，向來的政黨政

治自然回來，我們在此時和最近的將來，都應該處於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的地位。至於將來政治上軌道之後，具體主張上的不同或者使我們不能不造政黨，那可是另一問題了。這是我個人此時的意見，不及徵求各位提議人的主張，也許他們未必都贊同此意。

（適）

（十）

五月十五日晨報上登了蔡孑民先生等所提議的一篇『我們的政治主張』，我拜讀一下，是很表同情；但是提議人已允許別人來討論這個問題，現在就將他們所主張的具體辦法中第四項的『裁官』一項，我把我的意見，來分項討論一回。

第一　裁員

甲　積極的

他們主張『嚴定中央與各省的官制，嚴定各機關的員數，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農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但我主張：

（一）中央與各省的官制，除與裁官辦法有抵觸的，應該修正外，一律仍舊。因為官制所定的，多半是機關底組織和權限，修改與否，乃是政治和法律問題，與裁官是毫沒有相關。卽使官制中也有官名和缺額的規定，但是為實現機關行動起見，這種缺額，也是機關應有的；況且現在的『官滿為患』，其病根都不在於實缺，而在浮額和兼差；裁官底目的，也不在於廢官，而在於罷閒官。所以我主張現有各機關官制，可以不必變更。所謂與裁官辦法有抵觸的是什麼？就是：

（a）凡官制中已明定實缺而沒有限定人數的，（如院秘書廳的主事）應一律額定。

（b）凡官制中已有『因事務之必要得酌用辦事員』一條，（如國務院

所轄各局官制等）都應該酌加修正，明定員額，以掃除『得用無限辦事員』的流弊。

（c）京內外各機關，凡沒有官制或已有官制而沒有明定員缺的，除機關本身應該裁撤不計外，都應該分別補訂，以示一律。

（二）大部中部小部的區別，可不必管他；因為現在各機關官制關於人數一項，已經無形中有這種等差，我們維持他的官制，就可明認他的區別。以下就是明證：

（a）大部（如交通部）僉事四〇　主事一一〇

（b）中部（如農商部）僉事三二　主事五〇　（十年初官制）

（c）小部（如教育部）僉事二四　主事四二

（三）各機關官員額數，以其官制所定的及考試分發的為限；惟遇必要時，得酌添辦事員，但仍不得超過其官制上實缺之半。官制既明定員缺，那官員自應以此為限。惟事務殷繁的和實缺稀少的機關，有時恐怕辦事上還不行，所以再加上實缺半

數的辦事員，去調和他的緩急，而別方面因有這個限制，又有節經費，杜鑽營，私人不易引用，弊無從通同種種的利益。

乙　消極的

他們主張『廢除一切顧問諮議等等乾薪官吏，各機關各省的外國顧問，除極少數必需的專家外，一律裁撤』。我以爲還沒有徹底，最好是，京內外各機關永遠廢止：

(一)顧問，諮議，差遣等。（名譽職則可）

(二)調查員。因爲各機關所設的調查員，都是拿乾薪的，並爲報銷調查費作弊的發源地，無論那裏，應該一律裁撤，萬一有實際的必要時，正可派員兼充。

(三)超過官制缺額半數以上的辦事員，不論他名稱是參事上秘書上僉事上主事上行走任事或辦事等等。

(四)除少數專家以外的外國顧問。

第二　裁機關

(一)京內外沒有官制的各種機關，除少數必要的許他補訂官制外，一律裁撤。裁官原是重要，而裁撤飯桶機關，比裁官尤爲徹底。大凡有事可做的機關，無論京內各省，目下無不訂有官制，我們既承認他的官制，自可不必再於更張。至沒有官制的，多半是因特種情形而設立，他自身已表示一種暫時的態度，如果『留而不裁』，不但與上述維持有官制機關的主張相反，並且與裁官的根本也大大矛盾。我舉一個題：就是月支六七萬，用人幾百名，全年祗出二期印刷物的飯桶調查局，應否聽他改訂官制，還是怎麼樣呢？

(二)一個機關內，不准於官制中法定組織的司廳處科以外，另設常置的什麼會，處，——討論會，研究會，調查處，籌備處，清理處，等等，——另派人員，另支薪水夫馬或津貼等。即使有必要的，也應預先陳明高級機關，不另派人，不另支薪。萬一有與別的機關合組的必要時，也須另定限制。

第三　裁官後的整頓吏治方法

（一）由國務院財政部審計院銓敘局總檢察廳合組「任用委員會」，職掌各機關官吏的任用，并執行裁員事宜。凡各機關的大小官吏，都應該將他的名冊薪水和像片，送交該會審核備案。並將該會所有官吏姓氏依筆畫編成底冊，分送財政部審計院，來做發款和審查的根據。

（二）各機關官吏，除與其職務有連帶關係且得特許外，一律不准兼差。——特任官須由大總統明令特許，簡任荐任官須由任用委員會特許，委任以下須由各該長官特許，但仍須報告委員會。

近年兼差之盛，爲從來所沒有的。這種多掛名多畫到不辦事的冗官，於國家大有害處，所以非禁止不可。惟國家政務，雖已有各種機關分担處理，而應共通互助的地方，還是很多，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所以再定一種限制方法，免得兼差的人再來射影，而行政聯絡自亦不至被累了。

（三）實行幾小時辦公制，來表明他是一個「公務的勞動」。

（四）實行任用公開，所有任用人員，無論大小，都應刊登印鑄局的職員錄。

（五）財政部須根據任用委員會所核准的，來發薪水，審計院也用這個來審查。

（六）修改現行行政官官俸法，凡京內外各機關官俸，都應該增加原數半數以上至一倍。官俸法是民國元年訂定的，和現在社會經濟一比較，便知道是不對了。況且各機關從裁官以後，日常事務，即使沒有時間制來制限，也不能過問；天天辛勤的爲國家做事，而國家對於他的生活，反不顧到，也是不行的。痛快說起來，我們要打破中國式官，——侵公欵，飽私囊，不在薪水，——尤非從「裁員加薪」「杜絕中飽」來做起不可。這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我們不要講英美德法……什麼政治法律，抬起頭看看洋大人辦的鹽務稽核所，海關，郵局的辦法，就可以知道了。

（七）各機關實行財政公開。

(八)嚴定懲戒法，保障法，升遷法，撫卹法等。

(九)他們主張『參酌外國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級辦法。凡屬於考試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近來政治腐敗，原因雖有許多，而官吏資格，太不講究，實是一個大原因。因為什麼人都可做官，所以做大官的闊人，便可把他的心腹爪牙悉數引人，來幫他做禍國殃民的行為。至於他援引識過百家姓的親戚故舊，或招呼他的馬弁奴僕和姨太太的知己，來吃乾薪掛點勳章，還算沒有什麼。我敢老實說，現在的官，內中還不知『你的官是什麼東西』的人，不知有多少，這是中華民國最痛心的一件事！他們主張的，原是很對。但我希望考試的，除了注重專門科學外，還要注重普通學識，和世界的大勢，別注重已死的中文。非考試的，應格外注意他的出身和年齡，並須拘束他的『保薦升遷』。我並不是故意和現在的混官為難，其實要造成官是中國的官，為人民的僕，不再叫他做私人的官——某黨某派的官，——來做處理政務的官，不要做戕賊國民的官，那就非此不

可了！

（十）訂定官吏犯罪訴訟法。—採用英國的 Penal Action 訴式。—凡官吏侵蝕國帑，經告發人告發後成立犯罪時，爲私訴目的幾分之幾的金額，歸告發人領受。至於被控的案與國家金錢沒有關係的，當然可用別的法律來做手續法。

M，T，W.

（答）我們對於MTW君的這篇詳細痛快的文章，十分佩服，句句贊成。我們並希望他把眞姓名告訴我們。（適）

（十一）

我們中國自革命告成以來，除民國初元時稍稍現出那『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外，及後政治上的情形總是『江河日下』；到了現在，腐敗更盛，簡直難以用言語

形容出來了。時間已經過了十一載了，南北尚呈對峙之形，建設不下萬端，根本尚未有成文之法。推厥原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政府不好』。但我們試究其不好的原因又安在呢？不消說恐怕是這種『單一國』(Unitary state)的制度不配爲適應中國環境的一種工具了。因爲這種單一國的政府組織是單一性的，不是重疊性或聯邦性的，像中國這樣大的地方，各地風俗不同，利害各異，實行這種制度，一定是要遲滯的和隔閡的，就是有一個好中央政府也是要鞭長不及的。所以要想有一個『好政府』，那是非打破現在中國這種單一性國制不可，就是重新建設一種複合國—聯省自治—來做達該『好政府』這個目標的惟一途徑。

若是實行聯省自治，那種種具體問題如統一呀，裁兵呀，都是不難解決的。何以故呢？讓我略略說明如下：

第一南北統一問題。現在的南征北伐，名義上總是說求中國統一，殊不知這種武力的統一，事實上決定是不行的，因爲兩方的兵力相埒，打一個八年十年，勝負

始終不能分，結果不過是把元氣斲喪，同歸于盡罷了。若是實行聯省自治，各省暫守門羅主義，迅速把省憲制成，那北伐也不能伐，南征也不能征，豈不是這個『南北統一』問題，不費一兵，不勞一矢，無形的解決了嗎？

第二裁兵問題。據最近軍事調查，南北合計兵額總有一百三十餘萬，所需的費用不下二萬萬。我們試問問，為什麼這般軍閥——大的小的——要練這樣多的兵呢？無疑的一定是那些已經據有地盤者為保守其地盤而設，未據有地盤者為將來求得地盤而設。這種情形好像是羣雄割據的時代一樣。這種豢養多兵的目的就是侵占地盤，惟聯省自治可以打破他。因為聯省自治是本省人治本省人，各省無彼此干涉的可能，這樣一來，那班軍閥豢養多兵的目的已不存在，自然用不着豢養多兵來自找麻煩了，這就是不裁自裁的方法。所以實行聯省自治，裁兵問題也解決了。

把上面這兩個最重大的最難的而且阻礙力最大的問題一經解決了，辦理其他一切事務才不至掣肘。夫然後自命清高的好人大可以抖刷精神，社會上的優秀份子也

可以大告奮勇，同心戮力謀社會的安寧和個人的幸福；否則他們雖具有改造的意志，而無發展的餘地，那也是徒然。『好政府』仍自為『好政府』而不能實現。由此看來，要想產出一個『好政府』就在統一裁兵，而統一裁兵最好的方法又在聯省自治。故我以為聯省自治是目下中國建設『好政府』的途徑。

一九二二，五，十六。馬呂民。

（十二）

……我的意思，以為我們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不是統一問題，裁兵問題，和吏治問題，乃是政治組織的問題。什麼統一裁兵和吏治諸問題，不過是其附帶條件罷了。政體改革了，這些附帶問題卽隨之而解決。

然則，這一種政治是什麼？我一言以蔽之，卽是組織『聯省政府』。我深信『聯省政府』成立，可以使南北立卽統一，卽刻就可以能自動的裁兵，使軍閥不致

再有出現。至于『聯省政府』內部怎樣組織，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所以要極端贊成『聯省政府』之成立，因爲深信現在之南北分立數次和議無結果的原因，並不是僅僅是南北政府之衝突，乃是南北人民思想衝突之故。並且我深信『聯省政府』成立，一切衝突，立可以消滅。我學識淺陋，本夠不上談論這個問題，惟因先生們都是抱着集思廣益的主張，並懷着研究的精神，所以我敢冒昧陳言，祈先生等和閱者諸君隨時指教指教。

一九二二，五，一八。胡光煒。

(十三)

閱報載先生等政見，竊以爲開國十年以來有系統而適切於國情之政論，未有如先生此次提議之實獲我心也。

裁兵廢督之說，四年以前輿論倡之，然而政府變本加厲，督軍不足，且進而有

巡閱經略籌邊等使之設。民國四五年，全國僅五十餘師，今日百五十師左右矣。國之哲士清流，去軍人愈遠，而軍制愈壞。至官多議員多之說，年來罕有道破者。中央官署往往以十人之事而濫至數十人，或數百員，或逾千員者。國會事百餘人可治，多至七八百人。省會事三四十人可治，多至百餘人。故民國元二年之官及政費數倍於晚清，民國十年十一年又數倍於元二。世界兵多官多之國殆未有甚於中國也。芳以為必好人為將帥，而後兵可裁；好人為長官，而後官可裁。所謂政府者，不過文武官吏之積合體耳。今國人視軍閥官僚為萬惡，智識階級避之惟恐或浼，此政府所以日壞也。

芳為第一屆國會議員，異日恢復之後，則必首提普選案。然欲求通過，非同志三四百人不可，此難得之數也。裁兵案裁官案則又非僅僅通過國會，須視政府文武官實力奉行之如何。國之平民不能以羣衆作將帥作官作議員，只有監督之一法。監督之實，不外獎勉與掊擊二途。然報紙則多束於機械，而少公言，或言之寡效。老

百姓以未受教育，乏政治常識，而無能爲，且莫敢言。此外則學者少數，又力分而不集。於是壞者愈無所忌，好者亦灰心而不前。前年府院一致主張裁員減政，明令煌煌，結果適得其反。減裁者不能得賞，而輿論又無以慰勉之，於是黠者相率而非笑之矣。卽此一事，其間裁者增者，政府國民有一字之褒，或一字之貶耶？故芳以爲貫徹先生等之主張，有數策：

第一，凡智識階級一致從事於裁兵裁官裁議員之運動。

第二，凡能裁者，國人確實表示同情；對於增者，則一致攻擊。

第三，國會議員之言論，國民隨時予以嚴正之褒貶。

第四，憲法中於軍制官制，有明確之限制。

芳曾爲國民代表，此後願以裁兵裁官裁議員及普選等事爲自効於國民之的，卽不爲議員，亦願以此數事作先生等之後盾也。尤有進者，一國政治，必羣衆之威權可以左右國會，而國會又能舉監督政府之實，始克有濟。先生以爲然否？

李慶芳。

(十四)

努力週報登載的一篇『我們的政治主張』，已經惹起了社會上的反響，—如像晨報和益世報的批評—他們的意思，大概是說『賢人政治』和『好政府』都是不中用的，還是趨重在社會改革。但是我以為：我們現知道這壞政治是我們切膚之痛，並且是一切禍亂的種子，我們就不應當放鬆他；又知道政治是支配和管理其他一切社會組織的工具，我們就不應當蔑視他。所以中國現在的政治雖糟糕，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政治本身的大好能力，應當借政治能力，作改造社會的利器。因為有好政治，才有好社會。換言之，改革政治即是改革社會的動機，即是改革社會的前一半工夫，—好社會是個可以產出好政治，而好政治又可以整理社會—所以現在衆人所爭執的，不是那一種應不應該，適不適時，不過是次序先後的問題。可是我相信不

先從政治這一部分着手，是很難的。……所以先生們主張改革政治，我極端贊同；不過我還要向先生說幾句直率的話，望先生原諒。

我以爲凡是一種主張，必定要包含兩部分的意義：（一）懸出明瞭切實的目標，（二）指出達到目的具體方法。先生們懸的目標是『好政府』，隨後又說『憲政政府』，『有計畫的政治』，『公開的政府』，『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幸福』，『充分容納個人自由』和『愛護個人的發展』這些話，總算是給『好政府』一個最明斷圓滿的解釋。末尾所舉的幾個主張，南北和議，裁兵，裁官，……固是很具體的，但是也只是主張裏的一部分，——目標——幷不是實現好政府的方法手段。我想一個好主張，不單是目標好，幷且要方法好。換句話說，一種主張，不單是一個具體的目標。因爲不難于擇目標，難于有可能的具體方法。先生們雖有明瞭切實的目標，但是沒有指示出改革的道路來，卽是沒有告訴別人怎麽去進行，別人也就無從贊助和宣傳了。所以我要問問：

先生們爲實現好政府，主張裁兵，……用甚麼方法？怎樣去進行？是用和平的改良方法？還是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再進一步說，假如先生們主張『改良』，又怎麼去改良呢？假如主張革命，又怎麼去進行呢？

但是我觀察先生們的意思，大概是主張和平的改革，很不願意有流血的大犧牲；不過我以爲：就「經濟」說，革命固不如『改良』；就『徹底』說，『改良』又不如『革命』。就我們過去的歷史考察，中國的和平方法，已經用的不少了。以政府方面言，如北南和議，內閣改組，減政裁員，巨頭會議；以人民方面言，如自治運動，裁兵運動，廢督運動，最終的效果是甚麼？成績在那裏？從此就知道：中國還半生半死的政府，不能自行改革，無權力的平民，用柔和的手段也只能向政府作無效力的要挾和請求。我既得了這些教訓，就覺得和平的改良方法，是不適用于現代的中國，算是這種手段，在中國已經失敗了。所以我現在總不能忘情于『一粒炸彈勝過萬張傳單』這句格言。

殷鉞。

（答） 請般君參看第一篇討論及答語。 （適）

（十五）

我們要研究舊國會制憲，或另組織別種機關制憲，首先應研究的，就是在三種國會中宜召集那種。依張慰慈君發表的政治意見看來，是主張召集舊國會的，一般人也多主張召集舊國會，因舊會是合法的機關，自然召集舊會，方是合法的。我們既認定這舉動是合法的，那末，張君主張的制憲問題，就有研究的價值了。

（一）張君誤認現在的中國尚沒有法律可依據，所以他說：

……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及責成國會尅期完成憲法，是恢復憲法軌道的一種辦法，並不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法國憲法不是依據法律制定的，美國的憲法也不是依據法律制定的。

此種說法，不免有點錯誤。因法國從拿破崙第三降晉後，法國已成了無政府的狀態，自然沒有法律可依據以制憲。美國在聯邦憲法未制定以前，祇有聯盟約章，此約章算不得是一種憲法，所以美國當時是一種聯合國。若欲進一步來組成聯邦，其憲法制定，當然沒有法律可依據，與法國正同。中國現在就不然。中國的臨時約法固然是由革命而成，其制定是無法律的依據，恰與法美二國相同。但此後既有約法可據，且舊國會又是依約法召集的，不能說沒有法律可依據，主張舊國會制憲，不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

(二)張君既不主張召集舊國會來制憲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所以他又說：

如法果協商不妥，那末，由省議會舉出代表，或由別種法定機關舉出代表，組織制憲會議，也未始沒有商榷的餘地。

我們要知吳佩孚所主張的國是會和國民大會來解決時局，南政府未與以贊同，實因有法定的機關在，不贊成又在法外另組織機關所致。況中國數年的戰爭，皆藉口在

舊國會身上，另設別的機關，一定沒有商榷的餘地，我敢斷言。否則如國是會或國民大會等，南政府縱不贊成，必另有他種機關的主張來要求北政府承認，既沒有這樣的主張，是注重舊國會身上無疑。今主張別的機關來制憲，是不成的。況且張君的政治意見中已主張召集舊國會，現又在制憲問題中另主張組織別種機關來制憲也可，則召集舊國會來做什麼？原來約法載有國會制定憲法，這樣主張，不免稍違約法。且張君最簡易的制憲方法，也不免難於貫澈的地方。

(三)感情用事是不出眞理的，如張君說：

祇要能夠達到制定憲法的目的，什麼機的方法多可以用。如果不注重目的一方面，專去討論方法，那末，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總不能討論出什麼結果來。我們還希望一般政客們，不要你爭你的舊國會，他爭他的新國會，或新新國會，趕快的破除黨見，犧牲一些個人的私利，想法從最近的路程同大家趕快到憲法的軌道上去。

上說的話，純係感情用事，不以法律爲標準。試問中國國會有三，以何種國會爲宜？假如每人都以感情用事，犧牲了自己的意見，就會不知道那種國會可以制憲，那末，祇有聽他們三種國會自決雌雄來定誰制憲法。若果如此，中國豈不仍還大亂呢？我們須知道個人的主張不可輕於犧牲，愈主張得烈，眞理乃出。雖一時陷于糾紛的狀態，但不久眞理終必獲最後的勝利。如若不然，眞理終不能實現。如以新舊國會而論，舊會比新會爲優，是多數人所公認的。假如我們不極力主張舊會制憲，一旦新會得勢，豈不是我們犧牲了我們的意見的過呢？

依我看來，舊國會制憲是唯一的合法的辦法，並且利益有三：

(1)舊國會橫遭解散，在外奔走數年，備嘗艱苦，將其經驗用以制憲，可望得良好的憲法，如再用孔教定爲國教載在憲法的主張，必絕少其人。

(2)舊國會是合法的機關，若由此機關制憲，免再生歧異的主張。

（3）憲法草案是舊會起的草，對于各條已有研究，較由他種機關制憲，可以省時間和勞力。

雖說是舊國會在近年來的行動多有不滿人意的地方，但是事實問題，非法律問題。究竟舊國會之爲舊國會，仍是合法的機關。

我的意見如此，張君以爲如何？

文學成。

我的歧路

（一）學衡雜誌社梅光迪君來信

適之吾兄足下：

努力週報所刊政治主張及其他言論，多合弟意。兄談政治，不趨極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會，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久不通訊，故特致數語，以見『老梅』寬大公允，毫無成見，毫無偏私也。耑此，即頌撰安。

弟光迪啓。五月三十一。

（二）晨報副刊孫伏廬君來信

適之先生：

……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大多數沒有智識的人，決

不能產生什麼好政治。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來了，爲什麼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這條不經濟的路子？大多數人所以敬仰先生，換言之，『胡適之』三個字之所以可貴，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換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國哲學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國語文學史，能考證他人所不能考證的紅樓夢，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話文。現在先生拋棄（或者不完全拋棄，亦必拋棄一部分）這些可寶貴的事業，却來做『政論家與政黨』一類文章，我知稍有識者必知其不值。我們要看『政論家與政黨』，什麼地方不可以去找？我實在爲先生的光陰，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可惜。……先生呵，我是癡想竭我棉薄，將已被政治史奪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爭回來，不知能邀先生的垂顧嗎？

六月八日。伏廬敬上。

（三）常乃悳君來信

適之先生：

讀第四期努力週報中伯秋傅斯稜兩先生對於你們的週報的批評我也具有同感，先生的答詞我卻不敢同意。『紅樓夢攷證』『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一類的東西，實在在這裏沒有登出的必要，勉强湊進去反令閱者失望。不是說這種東西沒價值，祇是不應該在這種性質的出版物內出現罷了。先生的答詞似乎對于此點稍有含混。要知凡鼓吹一件事情不能不把全副精神集中到一點才能引起人的注意。思想文藝不是不要緊，但是你們不妨另外辦一種什麼東西來另外鼓吹，犯不着和政治問題攪在一處。我們現在所要求的不是包羅萬象的作品，祇是要一個又直捷又爽快刀刀見血的東西；否則先生們的文章那一種出版物上不可登，又何必特地搖旗擊鼓來辦這個東西呢？伯秋先生勸你把這半年功夫全用在政治上，我很贊成。我揣想你們的週刊所以不能期期都有精神者—第三期即很好—大約因沒有稿子的緣故。這事你不妨獨力擔任起來。說一句過火的話，即使此外一篇文章也沒有，你一個人打起精神

來包辦一下也不是什麼難事。何况如高一涵張慰慈諸先生也都是對政治有興味的人呢？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倘能再有進步嗎？總之，我認爲民國六年的時代從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藝是很正當的，現在却又應當轉過來從思想文藝鼓吹到政治才行。先生若能迎着這個趨勢首先領着大家往前走，——已往的趨勢是上山的，從工藝到法政，從法政到思想文藝；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我們現在只能走這政治的一步，過了這一步再走到工藝的一步，只有科學工藝是康莊大道，但你非過了這政治的一關不成。——則努力週報的功勞必不在新青年之下。至於別人的造謠攻擊倒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常乃悳上言。六月二日。

（四）我的自述

以上三篇通信，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却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

又不同了，他並非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眞是我的歧路了！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迴了三年；我現在忍着心腸來談政治，一隻脚已踏上東街，一隻脚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着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眞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與『變節而又遲迴』的原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工課佔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爲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一九一五年，我爲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爲衆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着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

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只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餘的文字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週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週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週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週評論第三

十一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的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但我的政論的『導言』雖然出來了，我始終沒有做到『本文』的機會！我的導言引起了無數的抗議：北方的社會主義者駁我，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痛罵我。我第三次替這篇導言辯護的文章剛排上版，每週評論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論文章也就流產了。

每週評論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這兩年零八個月之中，忙與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來做輿論的事業。我心裏也覺得我的哲學文學事業格外重要，實在捨不得丟了我的舊戀來巴結我的新歡。况且幾年不談政治的人，實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心裏總想國內有人起來幹這種事業，何必要我來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珂的附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敗，他們確然也還談談，因爲罵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華盛頓會議中，英美調停，由中日兩國代表開議，國內的報紙就加上一個『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們反對過的，現在這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們不能不極力反對。然而他們爭的是什麽呢？怎樣才可以達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無條件的

屈伏呢？外交問題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決呢？這些問題就很少人過問了。

我等候了兩年零八個月，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自信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說我談政治『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他可錯了；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正如我談白話文也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只是參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證的假設，絕不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的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我這幾年的言論文字，只是這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在各方面的應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古文學的推翻，白話文學的提倡，哲學史的研究，水滸紅樓夢的考證，一個『了』字或『們』字的歷史，都只是這一個目的。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我的朋友們，我不曾『變節』；我的態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與實例變了。

孫伏廬說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奪去的我，替文化史奪回來。我很感謝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於我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書比其餘的

書，只成一與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費一天在努力週報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評，遠不如做一萬字李觀學說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這一點『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政論態度，我最希望國內愛談政治又能談政治的學者來霸佔這個週報。以後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來替他們編輯整理，其餘六天仍舊去研究我的哲學與文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認常燕生的責備，但我不能承認他責備的理由。他說：

> 至於思想文藝等事，先生們這幾年提倡的効果也可見了，難道還期望他尚能再有進步嗎？

他下文又說『現在到了山頂以後，便應當往下走了。』這些話我不大懂得。燕生決不會承認現在的思想文藝已到了山頂，不能『再有進步』了。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却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我們『提倡有

心，創造『無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這也是我在這歧路上遲遲瞻顧的一個原因了。

十一，六，十六。

附錄一　王伯秋先生來信

雄雞一聲天下白，提倡改造政治的『努力』已出版了。但是我對於這個週刊的內容和方針，稍爲有些意見，寫在下面，供諸位的參考。

(一)態度公正，不偏於一黨一派。所有民國十一年以來各黨各派的意見，有可以採用的處所，我們不妨加意的提倡，有不可以採用的處所，我們就應該猛烈的反對。

(二)提綱挈領，大處落墨。就目前而論，如恢復六年的舊國會，和南北統一，是最要緊的事。近的將來如裁兵，廢督，製憲，改正選舉法，清理財政諸大端，都應該分別研究，發表我們的主張，使大衆知道現在中國的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應

該如何去解决他。近幾年來全國的人都不注意政治，智識階級的人並且以不談政治爲高尙。所以大家糊糊塗塗在民主共和的招牌底下混了十一年，究竟不知道中國幾年來的紛亂爲的是怎麽一回事。

（三）一方面鼓吹政治的理論（或創作，或繙譯），一方面提出實行的方法。如時事新報記者所說的『起碼的政治主張』，就議我們沒有辦法，只有題目。我們就應該特別的注意這一點。

（四）提倡政治教育。我國人的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知識又非常缺乏。我們就應該多發表些熱烈的文章，刺激他們；多搜集些政治的材料，供給他們；把努力週刊的一部分當作普及『政治教育』的一個機關。

（五）材料要豐富。本刊每周只有一次，每次只有一張，應該滿紙都載的是政治議論，學說，辦法，和各種有益的事實（如此次所載的南北軍隊的調查表很好）。使大家都知道努力是一團無黨的淸白分子所結合的一個提倡改造政治的言論機關。

如你的『紅樓夢攷證』與『新文學』等等的主張，且不要在這一個報上發表，免得別人誤會說我們沒有充分的政治知識和材料，特地拿些旁的東西來敷衍篇幅的。旁人的閒話雖然可以不聽，但是我們這報的主旨與體裁也應該專向一方面去用力。我勸適之這半年功夫暫且專心致志放在改造政治的上面，拿出你的提倡白話文的熱心來提倡良政治：讀書讀政治，演說演政治，做事做政治（不是做官，是做政治運動）。我想大家合起心來向這一條路上去，或者可以收着很大的效果。

以上所說的話，隨筆寫來，拉雜無次，請你不以辭害意。

伯秋

附錄二　傅斯棱先生來信

我讀罷你們的努力週報，於你們的政治主張，可說是完全表示同意，贊成；不過於其他部份尙有些不滿意處。

努力報之不能滿人意處者，老實話同胡先生說了罷，就是——

（1）無充分的精力　你們本來說是政治壞到極處了，趕快的『努力』去整理罷！這是何樣勇敢精神，才有這『努力』的前進。但仔細去看這努力報上的精力，又大大的和你們的『努力』主張相反了，因爲政治既敗壞到難堪，我們深感於這政治敗壞的痛苦而希望有『好政府』的組織，所以你們才有努力報的刊行，去鼓吹那『好政府』的目的。那麼於七日始出一次的小報紙，就應該把這一週間所感受政治不良的痛苦，該與該廢一些道理發表出來不可，這是對于去『努力』應當具的精神，也就是拿來代替那些新聞紙上應有的材料，也就算是新聞界的大改革。誰知你們的努力報不務於此，說得非常的好聽，於實行上未免言過其實了。請胡先生看，除去那篇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很有價值，像那天農和陳衡哲的兩篇文字，東西雖然不壞，但……努力報既是向前去鼓吹我們

的『好政府』主義，就該抱着這個主張向前幹去，那裏更有閑心去管他什麼耶穌教的位置如何，什麼美國的新聞紙如何，拿有用的精力幹些不相干的新聞學與宗教史，更加上胡先生答蔡孑民先生的紅樓夢考證，以那無用的文藝竟充滿了第四版，眞可惜了這第四版的地位。因爲這個報不是尋常的新聞紙可比，所以不能在這正努力去向好政府路上走，而又來賣些雜貨，總要叫他有系統才好！故說你們的報『無充分的精力』，希望胡先生在第三號上大大的改良爲是！

（2）偏重於空泛的學理　學理能說也是從經驗中來的，但總脫不掉『空泛』兩個字。因爲無論我國及歐美何種學說，不能因有所憑依任何主義就算是好的，蓋無論何種學理都是死藥方子，醫不了活潑潑的現政治的病，須要靠着現政治的實際找出他那些毛病出來，然後方可以去『努力』治他的病。如只要學理去『努力』幹去，不但無濟於事，學理

只管去說學理，而政治糟糕仍然是糟糕，豈不把你們的精神，信用，都要損失了嗎？如此那又何苦來呢！此我尤希望胡先生留意。

附錄三　答伯秋與傅斯棱兩先生

兩位先生的忠告，我們都很感謝。但他們兩位有一條相同的責備，使我們不能不有一度的聲明。他們兩位都盼望我們專力談政治而不顧我們談文學或新文學。他們都怪我的『跋紅樓夢考證』，這話我不願駁回。但伯秋先生竟不要我發表關於『新文學』等等的主張，傅先生竟說我們不應該管『什麼耶穌教的地位如何，什麼美國的新聞紙如何』。這種主張，我們便不能心服了。

我們這個報並不是『專』談政治的。政治不過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我們的希望是：討論活的問題，提倡活的思想，介紹活的文學。基督教的問題近來在國中頗引起一番熱鬧的注意，豈不值得討論？至於美國新聞紙的經過，這也是我們極與

論事業的人應該借鑒的。我們應該知道：政治不單是官吏與法制，也不單是裁兵與理財。我們這幾年所以不談政治，和許多不談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們當日不談政治，正是要想從思想文藝的方面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現在我們雖然因時勢的需要，不能不談政治問題，但我們本來的主張是仍舊不當拋棄的，我們仍舊要兼顧到思想與文藝的方面的。

我們至今還認定思想文藝的重要。現在國中最大的病根，並不是軍閥與惡官僚，乃是懶惰的心理，淺薄的思想，靠天吃飯的迷信，隔岸觀火的態度。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真仇敵！他們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們現在因為他們的小孫子——惡政治——太壞了，忍不住先打擊他。但我們決不可忘記這二千年思想文藝造成的惡果。

打倒今日之惡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惡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藝裏的『孽鬼』更要大家努力！

十一，五，二七。適。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

——答陳獨秀——

我們的朋友陳獨秀是反對聯省自治的。他的『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一篇的末三段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他很武斷的責備那主張聯省自治的人『未曾研究中國政治糾紛的根源在那裏』。他自己斷定中國政治糾紛的根源在於『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輿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

我們要很誠懇的替他指出：他所舉的只是糾紛的現狀，並不是糾紛的根源；只是亂，並不是亂源。試問，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又是從那裏來的？獨秀說是『帝制遺下來的』。這又是『米是米甕裏生的』的故事了！我們如果進一步研究帝制運動的

時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運動確可代表一種『强求統一』的迷夢。這個迷夢的來源長的很呢！自從秦始皇以來，二千多年的歷史確然呈現一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勢。這二千年歷史的教訓是：中國太大了，不適於單一制的政治組織。所以中央的統治力一衰，全國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盡，都厭亂了，然後又『合』起來。明朝用極端的專制，只落得十七世紀的大亂，連一個『分』字都夠不上，只是『瓦解』了。清朝承大亂之後，恩威並用，也只能支持到一百五十年；乾隆末年，匪亂已四起了；鴉片之戰以後，中央的紙老虎已戳穿了，故有十九世紀中葉的大亂。洪秀全的徒黨在十八個月之內，自廣西直打到南京；全國也幾乎『瓦解』了。後來平亂的人，不是中央的軍隊，都是起於保衛鄉黨的新軍。我們看湘軍的組織和長江水師的歷史，可以想見當日的統一，實由于各省的自衛。（長江水師與湘軍的餉費，皆不出于中央。）二十年的大亂之後，中國仍歸于統一，然而皇室與中央政府統治力的薄弱，早已完全暴露了。六十年來，中央的權限一天天的縮小，地

方的自覺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軍起，『省的獨立』遂成一件歷史的事實。當袁世凱的時代，這個現狀的意義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國二三四年間的『聯邦論』。『聯邦論』已起，而袁世凱還想做他的統一的迷夢。第一步是『袁家將』的分布各省；然而軍閥分封之後，仍舊不能減除各省獨立的趨勢。袁氏誤解病源，以爲皇帝的名號可以維繫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運動。故從歷史上看來，軍閥的封建與帝制的運動都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爲強求統一而封建軍閥，然而封建軍閥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遂成了獨秀說的政治糾紛的現狀。

我們不願意用一兩個簡單的公式來解釋那複雜的政治問題。但我們從歷史的事實上看起來，不能不說：『用集權形式的政治組織，勉強施行於這最不適於集權政治的中國』，是中國今日軍閥割據的一個大原因。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是今日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

我們且看看歷史上的事實，獨秀說：

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還要擴大到什麼地步？

我們要知道，各省督軍總司令的權大，是一件事；地方的權大，另是一件事。在今日的制度之下，只是督軍權大，而地方權極小。（這一點大家不可不特別注意。）就拿財政權來說罷：民國五年政府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權，把許多向來歸地方的收支，都劃歸中央管理，即如安徽一省十年度的『國家收支』，如下列表：

國家歲入經常門：

項目	金額
一，租稅	五，〇六四，二〇〇元
二，雜收入	一七五，八八〇元
合計	五，二四〇，〇八〇元

國家歲入臨時門：

項目	金額
合計	一二九，一九八元

國家歲入總數	五，三六九，二七八元
國家歲出經常門：	
一，外交部管	九，八四○元
二，內務部管	一，四七一，四一四元
三，財政部管	六二，一五九元
四，司法部管	五六○，八○八元
五，農商部管	五八，三○四元
六，教育部管	三五，○○○元
七，陸軍部管	三，八○○，三○五元
合計	六，五五七，一九○元
國家歲出臨時門：	
各部合計	三七五，八八○元

國家歲出總計　　　六，九三三，〇七〇元

我們要知道，這五百多萬的收入，七百萬的支出，都是『國家的收支』，都是省議會無權過問的。所謂『地方的收支』，只限於本省的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項，那是省議會可以過問的。自從民國五年以來，各省都是如此。（參看銀行月刊第二卷第八號，劉大鈞中央與各省之財政。）因爲地方的財政範圍縮小，因爲省議會無權過問那絕大的『國家收支』，而中央又無力實行管理，所以各省的財政大權都操在督軍與總司令之手。兵馬權的歷史，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說：今日只是督軍權大，而地方權小；若因爲督軍權大而就說地方權大，那就是倒果爲因的謬論了。

我們要知道，督軍總司令的權力所以擴大到那麼地步，正是因爲他們現在處的地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央有『權』可管他們，而無『力』管他們；地方有勢力可管他們，而無『權』管他們。試問我們今日要想裁制軍閥的權力，還是希

望那有權無力的中央呢？還是希望那有力無權的地方呢？我們的答案是：

> 增加地方的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這是省自治的意義，這是聯邦運動的作用。

地方有了權，就可以裁制軍閥嗎？可以的。我們試看江蘇近幾個月的公債案，那便是一證。因爲中央把地方的大部分財政權都收去了，故『地方收支』項下列有『公債』一門。公債既屬地方，地方便有權過問了。今年江蘇要發行四百萬公債，加上『江蘇國庫分金庫』的字樣，想只要財政部的批准，不經省議會的通過。但地方的反對究竟起來了。韓國鈞只得召集本省的紳士，開一個財政會議，改四百萬爲七百萬，總想躲過省議會的一關。但地方的反對還是不息的。他們反對的最大理由是：

> 募集公債，非行政機關所得單獨行動者也。國家募集公債，須經國會之議決；省政府募集公債，須經省議會之議決。法律昭然，寧堪弁髦？

我們可以預料江蘇這七百萬的公債是發不成的。我們再看曹錕曹銳威權之下的直隸

省議會；他們別的成績雖不足道，但這幾年中省議會始終不肯通過一個公債案。我們於此可見地方權力的範圍之內，軍閥的權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在今日地方權力薄弱之時，這種裁制是不能完全有效的。（如奉天廣東之借外債。）但將來地方的權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地方變成了可決否決的最後一關，那時候的軍閥就不能再有現在的容易日子了，那時候，全省的視線都注在省議會，本省的人才也會回到省議會去努力，省議會就成了軍閥與人民決鬥的戰場。軍閥也許用金錢與武力來作最後的奮鬥，——如山東的現狀，——但這種奮鬥的結果，一定是軍閥失敗的。

總括起來，我們的意見是：

（1）中國不適宜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的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惡果。

（2）今日只是督軍總司令的權大，而地方的權極小。這兩件事決不可混作一件事。

(3)軍閥的權限所以大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地方沒有權，又因為中央雖有權而無力裁制軍閥。

(4)今日決不能希望中央來裁制軍閥；裁制軍閥與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在於增加地方權限，在於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

至於獨秀說的『聯邦制若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奈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我對於這種論調，真不懂得了。獨秀在前面明明指出中國的經濟狀況，從家庭農業，到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有三種懸絕的狀況。至於語言宗教的不同也有許多不可掩的事實。（語言更明顯。）何以他又說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呢？況且稍研究聯邦國家的人，也應該知道聯邦制並不必建築在經濟狀況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美國不是一個例嗎？獨秀又說：

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

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曾明目張胆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

這也是不研究歷史事實的籠統話。我們且不論辛亥以前提倡的「新湖南」「新廣東」「新江蘇」「新浙江」；我們且不談民國三四年的聯邦論；即論最近三年來的聯省自治運動，那一省不是先由反對軍閥反對駐防的人提倡的？聯省自治的聲浪傳播遠了，事實上已不容易壓制了，「聯省自治」四個字已成為可以號召的旗幟了，於是軍閥也不能不注意他了。軍閥之中，對於這個運動，有兩種態度。一派是投降在這個旗幟之下，想借他的招牌來苟延殘喘的。湖南的趙，浙江的盧，便是這一派的代表。孤立的盧永祥甚至於不惜冒籍浙江，這是誰投降誰的表示？一派是還想做「武力統一」的迷夢的；他們的地盤大都根據在駐防異省的制度之上，聯省自治便是他們的致命之傷；他們既不能學盧永祥的冒籍，自然不能不出來反對聯省自治了。我們試看湖南爭省長的一幕戲，便可以了解直系武人反對聯省自治的心理了。

明明是武人軍閥最忌的一個武器，偏有人說他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豈非大錯！

我們可以大胆說：

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

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

十一，九，八。

附錄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

陳獨秀

人類社會因治生方法不斷的進步，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遂隨之不斷的進步：在這不斷的進步之過程中，保守者與改革者亦即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兩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斷的爭鬥；每個爭鬥的結果，後者恆戰勝前者，人類社會是依這樣方式進步的。照前人依據歷史的事實指示我們的：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即不斷的爭鬥

中，依治生方法之大變更擴大了他們的生活意識，他們利害相衝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兩次最大的階級爭鬥：第一次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第二次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所以人類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爭鬥，都有階級爭鬥的意義含在裏面。

今日，不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方在猛烈的進行中，即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雖在最進步的國家若德意志若法蘭西也還未曾完全終了。在產業幼稚的東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計外，即稍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形式及意識雖然都正在開始發展，而團結力都十分幼穉，因此國家統治權仍舊完全掌握在封建階級之手。最進步的日本，也不過是一個半封建式半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已戰勝封建的歐美資產階級，採用帝國主義，利用產業不發達的亞洲非洲諸國做他們的殖民地或商場，并且公然的或陰謀的運用他們政治及經濟勢力，箝制殖民地及商場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沒有自由發展的機會，這是非亞兩洲被壓迫的民族之普遍的

痛苦。

在這種世界政治的經濟的狀況之下的中國，他也是被壓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經濟是自然要受環境支配的。

中國經濟的狀況，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內地鄉村的家庭農業，(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業，(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因為受了列強在中國所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本國軍閥的擾亂，農民被物價騰貴驅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業漸為外國機器製造品所毀滅，新興的工商業沒有保護關稅及運輸便利，也不能夠發展起來和外資競爭。

中國政治的狀況，也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幣流通於全國，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操諸外人之手，這些政治狀況都是半殖民地的

狀況，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二)是國內軍閥的擾亂，帝制倒了，帝制遺下來的軍閥却未曾倒，大小軍閥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權財權，使全國中法律無效，輿論無效，財政紊亂而國家瀕於破產，又以軍閥互鬪之故，戰禍遍於全國，金融恐慌，運輸停止，工商業莫由發展；(三)是政黨之萎弱，幼稺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强壯的表徵，孤軍奮鬪的國民黨，雖然有民主革命的歷史，但黨員太少，還沒有支配全國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至其餘的黨派，都不過湊合數百個或數十個利害相同的官僚議員，依附軍閥來謀一官半職，我們不敢妄說他們是有主義有政策的政黨。

以上所列中國經濟的及政治的現狀，凡是誠實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應該承認實是如此。

這樣的經濟及政治狀況，遂使中國的階級爭鬥不得不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

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鬥，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鬥。因爲中國勞苦羣衆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式及意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爲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時期還未成熟。資產階級的政治爭鬥，已經由辛亥革命運動 愛國運動 及護法運動表示他們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爭鬥，是中國人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勞苦羣衆也都應該加入：因爲這第一段民主主義的爭鬥，乃是對內完全傾覆封建軍閥得着和平與自由，對外促成中國眞正的獨立，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不但能給中國資產階級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也只有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是解放無產階級使他們由幼稚而到強壯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國政治的經濟的現狀之下，這第一段民主主義的爭鬥，應該以左列諸項原則爲最重要的標的：

(一)傾覆軍閥及賣國黨，尤其首先要懲創勾結賣國黨或希圖割據的軍閥，以實現國內和平與本部統一。

(二)廢止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强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收回管理權，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使中國成爲眞正獨立的國家。

(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絕對的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

(四)定保護農民工人的各種法律。

用如何方法達到上列各項標的，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眞的民主政治的標的，固然不是在維持現狀之下，利用敵人勢力鼠竊狗偷可以達到，也不是小勢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爲一切國家都必然建設在權力之上：封建的國家建設在軍閥權力之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人民權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軍閥和人民兩種

權力之上，殖民地的國家建設在母國權力之上。無權力則無國家無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這種自然法則之支配，又是我們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若是人民的權力不能代替軍閥的權力，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民主政治是不會成功的。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在各種人民的組織裏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政治的隆汚是人民休戚之最大關鍵，政黨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張人民不干涉政治是發昏，主張干涉政治而不主張組織政黨，更是發昏之發昏。要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亦卽是以人民權力來代替軍閥權力，非有黨員居全國人口百分一之强大的民主黨二個以上不可。因爲有這們多的黨員，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國各級議會的選舉，才可以實施刷新政治的各項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這件事若辦不到，政黨政治是不會成功的，民主主義是不會實現的，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軍閥政治不倒，他們各霸一方把持財政，法律無效，輿論無效，戰亂蔓延，

工商凋敝，教育廢弛等現狀，是要繼續下去的。此等現狀繼續下去，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現在半殖民地狀況更變到完全殖民地狀況的。

我們知道民主主義的爭鬥僅是第一段爭鬥，不是人類最後的爭鬪；我們更知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下的政黨政治是必然包涵許多腐敗與罪惡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人類階級爭鬪亦卽社會進步的過程上看起來，在中國政治的及經濟的現狀上看起來，我們勢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敗更罪惡的軍閥政治之民主的政黨政治能夠成功。

現在有一派人主張聯省自治爲解決時局的辦法，這種主張是未曾研究中國政治糾紛的根源在那裏。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是因爲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輿論都歸無效，實業敎育一概停頓，並不是因爲中央權大地方權小的問題。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還要擴大到什麼地步？說到地方自

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則，我們本不反對，但是要曉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鎮鄉的自治，地方自治團體擴大到中國各省這樣大的範圍，已經不是簡單的地方自治問題，乃是採用聯邦制，屬於國家組織問題。

聯邦制若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奈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們這種主張，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實上，無人敢說這樣大的自治權馬上就能夠歸到人民手裏，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胆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武人割據是中國唯一的亂源。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之聯省論，與其說是解決時局，不如說是增長亂源。增長亂源的政治主張，我希望愛國君子要慎重一點。

所以我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

義，使中國成爲眞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

一個平庸的提議

——解決目前時局的計畫——

（一）政治的

大家都說，目前第一件要事是財政。其實那是錯的。政治不能解決，財政決不能解決：你要辦新稅，各省不保你；你要大借款，大家要反對；你要節省政費，裁了一千個冗員，還禁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砲！所以我主張先從政治方面下手。我的計畫是：

（1）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甲）名稱。　如政府不愛『聯省會議』之名，儘可叫他做『全國會議』，或『統一會議』。

（乙）組織。　每省派會員四人（省議會舉一人，省教育會與省商會各舉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國會舉三人。主席得由政府任命（以免紛爭）。

（丙）地點。　我主張在北京：因為北京雖在北京政府勢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確實自由多了，文明多了。

（丁）權限。　這個會議得討論並議決關於下列各項問題：

(a)裁兵與軍隊的安插。

(b)財政。

(c)國憲制定後統一事宜。

(d)省自治的進行計畫。

(e)交通事業的發展計畫。

這五項問題，設有一項和國會的權限衝突的，國會不應該吃醋，政府也不應該因怕

國會吃醋而不敢舉行。況且此次政府召集的財政會議，豈不也是一種各省會議嗎？既可以召集財政會議，何以不可以召集各省會議？況且我可以斷定那單討論財政的會議是無效的。

（2）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除那逼人而來的大戰禍。

（對於這一件事，全國贊成弭兵的人也應該加入。）

我這個提議，初看了似乎未免帶孩子氣，但是我這話是板起面孔來說的正經話。本年四五月間的奉直戰爭固然是勝敗太不徹底；但我們試問，奉直若再開戰，就能打出一個徹底的結果了嗎？況且人民有什麼罪過，必須忍受這一回一回的戰禍嗎？即使一時打不起來，而兩方拚命的預備作戰，搜括一切款項，作為軍費，那麼浩大的軍費也是人民不能長久負担的。況且前次直奉戰爭所以結束的快，大都是因為張作霖大舉入關，故一敗塗地；現在奉軍若取守勢，戰禍便不知何日終了了。假使戰事延長至兩三個月，——這是很穩健的計算——北中國的什麼事業（教育，礦業，工商，

等）都不能不根本毀壞了。所以我們無論怎樣推想，都回到一個同樣的結論：直奉的私鬥決不可不消除。

如果王寵惠們只願做大官，只願做一個「無抵抗力的內閣」（這是前日某報的妙語），那也罷了。如果他們還想做個像樣子的政治家，他們應該用公開的條件來調解消除奉直的私鬥。我主張的條件是：

（甲）雙方減縮軍備，克期同時裁兵。

（乙）東三省取消獨立，交還鹽稅及車輛。直系各省也不得提取鐵路收入。

（丙）任曹張吳三人為北方裁兵專使。

（丁）北方各省實行廢督，廢巡閱使。

（戊）其他事項，由上述之各省會議解決之。

我也知道這件事決不是王寵惠們幹得了的。但是我們既談大政方針，就不能不列這

一條了。我很希望國民注意此事，養成輿論，作一個實際上裁兵的大運動！就是王寵惠們幹不了，這件事總得有人幹的。

（二）財政的

財政的計畫，說的最詳細的是努力第八第九兩期R T的『中國財政的出路』。他說財政的『根本整頓方法』分兩項：

第一，劃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界限。

第二，力行裁兵減政。

第一條是要等國憲和各省會議的。此時空談『劃分財政』，是沒有用的。紙上的劃分是早已有過的了。故單有國憲的規定，還是不夠的；各省會議的一關是逃不過的。第二條的裁兵一項也必須等各省會議和奉直和議兩事舉行之後，方才可有把握。此時中央能行的只有減政一項。六七月間的減政計畫，近來似乎又漸漸停頓了。大概欠薪太多是不能減政一個大原因。然而欠薪不能還而冗員又不能減，天天

債台高上去，也終不成事體。如有相當時機，應該把陸軍，海軍，參謀三部併作一部，設一個總長，兩個次長，名爲『軍事部』。國憲制定之後，教育權既歸地方，教育部也可廢去，改爲內務部的一司。此類的例甚多，一時不必細舉了。

RT君說的『目前過渡方法』也有兩項：

第一，規定中央軍政費之最大限度爲每月五百五十萬元。

第二，整理各項長短期內外債及墊欵（包括欠薪），總數約四萬萬元。

他指出變通收入，鹽餘一部分，崇文門稅，山西解款，四項每月不過三百萬元。所以他主張等到適當的時期，舉行大借欵四萬萬元，以三萬萬四千萬抵債，以三千萬爲一年軍政費的補助，其餘卽作爲裁兵基金。利息爲六釐，担保爲海關增率稅。

他這兩個過渡方法，其實只是大借欵一個法子。前天報上登出芮恩施在顧維鈞茶會席上發表的財政演說，似乎可以表示政府確也有大借欵的希望。但芮恩施的一篇淺薄的演說是沒有用處的。外款非不可借，但現在政治未統一之前，大借款是決

不能成立的。即使如芮氏說的，外國資本家肯借款，中國的國民未必肯承認這筆借款。借款給軍閥政客去分贓，是決通不過的。

所以我主張現在救急的財政辦法是：

（1）從速解決政治的糾紛。先從上文說的兩事下手，——召集各省會議，消除直奉的戰禍。

總計中央名義上的收入，應有

田賦	八千餘萬元
厘金及雜捐	四千餘萬元
關餘	一千萬元（依十一年度預測）
鹽稅	八千萬元
雜稅	五百萬元
煙酒稅	四千萬元

印花稅　六百萬元

鑛稅　八十萬元

中央機關收入　一百萬元

官產收入　一千萬元

總計約二萬九千萬元。

假如各省都像山西那樣忠順，（山西省每年解中央二百餘萬元。）中央的財政問題早已解決大半了。現在中央的勢力不能放一個湖北省長或山東省長，還有人希望用財政會議來解決財政問題，豈不是做夢嗎？即如鹽稅一項，別說那四川的一千萬元，東三省近在咫尺，現在也扣留鹽稅了。這豈是一個財政會議就能解決的嗎？所以我主張第一步是政治糾紛的解決。

（2）爲目前計，宜從速宣布財政的收支實況，約如下列各項：

（甲）收入尙有幾項？

關餘，

鹽餘，

省解欵，

崇文關稅，

中央機關收入：交通，鹽商，司法等。

（乙）負債實數：

（a）欠餉詳數。

（b）臨時軍費。

（c）每月必需軍餉總數。

（d）每月必需行政費。（包括敎育）

（e）各機關欠薪實數。（包括國會）

（f）京師軍警費。

(g)京師軍警積欠。

(h)內外債到期應付利息。

(i)內外債到期應付本。

(丙)現在每月支出實數。

(a)究竟各軍發餉若干?

(b)各機關發薪詳報。

(c)各種內外債基金已撥付若干?

(d)其他實支。

(丁)收支比較，總虧若干?

這種公布是不可少的。政府現在想用一紙『依法懲辦』的命令來禁止索薪的舉動，那是自欺欺人的政策。即使你能禁索薪的包圍，你還不能禁各機關的罷工，更不能禁軍隊的鬧餉。只有開誠布公的把財政的狀況宣布出來，大家也許還可原諒政府

一點。

況且政府為什麼總不肯公布財政的實況呢？豈不是因為軍費太多，怕人不平嗎？其實當此變態的時代，軍費之多自是大家意中之事，又何必瞞人呢？況且政府越秘密，大家越猜疑，越不能心平，所以倒不如一切公開的好。

況且國民若不知道財政的實況，政府雖有救濟的計畫，也不能得大家的贊助。假如政府此時下令回到民國元年各機關人員一律支薪六十元的辦法，大家能不要求先查賬嗎？假如政府此時大借外債，大家能不要求先報告用途嗎？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公布，什麼財政計畫都行不去。

（3）公布財政實況之後，應通盤籌算，做一個目前救急的小計畫。這個計畫應分兩個部分：

（甲）分還積欠。　發給債券，按月攤還。

（乙）均平現狀。　無論変通財政，應與其他機關一律均平待

遇。或發半薪，或竟回復元年每人六十元的辦法。

這個計畫應包括維持北京地方治安的方法。北京舉行地方稅，專供地方之用，是應該辦的。況且北京警察制度較完備，徵收新稅也不致有什麼大困難。（北京中小學的經費也須由中央籌給，而北京市民不負一文錢的學校稅，豈非怪事？）

（4）大借款如不可免，此時也只宜做計畫，研究用途的分配，條件的磋商，而不能驟然實行，這時候若貿然做大借款，決沒有不失敗的！

以上計政治方面二條，財政方面四條，是我試做的對於目前時局的計畫。此外尚有蒙古問題與承認俄國的問題，鐵路問題與新銀行團的問題，因不願佔努力太多的篇幅，此時只好不談了。最後我要重引努力的話作結論：

「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沒計畫！」

十一，九，十二

一年半的回顧

努力第一期出版的時候（五月七日），正當奉直戰爭的時期。付印的時候，我們還以爲那一次的戰爭至少有一兩個月之久，所以我們請宗淹先生擔任軍事的調查和戰事的紀敘。不料努力第一期出版時，奉軍大敗的消息已證實了，戰事的結束似乎不遠了。當日北方的政局驟然呈一大變態。橫行關內的奉軍，正在紛紛退出關去；安福的國會早已銷沉了；安福的總統也快要倒了；新新國會似乎沒有召集的希望了。

那時在北方的優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較清明的機會，『我們的政治主張』也就於五月十四日發表出來。在那篇宣言裏，我們提出『好政府』三個字作爲『現在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並且加上三條子目：

(1)憲政的政府，

(2)公開的政府，

(3)有計劃的政治。

我們主張，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來奮鬥。以上是我們的原則。關於當日眼前的政治問題，我們也有六項提議：

(1)南北早日正式開和平會議。

(2)用『恢復六年解散的國會』等項爲議和的條件。

(3)裁兵。

(4)裁官。實行『考試任官』的制度。

(5)改良選舉制度。

(6)公開的，有計劃的財政。

我們不贊成立刻恢復民二國會，只贊成用此事爲解決南北糾紛的一個條件。我

們注意在一個公開的南北和會，或各省會議。但當時北方的勝利者吳佩孚，挾戰勝的餘威，號召北方，擁戴黎元洪為總統，立卽召集民二國會。那時我們認定這兩件事是大錯的，故於六月十八日提出兩項補救的辦法：

(1)希望黎元洪的政府自居於『事實上的臨時政府』，他的任務是用公開的態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統一。

(2)希望那自行召集的舊國會也自居於『臨時的國會』。

但這種提議，在當時簡直是與虎謀皮。黎元洪的貪戀權勢後來畢竟成為和平統一的大障礙；而國會的橫行竟釀成今日齷齪無恥的政局。

去年五六兩個月眞是政局的一大關鍵。吳佩孚召集舊國會，本是想取消南方『護法』的旗幟。五月裏孫文發表宣言，對北方將領要求裁軍隊為工兵；他的態度已很明顯，很有和平解決的表示了。不幸六月中廣州發生孫陳之爭，陳炯明推翻了孫文的勢力，孫氏倉皇出走。這件事在當日確然是孫陳兩人主張不同性情不同久不

相能的結果：當日大家的評論雖不一致，然而在當時就是最恨陳炯明的人也不信陳氏的行為是服從北方的指使。但事後看來，當日孫陳的決裂確是一大不幸的事。一來因為孫文失去勢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統一的野心。二來因為孫陳兩人決裂後，陳氏怕孫派的報復，竟公然與直系軍人聯絡。三來因為孫氏要報仇，竟至糜爛了廣東，至於今日。

從此以後，吳佩孚一意布置武力統一的實行。當時也有人設法運動各方面開一個和平會議。但輿論的鼓吹，政客的奔走，終打不破吳佩孚的迷夢和黎元洪的熱中。假使當日黎元洪與王寵惠能有政治的眼光，極力主張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至少也許可以避免一部分的糜爛，至少也許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困難。但庸碌的黎元洪和糊塗的王寵惠都不肯反抗洛陽的意旨；鬧到後來，王內閣終於被迫而去，而吳佩孚失勢之後，黎元洪也終于被迫而去。當日一個可以和平解決的機會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當日對於北方政府，確曾抱一點希望。一來呢，當日的閣員之中，有一部分頗負時望，雖是虛辭，但虛聲究竟遠勝于惡名。二來呢，當日的閣員，多數都是不要錢的好人。三來呢，當時董康高恩洪羅文幹的裁官政策，頗能實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總算開一點新氣象。

我們因此曾給王寵惠內閣出了一些主意。在努力二十期上，我用WGT的假名，發表了一個『解決目前時局的計劃』，內容是：

（1）速卽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2）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除北方的戰禍。

我們觀察直系軍人武力政策的結果，知道當日財政無辦法，教育無辦法，都由於他們亟亟備戰，把錢花在軍事的設備和搗亂南方兩項上去了。所以我們說：

政治不解決，財政決不能解決。……裁了一千個冗員，還禁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砲！

這種話頭在當日完全不發生效力，於是我們只好繼續向國民宣傳。我們在努力第二十八期上，曾說：

我們不信政治上有什麼包醫百病的良藥。但我們深信現在這種坐而待斃的怪現狀是不行的；支支節節的敷衍是不行的；狹義的大復仇主義，是不行的；偷偷摸摸的接洽，鬼鬼祟祟的買賣，是不行的。我在這個沉悶可憐的空氣裏，回頭看看我們老百姓受的痛苦，看看無數同胞忍淚吞聲的受痛苦，我們不能不問問自己：『究竟有什麼救急的法子沒有？究竟有什麼可以一試的法子沒有？』我們的答案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

但這時候，天津派的無恥政客早已暗地進行作『先倒閣，次驅黎擁曹』的大運動了。（邊守靖吳景濂的政治陰謀起於黎元洪入京之先，努力第六號曾揭載他們陰謀的電報。）十一月十九晨，羅文幹因奧款展期合同事被捕，不久王內閣也就倒

了。羅案的結果，羅文幹無罪；然而從那回以後，北京的政局遂成了吳景濂一班人橫行無忌的世界。加之李根源彭允彝等上台之後，私人走狗充塞了各機關，冗員增加了幾十倍，去年夏間的政界一線光明—裁官的實行—從此也絕望了。

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汚之苟安」，借羅案提出抗議，憤然去職。那時正是國會議員在光園拜壽，紅羅廠賣身的時候，蔡元培那種高潔的抗議，不但不發生什麼效果，反激一班豬仔議員老羞成怒，把張紹曾的內閣一榜全賜及第了！

我們在那個時候，也就起了一種覺悟。我們那時曾說：

> 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衆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努力四十期）

換句話說，我們還應該向國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後可以談政治的改革。

那時候北方武人的武力政策也使我們感覺政治改革的一時無望。吳佩孚的一派雖然退出了內閣，但他的武力政策仍舊不斷地進行。陸榮廷派的回廣西，楊森的回攻四川，孫傳芳的援閩，廣東孫陳戰爭的延長，無一處不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實行，我們在努力四十四期上曾說：

> 以這班已失人心的人，當此無從收拾的時局，而他們全無覺悟，仍舊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武力主義，——他們的失敗是可斷言的，並且不足惜的。只可惜人民的糜爛，反動政治的延長，從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終了呵。

這十個月的政治，完全是『反動的政治』。我們在三月二十五日曾說：

> 今日支配國事的人，——酒狂之上將，財迷之候補總統，酒色狂之國會議長，——那一個不是『非從其所欲而充分為之不止』的神經病人！怪不

得我們說的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這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政論生活的解嘲。

從此以後，努力的同人漸漸地朝着一個新的方向去努力。那個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自從四十八期（四月十五日）丁文江先生發表『玄學與科學』的文章以後，不但努力走上了一個新方向，國內的思想界也就從沉悶裏振作起精神來，大家加入這個『科學與人生』的討論。這一場大戰的戰線的延長，參戰武士人數之多，戰爭的曠日持久，可算是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以後三十年中的第一場大戰。現在這場思想戰爭的破壞事業似乎已稍稍過去了。觀戰最高興的老將吳稚暉先生已在別處開始做建設事業了。我們對於這一次挑戰引起的響應，不禁發生無限的樂觀。近來有一位愛努力的朋友邵力子先生在覺悟（十二，十，十二）上發表一封致胡適之先生的信，說自從我稱病擱筆以後，努力便沒有精采了。他說：

先生試想，照這樣支撐下去，不太覺無聊嗎？

鄒力子先生太恭維我個人了。其實我們的努力裏最有價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們的政論而是我們批評梁漱溟張君勱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讀書雜志裏討論古史的文章。而這些文章的登載幾乎全在我『稱病擱筆』之後！如果新青年能靠文學革命運動而不朽；那麼，努力將來在中國的思想史上佔的地位應該靠這兩組關於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評，——這是我敢深信的。

今日反動的政治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拜金的國會議員已把曹錕捧進新華門了。反直系的活動此時還沒有推翻直系的實力。西南各省內亂多不易收拾，自顧還不暇。奉浙兩處也不能輕易發動。抵抗的實力既如此薄弱，而反直系內部組合的分子又多有一二年前全國痛恨的罪人，我們即使善忘，也終不能一心一意的贊助今日所謂『反直系』的人物。我們向來鼓吹的各省會議，近來雖然得着一支意外的生力軍——何東君的活動，——然而曹錕賄選成功之後，這個和平會議的夢想也更少實現的希望了。

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眞可謂止了壁了。我們在這個時候，決意把努力暫時停刊。但我們並不悲觀。我在努力第五十三期上曾說：

我們深信，有意識的努力是決不會白白地費掉的！

我們現在仍舊如此設想。雖然將來的新努力已決定多做思想文學上的事業，但我們深信『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努力第七期），我們的新努力和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是繼續連貫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罷了。

我借這個機會再致謝努力的許多幫忙的朋友。最可痛的是我們的好朋友，努力的經理，章洛聲先生不幸於今年夏間在家病死了。章洛聲對於努力的犧牲和貢獻，比我們一班做文字的人都更多更大。他的病死也可算是這個週報此時停辦的一個重要原因。

十二，十，十五，在上海滄洲旅館。

與一涵等四位的信

一涵慰慈孟和性仁四位同鑒：

努力事承你們努力維持，至於今日，使我得安心在山中養病，我眞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們才好！

我在烟霞洞住了三個多月，雖然很安逸，很快樂，但我眞住的不耐煩了。並不是地方不好，實在是心裏不安。一來因爲我在大學的工課無人担任；二來因爲努力久累朋友；三來因爲離家日久。所以我決計『下山』來了。（『下山』二字是浙江教育廳長張宗祥用的思凡典故！）

四日下山，五夜到上海，一覺醒來曹錕已當選作總統了。上海一班朋友，都不願意我此時回來，大家談論的結果，都勸我暫不回京。醫生也不贊成我此時出來工

作。因爲我現在肛門還有一處痔瘡每月要發二三次，每正坐二時以上，背脊便酸痛。

因此，我於七日晚上請叔永夫婦，經農，振飛們來商議一次。結果是：

(1)努力暫時停辦，將來改組爲半月刊，或月刊，專從文藝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棄政治。俟改組就緒，再行出版。出版當在我恢復健康之時；此時仍繼續讀書雜志。

(2)我此時暫不回京授課，俟一年假滿之時再說。

以上二事皆以我病體未復元爲主要理由。

停辦之事，原非我的本意。但此時談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擊人，則至多不過於全國惡罵之中，加上一罵，有何趣味？若撇開人而談問題和主張，——如全國會議，息兵，憲法之類，——則勢必引起外人的誤解，而爲盜賊上條陳也不是我們要幹的事！

履轉尋思，只有暫時停辦而另謀換一方向僇力的辦法。

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

新青年的使命在於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這個使命不幸中斷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繼續至今，六年不斷的作文學思想革命的事業，影響定然不小了。

我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

在這個大事業裏，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們還應當邀請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輩，如蔡孑民先生，吳稚暉先生，一齊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願意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我們都應該儘量歡迎他們加入。

九月廿三日，自雲棲回到烟霞洞，看見山前的梅樹都憔悴不堪了，曾有一詩如下：

樹葉都帶着秋容了，
但大多數都還在秋風裏撐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許多梅樹，
却早已憔悴的很難看了。
我們不敢笑他們早凋；
讓他們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趕在百花之先開放罷！
讓我這首小詩預祝我們的新努力的生命罷！
謝謝你們維持努力的熱誠和幸苦。

適上。十二，十，九。

這一週

十一年六月至十二年四月

（一）

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爲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我們觀察今日的時代，惡因種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決沒有使人可以充分滿意的大改革。我們應該把平

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二）

徐世昌走了，黎元洪來了。我們不要談什麼法統，也並不存什麼『喁喁望治』的心思。我們對於這個新政府，只有下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1）我們希望這個政府自認為一個『事實上（De facto）的臨時政府』，他的最大任務是用公開的態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統一。

（2）我們對於這次在北京自行集會的舊國會，只希望他自居於臨時的國會，缺額不得遞補，不得取消在廣州的議員的名額，免得增加統一的障礙。

總之，南北不統一，什麼事都不能辦：軍事不能終了，兵也不能裁，財政也不能整理，教育休想發達，實業也休想安事。南北不統一，政治決不能上軌道。

（三）

前日盧永祥有一個通電，銜稱『暫行大總統職權黎鈞鑒』，內說：

法律地位既屬懸案，即令先行就職，仍是事實上之總統，而非法律上之總統。

盧永祥的反覆，是我們都不能恭維的，但這個意思出於實力派之口，是很可注意的。以我們的推想，將來必不止浙江一省借這個『事實上之總統』爲下場之計。也許西南各省將來也會承認黎元洪爲事實上的總統，而北京政府爲事實上的臨時政府。我們希望黎元洪不要忘記他的蒸電內『暫行大總統職權』的話，我們希望他的政府老老實實的自認爲事實上的臨時政府，即以事實上的臨時政府的名義與南方協議統一的事。

（四）

本週在京的舊國會議員二百三人開談話會，議決兩條：

(1)定八月一日爲繼續開常會之日期。

(2)屆期如不足兩院人數，卽依法遞補。

遞補是我們所反對的。本京益世報於十七日著社論也反對遞補，他的立論大旨是：

吾人固嘗以恢復舊國會爲足以就統一問題演進一步，故認爲解決時局中之一種方法，……然南方以遞補方法，湊足開會人數，北方亦以遞補方法，湊足開會人數，則時局不從國會解決。舊會不過一個，今求恢復而舊會乃補足兩個。……姑不論北伐之事如何，而北洋之軍隊一日不能長驅入廣，非常國會亦一日不能不繼續開會。……吾人將見糾紛之道與解決之期乃愈趨而愈遠也。

我們覺得這話很有理。我們承認國會議員談話會的議決案不能發生效力；我們希望他們爲免除統一的障礙起見，不得遞補缺額；如八月一日不足開會人數，不妨延長下去，等到非常國會的舊議員北來時方才開正式常會。在那個時期以前，只可有談

話會，或至多也開一個非常國會，或臨時國會，而不得稱正式常會。

（五）

我們說，若不從統一南北下手，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就拿財政來說罷。以我們所知，現在中央的財政簡直是絕無辦法。大家眼巴巴地射着鹽餘，但鹽餘平均每月不過三百多萬，而手續完備的支配已超過每月四百萬了！請看下表：

『一四』國庫券基金	七十萬元。
內國公債基金	百二十萬元。
『九六』公債基金	百五十萬元。
造幣廠借欵基金	七萬元。
審計院經費	四萬元。
海軍經費	五十萬元。

以上手續完備的支配，共四百零一萬元。此外還有手續不曾完備的，如

近畿軍警費　　百萬元。

定期兌換券基金　　二十三萬元。

鹽餘項下的支配，以上共五百二十四萬元，已超過鹽餘的實數一百多萬乃至近二百萬了。現在我們替政府設想，實在想不出理財妙法來。此次財政部向各省坐提應解中央之欵，我們也可以預料他的失敗。總之，國家不曾統一，軍隊不曾裁減，中央與地方財政未畫分之先，中央財政的路子是斷絕的了。現在只有停撥各項基金，東挪西補的自殺政策。但這種自殺政策的結果必致財政格外紊亂，信用格外喪失；定期兌換券儘管發行，儘管充塞市面，但前數年中交京鈔跌價的現狀必將復現於北京，而中央政府必終不免於破產。

（六）

黎元洪的魚電，滔滔三千多字，說的只是兩三句話，並且連這兩三句話都說不清楚，竟鬧出笑話來，幾乎下不得台。這件小故事應該使黎元洪得一個教訓。饒漢

祥一派的濫調文章可以少做做了！有話何不老實說？何必繞大灣子？何必做濫調文章？何必糟蹋許多電報生與讀者？饒漢祥可以歇歇了！

（七）

我們以爲這一個月的政治之中，比較的最可滿意的是各部裁官的實行。裁官向來也有辦過的，孫洪伊的裁官政策便是一例。但向來的裁官是沒有標準的，又沒有統一的計畫的。沒有標準，故隨便裁的也可以隨便添加。沒有統一計畫，故裁了東邊，添了西邊。這一次的裁官，起先似乎也是無標準無計畫的，後來財政部裁官始用『官制』與『考試分發』兩個標準。徐世昌臨走之前的許多命令之中有一條說裁官的辦法，共有五個要點：

（1）以官制爲標準。

（2）考試分發人員不受裁撤。

（3）以後各官署長官不得任意調用添派人員。

（4）駢枝機關，斟酌裁撤。

（5）兼職人員一律不得兼支薪津。

這是從局部的裁官，變爲統一的裁官計畫了。這個計畫雖然不能充分滿意，（參看努力週報第四期第十篇M. T. W. 的裁官意見。）但我們可以先承認這個最低限度的計畫；對於新來的政府，我們應該督促他實行。

（八）

董康的財政計畫，靑松已經在努力週報第五期裏評論過了。他開的五味藥方，現在只有『財政人員宜嚴加淘汰』一條總算做到了一部分。中交兩行的合併聽說是辦不到的了。其餘的三條，只有第一條『淸理財政』現在正在籌畫之中。董氏的條陳裏明說『應請簡派熟悉財政大員，會同審計院長，特設財政淸理處』。然而已派定的大員却是傅增湘。傅增湘是熟悉宋元版本的，然而我們決不能恭維他『熟悉財政』。這一着已錯了。現在財政淸理處的組織法尙未造出，人員也未派定，我們很

希望叢康不要再錯了。他的原條陳說財政清理處的職務是：

> 自元年以來，收支款目及庫券公債票等，分別澈查；一面畫清界限，將所有債務，重加整理；歲出歲入，另立新帳，勿令糾紛。冀以正本清源，懲前毖後，為財政公開之基礎。

這裏面有兩重職務：一是清理已往積弊，一是整理今後財政。這個擔子很重大，應該有專門人才去辦理。青松主張「應該有商會教育會銀行公會以及國會的代表參與的」。我以為最重要的是這個財政清理處應該以財政專門人才為主體，但有權可以向各部署調取案卷，質問事實。此項專門人才，不當限於部署中有職人員，不妨向其他學術團體或商業機關借用人才。如果將來的財政清理處仍由一班官吏或外行好好先生去辦，我們可以斷定他必無成績的。

（九）政治與計畫

我們在我們的政治主張裏曾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我們說：

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計畫是預先認定一個目的，推想出如何可以做到那目的的歷程，然後把那推想出的歷程定爲進行的步驟。譬如下棋，須能預先算到幾着以後；譬如造屋，須先打圖樣，次計算材料工程，然後動工。這是人人知道的。然而到了幹那關係最重大的一件事，——政治——大家便多不明白計畫的重要：這豈不是墨子說的『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嗎？

當熊希齡的內閣發表他們的『大政方針』的時候，國中很有許多人嫌他空談太多，文字又太繁，所以當時很少人注意這種『大政方針』。然而這八九年來，就是那樣的一個『空談太多』的計畫，也不可得了。這八九年的政治，竟全是飄泊的政治，沒有計畫，混到那裏是那裏。財政壞了，就隨他壞下去，直壞到今天這個樣子。兵多了，將驕了，也就隨他們鬧下去，直糟到這步田地。南北分裂了，也就由

他們分裂下去，越分越遠，直分到這個時候。陸放翁有詩道：

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

譬如東周亡，豈復需大疾？

中國所以鬧到這步田地，何嘗有什麼大病？只是這樣『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飄泊到現在這個不可收拾的情形！

計畫的功效，全在分期勉日，步驟分明；只要繼續做下去，一點一滴的積起來，總有成效可觀。我們試舉一個例。自從歐戰以來，全國的鐵路工程都停頓了。假使當年交通部有個計畫，規定京漢，京奉，津浦三條鐵路每年添築支路五十里。這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十年之內便可添造一千五百里的鐵路了。再看京綏一條路，只因爲這條路有個小計畫，每年發行六百萬的公債，所以這幾年之內能延長那麼多長的路線。京綏的六百萬公債每年只有一小部分賣到市面上，大部分的債券不等到市上早已被內部的人買去了。假如國有的各鐵路都有這樣的一個小計畫，十年

之中可以添多少鐵路？

現在有許多人愛批評閻錫山，但是閻錫山確有不可及的地方。他治山西，是有計畫的。例如他決心要辦普及的義務教育，先做一個分年期的計畫。四年的師範不夠養成教員，他就設速成的國民師範；這還不夠用，他就設更速成的傳習所。他依着這個計畫做去，如期進行，現在居然做到了義務教育！江蘇浙江還辦不到的事，閻錫山在那貧陋的山西居然先做到了！人稱山西爲模範省，又稱閻錫山爲模範督軍。山西的政治教育不夠做模範的，確然不少。但山西這一點「有計畫的政治」的精神，確是可以做全國的模範的。我們看山西的成績，就可以明白我們說的「計畫是效率的源頭，一個平庸的計畫遠勝於無計畫的飄泊」。

中國吃飄泊的苦，儘夠了！我們對於無論誰來組織的政府，第一個要求就是「有計畫」！國家是一件重器，政治是一件絕大的事，沒有計畫是不行的，沒有計畫的人是不配幹政治的！我們很盼望黎元洪顏惠慶吳佩孚董康高恩洪一班人此時暫

且把索薪發餉酬勳等事交給幾個附屬官僚去應付，他們應該鄭重的想想國家的大問題，做出一個通盤籌算的計畫來，然後依着預定的計畫，分期做去。日暮途遠，暗中摸索是不中用的！你們不要糟蹋時機，時機是不等候你們的！

例如裁兵，決不是一兩個濫調電報就能了事的，也不是欽派一個裁兵委員會就能了事的。我們希望這個政府做出一個具體的，分期的計畫；先發表出來，徵求國民的意見，修正之後，然後決定；決定之後，尅期實行。

又如教育，假如政府不要教育就罷；如要教育，那是非有一個計畫不可的。現在的情形，竟是政府完全不管教育；起初還管籌經費，到現在竟連經費都無人管了。現在國立各校的經費已欠了四個月了，到暑假完時，還有三個月。七個月的經費就是一百十幾萬；加上北京中小學的經費，就更多了。現在若再沒有一個通盤籌算的計畫，就是要做到這幾年來一日挨一日的光景，也都不可能了。

又如統一，也不是打幾個電報給孫文伍廷芳就夠了的，也應該早日做一個計

畫，至少應該注重下列各點：

(1)南方政府的問題：是不是應該承認他爲事實上的一個臨時南政府？

(2)和會問題：和會是無論如何不能免的。叫他做『統一會議』也好，『南北和會』也好，『聯省會議』也好。如何組織？如何產生？有何權限？這都是不能不早日計畫的。

(3)統一的條件：統一的條件的中心必是承認聯邦式的統一國家，這是無可疑的。但聯邦式的國家全不是現在這種軍閥割據式的國家。怎樣才能使這種軍閥割據式的國家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聯邦國家呢？省與中央，制度上應該怎樣劃分呢？現在事實上應該怎樣收束呢？軍隊怎樣處置呢？財政怎樣統一呢？這都是不能不籌畫的。至於非常國會遞補的議員的安置法，非常國會通過與取消的法令的去留等等，雖是較小的問

題，但也是應該計畫到的。

總之，我們已到了日暮途遠的地步，只有剋期計功的法子還可以勉強使我們趕上幾步；若再糊糊塗塗的妄想『挨』過日子，妄想暗中摸索着一條幸運的路子，那就是『瞎貓等着死老鼠』的無意識的行為。那種政府，我們不要！

——十一年六月十二至十八日——

（十）

本週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與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於是有八年聯安福部的政策，於是有十一年聯張作霖的政策。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據

海軍，用砲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孫氏曾著書提倡『行之非艱，知之維艱』的學說，我們當時曾贊成他的『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話。（每週評論三十一號。）現在看來，孫氏的失敗還在這一個『知』字上。一方面是他不能使多數人了解他的主張，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幸採用了一種短見的速成手段。但我們平心而論，孫氏的失敗不應該使我們埋沒他的成功。蔡元培等前次勸孫氏下野的通電，雖然頗受了一部分人的批評，但蔡氏電文裏贊美孫氏的話，確能寫出孫氏的成功。蔡電說：

公等堅持不渝，以種種手段求達護法目的。……固以為苟能達此目的，無論何種手段，不妨一試。且正維公等用此種種手段，使全國同胞永永有一正式民意機關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實行恢復之機會。公等護法之功，永久不朽。……

這些話並非溢美之詞。當日陸榮廷岑春煊等取下護法的招牌，分贓而散之後，若沒

有孫陳的繼起，恐怕第三次財神國會早已實現，軍閥勢力更要橫行，政治的轉機還不知遠在何時呢？

（十一）

盧永祥在浙江自行廢督的消息傳來之後，大家以為『盧永祥倒了』。但是照現在看來，盧氏竟是宣告獨立了。二十日，他就『浙江軍務善後督辦』之職，同日發出兩道電文。第一電報告獨立的原委，中有云：

> 伏維辭名而居實，既非拙性所屑為；全私而誤公，亦豈袍與之夙志？善後限於軍務，則權限固已分明；軍務專注善後，則收束乃其主旨。

中國人真會做文章！清初有名的『殺吾君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君也』，如何比得上這種『顛之倒之，倒之顛之』的濫調文章！所以旅居上海的浙江人也只能打出一個『反對不得，贊成不能』的電報，說：

> 盧督删電廢督，保留師長，又將博得軍務善後督辦。廢督其名，不廢

其實。吾儕小民，不知用意，反對不得，贊成不能。……

但盧永祥的第二『號』電，因爲不是用濫調駢文做的，却是很明白的。此電宣布『善後綱要』七條，第一條是：

自廢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內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軍制之恢復，並變相督軍制之發生。

然而浙江人的腦筋與人格確然受了盧永祥的非法侵犯了，浙江人難道也還是用『反對不能，贊成不得』八個字輕輕放過了嗎？

（十二）

此次裁官的結果，財政部裁了三千人，交通部裁了一千多人；最近內務部要裁的人，聽說也有五百多人；加上國務院總統府的裁員，總數已在六千人左右了。我們希望其餘各部都能實行裁員，並希望他們實行廢止兼差的弊政。我們更希望，將來能於裁員之外，實行合併無用的或駢枝的部署。如陸軍部與參謀部與海軍部，這

幾年來，眞可謂三個無用的廢物了。我們主張將來可將此三部併作一個軍事部，設一個總長，兩個次長，一個次長管海軍的事，一個次長管參謀部的事，儘可以夠用了。

（十三）

此次高恩洪在交通部的整頓，我們認爲大致是合宜的。高氏做的最痛快的兩件事，一件是二十三日廢止各鐵路貨捐，一件是取消各報館的津貼。報館的津貼是十年來中國輿論界的一個大汚點，他的害處比那摧殘言論自由的法令還要大無數倍。摧殘自由的法令至多不過是把輿論當作仇敵看待，而津貼與收買竟是把報館當作娼妓豬狗了！北京一處的報館和通信社的津貼，竟至有十二萬五千元之多。這眞是駭人聽聞的事！至於各鐵路貨捐的非法與病商害民，都是大家所公認的。當此財政奇絀的時代，高氏竟能提議廢止這一筆很可觀的入欵，我們不能不說他是有毅力的了。

——六月十九至二十五日——

（十四）

伍廷芳（1842—1922）死了。他的死耗傳出之後，無論南方北方，無論孫派陳派，都對他表示一致的敬意與哀悼。我們對他的爲人，也表示相當的敬意。至於他的蓋棺定論，我們想用『福人』兩個字包括他的一生。他的福分眞不淺！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時，全靠他的古怪行爲與古怪議論，壓倒了西洋人的氣燄，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個弱國的代表受許多外人的敬重。他的見解是很淺薄的，他對於東西文化的見解尤其是很淺薄的，然而西洋人被他那『老氣橫秋』的大模樣震服了，竟有人尊他爲中國式的學者的代表人物！這種福澤已很難得了。他在外交界占的地位，使他在國內政治上的事業也格外順溜。但是順溜還是極平凡的福分，伍廷芳的大福分都在他的不順溜的時期。第一是民國六年伍氏任國務總理時始終拒絕那

解散國會的命令的副署。拒絕解散令的副署，確可以表示伍氏的人格。黎元洪與伍廷芳同時都有這樣表示人格的機會，黎氏孤負了那個機會，遂讓伍氏獨享盛名了。黎氏雖然現在做了總統，我們終不能不說他福薄。第二是伍氏的死期恰當孫文失敗的時候。他對孫氏的始終幫助，也是他的人格的表示。伍氏的年輩和名望都可以使西南政府增加重量。伍氏恰當這個時候死去，不但他自己始終不變節的人格，格外從失敗裏照耀出來，並且使人對他晚年扶助的那個雖失敗而究竟不失為正義的旗幟，格外發生一種同情的敬意。

——六月二十六至七月二日——

(十五)

七月一日，黎元洪有一道命令，說：

地方自治，原為立憲國家根本要圖。……………現在國會業已定期開議，

將來制定憲法，所有中央與各省權限，必定審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俾得至中至當之歸，允符相維相繫之義。國家統一前途，實嘉賴之。

這道命令自然是應付那『聯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聯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說『地方自治』。這個理由，也不難猜測。『地方自治』是對『中央集權』而言，究竟還含有一個『中央政府』的觀念。『聯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區域為單位的，不必一定承認一個中央政府；況且近年的『聯省自治』的運動—或喊聲—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一種表示。怪不得北京政府此時有意避免這個名目了。這道命令總算是正式承認各省分治的必要，承認中央與各省的權限應當劃分，並且怪可憐的宣言『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這種吝嗇的承認，雖然還未必能滿南方各省的意，然而平心而論，這道命令確然遠勝那今天放一個省長，明天放一個省長的胡塗命令了。我們希望北京政府此時少放幾個省長；我們希望他更少

放幾個應該受拒絕的教育廳長。

（十八）

我前年（民國八年）十二月底到山東。那時山東的氣象非常之好。省議會新通過一個議案，增加了二十多萬的教育經費，設立了幾十名的東西洋留學男女學生官費名額。那時候最可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省議會中的新分子（以王朝俊爲領袖）用很高明的政治手段，揭發督軍張樹元吞蝕軍費的實情，居然把張樹元趕走。我到山東的第三天，張樹元就跑了。省議會趕跑一個督軍，乃是十年來絕無而僅有的事；況且當日山東省議員用的方法，使的手段，都使我非常贊歎。當日我曾有『山西不如山東』的評論。我和山東分別了兩年半，今回重來，氣象大變了！教育經費不但不會加添，連舊定的額數還領不到。去年山東省議會的選舉大競賣，確是山東歷史上一段大羞恥：覆選票有漲至一千多元一票的，省議員有花至三萬元始能當選的！現在省議員中共分五派：(1)天壇派，以謝鴻燾爲首領；(2)同仁派，以杜尚爲首

領：以上兩派都是『官府派』。(3)誠社，以張介禮為首領；(4)民治俱樂部，即王朝俊一派；(5)正誼俱樂部，以王貫忱為首領：以上三派為『地方派』。地方派的三支，近來稍能結合，號稱『三角同盟』，以與官府派對抗。官府派人數稍少，遂用種種手段抵制地方派，使省議會不能選出議長。省議會改選至今已十個月，還不曾選出議長。這種情形，比起我第一次到山東時，真有不堪回首之感！但我細看山東的情形，還不至十分絕望。地方派的結合，確是一件可以樂觀的事。我們很希望山東的『好人』，大家出來，援助地方派的議員，第一步打倒軍閥與軍閥的走狗，第二步監督地方派，使他們不至流為腐敗與黑暗。

(十七)

近日我們收到一本小冊子，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這本冊子雖是匿名的，但他們的十一條原則，確有轉載的價值。那些原則如下：

(一)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

完全收回管理權。

(二)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的農民。

(三)採用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制。

(四)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

(五)定保護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廠衛生工人保險法。

(六)定限制租課率的法律。

(七)實行強迫義務教育。

(八)廢止釐金及其他額外的徵稅。

(九)改良司法制度，廢止死刑，實行廢止肉刑。

(十)徵收累進率的所得稅。

（十一）承認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有平等的權利。

他們在那個宣言裏，對於我們的政治主張，頗表示不滿意。他們說我們的主張是『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又說是『姑息的妥協僞和平論』。我們竟不知道我們現在居然成了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一種第X階級，叫做什麼小資產階級！但這是小節，我們表過不題。我們只要指出這十一條並無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絕對不相容的地方。他們和我們的區別只在步驟先後的問題：我們重在『現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事事只從『現在第一步』着手。即如我們的第五條主張『廢止複選，採用直接選舉』，而他們主張『無限制的普通選舉』。我們自然也會談無限制的普通選舉，不過我們斟酌現在的情形，不能不把這個主張留作第二步。我們對於這種宣言者的唯一答案是：『我們并不非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

（十八）

——七月三日至九日——

八月一日就要到了。國會裏的法定人數是大概可以湊足的了。我們現在對北京的政府提出一個十分鄭重十分懇切的忠告：

總統的任期問題要發生了。

副總統的問題也要發生了。

甚至於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也要發生了。

要免去這些困難的問題，只有北京政府自認爲臨時政府一個法子。

黎元洪就職的通電本說是『暫行大總統職權』。現在北京政府不可忘了這句宣言，他們應該正式自認爲一個『暫行政府職權』的臨時政府；他們的任務是支持這個過渡的時局；他們的任期是到正式政府成立時靜

候接收。

這個辦法，有三大好處：（1）總統的任期可以不生問題了：也不必算那九十二天或一年零四個月的『舞文』的賬了，老老實實的做到正式政府產出時爲止。（2）副總統也不成問題了：此時無論舉誰做副總統，都免不了紛爭；既認爲臨時政府，自無選舉副總統的必要了。（3）還有一層最緊要的，就是可以消除東南與西南各省的反對：現在中國的大危機就是一部分的實力派太樂觀了，以爲統一尅期可待，不肯細心研究獨立各省的心理；而獨立各省也不能諒解北方的樂觀心理，以爲這是自驕自大的表示；因此，統一的阻力一時正不容易消除。現在北京政府若能宣言自居於臨時政府的地位，至少可以消除大部分的猜忌與反對。

我們希望黎元洪顏惠慶的政府的政治良心能使他們了解這個忠告。

（十九）

六年解散的國會，不久又要開會了。我們對於國會議員，已有了一番很懇切的忠告（見努力第九期第三版）。現在我們對國會再提出一個最簡單的建議，請求他們的籌度與容納：

國會這一次的集會，應當用全副精力貫注在制憲一件事。他的唯一任務是從制定憲法上產出正式的政府。

要謀節省時間與避免糾紛，這一次國會應該減少行政上的干涉，至最低限度。

最重要的是國會應該承認現在黎元洪顏惠慶的政府為事實上的臨時政府，任期至憲法制成正式政府成立時為止。

這樣的做去，可以使國會議員專心制定憲法，可以不做通過內閣的買賣，可以不做副總統的買賣，可以早日促成統一的中國。我們希望國會議員的政治良心能使他們贊成這個主意。

（二十）

我們的朋友李劍農在努力第十一十二期發表了一篇民國統一問題，對於這篇文章第一段的大意（第十一期）『欲廢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統一，欲統一必先確定聯邦制』，我們是贊成的。第二段（第十二期）的大意說，『這種聯省憲法的草案，須先由聯省會議議定，提交國會，依合法的形式通過』；『由各省選出相當的代表，趕緊開聯省會議，把聯省憲法的大綱議定，交國會通過』。我們對于這一段意思，不能完全贊同。第一，在法理上這個各省代表組織的聯省會議，遠不如國會有正式制憲的權限。我們贊成有一個各省全權代表的會議來解決這幾年發生的許多事實上的問題，但不贊成他們來做制憲的事業。第二，即使我們讓一步，撇開法理的問題，——正如劍農說的『一個國家，當開國之初，關於法理上的解釋，總有些

不圓滿」，—我們也還不能忽略事實上的障礙。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這個制定聯邦憲法草案的會議，至多只能得南方幾省的贊同；而國會制憲却是沒有一省敢明白反對的：我們為什麼要撇開這個很少反對的國會制憲，而另外去尋一個起草的聯省會議呢？況且這種聯省會議的代表，無論如何產生，在現在的形勢之下，總難免各省武人的操縱。劍農怕國會議員『稟承北洋正統的思想去制憲』，難道他不怕聯省會議的代表稟承『割據諸侯』的意旨去起草嗎？據我們看來，北洋正統的思想，只稍有南派的議員多數出席，再加上輿論的監督，便可以打破了。倒還是那督軍代表的聯省會議，很容易陷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狀況，不容易對付。況且現在各省的治安情形，很不一致，南北都有內亂很激烈的省分，也都有兵匪遍地的省分。劍農所主張的聯省制憲會議，在一年半年之內，恐怕不容易產生，所以我們主張直捷了當的責成國會從速制定省自治的制度，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作為各省後來制定省憲的概括標準。如果國會放棄他的責任，不能於短時期內制定憲法，那時我

們再採取別種革命的舉動，也不爲過。

（二）

近來最可以注意的是舊道德的死尸的復活。舊道德不適宜於新環境，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有時候舊道德偏要在新環境裏弄他的舊威風，很像一個紅頂花翎黃馬褂的官兒，忽然在北京飯店的屋頂花園裏呼么喝六，豈不是過渡時代的一個怪現象嗎？就拿『丁憂』的事做個例罷。兩千年來做官的人死了父母，便不能不開缺奔喪。只有極少數的大胆的奸雄，如明朝的張居正，不願意這樣做；然而他們也不能不假借『奪情』的名目；到了後來，還不能免後世腐儒的批評。然而做商人的却不因爲死了父母就三年不做生意，做蒙館教師的也不因爲死了父母就三年不敎書：可見職業主義所到的地方，封建時代的貴族的舊道德，久已站不住了。近來的官場對於父母的喪，也只有請假治喪，而不必開缺終制。然而舊道德的鬼，却也時時出現，卽如此次齊燮元的父親的死，居然有一班很開通的人打電報請他開缺守制，

並且打電要求北京政府准他開缺守制。我們并不反對齊燮元開缺，也不反對江蘇人要趕走他，但我們反對江蘇人抬出舊道德的死尸來做廢督的武器。這是一個例。我們再舉一個例。陳炯明一派這一次推翻孫文在廣東的勢力，這本是一種革命；然而有許多孫派的人，極力攻擊陳炯明，說他『悖主』說他『叛逆』，說他『犯上』。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裏，什麼叫做悖主？什麼叫做犯上？至於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爲是革命？怎樣的行爲是叛逆？蔡鍔推倒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祺瑞與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樣的論理，陳炯明該永遠做孫文的忠臣，吳佩孚也應該永遠做曹錕的忠臣了。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爲，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舊道德的死尸來做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附啟】這一條的後半最受南方許多朋友的攻擊；但我現在也不刪他，只願讀者了解這一條的主題是『舊道德的死尸的復活』，而不是替什麼人辯護。

適，十三，四，十五。

（二三）

這一週中國的大事，並不是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內閣的總辭職，也不是四川的大戰，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開幕。中國學科學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可算得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獻。自從地質調查所成立以來，丁文江翁文灝和其他的幾位地質學者，用科學的精神，作互助的研究，經過種種的困難，始終不間斷，所以能有現在的成績。他們的成績共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全國地質的調查。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業，一時不容易成功。他們現在已經測量的，只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幾省。第二是供給鑛產的知識。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成績最大，我們看中國鑛業家這幾年捐給地質調查所博物圖書館的錢的數目，就

可以知道中國鑛業所受的利益了。第三是科學的研究。地質調查所裏的地質學者，近年很出了些有價值的科學著作。本國學者除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各位之外，還有外國學者葛拉普（Grabau）安特森（Andersson）在所裏做專門研究。我們現在雖不能說這一班中國地質學者在世界的地質研究上有什麼創作的貢獻，我們至少可以說，他們整理中國的地質學知識，已經能使『中國地質學』成一門科學：單這一點，已經很可以使中國學別種科學的人十分慚愧了。——這一次開幕的博物館裏有三千二百五十種鑛物標本，圖書館裏有八千八百多種地質學書報，在數量的方面，已很可觀了。最可注意的是博物館裏的科學的排列法。中國人自辦的博物館最缺乏的是沒有科學的排列法，此次山東省花了五千元辦的山東歷史博物館，只可算是一個破爛的古董『堆』，還不如琉璃廠的一個大古董攤！三殿裏的古物陳列所，也只可算得一個亂七八糟的古董攤，全無科學的價值。讀者如要知道什麼叫作科學排列的博物館，不可不去參觀豐盛胡同的地質調查所。

——七月十七至二十三日——

(三二)

我們回想到民國元年至五年的無數『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就預料今年舊國會開會的前後總應該有許多國憲草案出現。不料到今天我們只看見八團體國是會議的一個國憲草案（見努力週報第十三期附張），此外竟不曾有同樣的嘗試。這不完全是因為國內的憲法學者的制憲熱心都冷下去了。我們猜想起來，這個現象有兩種原因：第一，舊國會的復活是兩個月前忽然出現的事；時間太短，一斑憲法學者還來不及把高閣上灰堆裏的憲法書取下來呢。第二，五年六年的天壇憲法，除了『地方制度』一章之外，都已通過了二讀會了。有許多人的心裏以為那通過了二讀會的部分是不能更動了的，——至多只可有文字上的修正，——所以他們只注意在那付審議的『地方制度』一章。這是大家不肯熱心去擬憲法草案的最大原因。

但是我們現在要問：究竟這一次國會制憲，能不能推翻或修改天壇憲法中已通過二讀會的條文呢？那主張不更動二讀通過的條文的，大意是希望憲法早早產生，故不願意推翻那已通過的條文；因為如果今回否認前回二讀會的效力，如果今回制憲又要從頭逐條討論起，那就要曠廢許多時日了。況且，這些人又覺得，當年與現在最重要的爭點都在省制一章，現在這一章既然可以根本修改，又何必爭那些比較不很重要又沒有什麼大毛病的其餘條文呢？這是主張不更動二讀條文的理由。我們仔細想來，也有一個主張。我們主張：

(1)為促成憲法計，凡上回通過二讀會的條文，如無十分不適用之處，概不再更動。

(2)但也不必嚴格的尊重二讀會的效力；凡已通過二讀會而現在認為不能不修正的，不妨提出修正，或根本推翻。

我們的理由有兩層。第一，二讀會通過後不能修改的話，並無明文的規定。二年九

月公布的議院法第二十七條只說，『關於法律財政及重大議案，非經三讀會，不得議決。』議院法中並不曾規定凡通過二讀會的議案不得更動。第二，况且民國六年到現在已隔五年多了，時勢的需要變了，國民的思想也變了；當日斤斤爭執的（如孔教問題），現在已不成問題了；當日雙方辯論最烈的（如集權與分權問題），現在已成了一方面的優勝了；當日不成問題的（如勞動組合問題），現在已成爲問題了：因此，我們今日決不能嚴格尊重五年前的二讀會的議案，——即使議院法有這種限制，我們還應該先修正議院法；何况本來沒有明文的規定呢？

我們覺得，八團體國是會議的國憲草案雖然顯出匆忙草成的痕跡，却有許多很有價值的主張，有許多地方遠勝於天壇憲法。第一，是聯省政府與各省的權限的劃分。這個草案對於聯省政府與各省的權限，都採取『列舉』主義：聯省政府的權限列舉了二十七項，各省的權限列舉了十三項（第二章）。財政方面，聯省政府的收入也都列舉出來（第八章，七四條）。第六十七條說，『凡關於聯省行政，聯省政

府得自設機關執行之。其不自設機關者，由聯省政府委託各省代執行之。』這個草案中劃分的權限是否都合宜？聯省政府的權限與各省的權限是否都應該列舉？不曾列舉的事權應該由什麼機關規定分派？這些問題我們且不討論。單論這種下手方法，確已遠勝於那天壇憲法的地方制草案了。第二，國民的生計方面的立法，這草案的第十章（第百零一條至百零七條）專論國民生計，大旨有五個要點：(1)原則上承認『全國之生計組織，應本於公道之原則，使各人得維持相當之生存』。(2)規定勞動應有法律的保護。(3)承認勞動結社的自由。(4)得稅財產，以供公用。(5)私人營業，國家認為『適於公有，並公有後可以增進公共利益者』，得收為國有，省有，或地方公有。這幾點都是很平允的主張，我們很希望將來這些意思都能成為憲法的一部分。

此外，這個國憲草案還有幾點特別的地方。(1)他規定『現役軍人，非解除兵柄三年後者，不得當選為大總統』。(2)他大胆的主張『暫以參議院行使立法

權』，『依戶口冊編成，國民之財產及識字資格得有詳細報告，再行規定衆議院之組織法及選舉法』。(3)他又大胆的主張議員的撤回：『原選機關對於所選參議院議員，認爲不合時，得以原選舉者過半數之同意，撤回之』。(4)他反對現行的總統選舉法，主張用參議院爲初選機關；而用各省省議會議員，和各省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合選與省議會相等的人數，爲覆選選舉會，於初選當選的六人之中，選出一人爲大總統。以上這幾項都是很有研究討論的價值的，故我們替他指出來。

——這個國憲草案有一部分是沿襲天壇憲法，有時也不免把天壇憲法有毛病的地方沿襲下來。例如第六十五條全是沿用天壇憲法的第九十二條。這一條天壇草案原稿是：

>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如否認時，得於公布期內聲明理由，請求國會覆議。如兩院各有列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

後來二讀會修正末句爲『如兩院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這就是否認大總統有『否決權』(Veto)，似乎不如原草案的妥當。現在國是會議的草案也不主張覆議的同意票數應該多於原議的票數，似乎與二讀會修正案有同樣的錯誤。

現在八月一日國會的開會似乎還不能足法定人數；即使能開常會，也決不能在短時期內開憲法會議。但是國憲是我們都應該注意的事；我們應該早日研究這個問題，或擬草案，或談法理，作爲將來制憲的預備。因此，我們因上海這個草案的觸動，也就高談起憲法來了。

(二四)

新任教育次長湯爾和前天在閣議席上因爭教育經費沒有結果，遂決然辭職。他眞做了一個『五日次長』。有些人怪他未免太性急了。但我們覺得湯氏的行爲是不錯的。他爲了一個主張而來，爲了主張的失敗而去：這是很正當行爲。我們對他表示同情的敬意。

——七月二十四至三十日——

（二五）

這一週最可喜的消息是國會開會後有多數議員提議「暫緩行使其他職權」，先行制憲。這樣的議案有兩個：一個提議「在憲法會議法定人數未足以前，先開憲法審議會，將六年二讀會未決各條，先行審議決定，以為報告大會之準備」。一個提議「兩院先行制定憲法；在憲法未制定以前，暫緩行使其他職權。」這兩個議案有一個共同的理由。前一案說：

蓋政治良否，其職責不在一方；而憲法不成，則國會獨任其咎。

後一案說：

民國成立十一年無憲法。前此責任，或可諉為外力干涉。……此次開會，若不專力制憲，或因政爭阻礙制憲進行，則國會咎無旁貸。

這種宣言，可算得是一部分議員的覺悟。我們盼望他們堅持到底，並且祝他們勝利。

但是，據北京星報（七月三十）的報告，尚有一部分的議員主張先解決現政府的地位，解決現總統是否合法，若合法，他的任期應如何計算；若不合法，國會是否承認現政府為臨時政府而另舉大總統。這種傳說，如果是確的，可見國會裏現在有兩個大派：一是制憲派，一是完全職權派。這種主張上的區分，雖然遠勝過鬧意氣的黨爭，但我們總希望這班國會議員不要作繭自縛：這種糾紛的問題真是同亂絲一樣，越理越亂，只有「以不了了之」的一個法子。如果他們這時候還不覺悟，還想做買賣，還想趁火打刼，——他們錯過這機會還不足恤，我們國民是永不會饒恕他們的。

（一一八）

上海傳來法統維持會的宣言頗使我們失望。他們明明說着：

國會者，四萬萬人之所有，非數百議員之所有；中華民國者，四萬萬人之國家，非數百議員之國家。法統之存亡，國會之眞僞，其爲利害禍福，惟我全體人民實身受之。

他們既承認全國人民爲最後的審判機關，就應該知道全國大多數人民所最關切的並不是什麼法統的存亡，乃是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如果議員先生們肯發大慈悲，不談什麼法統與名器，早早的賜我們一個憲法，我們可以斷定大多數的人民決不會起來『嚴拒非義，誓與奮鬥』。我們可以斗胆的摹倣法統維持會宣言的口氣，說：

法統者，百十個議員之招牌也，而非四萬萬人之問題也。法統二字，本不成意義，與舊史學的正統，理學道學的道統，同一無意識。上海的議員先生們如果心裏看得起『全體人民的利害禍福』，就應該根據於『約法制憲法之大權隸屬於第一屆正式之國會』的原則，惠然肯來制憲。如果他們還怕『認賊

法為合法，使僉壬長竊政權』，他們儘可以對北京的議員明定北來的條件，照廣州的前例，承認一個或兩個臨時政府，暫時維持秩序，至憲法成立時為止。那麼，憲法早成一日。『僉壬竊政權』的期間就縮短一天。不然，他們逗留上海，借一個假招牌來阻礙憲法的成立，他們的罪名也就難逃了。（八，三，天津。）

（一七）

黎元洪派到上海去的代表黎澍近有電給北京政府，請早日開一個各省代表會議，解決事實問題。他的電文說的很透切：

……是法律一層，已屬不成問題。所餘者，事實耳。西南六省，獨立者有年，稱政府者有年，一旦欲歸於妥協，當必有途徑以由之。政府不避艱辛，以誠意相召。……誠意從何而表示，必有方法以徵之，導其途徑，釋其方法，除公開會議外，實無良策。捨此而圖，鮮克成功。譬如鬩牆兄弟，久已參商，驟欲合居共爨，亦必杯酒聯歡，懇勤款接，始得

言歸于好。公開會議即此意也。……

這話確是今日政府應該採納的良言。政治上的交涉，是要『交涉』的，不是一方面的。有時候須要麼罕麥德去朝山，有時候須要山去朝麼罕麥德。北方政府這兩個月來，始終不肯召集各省代表的公開會議，我們眞想不出什麼道理來。難道是『夜郎自大』，不肯損失『中央政府』的體面嗎？若說是旣有國會，不應再有各省會議，怕國會要吃醋，那麼，國會從憲法上解決中央與各省的關係，各省會議解決這幾年來的事實問題，兩邊各不相妨，有什麼醋可吃呢？我們希望黎元洪注意黎澍電文中的結語：

機會之來，須臾即逝。與其爲各個之疏通，紛呶易啓，何若作簡單之談判，意見悉泯！

我們自從五月十四日以來所以力主早開南北和會，也是這個道理。（八，三，天津。）

——七月三十一至八月六日——

（一八）吳佩孚與聯省自治

吳佩孚的東電，期望國會議員做中國的『哈米頓，佛蘭克林』，並且給這班哈米頓佛蘭克林上了三個條陳。第一條說『職權固期能完全行使，然殫力宜以制憲爲準』。第三條主張『强迫敎育，保護勞動』。這兩條都可以得一般人的同情。但是那占全文大半篇幅的第二條就很有討論的餘地了。這一條討論分權與集權的得失，主張『須以單一之形式，貫澈分權之精神』。他對於『聯省自治』的話，仍是反對的；他雖不明指聯省自治，但電文中說的『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環視之國家供冥想之試驗』，明明是指聯省自治的主張。吳氏的軍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張，我們可不能不認爲幼稚。『聯省自治』這個名詞雖然不免有語病，但他的內容實在不過是一種聯邦或聯省的國家；無論聯邦與聯省，並不妨語

國家的統一，約法或憲法上儘可以仍舊說『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因爲統一民主國儘可以包含聯邦式的統一民主國。假使我們能做到像美國那樣的聯邦式的統一，難道我們還不能滿足嗎？然而吳氏却要拾出『破壞國家，違背約法』的大罪名來責備人，我們眞不懂了。我們平心而論，『聯省式的統一國家』，是現在唯一的統一；只有這種統一是可能的；吳氏說的『集權於國，分權於民』的統一，只是紙上的名詞，事實上是沒有那麼回事的。

試問怎樣才叫做『集權於國，分權於民』？依吳氏的具體辦法，省長必由中央任命，難道就可算是『集權於國』了嗎？那麼，又怎樣『分權于民』呢？吳氏一面說『宜民自治』，『分權于民』，一面又怕『省長而入選，非軍閥則買氓；縣長而入選，非鄉愿則地痞』。他又說，『政治甫入軌範之日，民選之利尚在無何有之鄉，而其爲害已不可勝紀』。如此看來，『分權于民』四個字也只好留在無何有之鄉了！

我們要明白承認：民治主義是一種信仰。信仰的是什麼呢？第一，信仰國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時，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善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給他一票，他今天也許拿去做買賣，但將來總有不肯賣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給他一票，他現在雖沒有賣票的機會，將來也沒有不賣票的本事了。

若因爲『組織未備，鍛鍊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爲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鍊』民治的唯一法子！若依吳佩孚的兢兢懷疑，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組織未備，鍛鍊未成，究其終極，總統而入選，非軍閥卽奸雄；議員而入選，非政棍卽財主！』我們何不也改總統爲世襲皇帝，改議員爲任命的呢？

我們要勸告吳氏：現在的爭點並不是那紙上的『集權於國，分權於民』，乃是『那幾部分的權限應該歸中央，那幾部分的權限應該歸各省』。當年的費府會

議，哈米標和佛蘭克林們做的事業，也只不過解決了這一個問題。現在吳氏既然期望國會議員做中國的哈米頓和佛蘭克林，正應該期望他們早早解決這個問題，明定中央與各省的權限，使將來的中央政府確爲各省公認爲不可少的總機關，使將來的各省確爲一個統一國家的自治省分而不致侵犯中央的權限，不致居服從中央之名而實行割據的分裂！

至於省長的問題，憲法裏儘可不必規定。將來『省之官制』是應該由各省自定的。如果某一省情願請中央任命省長，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吳佩孚廢民選省長的理由，是絕對不能成立的。

（二九）

黎元洪忽然向國會『補完民國六年七月正式辭職手續』！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那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然而這確是一條妙計。假如國會准他辭職，那就是國會承認了他的法律上的位置了。假如國會不准他辭職，他更是合

法的總統了。假如國會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國會自身不肯解決這個問題，他仍舊可做他的總統了。政府算定國會此時不能受理這事，故同時又通電全國，明明說着：

> 維持約法，踐履誓言，不得不補行辭職。……第時局阽危，南北尚未統一，本大總統膺國民付託之重，在職一日，即當盡一日之責。未經國會解决之前，決不稍圖推卸，貽誤國事。

現在國會果然把咨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決不稍圖推卸』了。這豈不是一條妙計嗎？——然而過去的事實還是事實，過去的歲月還是歲月，決不是一紙公文就能彌補了的。其實黎元洪若能老老實實的認清自己的職務是在非常時代被擁戴出來維持現狀的一個臨時總統，這一層還可以得國人的諒解，還可以得歷史上的諒解。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二十）

現在事實上是王寵惠出來組織內閣了。當顏惠慶組閣的時代，我們最不滿意的是，顏惠慶在外國多年，總算是負點虛名的人了，然而他的內閣毫無政策，毫無計畫。無主張的上台，無主張的下台，是政治家可恥的行爲！現在王氏又上台了。王氏是『我們的政治主張』的一個簽名者；那篇政治主張提出三個基本的要求：(1)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2)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3)要求一個有計畫的政府。我們現在對他先提出第三個要求，我們希望他先定一個大政方針，然後上台；我們希望他抱一個計畫而來，爲這個計畫的失敗而去。無計畫的上台，無計畫的下台，是我們決不希望於王氏的！

——八月七至十三日——

(三一)

本報這一期(努力第十六期)登出『滌襟』的一篇『述孫陳之爭』的長文。『頃

濼樸」是沒有黨派成見的人，此次自廣州避亂來上海，做了這篇文章，說明孫陳分家的歷史。他自己也有時加上一點評判。我們覺得他的態度很平允，所以在這一期裏把他全行登出，供討論粵事的人的參考。至於我們對於孫陳之爭，因為不容易得確實消息，所以不曾發表什麼偏袒的意見；然而第十二期上攻擊「舊道德的死尸」的一段短評，已惹起了民國日報一個月的攻擊了。我們研究他們的駁論，參考「濼樸」的文章，覺得我們的主張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們不曾完全了解孫派用秘密結社來辦政黨的歷史。同盟會是一種秘密結社，國民黨是一種公開的政黨，中華革命黨和新國民黨都是政黨而帶着祕密結社的辦法的。在一個公開的政黨裏，黨員為政見上的結合，合則留，不合則散，本是常事；在變態的社會裏，政治不曾上軌道，政見上的衝突也許釀成武裝的革命，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孫陳的衝突卻不如此簡單。孫文鑒於國民黨的失敗，仍舊想恢復秘密結社的法子來組政黨。因為陳炯明是新國民黨的黨員，不曾脫黨，而攻擊黨魁，故用秘密結社的道德標準看起來，陳炯

明自然是叛黨的罪人了。陳氏至今不敢發一個負責任的宣言，大概也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們旁觀的人只看見一個實力派與一個實力派決裂了，故認作一種革命的行動，而在孫氏一派人的眼裏，只見得一個宣過誓的黨員攻擊他應該服從的黨魁，故抬出『叛逆』『叛賊』等等舊名詞來打他。這是我們現在的觀察。但我們再進一步，提出一個疑問：秘密結社的儀式究竟是否適宜於大規模的政黨？秘密社用來維繫黨員的法子在現代的社會裏是否可以持久？這一個『制度』的問題似乎也有討論的價值罷。

——八月十四至二十日——

（三二）　怎麼可以推翻二讀會的憲法案？

在本報第十三期裏，我們曾主張（1）爲促成憲法計，凡已通過二讀會的條文，如無十分不適用之處，概不再更動；（2）但也不必嚴格的尊重二讀會的效力；凡已

通過二讀會而現在認為不能不修正的，不妨提出修正，或根本推翻。當時我們曾指出二年九月公布的議院法裏並不曾規定二讀會通過的條文不許修改。但那是我們的疏忽。議院法雖無這項規定，但衆議院規則第七十九條說：

第三讀會，除文字外，不得為修正之動議。但發現議案中有互相抵觸或與現行法律抵觸者，不在此限。

又憲法會議規則第十六條說：

第三讀會，除修正文字外，應將全案議決之。

這樣看來，二讀會的規定，果然可以阻礙憲法草案的通盤修正了。甚至於連那二讀會通過的『地方制度』四字的標題也不能改為『省制』。

但是國會議員中也有很多人覺得二讀會通過的憲法案確有不能滿人意的地方，可是他們只想出兩條可走的路：

(1)凡二讀案裏沒有的，不妨補加進去，如勞工保護法等。

(2)且將這個憲法補綻完後，從速通過公佈。等到新國會成立時，再依法組織憲法會議，痛快的修改他。

但是第二個辦法太笨重了；憲法公佈之後固可以修正，但也不應該改的太輕易了。第一個辦法—補綻—也是很困難的；不得更動原物，而又要補綻，那是很難下手的。

本期登出衞挺生君討論這個問題的一篇文章。他提出完成憲法手續的兩個辦法：

第一，現在把二讀會通過的原案提出請求「覆議」。

第二，或將二讀會通過的原案，不加修正，交付三讀會否決其全體，然後重行起草，用原案作為底稿。

這兩個辦法，都是很有理而且很可實行的手續。那第二種辦法，由三讀會否決二讀會的全案，雖是很重大的手續，却是很容易明白的；憲法會議規則第十六條即

可引為根據，不用我們再加說明了。只有那『復議』（Reconsider）的辦法，議院法，衆議院規則及憲法會議規則都沒有規定。但這確是歐美議會的一條通則。孫文的會議通則第十章，專論『表決之復議』，卽是此法。衛君已引了一些國外專家學者的話，我們為幫他解釋起見，不妨再引孫君的書－此書為漢文中最完備的會議規則－如下：

第七十七節：『復議之動議，卽推反表決而復行開議也。其作用則所以救正草率之表決，及不當之行為也』。

第七十八節：『此動議若得勝，則其效力有打消表決而使議案復回於未表決前之狀況，以得從事於種種之討論，然後再行表決也』。

第八十節：『復議動議，祗有得勝方面之人乃可提出。……倘表決果有不當，則失敗方面之人自不難托得勝方面之人提出復議也』。

第八十六節：『復議之動議，始自美國，其用處乃以應非常之事；如

他法之能力已窮而仍不能達目的者，然後始用之，方可謂為適當』。

我們覺得這個辦法最為妥善，我們希望輿論界鼓吹這個主張，並希望國會議員考慮採納衛君的建議。

——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

（三三）

現在的北京政府，真成了無政府的局面了。國務總理病在醫院，財政總長躲在天津，交通總長逃而復返，至今請假，教育部完全無人負責，國立八校校長已四次辭職了，京師的四個司法機關也因欠薪五個月而罷工了。報紙上只看見一批一批的將軍與勳位的發表，只看見甲內閣乙內閣的揣測，只看見大孫小孫來不來的猜謎。然而東三省扣留車輛，已近一千輛了；張作霖已通告北戴河的外人一律退出了；直奉的戰爭似乎又不可免了。再向南望去：河南的匪亂，湖北的政爭，江西的糜爛，

四川的戰事，廣西的糜爛，廣東的紛擾，都是不容易收束的絕大難題，——然而當局的人，仍舊只顧爭他們的意氣，只顧建立他們的勢力，只顧罵來罵去，只顧應付與敷衍。總而言之，今日中國已無政府！漂泊的政府，算不得政府！挨延度日的政府，算不得政府！

然而今日大權在握的人，還在那裏做他們的迷夢！一方面想拉孫文來倒黎元洪，一方面又想聯張作霖來抵制吳佩孚。這種鉤心鬥角的計策，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必定失敗的。孫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他同黨同事的陳炯明相安，如何能在北方的『三大』『四大』之下做小媳婦？至於張作霖，即使他能出關擁護黎元洪，即使他能大得勝利，至多也不過能逼迫吳佩孚早日與南方聯合，成一個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國的糾紛仍舊是解不開的。

孫文最近的態度，據東方通信社的消息，是很明顯的。他承認北方武人和他接近，但他自己並無北上的意思，也不曾派遣代表。他又說，他對於北方武人，只認

政見上的共同，不問是誰，只須確有誠意，都可聯絡共事。至於他的政見，我們從他的言論裏可以抽出的是：（1）護法的旗子可以捲起來了；（2）國會須是八年的國會；（3）反對『聯省自治』的主張；（4）收軍權於中央，發展縣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據之局。第一項自然沒有問題；第二項大概也可以沒有大問題。第三第四是和吳佩孚很接近的主張了。我們贊成收軍權於中央，也贊成縣自治的發展，但我們總不懂孫吳二氏怎樣能抹殺『省』的一級。我們至今不解國中研究政治事實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決『省』的問題而能收軍權於國，何以能希望不先許省自治而能使縣自治！試問國憲制定頒布之後，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權奉給中央了嗎？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廣東，就可以自行取消他們的自治制度了嗎？那些正在經營自治的各省，如雲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時放棄自治了嗎？假如不能，中央是否還要實行『武力統一』的政策？假如實行『武力統一』，國民能容許嗎？『孫吳』的兵法能自信得最後的勝利嗎？

我們對于孫吳二氏的忠告是：

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

只有『省自治』可以執行『分權於民』和『發展縣自治』的政策。

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

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現今的時局。

只有公開的會議可以代替那終久必失敗的武力統一。

我們因為孫吳二氏都還是為主義而不為私利私圖的人，所以對他們發這個誠懇的忠告。

對於孫氏，我們還有一個忠告：他對於陳炯明的復仇念頭，未免太小器了。孫氏是愛國愛廣東的人，不應該為了舊怨而再鬧廣東的糜爛。此次廣州之變，曲直不全歸於一方，而是非應俟之公論。此後孫氏只應該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廣東的善後，監督陳炯明的設施，許他整頓廣東，以為自贖的條件，那才是大政治家的行為。若

悻悻怒罵，不惜犧牲一省的人民以圖報復，那就不是我們期望於他的了。

——八月二十八至九月三日——

（三四）

直系軍人發出許多通電來反對『聯省會議』。吳佩孚說：

立法之權，屬諸國會。各方如有所見，不妨向國會陳議，用備研究。豈可另尋途徑，僭越職權？

孫傳芳說：

一俟憲法告成，則主權所着，何者應界與中央，何者應界與地方，必然迎刃而解，又何必再開聯省會議？

是呵！說的有理呵！然而七日政府却又下命令召集一個財政會議了。財政會議的發起人自己說：

目前應召集各省財政人員來京籌商辦法，將各省稅欵，何者應歸地方，何者應解中央，劃淸權限，內外相維。……

假如有人引孫傳芳的話來駁張英華，可不是針鋒相對嗎？可憐的人，知二五而不知一十！

——十一年九月三至十日——

（三五）

我們從前對於王寵惠的內閣，曾有一個要求：要求他們不要沒有計畫的上台，沒有計畫的下台。現在『王代閣』已總辭職了。沒有計畫的上台和沒有計畫的下台，都實現了。『代閣』時代的困難，我們也知道：同牀異夢的閣員，索薪的包圍，名義上——『代閣』——的不分明：這都是實在情形。但現在正式的『王內閣』似乎又要出現了：閣員的色彩雖然不能做到『淸一色』，漸漸趨向『湊一色』了；

『依法懲辦』的命令似乎可以減少索薪團的包圍了。這個時候出來組閣的人，總應該有個計畫了。我們對於這個第二次的王內閣，仍舊是一個忠告：沒有計畫而來，沒有計畫而去，是可恥的事。

（三六）

王寵惠雖不曾宣布什麼政策，然而北方的軍人已替他發表一個大政策了。直系的軍人反對唐紹儀內閣的許多通電，大意都是說，唐紹儀是主張聯省自治的，所以不配組閣；最配組閣的只有王寵惠。那樣看來，北方軍人早已公認『反對聯省自治』爲王寵惠的一種大政方針了。我們盼望王氏對於這一點有一種明白的表示。

（三七）

我們請讀者注意本期登出的一篇對於目前時局的計畫。他提出關於政治的兩條辦法，關於財政的四條，我們大致都贊成。我們覺得他這個計畫裏最大胆的是主張由政府公開的調解直奉的私鬨，消除那逼人的戰禍。我們承認這個意見很有供大家

注意的價值。我們眼睜睜地看着兩大系的軍閥天天練兵籌餉，準備作戰，像兩個不共戴天的敵國一樣，然而政府毫不敢過問，總想等到一系打敗了再來下令捉死老鼠！不但政府如此，國民也不敢過問，也想等到一系打倒之後再來說漂亮話，嘴裏心裏安慰着自己道：「讓軍閥自家打自家，倒了一個少一個」！這是我們的大羞恥！我們盼望國中輿論注意這個逼人的問題：奉直的問題不解決，我們別想談財政，也別想談外蒙古，也別想談教育，更別想談裁兵和統一。

（三八）

教育部召集的學制會議，日內就要開會了，我們對於這個會議，有兩個希望。

第一，我們希望到會的教育專家不要太注重學制的改革。學制從硬性的變成有彈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內容而不在學制的系統。這一次學制會議，依我們懸猜起來，至多不過能做到正式承認或修正後承認去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新學制原案。至於那更重要的「新學制課程」，決不是六七天的大會能議決

的。我們希望學制會議能組織一個長期的新學制課程草案委員會，委託他們從容研究這個問題。第二，我們對於新學制的中學部分，認爲最重要的部分。我們希望學制會議對於這一部分中的高級中學要特別愼重。現在辦不好四年中學的人，也決辦不好六年的中學。我們主張，現在只可指定少數已有成績的中學，准他們辦高級中學。高級中學須有特別預算，須規定教員的資格。除了幾個教育發達的省分之外，每省此時只可有一個高級中學。以後不妨分期逐漸增加，但此時不可不抱定『寧闕毋濫』的宗旨。這是我們對於學制會議的希望。

——九月十一至十七日——

（三九）

我們對於王內閣，曾提出一個解決目前時局的計畫。現在我們對於這一次出來任教育總長的湯爾和，也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本年八月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年

會曾有一個議案，原文是：「請教育部把一切公文改成國語，並且加上標點符號，給全國做個榜樣」。這個議案，我們希望湯氏早日批准實行。標點符號案是教育部頒布的，小學改用國語案也是教育部頒布的。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標點符號，既然正式提倡國語，豈可至今還不肯用國語和標點來做公文嗎？況且公文法令的第一要件是要明白無疑。凡是可以使公文格外明白無疑的，都應該採用。所以向來詔令告示口供往往用白話體，並且用句讀。這並非創例，不過是推廣向來的一個老法子，使他更精密，更普遍罷了。還有一層，中國的公文裏，保存着無數古代階級政治的遺形物，最不合今日民主共和國的精神。若一律改用白話，不但虛僞的文句可以掃除，階級觀念的根株也就可以一齊拔倒了。所以我們主張中華民國的法律公文應該一律改用白話，一律分段，一律加上新式標點符號；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國語與標點符號，這個改革應該從教育部做起。我們盼望湯爾和這一次出來就職，至少可以做到這一件需要的改革。

(四十)

近來中國新聞界捏造新聞的手段，似乎更巧妙了！前不多時，我們在北京中華新報上首先讀到漢陽兵工廠被工人炸毀大部分，損失六百餘萬元的重大消息；然當日並無他報記載此事，我們還不敢深信；過了兩天，北京各報差不多全有此事了。『三人成市虎』，這事竟很像真的了。然而此事竟是假的。最近的新聞製造家似乎也知道單製造『風聞』的新聞是不足以取信於社會的了，於是他們改換方法，竟來製造『文件』！前兩週，各報上登出曹錕吳佩孚給孫文的第二電，說『先生反對聯省自治，錕等極表同情。……』這一電，當時我們都信以為真，現在洛陽方面却正式否認此電了。前日（二十二日）黃報登出王寵惠給陳炯明的一個長電報，說什麼『非統一不足以裁兵，非裁兵不足以理財，非理財不足以救亡……』後來我們面問王氏，始知這個電報全是捏造的。研究歷史的人，往往輕視無證據的記載，但他們對『文件的證據』（Documentary evidence），却終不敢隨便忽略。現在中國的新

鬧製造廠竟老實製造『文件的證據』：這個風氣一開，報紙的信用全失，今日不能取信於讀者，將來也全無歷史參考的價值了！

——九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四一)

我們在第十二期裏曾提出一個假定的目前計畫，內分政治和財政兩分部。政治項下只有兩條：一是由中央從速召集各省會議，一是由中央提出公開的條件，消除奉直的私鬥。關於第二條，我們在前週的短評裏已指出他的重要了。最近聽說孫文的代表張繼到京後也說孫氏主張奉直私鬬應該調解，又聽說黎元洪也有這種主張，這都是很好的消息。但我們要補充一句。我們說的『消除奉直戰禍』，並不是姑息的調和；我們要求奉直雙方裁減軍備，雙方就地裁兵，雙方實行取消『聯督割據』：這才是眞正的消弭北方戰禍。但這是一種『與虎謀皮』的事，非有全國輿論協力作

先聲，協力作後盾，這事是不容易收效的。我們很盼望全國的輿論界少費精神去替王寵惠們製造俏皮的綽號，「什麼『學究內閣』『反串內閣』」而回轉頭來，向這個逼人的問題上作點有力的鼓吹！

同時我們還要盼望全國的輿論界一致督促中央早日召集一個各省會議。當直奉戰爭還不曾完全終了時，我們在五月十四日的報上便提議一個公開的南北和會，由和會議決召集舊國會，作為統一的一個條件。當時這個提議若實行了，現在國會裏決沒有什麼『民八』『民六』的紛爭，也不致到今日還是這樣四分五裂的中國了！但當日戰勝的實力派自作聰明，以為「法統重光」之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於是他們反對和會，反對各省會議，迫不及待的就把黎元洪擁出來了，就把國會恢復了；既不問事實上統一的阻礙，又不顧南方的心理，又不顧國會內部的法律問題與感情問題；所以國會雖然開會了，黎元洪雖然做了總統了，然而國家分裂如故，統一還是遙遙無期的，國會裏唱過幾次的武戲還是小之又小的惡果呢！當時以為統一

的障礙是孫文，孫文倒了，統一還是不能實現。當時又以爲國會的障礙是廣東的非常國會，現在非常國會沒有了，然而國會還不能太平無事的進行。我們再三考慮現在的政治情形，只有下面的簡單結論：

(1)武力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做這種迷夢的是中國的公賊！

(2)憲法是將來的政治工具，此時決不能單靠憲法來統一的。

(3)大革命——民主主義的大革命——是一時不會實現的；希望用大革命來統一，也是畫餅不能充飢。

(4)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來，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負責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爲。道理上這種辦法是不正當的，事實上這種辦法是很困難的。分贓可用此法，賣國可用此法，謀統一不可用此法。

(5)在今日的唯一正當而且便利的方法是從速召集一個各省會議，聚各省的全權代表於一堂，大家把袖子裏把戲都攤出來，公開的討論究竟

我們為什麼不能統一，公開的議決一個實現統一的辦法。

我們盼望全國國民仔細考慮這幾條簡單的結論，我們更盼全國的輿論家評判這幾條結論。

（四二）

近日有好幾家報上登出了一家通信社傳出的一段新聞，說，「回憶兩閱月以前，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等十六人發表一篇堂皇大文，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現在十六位中，已有三位為當局台上人物，而彼等政治主張並不見其實行。……二十號努力週報已有極嚴重之表示，當局者頗難措置，於是好事者特於二十二日下午，在鐵獅子胡同顧宅邀集十六位學者開一茶話會，冀藉變換政治主張。孰知某君仍堅持二十號努力週報上所載兩種要求，向王博士追索組閣的計畫，及大政方針甚力，博士無以應，但說過節。某君繼進以嚴重的忠告。博士不堪，互相駁詰，至面紅耳赤，彼此不歡，經主人出而排解，始罷。」

這一段新聞有許多很不確實的地方。第一，二十二日的茶會上在座的人只有五位是當日發表『政治主張』的人。第二，這一次茶會的目的本是要討論目前政治的計畫的，並不是什麼『好事者』邀集來調解某方面的責難的。第三，當日的討論確是很老實的，很懇摯的；但並沒有『面紅耳赤，彼此不歡』的事。第四，當日討論三小時的結果是，王內閣不是沒有計畫的；不過在這個索薪索餉的節關之前，一切計畫都是空話，所以他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發表什麼計畫。——我們對於『王內閣有計畫』的消息，自然是歡迎的。我們且讓一步，耐心等候王內閣順順溜溜的過了中秋節之後，把他們的大政方針宣布出來。我們盼望他們不要再使國民失望了！

——九月二十五至十月一日——

(四三)

北京大學這一次因收講義費的事，有少數學生演出暴亂的行爲，竟致校長以下

皆辭職。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來，很像是意外的風潮；在我們看起來，這確是意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後，北京大學「好事」的意興早已衰歇了。一般學生仍回到那「挨畢業」的平庸生活；優良的學生尋着了知識上的新趣味，都向讀書譯書上去，也很少與聞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學生團體竟陷入了絕無組織的狀態，三年組不成一個學生會！這幾年教職員屢次因經費問題，或罷課，或辭職；學生竟完全處於無主張的地位：懶學生落得不上課，不考；好學生也只顧自己可以讀書自修，不問學校鬧到什麼田地。學校紀律廢弛，而學生又無自治的組織，一旦有小變故，自然要鬧到「好人籠着手，壞人背着走」的危險境地。目前的風潮，也許可以即日結束；但幾十個暴亂分子即可以敗壞二千六百人的團體名譽，即可以使全校陷於無政府的狀態，這是何等的危機？我們希望北大的教職員學生們對於這一次的風潮，能了解其中所涵的教訓，能利用這個教訓來做點「亡羊補牢」的工夫。不然，這一次風潮過去之後，後患正長呢！

古人說，『暴得大名，不祥。』這話是有道理的。名譽是社會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會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許過於實際。所以享大名的，無論是個人，是機關，都應該努力做到社會上對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這種大名。不然，這個名不副實的偶像，終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學以二十年『官僚養成所』的老資格，驟然在全國沉寂的空氣裏，表示出一種生氣來，遂在一兩年中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這是大不祥的事。這樣的社會期望，就是兢兢業業的努力做去，也還不容易做到；何況北京大學這幾年來，疲於索薪，疲於罷課，日日自己毀壞自己呢？我們在這三年中，沒有一年不提出很懇切的警告。現在大覺悟的時期應該到了。幾年的盛名毀在幾十個學生手裏，這並不足奇怪，也不足痛惜。實不副名，要名何用？我們希望北京大學的同人們諸痛痛快快的忘記了這幾年得來的虛名，徹底覺悟過來，努力向實質上做去，洗一洗這幾年『名不副實』的大恥辱！

——十月十六至二十二日——

（四四）

上回北京政府稟承軍閥的意旨，派李厚基爲討逆總司令；現在又稟承軍閥的意旨，把馮玉祥調回北京，派張福來做變相的河南督軍。這兩件事可算是王寵惠內閣的兩大恥辱。攪鬧的政策的荒謬，我們在上一週已說過了。馮玉祥在河南，時間雖然不長，却已很有點成績。他的短處在於那種狹義的『爹爹政策』；想在短時期中改變人民的道德習慣。他的長處在於能用人；他對於財政廳長薛氏，教育廳長凌氏，都能給他們全權辦事，不去牽掣他們。財政方面的成效是已可以看出的了；教育方面的設施，此時還不能說到成效上去；但有了一千多萬元的趙家遺產作基金，加上專家的籌畫，若繼續下去，總可以有很好的成效的。馮玉祥還有一種長處。別人練兵，不肯派出去打匪，他們保護兵士就同舊式家庭保護小姐一樣，惟恐他們出去遇着危險！所以河南屯了那麼多的大將精兵，而土匪的勢燄竟和大將精兵之多

成正比例。馮玉祥練的兵是肯出去打匪的，他主張，只有好兵可以出去打匪，拿不好的兵出去打匪是給土匪送軍火去。然而這種政策是吳佩孚不能贊成的。他整理財政，而不能多供直系的軍餉；他抄沒了趙家的財產，而不肯叫胡景翼張福來靳雲鶚們拿出去內分；他練了好兵，不留以有待，而開出去勦匪：這都是馮玉祥的大罪狀了。

總之，馮玉祥不能做蕭耀南，不肯把河南變成吳佩孚的外府；而吳佩孚不能讓一個不能指揮如意，並且聲望日高的馮玉祥駐在河南：這是馮玉祥被調出河南的原因。

然而北京政府竟很恭順的服從了。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有沁電給河南教育會等各團體，說「馮督在豫，吏畏民懷；中央倚畀方殷，詎有他調之事？謠言望勿輕信。」然而十月三十一日馮玉祥他調的命令竟正式下來了。黎元洪自然可以向「責任內閣」身上推脫干係；王寵惠的內閣又向誰推脫干係呢？

王內閣過了中秋節之後，若有政策，還有繼續存在的理由；若沒有政策，早就該走了。沒有政策而不走，是為『戀棧』。李厚基討逆的命令，給他們一個走的機會；然而他們不走。馮玉祥他調的命令又給他們一個走的機會；然而他們還不走！當走而不走，是謂自毀！是謂自殺！

（四五）

十月中，我因教育會聯合會事到山東，每天看七八種報紙，覺得山東人對於王正廷已漸漸的由監督的態度變到仇視的態度上去了。近兩週內北京的山東同鄉和山東地方團體都有了很激烈的反對王正廷的表示。有好幾次要求政府『尅期罷斥，另簡賢明』的。

我們當這個時期，不能不對山東人士貢獻一次的忠告：山東人監督王正廷，是應該的；山東人在這個時候仇視王正廷，是應該慎重考慮的。到了這個時候，魯案善後督辦公署已漸漸的成了一個很專門的技術機關了。接收之期已近；即使山東人

此時能把王正廷攻倒，試問趕走王正廷之後的第二步又應該是什麼？山東人士的心目中究竟主張什麼人來做這件事？潘復靳雲鵬固不能滿山東人的意，顏惠慶溫世珍難道就能滿山東人的意了嗎？

我們以為，山東人對於這件很重要而且很帶專門技術性質的事，應該仔細考慮。這件事應該分兩大段研究。第一段是接收以前的交涉，第二段是接收以後的善後。關於第一段，國人（不但山東人）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應該公開的質問，公開的監督，公開的力爭：就是中日委員會已通過了的，也還有國務會議的一關可以挽回。山東人宣言的原則是：「華盛頓會議席上已喪失了權利的，我們不希望王正廷爭回；華盛頓條約裏不曾喪失的，我們希望他不再喪失」。這話固然很有理；但「交涉」是一種交易，逃不了討價還錢的手續。我們應該研究逐次交涉的問題，分別討論；不應該籠統日本人不漫天討價，也不能希望中國委員方面絕對不還錢。

至於第二段——接收以後——的善後事宜，應該另作一件事看待。山東人現在最怕

的是王正廷利用他辦接收的機會，替他自己養成勢力，預備將來做青島大王。王正廷對於這一點，應該有一種明白的宣言，表明他自己的態度。國人（不但山東人）對於青島市的組織，也應該作細心的研究。究竟青島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中央委任的督辦？督辦是不是應該完全不受山東省政府和省議會的監督？青島市和山東省究竟應該有什麼關係？這種問題是應該研究的。至於人的問題，我們認爲還是第二步。組織完備了，監督制裁的機關有了人，人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我們希望山東人士對於這件重大而帶專門性質的事件，不要全憑意氣，不要全利用羣衆心理，應該先把一切步驟想像出來。打倒一個人是容易的事，爲事擇相當的人就不容易了。攻擊一項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據事理，做更妥當的計畫，就不容易了。如果他們沒有底下的計畫和步驟，只從人的問題上作消極的攻擊，那就不能不使人疑心到「地方主義」上去了。

——十月三十至十一月五日——

（四六）

十一月十二日的時事新報上有『新猛』先生的一篇『胡適之與王正廷』，批評本報二十七期的社論。他的結論是：

> 誠有之，『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羶氣』。王正廷是什麼一種人，胡君還要和他說話，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懷疑胡適之了。

『新猛』先生自己說是『很愛惜』我的，所以我要對他下一種忠告：我若因為怕人懷疑而不敢說話，那就不成胡適之了。我在山東當面對山東的朋友說的話，在北京當面對山東代表說的話，和我在努力週報第二十七期上說的話是一樣的。前天晚上，我還接到山東教育界一位領袖的來信，他說：

> ……湘溪回省，談到接着先生原信，已和先生見面。王正廷問題，山

東人的態度不甚對，誠有如先生所言。現時亦無好法子轉變一般人的心理。……

現時所以沒有好法子轉變一般人的心理，正因爲當時利用羣衆心理的人能發而不能收，正因爲輿論界的人都怕人懷疑，都要避免『爲王正廷辯護』的嫌疑。我是不怕人懷疑的。只可惜我們說話太晚了，已『無好法子轉變一般人的心理』了！

『新猛』先生在那篇文裏還提出一個政論的標準。他說：

大凡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切不可帶有替某人某派或某事辯護的意思，而只可用超然的目光去批評其是否曲直。

假如我說羅文幹發表十一年公債的用途是不錯的，那就是替羅文幹辯護了嗎？假如我說孫丹林發覺內務部員的弊竇是好的，那就是替洛陽派辯護了嗎？我們讀『新猛』先生這幾句話，不能不疑心他所謂『超然的目光』只是一種阿世取容的時髦眼光。現在最時髦的是攻擊人。凡是攻擊，都是超然的。我們攻擊人，從來沒有受人

『懷疑』過。我們偶然表示贊成某人，或替某人說一句公道的話，就要引起旁人的『懷疑』了。我們對於廣東孫陳之爭，稍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民國日報罵了幾個月。我們對於董康高恩洪，也曾說幾句贊成的話，就引起了許多人的疑心，有一位先生因此就對人說努力週報是吳佩孚高恩洪拿出錢來辦的！現在我們對於山東人和王正廷的問題，又說了幾句我們認為公平的話，就有人來說我們想『吃羊肉』了！

我們因此得一個敎訓：

大凡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只可罵人，切不可贊成人。被人罵的人，一定都是該罵的，政論者應該加力幫着罵他。切不可贊成某人，切不可贊成某派，切不可贊成某事：贊成就是『替某人某派或某事辯護』了，就不是『超然的目光』了。

我們因此，又得一條心理上的觀察：

中國人不信天下有『無所為』的公道話。凡是替某人某派說公道話

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好處的，或是想吃羊肉的。

老實說罷，這是小人的心理，這是可以亡國的心理！

——十一月十三至十九日——

（四七）

十九晨，署財政總長羅文幹因吳景濂張伯烈的告發，被黎元洪下令逮捕。關於這一件事的各方面違法之點，高一涵君在今日本報（努力第三十期）另有專論；我們且談談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感想。

法律是政治的根本，違法的惡例是開不得的。前十天左右，日本告知報（Japan Advertiser）的訪員美國人侯基士對我談起鍾世銘被拘捕至今未得正式審判的機會；他說，這種例是開不得的，將來一定有效尤的。這一次談話之後，不下三天，遂有羅文幹被捕的事。吳佩孚有電來責黎元洪，說的話是不錯的；可惜他自己忘了

鍾世銘的案子，所以黎元洪的回電（梗電）說：

財部前次長鍾世銘久被看管，迄未免職。警廳奉執事之命，猶且毅然行之！

我們並不說，因為吳佩孚違法黎元洪就也可以違法；我們只要說，違法的惡例是開不得的。今天政府不經法律手續就查抄曹汝霖陸宗輿的財產，我們固然快意；但假如明天政府不經法律手續就查抄蔡元培李煜瀛的家產，我們就不快意了。然而在邏輯上卻實在是同樣的例子。

近來交通部對招商局的事，也是一例。招商局的傅宗耀有沒有犯罪，我們不知道。但是交通部如何能拿『勾通逃犯，鼓動工黨』的名目來請總統用指令逮捕他？又如何能據了幾個很像揑名的（看近日上海各報的封面廣告）股東的控告請總統就免他的職？因為這件事，上海的商人很動了公憤，開會對待政府。政府中人既能濫用命令的裁判來毀他的敵人，怪不得吳景濂黎元洪要用命令來拘捕閣員了。

總之，上自總統，下至極小的官吏，總覺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國家又怎樣能有法治，人權又怎樣能有保障呢？

（四八）

王內閣裏有三位閣員曾經簽名於我們在五月中發表的『政治主張』；因此，王內閣成立以來，很有些人愛拿那篇宣言裏『好人政治』的話來挖苦他們。我們在那篇宣言裏，本不曾下『好人』的定義。但我們理想中的『好人』，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一是才具上可以有為。在普通人的心裏，一個『好人』至少要有可靠的人格。現在羅案的發生，正是試驗『好人政治』的最低條件的機會了。好人政治的涵義是：進可以有益於國，退可以無愧於人。我們對於王羅諸君的政治上的才具，確是不很滿意的。但我們至今還承認他們的人格上的清白可靠。我們希望這一案能有一個水落石出，叫大家知道『好人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成效是『人格上禁得起敵黨的攻擊』！

（四九）

關於羅案的本題──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內容稍近於專門，故討論的人還不多。然而國會議員在幾分鐘內，居然議決把這個合同取消了。「取消」的意義，我們至今還不明白。二十二日京報的經濟新刊曾提出一個疑問：

> 否決展期新合同，必有兩種意義之解釋。否決展期合同即爲根本上不承認奧國借款，將奧國債票持票人之債權，由中國「一廂情願」，自行取消，從此中國解除履行債務的義務。此一義也。
>
> 否決展期新合同卽爲承認舊合同爲有效，還本付息，仍照舊合同履行；其過期之息則立時補付。此又一義也。

這個疑問，我們認爲有弄明白的必要。但我們看國會議員前日提出請懲辦王寵惠的質問書裏說：

> 各國自與德奧宣戰後，凡戰前所訂債務契約，經凡賽會議議決，在聯

合國與德奧所負債務責任，應皆為戰事賠償之用。吾國亦為參戰國之一，此種合同應在廢除之列。……

照這種論調，竟是根本上否認與國借款了。又看近日報上登的自稱某公民團體的上總統書，內稱

我國積欠各國至期應付之外債，未付本息者甚多，尚不能以新約强我承諾。況此項債票，既無抵押之品，雖有遣人出名交涉，亦無急迫償還之必要。

這竟是以賴債自豪的心理了。怪不得二十三日京報的經濟新刊的記者要說：

既不能賴債，則不能不還債。不能任人之齗斷還債，則不能不自動的整理諸內外債。今當財政共管高唱入雲之時，値特別會議將次開會之日，列國莫不競事稽查偵察我國財政現狀，蹈隙抵瑕，以求一逞。而我國人猶懵焉無知，甚或以賴債為自得，以為人莫可如何，而指愛國者為

賣國。是眞所謂狂者以不狂爲狂也，悲夫！

這種論調，我們認爲很公平的。賴債決不是政策。這一次展期合同的手續上是否完備，雖可以討論；但那種不負責任的賴債論，在這種國勢之下是決不能成立的。

（五十）

連日報上登出的『留學美國各大學學生』康洪章等四十餘人的『制憲芻議』，我們看了，實在覺得大失望。原文分五段，（1）緒論，（2）單層統治權議，（3）國民自治議，（4）四權並立議，（5）生產工具國有議。他們在『緒論』裏明說，『我們不要因襲的模仿的憲法，我們要創造的憲法』。然而他們的制憲論，却很富於『因襲的，模倣的』論調。例如末段論生產工具國有，他們說：

> 生產工具國有，與其說是師今，勿寧說是復古。……三代以上的井田制度，就是土地國有。……古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以王權代表國家，就是土地國有的不成文法啊。……

我們何不再進一步，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古代人民固有的不成文法呵！這種詩云子曰的邏輯，在國中中小學生的口裏，是可恕的；在一班大學院的留學生筆下，是不可恕的。

他們拿同樣的邏輯來主張他們所謂『單層統治權』。他們在『制憲庸議』之外，還附有一張公啓，說：

自聯邦說興，國內士大夫狃於現狀，乃揭橥聯省自治，欲易我二千年來沿習善制。

他們所謂『我二千年來沿習善制』，就是那單層統治權。他們以為

中國自秦始皇兼併六國後，郡縣制度確立，即爲單層統治權。以至於今，就是臨時約法，修訂憲法，憲法草案等所載，也全採單層統治權。

他們因此就下一個斷案：

那末，依據歷史，依據帝國政府的讓與，依據中華民國成立臨時約法

的本意，我們的憲法，必採單層統治權，本不成問題。

其實這種歷史的依據多的很呢！中國自秦始皇以後，皇帝專制的制度確立；那麼，『依據歷史』，依據『我二千年來沿習善制』，我們也應該採取專制帝制了。

最可怪的是他們把郡縣代表統一，又把封建和聯邦看作一樣，所以他們說主張聯邦制的人是『強效聯邦，恢復封建時代的二重統治權』。他們難道真不知道這二千年來中國久已成了『天高皇帝遠』的狀況？他們難道真不知道這二千年來中國久已變成『統治權的重數愈多，統一的程度愈淺』的狀況？那表面上的統一，所以能維持下去，全靠一種習慣的專制權威；一旦那專制權威一倒，紙老虎便戳穿了；雖有袁世凱的經營，只落得造成了無數割據式的藩鎮。聯邦論之起，只是一種承認事實上的危機而施救濟的方法，並不是康君們說的『抵制』。十一月十一日時事新報社評欄評『制憲芻議』，也指出這一點的錯誤，說『現狀是不集權又不聯邦的一種畸形狀態』。我們很盼望康君們注意這一點。（參看本書本卷頁一〇九『聯省自治

與軍閥割據」一篇）。

——十一月二十至二十六日——

（五一）　高凌霨證明賄買國會是實

一月十六日，北京的中一通信社傳出一段高凌霨的談話：

（某問）外間謂此次閣下包辦最高問題確否？（高答）最高問題現在時機未至，更無所謂包辦。（某問）此次二百元之津貼，非由尊處經手乎？所謂包辦卽指此也。（高答）此事從前係由劉君與政團接洽，余事前一無所聞。迨本月五號以後，某軍需官來京借住敝宅，所有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致發生此種誤會。至曹巡閱使此舉，係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更無所謂津貼。（某問）外間傳言閣下與張亞農之新民社獨厚確否？（高答）余對各黨向無歧視，亞農此次向余支款，

余以不經手銀錢謝絕，幾爲亞農所惱，何厚之有？

我們要請國民注意這段談話中的幾點：

（1）劉君，疑即劉夢庚，曾與各政團接洽二百元之津貼，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2）某軍需官來京發款，借住高凌霨宅，也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3）國會『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以便領此二百元之津貼，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4）此二百元之款，來自曹錕，『係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5）張亞農，即國會衆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確曾向高凌霨支款，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根據這五點，我們可以說，高凌霨正式證明曹錕與其黨羽行賄國會，又證明張伯烈

向他們索賄。我們的結論是：

(1)高凌霨是賄買國會案的要證，不可放走。

(2)劉某與某軍需官，也應查辦。

(3)曹錕是高凌霨證明為行賄主犯，也應卽行查辦。

(4)張伯烈身為國會衆議院副議長，經高凌霨證明有索賄嫌疑，也應卽行查辦。

我們希望國會中稍有一點人格的議員，用查辦羅文幹的精神，出來作徹底的查辦。不然，國會的名譽信用眞要掃地了。

(五二)　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於十七日下午向政府辭職，他的辭呈如下：

為呈請辭職事：竊元培承乏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雖職有專司，然國家大政所關，人格所在，亦不敢放棄國民天職，漠然坐視。數月以來，報

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汚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無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明令朝下，而身爲敎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卽於同日爲干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爲，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爲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爲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淸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汚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敎育當局之下，支持敎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敎育界及國人。謹此呈請辭職，迅予派員接替，立卸仔肩。此呈大總統。

他在各報上還有一個啓事，說：

元培爲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敎育當局

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我們知道，有許多人見了這兩個宣言，一定要發生一種疑問：『彭允彝是個什麼東西？蔡元培竟爲了一個無恥政客而放棄他幾年苦心經營的北京大學，豈不是大不值得嗎』？

這種責備是不能免的。但我們知道蔡先生的爲人，知道他這種正誼的決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幾年前就有了。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會中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如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麼辦呢？』那時大家面面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忍

鬧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爲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後來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那班有官位差使的留學生們始終沒有舉動，有幾個大膽說話的，如華南圭等，都被安福部降調出去了，——然而少年的國內學生却大動了。於是有五四之舉，有六三之禍，直到全國罷市，曹陸章免職，以後方才逐漸收束。

我追述這一段故事，只是要證明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爲抗議』的決心。他這一次單借彭允彝的事爲去職的口實，似乎還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傳統觀念；蔡先生雖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響甚深，是不可諱的。但他的呈文也明明說出：

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無不呈現於國中。

他又說；

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汚之苟安。

這是他憤然抗議的本意。我們贊成蔡先生此次的舉動，也只是贊成這點大聲主持正誼，『不忍爲同流合汚之苟安』的精神。

我這幾天病中讀了兩部很激刺腦筋的書：一部是學海類編裏的東林始末，一部是藝海珠塵裏的社事始末。這兩部書都可幫助我證明我的一個通則：『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智識階級的肩膊上』。東漢末年的太學生，兩宋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和復社幾社，都是如此的。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智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開口了。現在大家往往責備各省的學生干涉政治，釀成學潮；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爲中年的智識階級縮頭袖手不肯干政。故安徽學生趕走李兆珍，包圍省議會，釀成姜周流血之案，此正

是安徽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故江蘇學生包圍省議會，趕跑議員，此正是江蘇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故五四與六三之大犧牲，正是全國中年智識階級的奇恥。北京的教育界，連年疲精力於經費問題；在多數國人的眼裏，北京教育界久已和『金錢』『飯碗』等字結了不解之緣了。在這個時候，教育界的老將蔡先生忽然提出這種正義的抗議；對於『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作悲憤的抗議。我們猜想，他的抗議不過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爲自愛的人到了忍無可忍之時，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的決心。我們可以斷定，他決不願靑年學子因此廢學輟業的。所以他毅然決然的一個人奉身而退，不願意牽動學校，更不願意牽動學生。但他這一次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明末倪元璐論東林之事，曾說：

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准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

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夫，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

眼前也許有議蔡先生此舉爲『矯激』的。我們要套倪元璐的話替他答辯道：

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今日廉隅毀裂已淨盡，故有光園之拜壽，有紅羅廠之賣身。拜壽不已，必至於勸進；賣身尚爲之，何有於賣國。宜乎蔡先生之奉身而退，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也。

——十二年一月十五至二十一日——

（五三） 賄買國會的問題

本報第三十八期曾有『高凌霨證明賄買國會是實』一篇時評，指出五個要點：

(1)劉君，疑即劉夢庚，曾與各政團接洽二百元之津貼，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2)某軍需官來京發欵，借住高凌霨宅，也是高凌霨認爲事實的。

(3)國會『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以便領此二百元之津貼，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4)此二百元之欵，來自曹錕，『係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5)張亞農，即國會衆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確曾向高凌霨支欵，也是高凌霨承認的。

一月二十二日以後，北京晚報，京報等報登出『高凌霨啓事』的廣告，說：

連日京報及努力週刊登載鄙人與某君談話關於張亞農君支款一事鄙人並無此談話，張君亦未嘗向鄙人支款。特此聲明。

這個聲明，我們認為不能滿意。我們指出的有五個要點，而高凌霨只否認了張伯烈索賄的一點。其餘四點，是不是已經無可抵賴了？況且除了我們引的一段談話之外，還有國會議員黃攻素的質問書可以引證。黃君質問書中有一段說：

自本月起，每議員支車馬費二百元，限制投票票價不出五千元。此種買賣，專由高五接洽。……以堂堂閣員，竟明目張胆為之作行賄經理人，成何政象？

這是很嚴厲的質問，然而這個無恥的國會竟不理會他！國會不理這種重大的質問，難道國民也不過問這個非常重大的賄買國會的問題嗎？

（五四）今日之事

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

國會對教育界宣戰；

也就是惡政府對淸議宣戰！

十九日，學生三千人向衆議院請願，被軍警毆打，受重傷者十餘人，受微傷者三百餘人。我們且不引學生方面的話，我們單引國會議員李素『致同人書』中的一段：

> 象坊橋畔，學生請願，……約法對於請願，無何等限制；議會對於請願，有相當受理。……乃警士橫加干涉，學子備受趕擊；刀斫槍傷，如捕盜犯。……究竟所請者何事，所願者何事，必有隱情，豈盡好事？衆院抹倒一切，毫未考慮，神聖固不可侵犯，人民豈盡可厚誣？……

這是國會自身一分子說的公道話，已很夠證明衆議院門前的慘劇的眞相了。

衆議院悍然不顧淸議，竟把內閣閣員完全通過了。我們當時還希望參議院能利用兩院制給與上院愼重考慮的機會，至少能否決一個敎育界公認爲敗類的彭允彝，也還可以替國會留一點點臉面。不料二十四日下午參議院投閣員同意票，竟又『一

榜盡賜及第』了！報紙所指爲行賄國會的經紀人高凌霨也通過了，教育界所指爲毫無人格的彭允彝也通過了。落第的只有一個不肯請客，不肯行賄的施肇基。

這是國會明白和清議宣戰的表示。然而還不止於此。今日的政局是國會和內閣和總統打成一家的政局：金錢與差使，酒食和『冰炭敬』，竟把這十二年來分爭的三方面黏成一片了。所以今日之事可以說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惡政府對清議宣戰的表示！

明朝末年，政府黑暗到了極處，日日與清議宣戰。有一天，宰相王錫爵對顧憲成說：

近有怪事，知之乎？

顧憲成問是什麼怪事，王錫爵說：

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

顧憲成說：

外間亦有怪事。

王錫爵問是什麼，顧憲成說：

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

今日之事，也到了這步田地。清議所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政府必以為非。清議所非，這個『三位一體』的政府必以為是！

認清了這一點，然後可以決定我們對於政治的態度。

（五五）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

一月二十三日，蔡元培有一篇很明白痛切的宣言（見努力第三十九期附錄）。北京晨報給他加上了一個很確當的標題，叫做『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並且加上了一條短評，說：

記者就此篇宣言觀之，則蔡氏欲以不合作主義（Non-cooporation）打破今日之惡人政治，此與印度甘地（Gandi）抵抗英國政府之方法，完全

相同。但未審蔡氏之主張，能如甘地風靡印度否耳。

晨報的見解，我們覺得很不錯。蔡先生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為『不合作主義』，因為他很明白的指出，當局的壞人所以對付時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助紂為虐』；正誼的主張者，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這是很沉痛的控訴：控訴一切只認得『有奶便是娘』的學者，官吏，新聞家，指出他們『助紂為虐』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但是他究竟是一個『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樣的做積極的運動，他只能為自己向這個方向作準備。他現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訴文字，一方面控訴『不要人格，只要權利』的當局壞人，一方控訴『有奶便是娘』的無數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他已起訴了！他提出的證據是眼前的現狀，他指定的法庭是我們各人的良心！

印度是個宗教的國家，甘地已成了一個愛國的教主，故甘地的不合作主義可以

「風靡印度」。在這個混濁黑暗無恥的國家裏，在這個怯懦不愛自由的民族裏，蔡先生的不合作主義是不會成功的。況且印度人對英國的反抗，目標很簡單，旗幟很鮮明，正如中國前年的抵制日貨，容易使人了解，所以能有暫時風靡印度的功效。中國今日的問題，却是內政的問題，遠不如外交問題那樣簡單了。我們認爲公敵的人，却有人捏着叫乾爹，叫老板。我們認爲應該毀滅的制度，却是許多人的財源和飯碗。所以我們可以預料蔡先生的不合作主義是决不會風靡全國的。

然而正因爲這個國家太混濁黑暗了，正因爲這個民族太怯懦無恥不愛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這種正誼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爲情』，使我們『不好過』。倘使這點『難爲情』『不好過』的感覺力都沒有，那就眞成了死證了。

——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

（五六）彭允彝代表什麼？

上期我曾說：『教育界攻擊彭允彝，並不是攻擊他本身，乃是攻擊他所代表的東西。第一，他代表無恥。第二，他代表政府與國會要用維持一個無恥政客來整飭學風的荒謬態度。』（努力第三十九期）

一月二十九日，黎元洪果然下指令：『令教育總長彭允彝：呈悉。整頓學風，不辭勞怨。國事阽危，正資倚賴。深望勉為其難，毋萌退志。此令。』

一月三十日彭允彝果然到部了。

一月三十一日，彭允彝硬挽出我的一個朋友來對我說，他有不能走的苦衷，因為吳景濂一班人一定要他幹下去，不許他走。

於是我在一月二十五日說的彭允彝的兩層代表資格，都證實了。

（五七）蔡元培是消極嗎？

蔡先生的宣言發表以來，竟在意外的方面得着不滿意的批評！

獨秀在嚮導第十七期裏作文，說蔡先生『這種消極的，非民衆的觀念，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礙』。他恐怕蔡先生的『消極的高尙潔己態度』或致引導羣衆離開奮鬥的傾向，而走向退避的路上去，所以他覺要我們『如防禦鼠疫霍亂一樣，日夜防禦蔡校長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侵入思想界』！

獨秀又以爲『蔡校長打倒惡濁政治的運動也只看見學者官吏而不看見民衆』，所以他又說這是『非民衆的』。

獨秀那篇文章裏論『不合作主義』本身是消極的態度一層，已有淵泉在二月一日的晨報上答覆了。淵泉引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的八種涵義，來說明『他們所謂不字，是含有積極的進取的精神，決不止消極的否定的意味』。淵泉又指出『勞動階級的罷工，也是一種不合作主義的表現』。這一層我們很以爲然。

我以爲我們對于蔡先生此次抗議的行爲，應該分三方面觀察：第一，須認明這是蔡先生個人的性情的表現；第二，然後批評這種態度錯不錯；第三，然後討論他

的宣言在中國社會上可發生的影響。

在他個人方面，我們平日知道他的，都該承認他確不是完全消極的人。他的行為，有時類似消極，然而總含有積極的意味。五六年前，他提倡進德會，會中有『八不主義』到『七不主義』，這是很像消極的。然而他所以提倡這個會的本意却只是『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一句話。他的宣言裏說，『退的舉動，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又說，『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這兩句話都只是說，『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這是蔡先生平日一貫的精神。

其次，他這個態度究竟錯不錯呢？我們認為不錯。『有所不為』一句話含有兩層意義，兩層都是積極的。第一，『有所不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惡裏去。這種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養的基礎。第二，『有所不為』是一種犧牲的精神，為要做人而欲有所不取，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為要做人而獸性的慾望有所不得不制裁，為要做人而飯碗有所不得不摔破：

這都是一種犧牲的精神。蔡先生舉的例是『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其實這個公式可以擴大成『若求有X，至少要有犧牲g的決心』。這個g，是無定的：也許是金錢，也許是飯碗，也許是生命！所以我們說蔡先生這個態度是不錯的。

最後，我們可以討論這種抗議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好不好。獨秀怕他『爲惡濁政治延長壽命』，我們以爲獨秀未免太過慮了。蔡先生的抗議在積極方面能使一個病廢的胡適出來努力，而在消極方面決不會使一個奮鬥的陳獨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我在上期曾說：

> 然而正因爲這個國家太混濁黑暗了，正因爲這個民族太怯懦無恥不愛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這種正誼的呼聲，時時起來，不斷的起來，使我們反省，使我們『難爲情』，使我們『不好過』。

這個意思，我始終認爲不錯。現在我們如果希望打倒惡濁的政治，組織固是要緊，

民衆固是要緊，然而蔡先生這種『有所不爲』的正誼呼聲更是要緊。爲什麼呢？我們不記得這二十年的政治運動史嗎？當前淸末年，政府用威權來殺戮志士，然而志士越殺越多，革命黨越殺越多。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那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一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長！大家生在這個豬仔世界之中，久而不聞豬臊氣味，也就以爲『豬仔』是人生本分，而賣身拜壽眞不足爲奇了！

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衆固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爲要做人而有所不爲的犧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豬仔，然後可以打破這個豬仔的政治！

——一月二十九至二月四日——

（五八）這個國會配制憲嗎？

這個國會復活以來，所行所爲，無日不自絕於國人，國人也早已厭惡痛恨他了。但國內有一班人，對於這個國會還存一點顧惜之意，他們的理由是希望國會早日把憲法制成。但我們到了現在，不能不正告他們：這個國會是決不配制定憲法的。我們且不說別的理由，單說三點：

第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至少要能引起國人的信仰與崇敬。試問這一個光園拜壽，紅羅廠領冰炭敬的無恥政客團體定出的憲法，能引起誰的信仰與崇敬？『不以人廢言』乃是一句強人以所難的格言。這句格言，只可爲極少數人說法，決不能望多數人奉行。用現在這班國會議員去制憲，檢直是中華民國的奇恥大辱。憲法的尊嚴一定要斷送在他們的手裏！

第二，這個國會制出的憲法一定不能應付中國今日的需要，一定不能滿足國人

的希望。例如我們希望將來的新國會人數要大大的減少，要減去現數三分之二以上：這個希望可不是與虎謀皮嗎？又如我們希望將來的新憲法要打破現制國會專賣總統選舉的制度：這又不是與虎謀皮嗎？又如我們希望將來的新憲法要規定一種制裁國會議員自身的方法：這又不是與虎謀皮嗎？總之，我們對於將來憲法上救濟政治罪惡的種種希望，沒有一樁不是與虎謀皮。國會制憲，本可懷疑；這個國會，尤其不配制憲。

第三，自從上月憲法起草員提出『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草案以後，國會不配制憲的證據更明顯了。國會中人對於這個帶聯邦制性質的草案，早已紛紛表示反對了。反對的議員，大約不出兩派。一派是稟承那些割據的軍閥的意旨，要替軍閥保持割據的局面；還有一派是代表壟斷式的財閥說話，因為他們老板的營業跨有幾省的地面，怕省權伸張以後，他們壟斷的局面就沒有現在這樣容易了。上星期憲法會議裏的搗亂，試問是不是這兩派的議員鬧出來的？將來這種醜戲還多着呢！

我們從這一次的紛爭上，更可以證明這個國會決不配制憲。

總之，憲法是根本法律；民治國家的法律決不是那班自己不守法律的無恥政客所能制定的。我們可以預言：吳景濂張伯烈的國會卽使定出一個憲法來，將來決不會有憲法的效能，將來不過添一張廢紙！

——二月五日至十一日——

（五九）上海罷市的取消

上海總商會，去年因爲受英國旅華商會的刺激，曾對於裁兵理財兩個問題有一番書面的表示；並且當時傳說，他們曾想於本年舊曆正月十九日舉行罷市，以爲裁兵理財的示威運動。後來又有元宵節（三月二日）大罷市的傳說。以近日的事實看來，這件事是無形取消的了。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各報登有上海工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五個勞動團體的聯合聲明，說：

近日滬上各報喧傳，有元宵總罷工之謠，……敝會絕對聲明，毫無關係。

勞動團體何如此說，那素來愼重的總商會，在何豐林的勢力之下，更不消說了。果然上海三月一日電說：

商會聯合會發表宣言，略謂日昨之裁兵要求，係出於國民之公意。……此事將來必見事實。罷工罷市爲最後之手段，目下尙非其時。（二日晨報）

也許有些人對於上海罷工罷市之取消，覺得很失望的。但我們覺得這是意中之事，並不足使我們失望。正月十五或十九，罷一天市，那不過等於延長假期一天，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所以元宵或十九大罷市的話，本身就有點滑稽了。況且罷工罷市是很笨重的消極武器，很難使用，更難持久。對於一個極簡單的目標，如八年六月要求曹陸章的免職，那還可以一用。至於制度的改革，決不是一天乃至三

五天的罷市罷工所能做到的。而商會聯合會提出的三個目標——裁兵，制憲，理財——又都是制度的改革。我們早就不曾期望他們用一天的放假式的罷市來敷衍這幾個制度上的大問題。卽使罷市實現，也不過是一種示威的運動；以後如何能使這些目的一一做到，究竟還是要倚靠實際的組織和不斷的運動的。

我們對於全國的商界，不希望他們用一兩天的罷市來敷衍幾個大問題，只希望他們早日覺悟政治不良是近年實業不振和商業衰敗的大原因；早日覺悟內政不清明是商界實業界受種種外侮侵陵逼迫的原因。我們希望他們從書面的表示，進一步為實際的組織，再進一步為實力的政治活動。

（六十）　司法獨立之破壞

北京政府決心要倒行逆施的去辦理羅文幹的一案，竟於一個月之內把余棨昌實授了大理院院長，把高等檢察廳廳長也換了人，現在竟把原來辦理此案的地方檢察廳廳長熊元襄也調部任用了。現在從地方檢察廳直到大理院，很可以說是呵成一氣

了！我們只好拭目以待『甕中捉鼈』的把戲的實現！

這種很明顯的蹂躪司法的表示，竟不聞國中有什麼抗議，也不聞司法界有什麼抗議。這眞是很奇怪的現象。

在這個沈寂的司法界裏，只有東省特別法院李家鏊等痛駁司法部『佳』電的『眞』電，可算是靜夜的孤鐘了。司法部原電痛斥李家鏊等對羅案的抗議，並且很嚴厲的威嚇他們：『勿以法院之尊嚴，爲他人之機械。如果執迷不悟，則法牽具在，本總長雖深愛同人，亦不能爲之原也』。李家鏊等駁電有云：

羅案自始無告訴人，據本年一月十四日政府公報所載不起訴處分書，及上年十一月大總統復吳巡閱使梗電，已足證明，自無庸目覩情形，方知底蘊。聲請再議，僅限於告訴人，刑訴條例亦已明白規定，其無再議之餘地，何待煩言。鈞部謂此案再議，原有聲請之人。究竟此種再議，從何而來，同人實所未解。前奉宥電，既謂依刑訴條例第二百五十五

條，令行地檢廳依法辦理，自不得不謂之命令再議。以不得聲請再議之案，而仍依再議程序，將已受不起訴處分之被告，重行羈押，尤不得不謂之蹂躪人權。

又說：

特區法院原為撤廢領事裁判權而設，但亦須執法者均能守法，方足以杜外人之口實。今違法之舉動，竟出首善之當局。使上行下效，相率而不守法，是為無法之國家。收回法權，寧不絕望。與其虛糜國帑，何若停辦之為愈。

又說：

況有電既有不吝教誨之語，足見鈞座有虛懷下問之心，自同人竭誠相告，復反來電詰責，指為越軌，存心文過，實已流溢行間。

對程克們說這種道理，雖然無異於對牛彈琴，但這種切直的抗議在今日這種寒蟬式

的司法界中確是很難得的了。

——二月二十六至三月四日——

（六一）張紹曾的內閣早就該走了

我們以為張紹曾的內閣是不會自動的去位的了。然而中國的政治界裏，不可能的怪事在在會產生。張紹曾內閣竟通電總辭職了。

據北京報紙的傳說，張內閣辭職的最近原因是保定洛陽兩方軍閥強迫他們發表沈鴻英督粵，和孫傳芳督閩的命令。連日報載洛陽專使李倬章和保定專使項致中在京坐催這兩道命令的發表。張內閣既掛着『和平統一』的招牌，自不敢貿然發表這種『武力統一』的表示。爭執的結果，張紹曾已允發表孫傳芳督閩，後來終不敢發表，遂致全體辭職。

若這種消息是確實的，張內閣居然肯以去就和保洛軍閥為主張上的爭執，總算

有點政治手段的了。所以有些報紙竟因此很表示恭維之意，如辛博森們的東方時報中文欄竟說：

> 張內閣……此次對閩粵問題，能抱定和平宗旨，寧犧牲總揆高位，不為武人勢力所屈服，尤為數年來歷任總理中所不多覯。（英文欄略同）

如果張內閣真能明白宣佈武人壓迫的狀況，如果他們敢對於他們的太上政府明白宣戰，那麼，這種論調也許有人贊成。然而我們細讀他們發出的辭職通電，翻來覆去，竟尋不出這種『不為武人勢力所屈服』的精神。他們只說：

> 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佳兵既與本志相違，坐視又惟滋亂是懼。

『僭名竊位』是明指廣州；而『枕戈待旦』一句，也可指奉天，也可指四川，但決不能算是直指保定洛陽近日的威迫。無論誰讀這電文，只看見張內閣對孫文的抗議，而看不出一毫反抗曹吳的決心！

然而張內閣的辭職，又似乎不容易挽回了。因為他們那個爛調駢文的通電裏，只有『僭名竊位』一句是斬釘截鐵，不會有別解的。而這一句所攻擊的事實又是最不容易挽回的。如果張內閣希望用這一層為進退的條件，那就未免太笨了。他們該不至於這樣笨拙罷。

所以我們可以猜想，張紹曾內閣這一次辭職是真想下台不幹了。不幹的原因，也有種種說法。晨報說是：

> 實因內部意見不一，張敬輿無法駕馭，於是欲以一走彌縫之。對於閩粵兩令，亦並非絕對拒絕，乃已諾發表而復悔之，無法反汗，而欲以總辭職先發制人。

晨報說是：

> 張自就職以來，雖據和平統一主義，而毫無根本計畫，今日敷衍甲，明日敷衍乙，弄得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則此時之辭職，吾人固猶恨太

晚也。

在我們看來，張紹曾的內閣早就應該走了。無論他們的和平統一主義有無根本計畫，即使他們眞有根本計畫，這八九個人也不是能做到和平統一的人。全國唾駡一個無恥的彭允彝，而張內閣始終庇護他；司法界輿論界攻擊一個程克，而張內閣始終擁護他。軍閥濫殺工人甚至濫殺無辜的律師，而張內閣始終不說一句話。元宵節北京軍警毆打市民提燈會，使多少少年學生流血受傷，而張內閣不聞不問。這班人早已失國人的信用了。失了國人信用的人而妄想做統一的夢，豈非倒行而求進嗎？

總之，張內閣對於一個無恥的彭允彝，倘不能去，而覺有人信他們這次的辭職是反抗保洛軍閥的表示！這種信仰心，是我們不敢領敎的。

——三月五日至十一日——

（六二） 武力統一之夢

我們在上期本報裏，曾指出張紹曾內閣辭職的通電，只明白表示了張內閣對保文的抗議，而沒有一毫反抗曹吳的決心。

這一週裏，這話竟完全證實了。從張紹曾內閣不敢反抗保洛軍閥的情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張內閣當日口頭表示的『和平統一』的話早已無形取消，而今日北方軍閥實已決心要做『武力統一』的迷夢了！

我們在去年夏間親自聽見一位代表軍閥的閣員說，『只消兩萬兵直搗廣州，什麼事都沒有了。』我們當時就說，『你們為什麼不能先弄兩萬兵直搗奉天呢？』

現在的形勢只有比去年更糟了。東三省的內政和軍備，都已非去年戰敗之後的情形可比；財政一方面，尤非各省所能比。廣東方面，無論北方軍閥如何勾結沈鴻英，如何資送孫傳芳，他們至多能擾亂廣東，而決不能征服廣東。四川方面也是如此：他們無論如何幫楊森劉湘的忙，他們至多也只能擾亂四川，而決不能征服四

川。至於中部各省，我們只看見齊燮元四面擴張地盤，努力爲他自己製造勢力；這個野心辣手的武人，豈肯久居曹吳之下？

一年以來，直系軍閥早已把一年前所得的一點相對的同情都漸漸失去了。本來直系之中也只有吳佩孚可以勉強支撐門面；去年就是國中最激烈的報紙，也還稱他爲『較爲開明』的軍人。但京漢鐵路罷工事件，洛陽保定武昌三方軍閥的倒行逆施，武力統一的陰謀的顯露，征閩亂粵圖川的計畫的實行，國人對於吳佩孚早已非常失望了。對吳佩孚尚且如此，對曹錕一班人更不用說了。

以這班已失人心的人，當此無從收拾之時局，而他們還全無覺悟，仍舊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武力主義，——他們的失敗是可斷言的，並且不足惜的。只可惜人民的糜爛，反動政治的延長，從此更不知何日才得終了呵。

——三月十二至十八日——

（六三）解嘲

從前王寵惠內閣下台之後，湯爾和君曾對我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裏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着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這個忠告自然是很歡迎的。但我們却也有一種妄想：我們也明知那說的和行的是兩個世界，但我們總想把這兩個世界拉攏一點，事實逐漸和理論接近一點。這是輿論家的信仰，也可以說是輿論家的宗教。所以我們雖相信湯君的話有理，却還不能實行他的話。

但我們近來也常常忍不住嘲笑自己道：『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即如此次張紹曾內閣總辭職的事，我們雖然也認定他們的辭職決不是反抗保洛軍閥的表示，但想不出他們爲什麼要出此一舉。他們的辭呈裏明明拿『借名竊位』

『枕戈待旦』爲理由，而這兩樁又都不是一紙辭職通電就能銷滅了的。所以我們曾猜想他們這一次辭職是眞想下台不幹了。

然而『原來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他們又都幹了，幷且帖耳低頭的把保洛軍閥所要求的十二道命令一齊發表了。

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我想民黨議員王恢似乎得着一個答案了。他在他的『致張紹曾書』裏，曾說：

> 稔知足下（張紹曾）富有神經病。……害神經者，……其犯罪也，非從其所欲而充分爲之不止。

其實何止張紹曾一人！今日支配國事的人，——酒狂之上將，財迷之候補總統，酒色狂之國會議長——那一個不是『非從其所欲而充分爲之不止』的神經病人！怪不得我們說的話『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了！

（六四）　四川的省憲草案

R T君在『湖南的財政』一篇裏，指出湖南省憲關於預算案一項，規定教育經費等項的百分比例，和事實相去太遠，致使新政府成立後預算案竟提不出。他說的很痛快的：若依現狀編預算，結果便是違憲；若依憲法的規定來編預算，結果便是不可能。（參看努力第四十五期登的原文）

我因此想到現在許多制憲的先生們，誤認了『憲法為百年大計』的話，以為百年的大計儘可以不顧目前的事實。法律是應付事實的一些通則。法律若不顧事實，結果必至於提倡違法。使人認守法為不可能，豈不是等於提倡違法嗎？

今天我們接到四川省憲起草委員會草成的四川省憲法草案，全文共一百五十九條，我們匆匆看過，不能詳細討論，但我們看這裏面關於財政一項，雖然也有教育基金（第八十條），和重要實業的獎勵補助（第八十六條）等等，但都不曾規定預算案裏各項支出的百分比例。這一端確是勝于湖南省憲法的。

但四川的草案中也有許多太遠於事實的。例如第四十條說：

省議會得以左列方法解散之：

(一)由省議會以議員總額三分一以上之連署提議，三分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可決者。

(二)由全省公民二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議，經全省公民總投票過半數可決者。

(三)省長以政務員全體之副署，或監政院之咨請，提出理由書，交全省公民總投票過半數可決者。

這三個法子其實等於說省議會是無法解散的。第一法，等於與虎謀皮，自然無效。第二法既要全省公民二十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又要全省公民總投票過半數的可決，是做不到的。全省公民二十分之一，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在最近的將來，在交通不便而疆域遼廓的四川，全省公民的總投票也不會有二十分之一的公民出來投票的。這種規定豈不是等於具文嗎？第三個辦法更沒有道理了。四川省憲上規定省長是全

省人民直接投票公選的。全省人民直接選出的省長，而必須得全省公民總投票的可決，然後可以解散省議會，這又何必呢？監政院也是各縣縣議會選舉出來的五個監政員組成的。各縣縣議會舉出之監政院之提議，又得全省公民直接選出的省長的同意，而仍必須經過公民總投票的可決，這又何必呢？況且解散議會本是行政部的一種最後自衛的方法，解散之後，如民意不服，仍可把原有的議會選出來。又何必於解散之先經過這種笨重的手續呢？

『人民總投票』在今日是一個很不容易施行的制度。數年前，湖南省憲的最初草案裏屢用人民總投票的法子，已爲學者所譏評。然而這個制度還時時出現於各種省憲草案裏，這也是今日政論家不顧事實的一個證據了。

四川省憲法草案裏的第十章『監政院』一項頗有點別致。第百二十三條說：

監政院置監政員五人，由各縣縣議會選舉之。

第百二十八條說：

監政院之職權如左：

(一)省議會有違法行爲時，得咨請省長提出解散案，付全省公民總投票表決。

(二)省議員有應受懲戒行爲，省議會不爲提議時，得咨請省議會議決。

(三)官吏有違法行爲時，得咨請省長查辦。

(四)省長，政務員，省法院司，法官，審計員，依本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應行彈劾，省議會不爲提議時，得提出彈劾案，咨請省議會議決。

(五)議員官吏有犯罪行爲，檢察官不爲起訴時，得咨請司法司，令行檢察局，提起公訴。

(六)監察各項官吏之考試。

這大概從舊日的御史制度變出來的。現在的議員先生實在變成『三不管』了，這種彈劾機關是不可少的。只可惜這種機關竟定為『每五年改選一次』，未免太短了。我們以為全省的縣議會選出來的五個『有學識風節』的監政員，應該有終身的任期，以不失職為消極的限度。不知四川的憲法起草員以為如何？

——三月十九至廿五日——

（六五）　外交與內政

果然一個不愛管政治的民族，一聽得外交問題，也都感奮興起了！三月二十五日上海的對日遊行大會，參加者一百六十個團體，共五萬餘人，可算是空前的大舉。二十六日，北京的方面，大雨淋漓之中，也有幾千人的大游行；次日，平素最麻木的北京商界也居然有千人的游行集會！其餘各地方也都有很嚴肅的表示。

我們對於這種熱情的表示，不但不發生樂觀，只能發生感喟。

外交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和內政有密切關係的。向來說，『弱國無外交』，其實是『內亂之國無外交』。四分五裂的中國，破產的財政，瘋狂穢污的政治，九個月換五個外交總長的外交，穢德彰聞的國會，是不是可以號召全國一致的熱心來作外交的後盾？

固然旅順大連是要爭回的，固然一九一五年的條約是應該廢止或根本修正的。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不在乎一日半日何豐林一類保障之下的游行，不在乎無數濫調的『快郵代電』。（我的朋友劉文典先生說，『快郵代電』正是中國人最下流的劣根性的鐵證。）達到這個目的之法，只有一條，就是澄清內政！

內政不清明，國家不統一，上無可以號召全國人心的政府，下無一致愛護政府的國民，是外交失敗的最大原因。中央無法可以對付割據東三省的張作霖，如何能對付那佔據旅大的日本？駐歐的各公使竟到了同盟罷工的境地，駐日本的公使當此時期至今還逗留不曾出國門。有人說過：『後盾』固然重要，但『前矛』更其重

要。卽使我們假定今日果有對外的民氣可作後盾，無奈這種不爭氣的政府決不配作我們的前矛呵！

我們老實承認，我們對于今日的外交問題，實在鼓不起熱心來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們只希望國人從這種失敗的外交狀況上格外感覺早早澄淸內政的迫切！

（六六八）　告日本國民

我們對於國內的態度，具於上條。然而日本一部分國民的最近表示，也使我們不能不對他們提出一個忠告。

日本貴族院議員蜂須賀正韶侯爵等，及衆議院議員岡崎邦輔等，共一百三十餘人，發起對華國民同盟會，於三月二十二日開發起人總會，議決一種宣言和決議；議定於二十八日開大會。他們的決議如下：

日本國民對於大正四年之中日條約，今後無論中國出何種態度，亦斷不容其廢止。

這明是替日本政府答覆中國政府通牒的論調作後援了。他們的宣言頗長，大旨有兩點：

(一)『已由獨立國家間成立之條約，而於日後宣言無效，乃外交史上未曾見之特例』。

(二)『中日條約乃曾濺帝國國民之血，防遏俄國之侵略，為中日共存籌畫之結果，實我國策之礎石也』。

我們不用談外交史的特例，也不用多談兩國近世史上的往事。我們只須指出三點：

(一)一九一五年的中日交涉，為日本外交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件：所獲得的權利，遠不能抵償日本的兩種絕大損失：(1)中國國民的排日運動，(2)世界列國對日本的懷疑，日本國際信用的低落。

(二)山東問題之解決，青島之交還，庚子賠款退還之醞釀，這都是和解中日兩國國民間仇視的心理的具體有效的政策。但一九一五年的條約

不根本修正，旅大的問題不根本解決，則是眼中之釘尙在，中日之親善終於無期。

（三）此次中國之提議，正是給日本一個絕好的機會，使日本政府可以根本挽救大隈時代的外交大失策，使中日國民間可以根本消除廿餘年的不幸的仇視。

日本的國民，不能了解這個時機的遠大的意義，而僅僅爲咬文嚼字之『無用之紛爭』，這是我們認爲很不幸的。

（六七）法國人的恥辱

當上海市民舉行五萬人之對日大遊行的那一日，法租界的巡捕房竟把中華民國全國學生總會的三益里總會所封閉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會所也於同日被封閉了！各代表的行李都被限令搬出了！

法蘭西民族在歷史上是有爭自由而戰的榮譽的；三色的國旗，代表這個光榮的

民族的三大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法國人在中國，向來也還有擁護中國愛自由者的表示，所以二十年來的中國政爭，法租界向來是民黨和其他愛自由者的退避之所。

但是近年來的法國民族早已不是那歷史上光榮的 La belle France 了！萊因河畔的橫行，我們也許原諒他們爲迫於救亡不得已而出此。但上海的法國巡捕房近年的行爲，實在有我們不能不認法蘭西民族的奇恥大辱的。

新青年不被禁於北京，不被禁於廣州，而兩次被禁於上海法捕房！陳獨秀在北京雖曾被捕，然北京軍警拘捕獨秀於親見他佈散傳單之時，而後來安然出獄，不曾受半文之罰金。而陳獨秀在法界兩次被拘，罰金與訟費使他破產還不夠。這種比較不夠使我們反省嗎？

中法實業銀行復業案的種種黑幕還未終了，中法通惠工商學校的種種黑幕還未終了，而法捕房竟不許全國學生總會開會，終於把他們的總會所封閉了。

我們要正告法國人和一般熱心提攜中法文化事業的人：安南禁偶語的法令未除，而法國的市儈居然在中國替何豐林們作鷹犬了！十年的中法文化提攜的呼號，遠不如三益里的一張告示，兩紙封條力量之大！

——三月廿六至四月一日——

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吳敬梓年譜

我的朋友汪原放近來用我的嘉慶丙子本的儒林外史標點出來，作爲儒林外史的第四版。這一番工夫，在時間上和金錢上，都是一大犧牲。他這一點犧牲的精神，竟使我不能不履行爲吳敬梓作新傳的舊約了。因此，我把這兩年搜集的新材料整理出來，作成這一篇年譜。古來的中國小說大家，如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的作者，都不能有傳記：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現在吳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給他做一篇一萬七八千字的詳傳，我覺得這是我生平很高興的一件事

了。

（一）家世

全椒吳氏，遠祖以永樂時『從龍』的功勞，『賜千戶之實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轉弟而讓襲，歷數葉而遷居』。（文木山房集移家賦）按先生自注，轉弟是遷到全椒的始祖。他家起先業農，後來行醫，移家賦說：

爰負耒而橫經，治青囊而業醫……翻玉版之異切，研金匱之奧奇。（參看儒林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

吳敬梓的高祖吳沛，沛父吳謙，謙父吳鳳。（陳廷敬吳國對墓誌，見耆獻類徵卷百十五。）吳沛字海若，是一個廩生，陳廷敬說他『道德文學爲東南學者宗師』。他的事蹟見全椒志卷十，頁四四。移家賦寫他的高祖很詳細，有云：

自束髮而能文，及勝衣而稽古，紹絕學於關閩，問心源於鄒魯。……

貧居有等身之書，于時無通名之譽。

吳沛著有詩經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志，卷十五。）

吳沛生子五人，「四成進士，一爲農，終布衣」。這五人的名字是：國鼎，國器，國縉，國對，國龍。（次第見吳國對壽詩。）

吳國鼎，字玉鉉，崇禎癸未進士，（明進士題名錄注六合籍。）授中書舍人。有過國集及詩經講義。（志十，參志十五。）

吳國龍，字玉騧，也是崇禎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清順治時，他降了清朝；康熙初，授工科給事中，改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後來轉到禮科掌印給事中。他雖是貳臣傳中人物，但做諫官時頗有聲名，有吳給諫奏稿八卷，心遠堂集三十四卷。（志十，頁十六，參志十五。）

吳國縉，字玉林，順治壬辰進士，改教職，做江寧府教授。志上稱他「性閎敏，於書無所不讀」。有詩韻正五卷，世書堂集四十卷。（志十，又十五。）

吳國器，字玉質，以布衣終老，道德甚高，王士禎有『用韋左司寄全椒道士韻，追贈國器，甚稱美之』。（注十一。）移家賦自注云，『布衣公無疾而終，人傳仙去。』

這四人是吳敬梓的伯叔曾祖。他本身的曾祖吳國對，字玉隨，號默巖，和國龍是雙生的。國對排行第四，但他登第却在最後，直到順治甲午中舉人，戊戌中第一甲第三人（俗稱探花）。移家賦說：

似予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獨傷晚遇。常發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三殿臚傳，九重溫語，宮燭宵分，花磚月午。張珊網於海隅，懸藻鑑於畿輔。詔分玉局之書，渴飲金莖之露。羨白首之詞臣，久赤墀之記注。

海隅的珊網指他典試福建，畿輔的藻鑑指他提督順天學政。末兩聯指他由編修做到侍讀。賦中說他『發憤揣摩，遵道得路』，也是寫實的，他是一個八股大家，方嶟做文木山房集序，曾說：

全椒吳侍讀公以順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其所爲制義，衣被海內；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李文貞公其一也。

但方苞又說他的『詩古文辭與新城王阮亭先生齊名』，全椒志（十，頁四五）也說他『才學優贍，工詩賦，著書，言論丰采爲一時館閣所推重』。（全椒新修的志，末尾附有他的序。）陳廷敬作他的墓誌，說：

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工於騷賦之作，故獨喜多爲詩，其愁憂懷愉離合諷諭警戒之旨，恆發之於詩，名曰詩乘。

他的遺集後來編爲賜書樓集二十四卷。（全椒志十五。）

據陳廷敬的吳國對墓誌，國對生三子，長子名旦，次名勖，次名昇。吳旦即是吳敬梓的祖父，字卿雲，增監生，考授州同知，是一個孝子，事蹟見全椒志孝友傳。陳廷敬說：『旦賢而有文』。但他死的很早，故移家賦不提到他的歷史。全椒志藝文志說他有月潭集。

吳旦的親弟吳勖也在孝友傳，幼弟吳昇是一個舉人。吳國龍的兒子吳昺，中康熙三十年榜眼，很有文名，著有卓望山房集及玉堂應奉集，曾充宋金元明四朝詩選掌局官。他的哥哥吳晟也是康熙年間的進士，也有文學的名譽。

所以吳敬梓自己寫他曾祖以後的家世道：

五十年中，家門鼎盛。陸氏則機雲同居，蘇家則軾轍並進。子弟則人有鳳毛，門巷則家誇馬糞。綠野堂開，靑雲路近。……巵茜有千畝之榮，木奴有千頭之慶。……故物唯存於簪笏，舊業不繫於貂璫。……圖史與肘案相錯，綺襦與軒冕俱忘。……鼎文有證謬之辨，金根無誤改之傷。羨延陵之咼子，擯海內之文章。……（移家賦）

這一段可以比較儒林外史第三十回郭鐵筆說的「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一大段。三鼎甲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榜眼，一個探花。杜少卿的曾祖，外史說是狀元，其實是探花吳國對。國對有賜書樓集，外史第三十一回寫杜少卿的家中，「左

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可以互證。

吳敬梓的父親生在這個環境裏，看慣了富貴與文學，覺得不很可貴，所以他立志要做聖賢了。移家賦注裏說他父親曾做『贛榆教諭，捐貲破產興學宮』。我們靠這一點線索，在全椒志卷十二，頁二四上，尋出他名叫吳霖起，（陳廷敬也說吳旦生一子，名霖起）是康熙丙寅（一六八六）的拔貢，做江蘇贛榆縣的教諭。志裏沒有他的傳，但移家賦說他的生平很詳細：

吾父於是仰而思，坐以待；網羅於千古，縱橫於百代；為天下之楷模，識前賢之紀載。……講學鄰嶧，策名帝都。摩石鼓之文，聽圜橋之書。嘗捧檄之未決，念色養之堪娛。……方遂茅容之願，遽下皋魚之泣；肝乾肺焦，形變骨立。……喪葬既畢，精業維勤；卷之萬象，揮之八垠；守子雲之玄，安黔婁之貧。覬使才於履屐，作表帥於人倫。……馬帳溢執經之客，鹿車駢問字之人。

贛榆在江蘇的東北海邊，故賦中說：

　　暮年黌舍，遙在海濱；時矩世範，律物正身。……雖茶蘼然，引觴徐酌；既横舍之既修，歌泮水而思樂。

末二句指他捐產修學宮的事。後文又有注云，

　　先君於壬寅年（一七二二）去官，次年辭世。

儒林外史裏寫杜少卿的父親『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第三十四回），又說他做『江西贛州府知府』（第三十一回）。贛州是暗射贛榆縣；因為要說他做知府，所以不能不說中進士了。第三十一回杜慎卿說：

　　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

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

　　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獃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

那些「教孝弟，勸農桑」的歎語。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曾經看當了眞；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

這一段說他父親丟官的原因，可以補志傳的不完。

吳霖起死後，家業遂衰。移家賦接着說：

於是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兄弟參商，宗族詬誶。假蔭而帶狐令，竇婚而締雞肆。……侯景以兒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販鬻祖曾，竊貲皂隸。若敖之鬼餒而，廣平之風衰矣！

總結上文，作爲一表：

- 吳鳳——謙——沛
  - 國鼎
  - 國器
  - 國縉
  - 國對
    - 旦——霖起——敬梓
    - 勱
    - 昇
  - 國龍

（二）年譜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的事蹟略見程晉芳做的傳，和我前年做的小傳。近年我買得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四卷。這是意外的發見，不可不說是『吳迷』的報酬。因此，我用此書做底本，參考別的書，做成這篇年譜，略補我的前傳缺漏的罪過。

康熙四十，辛巳（一七〇一），先生生。

是時，顧炎武已死了二十年，黃宗羲已死了六年。

先生的朋友程廷祚（生一六九一）已生了十年。

康熙四一，壬午（一七〇二），先生二歲。

是年萬斯同死。

康熙四三，甲申（一七〇四），先生四歲。

閻若璩死，顏元死，尤侗死。

康熙四四，乙酉（一七〇五），先生五歲。

全祖望生。

康熙四八，己丑（一七〇九），先生九歲。

朱彝尊死。

康熙五十，辛卯（一七一一），先生十一歲。

王士禎死。

康熙五二，癸巳（一七一三），先生十三歲。母死。

集中贈僧宏明詩，『昔余十三齡，喪母失所恃』。

康熙五三，甲午（一七一四），先生十四歲，隨父到贛榆縣教諭任所。

贈僧宏明詩，『十四從父宦，海上一千里』。

康熙五五，丙申（一七一六），先生十六歲。

毛奇齡死。袁枚生。

康熙五七，戊戌（一七一八），先生十八歲。

友人程晉芳生。同里親友金兆燕（棕亭）生。

康熙五九，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二十歲。中秀才。

庚戌除夕詞，「落魄諸生十二年」。

康熙六一，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二十二歲。父去官。

移家賦注，「先君於壬寅年去官，次年辭世」。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二十三歲。父死。

雍正三，乙巳（一七二五），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戴震生。

蔣士銓生。

雍正八，庚戌（一七三〇），先生三十歲。有庚戌除夕客中的減字木蘭花詞八首。八首詞裏，頗多傳記材料，今摘錄一些：

第一首云：

今年除夕，風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來，那得雙眉時暫開！

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鍾山朝復夜。金盡床頭，壯士逢人面帶羞。王家曇首，伎識歌聲春載酒。白板橋西，贏得才名曲部知。

第三首云：

田廬盡賣，鄉里傳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馬輕裘笑我貧！

依這兩首看來，吳敬梓的財產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儒林外史裏的杜少卿，似乎還少寫了這一方面。但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

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得精光。……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這就是『田廬盡賣，鄉里傳爲子弟戒』一句的說明了！

第五首云：

哀哀我父，九載乘箕天上去。（按先生之父死於癸卯，至庚戌只有八年，此云九年，是算到次年元旦。）弓冶箕裘，手捧遺經血淚流。劬勞慈母，野屋荒棺拋露久。未卜牛眠，何日瀧岡共一阡？

據此，先生之母也死了幾年了，到庚戌還不曾安葬。

第六首云：

閨中人逝，取冷中庭傷往事。買得廚娘，消盡衣邊荀令香。愁來覽鏡，憔悴二毛生兩鬢。欲覓良緣，誰喚江郎一覺眠？

據此，先生之妻也死了。此時只有一妾，尚未續娶。集中有輓外舅葉草牕翁詩云：

> 吳中有耆碩，轉徙淮南地，自號草牕翁，所師儼貫季。愛女適狂生，時人歎高義。……

是先生之妻姓葉，是一個儒醫的女兒。

第八首云：

> 奴逃僕散，孤影尚存渴睡漢。明日明年，蹤跡浮萍劇可憐。秦淮十里，欲買數椽常寄此。風雪喧豗，何日笙歌畫舫開？

這一首前半說的是王鬍子拐了銀子逃走的影子；後半已有移家南京的意思了。末句還是做「歌笙畫舫」的夢！

雍正九，辛亥（一七三一），先生三十一歲。

友人嚴長明生。

雍正十一，癸丑（一七三三），先生三十三歲。二月，移家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

有買陂塘二首，序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諸君子高宴，各賦看新漲二截見贈，余既依韻和之，復爲詩餘二闋，以志感焉。』第一首上半云：

少年時，青谿九曲，畫船曾記遊冶。紼繯雜處閒簫管，多在柳堤月榭。朝復夜，費蜀錦吳綾，那惜纏頭價！臣之壯也，似落魄相如，窮居仲蔚，寂寞守蓬舍。

第二首下半云：

人間世，只有繁華易委，關情固自難已。偶然買宅秦淮岸，殊覺勝於鄉里。饑欲死，也不管干時似淅矛頭米。身將隱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先生又作移家賦，序五百七十二字，賦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可說是他文集中的

第一百作。序中有云：

晏嬰爽塏，先君所置；燒杵掘金，任其易主。百里鶩此艋艇，一日達於白下。……梓家本青華，性耽揮霍。生值承平之世，本無播遷之變。乃以鬱伊既久，薪纆成疾。鳥將東徙，渾未解於更鳴；烏巢南枝，將覺托於戀懷。……雖無揚意之薦達之天子，桓譚之賞傳於後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千戶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獨文梓焉。追爲此賦，歌以永言。悲切怨憤，涕漣流沫。……

全賦先敘吳氏遠祖，次寫他的高祖，次寫曾祖弟兄，次寫曾祖，次寫曾祖以下五十年的家門盛況，次寫他的父親，次寫父死後家門不振的狀況。（以上略引見前篇。）次寫全椒鄉土風俗的澆薄：

彼瓦郎與列肆，乃販脂而削脯；既到處而輒留，能額瞬而目語。魚鹽豫絲，齒革毛羽；……漉沙搏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遷

其地而仍良，皆雜處於吾土。山魈入面，窮奇鑿牙；細旃廣廈，錦帷瓊軒。馬首之金匼帀，腰間之玉辟邪。……昔之列戟鳴珂，加以紫標黃榜，莫不低其顏色，增以悽愴；口囁嚅而不前，足盤辟而欲往。……

儒林外史裏的宋爲富，萬雪齋，方老六，彭老五，大概都在這一段裏了。以下一長段，寫他自己：

梓少有六甲之謡，長餘四海之心。推雞坊而爲長，戲鵝欄而忿深。嗟早年之集蓼，託毀室於冤禽。淳于恭之自箠不見，陳太邱之家法難尋。熏爐茗椀，藥臼霜碪；竟希酒聖，聊託書淫；句鍛季鍊，月弄風吟。談諧不爲塞默，交遊不入僉壬。……有瑰意與琦行，無捷徑以窘步；吾獨好此姱修，乃衆庶之不譽。……閉戶而學書空，叩門而拙言辭。至於眷念鄉人，與爲游處，假以水而致蠅，若以貍而致鼠。見幾而作，逝將去汝！……既而名紙毛生，進退維谷。歎積案而成箱，亦連篇而累牘，譾

濟發於巧心，終受欺於拙目。鬼嗤謀利之劉龍，人笑苦吟之周朴。竟有造詩而不報，或至對賓而杖僕。誰爲倒屣之迎？空有濺鹽之辱。……五世長者知飲食，三世長者知被服。彼錢癖與賓精，枉秤珠而量玉。遂所如而齟齬，困窮途而悉痡。……

全椒人只曉得他是一個敗子，不認得他是一個名士。故他最不滿意於他的本鄉人。外史中借五河縣來痛罵他的本縣。（看第四十七回。）他所以要離開鄉土，寄居南京，大半也是由於他厭惡全椒人的心理。

雍正十二，甲寅（一七三四），先生三十四歲。

有除夕乳燕飛詞：

令節窮愁裏，念先人生兒不孝，他鄉留滯。風雪打牕寒徹骨，冰結秦淮之水。自昨歲移居住此。三十諸生成底用？賺虛名，浪說攻經史！捧巵酒，淚痕滓。家聲科第從來美。嘆顛狂，齊竽難合，胡琴空碎。數畝

田園生計好，又把膏腴輕棄。應媿煞穀貽孫子。倘博將來椎牛祭，總難酬罔極恩深矣，也略解，此時恥。

此詞寫他的懺悔，見解卻不甚高明。

雍正十三，乙卯（一七三五），先生三十五歲。

是時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辭」的學者。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先生三十六歲。三月，安徽巡撫趙國麟考取先生，行文到全椒，取具結狀，將正式薦舉他入京應博學宏辭的考試。先生病了，不能上路，才作罷（文集唐時琳序。）先生從此不應鄉舉考試。（程晉芳作的傳。）

儒林外史寫杜少卿裝病辭薦辟（第三十三回），全椒志（十，頁四七）也說他「乾隆間以博學鴻詞徵，辭不就」。程晉芳給他作傳，說，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

這三種說法，都不很確實。我只採取唐時琳的序，因為他當時做江寧教授，又是推薦吳敬梓的人，他說的話應該最可靠。况且唐序又說，

> 兩月後，敏軒病愈，至余齋。……余察其容憔悴，非託為病辭者。……

况且先生自己有丙辰除夕述懷詩，也說，

> 相如封禪書，仲舒天人策。夫何採薪憂，遂為連茹阨！人生不得意，萬事皆愬愬。有如在網羅，無由振羽翮。

可見他的病是真病，不是裝病。當時他還很歎惜他因病不得被薦。事後追思，落得弄真成假，說，

> 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外史三十四回。）

我這樣說法，並不是要降低吳敬梓的人格。做秀才希望被薦做博學鴻詞，這也算不得什麼卑鄙的事。現在文木山房集裏，賦中有正聲感人賦，題下注「撫院

取博學鴻詞試帖』;又有繼明照四方賦,下注『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詩中有試帖詩三首,下分注『督院』『撫院』『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可見吳先生自己並不諱飾他曾去應考省中博學鴻詞的考試;又可見他確然覺得這是做秀才的一場很光榮的結局。至於程晉芳說趙國麟『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那是錯的。趙國麟後來並不曾薦他。杭世駿的詞科掌錄記趙國麟保舉的,只有文木集中(卷三,頁三)說的江若度梅淑伊李岑森三人,而沒有吳敬梓的名字。這是鐵證。

是年詞科被薦者,有先生的從兄吳檠(字青然,號岑華,有咫聞齋詩鈔,陽局詞鈔,清耳珠談等書;即外史中的杜愼卿。)和友人程廷祚,(綿莊,即外史中的莊徵君。)皆不第,程晉芳作程廷祚的墓誌銘,說:

> 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

之。卒不仕，亦竟試不用，歸江寧。（勉行堂文集卷六）

這一件事，可與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大學士太保公一節參看。

文木集有減字木蘭花詞一首，注云：

識舟亭阻風，喜遇朱乃吾，王道士崑霞。

詞云：

卸帆臨下，一帶江城渾似畫。羽客凭闌，指點行舟杳靄間。　故人白首，解贈青銅沽濁酒。話別怱怱，萬里連檣返照紅。

這就是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在識舟亭遇來霞士和韋四太爺的一件故事。

乾隆二，丁巳（一七三七），先生三十七歲。

先生有關於詞科的詩幾篇。一篇酬青然兄，中有云：

兄昔膺薦牘，驅車赴長安，待詔三殿下，簪筆五雲端。月領少府錢，朝賜大官餐。卿士交口言，『屈宋堪衙官』！如何不上第，蕉萃歸江

干？酌酒呼弟言，『卻聘爾良難』！……

這是杜少卿不滿意於杜慎卿的口氣了。

又有貧女行二首：

蓬鬢荊釵黯自羞，嘉時曾以禮相求。自緣薄命辭徵幣，那敢逢人怨蹇修？

阿姊居然買佩蘭！踏歌連臂曲初殘。歸來細說深宮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這似乎也是嘲玩杜慎卿的詩。

趙國麟原取四人，吳敬梓因病作罷，餘三人入京應試。試畢，三人中之李岑森病死在京。先生因作傷李秀才詩，大有『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之意。（詩不佳，不錄。）那時詞科落第的一些名士，紛紛回南，演出種種醜態；先生冷眼旁觀，格外覺悟了。所以他又作美女篇：

爽光與修明，豔色天下殊。一朝入吳宮，權與人主俱。不妬比盡斯，妙選聘名姝。紅樓富家女，芳年春華敷。頭上何所有？木難間珊瑚。身上何所有？金縷繡羅襦。佩間何所有？環珮皆瑤瑜。足下何所有？龍縞覆氍毹。歌舞君不顧，低頭獨長吁。遂疑入宮娭，毋乃此盲謎？何若漢皐女，麗服佩兩珠，獨贈鄭交甫，奇緣千載無？

丁巳以前，先生還有窮秀才氣；丁巳以後，先生覺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了。試看他寧可作自由解珮的漢皐神女，不願作那紅氍毹上的吳宮舞腰：這便是大覺悟的表示了。

是年紀昀生。

乾隆三，戊午（一七三八），先生三十八歲。

有送別曹明湖詩，可考定爲是年作的。因此推知前後諸詩大概也是這時候作的。中有病中憶兄煩一首，前四句云：

自汝辭余去，身遠心不違。有如別良友，獨念少寒衣。

『有如別良友』五個字，沒有人道過。

烺字荀叔，號杉亭，後來成爲一個大算學家，疇人傳四十二有他的傳。他少年時就很聰明，文木集附有他的詩一卷，詞一卷。詩中有三首是他十五歲時做的。怪不得儒林外史三十二回裏婁太爺對杜少卿說，『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他們家已貧了，故吳烺少年時即出門謀生活。文木集還有一首除夕寧國旅店憶兒烺詩，自注云：『兒年最幼，已自力於衣食。』

是年章學誠生，任大椿生。

乾隆四，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三十九歲。

有冀州客舍詩，中有云，『七年興建業，兩度客冀州。細雨僧廬晚，寒花江岸秋。』

有生日內家嬌詞云：

行年三十九，懸弧日酌酒淚同傾。嘆故國幾年，草荒先壟；寄居百里，烟暗臺城。空消受徵歌招畫舫，賭酒醉旗亭。壯不如人，難求富貴。老之將至，羞夢公卿。行吟憔悴久，靈氣告，須歷吉日將行。擬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還重華協帝，陳詞敢秖，有娀佚女，弭節揚靈。恩不甚兮輕絕，休說功名！

這一首詞在詞集的最末。大概這一部文木山房集是編到這一年爲止了。

文木山房集前有黃河一篇序，中說：

余方謀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軒薄遊眞州，可村方先生愛爲同調，遽損囊中金，先我成此盛舉。

又方嶟序云：

敏軒今將薄遊四方，余遂捐篋中金，梓其有韻之文。

這一年先生正在眞州，此集當刻于此年，或下一年。集中無三十九歲以下的詩

詞，正是因此。

乾隆五，庚申（一七四〇），先生四十歲。

是年趙翼生。

全椒志云：

江寧雨花臺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五百餘人。（金和跋作二百三十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復其舊。貲罄，則鬻江北老屋成之。

此事不知在何年。以志有『年四十而產盡』一語，故附於此。

乾隆六，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惠士奇死。

是年吳檠中舉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參看外史三十一回杜慎卿對鮑廷璽說的話。）

先生始見程晉芳，時年二十四。（程晉芳嚴東有詩序。）

程晉芳的族伯祖麗山與先生有姻連。先生在南京，常常絕糧；麗山時時周濟他。程晉芳說：

>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呶，未嘗爲來日計。（文木先生傳。）

這位程麗山，他處無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寫莊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許就是此人。（莊濯江是莊徵君之姪，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晉芳；但程晉芳見先生時，還是二十四歲的少年，而莊濯江四十年前與杜少卿的父親相聚，此時已是『清清疎疎，三綹白鬚』了。）

程晉芳又寫先生的貧狀如下：

> （先生）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口輩五

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文木先生傳。）

汪京門不可考。樊聖□原缺一字，今考定爲樊聖謨。按江寧府志文苑傳：

樊明徵，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於古人禮樂車服，皆考覈而制其器。有受教者，舉器以示之，不徒爲空言也。著書四十餘種，尤詳金石之學。

這自然是外史裏的遲衡山了。

乾隆七，壬戌（一七四二），先生四十二歲。

程晉芳說：

辛酉壬戌間，延（先生）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程家是淮安鹽商，袁枚作程晉芳的墓誌說：

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

先生到程家時，程家尚在這樣興盛的時代。

乾隆九，甲子（一七四四），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姚鼐生，錢坫生，汪中生。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卽是汪中，那是錯的。

乾隆十，乙丑（一七四五），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吳檠中進士。

余蕭客生，武億生。

乾隆十一，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四，己巳（一七四九），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方苞死，黃景仁生。

程晉芳春帆集（起戊辰，盡庚午之二月，故繫於此年）有懷人詩十八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詩云：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魄中南遷。偶遊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颼颼窮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數月之事。）白門三日雨，竈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賞春焉。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這一首詩極有用，因爲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這個時候，──戊辰至庚午（一七四八至一七五〇）──儒林外史已成書了，已有朋友知道了。外史刻本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的一篇序。這個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說序之餘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

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已成書之理。況且那時的吳敬梓只有三十六歲，見解還不曾成熟，還不脫熱心科名的念頭，元年除夕述懷詩可以爲證。那時的吳敬梓決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來！

我們看他對於科第功名的大覺悟，起於乾隆二年以後。（說見上文。）我們可以推測他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之間；到程晉芳作懷人詩時，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吳敬梓是一個八股大家的曾孫，自己也在這裏面用過一番工夫來，經過許多考試，一旦大覺悟之後，方才把八股社會的眞相—醜態—窮形盡致的描寫出來。他是八股國裏的一個叛徒。程晉芳說他

>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

他爲什麽這樣痛恨八股呢？我們在他的詩集裏尋出一篇哭舅氏的詩，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間做的；這詩大可以表出他那時候對於科舉時文的態度：

河干屋三楹，叢桂影便娟，緣以荆棘籬，架以蒿牀眠。南鄰侈豪奢，張燈奏管絃。西鄰精心計，秉燭算緡錢。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殘編。弱冠公諸生，六十猶屯邅。皎皎明月光，揚輝屋東偏。秋蟲聲轉悲，秋藜爛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時遇賓興，力疾上馬韉。夜沽荒店酒，朝銜隔江煙。射策不見收，言歸泣涕漣。嚴冬霜雪凝，偃臥小山巔。酌酒不解歡，飲藥不瘉痊。百憂摧肺肝，抱恨歸重泉。吾母多弟兄，惟舅友愛專。諸舅登仕籍，俱已謝塵緣。有舅操尺度，所持何其堅！士人進身難，底用事丹鉛？昔爲鄉人畏，賤受鄉人憐。寄言名利者，致身須壯年。

他這一位母舅簡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進范進。認得了這一位六十歲『抱恨歸重泉』的老秀才，我們就可以明白吳敬梓發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的時代，八股的勢力並不很大，八股的毒燄並不曾

阻礙經學史學與文學的發達。何以吳敬梓單描寫那學者本來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豈不是俗話說的打死老虎嗎？」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覺得儒林外史的時代不像那康熙乾隆的時代。但我現在明白了。看我這篇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時代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清朝第一個時期的大師，毛奇齡最後死。學問方面，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胡渭都死了。文學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禎也死了。當吳敬梓三十歲時，戴震只有八歲，袁枚只有十五歲，四庫全書的發起人朱筠只有兩歲，汪中姚鼐都還不會出世呢。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八股的氣燄忽然又大盛起來了。我可以引章學誠的話來作證：

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還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

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一七五二——一七五三，當吳敬梓將死的時候，）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章氏遺書卷四，答沈楓墀論學書）（「四書文」即八股時文。）

這正是吳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時代。懂得這一層，我們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價值了。

乾隆十五，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五十歲。

金兆燕有寄吳文木先生詩：

文木先生何嶔崎！行年五十仍書癡。航頭屋壁搜姚姒，簪篛蔑叟訪孔羲。昔歲鶴版下綸扉，嚴徐車馬紛奔馳。蒲輪覓徑過蓬戶，鑿坏而遁人不知。有時倒著白接䍠，秦淮酒家杯獨持。鄉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晚年說詩更鮮匹，師伏翼蕭俱辟易。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

材。三。十。一。。一。言。解。頤。妙。義。出。，凱。風。爲。洗。萬。古。誣。，喬。木。思。擧。百。神。職。。（先生注詩，力闢凱風原註『不能安室』之謬。南有喬木云，祀漢神也。）溝猶瞀儒删鄭衞，何異索塗冥擿埴？昨聞天子坐明堂，欲祡衡霍巡南方，特重經術求賢良，仲讓講義詩兩行。欽明八風舞迴翔。負薪老子露印綬，妻孥竦息趨路旁。先生何爲獨深藏，企脚高臥向栩床？金陵美酒一千斛，鄰鄰素盌潑紅玉。何時與我靑綺裘，共君復醉鍾山麓？申公輭公老且禿，驅之不堪塡硎谷。先生速起爲我折五鹿。秋風多，江水波，寄君一曲之高歌。歌殘星斗橫秋河。屠販唾手亦富貴，安能佐治無偏頗？先生抱經老岩阿，吁嗟如此蒼生何！

詩中說先生『晚年說詩』一段，可與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論詩經一大段參看。全椒志卷十二說先生有詩說七卷。但現在不傳了。我們現在只知道他的五條詩說：

（1）漢廣（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金和儒林外史跋。）

（2）凱風：『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了，那有想嫁之理？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外史）

（3）女曰雞鳴：『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外史）

（4）溱洧：『也只是夫婦同游。』（外史）

（5）爰采唐矣：『爲戴嬀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金和跋）

程晉芳說：

「先生」與余族綿莊（程廷祚）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程廷祚與吳敬梓都是乾嘉經學的先鋒。

乾隆十六，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乾隆帝南巡，先生之子吳烜迎鑾，召試奏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烜習算學，師事劉湘煃。後來吳烜做到甯夏府同知，署過一回知府，因病告歸。他著有周髀算經圖註，乾隆戊子刊成，沈大成作序，序文引見疇人傳。此外還有句股算法，五音反切圖說，杉亭詩文集，詞集。我所見的春華小草一卷，靚粧詞鈔一卷，是他少年時代的詩詞。

是年程廷祚六十一歲，被舉『經明行修』，入京，復報罷。（程晉芳綿莊先生墓誌）

是年嚴長明二十一歲。嚴是江寧人，少年有才名，先生很稱許他。（程晉芳嚴東有詩序）嚴長明的詩集久不傳，近年（一九一一）葉德輝刻出他的詩集十卷，其中歸求草堂詩集六卷，是編年的。辛未年有『吳文敏軒招集文木山房，分詠南史隱逸傳，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賦一首』二篇，又有『過顧氏息廬，和敏軒文韻』一篇。壬申年有『晤程二魚門，有贈』一首，起句云，『昨年傾蓋阜陵

吳，（自注，敏軒丈。）道汝鬟名似「顚」「廚」。』据此，先生識嚴長明，始於辛未。

乾隆十七，壬申（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二歲。

程晉芳到南京鄉試，先生同嚴長明去訪他。嚴愛程詩，爲他作駢體序，千餘言。程自叙，『「風晨雨夕，余三人往來最密也。」』（程嚴東有詩序）嚴贈程詩，有『意氣直凌滄海日，鬚眉如對列仙圖』之句，程有寄懷嚴東有詩，有『今年游江南，快意觀才子』之句。程晉芳寄懷嚴東有詩共三首，第二首專說吳敬梓：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時坐書牖，發詠驚鸝庚。阿郞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烟青。頻蟈雨中眠，晨夕追良朋，孤棹駛煙水，雜花拗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鏤寒氷。西窗驅

念我，餘話秋燈青。（勉行堂詩集五）

此詩可考見先生當時的生活情形。

程晉芳是年又有『聞滁州馮粹中沒於京師，詩以哭之，並告諸友，謀歸其輿』一詩。滁州馮粹中卽是儒林外史中的處州馬純上。程詩第一首有云：

海上松期方本幻，（原注，『馮曾遇假仙於浙水』）塚中文字傑猶騰。

此可證外史第十五回馬二先生遇洪憨仙的事。程詩第二首有『涇流渭水濁兼清』之語，又有『俠魄』之稱，可以考見馮粹中雖只是一個八股選家，確是濁中有清，確有一點俠氣，可以使程晉芳吳敬梓一班名士恭敬他。吳敬梓雖痛恨八股文家，但他對於馬二先生，刻畫儘管盡致，卻始終是褒詞多於貶詞。這也可見馮粹中的人格，又可見吳敬梓的公允了。（金兆燕棕亭詩鈔卷七也有哭馮粹中一詩。）

乾隆十九，甲戌（一七五四），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揚州，遇程晉芳。程家本很富，那幾年鹽務大虧耗，晉芳又不能治生產，家遂貧。（參看袁枚作的墓誌。）晉芳自敘此會，說：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卽景悵悵，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

據此，是先生死於十月十四日。但金兆燕是當日親見先生死的人，他說是「孟冬晦前夕」，是十月二十九日。我們似當信金說。

程晉芳記云：

先數日，裒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祗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

同年王又曾穀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於江寧。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儒林外史評引）有「書吳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句，序云：

　慕文木名數年不得見。乾隆甲戌，始相見於揚州館驛前舟中。其夕郎無疾而終。

那時金兆燕在揚州，和先生往來最密，並且親見先生臨死的情形。他有「甲戌仲冬送吳文木先生旅櫬於揚州城外登舟歸金陵」長詩一篇，我們全鈔於此：

　寒霜棲城闉，白日照江湄。送君登孤舟，千載從此辭。布帆乘風張，一縷驚驃馳。三號不可見，我行將安之？自我來蕪城，旅舍極苦飢。客中遇所親，歡若龍鸞罷。我居徐寧門，君躡后土祠，昕夕相過從，風雨無愆期。峨峨瓊花臺，鬱鬱冬青枝，與君攀寒條，淚下如連絲。憤來擅短狭，作達靡不爲：金尾戲新婦，（吳一山納妾，招同飲。）碧觀尋髡

縉；（石莊上人寓碧天觀，屢同訪之。）飽喫『肉笑靨』，酣引『玉練槌』；櫃坊與茶閣，到處隨狂嬉。藪藪賈人子，廣廈擁厚貲，牢盆牟國利，質庫朘民脂；高樓明月中，笙歌如沸糜。誰識王朋歎，齋鐘愧闍黎？嗟哉末俗頹，滿眼魍魎魑。執手渺萬里，對面森九嶷。丈夫抱經術，進退觸藩羝。於世旣不用，窮餓乃其宜。何堪伍羣小，顛倒肆詆欺！先生豁達人，餔糟而歠醨。小事聊糊塗，大度乃滑稽。安所庸芥蔕，且可食蛤蜊。逝將買扁舟，卒歲歸茅茨。梅花映南榮，曝背樂無涯。小子聞斯言，背面揮涕洟。未見理歸裝，已愁臨路歧。誰知近死別，乃與悲生離。孟冬晦前夕，寒風入我帷。獨客臥禪關，昏燈對牟尼。忽聞叩門聲，奔馳且驚疑。中衢積寒冰，怒芒明參旗。踉蹌至君前，瞪目無一詞。左右為余言，頃刻事太奇：今晨飽朝餐，雄談盡解頤；乘暮觴客歸，呼奴酹一巵；薄醉遂高眠，自解衫與綦。安枕未終

食，殄瘁如流澌；年七不及投，撒手在片時。幼子哭牀頭，痛若遭鞭笞。作書與兩兄，血淚紛淋漓。仲兄其速來，待汝視楄柂。伯兄聞赴奔，何日發京師？擗踊如壞牆，見者爲酸嘶。燕也骨肉親，能不摧肝脾！憶昔丱髫年，殘燭同裁詩。每言攡鳳聲，定不儕伏雌。歲月何飄忽，逝景不可追。蹭蹬一無成，于時鈍如錐。負米無長策，高堂艱晨炊。四海誠茫茫，舉足皆賊陂。奔走困飢寒，慚彼壹宿離。義君解致衰，萬事擲若遺。著書壽千秋，豈在骨與肌？江山孫伯符，風月鄒僧施。生平愛秦淮，吟魂應戀茲。一笑看凌雲，橫江天四垂。

（三）後記

先生有子三人，（金詩，又程傳。）長即吳烜，餘二子不可考。

先生所著的書，全椒志載有

詩說　七卷，

文木山房詩文集　十二卷，

儒林外史　五十卷。

金和跋儒林外史，說：

詩說七卷。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鈔本，亂後遺失。）是書（儒林外史）爲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敎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旣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宜删之。

金和的話也有小錯。（1）詩文集有兩本：先生四十歲左右曾刻過一本，凡賦一卷，詩二卷，詞一卷，共四卷；後附吳烺詩詞各一卷。此本無先生四十歲以後的詩詞。此外尚有一種全集，即全椒志所記之十二卷本。王又曾書文木山房詩集後十首之一云：

古風慷慨邁唐音，字字廣全月食心。但誣父師專制舉，此言便合鑄黃金。

原注云：

『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詩中句也。

這兩句極有關係的詩，我的一部文木山房集裏竟沒有。可見此本不曾收先生晚年的詩。(2)無論詩文集四卷或十二卷，這都是偶數，金和『先生著書皆奇數』的通則，已不能成立了。況且儒林外史原本止有五十卷，程晉芳和金榆志都是如此說的。同治年間的六十回本固是後人增加的；五十六回本的末一回，確如金和所說，是後人增加的；餘下的五十五回之中，大概還有後人增加的五回。

金和說，儒林外史是金兆燕做揚州府教授時刻板印行的。金兆燕於乾隆三十三年做揚州府教授，直做到乾隆四十四年（一七六八——一七七九）。這部書當是這十年內刻的，是為初刻本。初刻本和原稿本有什麼異同，初刻本是否五十回，這兩個

問題我們都不能解決了。現存的最古本是嘉慶丙子（一八一六）的五十六回本（就是汪原放君這一次標點的底本）。到了七十年後，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的補本出現，方添了四回，敍沈瓊枝的事，共六十回。

詩說七卷，大概先生死時尚無刻本，故王又曾詩有『詩說紛紛妙注箋，好擬棗木急流傳』的話。不知後來有無刻本。

關於儒林外史的書，有下列的各種：

儒林外史評二卷。此書是天目山樵的評語和當塗黃小田的評語合刻的，有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刻書者當塗黃安謹的序。

（2）儒林外史評語。南匯張文虎嘯山著。未見。朱記榮行素堂目覩書錄丙四十二載有此書。

本篇的參考書舉要：

（1）吳敬梓，文木山房集四卷，附吳烺詩詞各一卷。有上海唐時琳，會昌吳湘皋，上元程廷祚，儀徵方嶟，江寧黃河，江都李本宣，山陰沈宗淳的七篇序。以方黃二序考之，是書大概刻於乾隆五年左右。

（2）程晉芳，勉行堂全集，詩二十四卷，文六卷。嘉慶戊寅（一八一八）刻。

（3）嚴長明，嚴東有詩集十卷。宣統辛亥（一九一一）長沙葉德輝刻。

（4）金兆燕，國子先生全集，古文十卷，駢文八卷，詩鈔十八卷，詞鈔七卷。道光丙申（一八三六）刻。

（5）全椒縣志十六卷。民國九年排印。

此外如疑年錄四種，明清進士題名錄等，不備舉了。

十一，十二，三。

西遊記考證

民國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遊記序，當時搜集材料的時間甚少，故對於考證的方面很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這一年之中，承許多朋友的幫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閒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證，先在讀書雜誌第六期上發表。當時又為篇幅所限，不能不刪節去一部分。這回西遊記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遊記序和考證合併起來，成為這一篇。

（一）

西遊記不是元朝的長春眞人邱處機作的。元太祖西征時，曾遣使召邱處機赴軍

中，處機應命前去，經過一萬餘里，走了四年，始到軍前。當時有一個李志常記載邱處機西行的經歷，做成西遊記二卷。此書乃是一部地理學上的重要材料，並非小說。

小說西遊記與邱處機西遊記完全無關，但與唐沙門慧立做的慈恩三藏法師傳（常州天甯寺有刻本）和玄奘自己著的大唐西域記（常州天甯寺有刻本）却有點小關係。玄奘是中國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二十六歲立志往印度去求經，途中經過了無數困難，出遊十七年，（六二八——六四五）經歷五十多國，帶回佛教經典六百五十七部。歸國之後，他着手翻譯，於十九年中，（六四五——六六三）譯成重要經論七十三部，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參看改造四卷一號梁任公先生的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慧立為他做的傳記，——大概是根據於玄奘自己的記載的——寫玄奘的事蹟最詳細，為中國傳記中第一部大書。傳中記玄奘的家世和求經的動機如下：

玄奘，俗姓陳，緱氏人。兄弟四人，他第四。他的二哥先出家，教他

誦習經業。他後來也得出家，與兄同居一寺。他遊歷各地，訪求名師，講論佛法，後入長安，住大覺寺。他『旣遍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幷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

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後來途中有謝高昌王的啓，中有云：

……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乖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决。玄奘……負笈從師，年將二紀，……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雖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這個動機，不幸被做西遊記的人完全埋沒了。但傳中說玄奘路上經過的種種艱難困

害，乃是西遊記的種子。我們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國政尙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出）玉門關，……孑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

第一烽與第四烽的守者待他還好，放他過去。下文云：

從此已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汚，愍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下文又云：

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下字作『取下來』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

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穌息，得少睡眠……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穌息。……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

這種記叙，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狀況，又符合宗教經驗的心理，眞是極有價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後，即到伊吾。高昌國王麴文泰聞知他來了，即遣使來迎接。玄奘到高昌後，國王款待極恭敬，堅留玄奘久住國中，受全國的供養，以終一身。玄奘堅不肯留，國王無法，只能用強力軟禁住他，每日進食，國王親自捧盤。

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給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

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從此以後，玄奘便是『闊留學』了。這一段事，記高昌王與玄奘結拜爲兄弟，又爲他通書于當時鎮服西域的突厥葉護可汗，書中也稱玄奘爲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資格旅行各國。這一點大可注意。西遊記中的唐太宗與玄奘結拜爲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資格西行，這一件事必是從高昌國這一段因緣脫胎出來的。

（二）

以上略述玄奘取經的故事的本身。這個故事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件極偉大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的傳播，和一切大故事的傳播一樣，漸漸的把詳細節目都丟開了，都『神話化』過了。況且玄奘本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他的遊記裏有許多事實，如沙漠幻景及鬼火之類，雖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釋，在他自己和別的信徒的眼裏

自然都是『靈異』，都是『神蹟』。後來佛教徒與民間隨時逐漸加添一點枝葉，用奇異動人的神話來代換平常的事實，這個取經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話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師傳中一段說：

>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汚，愍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這一段話還合於宗教心理的經驗，然而宋朝初年（西歷九七八）輯成的太平廣記，引獨異志及唐新語，已把這一段故事神話化過了。太平廣記九十二說：

>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誤）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

〔多〕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我們比較這兩種紀載，可見取經故事『神話化』之速。太平廣記同卷又說：

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卽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為摩頂松。

這正是西遊記裏玄奘說的『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卽回來』（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話的來源了。這也可證取經故事的神話化。

歐陽修于役志說：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飮壽寧寺（揚州）。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圬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南唐建國離開玄奘死時不過二百多年，這個故事已成爲畫壁的材料了。我們雖不知此畫的故事是不是神話化了的，但這種記載已可以證明那個故事的流傳之遠。

（三）

民國四年，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此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個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爲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參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爲南宋「說話」的一種。書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題目，頗似後世小說的回

目。書中有詩有話，故名『詩話』。今鈔十七章的目錄如下：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第十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我們看這個目錄，可以知道在南宋時，民間已有一種唐三藏取經的小說，完全是神話的，完全脫離玄奘取經的眞故事了。這部書確是西遊記的祖宗。內中有三點，尤可特別注意：

(1)猴行者的加入。

(2)深沙神爲沙和尚的影子。

(3)途中的妖魔災難。

先說猴行者。取經詩話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駕弟子了。第二節說：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謹愼。』……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尙：『萬福，萬福！和尙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僧奉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敎，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尙生前兩迴去取經，中路遭難。此迴若去，千死萬死。』法師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万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尙取經。此去百万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當時有玄奘『生前兩迴取經，中路遭難』的神話。(2)猴

行者現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為水簾洞了。(4)「八万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一句，初讀似不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此句當解作「八万四千個獼猴之王」。(說詳下章)

第三章說猴行者曾「九度見黃河清」。第十一章裏，他自己說：

> 我八百歲時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喫了，至今二万七千歲不曾來也。

法師曰：

> 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喫。

猴行者曰：

> 我因八百歲時偷喫十個，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

這一段自然是西遊記裏偷吃蟠桃的故事的來源，但又可見南宋「說話」的人把猴行

者寫的頗知畏懼，而唐僧卻不大老實！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終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來了。

說由未了，攧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師曰，『可去尋取來喫。』猴行者卽將金鐶杖向盤石上敲三下，乃見一個孩兒，面帶青色，爪似鷹鸇，開口露牙，向池中出。行者問，『汝年幾多？』孩曰，『三千歲。』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見一孩兒，面如滿月，身掛繡纓。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歲。』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數下，偶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鐶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尙，『你喫否？』和尙聞語心驚，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枚乳棗，當時吞入口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

這時候，偷蟠桃和偷人參果還是一件事。後來西遊記從此化出，分作兩件故事。

上段所說『金鐶杖』，乃是第三章裏大梵天王所賜。行者把唐僧帶上大梵天王宮中赴齋，天王及五百羅漢請唐僧講法華經，他『一氣講完，如瓶注水』。大梵天王因賜與猴行者『隱形帽一事，金鐶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這三件法寶，也被西遊記裏分作幾段了。（詩話稱天王為北方毗沙門大梵天王。這是『托塔天王』的本名，梵文為 Vai'sravana，可證此書近古。）

詩話第八章，不幸缺了兩頁，但此章記玄奘遇深沙神的事，確是後來沙僧的根本。此章大意說玄奘前身兩世取經，中途都被深沙神喫了。他對唐僧說：『項下是和尚兩度被我喫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尚說：『你最無知。此回若不改過，教你一門滅絕。』深沙合掌謝恩：『伏蒙慈照！』深沙當時哮吼，化了一道金橋，深沙神身長三丈，將兩手托定，師行七人便從金橋上過，過了深沙。深沙詩曰：

一墮深沙五百春，渾家眷屬受災殃。金橋手托從師過，乞荐幽神化却

身。

法師詩曰：

兩度曾經汝喫來，更將枯骨問无才。而今赦汝殘生去，東土專心次第排。

猴行者詩曰：

謝汝回心意不偏，金橋銀線步平安。回歸東土修功德，薦拔深沙向佛前。

西遊記第八回說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時，「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閒時拿來頑耍。」這正是從深沙神一段變出來的。第二十二回，木吒把沙和尚項下掛的骷髏，用索子結作九宮，化成法船，果然穩似輕舟，浪靜風平，渡過流沙河。那也是從詩話裏的金橋銀線演化出來的。不過

在南宋時，深沙的神還不曾變成三弟子之一。豬八戒此時連影子都沒有呢。

次說詩話中敘玄奘路上經過許多災難，雖沒有『八十一難』之多，却是『八十一難』的縮影。第四章猴行者說：

我師莫訝西路寂寥；此中別是一天。前去路途盡是虎狼蛇兎之處。逢人不語，万種恓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

全書寫這些災難，寫的實在幼稚，全沒有文學的技術。如寫蛇子國：

大蛇小蛇，交雜無數，擾亂紛紛。大蛇頭高丈餘，小蛇頭高八尺，怒眼如燈，張牙如劍。

如寫獅子林：

只見麒麟迅速，獅子崢嶸，擺尾搖頭，出林迎接，口銜香花，皆來供養。

這種淺薄的敘述可以使我們格外賞歎明清兩朝小說技術的驚人的進步。

我們選錄詩話中比較有趣味的一段——火類坳頭的白虎精：

……只見嶺後雲愁霧慘，雨細交霏。雲霧之中，有一白衣婦人，身掛白羅衣，腰繫白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蓮，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見，高聲便喝：「想汝是火類坳頭白虎精，必定是也！」婦人聞語，張口大叫一聲，忽然面皮裂皺，露爪張牙，擺尾搖頭，身長丈五。定醒之中，滿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將金鐶杖變作一個夜叉，頭點天，腳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藍靛青，髮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當時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敵，被猴行者戰退。半時，遂問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個老獼猴。」虎精聞說，當下未伏，一叫獼猴，獼猴在白虎精肚內應，遂教虎開口吐出一個獼猴，頓在面前，身長丈二，兩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

曰，「汝肚內更有一個。」再令開口，又吐出一個，頓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個老獼猴，今日吐至來日，今月吐至來月，今年吐至來年，今生吐至來生，也不盡。」白虎精聞語，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團大石，在肚內漸漸會大；教虎精吐出，開口吐之不得，只見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渾門大殺，虎精大小粉骨塵碎，絕滅除蹤。

西遊記裏的孫行者最愛被人吃下肚裏去，這是他的拿手戲，大概火燄坳頭的一個暗示，後來也會用分身法，越變越奇妙有趣味了。我們試看孫行者在獅駝山被老魔吞下肚去，在無底洞又被女妖吞下去；他又住過鐵扇公主的肚裏，又住過黃眉大王的肚裏，又住過七絕山稀柿衕的紅鱗大蟒的肚裏。巧妙雖各有不同，淵源似乎是一樣的。

以上路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大概。這一本小冊子的出現，使我們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這種完全神話化了的取經故事；使我們明白西遊記小說——同水滸三國一樣——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歷史：這眞是可寶貴的文學史料了。

（四）

說到這裏，我要退回去，追叙取經故事裏這個猴王的來歷。何以南宋時代的玄奘神話裏忽然插入了一個神通廣大的猴行者？這個猴子是國貨呢？還是進口貨呢？

前不多時，周豫才先生指出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中選的西遊記四齣，中有兩齣提到『巫枝祇』和『無支祁』。定心一齣說孫行者『是驪山老母親兄弟，無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國一齣說：

似摩騰伽把阿難攝在瑤山上，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枝祁把張僧拏在龜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眞僧，如今佳人個個要尋和尚。

周先生指出，作西遊記的人或亦受這個巫枝祁故事的影響。我依周先生的指點，去尋這個故事的來源。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李湯條下，引古岳瀆經第八卷云：

>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因鴻濛氏，章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靑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這個無支祁是一個『形若猿猴』的淮水神，詞源引太平寰宇記，說略同。周先生又指出朱熹楚辭辨證天問篇下有一條云：

> 此間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

據此，可見宋代民間又有『僧伽降無之祈』的傳說。僧伽爲唐代名僧，死於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他住泗州最久，淮泗一帶產生許多關于他的神話。（宋高僧傳十八，神僧傳七。）降無之祈大概也是淮泗流域的僧伽神話之一，到南宋時還流行民間。

但上文引曲詞裏的無支祁，明是一個女妖怪，他有『把張僧拏在龜山上』的神話。龜山卽是無支祁被鎖的所在，大概這個無支祁，無論是古的今的，男性女性，始終不曾脫離淮泗流域。這是可注意的第一點，因爲西遊記小說的著者吳承恩（見下章）是淮安人。第二，宋高僧傳十八說，唐中宗問萬迴師，『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僧伽傳說他有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木叉多顯靈異，唐僖宗時，賜謚曰眞相大師，塑像侍立於僧伽之左，若配饗焉。傳末又說『慧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傍』。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因爲在西遊記裏，惠岸和木叉已併作一人，成爲觀音菩薩的大弟子了。第三，無支祁被禹鎖在龜山足下，後來出來作怪，又有被僧伽（觀音菩薩化身）降伏的傳說；這一層和取經神話的猴王，

和西遊記的猴王，都有點相像。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確曾從無支祈的神話裏得着一點暗示，也未可知。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

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從中國傳說或神話裏演化出來的。但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因爲太平廣記和太平寰宇記都根据古岳瀆經，而古岳瀆經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書。宋元的僧伽神話，更不消說了。因此，我依着鋼和泰博士(Baron A. von Staë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Rāmāyana）裏尋得一個哈奴曼（Hanumān），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影了。

拉麻傳大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紀的是阿約爹國王大剎拉達的長子，生有聖德和神力；娶了一個美人西妲爲妻。大剎拉達的次妻聽信了讒言，離間拉麻父子間的愛情，把拉麻驅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麻在客中，遇着女妖蘇白，蘇

白愛上了拉麻，而拉麻不保他。這一場愛情的風波，引起了一場大鬥爭。蘇白大敗之後，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凡納，把西妲的美貌說給他聽，拉凡納果然動心，駕了雲車，用計賺開拉麻，把西妲刼到楞伽去。

拉麻失了他的妻子，決計報仇，遂求救於猴子國王蘇格利法。猴子國有一個大將，名叫哈奴曼，是天風的兒子，有絕大神通，能在空中飛行，他一跳就可從印度跳到錫蘭（楞伽）。他能把希瑪拉耶山拔起背着走。他的身體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臉放金光，尾長無比。他替拉麻出力，飛到楞伽，尋着西妲，替他們傳達信物。他往來空中，偵探敵軍的消息。

有一次，哈奴曼飛向楞伽時，途中被一個老母怪（Su-rasā）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這個老魔的肚子裏，心生一計，把身子變的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變大，後來越變越大，那妖怪的嘴張開竟有好幾百里闊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變的極大時，忽然把自己身子縮成拇指一般小，從肚裏跳上來，不從嘴裏

出去，卻從老魔的右耳朵孔裏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飛到希瑪拉耶山（剛大馬達山）中去訪尋仙草，遇着一個假裝隱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納的叔父受了密計來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殺了池子裏的一條鱷魚，從那鱷魚肚裏走出一個受謫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備喀拉的詭計，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着一條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體從希瑪拉耶山一直摔到錫蘭島，不偏不正，剛剛摔死在他的姪兒拉凡納的寶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納決鬥，被拉凡納們用計把油塗在他的猴尾巴上，點起火來，那其長無比的尾巴就燒起來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他們不但沒有燒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殺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敵人的都城楞伽燒完了。

我們舉這幾條，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但不能多舉例了。哈奴曼保護拉麻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敵人，奪回西妲，陪他們凱旋，回到阿約爹國。拉麻凱旋之後，感謝哈奴曼之功，賜他長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陶生（John Dowson）在他的印度古學詞典裏（頁一一六）說：「哈奴曼的神通事蹟，印度人從少至老都愛說愛聽的。關於他的繪畫，到處都有。」除了拉麻傳之外，當第十世紀和第十一世紀之間（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奴曼傳奇」（Hanumān Nāṭaka）出現，是一部專記哈奴曼奇跡的戲劇，風行民間。中國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除上引許多奇跡外，還有兩點可注意。第一，取經詩話裏說，猴行者是『花果山紫雲洞八万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國。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與哈奴曼的身分也很相近。第二，拉麻傳裏說哈奴曼不但神通廣大，並且學問淵深；他是一個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經詩話裏的猴行者初見時乃是一個白衣秀才，也許是這位文法大家墮落的變相呢！

（五）

現在我可以繼續敍述宋以後取經故事的演化史了。

金代的院本裏有唐三藏之目，但不傳於後。元代的雜劇裏有吳昌齡做的唐三藏西天取經，亦名西遊記。此書見於也是園書目，云四卷；曹寅的楝亭書目（京師圖書館抄本）作六卷。這六卷的西遊記當乾隆末年納書楹曲譜編纂時還存在，現在不知尙有傳本否。納書楹曲譜中選有下列各種關於西遊記的戲曲：

唐三藏　一齣：『回回』。（續集二）

西遊記　六齣：『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續集三）

又西遊記　四齣：『餞行，定心，揭鉢，女國』。（補遺）

俗西遊記　一齣：『思春』。

我們看這些有曲無白的詞曲，實在不容易想像當日的原本是什麼樣子了。唐三藏一

齣，當是元人的作品。但我們在這一齣裏，只看見一個西夏國的回回皈依頂禮，不能推想全書的內容。只有末段臨行時的曲詞說：

　　俺只見黑洞洞征雲起，更那堪昏慘慘霧了天日！願恁個大唐師父取經回，再沒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從末句裏可以推想全書中定有『外道邪魔』的神話分子了。

　　吳昌齡的六本西遊記不知是納書楹裏選的這部唐三藏，還是那部西遊記。我個人推想，唐三藏是元初的作品，而吳昌齡的西遊記却是元末的作品，大概即是納書楹裏還有十齣的那部西遊記。我的理由有幾層：

　　(1)這部西遊記曲的內容很和西遊記小說相接近。焦循劇說卷四說：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小異就是無大異。今看西遊記曲中，『撇子』一折寫殷夫人把兒子拋入江中，『認子』一折寫玄奘到江州衙內認母，『餞行』一折寫玄奘出

發，『定心』一折寫緊箍咒收伏心猿，『伏虎』『女還』二折寫行者收妖救劉大姐，『女國』一折寫女國王要嫁玄奘，『借扇』一折寫火燄山借扇：都是和西遊記小說很接近的。『揭鉢』一折雖是演義所無，但周豫才先生說『火燄山紅孩兒當即由此化生』，是很不錯的。十折之中，只有『胖姑』一折沒有根據。但我們很可以假定這十折都是焦循說的那部『與西遊記小說小異』的吳昌齡西遊記了。

(2)吳昌齡的西遊記曲，頗有文學的榮譽。虎口餘生(鐵冠圖)的作者曹寅曾說：

吾作曲多效昌齡，比于臨川之學董解元也。(見棟亭劇說四。)

我們看納書楹所引十折，確然都很有文學的價值。最妙的是『胖姑』一折，全折曲詞雖是從元人睢景臣的漢高祖還鄉(看讀書雜志第四期末欄)脫化出來的，但命意措詞都可算是青勝於藍。此折大概是借一個鄉下胖姑

的口氣描寫唐三藏在一個國裏受參拜頂禮臨行時的熱鬧狀況。中說：

（一綹兒麻）不是俺胖姑兒心精細，則見那官人們簇擁着一個大擺槌。那擺槌上天生有眼共眉。我則道，匏子頭，葫蘆蒂：這個人兒也忒煞蹺蹊！恰便似不敢道的東西，枉被那旁人笑恥。

……………

（新水令）則見那官人們腰屈共頭低，喫得個醉醺醺腦門着地；咿咿嗚，吹竹管；撲冬冬，打着牛皮。見幾個回回，笑他一會，鬧一會。

……………

（川撥棹）好教我便笑微微，一個漢，木雕成兩個腿；見幾個武職，他舞着面旌旗，忽刺刺口裏不知他說個甚的，粧着一個鬼：——人多，我也看不仔細。

這種好文字，怪不得曹楝亭那樣佩服了。這也是我認這部曲為吳昌齡原作的一個重要理由。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如果納書楹裏保存的西遊記殘本真是吳昌齡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說，元代已有一個很豐富的西遊記故事了。但這個故事在戲曲裏雖然已很發達，有六本之多，為元劇中最長的戲（西廂記只有五本）。然而這個故事還不曾有相當的散文的寫定，還不曾成為西遊記小說。當時若有散文西遊記，大概也不過是在取經詩話與今本西遊記之間的一種平凡的『話本』。

錢曾也是園書目記元明無名氏的戲曲中，有『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一本，這也是猴行者故事的一部分。大概此類的故事，當日還不曾有大規模的定本，故編戲的人可以運用想像力，敷演民間傳說，造為種種戲曲。那六本的西遊記已可算是一度大結集了。最後的大結集還須等待一百多年後的另一位姓吳的作者。

（六）

我前年做西遊記序，還不知道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只能說：「西遊記小說之作必在明朝中葉以後」，「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見小說考證卷二，頁七六，引山陽丁晏的話，說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西遊記是淮安嘉靖中歲貢生吳承恩作的。小說考證收的材料最濫，但丁晏是經學家，他的話又是根據淮安府志的，所以我們依着他的指引，去訪尋關於吳承恩的材料。現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許多材料鈔給我，轉錄於下：

（天啓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數奇，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丘少司徒匯而刻之。

〔又同書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口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與天啓志悉同。

〔同治山陽縣志十二，人物二〕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工書。嘉靖中歲貢生（查選舉志亦不載何年），官長興縣丞。英敏博洽，爲世所推。一時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貧無子，遺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綱收拾殘缺，分爲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陳文燭爲之序，名曰射陽存稿，又續稿一卷，蓋存其什一云。

〔又十八，藝文〕吳承恩：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

光緒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一，又卅八，藝文，所載與上文悉同。

又山陽志五，職官一，明太守條下云：『黃國華，隆慶二年任。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進士，隆慶初任。邵元哲，萬曆初任。』

焦循劇說卷五引阮葵生茶餘客話云：

舊志稱吳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今不知『雜記』爲何書。惟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遊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皆樂道之。按射陽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童孺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游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秘訣，亦鑿矣。（此條今通行本茶餘客話不載。）

周先生考出茶餘客話此條係根据吳玉搢的山陽志遺卷四的，原文是：

天啓舊志列先生爲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初不知雜記爲何等書。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爲先生著。考西遊記舊稱爲證道書，謂其

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係其國初邱長春眞人所撰。而鄉志謂出先生手。天啓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意長春初有此記，至先生乃爲之通俗演義；如三國志本陳壽，而演義則稱羅貫中也。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或云有後西遊記，爲射陽先生撰。

吳玉搢也誤認邱長春的西遊記了。邱長春的西遊記，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紀行程的地理書，和此書絕無關係。阮葵生雖根据吳說，但已不信長春眞人的話，大概乾隆以後，學者已知長春眞人原書的性質，故此說已不攻自破了。

吳玉搢的山陽志遺卷四還有許多關於吳承恩的材料，今錄於下：

嘉靖中，吳貢生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時金石碑版嘏祝贈送之詞，多出其手。薦紳臺閣諸公皆倩爲捉刀人。顧數奇，不偶，僅以歲貢官長興縣丞。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失傳。邱司徒正綱收拾殘缺，得其友人馬清溪馮竹泉所手錄，又益之以鄉

人所藏，分爲四卷，刻之，名曰射陽存稿（又有續稿一卷）。五嶽山人陳文燭爲之序。其略云：「陳子守淮安時，長興徐子與過淮。往汝忠丞長興，與子與善。三人者呼酒韓侯祠內，酒酣論文論詩，不倦也。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時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蓄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卽欲敷文陳詩，難矣。徐先生與予深韙其言。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沈辭淵深，浮藻雲駿，張文潛以後一人而已。」其推許之者，可謂至極。讀其遺集，實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書刋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紙墨已渝敝。後陸續收得刻本四卷，並續集一卷，亦全。盡登其詩入山陽耆舊集，擇其傑出者各體載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

據此，是隆慶初（約一五七〇）陳文燭守淮安時，吳承恩還不曾死。以此推

之，可得他的年代：

嘉靖中（約一五五〇），歲貢生。

嘉靖末（約一五六〇），任長興縣丞。

隆慶初（約一五七〇），在淮安與陳文燭徐子與往來酬應，酒酣論文。

萬曆初（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

他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約一五二〇），死于萬曆之初。天啓淮安志修于天啓六年，當西歷一六二六，去吳承恩死時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據了。

最可惜的是我們至今還不曾尋到吳承恩的射陽存稿，也不曾見着吳玉搢的山陽感舊集。幸得山陽志遺裏錄有吳承恩的詩十一首，我們轉載幾首在這裏：

平河橋

短蓬傍向河橋泊，獨對靑旗枕臂眠。日落牛羊歸牧笛，潮來魚米集商船。遠離野寺平臨水，隔岸村炊互起煙。會向此中謀二頃，閒擕藜杖聽鳴蟬。

隄上

平湖渺渺漾天光，瀉入溪橋噴玉涼。一片蟬聲萬楊柳，荷花香裏據胡床。

對月感秋，四之一。

湘波捲桃笙，齊紈扇方斂。秋來本無形，潛報梧桐葉。啼螿代鳴蟬，其聲亦何切！繁霜結珠露，忽已如初雪。六龍驅日車，羲和不留轍。羣生總如夢，獨爾驚豪傑。大笑仰靑天，停盃問明月。

二郎搜山圖歌

李在惟閑畫山水，（李在，明宣德時畫家）不謂兼能貌神鬼。筆端變

幻異駭人，意態如生狀奇詭。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星飛電掣各奉命，蒐羅要使山林空。名鷹攫拏犬騰嚙，大劍長刀瑩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洒嬌啼血。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蹤。青鋒一下斷狂虺，金鎖交纏禽毒龍。神兵獵妖猶獵獸，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爪牙雖存敢馳驟！我聞古聖開鴻濛，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來群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終南進士老鍾馗，空向宮闈啗虛耗。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爲猿鶴爲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無事臨風三歎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爲我致麟鳳，長享萬年保合清寧功？

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遊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度了。

（七）

西遊記的中心故事雖然是玄奘的取經，但是著者的想像力眞不小！他得了玄奘的故事的暗示，採取了金元戲劇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像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話來！這部書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他的結構共分作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齊天大聖的傳。（第一回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經的因緣與取經的人。（第八回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難的經歷。（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

我們現在分開來說：

第一部分乃是世間最有價值的一篇神話文學。我在上文已略考這個猴王故事的來歷。這個神猴的故事，雖是從印度傳來的，但我們還可以說這七回的大部分是著

著創造出來的。須菩提祖師傳法一段自然是從禪宗的六祖傳法一個故事上脫化出來的。但著者寫猴王大鬧天宮的一長段，實在有點意思。玉帝把猴王請上天去，却只叫他去做一個未入流的弼馬溫；猴王氣了，反下天宮，自稱『齊天大聖』；玉帝調兵來征伐，又被猴王打敗了；玉帝沒法，只好又把他請上天去，封他『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後來天上的大臣又怕他太閑了，叫他去管蟠桃園。天上的貴族要開蟠桃勝會了，他們依着『上會的舊規』，自然不請這位前任弼馬溫。不料這饞嘴的猴子一時高興，把大會的仙品仙酒一齊偷吃了，攪亂了蟠桃大會，把一座莊嚴的天宮鬧的不成樣子，他却又跑下天稱王去了！等到玉帝三次調兵遣將，好容易把他捉上天來，却又奈何他不得；太上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爐中鍊了七七四十九日，仍舊被他跑出來，『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敲，更無一人可敵，直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玉帝發了急，差人上西天去討救，把如來佛請下來。

如來到了，詰問猴王，猴王答道：

> 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非他有，歷代人王有分傳。强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

他又說：

> 他（玉帝）雖年劫修長　也不應久住在此。常言道，「交椅輪流坐，明年是我尊。」只敎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能了。若還不讓，定要攪亂，不得清平！

前面寫的都是政府激成革命的種種原因；這兩段簡直是革命的檄文了！美猴王的天宮革命，雖然失敗，究竟還是一個「雖敗猶榮」的英雄！

我要請問一切讀者：如果著者沒有一肚子牢騷，他爲什麼把玉帝寫成那樣一個大飯桶？爲什麼把天上寫成那樣黑暗，腐敗，無人？爲什麼教一個猴子去把天宮鬧的那樣稀糟？

但是這七回的好處全在他的滑稽。著者一定是一個滿肚牢騷的人，但他又是一

個玩世不恭的人，故這七回雖是駡人，却不是板着面孔駡人。他駡了你，你還覺得這是一篇極滑稽，極有趣，無論誰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話小說。正如英文的阿梨思夢游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雖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學，仍舊是一部極滑稽的童話小說（此書已由我的朋友趙元任先生譯出，由商務出版）。現在有許多人研究兒童文學，我很鄭重的向他們推薦這七回天宮革命的失敗英雄齊天大聖傳。

第二部分（取經因緣與取經人物）有許多不合歷史事實的地方。例如玄奘自請去取經，有詔不許；而西遊記說唐太宗徵求取經的人，玄奘願往：這是一不合。又如玄奘本是緱氏人，父為士族，兄為名僧；他自身出家的事，本傳紀敘甚詳；而西遊記說他的父親是狀元，母親是宰相之女。但是狀元的兒子，宰相的外孫如何忽然做了和尚呢？因此有殷小姐忍辱報仇的故事造出來，（參看太平廣記一二二陳義郎的故事。）作為玄奘出家的理由。這是二不合。但這種變換，都是很在情理之中的。玄

奘的家世與幼年事蹟實在太平常了，沒有小說的興趣，故有改變的必要。況且玄奘既被後人看作神人，他的父母也該高陞了，故陞作了狀元與相府小姐。玄奘為經義難明，異說難定，故發憤要求得原文的經典：這種考據家的精神，是科學的精神，在我們眼裏自然極可佩服；但這也沒有通俗小說的資格，故也有改變的必要。於是有魏徵斬龍與太宗遊地府的故事。這一大段是許多小故事雜湊起來的。研究起來，很有趣味。袁天罡的神算，自然是一個老故事。（參看太平廣記七六，又二二一。）秦叔寶尉遲敬德做門神，大概也是唐人的故事。涇河龍王犯罪的故事，已見於唐人小說。太平廣記四一八引續玄怪錄，敘李靖代龍王行雨，誤下了二十尺雨，致龍王母子都受天譴。這個故事是很古的。唐太宗遊地府的故事，也是很古的。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有一則（王靜庵先生引太平廣記所引）云：

>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

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及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此事最有趣味，因爲近年英國人斯坦因（Stein）在燉煌發見唐代的寫本書籍中，有一種白話小說的殘本，僅存中間一段云：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 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 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引見東方雜誌十七卷，八號，王靜菴先生文中。）

這個故事裏已說判官姓崔名子玉。我們疑心那魏徵斬龍及作介紹書與崔判官的故事

也許在那損壞的部分裏，可惜不傳了。崔判官的故事到宋時已很風行，故宋仁宗嘉祐二年加崔府君封號詔有『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等語。（引見東方雜誌，卷頁同上。）這個故事可算很古了。

如果上文引的納書楹曲譜裏的西遊記是吳昌齡的原本，那麼，殷小姐忍辱復仇，唐太宗徵求取經人，等等故事由來已久，不是吳承恩新加入的了。

第三部分（八十一難）是西遊記本身。這一部分有四個來源。第一個來源自然是玄奘本傳裏的記載，我們上文已引了最動人的幾段。那些困難，本是事實，夾着一點宗教的心理作用。他們最能給小說家許多暗示。沙漠上光線屈折所成的幻影漸漸的成了眞妖怪了，沙漠的風沙漸漸的成了黃風大王的怪風和羅剎女的鐵扇風了，沙漠裏四日五夜的枯燋漸漸的成了周圍八百里的火燄山了，烈日炎風的沙河漸漸的又成了八百里『鵝毛飄不起』的流沙河了，高昌國王漸漸的成了大唐皇帝了，高昌

國的妃嬪也漸漸的成了托塔天王的假公主和天竺國的妖公主了。這種變化乃是一切大故事流傳時的自然命運，逃不了的，何況這個故事本是一個宗教的故事呢？

第二個來源是南宋或元初的唐三藏取經詩話和金元戲劇裏的唐三藏西天取經故事。這些故事的神話的性質，上文已說明了。依元代雜劇的體例看來，吳昌齡的西遊記雖爲元代最長的六本戲，六本至多也不過二十四折；加上楔子，也不過三十折。這裏面決不能紀敍八十一難的經過。故這個來源至多只能供給一小部分的材料。

第三個來源是最古的，是華嚴經的最後一大部分，名爲入法界品的。（晉譯第三十四品，唐譯第三十九品。）這一品占華嚴經全書的四分之一，說的只是一個善財童子信心求法，勇猛精進，經歷一百一十城，訪問一百一十個善知識，畢竟得成正果。這一部入法界品便是西遊記的影子，一百一十城的經過便是八十一難的影子。我們試看入法界品的布局：

(1)文殊師利告善財言，『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可樂，其國有山名爲和合，於彼山中，有一比丘名功德雲。汝詣彼問，云何菩薩學菩薩行，修菩薩道，乃至云何具普賢行。』……

(2)功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南方有國名曰海門，彼有比丘名曰海雲。汝應詣彼問菩薩行。』……

(3)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詣南方六十由旬，有一國土名曰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應往問彼云何菩薩修清淨行。』……

(4)善住比丘言，『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住林，彼有長者名曰解脫。汝詣彼問……』

這樣一個轉一個的下去，直到一百一十個，直到彌勒佛，又得見文殊師利，遂成就無量大智光明，『不久當與一切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這一個『信心求法，勇猛精進』的故事，一定給了西遊記的著者無數的暗示。

第四個來源自然是著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了。上面那三個來源都不能供給那八十一難的材料，至多也不過供給許多暗示，或供給一小部分的材料。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八十一難大部分是著者想像出來的。想出這許多妖怪災難，想出這一大堆神話，本來不算什麼難事。但西遊記有一點特別長處，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長了面孔，整日說正經話，那是聖人菩薩的行為，不是人的行為。西遊記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絕大神話小說，正因為西遊記裏種種神話都帶着一點詼諧意味，能使人開口一笑，這一笑就把那神話『人化』過了。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神話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話。

我們可舉幾個例。如第三十二回平頂山猪八戒巡山的一段，便是一個好例：

> 那獃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見山凹中有一塊桌面大的四四方方青石頭。獃子放下鈀，對石頭唱個大喏。行者暗笑，『看這獃子做甚勾當！』原來那獃子把石頭當做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習哩。他

道：『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甚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錫打的，銅鑄的，麵蒸的，紙糊的，筆畫的，——他們見說我獃哩，若說這話，一發說獃了。我只說是石頭山。他若問甚洞，也只說是石頭洞。他問甚麼門，却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裏邊多少遠，只說入內有三層。他若再問門上釘子多少，只說老猪心忙記不真。』……

最滑稽的是朱紫國醫病降妖一大段。孫行者揭了榜文，却去揣在猪八戒的懷裏，引出一大段滑稽文字來。後來行者答應醫病了，三藏喝道：

你跟我這幾年，那會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胆擅這個大禍？

行者笑道：

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

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

下文診脈用藥的兩段也都是很滑稽的。直到尋無根水做藥引時，行者叫東海龍王敖廣來「打兩個噴嚏，吐些津液，與他吃藥罷」。病醫好了，在謝筵席上，八戒口快，說出「那藥裏有馬……」行者接着遮掩過去，說藥內有馬兜鈴。國王問衆官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症。時有太醫院官在傍道：

> 主公，
> 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蠱，補虛寧嗽又寬中。

國王笑道：

> 用的當，用的當。豬長老再飲一杯。

這都是隨筆詼諧，很有意味。

我們在上文曾說大鬧天宮是一種革命。後來第五十回裏，孫行者被獨角兕大王

把金箍棒收去了，跑到天上，見玉帝。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

> 啓上天尊。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遇一兇怪，把唐僧拿在洞裏要吃。我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我疑是天上兇星下界，為此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這種奴隸的口頭套語，到了革命黨的口裏，便很滑稽了。所以殿門傍有葛仙翁打趣他道：

> 猴子，是何前倨後恭？

行者道：

> 不是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這種詼諧的裏面含有一種尖刻的玩世主義。西遊記的文學價值正在這裏。第一部分如此，第三部分也如此。

（八）

西遊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現在我們把那些什麼悟一子和什麼悟元子等等的『真詮』『原旨』一概刪去了，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至於我這篇考證本來也不必做；不過因為這幾百年來讀西遊記的人都太聰明了，都不肯領略那極淺極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過紙背去尋那『微言大義』，遂把一部西遊記罩上了儒釋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遊記有了幾百年逐漸演化的歷史；指出這部書起於民間的傳說和神話，並無『微言大義』可說；指出現在的西遊記小說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復善諧謔』的大文豪做的，我們看他的詩，曉得他確有『斬鬼』的清興，而決無『金丹』的道心；指出這部西遊記至多不

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並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他並不隱藏，我們也不用深求。

十二，二，四，改稿。

附錄　『讀西遊記考證』

董作賓

西遊記的作者，自從丁晏在他底頤志齋集續編頁二十三書西遊記後裏面，表明是他底同鄉吳承恩以後；差不多可以說看西遊記的人，都不會注意到作者姓氏；甚至於拿邱處機來頂名冒替。就是善於給小說作考證的胡適之先生，在他底西遊記序裏面也不會提到作者是誰。這未免令人替吳老先生不平。因此，我們便費了多天功夫，來搜求關於吳承恩的材料，終以為不甚完備，尚不曾着手整理。昨天看見第六期的讀書雜志裏面西遊記考證，居然把吳老先生表彰出來，並且材料也還不少。從

此吳承恩的姓名，藉着他底文學作品得以永遠不死。將來再經了適之先生的考索，或者竟替他作出一個年譜來，又何嘗不是這位吳老先生的榮幸呢？現在我們索性把搜求所得，未曾見於考證裏面的材料，寫了出來，供獻給適之先生，讓他作個綜合的研究。

同治十二年長興縣志，名宦，頁十五：

> 吳承恩，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授長興縣丞。性耽風雅，作爲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後殆無其倫。官長興時與邑紳徐中行最善。往還唱和，率自胸臆出之。丞廨浮沉，絕無攀援附麗，其賢於人遠矣！著有射陽先生存稿。

志中所載，係雜引李本寧大本山房集，和陳玉叔（文燭）射陽存稿序裏面的話；李語也見於明詩綜卷四十八頁二十五，吳承恩七首下註：

> 李本寧云，汝忠與徐子與善，往還唱和；今按其集獨不類七子，率自

胸臆出之。以彼其才，僅爲縣丞以老！一意獨行，無所振拔附麗，豈不賢於人哉？

據此，可知徐中行與吳承恩的交情，並且知道他們會互相唱和。我們倘若把徐中行的詩文拿來看一看，定然能尋些關於吳承恩的材料；像適之先生在四松堂詩集找着曹雪芹的故事一樣。徐中行是「後七子」之一，曾入明史文苑傳；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裏面，也極口稱贊他。他的著作有：

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青蘿館集，六卷。

以上二種，均見四庫存目。可惜尚未覓得！

我們看了徐中行的傳略，也可以作吳承恩官長興時代的旁證。按明詩綜卷四十六，（頁二十九）說：

徐中行，二首。中行字子輿，長興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

出知汀州府……有青蘿館集。

中行成進士在庚戌，當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而吳承恩得歲貢却不在此年。按光緒淮安府志貢舉表，歲貢生有

吳承恩，甲辰。

甲辰是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周豫才先生看光緒淮安志，遺漏了這一條；適之先生假定的年歲，較此相差六年。

考證假定吳承恩任長興縣丞在嘉靖末，約當西歷一五六〇。乾隆十四年長興縣志職官，名宦，皆不載吳承恩之名。同治長興志名宦的次序，係隨便列入，不足爲依據。他的職官表也無吳承恩作縣丞的年歲。但此表中縣丞的缺額上，尙有線索可尋。表如下：

嘉靖年	長興縣丞	附記
一六——二〇	李良材	

二一　張梓

二二

二三(甲辰)　　吳承恩歲貢

二四—二五

二六　張鏽　沈天民

二七—二八　馬萬椿

二九(庚戌)　馬萬椿　　徐中行進士

三〇　馬萬椿(本年陞州判)

三一—三四

三五—三六　吳世法　譚以皆

三七　周杭

三八　龐忠烈

三九—四五

我初以爲同治志『嘉靖中』的『中』字，當是指二四至二五兩年，因爲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五年正在中間。適之先生以爲『中』字不當這樣拘泥看；況且歲貢在廿三年，而縣丞在廿四年，似乎不合情理。此外只有兩個缺額了，一是三一至三四年，一是三九至四五年。吳承恩丞長興，不出這兩個時代。適之先生主張三九至四五年（一五六〇至六六）之間；因爲文人作縣丞，大概是迫于貧老，不得已而爲之，故此事似以晚年爲適宜。況且明詩綜引李本寧的話，說：『以彼其才，僅爲縣丞以老。』這更可見他作縣丞是在老年了。若此說不錯，則考證原擬嘉靖末（約一五六〇）爲丞長興之年，竟得一有力的旁證了。

適按明史二八七云：

徐中行，……由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稍遷汀州知府。廣東賊蕭五來犯，禦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擊

之，讓功甫寧，甫寧得優擢。尋以父憂歸。補汝寧，坐大計，貶長蘆鹽運判官，遷湖廣僉事……罷官江西左布政使，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卒官。

我們在這時候，材料不完全，不能知道徐中行丁父憂的年歲。但徐中行是嘉靖二九的進士，做到汀州知府，立了功，然後丁憂回家，至少須有十年的時間。大概吳承恩做長興縣丞，和徐中行丁憂回籍，同在嘉靖三九年以後，故他們有往還熟識的機會。

考證上又假定：『萬曆初（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不知何據？但是這裏卻有一件可靠的證據，寫來作他補充的條件。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文藝，頁十一，載：

吳承恩瑞龍歌。（原註—事見蛻龍潭）憶昨淮揚水爲厲，冒郭襄陵泗無際；皆云『龍怒駕狂濤，人力無由殺其勢』。忽然溪壑息波瀾，細

草平沙得龍蛻；崢嶸頭角異尋常，猶帶祥煙與靈氣；神奇自古驚流傳，豁地飛天總成瑞。高家堰報水土平，世運神機關進退；司空馳奏入明光，百辟趨朝笑相慰：獨不見，當年神禹治九州，奏績玄龜動天地；今茲告兆協神龍，千古玄符迥相繼；佇看寰宇徧耕桑，萬年千年保天佑。

又卷一，祥異及山川載有：

萬曆七年三月十八日，申，大雷雨……

蛻龍潭，萬曆七年。王世貞有記。

蛻龍潭故事，在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承恩還彀上替他作瑞龍歌，可以推想他的死在萬曆七年以後。考證約計他的死是（一五八〇），恰恰萬曆八年，未免太湊巧了。總之：我們雖不能斷定他是否死在七年或八年，或者八年以後若干年？然而有了這個證據，卻是可以說他的死不在萬曆七年以前。

在考證裏面，適之先生說：『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爲水簾

洞了。』在這一點，我們也曾尋出來些蹤跡。因為看淮安志的時候，偶然看見藝文裏面有『朱世臣題雲台山水簾洞』的標題，想到水簾洞是美猴王的發祥地；也算這部西遊記的出發點；不無研究的價值。於是就加意探訪，果然尋到了水簾洞的去處。

嘉慶海州志，卷第十一，山川：

姚陶登雲台山記……夜半，呼僕夫乘月登山，觀日出。由殿東石徑上一里許，為水簾洞；洞中石泉極淺，冬夏不竭，泉甚甘美。云為三元弟兄修真處。……

雲台山，就是郁州。他有許多名字是：『蒼梧山』，『青峯頂』，『青風頂』，『覆釜山』，『逢山』，『鬱州』等等。晉宋之間，南北相爭，頗為要地，並曾僑置青冀二州。雲台的名字，是萬曆年間起的。此山是海邊的一個孤島，周圍約有二百餘里。志又稱：

雲台，向在海中，禁為界外；康熙十六年，奏請復為內地。

此山的形勢，也似乎是花果山的背景。遊覽過此山的吟詠記載，有很多的人，我們一看，就可以知道雲台山的價值了。

作賦的：孫斯位，汪枚。

作記的：吳進，姚陶。

作詩的：蘇軾，劉峻，王時揚，周于德，張一元，黃九章，武尚行，紀映鍾，楊錫紱，張賓鶴，吳恆宣，管韓貞。

此外關於吳承恩的遺詩，除了山陽志遺以外，在明詩綜看見的有七首，題目如下：

對月，富貴曲效溫飛卿體，楊柳青，田園卽事，秋夕，東未齋陶師，句曲。

見淮安志藝文的二首：

堤上，瑞龍歌。

以上所錄，爲給適之先生湊集材料起見，所以亂雜無章地寫了許多。不過可以作西遊記考證的一點補充的材料罷了，實在夠不上說是一種研究。

十二，二，五。

後記一　（適）

董先生供給我這些好材料，使我十分感謝。他所舉的吳承恩道詩，也都承他鈔給我了。淮安府志裏『隄上』一首，明詩綜裏『楊柳青』一首，皆與山陽志遺相重。今補錄『田園卽事』一首於下：

田園卽事　吳承恩

大溪小溪雨已過，前村後村花欲迷。老翁打鼓官社裏，野客策杖官橋西。黃鸝紫燕聲上下，短柳長桑光陸離。山城春酒綠如染，三百靑錢誰爲攜？

後記二　（適）

這篇跋登出之後不多時，董先生又去檢查康熙年間修的汝寧府志，他在卷八『官師（名宦）』裏尋得這一條：

> 徐中行（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任）……丁巳（嘉靖三六，西一五五七）出守汀州，以外艱歸。壬戌（嘉靖四一，西一五六二）起補汝寧。……官僅一載，竟中忌者之口，以京察左遷去。

這一條可以證明我上文的假設：徐中行丁憂回籍，果在嘉靖三九至四一年。大概我猜想吳承恩作縣丞也在此時，是不錯的了。

現在可以修正我考證裏擬的年表如下：

嘉靖二三（一五四四），吳承恩歲貢。

　二九（一五五〇），徐中行進士。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一（一五大二），徐中行丁父憂，在長興。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五（？），吳承恩作長興縣丞。

隆慶初（約一五七〇），吳承恩在淮安，與陳文燭徐中行往來酬應，酒酣論文。

萬曆六（一五七八），徐中行死於江西布政任上。

七（一五七九），吳承恩作瑞龍歌。

約萬曆七八年（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以他歲貢之年推之，他享壽當甚高，約七十多歲。生時當在弘治正德之間，（約一五〇五）。

這個表精密多了。我們不能不感謝董作賓先生的厚意和助力。

十二，三，九。

鏡花緣的引論

（一）李汝珍

鏡花緣刻本有海州許喬林石華的序，序中說「鏡花緣一書，適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數年之力成之」。其餘各序及題詞中，也都說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說李松石是誰的。前幾年，錢玄同先生告訴我李松石是一個音韻學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興縣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鑑。後來我依他的指示，尋得了李氏音鑑，在那部書的本文和序裏，鈎出了一些事蹟。

李汝珍，字松石，大興人。順天府志的選舉表裏，舉人進士隊裏都沒有他，可見他大概是一個秀才，科舉上不曾得志。順天府志的藝文志裏沒有載他的著作，人

物志裏也沒有他的傳。中國人名大辭典（頁三八九）有下列的小傳：

李汝珍，【清】大興人，字松石。通聲韻之學，撰李氏音鑑，定『春滿堯天』等三十三母。徵引浩繁，淺學者多為所震，然實未窺等韻門徑。又有鏡花緣，及李刻受子譜。

此傳不知本於何書，但這種嚴酷的批評實在只足以表示批評者自身的武斷。（關於李汝珍在音韻學上的成績，詳見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雲）到江蘇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時歙縣凌廷堪（生一七五七，死一八〇九）家在海州，李汝珍從他受業。論文之暇，兼及音韻。（音鑑五，頁十九。）那時凌廷堪年僅二十六歲；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時也不過二十歲上下，他生年約當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凌廷堪是燕樂考原的作者，精通樂理，旁通音韻，故李汝珍自說『受益極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慶十年（一七八二—一八〇五），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蘇省內，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鑑石文煃序）。他雖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學者的影響最大；他的韻學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這長期的居住南方。嘉慶十年石文煃序中說，『今松石行將官中州矣。』但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他仍在東海（音鑑題詞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凌廷堪補殿試後，自請改教職，選得寧國府教授；六十年（一七九五）赴任。此後，李汝珍便因道路遠隔，不常通問了。（音鑑五，頁十九）他的朋友同他往來切磋的，有

許喬林，字石華，海州人。

許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慶舉人。於諸經皆有發明；通古音，兼精算學。著有許氏說音，音鵠，宣夜通，味無味齋集。（人名大辭典頁一〇三四）許桂林是李汝珍的內弟。（音鑑五，頁十九）

徐銓，字藕船，順天人。著有音繩。（音鑑書目）

徐鑑，字香垞，順天人。著有韻略補遺（同上）

吳振勃，字容如，海州人。

洪□□，字靜節。

這一班人都是精通韻學的人。華嚴字母譜列聲母四十二，韻母十三。李汝珍把聲母四十二之中，删去與今音異者十九個，而添上未備的及南音聲母十個，共存三十三個聲母。他又把韻母十三之中，删去與今音異者兩個，而添上今音十一個，共存韻母二十二個。他自己說，新添的十一個韻母之中，一個（厮韻）是淩廷堪添的，徐鑑與許桂林各添了兩個，徐銓添了一個；他自己添的只有五個。（音鑑五，頁十九）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音鑑成書。（音鑑李汝璜序）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音鑑付刻，是年刻成。（吳振勃後序）

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李汝珍任東海，與許桂林同讀山陰俞杏林的傳聲正

宗。俞氏書中附有音鑑題詞四首，其第四首云：

松石全書絕等倫，月南後序更精醇。揣摩我媿無他技，開卷差爲識字人。

此可見音鑑出版不久，已受讀者的推重。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他把俞杏林的題詞附刻在音鑑之後，並作一跋。

自此年以後，他的事蹟便無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歲左右的人了。這三十五年中，他的踪跡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鏡花緣之著作，不知在於何年。孫吉昌的題詞說：

……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陸離！……而乃不得志，形骸將就衰，耕無負郭田，老大仍驅飢。可憐十數載，筆硯空相隨，頻年甘兀兀，終日惟

孳孳。心血用幾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壯心，休言作者癡。窮愁若著書，其志良足悲。……古今小說家，應無過於斯。……傳鈔紙已貴，今已付剞劂，不脛且萬里，堪作稗官師。從此堪自慰，已爲世所推。……

從這上面，我們可得兩點：

(1)鏡花緣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時作的。

(2)鏡花緣刻成時，李汝珍還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詩和許喬林的序都沒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麥大鵬序，他說：

> 李子松石鏡花緣一書，耳其盡善，三載於茲矣。戊子(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清和，偶過張子燮亭齋塾，得窺全豹，不勝舞蹈。復聞芥子園新雕告竣，遂購一函，如獲異寶。……

麥氏在一八二九，已知道此書三年了；一八二八他所見的『全豹』，不知是否刻

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園新雕本；次年麥氏又託謝葉梅摹繪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繪像精雕本，爲後來王韜序本的底本。我們暫時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園本爲初刻本，而麥氏前三年聞名的鏡花緣爲鈔本。如此，我們可以說：

一八〇五，音鑑成書。

一八一〇，音鑑刻成。（以上均見上文）

約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十數年之力』——爲鏡花緣著作的時期。

約一八二五，鏡花緣成書。

一八二八，芥子園雕本鏡花緣刻成。

一八二九，麥刻謝像本（廣東本）付刻。

假定芥子園本即是孫吉昌題詞裏說的「今已付剞劂」之本，那麼，李汝珍還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約在乾隆中葉（約一七六三）；他死時約當道光十年（約一八三〇），已近七十歲了。

（二）李汝珍的音韻學

關於李汝珍的音鑑，我們不能詳細討論，只能提出一些和鏡花緣有關係的事實。鏡花緣第三十一回，唐敖等在歧舌國，費了多少工夫，才得着一紙字母，共三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只有第一個字是有字的，或用反切代字，其餘只有二十一個白圈。只有「張」字一行之下是有字的。每行的第一個字代表聲類(Consonants)，每行直下的二十二音代表韻部(Vowels)。這三十三個聲母，二十二個韻母，是李汝珍的音鑑的要點。音鑑裏把三十三聲母作成一首行香子詞，如下：

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翾。對酒陶然，便博個醉中仙。

這就是鏡花緣裏的

昌，茫，秧，「梯秧」，羌，商，槍，良，囊，杭，「批秧」，方，

『低秧』，菱，『妙秧』，桑，郎，康，倉，昂，娘，滂，香，當，漿，

湯，鋼，『兵秧』，糧，岡，臧，張，廂。（次序兩處一一相同。）

承錢玄同先生音注如下：

春 ㄔ，ㄔㄨ（ch,' ch'u）

滿 ㄇ（m）

豬 一（齊，）ㄩ（撮）（y, yü）

天 ㄊ一（t'i）

溪 ㄑ一，ㄑㄩ（ch'i, ch'ü）

水 ㄕ，ㄕㄨ（sh, shu）

清 ㄘ一，ㄘㄩ（ts'i, ts'ü）

漣 ㄌ一，ㄌㄩ（li, lü）

嫩 ㄋ，ㄋㄨ（n, nu）

紅　ㄏ，ㄏㄨ(h,hu)

飄　ㄆㄧ(p'i)

粉　ㄈ(f)

蝶　ㄉㄧ(ti)

驚　ㄐㄧ，ㄐㄩ(chi,chü)

眠　ㄇㄧ(mi)

松　ㄙ，ㄙㄨ(s,su)

巒　ㄌ，ㄌㄨ(l,lu)

空　ㄎ，ㄎㄨ(k',k'u)

翠　ㄘ，ㄘㄨ(ts',ts'u)

鷗　口(開)ㄨ(合)(口,w)

鳥　ㄋㄧ，ㄋㄩ(ni,nü)

盤 ㄆ(p')

閒 ㄒ丨,ㄒ丨ㄩ(hsi,hsü)

對 ㄉ,ㄉㄨ(t,tu)

酒 ㄗ丨,ㄗㄩ(tsi,tsü)

陶 ㄊ,ㄊㄨ(t',t'u)

然 ㄖ,ㄖㄨ(j,ju)

便 ㄅ丨(pi)

博 ㄅ(p)

個 ㄍ,ㄍㄨ(k,ku)

醉 ㄗ,ㄗㄨ(ts,tsu)

中 ㄓ,ㄓㄨ(ch,chu)

仙 ㄙ丨,ㄙㄩ(si,sü)

他的二十二個韻母，和錢玄同先生的音注，如下：

	鏡花緣	音鑑	錢玄同先生的音注	
（1）	張	張	ㄤ，ㄧㄤ	ang, iang
（2）	真	真	ㄣ，ㄧㄣ	en, in
（3）	中	中	ㄨㄥ，ㄩㄥ	ung, iung
（4）	珠	珠	ㄨ，ㄩ	u, ü
（5）	招	招	ㄠ，ㄧㄠ	ao, iao
（6）	齋	齋	ㄞ，ㄧㄞ	ai, iai
（7）	知	知	ㄧ，ㄖ，ㄙ，	i, ih, ŭ
（8）	遮	遮	ㄝ，ㄧㄝ，ㄩㄝ	eh, ieh, üeh
（9）	詀	詀（眞衫切）	ㄢ	an
（10）	氈	氈		en, sïn

(11)	專	專		uœn, yœn
(12)	張鷗	周	ㄡ，ㄧㄡ	ou, iu
(13)	張婀	○切張歌	ㄛ，ㄧㄛ	o, io
(14)	張鴉	渣	ㄚ，ㄧㄚ	a, ia
(15)	珠逶	追	ㄨㄟ	uei
(16)	珠均	諄	ㄨㄣ，ㄩㄣ	uen, üin
(17)	張鶯	征	ㄥ，ㄧㄥ	êng, ing
(18)	珠帆	○切珠鸞	ㄨㄢ	uan
(19)	珠窩	○切珠窩	ㄨㄛ，ㄩㄛ	uo, üo
(20)	珠窪	撾	ㄨㄚ	ua
(21)	珠歪	○切珠歪	ㄨㄞ	uai
(22)	珠汪	莊	ㄨㄤ	uang

附注：第十和第十一兩韻，注音字母與羅馬字皆不方便，故用語音學字母標之。en 略如上海讀『安』之音；ien 略如長江流域中的官音讀『烟』，不得讀北京讀『烟』之音。uen,yœn 二音當如蘇州讀『椀』『遠』之音，須作圓脣之勢，方合。

在我們這個時候，有種種音標可用，有語音學可參攷，所以我們回看李汝珍最得意的這點發明，自然覺得很不希奇了。但平心而論，他的音韻學卻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他生於清代音韻學最發達的時代；但當時的音韻學偏於考證古韻的沿革，而忽略了今音的分類。北方的音韻學者，自從元朝周德淸的中原音韻以來，中間如呂坤劉繼莊等，都是注重今音而不拘泥於古反切的。李汝珍雖頗受南方韻學家的影響，但他究竟還保存了北方音韻學的遺風，所以他的特別長處是（1）注重實用，（2）注重今音，（3）敢於變古。他在凡例裏說：『是編所撰字母，期於切音易得其響，故粗細各歸一母。』他以實用為主，故『非，敷，奉』併入『粉』，只留一音，

而大胆的删去了國音所無的ㄪ音；故『泥，娘ㄋ』併入『鳥』，另分出一個『嫩ㄋ』，兩母都屬ㄋ音，而那官音久不存在的ㄫ與ㄬ兩音就被删去了。這種地方可以見他的眼光比近年製造注音字母的先生們還要高明一點。他分的韻母也有很可注意的。例如『麻ㄚ』韻分為『遮ㄝ』(eh)『鴉ㄚ』(a, ia)『撾ㄨㄚ』(ua)三韻；而那個向來出名的『該死十三元ㄢ』竟被他分入四韻。這都是他大胆的地方。

本來這些問題不應該在這篇裏討論；不過因為人名大辭典很武斷的說李汝珍『實未窺等韻門徑』，所以我在這裏替他略說幾句公道話。要知道實用的音韻學本和考古的音韻學不同道，誰也不必罵誰。考古派儘管研究古音之混合，而實用派自不能不特別今音的微細分別。許桂林作音鑑後序，曾說：

顧寧人言古無麻韻，半自歌戈韻誤入，半自魚模韻誤入。（適按，此說實不能成立；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汪榮寶先生所著長文，及錢玄同先生跋語。）然則必欲從古，並麻韻亦可廢。若可隨時變

通，廝嗟何妨爲二部乎？

這句話正可寫出考古派與實用派的根本不同。李汝珍在音鑑卷四裏曾論他的『著述本意』道：

　苟方音之不侔，彼持彼音而以吾音爲不侔，則不唾之者幾希矣。豈直覆瓿而已哉？珍之所以著爲此篇者，蓋抒管見所及，淺顯易曉，俾吾鄉初學有志於斯者，藉爲入門之階，故不避譾陋之誚。……至於韻學精微，前人成書具在，則非珍之所及矣。（四，頁二六）

他是北京人，居南方，知道各地方音之不同，所以知道實用的音韻學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我們看他著述的本意只限於『吾鄉』，可以想見他的愼重。他在同篇又說：

　或曰：子以南北方音，辨之詳矣，所切之音亦可質之天下乎？

　對曰：否，不然也。……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珍北人也，於北音宜無不喻矣；所切之音似宜質於北矣。而猶曰未可，况質於天下乎？

（四，頁二五）

他對於音韻學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瞭呀！只此一點，已足以『前無古人』了。

（三）李汝珍的人品

我們現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樣的一個人。關於這一點，音鑑的幾篇序很可以給我們許多材料。余集說：

> 大興李子松石少而穎異，讀書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學；以其暇旁及雜流，如壬遁，星卜，象緯，篆隸之類，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於音韻之學，尤能窮源索隱，心領神悟。

石文煃說：

> 松石先生伉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隸，獵圖史，旁及星卜弈戲諸事，靡不觸手成趣。花間月下，對酒徵歌，興至則一飲百觥，揮霍如

志。

這兩個同時人的見證，都能寫出鏡花緣的作者的多才多藝。許喬林在鏡花緣序裏說此書『枕經葄史，子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我們看了余集石文煃的話，然後可以了解鏡花緣裏論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談弈（七十三回），論琴（同），論馬弔（同），論雙陸（七十四回），論射（七十九回），論籌算（同），以及種種燈謎，和那些雙聲疊韻的酒令，都只是這位多才多藝的名士的隨筆遊戲。我們現在讀這些東西，往往嫌他『掉書袋』。但我們應該記得這部書是清朝中葉的出產品；那個時代是一個博學的時代，故那時代的小說也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博學的牌子。這是時代的影響，誰也逃不過的。

關於時代的影響，我們在鏡花緣裏可以得着無數的證據。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齒國女學堂裏談經，論『鴻雁來賓』一句應從鄭玄注，論語宜用古本校勘，『車馬衣輕裘』一句駁朱熹讀衣字爲去聲之非，又論易經王弼注偏重義理，『既欠精詳，而

又妄改古字』：這都是漢學時代的自然出產品。後來五十二回唐閨臣論注禮之家，以鄭玄注爲最善，也是這個道理。至於全書說的那些海外國名，一一都有來歷；那些異獸奇花仙草的名稱，也都各有所本（參看錢靜方小說叢考卷上，頁六八至七二）：這種博覽古書而不很能評判古書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個時代的特別現象。

（四）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書

現在我們要回到鏡花緣的本身了。

鏡花緣第四十九回，泣紅亭的碑記之後，有泣紅亭主人的總論一段，說：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羣芳之不傳，因筆志之。……結以花再芳畢全貞者，蓋以羣芳淪落，幾至澌滅無聞，今賴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

這是著者著書的宗旨。我們要問，著者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究竟他所見的是什麼？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見的是幾千年來忽略了的婦女問題。他是中國最早提出這個婦女問題的人，他的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

這是鏡花緣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鑿附會的人，但我研究鏡花緣的結果，不能不下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個留心社會問題的人。這部鏡花緣的結構，很有點像司威夫特（Swift）的海外軒渠錄（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像出來的『海外奇談』來譏評中國的不良社會習慣的。最明顯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國的一大段；這裏凡提出了十二個社會問題：

（1）商業貿易的倫理問題。（第十一回）

(2)風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3)生子女後的慶賀筵宴。

(4)送子女入空門。

(5)爭訟。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備饌過多。

(8)三姑六婆。

(9)後母。

(10)婦女纏足。

(11)用算命為合婚。

(12)奢侈。

這十二項之中，雖然也有迂腐之談，——如第一，第五，諸項——但有幾條確然是很有

見解的觀察。內中最精采的是第十和第十一兩條。第十條說：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為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不為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條說：

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為劣，南以屬虎為凶。其說不知何意，至

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豈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之婦。況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皆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强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即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

這兩項都是婦女問題的重要部分；我們在這裏已可看出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熱心了。

大凡寫一個社會問題，有抽象的寫法，有具體的寫法。抽象的寫法，只是直截

指出一種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濟的方法。君子國裏的談話，便是這種寫法，正如牧師講道，又如教官講聖諭廣訓，扯長了面孔講道理，全沒有文學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對於女子問題，若單有君子國那樣乾燥枯寂的討論，就不能算是一個文學家了。鏡花緣裏最精采的部分是女兒國一大段。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學的技術，詼諧的風味，極力描寫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慘酷的，不人道的待遇。這個女兒國是李汝珍理想中給世間女子出氣伸冤的烏託邦。在這國裏，

> 歷來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於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說道：

> 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婦人，卻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

> 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

做，卻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點頭道：

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們雖覺異樣，無如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為非。

這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根本見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狀況，並沒有自然的根據，只不過是「自古如此」的「矯揉造作」，久久變成「自然」了。

請看女兒國裏的婦人：

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鬏兒，鬢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葱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

一看，原來一部鬍鬚，是個絡腮鬍子。

這位絡腮鬍子的美人，望見了唐敖多九公，大聲喊道：

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卻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

以上寫『矯揉造作』的一條原理，雖近於具體的寫法，究竟還帶一點抽象性質。第三十三回寫林之洋選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於文學趣味的具體描寫法。

那天早晨，林之洋說道：

幸虧俺生中原。若生這裏，也教俺纏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請君入甕』！女兒國的國王看中了他，把他關在宮裏，封他為王妃。

早有宮娥預備香湯，替他洗浴，換了襖褲，穿了衫裙，把那一雙大金蓮暫且穿了綾襪，頭上梳了鬏兒，搽了許多頭油，戴上鳳釵，搽了一臉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紅，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鐲，把牀帳安了，請林之洋上坐。

這是『矯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

幾個中年宮娥走來，都是身高體壯，滿嘴鬍鬚。內中一個白鬚宮娥，手拏針線，走到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個宮娥上來，緊緊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登時一針穿過。林之洋大叫一聲『痛殺俺了！』望後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也是一針直過。林之洋只痛的喊叫連聲。兩耳穿過，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幾揉，戴了一副八寶金環。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

第三步是纏足：

接着，有個黑鬚宮人，手拏一疋白綾，也向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襪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脚縫內，將五個脚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卽用白綾纏裹。纔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拏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林之洋身旁旣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脚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衆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時。

林之洋——同一切女兒一樣——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

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罰了。一個保母走上來，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鬚婦人，手捧一塊竹板，約有三寸寬，八尺長，不覺吃了一嚇道：『怎麽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四個微鬚婦人，一個個膀闊腰粗，走上前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擧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剛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濺茵褥。

『打肉』之後，

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

他—她—實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裹脚的白綾亂扯去了。這一回的懲罰是：『王妃不遵約束，不肯纏足，即將其足倒掛梁上。』

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卽向衆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致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於是隨着衆人擺佈。

好一個反抗專制的革命黨！然而——

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將足弔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登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弔了片時，不但不死，並且越弔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裏忍得住！不因不由殺猪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卽啓奏，放了下來。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衆人，不敢違拗。衆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狠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衆人日夜隄防，眞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

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

一個平常中國女兒十幾年的苦痛，縮緊成幾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林之洋在女兒國御設的『矯揉造作速成科』畢業之後，

到了吉期，衆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開臉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雙金蓮雖覺微長，但纏的彎彎，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卻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頭上戴了鳳冠，渾身玉佩叮噹，滿面香氣撲人；雖非國色天香，卻是嫋嫋婷婷。

不多時，有幾個宮人手執珠燈，走來跪下道：『吉時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主散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林之洋聽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只覺耳中嚶的一聲，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顫顫巍巍，如鮮花

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得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幾十天的『矯揉造作』，居然使一個天朝上國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兒國的國王，顛顛巍巍地『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了！

幾千年來，中國的婦女問題，沒有一人能寫的這樣深刻，這樣忠厚，這樣怨而不怒。鏡花緣裏的女兒國一段是永遠不朽的文學。

女兒國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會的，政治的意義。請看唐敖說那處河道的情形：

以彼處形勢而論，兩邊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淺，形像如盤，受水無多，以至為患。這總是水大之時，惟恐衝決漫溢，且顧目前之急，不是築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並不預為設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勢略大，又復培壅，以致年復一年，河身日見其高。若以目前形狀而

論，就如以浴盆置於屋脊之上，一經漫溢，以高臨下，四處皆為受水之區，平地即成澤國。若要安穩，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衝決，再加處處深挑，以盤形變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這裏句句都含有雙關的意義，都是暗指一個短見的國家，只會用『築堤』『培岸』的方法來壓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曉得一個『疏』字的根本救濟法。李汝珍說的雖然很含蓄，但他有時也很明顯：

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難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麼？』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我喚了兩個人役細細訪問。此地向來銅鐵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謀為不軌。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惟富家間用銀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這不是明明的一個秦始皇的國家嗎？他又怕我們輕輕放過這一點，所以又用詼諧的

寫法，叫人不容易忘記：

多九公道：『原來此地銅鐵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掛招牌，俱寫「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藥品，自應切片，怎麼倒用牙咬？腌臢姑且不論，豈非舍易求難麼？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聽唐兄之言，無怪要用牙咬了。……』

請問讀者，如果著者沒有政治的意義，他爲什麽要在女兒國裏寫這種壓制的政策？女兒國的女子，把男子壓伏了，把他們的脚纏小了，又恐怕他們造反，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謀爲不軌』。這是何等明顯的意義！

女兒國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權伸張的一個烏託邦，那是無可疑的。但他又寫出一個黑齒國，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發達的一個烏託邦了。

黑齒國的人是很醜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加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覺無比。

然而黑齒國的教育制度，卻與衆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見一所『女學塾』。據那裏的先生說：

至敝鄉考試歷來雖無女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卽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攻書，以備赴試。

再聽林之洋說：

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醜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俺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細細打聽，纔知這裏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幾本書上。

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以才學高的爲貴，不讀書的爲賤。就是女人也是這樣。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

這是不是一個女學發達的烏託邦？李汝珍要我們特別注意這個烏託邦，所以特別描寫兩個黑齒國的女子，亭亭和紅紅，把天朝來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紅一陣，白一陣，頭上只管出汗』。那女學堂的老先生，是個聾子，不曾聽見他們的談論，只當多九公怕熱，拿出汗巾來替他揩汗，說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賢受熱，殊抱不安。但汗爲人之津液，也須忍耐少出纔好。大約大賢素日喜喫麻黃，所以如此。今出這場痛汗，雖痢瘧之症，可以放心，以後如麻黃發汗之物，究以少喫爲是。

後來，多九公們好容易逃出了這兩個女學生的重圍，唐敖說道：

小弟約九公上來，原想看他國人生的怎樣醜陋。誰知只顧談文，他們面上好醜我們還未看明，今倒被他們先把我們腹中醜處看去了。

這樣恭維黑齒國的兩個女子，只是著者要我們注意那個提倡女子教育的烏託邦。

李汝珍又在一個很奇怪的背景裏，提出一個很重大的婦女問題：他在兩面國的強盜山寨裏，提出男女貞操的『兩面標準』(Double standard)的問題。兩面國的人，『個個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一張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卻另『藏着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第二十五回)他們見了穿綢衫的人，也會『和顏悅色，滿面謙恭』；見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變了樣子，臉上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這就是一種『兩面標準』。然而最慘酷的『兩面標準』卻在男女貞操問題的裏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貞操，而自己卻可以納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禮法許可的，而婦人多夫卻是絕大罪惡；婦人和別的男子有愛

情，自己的丈夫若寬恕了他們，社會上便要給他『烏龜』的尊號；然而丈夫納妾，妻子却『應該』寬恕不妒，妒是婦人的惡德，社會上便要給他『妒婦』『母夜叉』等等尊號。這叫做『兩面標準的貞操』。在中國古史上，這個問題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謝安的夫人說的『周婆制禮』。和李汝珍同時的大學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妒非婦人惡德』。但三千年的議禮的大家，沒有一個人能有李汝珍那樣明白爽快的。鏡花緣第五十一回裏，那兩面國的強盜想收唐閨臣等作妾，因此觸腦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這位夫人把他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還數他的罪狀道：

既如此，為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眞是強盜行為，已該碎屍萬段。你還只想置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

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歸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曾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秀。這個故典，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讀者應該記得，這一大段訓詞是對着那兩面國的強盜說的。在李汝珍的眼裏，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強盜，都是兩面國的強盜，都應該碎屍萬段』，都應該被他們的大人『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點忠恕來』。——什麼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個單純的貞操標準：男所不欲，勿施於女；所惡於妻，毋以取於夫：這叫做『忠恕之道』！

然而女學與女權，在我們這個『天朝上國』，實在不容易尋出歷史制度上的根據。李汝珍不得已，只得從三千年的歷史上挑出武則天的十五年（六九〇——七〇五）

做他的歷史背景。三千年的歷史上，女后垂簾聽政的確然不少，然而婦人不假借兒子的名義，獨立做女皇帝的，卻只有呂后與武后兩個人。呂后本是一個沒有學識的婦人，他的政治也實在不足稱道。武則天卻不然；他是一個有文學天才並且有政治手腕的婦人，他的十幾年的政治，雖然受了許多腐儒的誣謗，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他能提倡文學，他能提倡美術，他能賞識人才，他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他的冕旒之下。李汝珍抓住了這一個正式的女皇帝，大膽的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汚衊武則天人格的謠言都掃的乾乾淨淨。鏡花緣裏，對於武則天，只有褒詞，而無謗語：這是李汝珍的過人卓識。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則天皇帝來替中國女子出氣的。所以他在第四十回，極力描寫他對於婦女的德政。他寫的那十二條恩旨是：

(1)旌表賢孝的婦女。

(2)旌獎「悌」的婦女。

（3）旌表貞節。

（4）賞賜高壽的婦女。

（5）「太后因大內宮娥，拋離父母，長處深宮，最為淒涼，令命查明，凡入宮五年者，概行釋放，聽其父母自行擇配。嗣後採選釋放，均以五年為期。其內外軍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領回，為之婚配。如無父母親族，即令其主代為擇配。」

（6）推廣「養老」之法，『命天下郡縣設造養媼院。凡婦人四旬以外，衣食無出，或殘病衰頹，貧無所歸者，准其報名入院，官為養贍，以終其身。』

（7）「太后因貧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貧不能育，或因疾病纏綿，醫藥無出，非棄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賣為女婢，種種苦況，甚為可憐，令命郡縣設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數歲者，無論疾病殘

廢，如貧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養。有願領回撫養者，亦聽其便。其堂內所育各女，俟年至二旬，每名酌給粧資，官爲婚配。』

（8）『太后因婦人一生衣食莫不倚於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旣無丈夫衣食可恃，形隻影單，飢寒誰恤？今命查勘，凡嫠婦苦志守節，家道貧寒者，無論有無子女，按月酌給薪水之資，以養其身。』

（9）『太后因古禮女子二十而嫁，貧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議婚，甚至父母因無力粧奩，貪圖微利，或售爲侍妾，或賣爲優娼，最爲可憫，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實係貧寒無力，粧奩不能婚配者，酌給粧奩之資，即行婚配。』

（10）『太后因婦人所患各症，如經癸帶下各疾，其症尚緩，至胎前產後，以及難產各症，不獨刻不容緩，並且兩命攸關，故孫眞人著千金方，特以婦人爲首，蓋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之義，其事豈容忽略？無

如貧寒之家，一經患此，既無延醫之力，又乏買藥之資，稍爲耽延，遂至不救。婦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幾。亟應廣沛殊恩，命天下郡縣延訪名醫，各按地界遠近，設立女科。並發御醫所進經驗各方，配合藥料，按症施捨。」

（11）（略）

（12）（略）

這十二條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議。第十條特別注重女科的醫藥，尤其是向來所未有的特議。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則天創辦男女平等的選舉制度。注意，我說的是選舉制度，不單是一個兩個女扮男裝的女才子混入舉子隊裏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識在於要求一種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樣用文學考取科第。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上官婉兒和李易安，只是缺之一種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並不是沒有木蘭和秦良玉，

呂雉和武則天，只是缺乏一種正式的女子參政制度。一種女子選舉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到女子參政。所以李汝珍在黑齒國說的也是一種制度，在武則天治下說的也只是一種制度。這真是大膽而超卓的見解。

他擬的女子選舉制度，也有十二條，節鈔於下：

（1）考試先由州縣考取，造冊送郡；郡考中式，始與部試；部試中式，始與殿試。……

（2）縣考取中，賜文學秀女匾額，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賜文學淑女匾額，准其部試。部試取中，賜文學才女匾額，准其殿試。殿試名列一等，賞女學士之職，二等賞女博士之職，三等賞女儒士之職，俱赴紅文宴，准其年支俸祿。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量材擢用。……

（3）殿試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職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級。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無官職，賜五品服色榮身。二等

者賜六品服色，三等者賜七品服色。餘照一等之例，各有區別，女悉如之。

(5)試題，自郡縣以至殿試，俱照士子之例，試以詩賦，以歸體制。

(因爲唐朝試用詩賦。)

(6)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試者，俱按程途遠近，賜以路費。

但最重要的宣言，還在那十二條規例前面的諭旨：

大周金輪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帝王輔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詞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嫻文藝，亦增蘋藻之光。我國家儲才爲重，歷聖相符；朕受命維新，求賢若渴。闢門纘俊，桃李已屬春官；內則遴才，科第尚遺閨秀。郎君既膺鶚薦，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擧之公，難語人才之盛。昔帝與將墜，伏生之女傳經；漢書

未成，世叔之妻續史。講藝則紗幔綾帳，博雅稱名；吟詩則柳絮椒花，清新獨步。羣推翘秀，古今歷重名媛。愼選賢能，閨闈宜彰曠典。况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貞吉久屬於坤元。陰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徵競美。是用博諮羣議，創立新科。於聖曆三年，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從此珊瑚在網，文博士本出宮中。玉尺量才，女相如豈遺苑外？丕煥新猷，聿昭盛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前面說『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後面又說『况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此是用陸象山的門人的話。）這是很明顯的指出男女在天賦的本能上原沒有什麼不平等。所以又說：『郎君既膺鶚薦，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這種制度便是李汝珍對於婦女問題的總解決。

有人說，『這話未免太恭維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張開女科，也許是中了幾千年科舉的遺毒，也許仍是才子狀元的鄙陋見解。不過把舉人進士的名稱改作淑女才女

罷了。用科擧虛榮心來鼓勵女子，算不得解決婦女問題。』

這話固也有幾分道理。但平心靜氣的讀者，如果細讀了黑齒國的兩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並不單是科第，乃是學問。李汝珍也深知科擧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寫淑士國（第二十三四回）極端崇拜科擧，——『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遊民』——而結果弄的酸氣逼於國中，酒保也帶着儒巾，戴着眼鏡，嘴裏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認科擧的教育究竟比全無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說淑士國的人：

> 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

人人『自幼莫不讀書』，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

> 讀書者甚多，書能變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況且在李汝珍的眼裏，科舉不必限於詩賦，更不必限於八股。他在淑士國裏曾指出：

> 試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曆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要上進，卻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這豈是熱中陋儒的見解！

況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選舉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到女子參政。關於女子教育一層，有黑齒國作例，不消說了。關於參政一層，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還不敢作澈底的主張，所以武則天皇帝的女科規例裏，關於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虛榮與封贈，而不明言政權，至多只說『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量才擢用』。內廷供奉究竟還只是文學侍從之官，不能算是澈

底的女子參政。

然而我們也不能說李汝珍沒有女子參政的意思在他的心裏。何以見得呢？我們看他於一百個才女之中，特別提出陰若花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四個女子；他在後半部裏尤其處處優待陰若花，讓他回女兒國做國王，其餘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們臨行時亭亭的演說：

亭亭正色道：「……愚姊志豈在此？我之所以歎嗟者，有個緣故。我同他們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國，無非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勅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國，正是千載難逢際遇。將來若花姊姊做了國王，我們同心協力，各矢忠誠，或定禮制樂，或興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舉賢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牘，扶佐他做一國賢君，自己也落個女名臣的美號。日後史冊流芳，豈非千秋佳話！……」

這是不是女子參政？

三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曾大胆的提出婦女問題的各個方面來作公平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的初年，才出了這個多才多藝的李汝珍，費了十幾年的精力來提出這個極重大的問題。他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虛心的討論，審慎的建議。他的女兒國一大段，將來一定要成為世界女權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選舉等等問題的見解，將來一定要在中國女權史上佔一個很光榮的位置：這是我對於鏡花緣的預言。也許我和今日的讀者還可以看見這一日的實現。

十二年，二月至五月，陸續草完。

跋紅樓夢考證

（一）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裏，曾根據於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三部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1）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二一三）

（2）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

（3）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裏，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二一五－六）

(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一七二〇）；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我那時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為我知道四松堂集裏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楊鍾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對於四松堂集，已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跑來說，『四松堂詩集找着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說，他在一家書店裏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裏桌子上擱着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箋上題着『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眞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爲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裏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有一個『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題上都帖着一塊小紅箋。題下注的甲子，都被編書的人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着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永𢡟（也是清宗室裏的詩人，有神清室詩稿）劉大觀紀昀的序，有敦誠的哥哥敦敏作的小傳。全書六冊，計詩兩冊，文兩冊，鷦鷯菴筆麈兩冊。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所採的詩文都是從這裏面選出來的。我在考證裏引的那首『寄懷曹雪芹』，原文題下注一『霑』字，又『揚州舊夢久已絕』一句，原本絕

字作覺，下帖一籤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雪橋詩話說曹雪芹名霑，爲楝亭通政孫，即是根據于這兩條注的。又此詩中「蓟門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時余在喜峯口。」按敦敏作的小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敦誠在喜峯口。此詩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證引的「佩刀質酒歌」雖無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題下注「癸未」，大概此詩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這兩首之外，還有兩首未刻的詩：

（1）贈曹芹圃（注）即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誰買與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這詩使我們知道曹雪芹又號芹圃。前三句寫家貧的狀況，第四句寫盛衰之感。（此詩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2)輓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注：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適按，此二句又見于鷦鷯菴筆麈，楊鍾羲先生從筆麈裏引入詩話；楊先生也不曾見此詩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

這首詩給我們四個重要之點：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考證裏的猜測還不算大

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聲明一句。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三），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敦誠『寄懷曹雪芹』的詩注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有一點小誤。雪芹曾隨他的父親曹頫任江寧織造任上。曹頫做織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一七一五——二八）；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十年（一七一九——二八）。曹家三代四個織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入這一條小注，那時距曹寅死時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誠與袁枚有同樣的錯誤。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4）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裏的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裏，又可以知道敦誠生於雍正甲寅（一七三四），死於乾隆戊申（一七九一），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裏的推測。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裏借來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鷦鷯菴筆麈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裏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

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十一，五，三。

（二）

——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

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是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 知其（紅樓夢）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爲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爲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爲允礽，以鳳

姐哭向金陵而推爲佘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爲健菴，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爲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爲徐元文，寶蟾之疑爲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始不列入。自以爲審愼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强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關於這一段『方法論』，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顯的是孽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即是田千秋，孫汶即是孫文，莊壽香即是張香濤，祝寶廷即是寶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劍雲即是江標字劍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

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爲馮粹中，莊紹光之爲程綿莊，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裏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讀完質園詩集三十二卷，不曾尋着一毫證據，只好把這個好謎犧牲了。又如杜少卿之爲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係；直到我尋着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舉出的人，至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於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竟尋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在人物的書，我們尙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三國志，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遊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紅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顧頡剛先生曾舉出兩個重要理由：

（1）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只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爲女，官僚和文

人都會變成宅眷？

(2)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係的就會發生關係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爲允礽，黛玉爲朱竹垞，薛寶釵爲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

顧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申了。蔡先生曾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這個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爲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裏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裏西門慶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我對於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贊同的是他的第二節。這一節的大旨是：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

著作之內容，卽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大錯的。蔡先生引託爾斯泰傳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敍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試問作此傳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這樣考證各書的『情節』呢？蔡先生又引各家關於 Faust 的猜想，試問他們若不知道 Goethe 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 Gretchen 爲誰呢？

我以爲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卽如兒女英雄傳一書，用年羹堯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間的序，一篇乾隆年間的序。我們幸虧知道著者文康是咸豐同治年間人；不然，書中提及紅樓夢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寶鑑（道光中作的）裏的徐度香與袁寶珠，豈不都成了靈異的預言了嗎？

即如儒林外史裏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現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於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了。又舊說儒林外史裏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時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敍述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說，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爲向來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個大問題。因爲不知道曹家有那樣富貴繁華的環境，故人都疑心賈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爲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書是指斥滿洲人的。因爲不知道曹家盛衰的歷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爲曹雪芹把眞事隱去的自敍傳。現在曹雪芹的歷史和曹家的歷史既然有點明白了，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這

樣的批評，是我所極歡迎的。我曾說過：

我在這篇文章裏，處處想擺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此間所謂『證據』，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並不是那些『紅學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若離開了作者，時代，版本等項，那麼，引東華錄與引紅礁畫槳錄是同樣的『不相干』；引許三禮郭琇與引冒辟疆王漁洋是同樣的『不相干』。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徵，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大觀園裏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菴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靑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羣芳譜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馬鏗倫理學裏，（部甲，四，一〇九九a）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爲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旣是愛智慧的人，爲維持眞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眞理旣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眞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附錄　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蔡孑民

——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

余之爲此索隱也，實爲郎潛二筆中徐柳泉之說所引起。柳泉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余觀石頭記中，寫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正與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賄金豆，以金鎖影之；其假爲落馬墜積潴中，則以薛蟠之似泥母豬

影之。西濱之魁中科第，以妙玉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獄中，以被劫影之。又如以妙字影姜字；以玉字影英字；以雪字影高士字，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爲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爲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爲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爲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爲健菴；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爲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爲徐元文；寶蟾之疑爲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爲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强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然胡先生之言，實有不能强我以承認者。今貢其疑於左：

（一）胡先生謂『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

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又云：『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蹟家世；著者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案考定著者，時代，版本之材料，固當搜求。從前王靜菴先生作紅樓夢評論，曾云：『作者之姓名（徧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顧無一人爲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又云：『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爲惟一考證之題目。』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歷，業於短時期間，搜集多許材料。誠有功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菴先生之遺憾矣。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决非無考證

之價值。例如我國古代文學中之楚詞，其作者爲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時代，在楚懷王襄王時，卽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間。久爲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如王逸所舉者，固無非內容也。其在外國文學，如 Shakespeare 之著作，或謂出 Bacon 手筆，遂生作者究竟是誰之問題。至於 Goethe 之 Faust，則其所根據的神話與劇本，及其六十年間著作之經過，均爲文學史所詳載。而其內容，則第一部之 Gretchen 或謂影 Elsassirin Friederike（Bielschowsky之說），或謂影 Frankfurter Gretchen（Kuno Fischer之說）。第二部之 Walpurgisnacht 一節爲地質學理論。Helena 一節爲文化交通問題。Euphorion 爲英國詩人 Byron 之影子。（各家所同。）皆情節上之考證也。又如俄之託爾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無甚疑問。近日張邦銘鄭陽和兩先生所譯 Salolea 之託爾斯泰傳，有云：『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

翁，如伊爾屯尼夫，鄂崙玲，聶乞魯多夫，賴文，畢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冀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家庭樂敘其少年時情場中之一事，並表其情愛與婚姻之意見；書中主人翁既求婚後，乃將少年狂放時之惡行，縷晳不諱，授所愛以自懺。此事，託爾斯泰於家庭樂出版三年後，向索利亞柏斯求婚時，實嘗親自為之。即戰爭與平和一書，亦可作託爾斯泰之家乘觀。其中老樂斯脫夫，即託爾斯泰之祖。小樂斯脫夫，即其父。索利亞，即其養母遠善娜，嘗兩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樂斯脫夫，即其姨遠善娜柏斯。畢索可夫與賴文，皆託爾斯泰用以自狀。賴文之兄死，即託爾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復活書中聶乞魯多夫之奇特行動，論者謂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實即的米特利生平留於其弟心中之一記念；的米特利娶一娼，與聶乞魯多夫同也。』亦情節上之考證也。然則考證情節，豈能概目為附會而拒斥之？

（二）胡先生謂拙著索隱所闡證之人名，多是『笨謎』，又謂『假使一部紅樓

夢眞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眞不值得猜了』。但拙著闡證本事，本兼用三法，其如前述。所謂姓名關係者，僅三法中之一耳；卽使不確，亦未能抹殺全書。況胡先生所謂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在彼輩方謂如此而後『値得猜』也。世說新書稱曹娥碑後有『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卽以當『絕妙好辭』四字。古絕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以藁砧爲夫，以大刀頭爲還。南史記梁武帝時童謠有『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等句，謂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後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品花寶鑑，以侯公石影袁子才，侯與袁爲猴與猿之轉借，公與子同爲代名詞，石與才則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占八斗』之語來。兒女英雄傳，自言十三妹爲玉字之分析，已不易猜；又以紀獻唐影年羹堯，紀與年，唐與堯，雖尙簡單；而獻與羹則自『犬曰羹獻』之文來。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卽如儒林外史之莊紹光卽程綿莊，馬純上卽馮粹中，牛布衣卽朱草衣，均爲胡先生所承認。（見胡先生所著吳敬梓傳及附錄。）然則金和

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號陶朱公，而以范易陶；萬字俗作万，而以萬代方；亦非『笨謎』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

（三）胡先生謂拙著中劉老老所得之八兩及二十兩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兩，沒有下落；謂之『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案石頭記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隱，不過數十則；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闕之，此正余之審慎也。若必欲事事證明而後可，則石頭記自言著作者有石頭，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諸人，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曹雪芹；石頭記中有許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南巡一事；將亦有『任意去取沒有道理』之誚與？

（四）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斷定石頭記是『曹雪芹的自敍傳』，『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裏甄賈（眞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案書中既云眞事隱去，並非僅

隱去眞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叙之事爲眞。又使寶玉爲作者自身之影子，則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鄙意甄賈二字，實因古人有正統僞朝之習見而起。賈雨村舉正邪兩賦而來之人物，有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吾疑甄寶玉影宏光，賈寶玉影允礽也。）若以趙嬤嬤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四次接駕，爲甄家即曹家之確證，則趙嬤嬤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謂賈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賈政爲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頫相應，謂賈政即影曹頫。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聞曾放學差也。且使賈府果爲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爲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且許三禮奏參徐乾學，有曰：『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余國柱），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

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濟人」之對云云。今觀石頭記第五十五回，有『剛剛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之說。第四回，有『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之護官符。顯然爲當時一謠一對之影子，與曹家何涉？故鄙意石頭記原本，必爲康熙朝政治小說，爲親見高徐余姜諸人者所草。後經曹雪芹增删，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家也。

民國十一年一月三十日。

水滸續集兩種序

（一）

這部水滸續集是合兩種書做成的。一部是摘取百十五回本水滸傳的第六十六回以後，是爲征四寇。一部是淸初陳忱做的水滸後傳。我們的本意是要翻印水滸後傳；但後傳是接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做的，不能直接現行的七十回本。因此，我們就不能不先印行石碣發見以後的半部故事：這是征四寇翻印的第一個原因。征四寇一書，外間止有石印的劣本。這部書確是百十五回本的後半部；我們現在既知道百十五回本裏不但保存了百回本裏征遼和征方臘的兩大部分，並且還保存了最古本裏征田虎和征王慶的兩大部分，那麼，這部征四寇確也有保存流通的價值了。這是翻

印征四寇的第二個原因。百十五回（英雄譜）本的水滸傳有許多地方用詩詞或駢文來描寫風景和軍容，——例如此本第三十五回內寫江上風景的一萼紅（頁四），和三十六回寫淮西水軍一段（頁四），——都是今本征四寇所沒有的。這種平話的套頭還可以看見百十五回本之古，所以我們用百十五回本來校補征四寇，弄出這個比較完善的征四寇來。這是翻印征四寇的第三個原因。

但征四寇的部分，除了他的史料價值之外，卻也有他自身的文學價值。我在水滸傳後考裏曾引了燕青辭主一段（文存三，頁一七八），和宋江之死一段（文存三，頁一六七）。現在我且引魯智深圓寂一段：

卻說魯智深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是夜智深忽聽江潮聲響，起來持了禪杖搶出來。衆僧驚問其故，智深曰，『洒家聽得戰鼓響，俺要出去廝殺。』衆僧笑曰，『師父錯聽了。此是錢塘江上潮信響。』智深便問，『怎的叫做潮信？』衆僧推窗，指着潮頭，對智深說曰，『這潮信日夜

兩番來。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子時潮來。因不失信，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大悟曰，『俺師父智真長老曾囑咐俺四句偈曰，「逢夏而擒」，前日捉了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應了此言。』便問衆，『如何是圓寂。』衆僧曰，『佛門中圓寂便是死。』智深笑道，『既死是圓寂，洒家今當圓寂，與我燒桶湯來，洒家沐浴。』衆僧卻去燒桶湯來。智深洗沐，換一身淨衣，令軍校去報宋江，『來看洒家。』又寫了數句偈語，去法堂焚起眞香，在禪椅上，左脚踏右脚，自然而化。

及宋江引衆頭領來看時，智深在禪椅上不動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枷，這裏扯斷玉鎖。

錢塘江信潮來，今日方知是我。

這種寫法，自不是俗手之筆。又在末回寫宋徽宗在李師師家中飲酒，醉後入夢，夢

遊梁山泊一段：

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上皇坐定，見階下拜伏者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宋江向前垂淚啟奏曰，『臣等不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自從陛下招安，南征北討，兄弟十中損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來，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訖。臣死無怨，但恐李逵知而懷恨，輒生異心，臣亦與藥酒飲死。吳用花榮亦忠義而皆來，在臣塚上俱各自縊身死。……申告陛下，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鑒。』

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御筆印封黃酒。不知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卿等有此冤屈，何不詣九重深處，顯告寡人？』

宋江正待啟奏，忽見李逵手把雙斧，厲聲叫曰，『無道昏君，聽信四個賊臣，屈壞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吃這一驚，忽然覺來，乃是一夢。睜開雙眼，見燈燭熒

煌，李師師猶然未發。……

這種地方都帶有文學意味。

征四寇的內容可分六大段：

(1)梁山泊受招安的經過，——第一回至第十一回。

(2)征遼，——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

(3)征田虎，——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八回。

(4)征王慶，——第二十九回至第四十回。

(5)征方臘，——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七回。

(6)結束，——末二回。

關於這幾部分的考證與批評，我在前兩篇水滸傳考證裏已約略說過了。（看文存三，頁一二四—一二六，又三，一五七—一七一。）我希望讀者特別注意此書中寫王慶和柳世雄和高俅的關係一大段，用這一段來比較今本水滸第一回寫高俅王進柳世權的關係

的一段。（看文存三，一五九—一六一。）這種比較是很有益的，不但可以看出今本水滸的技術上的優點，還可以明瞭征四寇在「水滸演進史」上的位置。

我在水滸傳後考裏曾略述百廿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並且指出百廿回本寫田虎王慶的部分，和百十五回本有大不相同的地方。（文存三，頁一六四—一六六。）現在百十五回本已在這裏保存了。今年上海涵芬樓收買到百廿回本的水滸傳，前有「發凡」十一條，有楊定見序，與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所藏本相同。聽說此書不久也要排印出版。從此百十五回本與百廿回本都重在人間流通了，研究水滸傳的人又可添許多比較參證的材料了。

（二）

水滸後傳四十卷，原稱「古宋遺民著，雁岩山樵評」。俞樾據沈登瀛南潯備志，考定此書是雁宕山樵陳忱做的。今年承顧頡剛先生代我在汪曰楨南潯鎮志裏尋

出許多關於陳忱的材料，竟使我可以做陳忱的略傳了。

南潯鎮志卷十二，頁廿二上云：

> 陳忱，字遐心，號雁蕩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潯，閱數傳至忱。（研志居瑣錄）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范志）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董志）好作詩文，鄉薦紳咸推重之。惜貧老以終，詩文雜著俱散佚不傳。（瑣錄）

這部志的體裁最好，傳記材料俱注明出處。研志居瑣錄是范穎通的，董志是乾隆五十一年董肇鏜的南潯鎮志，范志是道光廿年范來庚續修的。

在著述一門裏，有

> 陳忱　雁宕雜著（佚）
> 　　　雁宕詩集二卷（未見）

汪氏注云：

按范志，忱又有讀史隨筆。攷……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字用寬，甲午副貢，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范志因以致誤。……

中國人名大辭典一〇七二頁上說：

陳忱，清秀水人，字遐心，有讀史隨筆。

這也是把南潯的陳忱和秀水的陳忱混作一個人了。

汪志卷三十，頁十七，又云：

潯人所撰，……彈詞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曲本則有陳忱癡世界，……演義則有……陳忱後水滸。此類舊志不免闌入，今悉不載。

據此看來，陳忱做的通俗文學頗不少，可惜現在只剩這部後水滸了。後水滸開篇有趙宋一代史事的長歌一首，還可以考見他的廿一史彈詞的一部分。

汪志卷三十五，爲志餘，也有幾段關於他的話：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兼逸集以『身名俱隱』稱之。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托宋遺民刊行。

這就是俞樾所根據的話。後水滸絕不是『游戲之作』，乃是很沈痛地寄託他亡國之思，種族之感的書。當時禁網很密，此種書不能不借『古宋遺民』的名字。今本水滸後傳裏還有幾處可以看見著者有意託古的痕跡。第一是雁宕山樵的序末尾寫『萬曆戊申秋杪』。萬曆戊申（一六〇八）在明亡之前三十五年，這明明是有意遮掩亡國之痛的。第二，是原書有『論略』六十多條，末云：『遺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羅之世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元人以塡詞小說爲事，當時風氣如此。』這竟是把此書的著作人硬裝在元朝去了。第三，『論略』末又云：『此藁近三百年無一知者。閒向藏括蒼民家，又遭傖父改竄，幾不可句讀。余懸重價，久而得之。……』著者本是湖州南潯人，既自稱雁宕山樵，又把此書的

來源推到『括蒼民間』去，使人不可捉摸。我們看他這樣有心避禍，更可以明白他著書的本旨了。

汪志卷三十六引沈彤震澤縣志云：

國初吾邑（震澤）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為驚隱詩社，四方同志咸集。今見于葉桓奏詩稿與其他可致者，若上……陳忱雁宕，……玉峯歸莊玄恭，顧炎武寧人，……同邑吳炎赤溟，……王錫闡兆敏，潘檉章力田。……（原文列舉四十餘人，今僅舉其稍知名者六人為例。）於時定亂已四五年；跡其始起，蓋在順治庚寅。（七年，西一六五〇，明亡後七年。）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遯跡林泉，優遊文酒；角巾方袍，時往來于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散。（此指潘吳史案。）

這一段可見陳忱是明末遺民，絕意不仕清朝的。他的朋友多是這一類的亡國遺民。

這一層很可以解釋他托名『古宋遺民』的意思了。

頡剛從汪志裏輯得陳忱的遺詩三首：

明陳忱敬夫。（頡剛案，據此，可知其字爲敬夫。）

移居西村二首

流離憐杜老，還就瀼西居，水作孤村抱，門開烟柳疏。裹沙移藥草，帶雨負殘書。世故雖多舛，南薰且晏如。

溪上雲林合，茅茨落照邊。奇情負山水，雜興託園田。老去詩眞誤，貧來家屢遷。若西清絕處，棲逸在何年？

過長生塔院，訪沈雲樵徐松之，兼呈此山師

寺門松動影離離，縱目西郊欲雪時。故國棲遲遺老在，新亭慷慨幾人知？愁深失計三年別，亂極猶談一日詩。雖是支公超物外，歲寒窐裏亦低眉。

這詩裏的此山和尙也是一個遺老，原姓周，名廏，字瀫城；他本是一個秀才，明亡後便做了和尙。長生塔院是他爲他的師父明聞募建的，遺民黃周星題歲寒堂扁額。（汪志卷十五）黃周星字九煙，明朝遺臣，流寓在南潯，康熙間投水死。黃周星和呂留良（晚村）往來最密，晚村的東莊詩存裏有許多贈他的詩。內有寄黃九煙一詩首句云：「鬪道新修諧俗書，文章賣買價何如？」自注云：「時在杭，爲坊人著稗官書。」可見當時那一班遺民常常替書坊編小說書爲餬口計。這部水滸後傳也許是陳忱當時替書坊編的。

陳忱的生卒年月，現已不可考了。他的自序假託于一六〇八，而他們的詩社起于一六五〇；我們也許可以假定他生于萬曆中葉，約當一五九〇；死于康熙初年，約當一六七〇，年約八十歲。鄭成功據臺灣在一六六〇年。水滸後傳寫的暹羅，似暗指鄭氏的臺灣，故我們假定陳忱死在康熙時。

（三）

水滸後傳裏的人物，除了幾個後一輩的少年英雄之外，都是前傳裏剩餘的人物。後傳的領袖是混江龍李俊。忠義水滸傳第九十九回曾說宋江征方臘回來，到了蘇州，李俊詐稱風疾不起；宋江行後，李俊和童威童猛三人自來尋費保等，他們到榆柳庄上，把家財賣了，造了大船，多貯鹽米，開出太倉港，入海，到外國去。後來李俊做了暹羅國王，童威等俱做官人（此據日本譯本）。這就是後傳裏李俊做暹羅王的故事的根據。後傳因為前傳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故不能不認李俊為主要人物，既認了一個潯陽江上的漁戶作主要人物，自不能不極力描寫他一番。後傳第九回裏寫李俊「不通文墨，識見却是暗合」，這便是古人描寫劉邦石勒的方法了。

但後傳的主要人物究竟還要算浪子燕青。凡是後傳裏最重要的事業，差不多全是燕青的主謀，所以後來在暹羅國裏李俊做了國王，柴進做了丞相，燕青便做了副

丞相；燕青是奴僕出身，故首相不能不讓給門閥光榮的柴進；然而燕青却特別加封文成侯，特賜『忠貞濟美』的金印，這又可見著者對燕青的偏愛了。本來在前傳裏，燕青已立了大功，運動李師師，運動徽宗，以成招安之局，都是他的成績。末段征方臘回來，燕青獨能看透功成身退之旨，飄然遠遁，留詩別宋江道：

> 情願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虀過此生。

這種地方，都可見百回本的著者早已極力描摹燕青的才能和人格；後傳裏燕青地位之高也是很自然的。

水滸後傳是一部泄憤之書，這是著者自己在論略裏說過的。他說：

> 後傳爲泄憤之書：憤宋江之忠義而見鴆於奸黨，故復聚餘人而救駕立功，開基創業；憤六賊之誤國，而加之以流貶誅戮；憤諸貴倖之全身遠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圍冒險；憤官宦之嚼民飽壑，而故使其傾倒宦

囊，倍儆民利。

這是著者自己對於此書的意見。我們看他舉出的四件事，第四事散見各回，不便詳舉；第一事在第三十七八回，第二事在第二十七回，第三事在第二十四回。這都是著者寄託最深，精神最貫注的地方，我們可以特別提出來，以表示這書的眞價值。

（一）救國勤王的運動　後傳描寫北宋滅亡時的情形，處處都是借題發洩著者的亡國隱痛。第七回先寫趙良嗣獻計，聯合金國，夾攻遼國；第十五回寫此策之實行，寫燕雲的收復；第十九回寫宋朝納張瑴之降，與金國開釁，金兵大舉征宋。在第十九回裏，徽宗傳位於太子，改元靖康；呼延灼父子隨梁方平出兵防黃河；次回寫汪豹內應，獻了隘口，呼延灼父子被困，金人長驅渡河。第二十二回裏，金兵進圍汴京。第二十三回寫姚平仲之敗，郭京法術不靈，汴京破了，二帝被擄，康王即位於南京。

以上寫北宋的滅亡，雖然略加穿插，大體都不違背歷史的事實。第二十五回寫

金人立劉豫爲齊帝，大刀關勝不肯降金，劉豫要將他斬首，幸得燕青用計救了他。

此事也有歷史的根據。金史劉豫傳說：

　關勝者，濟南驍將，屢出城拒敵。豫殺勝出降。

又宋史劉豫傳說：

　劉豫懲前恐，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欵。

又王象春齊音云：

　金兵薄濟南，守將關勝善用大刀，屢戰兀朮。金人賄劉豫，誘勝殺之。（此據梁學昌庭立記聞上，頁廿五引。原書未見。但梁氏說，『是勝未嘗降金也，宋史誤。』今按宋史並未言關勝降金，不誤。）

第二十六回寫飲馬川的好漢李應燕青等大破劉猊的金兵。大勝之後，他們決議『去投宗留守，共建功業，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他們南行時，在黃河渡口，遇

著叛臣汪豹和金國大將烏祿的大兵，打了一仗，殺敗金兵，生擒汪豹，用亂箭把他射死。但宗澤已嘔血死了，兀朮南下，汴京再陷，飲馬川的豪傑無處可投奔，只好上登雲山去落草，暫作安頓。

後傳寫這班梁山泊舊人屢次想出來勤王救國，雖多是懸空造出的事實，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關勝之死於國事，是正史上有記載的。當時人心思宋，大河南北，豪傑並起，收拾敗殘之局，以待國家大兵，——這是宗澤岳飛諸人所常提及的事。直到二三十年後，山東尚有耿京辛棄疾南歸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說水滸後傳所說勤王的豪傑，雖出於虛造，却也可代表當時的人心。

衆豪傑後來都到暹羅去了，但他們終不忘故國，第三十七回特寫宋高宗在牡蠣灘上被金兵困住，李俊燕青等領水師，攻破阿黑麻的兵，救了高宗。這一段故事全是虛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來表現他心裏的希望。那時明永曆帝流離南中，鄭成功出沒海上，難怪當日的遺民有牡蠣灘救駕，暹羅國酬勳的希望了。

（二）誅殺奸臣的快事　金兵圍汴京時，欽宗用當時的公論，貶逐一班奸臣。水滸後傳爲省事起見，把這班貶逐的姦臣分作兩組。王黼楊戩梁師成爲一組，押赴播州。李綱與開封府尹聶昌商議，派勇士王鐵杖跟他們去，到雍丘驛，晚上把他們都刺死了（第二十二回）。這事也有根據。宋史王黼傳云：

金兵入汴，黼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

楊戩死於宣和三年，死時還贈太師吳國公。梁師成貶爲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府吏護至貶所，在路上把他縊死了，以暴死奏聞，詔籍其家。這件事似乎也是聶山幹的。陳忱把這三人湊在一起，把那善終的楊戩也夾在裏面，好叫讀者快意。

還有那蔡京蔡攸童貫高俅的一組的結局，卻全是陳忱想像出來的了。按宋史蔡

京貶儋州，行至潭州病死，年八十。蔡攸貶逐後，詔遣使者隨所至誅之。高俅得善終，事見宋人筆記。童貫竄英州，未至，詔數他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澂追至南雄，誅之，函首赴闕，梟于都市。陳忱却把這四個人合在一組，叫蔡京主張改裝從小路往貶所去。不料行到了中牟縣，被燕青遇見了。燕青走來對李應衆人說道：「偶然遇着四位大貴人，須擺個盛筵席待他。」

這個盛筵席果然擺好了。

酒過三巡，蔡京高俅舉目觀看，却不認得。……又飲夠多時，李應道：「太祖皇帝一條桿棒打盡四百軍州，掙得萬里江山，傳之列聖。道君皇帝初登寶位，即拜太師為首相，……怎麼一旦汴京失守，二帝蒙塵，兩河盡皆陷沒，萬姓俱受災殃？是誰之過？」

蔡京等聽了，踧踖不安，想道：「請我們吃酒，怎說出這大帽子的話來！」面面相覷，無言可答，起身告別。

李應道：『雖然簡褻，賤名還未通得，怎好就去？』喚取大杯斟上酒，親捧至蔡京面前，說道：『太師休得驚慌。某非別人，乃是梁山泊義士宋江部下撲天鵰李應便是。承太師見愛，收捕濟州獄中；幸得救出，在飲馬川屯聚，殺敗金兵；今領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不意今日相逢，請奉一盃。』……蔡京等驚得魂飛魄散，推辭不飲，只要起身。李應笑道：『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且請寬坐。』

接着便是王進和柴進起來數高俅的罪狀。裴宣起來，舞劍作歌，歌曰：

皇天降禍兮，地裂天崩。二帝遠狩兮，凜凜雪冰。奸臣播弄兮，四海離心。今夕殄滅兮，浩氣一伸！

押差官起來告辭，樊瑞圓睜怪眼，倒豎虎鬚道：

你這甚麼乾鳥，也來講話！我老爺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四個奸賊，不要說把我一百單八個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錦繡般江山都

被他弄壞，遍天豺虎，滿地屍骸，二百年相傳的大宋，瓦敗冰消，成甚麼世界！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你這乾鳥，若再開口，先砍你這顆狗頭！

底下便是一段很莊嚴沈痛的文字：

李應叫把筵席搬開，打掃乾淨，擺設香案，焚起一爐香，率領衆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靈，望北拜了二帝，就像啓奏一般，齊聲道：『臣李應等爲國除奸，上報聖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積憤。』都行五拜三叩頭禮。禮畢，抬過一張桌子，喚請出牌位來供在上面，却是宋公明，盧俊義，李逵，林冲，楊志的五人名號。點了香燭，衆好漢一同拜了四拜，說道：『宋公明哥哥與衆位英魂在上：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貫蔡攸四個奸賊在此。生前受他謀害，今日特爲伸冤。望乞照鑒！』

蔡京等四人盡皆跪下，哀求道：『某等自知其罪，但奉聖旨，去到脩

州，甘受國法。望衆好漢饒恕！』

李應道：『……你今日討饒，當初你饒得我們過嗎？……只是石勒說得好：王衍諸人，要不可加以鋒刃。前日東京破了，有人在太廟裏看見太祖誓碑：「大臣有罪，勿加刑戮」，載在第三條。我今凛遵祖訓，也不加兵刃，只叫你們嘗嘗鴆酒滋味罷！』

喚手下斟上四大碗。蔡京高俅童貫蔡攸滿眼流淚，顫篤速的，再不肯接。李應把手一揮，只聽天崩地裂，發了三聲大砲；四五千人齊聲吶喊，如震山搖嶽。兩個伏事一個，扯着耳朵，把鴆酒灌下。

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竅流血，死於地下。……李應叫把屍骸拖出城外，任從鳥啄狼餐。

這一大段『中牟縣除奸』的文章，在第二流小說裏是絕無而僅有的。這都因爲著者抱亡國的隱痛，深恨明末的貪官汚吏，故作這種借題泄憤的文章。他的感情的真摯

遂不自由地提高了這部書的文學價值了。

(三)黃柑青子之獻　這一段是水滸後傳裏最感動人的文章。徽欽二帝被擄之後，楊林戴宗要同到飲馬川去了，燕青不肯走，說，『還有一段心事要完。』次早燕青扮做通事模樣，拿出一個藤絲織就紫漆小盒兒，口上封固了，不知甚麼東西在裏面，要楊林捧着，從北而去。他走進金兵大營裏去，楊林見了那大營的軍容，不覺寒抖不定；燕青神色自若，居然騙得守兵的允許，進去朝見道君皇帝。

……道君皇帝一時想不起，問『卿現居何職？』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當年元宵佳節，萬歲幸李師師家，臣得供奉，昧死陳情；蒙賜御筆，赦本身之罪，龍劄猶存。』遂向身邊錦袋中取出一幅恩詔，墨跡猶香，雙手呈上。

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元來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義之士，多建大功；朕一時不明，爲奸臣蒙蔽，致令沈鬱而亡。朕

甚悼惜。若得還宮，說與當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廟，子孫世襲顯爵。」

燕青謝恩，喚楊林捧過盒盤，又奏道：「微臣仰覩聖顏，已為萬幸。獻上青子百枚，黃柑十顆，取苦盡甘來的佳讖，少展一點芹曝之意。」

齊眉獻上，上皇身邊止有一個老內監，接來啓了封蓋。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納在口中，說道：「連日朕心緒不寧，口內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煩。」嘆口氣道：「朝內文武官僚世受國恩，拖金曳紫；一朝變起，盡皆保惜性命，眷戀妻子，誰肯來這裏省視！不料卿這般忠義！可見天下賢才傑士原不在近臣勳戚中！朕失於簡用，以致於此。遠來安慰，實感朕心。」命內監取過筆硯，將手中一柄金鑲玉靶白紈扇兒，弔著一枚海南香雕螭龍小墜，放在紅氍之上，寫一首詩道：

笳鼓聲中藉毳茵，普天僅見一忠臣。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賚黃柑

慶萬春！

寫罷，落個款道：「教主道君皇帝御書」。就賜與燕青道：「與卿便面。」燕青伏地謝恩。上皇又喚內監分一半青子黃柑：「你拿去賜與當今皇帝，說是一個草野忠臣燕青所獻的。」

…………

兩個取路回來，離金營已遠，楊林伸着舌頭道：「嚇死人！早知這個所在，也不同你來。虧你有這膽量！……我們平日在山寨，長罵他（皇帝）無道；今日見這般景象，連我也要落下眼淚來。」

這一大段文章，眞當得「哀豔」二字的評語！古來多少歷史小說，無此好文章；古來寫亡國之痛的，無此好文章；古來寫皇帝末路的，無此好文章！

水滸後傳在坊間傳本甚少，精刻本更不易得；但這部書裏確有幾段很精采的文

字，要算是十七世紀的一部好小說。這就是我們現今重新印行這部書的微意了。

十二，十二，二十。

三國志演義序

三國的故事向來是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想像力與興趣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中國歷史上只有七個分裂的時代：(1)春秋到戰國，(2)楚漢之爭，(3)三國，(4)南北朝，(5)隋唐之際，(6)五代十國，(7)宋金分立的時期。這六個時代之中，南北朝與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時期，心理上總有一點『華夷』的觀念，大家對於『北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故南北朝不成演義的小說，而南宋時也只配做那偏於『攘夷』的小說（如說岳）。其餘五個分立的時期都是演義小說的好題目。分立的時期，人才容易見長，勇將與軍師更容易見長，可以不用添枝添葉，而自然有熱鬧的故事。所以東周列國志，七國志，楚漢春秋，三國志，隋唐演義，五代史平話，殘唐五代等書的風行，遠勝於兩漢演義，兩晉演義等書。但這五個分立時期之

中，春秋戰國的時代太古了，材料太少；况且頭緒太紛煩，不容易做的滿意。楚漢與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像力來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熱鬧的故事。五代十國頭緒也太繁，况且人才並不高明，故關於這個時代的小說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國時代，魏蜀吳的人才都可算是勢均力敵的，陳壽裴松之保存的材料也很不少；况且裴松之注三國志時，引了許多雜書的材料，很有小說的趣味。因此，這個時代遂成了演義家的絕好題目了。

三國志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唐朝已有說三國故事的了。段成式酉陽雜俎說：『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劇，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編鵲字，上聲。』又李商隱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這都可證晚唐已有說三國的。宋朝『說話』的風氣更發達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北宋晚年的『說話』，共有許多科，內中『說三分』是一種獨立科目，不屬於『講史』一科，竟成了一種專科了。蘇軾志林說：

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宋金分立的時代，南方的平話，北方院本，都有這一類的歷史故事。現在可考見的，只有金院本中的襄陽會。到了元朝，我們的材料便多了。錄鬼簿與涵虛子記的雜劇名目中，至少有下列各種是演三國故事的：

王　曄　臥龍岡。

朱　凱　黃鶴樓。

王實甫　陸績懷橘，曹子建七步成章。

關漢卿　管寧割席，單刀會。

尚仲賢　諸葛論功。（錄鬼簿作「武成廟諸葛論功」，不知是否三國故事。）

高文秀　周瑜謁魯肅，劉先主襄陽會。

鄭德輝　王粲登樓，三戰呂布（二本）。

武漢臣　三戰呂布（二本）。（按錄鬼簿，武作的是一部分，餘為鄭作。）

王仲文　諸葛祭風，五丈原。

于伯淵　斬呂布。

石君寶　哭周瑜。

趙文寶　燒樊城糜竺收資。

無名氏　連環計，博望燒屯，隔江鬥智。

這十九種之中，現在只有單刀會，博望燒屯（日本京都文科大學影刻的元人雜劇三十種之二），連環計，隔江鬥智，王粲登樓（臧刻元曲選百種之一），五種存在。

明朝宗室周憲王的雜劇十段錦之中，有關雲長義勇辭金一種，現在也有傳本（董康

劇的）。

我們研究這幾種現存的雜劇，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國故事大概與現行的三國演義裏的故事相差不遠。內中只有王粲登樓一本是捏造出來的情節；如說蔡邕做丞相，曹子建稱他爲學士，王粲上萬言策，得封天下兵馬大元帥：都是極淺薄的捏造。其餘的幾本，雖有小節的不同，但大體上都與三國演義相差不多。我們從這些雜劇的名目和現存本上，可以推知元朝的三國故事至少有下列各部分：

（1）呂布故事：虎牢關三戰呂布，連環計，斬呂布。

（2）諸葛亮故事：臥龍岡，博望燒屯，燒樊城，襄陽會，祭風，隔江鬥智，哭周瑜，五丈原。

（3）周瑜故事：謁魯肅，隔江鬥智，哭周瑜。

（4）劉關張故事：三戰呂布，斬呂布，及以上諸劇。

（5）關羽故事：義勇辭金，單刀會。

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個被人痛恨的人物，（見上引蘇軾的話。）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個足計多謀的軍師，而關羽已成了一個神人。（義勇辭金裏稱他爲「關大王」；單刀會是元初的戲，題目已稱「關大王單刀會」了。）

（6）曹植管寧等小故事。

散文的三國演義自然是從宋以來「說三分」的「話本」變化演進出來的。宋時已有很好的短篇小說，如新發現的京本通俗小說（在煙畫東堂小品中），便是很明白的例。但宋時有無這樣長篇的歷史話本，還不可知。舊說都以爲三國演義是元末明初一個杭州人羅貫中做的。羅貫中，或說是名貫，字本中（七修類稿）；或說是名本，字貫中（續文獻通考）。水滸傳，三國志，隋唐演義，平妖傳等書，相傳都是他做的。大概他是當時的一個演義家，曾做了一些演義體的小說。明初的三國演義也許眞是他做的。但那個本子和現行的三國演義不同。當明萬曆年間，水滸傳的改本已風行了，但三國演義還是很淺劣的。胡應麟在莊嶽委談裏說三國演義『絕淺

陋可嗤』，又說此書與水滸『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可見此書在明朝並不曾受文人的看重。

明朝末年有一個『李卓吾評本』的三國演義出現。此本現在也不易得了；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鈴木豹軒教授藏的一部英雄譜，上欄是百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傳，下欄是這個本子的三國演義。我們不知道這個本子和那明初傳下來的本子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但我們可以斷定這個本子仍舊是很幼稚的。後來清朝初年，有一個毛宗崗（序始），把這個本子大加刪改，加上批評，就成了現在通行的三國志演義。毛宗崗假託一種『古本』，但我們稱他做『毛本』。毛宗崗把明末的本子叫做『俗本』，但我們要稱他做『明本』。

毛本有『凡例』十條，說明他刪改明本之處。最重要的有幾點：

（1）文字上的修正：『俗本（即明本，下同）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

（2）增入的故事：『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關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今悉依古本存之。』

（3）增入的文章：『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今悉依古本增入。』

（4）削去的故事：『如諸葛亮欲燒魏延于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今皆削去。』

（5）削去的詩詞：『俗本每至「後人有詩歎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如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詩館驛屋壁，皆偽作七言律體。……今悉依古本削去。』

（6）辨正的故事：『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雷失箸，及馬騰入京遇

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后罵曹丕，而俗本反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

我們看了這些改動之處，便可以推想明本三國演義的大概情形了。

我們再總說一句：三國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多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

這部書現行本（毛本）雖是最後的修正本，却仍舊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勢力的通俗歷史講義，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學價值的書。爲什麼三國演義不能有文學價值呢？這也有幾個原因：

第一，三國演義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像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此書中最精采，最有趣味的部分在於赤壁之戰的前後，從諸葛亮舌戰羣儒起，到三氣周瑜爲止。三國的人才都會聚在這一塊，「三分」的局

面也定於這一個短時期，所以演義家盡力使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打破歷史事實的束縛，故能把這個時期寫的很熱鬧。我們看元人的隔江鬥智與此書中三氣周瑜的不同，便可以推想演義家運用想像力的自由。因為想像力不受歷史的拘束，所以這一大段能見精采。但全書的大部分都是嚴守傳說的歷史，至多不過能在穿插瑣事上表現一點小聰明，不敢儘量想像創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歷史，而沒有文學的價值。水滸傳全是想像，故能出奇出色；三國演義大部分是演述與穿插，故無從能出奇出色。

第二，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們極力描寫諸葛亮，但他們理想中只曉得『足計多謀』是諸葛亮的大本領，所以諸葛亮竟成一個祭風祭星，神機妙算的道士。他們又想寫劉備的仁義，然而他們只能

寫一個庸懦無能的劉備。他們又想寫一個神武的關羽，然而關羽竟成了一個驕傲無謀的武夫。這固是時代的關係，（參看胡適文存卷一，頁五二一—五三）但三國演義的作者究竟難逃『平凡』的批評。毛宗崗的凡例裏說：

俗本謬託李卓吾先生評閱，……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

這種見地便是『平凡』的鐵證。至於文學的技術，更『平凡』了。我們試看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羣儒一大段，在作者的心裏，這一段總算是極力抬高諸葛亮了；但我們讀了，只覺得平凡淺薄，令人欲嘔。後來寫『三氣周瑜』一大段，固然比元人的隔江鬥智高的多了，但仍是很淺薄的描寫，把一個風流儒雅的周郎寫成了一個妬忌陰險的小人，並且把諸葛亮也寫成了一個奸刁險詐的小人。這些例都是從三國演義的最精采的部分裏挑出來的，尚且是這樣，其餘的部分更不消說了。文學的技術

最重剪裁。會剪裁的，只消極力描寫一兩件事，便能有聲有色。三國演義最不會剪裁；他的本領在於搜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不肯遺漏一點。因爲不肯剪裁，故此書不成爲文學的作品。

話雖如此，然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裏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裏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他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只求一部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廿四史與通鑑綱鑑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古文觀止與古文辭類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要求，我們都曾嘗過他的魔力，我們都曾受過他的恩惠。我們都應該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與感謝！

十一，五，十六。在北京。

（注）作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于此。

三國志演義序

高元國音學序

我的朋友高元先生著的這部國音學，理論非常澈底，證據非常充足，本用不着我這個門外漢來說什麼外行話。但他臨去國時，幾番叮囑我，要我把我對於這部書的意見寫出來做一篇短序；他的意思大概是因爲這部書有許多『駭人聽聞』的議論，故希望我們借這個機會先加入這個討論，引起大家的興趣。我不願意孤負他的好意，故大胆說幾句話。

他這部書的前半，專講學理，加上實驗的證據，在我個人看來，很是滿意的了。後半除講學理之外，還附有兩個重要的辯論：一是他的關等呼論，一是他的絕對廢棄四聲論。這兩個都是很重要的主張，很可以算是國音學上的兩大解放。關等呼論，高先生近來另著專篇，說的更爲詳細，不用我再說了。他的廢棄四聲論，當

這個時候，也許還要引出一些反動的論調。我是贊成這個主張的人，故借這個機會，表出我贊成的理由，並且對於他的主張，提出一個小小的修正。

當民國九年五月國語統一籌備會臨時大會裏錢玄同先生們提出「國音不必點聲」的議案時，我是大會的主席，又是審查委員會的主席。我是贊成這個議案的，但爲調和當時的意見起見，——當時有人提出恰相反的議案，——故我提議，把這個議案改爲「教授國音時不必點聲」。這個修正案，居然通過了。我們贊成廢棄點聲的人當時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後來空氣更順溜時，然後作更進一步的計畫。一年之後，雖不幸有規定五聲標準的議案，雖使人不免有點失望，但同時也有像高先生這樣明快的絕對廢棄論出現，總可以算是滿足了我們的期望了。

我可以預料，五聲的標準是定不出來的。即使定得出來，即使用圖用音譜表示出來，也無法能使多數教員學生懂得記得。現在的國語是北部與中部的調和，但中部的小部分雖保存入聲，北部與西部久已沒有入聲了。北部與西部的廢止入聲，是

語言自然演化的結果，決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使已經天然陶汰了的入聲依舊回到國語裏去，這個入聲的復辟比滿清帝室的復辟還要艱難一千倍，我們如不信這種困難，可以去請教王蘊山先生，問他怎樣教授入聲，就可以知道了。

中國各種方言的比較，可以看出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由最古的廣州話的九聲逐漸減少到後起的北部西部的四聲。（北部雖是古文化的祖墳，但語言却是新進的晚輩；西部語言更晚。）我們知道這個自然趨勢，便知道國語的有入聲是一種勢而無功的調和。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這個趨勢是應該再往前進的，是應該走到四聲完全消滅的地位的。高先生說的不錯：

『假如不定五聲標準，或者因爲紛亂之結果，便可以促進國語的革命，——由單音會語變成複音會語。若服了這一服叫人不死不活的參湯，那革命的動機必定緩和了。可是進行無論遲慢，我相信他必定有可以達到之一日。』

但我對於高先生主張促進這個革命的辦法，却有一點懷疑，他主張兩個辦法：

(1)設法把複音會字大造特造。

(2)把『聲隨』的韻也大增特增。

第一條是不錯的，但第二條是大可不必的，並且是不能用人力來勉強做的。現在只有極力向第一條做去，增加複音會字。實行的手續有兩途：

(1)實行『詞類連書』之法，逐漸提倡把文字中之複音會字，—如『逐漸』，『提倡』，『複音會字』之類，—都連寫起來，上下各空半格，如西文之寫法。印刷時也如此排列。

(2)作文說話時，避免單音字；凡有單音字，極力改爲複音會字。造新名詞時，決不可造單音字。例如英語之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當譯爲『從具體的到抽象的』，決不可如復古派某君譯爲『由著之玄』。

將來這種複音會字的尾字也許有自然變作『聲隨的韻』的——『桌子』也許會變成 tʒuotz，——但我們儘不必去強求他。爲什麼呢？因爲『聲隨的韻』容易消滅，而複音會字不容易消滅。古代的『聲隨』，如 m, p, t, k, 等，已消滅了。北部語言之中，古聲隨的保存，全靠他們的變成複音會字的尾音。例如『甚』的 m 音變成『甚麼』，『恁』的 m 音變成『那麼』，『怎』的 m 音變成『怎麼』，『俺』的 m 音變成『俺們』。複數代名詞『我們』『你們』等的尾音『們』，都是一個時代的 m 尾音，先變成『每』，再變爲『們』。變成『麼』與『們』之後，就不像『m』那樣容易消滅了。

這是我對於高先生的五聲廢止論的一點意見。同這一點稍有連帶關係的是他第五章論中國語的特性的第一條『中國語爲單音會語 (Monosyllable)。』這句話只有一部分的眞理。其實世上沒有純粹單音語的國家，也沒有純粹複音語的國家。中國語在今日決不能叫做『單音會語』了。如『我們』，『絕對的』，豈可認爲單音

字嗎？

十一，一，一二，胡適，在上海大東旅社。

趙元任國語留聲片序

我的朋友趙元任先生去年在北京時，我們曾討論到國音留聲機片，趙先生說出對於製片的許多意見：第一，重在課本，課本選材不當，往往流於乾燥無味，敷衍了事。第二，發音的人若不明白語音和音樂的原理，往往有讀音錯誤和語氣不自然的毛病。那時有一班熱心國語教學的人便勸他自己編一部較完善的課本，自己發音。他很贊成這个意思，後來有了經濟上的援助，這事居然實現了。現在趙先生發音的機片已做成了，他編的課本已印成了，我忍不住要說幾句介紹的話。

我敢說：如果我們要用留聲機片來教學國音，全中國沒有一个人比趙元任先生更配做這件事的了。他有幾種特別天才：第一，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學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國語言之外，還懂得許多中國方言。他學方言的天才確是可驚異的。前年

他回到中國，跟着羅素先生旅行，他在路上就學會了幾種方言。他不但能說許多方言，並且能在短時期之中辨別出各種方言的特別之點。例如一天他和我談起北京話裏『我們』和『咱們』有區別，不可亂用；（看本書第九課（43.4）註）我拿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來細細檢查，果然都有分別。我又問他中國方言中有幾種是有這个區別的，他隨口便舉出了常州，無錫，福州，廈門等處的方言爲例。這種天才眞是很可妬羨的。第二，他又是一个天生的音樂家。他在音樂上的創作，曾得美國音樂大家的賛賞。他的創作的能力，我們不配談；我們只知道他有兩隻特別精細的音樂耳朶，能夠辨別那極微細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種種發音上的區別；他又有一副最會模倣的發聲機官，能夠模倣那極困難的，普通人多學不會的種種聲音。第三，他又是一个科學的言語學者。單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夠用的，至多不過學一个絕頂聰明的『口技家』罷了。但是趙先生依着他的天才的引誘，用他的餘力去研究發音學的學理；他在這裏面的成就也是很高深的。所以無論怎樣雜亂沒有條理的對象，到了

他的手裏，都成了有系統的分類，都成了有線索的變遷。

趙先生有了這幾種特別長處，所以最適宜於做國音留聲機片的編著者和發音人。他這部課本就可以證明我們對他的期望是不虛的。他自己用兩句格言包括他這部書的用處：『目見不如耳聞，耳聞不如口讀。』這兩句話說盡我們平常用的種種模糊影響的，非科學的國音教學法。我們的大病在於偏重目見，偏重紙上的字形。例如『他借去了三本書，至今還（ㄏㄞ）不曾還（ㄏㄨㄢ）我』，上『還』字與下『還』字在紙上是一樣的，在國音字典上也是一樣的，但是耳朵裏聽起來，嘴上說起來，可是兩樣的了。又如本書裏第十課（45）『他做了（ㄌㄧㄠ）了（ㄌㄜ）去了（ㄌㄚ）！』的三个『了』字，有三種不同的發音，也不是眼睛裏看得出來的。（國音字典上也只有一个『ㄌㄧㄠ』音。）又如第六課（35）（ㄇ）『供給（ㄐㄧ）給（ㄍㄟ）他』的兩个『給』字讀法不同。趙先生在這種地方辨別的最精細；這副機片的發音與編課本都出于趙先生一个人，故我們可以說他是能把眼，耳，嘴三項都打成一片的了。

趙先生的最大貢獻是在論聲調的第七八兩課。這兩課雖很簡單，却包含着許多重要的學理。第一，他的分別五聲的方法，用音樂來說明『陰陽賞去入』的腔調，又發明一个『賞半』的變聲。第二，他對於『賞』聲的研究最有價值。他整理出兩條通則來：(1)賞聲下連陰陽去入聲或輕音字，就成『賞半』；(2)賞聲下連賞聲，第一賞聲變陽聲。故賞聲在句子的裏面，幾乎不存在了。第三，他又指出凡五聲的字，在不應該重讀的地位，一概讀為『輕音』。故『張家外頭屋裏處過賊的』的『家，頭，裏，過，的』五字竟無『聲』可說，只是一種輕音。——以上三條都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三條都可以教大家了解『聲』究竟是什麼東西；又可以教我們知道『聲』不是呆板的，是活用的；不是可以用機械的點聲符號來死記的，是要隨着語言的自然變動的。現在爭執『點聲』的重要的人，不可不細細研究這兩課。

此外，本書還有許多同樣重要的貢獻。如第五六兩課校正各處方音裏最容易混亂國音的地方，也是極難得的教材。他舉出的音，如『ㄈ』與『ㄏㄨ』，『ㄨ』與

「ㄈㄨ」，「ㄌ」與「ㄋ」，「ㄒㄧ」與「ㄧ」與「ㄩ」與「ㄒㄩ」，「ㄐㄧ」與「ㄗㄧ」「ㄑㄧ」與「ㄘㄧ」，「ㄒㄧ」與「ㄙㄧ」，「ㄓ」與「ㄗ」，「ㄔ」與「ㄘ」，「ㄕ」與「ㄙ」，「ㄣ」與「ㄥ」，「ㄥ」與「ㄨㄥ」，……都是最容易混亂的音。這種材料最不容易搜的完備；這兩課內中也許有不完備的地方（如裏面用「安徽」二字，區域未免太廣），但大致上是極有用，極可佩服的。我們看了這兩課，便可以知道趙先生學方言的天才；又可以承認這樣的材料，除了趙先生，是沒有旁人能做的。

趙先生在他的許多特長之外，又是一个滑稽的人，生平最喜歡詼諧的風味，最不愛拉長了面孔整天說規矩話。我們讀了他譯的阿麗思夢遊奇境記，都不能不佩服他的詼諧天才。他編這部書，也忍不住時時插入一點滑稽的材料。本來教發音是最枯燥無趣的事，有了趙先生的詼諧材料，讀的人可以減輕多少枯窘的悶境。例如他在第一課裏，「ㄩ」字讀「迂夫子的迂」，「ㄛ」字讀「阿彌陀佛的阿」；第七課(37)舉的例裏「菜油炒麵吃」，「偷嘗兩塊肉」；這都是他的滑稽生性的表現，別

有一種風味，可以打破教科書的傳統的沈悶！至於第十二課的兩篇故事，完全是笑話，更是那『忍俊不禁』的趙元任出現了。有時他覺要請我們猜謎了！（第七課(37,2)註。）我雖然猜不出他的謎兒，但他這點玩世的放肆，我們都該寬恕他的。

最後，我要加一條小注。第十五課裏，趙先生選我的鴿子詩，他替我把末句『鮮明無比』改成『鮮明照地』。他的理由，我是承認的；但『照地』兩字終不大妥當。去年冬間趙先生從美國寄信來，要我剋期回答；恰巧我那時在百忙中，一時想不出滿意的改法，他給我的限期早過去了，我只好隨他改了。今年想想，這四字似乎可改作『十分鮮麗』，不知趙先生贊成嗎？

十一，六，三十，北京。

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

今天的講題是『中學的國文教學』，兩年前民國九年，我曾在北京發表過一次（參看胡適文存卷一，頁三〇三以下），那時候沒有什麼標準，全憑理想立言。兩年以來，漸覺得我那些主張有一部分是禁得起試驗的，有一部分是無法試驗的，有一部分是不能不修正的。此次再來講演這個題目，先就舊主張略說一說，再加以兩年來修正的地方，作為我的新主張。為講演的便利，分為以下四段：

（一）假定的『中學國文標準』

我在兩年前定的——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是：

（1）人人能以國語自由發表思想。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書。

(3)人人能作文法通順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學的機會。

這幾個標準，我現在修改作以下三條：

(1)人人能用國語自由發表思想—作文，演說—都能明白曉暢沒有文法上的錯誤。這一條與舊主張第一條無大差異。我所持理由：因爲國語文容易學習，容易通曉，而且實在重要。以我數年來的觀察，可以說：中學生作古文的，都沒有什麽成績。有許許多多中等學校畢業生都不能用古文發表他自己的思想。然而在這幾年之中，能做通順的白話文的中學生却漸漸多起來了。我們認定一個中學生至少要有一個自由發表思想的工具，故用『能作國語文』爲第一個標準。

(2)國語文通順之後，方可添授古文，使學生漸漸能看古書，能用古書。學生先學習國語文到了明白通順的程度，然後再去學習古文，所謂

『事半功倍』，自然是容易的多。學外國文也是如此，先學好了一種歐洲語言，然後再去學第二種，必定容易的多。還有一個證據是：據我們的觀察和研究所得，可以斷定有許多文字明白通暢的人，都不是在講堂上聽教師講幾篇唐宋八家的殘篇古文而得的成績；實在是他們平時或課堂上偷看小說而來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國語可以幫助古文的學習了。

(3)作古體文但看作實習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學國文的目的。因爲在短時期內，難望學生能作長篇的古文；卽使能作，也沒有什麼用處。這次本社年會國語國文教學分組裏，黎錦熙先生提了一個議案，他說：『中學作文仍應以國語文爲主，……願意學習文言文者，雖可聽其自由，但只可當作隨意科……』，可以做個參考。

以上講完了中學國文標準，現在講第二段：

（二）假定的『中學國文課程』

前年假定的是：國語文佔四分之一，古文佔四分之三。四年合計，中學課程以二十時爲準：國語文所佔五小時內，白話文應佔二小時，語法與作文一小時，演說一小時，辯論一小時；古文所佔十五小時內，古文選本應佔十二小時，文法與作文應佔三小時。

現在我擬定兩個國文課程的標準是：

（1）在小學未受過充分的國語教育的，應該注意下列三項：

（一）宜先求國語文的知識與能力。

（二）繼續授國語文至二三學年，第三四學年內，始得兼授古文，但鐘點不得過多。

（三）四學年內，作文均應以國語文爲主。

（2）國語文已通暢的，也分爲下列三項：

（一）宜注重國語文學與國語文法學。

（二）古文鐘點可稍加多，但不得過全數三分之二。

（三）作文則仍應以國語文爲主。

以上爲中學的國文課程。以下再講第三段：

（三）國語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1）國語文的教材：國語文的教材與九年定的大略相同，不過現在的新主張比較舊主張略有增加。

（一）小說

（二）戲劇與詩歌

（三）長篇議論文與學術文

（四）古白話文學選本　依時代編纂，約自唐代的詩，詞，語錄起，至晚清爲止。這種選本可使學生知道——白話文非少數人提倡來的，乃

是千餘年演化的結果。我們溯追上去，自現在以至於古代，各個時代都有各個時代很好的白話文，都可供我們的選擇。有許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話小詞，元人的白話小令，明清人的白話小說，都是絕好的文學讀物。

(五)國語文的文法

(2)國語文的教授法：此與九年所擬的完全相同。

(A)指定分量，由學生自修。講堂上只有討論，不用講解。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於當代的新潮流，教員在講堂上，除了補充和討論以外，實在沒有講解的必要。

(B)用演說，辯論，作國語的實用教授法。國語文既是一種活的文字，就應當用活的語言作活的教授法。演說，辯論……都是活的教授法，都能幫助國語教學的。我可以說：『長於演說的人，一定能作好的

文章，辯論家也是一樣。』

各種國語教材的教授法，我在兩年前已大略說過了。只有新添的『古白話文學』與『文法』兩項可以提出來略說一點。

教授古白話文學時，應講演白話文學的興起，變遷的歷史，指出選例的價值。

教授國語文法時，可略依下列之三條原則：

第一，於極短時期中，教完文法中『法式的』部分。所謂法式的部分，就是名詞分幾類，動詞分幾類，什麼叫『主詞』……等。

第二，然後注重國語文法的特別處。如『把他殺了』的『把』字；『我恨不得把這班貪官污吏殺的乾乾淨淨』的『的』字；『宋江殺了人了』的兩個『了』字；『放了手罷』的『了』字；『那個在景陽崗上打虎的武松』的『的』字……這些都是國語文法的特別處，是應當特別注重的。

第三，改正不合文法的文句。有許多的國語文句是不合文法的，應當隨時改正。比如：

『除非過半數的會員出席，大會才開得成。』

這一句的上半句用『除非』，下半句不能用肯定，所以應該改寫：

『除非過半數會員出席，大會是開不成的。』

如此，才能免於文法上的錯誤。

以上講完了國語文，現在講古文之部。

(四)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

前年的計畫之中，這一項惹起了最多的懷疑，而我自己這兩年的觀察也使我覺得這一項所以不能實施的原因了。現在先摘要說明我前年的主張：

(1)古文的教材：

第一學年，專讀近人的文章，自梁任公到章太炎，都可選讀。此外還

應多看文言的小說，如戰血餘腥記，稽者傳等。

第二三四學年，分兩種：

（甲）古文選本，從老子檀弓到姚鼐曾國藩，每一個時代的重要作者，都應選入；於選本之中，包括古文文學史的性質。

（乙）自修的古文書，一個中學畢業生應該看過下列的幾部書：

（A）史書：資治通鑑，或紀事本末等。

（B）子書：孟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論衡，……

（C）文學書：詩經之外，隨學生性質所近，選習兩三種專集，如陶潛，杜甫，王安石，蘇軾等。

（2）古文教授法：

（甲）教員分配分量，學生自己去預備。

（乙）講堂上沒有逐篇逐句講解的必要，只有質疑問難，大家討論兩項

事可做。

（丙）教員除解答疑難，引導討論外，可以隨時加入參考的材料。

以上是我三年前的主張。這個理想的計畫，到現在看來，很象是完全失敗了。教材的分量，早就有人反對了；教授古文，注重自修，大家也覺得難以實行。但這種失敗，我還不肯認爲根本的失敗。我至今承認我當年主張的理由（看文存卷一，頁三一五—六）沒有什麼大錯。我以爲我的主張此時所以不能不失敗，只爲了一個原因，就是沒有相當的設備。

三四年前普通見解總是愁白話文沒有材料可教；現在我們才知道白話文還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沒有相當的教材可用。我曾說，『那幾本薄薄的古文讀本是決不會教出什麼成績來的。』這話我至今認爲不錯。但除了那本古文讀本之外，還有什麼適當於教科的書籍嗎？我提倡學生自讀古書，但是有幾部古書可以便於自修呢？我曾舉資治通鑑，但現行的資治通鑑，——宋本，百衲本，局本，石印，——那

一部可以供普通中學學生的自修呢？我又說過各種『子書』，但現在的子書可有一部適用的嗎？就拿最簡短的『老子』來說罷，王弼本與河上公本是最通行的了；然而清朝古學大師對於老子的校勘訓詁，——如王念孫俞樾等——至今沒有人搜集成一種便於自修的『集註』。究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二句應該讀『常無』，『常有』為兩小頓呢？還是讀兩個『欲』字作小頓呢？『常』字還是作『常』解呢？還是依俞樾作『尙』字解呢？

我又說過詩經，但是詩經不經過一番大整理是不配作教本的。二百年來，學者專想推翻朱熹的詩集傳，但朱傳仍舊是社會上最通行的本子。現在有幾個中學國文教員能用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一班漢學家的箋疏呢？有幾個能吊姚際恆或龔橙的見解呢？究竟毛傳，鄭箋，孔疏，朱傳……那一家對呢？究竟齊詩，魯詩，韓詩，毛詩，的異同，有沒有參考比較的價值呢？究竟『關關雎鳩』一篇是泛指『后妃德』呢？還是美文王的后妃呢？還是刺她的曾孫媳婦康王后呢？還是老老實實的一

首爲相思的詩呢？這一部書，經過朱熹的整理，又經過無數學者的整理，然而至今還只是一筆糊塗賬；專門研究的人還弄不清楚，何况中學學生呢？若我們也糊裏糊塗的把朱熹的詩集傳做課本，叫學生把關雎當作『后妃之德』的詩，那就是瞞心昧己，害人子弟了！

總之，我說的『沒有相當的設備』，是說古書現在還不曾經過一番相當的整理。古書不經過一番新式的整理，是不適宜於自修的，我們不看見英美學生讀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嗎？莎士比亞生當三百年前，他的戲劇若不整理，也就不好懂了。我們試拿三百年前刻的『四開』（Quarto）『對開』（Folio）的古本莎士比亞集，比較現在學校用的那些有詳序，有細注，有校勘記的本子，方才可以知道整理古書在教學上的重要了。

整理古書的方法，現在不能細說，只可說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1）加標點符號。

（2）分段。

（3）刪去繁重的，迂謬的，不必有的舊注。

（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這兩條，我且舉一個例。

詩經的第一首，舊序與舊注都可刪去，但注下列的幾處：

（a）『關雎』是什麼？

（b）『洲』字，『逑』字，『芼』字。

（c）『荇菜』是什麼？

（d）『左右流之』的『流』字，下有『之』字，明是外動詞，與『水流』的『流』不同，故應加注。

（e）『思服』二字，應酌採諸家之說，定一適當之注。

（5）校勘　用古本善本校勘異同，訂正訛脫。

（6）考訂其假　如書經的『古文』一部分是二百年來經學大師多認為

假的了。如莊子的說劍，讓王，盜跖諸篇，是宋人就認爲假的了。

(7)作介紹及批評的序跋　每書應有詳明的序跋，內中至少應有下列各項：

(a)著作人的小傳。

(b)本書的歷史　如序書經，應述『今古文』的公案。

(c)本書的價值　如序詩經，應指出他的文學價值。

有了這一番整理的工夫，我們就可以有一套『中學國故叢書』了。這部叢書的內容，大概有下列各種書：

(1)詩經　(2)左傳　(3)戰國策　(4)老子

(5)論語　(6)墨子　(7)莊子　(8)孟子

(9)荀子　(10)韓非子　(11)楚辭　(12)史記

(13)淮南子　(14)漢書　(15)論衡　(16)陶潛

(17)杜甫　(18)李白　(19)白居易　(20)韓愈

(21)柳宗元　(22)歐陽修　(23)王安石　(24)朱熹

(25)陸游　(26)楊萬里　(27)辛棄疾　(28)馬致遠

(29)關漢卿　(30)元曲選　(31)明曲選　……(這不過是隨便舉例，讀者不可拘泥。)

有了這幾十部或幾百部整理過的古書，中學古文的教授便沒有困難了。教材有了，自修是可能的了，教員與學生的參考材料也都有了。教員可以自由指定材料，而學生自修也就有樂無苦了。到了這個時候，我可以斷定中學生的古文程度比現在大學生還要高些！大家如不相信，請努力多活幾年，讓我們實驗給你們看！

(附記)這篇前三段是用楊君的筆記，末一段是我後來重做的。

十一，八，十七。

中古文學概論序

做文學史，和做一切歷史一樣，有一個大困難，就是選擇可以代表時代的史料。做通史的人，於每一個時代，記載幾個帝王的卽位和死亡，幾個權臣的興起和傾倒，幾場戰爭的發動和結束，便居然寫出一部「史」來了。但這種歷史，在我們今日的眼光裏，全是枉費精神，枉費筆墨，因爲他們選擇的事實，並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並不能寫出文化的進退，並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狀況。例如記五代十國的時代，史家只叫我們記着那許多無謂的梁唐晉漢周，和高祖莊宗世宗……和荆南吳越南唐……等等。但我們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們就應該知道，與其記誦五代十國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錢鏐在浙江興的水利或王審知入閩後種族上和文化上的影響；與其痛罵馮道的無恥，不如研究當日政府雕板的監本九經的歷史；與

其記載桑維翰的大話，不如研究李煜馮延己一班人的小詞；與其比較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的文字優劣和義法寬嚴，不如向當時人的著作裏去尋那些關於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裏，無意之中，記載着五代時江南的米價，那是眞重要的史料。敦煌石室裏，前不多年，忽然發現韋莊詳記北方饑荒的一首白話長詩，那也是眞重要的史料。比起這種眞正史料來，什麼謹嚴的史傳，什麼痛快的論贊，都變成一個錢不值的了！

做文學史，也是如此。從前的人，把詞看作『詩餘』，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雜劇更不足道了。至於『小說』，更受輕視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反動。臨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的詞集，貴池劉氏和武進董氏翻刻了許多雜劇傳奇，江陰繆氏上虞羅氏翻印了好幾種宋人的小說。市上詞集和戲劇的價錢漸漸高起來了，近來更昂貴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對於小說，漸漸能尊重賞識了。這種風氣的轉移，竟給文學史家增添了無數難得的史料。詞集的易得，使我

們對於宋代的詞的價值格外明瞭。戲劇的翻印，使我們對於元明的文學添許多新的見解。古小說的發現與推崇，使我們對於近八百年的平民文學漸漸有點正確的了解。我們現在知道，東坡山谷的詩遠不如他們的詞能代表時代；姚燧虞集歐陽玄的古文遠不如關漢卿馬致遠的雜劇能代表時代；歸有光唐順之的古文遠不如金瓶梅西遊記能代表時代；方苞姚鼐的古文遠不如紅樓夢儒林外史能代表時代。於是我們對於文學史的見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種革命了。

現在還有許多守舊的人，對於正統文學的推翻和小說戲劇的推崇，總有點懷疑。不過這是因爲他們囿於成見，不肯睜開眼睛去研究文學史的事實。他們若肯平心靜氣地研究二千多年的文學史，定可以知道文學史上儘多這樣的先例；定可以知道他們所公認的正統文學也往往是從草野田間爬上來的。三百篇中的國風，楚辭中的九歌，自然是最明顯的例。但最有益的教訓莫過於中古文學史。

中古文學史給我們什麼教訓呢？

當西漢的時候，當時所有典型的文學大概只有兩種：一是周秦的散文，二是南方的賦體。（三百篇雖尊為『經』，但四言的詩已不適用。）前者演為司馬遷班固以下的古文，後者演為司馬相如張衡等的賦。這是正統文學。但兩漢時期內，民間忽然發生了不少的無主名的詩歌。後來經政府幾度的採集，用作各種樂歌，這一類的詩歌遂得着『樂府歌辭』的類名。這一類平民文學之中，眞有許多絕妙的文學作品。如鼓吹曲中的戰城南，如相和歌辭中的孤兒行，婦病行，陌上桑等，如雜曲歌辭中的孔雀東南飛，都是絕好的作品，遠勝於司馬相如揚雄一班人所作的那些鋪張堆砌的笨賦。漢代雖然有了這種有價值的平民文學，然而當時的文人學士似乎還不曾完全了解樂府歌辭在文學上的地位。他們仍舊努力去做那堆砌艱晦的賦，而不肯做那新興的民間詩體。故從正統文學的方面看起來，我們只見從賈誼的鵩賦到禰衡的鸚鵡賦，果然也成一條不斷的正統。但我們現在知道，這一條線只能代表貴族文學和廟堂文學，而不能代表那眞有生命的民間文學；只能代表那因襲模倣的古典文

學，而不能代表那隨時代變遷的活文學。直到建安黃初的文學時期，曹操父子出來，方才大膽地模倣提倡那自由樸茂的樂府詩體。從此以後的詩人大部經過一個模擬古樂府的時期，於是兩漢平民文學的價值方才大明白於世，而孤兒行陌上桑一類的詩歌遂從民間文學一躍而升作正統文學的一部分了。這不是一個很有益的教訓嗎？

再說下去。南北朝時代，中國北方完全淪陷在北部異族的統治之下，中原文化只好搬到江南來避難。這個時期內，發生了兩大系的平民文學：一是北方新民族的英雄文學，如折楊柳歌辭，如瑯琊王歌辭，如木蘭辭之類；一是南方民族的兒女文學，如子夜讀曲諸歌。一方面的慷慨悲壯，一方面的宛轉纏綿，都極盡平民文學的風致。然而當時的貴族文人，一面雖也學時髦，居然肯模倣漢魏樂府，一面却不知道賞識眼前的活寶貝。他們只會作「擬」某人或「擬」某題的詩，而不能採用當日民間的文學新體。所以從表面上看去，我們也只看見江淹顏延之沈約一班人的古典

文學，或是北方蘇綽等人的假古董，而不看見那眞有生氣又眞有價值的南北平民文學。直到蕭梁以後，民間新樂府的價値才漸漸逼人承認了；那種簡短精采的文學新體——這是六朝民歌的特點，爲漢魏民歌所無，——漸漸成爲時髦的詩體了。自此以後，南北朝的民歌——樂府歌辭——遂又從民間文學一躍而成爲正統文學的一部分了。這又不是一大教訓嗎？

所以我們做中古文學史，最要緊是把這種升沉的大步驟一一指點出來，叫人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間文學升作正統文學的先例，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比較的材料，也許可以打破我們一點守舊仇新的頑固見解。

雲南徐嘉瑞先生編的這部中古文學概論，很大膽地採用上文所說的見解，認定中古文學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時間的平民文學，所以他把平民文學的敘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這一千年的貴族文學只佔了一個很不冠冕的位子。這種大刀闊斧的手段，一定有人要認爲大逆不道的。但在我個人看來，徐先生的基本觀念似乎是很

不錯的。無論如何，他這部書總是一部開先路的書，可以使贊成的人得許多參攷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對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至於爲初學的人設想，一部提綱挈領，指出大趨勢和大運動的書，總勝於無數記帳式列舉人名書名的文學史多多了。

凡是開先路的書，總不免有忽略小節的毛病。徐先生這部書自然也有一些可以指摘的小疵。例如他說霓裳羽衣舞，費了二千多字，而寫唐代的文學也只有三千字：這未免太不平均了。又如他敘述漢魏的樂府歌辭，往往每篇有詳說；而那篇絕代的傑作孔雀東南飛，却只得着一兩句話的敘述：這也未免輕重稍失當了。這一類的小疵，我們很盼望徐先生於再版時修改補正。

十二，九，廿四，胡適序於杭州烟霞洞。

評新詩集

（一）康白情的草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價八角。——

在這幾年出版的許多新詩集之中，草兒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了。白情在他的詩裏曾有兩處宣告他的創作的精神。他說：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頁二五四）

他又說：

我要做就是對的；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隨做我底對的；
隨丟我底對的。（頁二四三）

我們讀他的詩，也應該用這種眼光。『隨做我底對的』是自由；『隨丟我底對的』是進步。白情這四年的新詩界，創造最多，影響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詩，並不是有意創體。我們在當日是有意謀詩體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別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裏的東西』；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

白情受舊詩的影響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舊詩如『貳臣猶根帶，四海未桑麻』（一九一六年）；如『多君相得乘龍婿，愧我詩成嚼蠟𡆙』（一九一七年），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這種舊詩體的束縛的，故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的除夕詩，（頁三〇一—四）便有『去，去，去，出門去！劉鐵直幹麼？乘興訪樸園，踏雪沿北河』的古怪組合。『幹麼』底下緊接兩句極牽强的駢句，便是歧路的情境

了。寀的人在這個歧路上仍舊努力去做他的駢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後便是『草兒』（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的時代了。

自草兒（頁一）到雪夜過秦安（頁四八），是一九一九年的詩。這一組裏固然也有好詩，如窗外，送客黃浦，日觀峯，疑問；但我們總覺得這還是一個嘗試的時代，工具還不能運用自如，不免帶點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

誰遮這落日？
莫是崑崙山底雲麼？
破喲！破喲！
莫斯科的曉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喲！

又如：

你（黃河）從崑崙山的溝裏來麼？

崑崙山裏底紅葉

想已飽帶着一身秋了。

這都不很自然。至於桑園道中的

山哪，嵐哪，

雲哪，霞哪，

半山上的煙哪，

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

現在竟成了新詩的濫調了！

自朝氣（頁四九）至別少年中國（頁二八六），共二百四十頁詩，都是一九二〇年的作品。這一年的成績確是很可驚的。當時我在學燈上見着白情的江南，就覺得白情的詩大進步了。江南的長處在於顏色的表現，在於自由的實寫外界的景色。我們引他的第三段：

柳樹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個撮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着些紅嘴，
跟着她，叫着。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這種詩近來也成為風氣了。但這種詩假定兩個條件：第一須有敏捷而真確的觀察力，第二須有聰明的選擇力。沒有觀察力，便要鬧笑話；沒有選擇力，只是堆砌而

不美。白情最長於這一類的詩；草兒裏此類很多，我們不多舉例了。

平心而論，這一類的寫景詩，我們雖承認他的價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這一類的詩最容易陷入『記帳式的列舉』。『雲哪，山哪，嵐哪』，固然可厭；『東邊一個什麼，西邊一個什麼，前面一個什麼』，也很可厭。南宋人的寫景絕句，所以不討人厭，全靠他們的選擇力高，能挑出那最精采的印象。畫家的風景畫，所以比風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為畫家曾有過一番精采的剪裁。近日許多寫景詩，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為不懂得文學的經濟，不能去取選擇。

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游詩。中國舊詩最不適宜做紀遊詩，故紀遊詩好的極少。白情這部詩集裏，紀游詩佔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這是用新詩體來紀游的第一次大試驗，這個試驗可算是大成功了。我們選他的日光紀游第六首：

馬返以上沒有電車了，

我們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紙揹在背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一路，赤腳的女子笑着過來了。

油紙揹在背上；

「下駄」提在左手上；
洋傘撐在右手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綉花的紅裙上。
他們看了我們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們看了他們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 *

過幸橋，
過深澤橋，
我們直溯大谷川底源頭沿上去。

我們不溜在河裏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

好雨！好雨！

這種詩眞是好詩。『看來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這是白情評我的詩的話，他說這是美國風。我不敢當這句評語，只好拿來還敬他這首詩，並且要他知道這不是美國風，只是詩人的理想境界。

佔草兒八十四頁的廬山紀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國詩史上一件很偉大的作物了。這三十七首詩須是一氣讀下去，讀完了再分開來看，方才可以看出他們的層次條理。這裏面有行程的紀述，有景色的描寫，有長篇的談話；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廬山紀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紀五老峯的探險，寫的最有精采，使我們不曾到過廬山的人心裏怦怦的想去做那種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裏說：

山阿裏流泉打得欽虺孔隆地響，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動，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蘭式的茅店，風吹得涼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動，
我就去歇憩。

這就是『我要做就是對的』。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廬山時的精神。我們祝禱他們在詩國裏永遠保持這種精神。

白情的詩，在技術上，確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說：

總之，新詩裏音節底整理，總以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為標準。（頁三五四）

這一層，初看來似是很淺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許多詩人『鄙漂亮而不為』！但是我們很誠懇的盼望這些詩人們肯降格來試試這個『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標準。

十一，八，三十。

（二）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一九二二年三月出版，價六角。——

平伯這部詩集，分成四輯。他自己說，『第一輯裏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輯裏的，作風似太煩瑣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澀之處；第三輯底前半尚存二輯的作風，後半似乎稍變化一點；四輯……有幾首詩，如打鐵，挽歌，一勺水啊，最後的洪鐘，有平民的風格。』

平伯主張『努力創造民衆化的詩』。假如我們拿這個標準來讀他的詩，那就不能不說他大失敗了。因爲他的詩是最不能『民衆化』的。我們試看他自己認爲有平民風格的幾首詩，差不多沒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鐵篇中的

刀口碰在鋤耙上，

刀口短了鋤把長。

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裏有墳堆，

墳堆裏有骨頭。

駿骨可招千里駒；

枯骨頭，華表巍巍沒字碑，

招甚麼？招個坏！

這決不是『民衆化』的詩。一句水啊是一首好詩，但也不是『民衆化』的詩：

好花開在汚泥裏，

我酌了一勺水來洗他。

半路上我渴極了。

竟把這一勺水喝了。

……………………

請原諒罷，寬恕着罷！

可憐我只有一勺水啊！

這首詩雖不晦澀，但究竟不是民衆能了解的。所以我們讀平伯的詩，不能用他自己的標準去批評他。『民衆化』三個字談何容易！十八世紀之末，英國詩人華茨活斯（Wordsworth）主張作民衆化的詩，然而他的詩始終只是『學者詩人』的詩，而不是民衆的詩。同時北方民間出了一個大詩人彭思（Burns），他並不提倡民衆文學，然而他的詩句風行民間，念在口裏，沁在心裏，至今還是不朽的民衆文學。民衆化的文學不是『理智化』的詩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頁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無錢莫想他』四句，譯爲五十行的新詩；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詞句雖多至數（十）倍，而溫厚蘊藉之處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這不是一個明白的例證嗎？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詩。第四輯裏，如所見一首：

　　騾子偶然的長嘶，
　　鞭兒抽着，沒聲氣了。
　　至於斷叫這件事情，
　　鞭絲拂他不去的。（頁二四〇）

又如引誘一首：

　　顛簸的車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細髮拂着，
　　於是我底頭頻頻迴了！（頁二三〇）

這種小詩，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愛做小詩，偏要做那很長而又晦澀的詩！

　　有許多人嫌平伯的詩太晦澀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頗替平伯辯護，他說，

平伯底詩果然艱深難解麼？……作者底艱深，或竟由於讀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詩集裏，平伯自己也說『春底一回頭時稿成後，給佩弦看，他對于末節以為頗不易了解』。（雪朝頁六十一。）這可見平伯詩的艱深難解，自是事實，並不全由于讀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釋是『表現力薄弱』。這雖是作者的謙辭，然而我們却也不能不承認這話有一部分的真實。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詩，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學家；本是極平常的道理，他偏要進一層去說，於是越說越糊塗了。平伯說：

說不盡的，看的好；
看太仔細了，想可好？
花正開着，
不如沒開去想他開的意思。（頁七三）

這正是我說的「進一層去說」。這並不是缺點；但我們知道詩的一個大原則是要能深入而淺出；感想 (impression) 不嫌深，而表現 (expression) 不嫌淺。平伯的毛病在於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時變成煩冗，有時變成艱深了。

我們可舉遊皋亭山雜詩的第四第五兩首來做例。第四首題為「初次」：

孩兒們，娘兒們，
田莊上的漢兒們，
紅的，黑的布衫兒，
藍的，紫的棉綢襖兒，
瞪着眼，張着嘴，
嘆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遠啊，

不唱戲，不賽會，
沒甚新鮮玩意兒；
猜不出城裏客人們底來意。
他們笑着圍攏來，
我們也笑着走攏來；
不相識的人們終於見面了。（頁七七）

……………

說到這裏，很夠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學調子的話；他想拿抽象的話來說明，來「詠歎」前面的具體景物，却不知道這早已犯了詩國的第一大禁了。（看頁七七）第五首爲『一笑底起源』，這題目便是哲學調子了！這首詩，若剝去了哲學調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我們拿捎來的飯吃着，

我們笑癡癡的笑覷着。
吃飯有甚麼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們中間的一個——她，
忍不住了，說了話了。
「飯少罷！給你們添上一點子？」
回轉頭來聲音低低的，
「那裏像我們田莊上呢！……」
…………………（頁七八——七九）

這種具體的寫法，儘夠了，然而平伯還不滿足「他」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們是說不出，
在他們是沒有說。
既笑着，總有可笑的在，
總有使我們他們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罷了，
可笑便是可笑罷了，
怎樣不可思議的一笑啊！
這不是畫蛇添足嗎？他又在「那裏像我們田莊上呢」的後面，加上了十三句咏歎的哲理詩：
是簡單嗎？
是不可思議嗎？
是不可思議的簡單嗎？

他們底雖不全是我們底，

……………………

也不是非我們底，……

他這樣一解釋，一咏歎，我們反更糊塗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詩，夾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歎裏，就不容易出頭了！

所以我說：

平伯最長於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好詩，只因為他想兼作哲學家，所以越說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詩被他的哲理埋沒了。

這不是譏評平伯，這是我細心讀平伯的詩得來的教訓。我願國中的詩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個好詩人已是儘夠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隴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學家。

十一，九，十九。

嘗試集四版自序

嘗試集是民國九年三月出版的。當那新舊文學爭論最激烈的時候，當那初次試作新詩的時候，我對於我自己的詩，選擇自然不很嚴；大家對於我的詩，判斷自然也不很嚴。我自己對於社會，只要求他們許我嘗試的自由。社會對於我，也很大度的承認我的詩是一種開風氣的嘗試。這點大度的承認遂使我的嘗試集在兩年之中銷售到一萬部。這是我很感謝的。

現在新詩的討論時期，漸漸的過去了。——現在還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話來攻擊新詩的運動，但這種『詩云子曰』的邏輯，便是反對論破產的鐵證。——新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加多了。有幾位少年詩人的創作，大膽的解放，充滿着新鮮的意味，使我一頭高興，一頭又很慚愧。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

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脚後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着纏脚時代的血腥氣。我現在看這些少年詩人的新詩，也很像那纏過脚的婦人，眼裏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們跳上跳下，心裏好不妬羨！

但是纏過脚的婦人永遠不能恢復他的天然脚了。我現在把我這五六年的放脚鞋樣，重新挑選了一遍，刪去了許多太不成樣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內中雖然還有許多小脚鞋樣，但他們的保存也許可以使人知道纏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許還有一點歷史的用處，所以我也不必諱了。

刪詩的事，起于民國九年的年底。當時我自己刪了一遍，把刪賸的本子，送給任叔永陳莎菲，請他們再刪一遍。後來又送給『魯迅』先生刪一遍。那時周作人先生病在醫院裏，他也替我刪一遍。後來俞平伯來北京，我又請他刪一遍。他們刪過之後，我自己又仔細看了好幾遍，又刪去了幾首，同時卻也保留了一兩首他們主張

刪去的。例如江上，「魯迅」與平伯都主張刪，我因爲當時的印象太深了，捨不得刪去。又如禮一首（初版再版皆無。）「魯迅」主張刪去，我因爲這詩雖是發議論，却不是抽象的發議論，所以把他保留了。有時候，我們也有很不同的見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寫信來，說此詩很好，平伯也說他可存；但我對於此詩，始終不滿意，故再版時，刪去了兩句，四版時竟全刪了。

再版時添的六首詩，此次被我刪去了三首，又被「魯迅」叔永莎菲刪去了一首。此次添入嘗試集十五首，去國集一首。共計

嘗試集第一編，刪了八首，又嘗試篇提出代序，共存十四首。

嘗試集第二編，刪了十六首，又許怡蓀與一笑移入第三編，共存十七首。

嘗試集第三編，舊存的兩首，新添的十五首，共十七首。

去國集，刪去了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

共存詩詞六十四首。

有些詩略有删改的。如嘗試篇删去了四句，鴿子改了四個字，你莫忘記添了三個「了」字，一笑改了兩處，例外前在新青年上發表時有四章，現在删去了一章。這種地方，雖然微細的很，但也有很可研究之點。例如一笑第二章原文

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

蔣百里先生有一天對我說，這樣排列，便不好讀，不如改作

那個人後來不知怎樣了。

我依他改了，果然遠勝原文。又如你莫忘記第九行原文是

噯喲，……火就要燒到這裏。

康白情從三萬里外來信，替我加上了一個「了」字，方才合白話的文法。做白話的人，若不講究這種似微細而實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話，更不配做白話詩。

嘗試集初版有錢玄同先生的序和我的序。這兩篇序都有了一兩萬份流傳在外；

現在爲減輕書價起見，我把他們都删去了。（我的『自序』現收入胡適文存卷●。）

我借這個四版的機會，謝謝那一班幫我删詩的朋友。至於我在再版自序裏說的那種『戲台裏喝采』的壞脾氣，我近來也很想矯正他，所以我恭恭敬敬的引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先生『評』嘗試集的話來作結。胡先驌教授說：

> 胡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這幾句話，我初讀了覺得很像是罵我的話；但這幾句話是登在一種自矢『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的雜誌上的，大概不會是罵罷？無論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徹底，胡先驌教授却說我『鹵莽滅裂趨於極端』，這句話實在未免過譽了。至於『必死必朽』的一層，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驌教授又說，

> 陀司妥夫士忌，戈爾忌之小說，死文學也。不以其轟動一時遂得不死

不朽也。

胡先驌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請陀司妥夫士忌和戈爾忌來陪我同死同朽，這更是過譽了，我更不敢當了。

十一，三，十。

蕙的風序

我的少年朋友汪靜之把他的詩集『蕙的風』寄來給我看，後來他隨時做的詩，也都陸續寄來。他的集子在我家裏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這一年之中，我覺得他的詩的進步着實可驚。他在一九二一，二，三，做的雪花——棉花，有這樣的句子：

你還以爲我孩子瞎說嗎？
你不信到門前去摸摸看，
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麽？
媽，你說這是雪花，
我說這是頂好的棉花，

比我前天望見棉花舖子裏的還好的多多。

這確是很幼稚的。但他在一年之後——一九二二，一，一八——做的小詩，如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胆寒呵。

這就是很成熟的好詩了。

我讀靜之的詩，常常有一個感想：我覺得他的詩在解放一方面比我們做過舊詩的人更澈底的多。當我們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詩時，我們的『新詩』實在還不曾做到『解放』兩個字，遠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長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們雖然認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當日加入白話詩的嘗試的人，大都是對於舊詩詞用過一番工夫的人，一時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鐐銬枷鎖。故民國六七八

年的『新詩』，大部分只是一些古樂府式的白話詩，一些擊壤集式的白話詩，一些詞式和曲式的白話詩，——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詩。但不久就有許多少年的『生力軍』起來了。少年的新詩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來最早；他們受的舊詩的影響，還不算很深，（白情草兒附的舊詩，很少好的。）所以他們的解放也比較更容易。自由（無韻）詩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勞都不小。但舊詩詞的鬼影仍舊時時出現在許多『半路出家』的新詩人的詩歌裏。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

雲皎潔，我底衣，
霞爛縵，他底裙裾，
終古去敖翔，
隨着蒼蒼的大氣；
為什麼要低頭呢？
哀哀我們底無儔侶。

去低頭！低頭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盪；

看下方啊，

撕碎吾身荷芰底芳香。

這詩的音調，字面，境界，全是舊式詩詞的影響。直到最近一兩年內，又有一班少年詩人出來；他們受的舊詩詞的影響更薄弱了，故他們的解放也更徹底。靜之就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個。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他的詩有時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遠勝於晦澀。況且稚氣總是充滿着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如靜之的月夜的末章：

我那次關不住了，

就寫封愛的結晶的信給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見了；
不過由我底左眼寄給右眼看，
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這是稚氣裏獨有的新鮮風味，我們「老」一輩的人只好望着欣羨了。我再舉一個例：

浪兒張開他底手腕，
一疊一疊滾滾地擁擠着，
摟着砂兒怪親密地吻着。
剛剛吻了一下，
却被風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來了。

呀，他又剛愎愎地勢洶洶地趕來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邊的小石塔，

更親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噴散着。

笑了，他快樂的大聲笑了。

但是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罷！

你已經留給伊了——

你底愛的痕跡統統留給伊了。

你如此永續地忙着，

也不覺得倦嗎？（湖濱）

這裏確有稚氣，然而可愛啊，稚氣的新鮮風味！

至於『太露』的話，也不能一概而論，詩固有淺深，到也不全在露與不露。李商隱一派的詩，吳文英一派的詞，可謂深藏不露了，然而究竟遮不住他們的淺薄。三百篇裏：

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

這是很露的了，然而不害其爲一種深切的感情的表現。如果眞有深厚的內容，就是直截流露的寫出，也正不妨。古人說的『含蓄』，並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過一層，反覺得直說直叙不能達出詩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脫略枝節，超過細目，抓住了一個要害之點，另求一個『深入而淺出』的方法。故論詩的深度，有三個階級：淺入而淺出者爲下，深入而深出者勝之，深入而淺出者爲上。靜之的詩，這三個境界都曾經過。如前年做的怎敢愛伊：

我本很愛伊，——
　十二分愛伊。
我心裏雖愛伊，
　面上却不敢愛伊。
我倘若愛了伊，
　怎樣安置伊？

　　他不許我愛伊，
　　　我怎敢愛伊？

這自然是受了我早年的詩的餘毒，未免「淺入而淺出」的毛病。但同樣題目，他去年另有一個寫法：

　　願你不要那般待我，
　這是不得已的，
　因你已被他霸佔了。
　我們別無什麼，
只是光明磊落真誠懇摯的朋友；
但他總抱着無謂的疑團呢。
他不能了解我們，
這是怎樣可憎的隔膜呀！

你給我的信——
裏面還擱着你底眞心——
已被他妬恨地撕破了。
…………
他兇殘地怨責你，
不許你對我訴衷曲，
他冷酷地刻薄我，
我實難堪這不幸的遭際呀！
因你已被他霸佔了，
這是不得已的，
願你不要那般待我——
一定的，

一定不要呀！（非心願的要求）

這就是『深入而深出』的寫法了。露是很露的，但這首詩究竟可算得一首赤裸裸的情詩。過了一年，他的見解似乎更進步了，他似乎能超過那笨重的事實了，所以他今年又換了一種寫法：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攏來，
共總鎔成了一個；
像月亮般掛在清的天上，
給大家看個明明白白。

我願把人間的心，
一個個都聚攏來，

用仁愛的日光洗潔了；
重新送還給人們，
使誤解從此消散了。（我願）

這種寫法，可以算是「深入而淺出」的了。我不知別人讀此詩作何感覺，但我讀了此詩，覺得裏面含着深刻的悲哀，覺得這種詩是「詩人之詩」了。

靜之的詩，也有一些是我不愛讀的。但這本集子裏確然有很多的好詩。我很盼望國內讀詩的人不要讓腦中的成見埋沒了這本小冊子。成見是人人都不能免的；也許有人覺得靜之的情詩有不道德的嫌疑，也許有人覺得一個青年人不應該做這種呻吟宛轉的情詩，也許有人嫌他的長詩太繁了，也許有人嫌他的小詩太短了，也許有人不承認這些詩是詩。但是，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成見是最容易錯誤的，道德的觀念是容易變遷的，詩的體裁是常常改換的，人的情感是有個性的區別的。況且我們

受舊詩詞影響深一點的人，帶上了舊眼鏡來看新詩，更容易陷入成見的錯誤。我自己常常承認是一個纏過脚的婦人，雖然努力放脚，恐怕終究不能恢復那「天足」的原形了。我現在看着這些徹底解放的少年詩人，就像一個纏過脚後來放脚的婦人望着那些眞正天足的女孩子們跳來跳去，妒在眼裏，喜在心頭。他們給了我許多「煙士披里純」，我是很感謝的。四五年前，我們初做新詩的時候，我們對社會只要求一個自由嘗試的權利；現在這些少年新詩人對社會要求的也只是一個自由嘗試的權利。爲社會的多方面的發達起見，我們對於一切文學的嘗試者，美術的嘗試者，生活的嘗試者，都應該承認他們的嘗試的自由。這個態度，叫做容忍的態度（Tolerance）。容忍上加入研究的態度，便可到了解與賞識。社會進步的大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靜之自己也曾有一個很動人的呼告：

被損害的鶯哥大詩人，

將要絕氣的時候，

對着他底朋友哭告道：

犧牲了我不要緊的；

只願諸君以後千萬要防備那暴虐者，

好好地奮發你們青年的花能！（被摘著的）

十一，六，六。胡適。

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個例

研究歌謠，有一個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較的研究法』。有許多歌謠是大同小異的。大同的地方是他們的本旨，在文學的術語上叫做『母題(motif)』。小異的地方是隨時隨地添上的枝葉細節。往往有一個『母題』，從北方直傳到南方，從江蘇直傳到四川，隨地加上許多『本地風光』；變到末了，幾乎句句變了，字字變了，然而我們試把這些歌謠比較着看，剝去枝葉，仍舊可以看出他們原來同出於一個『母題』。這種研究法，叫做『比較研究法』。

讀書雜誌第二期上有一首歌謠：

沙土地兒跑白馬，

一跑跑到丈人家，

大舅兒望裏讓，
小舅兒望裏拉。
隔着竹簾兒看見他，——
銀盤大臉，黑頭髮，
月白緞子棉襖，銀疙瘩。

這首歌是全中國都有的；我們若去搜集，至少可得一兩百種大同小異的歌謠：他們的「母題」是「到丈人家裏，看見了未婚的妻子」，此外都是枝節了。比較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

(1)某地的作者對於母題的見解之高低。

(2)某地的特殊的風俗，服飾，語言等等——所謂「本地風光」。

(3)作者的文學天才與技術。

如我的鄰縣——旌德——的這一隻歌謠，雖可以看出當時本地的服飾，在文學技術上就

還不如上文引的北京的問題歌了：

東邊來了一位小學生，
辮子拖到脚後跟，
騎花馬，坐花轎，
坐到丈人家。
丈人丈母不在家，
簾子背後看見他。
金簪子，玉耳挖，
雪白臉，定粉擦，
雪白手，銀指甲，
大紅棉襖繡蘭花，
天青背心胡蝶花，

百褶裙子海棠花，
大紅緞鞋四面花。
我回家，告訴媽：
賣田賣地來娶他！

我們再舉一個例。第十六期努力上，登出一首北京附近的歌謠：

蒲櫳子車，(原注，大車上搭席棚的)
呱達達，
一搖鞭，到了家。
爹看見，抱包袱；
娘看見，抱娃娃。
哥哥看見餂一餂，
嫂子看見扭一扭。

不用你趕，
不用你攆，
今天來了明天走。
爹死了，我念經；
娘死了，我唱戲；
哥哥死了，燒張紙；
嫂子死了，棺材上邊抹狗矢！

這歌的『母題』是『小姑出嫁後回娘家，受了嫂嫂的氣，發洩他對於嫂嫂的怨恨』。

前天承常惠君給我鈔了許多同類的歌謠，很可以供比較的研究。我們把他們都鈔在這裏：

（一）

推龍車，大馬拉，

嘩啦嘩啦到娘家。
爹出來，抱包袱；
娘出來，抱娃娃。
哥哥出來抱匣子，
嫂子出來一扭撻。
「嫂子嫂子你別扭。
當天來，當天走。
不吃你飯，不喝你酒。」

（二）

小白菜，地裏黃。
奴打燒餅看親娘。
親娘說，來了我的親閨女。

爹爹說，來了我的一枝花。
哥哥說，來了我的小妹妹。
嫂子說，來了我的攪蛐扒。
哥哥說，打點酒兒。
嫂子說，錢沒有。
哥哥說，買點肉兒。
嫂子說，錢不夠。
姑娘聞聽，套上車馬徉徜走。
爹娘送到大門口，
嫂子送到鍋台角兒，
哥哥送到十里莊。
十里莊，寫文章：

寫咱爹，寫咱娘，
寫咱嫂子不賢良。
有咱爹，有咱娘，
這條道兒走的長。
沒咱爹，沒咱娘，
這條道兒苦斷了腸。

（三）

大麥穗，節節高。
俺娘不好俺瞧瞧。
進大門，見俺爹，
俺爹穿着格登靴，
格登格登上縣車。

進二門，見俺娘，

俺娘坐在象牙牀。

進三門，見俺哥，

俺哥抱着書本兒不逗我。

進四門，見俺嫂，

俺嫂一扭，扭到門格老。

嫂嫂嫂嫂你別扭。

不吃你的飯，

不喝你的酒。

賸下飯，你喂狗。

剩下酒，你洗手。

。。。。。。

瞧瞧爹娘俺就走。

爹娘在，俺還來。
爹娘不在，俺不來。

爹爹坟上蒸饃饃，
娘娘坟上炸油菜；
哥哥坟上挂白紙。
嫂嫂坟上拉泡屎。

（四）

糠楷襬兒，打滑揩。
新娶的媳婦想娘家。
想着想着哥來接，
四套騾子蒲籠車。

大綠襖，花雲肩，
紅緞裙子鑲邊。
指使丫頭抱紅毯。
問問婆婆住幾天。
婆婆說，
「天又冷，地又寒。
給你日子你作難。
愛住幾天住幾天。」
爹見了，接包袱；
娘見了，抱紅匣；
嫂子見了一扭挪。
什麽扭？

不吃你家的飯，
不喝你家的酒，
看看姜娘俺就走。
有俺姜娘來幾趟，
沒了姜娘踏過手。

俺娘送到大門外，
哭哭啼啼拜兩拜。
俺姜送到大門西，
哭哭啼啼作兩揖。
哥哥送到棗樹行，
背着哥哥記一張。

先寫爹，後寫娘，
再寫嫂嫂不賢良。
爹死了，金棺材；
娘死了，銀棺材；
哥哥死了油漆板；
嫂子死了拿席捲。
爹坟頭，燒金子；
娘坟頭，燒銀子；
哥哥坟頭燒鏹紙；
嫂嫂坟頭拉泡屎！

現在搜集歌謠的人，往往不耐煩搜集這種大同小異的歌謠，往往向許多類似的

歌謠裏挑出一首他自己認爲最好的。這個法子是不很妥當的。第一，選的人認爲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第二，即使他删的不錯，他也不免删去了許多極好的比較參考的材料。即如上文『蒲靈子車』一首，若單只有這一首，我們也許把他看作一個趕車的男子回家受氣的詩。但有了這五首互相比較，他們的本題就絕無可疑了。參考比較的重要如此！

十一，十二，三。

北京的平民文學

近年來，國內頗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謠，在報紙上發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還沒有人用文學的眼光來選擇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學意味的「風詩」特別顯出來，供大家的賞玩，供詩人的吟咏取材。前年常惠先生送我一部北京歌唱（Pekinese Rhymes），是一八九六年駐京意大利使館華文參贊衛太爾男爵（Baron Guido Vitale）搜集的。共有一百七十首，每首先列原文，次附英文注解，次附英文譯本。衛太爾男爵是一個有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就能認識這些歌謠之中有些「真詩」，他在序裏指出十八首來做例，並且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現在白話詩

起來了，然而做詩的人似乎還不會曉得俗歌裏有許多可以供我們取法的風格與方法，所以他們寧可學那不容易讀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風格。這個似乎是今日詩國的一種缺陷罷。我現在從衞太爾的書裏，選出一些有文學趣味的俗歌，介紹給國中愛『眞詩』的人們。

十一，九，二十，胡適。

（一）（原三二）

出了門兒，
陰了天兒，
抱着肩兒，
進茶館兒；
靠爐台兒，

找倆朋友尋倆錢兒。
出茶館兒，
飛雪花兒。
老天爺，
竟和窮人鬧着頑兒！

（二）（原六十）

喜雀尾巴長，——
娶了媳婦兒不要娘。
媽媽要吃窩兒薄脆，
「沒有閒錢補笊籬。」
媳婦兒要吃梨，
備上驢，

去趕集，
買了梨，
打了皮，
「媳婦兒，媳婦兒，你吃梨！」

（三） （原一一九）

隔着牆兒扔切糕，
棗兒豆兒都扔了。
隔着牆兒扔磚頭，
砸了妞兒的兩把兒頭。（旗裝婦女的頭。）
隔着牆兒扔票子，
「怎麼知道姑娘沒落子」（落讀如鬧。）

（四） （原一三三）

我的兒，
我的姣，
三年不見，長的這麼高！
騎着我的馬，
拿着我的刀，
扛着我的案板賣切糕。

（五）　（原一四〇）

錐鞵子兒，
納底子兒，
掙了二升小米子兒。
蒸蒸烙烙，
吃他娘的一頓犒勞！

（六）（原一五一）

小姑娘，作一夢，
夢兒婆婆來下定：
真金條，
滲金條，
扎花兒褲子，綉花兒襖。

（七）

大哥哥，二哥哥，
這個年頭怎麼過！
棒子麵兒二百多。——
緑豆開花兒，一呀兒喲！

（八）（原一四六）

窮太太兒，
抱着個肩兒，
吃完了飯兒，
遶了個灣兒，
又買檳榔，
又買煙兒。

（九）（一四三）

廟門兒對廟門兒，
裏頭住着個小妞人兒，
白臉蛋兒，
紅嘴唇兒，
扭扭捏捏愛死個人兒！

（十）（原九六）

小三兒他媽，

頂房梲，（房梲是屋梁，此句說屋低。）

窩摳眼，

挺長脖；（此兩句說他瘦。）

穿着一件破移襬，

窟窿兒大，

補丁多，

渾身的鈕子沒有兩個。

告訴你媽嫁了我罷：

又得吃來又得喝。

（十一）（原八二）

好熱天兒，
掛竹簾兒。
歪脖兒樹底下，
有個妞兒哄着我頑兒！
穿着一件大紅坎肩兒，
沒有沿邊兒；
梳油頭，別玉簪兒；
左手拿着玉花籃兒，
右手拿着梔子茉莉串枝蓮兒。

（十二）　（原七〇）

風來啦，
雨來啦，

老和尚背了鼓來啦！

（十三）（原五五）

紅葫蘆，
軋腰兒；
我是爺爺的肉姣兒，
我是哥哥的親妹子，
我是嫂嫂的氣包兒。
爺爺，爺爺，賠甚麼？
大箱大櫃賠姑娘。
奶奶，奶奶，賠甚麼？
針線笸籮兒賠姑娘。
哥哥，哥哥，賠甚麼？

花布手巾賠姑娘。
嫂嫂，嫂嫂，賠甚麽
『破罎子
爛罐子，
打發那丫頭嫁漢子！』

（十四）（原四四）

一進門兒喜冲冲，
院子裏頭搭大棚；
洞房屋子把燈點，
新姑娘一傍淚盈盈。
新郎不住的來回覵，
說，『你不吃點兒東西兒，

我可心疼！』

（十五）（原五）

沙土地兒跑白馬，
一跑跑到丈人家。
大舅兒望裏讓，
小舅兒望裏拉。
隔着竹簾兒看見他，——
銀盤大臉，黑頭髮，
月白緞子棉襖，銀疙疸。（原注，疙疸是鈕扣。）

（十六）（原二〇）

金軲轆棒，
銀軲轆棒，

爺爺兒打板兒

奶奶兒唱，——

一唱唱到大天亮。

養活了個孩子沒處放，

一放放在鍋台上，

啦兒啦兒的喝米湯！

（附注）我選的原三二，四四，五五，六十，這四首在衛太爾指出的十八首之中。

附錄　談北京的歌謠

常　惠

讀書雜誌第二號，適之先生選了十幾首韋大列（Vitale）的歌謠，說道是「真

詩」；我也很以爲然。但我們也曾經介紹過一次，把他的序譯出來，登在少年的第十五期。在那序的前面我說：

「一本書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共有一百七十首歌謠，是一位意大利學者所輯，裏邊的歌謠不但是中文，而且全都譯成英文。惟有一樣，因爲這位先生太講理解了，裏邊不免有點兒附會的地方。」

我爲什麼說他太講理解呢？因爲他的第七十首，

「風來啦，雨來啦，

老和尙背着鼓來啦！」

這首確是『張三的帽子，給李四戴上了』。因爲他極注意中國的風俗習慣，有一句諺語，『風是雨的頭，屁是屎的頭』，他就以爲這首歌謠也是說下雨的。風過去就是雨，雨來了跟着又是雷。所以他的註釋裏說，老和尙背着鼓是打雷呢。

還有一本書是周啓明先生借給我的，我也說過：

『一本在一九〇〇年出版的，共有一百五十二首歌謠，是一位美國何德蘭女士所輯，不但有中文，還有譯成英文的韻文。而且還有極好的照像，很能把二十年前北京的社會狀態表現出來，這是我最喜歡看的。然而她譯成英文因爲韻的限制，將原意失了不少，這也是一個美中不足。』

她在她的書裏邊就不那麼說了：

『狼來咯，虎來咯，
老和尚背着鼓來咯！』

這首是對的。怎見得呢？一看帝鄉景物略就知道了。『凡歲時不雨……初雨，小兒群喜』，歌曰：

『風來了，雨來了，
禾場背了穀來了。』

可見這首歌謠的訛傳，後又由『兒歌』變成『母歌』了。這也是演進的一個原因。所改『狼來了，虎來了』，拿他來恐嚇小孩子，使他速睡，頗爲適宜。至於『和尚背着鼓來了』一句是襯韻的關係，並沒有什麼意義在裏邊。

什麼叫作『母歌』，這一層，周啓明先生在『兒歌之研究』裏說：

『母歌者：兒未能言，母與兒戲，歌以侑之：與兒之自戲自歌異。其最初者卽爲撫兒使睡之歌，以嘽緩之音，作爲歌詞，反復重言，聞者身體舒解，自然入睡。……此類雖視爲母歌，及兒童能言，漸亦歌之，則流爲兒戲之歌。』

我時常聽見老娘們抱着小孩兒，一邊用手拍着，一邊嘴裏唱着：『呵！呵！小孩兒睡覺啦，呵！呵！』除去『狼來了』那一首，還有兩首『催眠歌』：

(一)

楊樹葉兒，嘩啦啦，

小孩兒睡覺找他媽，
乖乖寶貝兒你睡罷，
媽虎子來了我打他。

（二）

我兒子睡覺了，
我花兒困覺了，
我花兒把卜了，
我花兒是個乖兒子，
我花兒是個哄人精。

『把卜』這兩個字是很難解的，韋大列的註釋裏面也曾提過，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問了許多上年紀的人也都說不出來；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是蒙古話，我就有點兒相信，隨去學蒙文，借此機會可以問蒙古人了。但是任憑你怎樣問，他也不知

三十九

道。我始終不服氣，總疑惑有影響，後來纔知道決不是蒙文。因爲韋大列著有蒙文的文法；若是蒙古傳來的，他決不會不知道。我又在兒女英雄傳的第二十四回裏見有『罷卜着睡』，我想許是小孩兒嘴裏含着乳頭睡覺，叫做『罷卜』，也未可知。（英文裏有個字『Pap』是『乳』的意思，倒也相近。）

還有韋氏第十七首：我總不相信是『自然的歌謠』，我疑惑是坊間唱本百花名。後來我的朋友也給我搜集兩首來，與這首差不多，於是我纔相信韋氏確是由民間得來，但他的第一百十三首，則不足取了。如今把第十七首寫在下面：

石榴花兒的姐，茉莉花兒的郎，
芙蓉花兒的帳子，繡花兒的牀，
芝蘭花兒的枕頭，芍藥花兒的被，
繡球花兒的褥子鬧嚷嚷；
叫聲秋菊海棠來掃地，

處美人兒的姑娘走進了房，
兩對銀花鏡，
梳油頭桂花香。
臉擦宮粉玉簪花兒香，
嘴點朱唇桃花瓣兒香，
身穿一件大紅襖，
下地羅裙拖落地長；
叫了聲松花兒來掃地，
松花掃起百合香；
茨菇葉兒尖，荷花葉兒圓，
靈芝開花兒抱牡丹，
水仙開花兒香十里，

梔子開花兒嫂嫂望江南。

再看坊間唱本兒的百花名，十採花：

牡丹花的姐兒，芍藥花的郎，

丹桂花的幔帳，茉莉花的牀，

繡球花的枕頭，芙蓉花的被，

芝蘭花的褥子鋪滿牀；

到晚來秋菊花臘梅花把銀燈掌，

他二人並頭蓮花上了象牙牀，

脫去衣裳入了水仙花的帳，

揉爛了巫雲夜來花香；

清晨早起又把菱花照，

青絲花鳥雲玫瑰花香，

梧桐刨花抿成騎馬穗兒，
紐絲派油頭桂花香；
柳眉杏眼花含露，
罌粟花洋鏝貼太陽，
臉擦宮粉桃花潤，
嘴唇胭脂橘子花香，
玄丹花鼻子，櫻桃花口，
雪花銀牙豆蔻花香，
元寶花的耳朵金銀花的墜兒，
鬢角上斜插花海棠；
身穿一件石榴花的襖，
雞冠花的褲子大甩襠，

梔子花褲腿兒，月季花的帶兒，
玉簪花裏脚秦椒花內藏，
欵冬花邁開金蓮蓮花步，
春風一動百草花香。

我們看着雖不敢說第十七首不是『自然的歌謠』，但不能說沒有一點兒影響。再看何德蘭的第一百十六首：

樹葉青，
齊王選他作正宮。
樹葉黃，
齊王選他作娘娘。

這首我知道是由彈詞裏英烈春秋來的，一看便知：

桑葉青，桑葉青，

齊王聘我掌宮庭，
無鹽若進昭陽院，
九族叨恩蔭父兄。

*

桑葉黃，桑葉黃，
天子封我掌國邦，
三宮六院皆欽伏，
父兄加職伴君王。

英國有一首『兒歌』也與這首相近：

百合花的白，
迷迭香的青，
你要是國王，

我就是正宮。

*

薔薇花的紅，

零陵香的綠，

你要不忘我，

我就不忘你。

但何氏也有大錯的：在一百〇一頁徑直的把唱本兒王二姐摔鏡架裏的引場詩（灘頭）給抄來了：

一場秋風一場涼，

一場白露一場霜，

嚴霜單打獨根草，

螞蚱死在草根上。

然而也確有一些人們唱他，不過是沒有經一番陶冶罷了。就如街上小孩兒們唱的：

天牌呀，地牌呀，奴不愛，

只愛人牌對蛾牌！

誰人不知道他是唱本兒的打骨牌，難道也算歌謠嗎？然而我們實在也難怪有這些錯誤在裏邊：就如王大娘探病或叫紗窗外罷：

紗窗，紗窗外呀，高底兒響叮噹，

問了一聲誰呀，隔壁王大娘，

許久不上俺家逛阿，我的王大娘兒啊

※

大娘進屋裏呀，坐在象牙牀，

今日我無事呀，來看二姑娘，

姑娘的病體可怎樣呵，咊喉咊喉嗐！

※

奴家的病兒煩呀，必內不自然，
茶也懶怠吃呀，飯也懶怠餐，
珍羞美味懶怠下咽呵，我的王大娘兒咧。

北京的『兒歌』裏也確實的有這麼一首：

紗窗，紗窗外，厚底兒響叮噹！
『問了一聲誰？
——隔壁王大娘。
——王大娘，請到屋裏高凳兒上坐。』

※

撤開紅綾帳，瞧見二姑娘，
二姑娘病的不像人樣兒。

『二姑娘，二姑娘，你怎麼不梳頭？
沒有桂花油。
你怎麼不洗臉？
沒有玫瑰碱。
你怎麼不吃飯？
沒有烙餅，攤雞蛋。
你怎麼不喝粥？
沒有金鈎兒如意八寶兒菜。』
還有一首是由神仙傳裏的張果傳來的，或者是張果好詼諧的原故：
拍！拍！
誰呀？
——張果老哇。

——你怎麼不進來？

——怕狗咬哇。

——你胳肢窩夾着什麼？

——破皮襖哇。

——你怎麼不穿上？

——怕虱子咬哇。

——你怎麼不讓你老伴兒拿拿？

——我老伴兒死啦。

——你怎麼不哭她？

——盆兒呀！罐兒呀！我的老蒜瓣兒呀！

由此看來，要研究歌謠，不只要好的文學，——『真詩』——還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學。要研究民族心理學，萬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書籍。所以我要讀坊間的唱

本兒，彈詞，小說，比較那大文學家的著作愛讀的多。我想本可以不必知道著者是誰，只要看他的內容取材於社會和影響於社會就得了。我們就從此努力研究『民俗學』（Fookeore）罷！

十一，十月，七日。

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卷頭言

我是有歷史癖的；我深信語言是一種極守舊的東西，語言文字的改革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語言文字的歷史，曾發現一條通則：

在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却是頑固黨。

從這條通則上，又可得一條附則：

促進語言文字的革新，須要學者文人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式的承認。

這兩條原則，是我五年來關于國語問題一切論著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不須舉例來證明了。

小百姓二千年中，不知不覺的把中國語的文法修改完善了，然而文人學士總不肯正式承認他；直到最近五年中，才有一部分的學者文人正式對這二千年無名的文法革新家表示相當的敬意。俗話說，『有禮不在遲。』這句話果然是不錯的！

然而這二千年的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

例如一個『錢』字，有十六畫；小百姓嫌他太難寫了，就改用一個四畫的『尓』字，甚至于改用一個兩畫的『[illegible]』字。又如『萬』字改作『万』字，『劉』字改作『刘』字，『龜』字改作『龟』字，『亂』字改作『乱』字，『竈』字改作『灶』字，『蘆』字改作『芦』字，『聽』字改作『听』字，『聲』字改作『声』字，『與』字改作『与』字，『靈』字改作『灵』字，『喜』字改作『㐂』字，『齊』字改作『齐』字，『齋』字改作『斋』字，『還』字改作『还』字，『壞』字改作『坏』字，……這些驚人的大改革，處處都合于『經濟』的一個大原則。我曾說過：

改變的動機是實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目的，是要補救這種實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結果是應用能力的增加。（胡適文存卷三，頁三四。）

那幾句話雖是爲白話文法說的，但我現在用來褒揚破體字的改革，似乎也是很適當的。

小百姓總算盡了他們的力了；現在又輪到學者文人來做審查與追認的一步工夫了。

錢玄同黎劭西諸位先生們對于古來這些破體字，曾經細細研究過，認爲很有理由的改革，認爲進步，不是退化。他們覺得這些破體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灘簧的專有品，乃是全國人的公共利器。所以他們現在以言語學家的資格，十分鄭重的對全國人民提出他們審查的報告，要求全國人采用這幾千個合理又合用的簡筆新字來代替那些繁難不適用的舊字。

這雖不是澈底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而且應該有的一椿過渡的改革。錢先生們

的理論是很不容易駁倒的，他們的態度是十分誠懇的。我很盼望全國的人士也都用十分誠懇十分鄭重的態度去研究他們的提議！

十二，一，十二，病中作。

胡適之先生對於我們出『漢字改革號』是極贊成的，曾經答應給我們做一篇長文。不料胡先生現在病了，不能久坐作文；但他還扶病寫了這一篇『卷頭言』給我們。這是我們極抱不安，極應該感謝他的。

胡先生這篇『卷頭言』，是用歷史的眼光說明通行於民衆社會的簡筆字合理又合用，應該由學者文人來審查與追認。他一面固然發表了他自己的主張，一面就介紹我們的提議給全國的人們去做研究的資料。但字體改簡，只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中的一種方法，而且只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此外應該研究的問題很多很多。本期中討論字體改

體的問題以外，還有好些提議，如趙元任先生的『國語羅馬字』，黎劭西先生的『詞類連書條例』，以及沈兼士，蔡子民諸先生所發表的文章都是。我很懇切的希望大家對於這些文章一律注意，並且加入討論。

錢玄同附誌。一九二三，一，一四。

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

讀王國維先生曲錄六卷，晨風閣叢書本。今早出門，買得晨風閣叢書，內有曲錄及戲曲考原。我前曾見曲苑內所收曲錄二卷，甚不滿意；前次小說月報中頡剛的小記一條，始知曲苑本為初稿不完全的稿本，故買此本讀之。

曲錄卷一爲宋金雜劇院本部，凡九百七十七種，多采自周密的武林舊事及陶宗儀輟耕錄。此外尚有采自錢曾也是園書目之「宋人詞話」十二種，當日猶未知其非戲曲也。至近年江東老蟫覓得京本通俗小說九種，共四冊，三冊上有錢遵王圖章，而其中錯斬崔寧和馮玉梅團圓兩種即見于也是園書目的，人始知此十二種乃是話本，不是戲曲。後羅振玉借得唐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始知當日「詩話」「詞話」皆是當日平話的種類。錢曾誤列此十二種入戲曲部，王先生沿其誤而不及改。

以此類推，周陶兩目所列九百餘種中，定有許多不是曲文，其以調名（如金明池、山麻稭）或以事繫曲調者（如四皓逍遙樂，請客薄媚，柳壯上官降黃龍）固是曲，無疑；其以事繫扮演之腳色者（如貨郎孤，貧富旦，孤與旦皆腳色名目）亦無疑。但其中有以事名者（如刺董卓，如懸頭梁上），有以人名者（如王安石，如史弘肇），皆不一定爲曲文。王安石也許和京本通俗小說中的拗相公同是一本。其中最明顯的是頁二十八之太公家教一本，此本之非曲文，王先生後來在他處曾得着鐵證，已無可疑。又頁四二以下之『官名』『飛禽名』『花名』，等等，大概也都是話本。

卷二列有主名之元雜劇四百九十六種。卷三列有主名之明雜劇一百五十六種，元明無名氏雜劇二百六十六種，清雜劇有主名的六十九種，無名氏十四種；共五百〇五種。計二卷，可定爲元明清三朝雜劇的，共一千〇一種。

卷四列傳奇，有主名的二百六十七種，無名的百二十種。其首列之董解元西

廂，乃敍索彈詞，不當列在此。又此三百八十多種，只有五六種是元人做的，大概皆元末明初人；其餘皆明人之作。

卷五列清代傳奇，有主名的四百三十七種，無名的三百七十二種，倂禁書目中六種，共八百十五種。中如歸莊的萬古愁明是彈詞，高鶚的紅樓夢明是小說，皆不當列入。又如舒位的修簫譜四種，皆是極短的雜劇，也不當列入傳奇之部。此外，遺漏的當不少。如曹寅的虎口餘生（鐵冠圖），原署『遺民外史』，此錄列入無名氏。曹寅作曲大概不少，今皆不可考了。

計五卷所列，三朝曲本共存三千一百七十八種之目，其全本留傳者，大概只有十之二三了。『正統文學』之害，眞烈於焚書之秦始皇！文學有正統，故人不識文學：人只認得正統文學，而不認得時代文學。收藏之家，寧出千金買一部絕無價值之宋版唐人小集，而不知收集這三朝的戲曲的文學，豈不可惜！

全本既不可得，則保存一部分精華之各種總集爲可貴了。曲錄于此類總集，也

有小錯誤。如誠齋樂府不當在『小令套數部』，如重要選本如綴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譜中既收那些有曲無白的譜，而反遺去曲白俱全之六也曲譜等：都是短處。

此書出版于宣統元年，已近十四年了。這十四年中，戲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們希望王先生能將此書修改一遍，於每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十二，二，十。